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年12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 34 卷(包括总目录卷 1 卷),收入自 80 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 10000 余件,文献上限为 1917 年初,下限至 90 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本卷选编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分为三个专题，即“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1937年12月至1940年8月）、“苏联与1944年的华沙起义”（1944年7~10月）和“苏联战后对德国的占领”（1945年3月至1949年11月）。

“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专题：本卷刊出了有关这一问题的90余件档案文献，一方面反映了苏联政府在实施将波罗的海三国纳入苏联版图的这一既定政策的过程中，与德国政府进行幕后交易和磋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苏联分别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和接触的真实记录。

“苏联与1944年的华沙起义”专题：对于1944年8月1日至10月2日在华沙爆发的反对法西斯德国占领者的失败的武装起义，过去西方公布了很多档案文献。本卷收集的是近年俄国解密的档案材料，其中包括当时苏联政府与英、美之间就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援助问题进行交涉的来往信函，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的会谈记录，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整理的情报和报告，以及镇压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华沙区总督菲舍尔给德国国会议员的报告等。

“苏联战后对德国的占领”专题：本卷刊登的65个档案文件，主要是关于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后改名情报厅）与联共（布）

中央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函、报告、指示等文献。作为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机构之一，宣传（情报）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占领区内部的政治事务集中在自己手中，甚至曾一度参与了制定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因此，这组档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战后对德占领政策的发展和变化。

沈志华

1998年7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21-1

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

(1937年12月至1940年7月)

专题说明..... 21-1

No07362 拉多涅尔呈交爱沙尼亚总统的国防现代化
计划(节录)(1937年12月14日) 21-3

No07359 梅吉尔列关于访问塔林给德国外交部长的信
(1938年8月31日) 21-7

No07363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关于购买武器问题的
讨论记录(1938年11月11日) 21-10

No07437 爱沙尼亚俄罗斯族教育和慈善协会联盟与俄罗斯民族
联盟理事会主席致总统的呼吁书
(1939年2月) 21-14

No07357 李维诺夫关于苏爱关系给列伊的照会
(1939年3月28日) 21-20

No07360 波克关于爱苏关系致德国外交部长电
(1939年4月15日) 21-22

No07388 弗洛文关于与爱比克会谈致德国外交部电
(1939年4月24日) 21-24

- №07387** 瑟尔特尔关于美国呼吁书问题与波克谈话记录
(不早于 1939 年 4 月 24 日) 21 - 26
- №07364** 爱沙尼亚国防部对第二号总动员计划的解释性
呈文(节录)(1939 年 5 月) 21 - 27
- №07365** 里利关于爱沙尼亚军备问题在国防委员会会议上
的发言(1939 年 5 月 25 日) 21 - 32
- №07389** 爱沙尼亚国家杜马关于讨论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
会议记录(1939 年 5 月 25 日) 21 - 34
- №07369** 列伊关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致瑟尔特尔的信
(节录)(1939 年 6 月 5 日) 21 - 38
- №07370** 莫洛托夫与列伊关于爱德条约的谈话记录
(1939 年 6 月 5 日) 21 - 40
- №07390** 爱沙尼亚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1939 年 6 月 7 日) 21 - 42
- №07371** 斯特拉德曼关于与法国接触结果给爱沙尼亚
外交部的信(1939 年 6 月 7 日) 21 - 44
- №07373** 拉脱维亚政府关于苏英谈判给英国政府的
照会(节录)(1939 年 6 月 12 日) 21 - 45
- №07391** 爱沙尼亚政府就互不侵犯条约对国家杜马
的解释(节录)(1939 年 6 月 15 日) 21 - 46
- №07374** 哈里发克斯关于苏爱条约给英国驻里加公使
的信(节录)(1939 年 6 月 17 日) 21 - 49
- №07386** 弗洛文关于德爱关系致德外交部的信(节录)
(1939 年 7 月 5 日) 21 - 51
- №07379** 哈尔列关于拜访瑟尔特尔致哈里发克斯
的信(节录)(1939 年 7 月 11 日) 21 - 53
- №07380** 哈里发克斯关于爱沙尼亚关注英苏谈判致英国
驻里加公使的信(节录)
(1939 年 7 月 18 日) 21 - 56

- No07411** 斯米特关于德苏关系动向给瑟尔特尔的信（节录）（1939年8月22日） 21-58
- No07417** 瑟尔特尔关于爱德关系致拉多涅尔的信（1939年8月24日） 21-60
- No07418** 巴罗关于法国各界对德苏条约的反应致瑟尔特尔的信（1939年8月25日） 21-61
- No05665** 谢苗诺夫关于立陶宛局势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节录）（1939年8月25日） 21-63
- No05666** 佐托夫关于苏德条约与科列契克的谈话（节录）（1939年8月26日） 21-64
- No07419** 瑟尔特尔关于苏德条约与弗洛文的谈话记录（1939年8月28日） 21-65
- No07421** 列伊关于苏德条约给爱沙尼亚外交部的信（节录）（1939年8月31日） 21-66
- No07438** 莫林关于拉脱维亚军事动员事致武装力量参谋部电（1939年9月1日） 21-69
- No07439** 列奥纳尔德关于苏德秘密协定致美国务卿电（节录）（1939年9月5日） 21-70
- No05667** 尼基金关于爱沙尼亚对入侵波兰的反应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1939年9月15日） 21-71
- No07440** 弗洛文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心态致德国外交部电（1939年9月19日） 21-74
- No07443** 列伊关于莫洛托夫召见与爱沙尼亚外交部的电话记录（节录）（1939年9月19日） 21-75
- No05668**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波兰人越境的日记（节录）（1939年9月20日） 21-76
- No05669**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居民情绪的日记（节录）（1939年9月21日） 21-77

- №07444** 契科纳尔蒂关于苏联舰艇出现在波罗的海致
意大利外交部电 (1939年9月21日) 21-79
- №07445** 斯坦因加尔特关于瑟尔特尔访苏致
美国务卿电 (节录) (1939年9月23日) 21-80
- №07446** 舒马尼斯关于瑟尔特尔召见情况致拉脱维亚
外交部电 (节录)
(1939年9月23日) 21-81
- №07448** 莫洛托夫关于苏爱军事联盟与瑟尔特尔的会
谈记录 (1939年9月24~25日) 21-83
- №07449** 斯坦因哈尔德关于瑟尔特尔行踪致美国务卿
的电报 (1939年9月25日) 21-94
- №07450** 弗洛文关于爱苏谈判致德国外交部电 (节录)
(1939年9月25日) 21-95
- №07455**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苏联政府建议
的第29号记录 (1939年9月26日) 21-96
- №07461** 布留克里梅耶尔关于爱苏谈判致德国外交
部长电 (1939年9月27日) 21-107
- №07462** 契克纳尔蒂关于爱沙尼亚与苏联谈判致
意大利外交部电 (1939年9月27日) 21-108
- №07463** 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爱沙尼亚代表团关于
缔约谈判的记录 (1939年9月27日) 21-109
- №07464** 爱沙尼亚驻苏使馆关于爱苏谈判进程致外
交部电 (1939年9月27日) 21-116
- №07465** 爱沙尼亚代表团关于修订条约文本的会
议讨论记录 (1939年9月27~28日) 21-117
- №07466** 威利关于苏联船只被击沉事致美国国务卿电
(1939年9月28日) 21-124

- No07467** 爱沙尼亚外交部关于签订条约致驻莫斯科代表团电 (1939年9月28日) 21-125
- No07468** 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爱沙尼亚代表团关于签约的谈判 (1939年9月28日) 21-126
- No07469** 爱沙尼亚与苏联贸易周转额协定 (1939年9月28日) 21-137
- No07470** 米高扬关于苏爱贸易条约致瑟尔特尔的信 (1939年9月28日) 21-139
- No07456** 拉多涅尔关于准备发生战争致爱沙尼亚各部队电 (1939年9月28日) 21-142
- No07457** 马特洛萨关于爱沙尼亚军方态度致纳尔瓦军区司令的信 (1939年9月28日) 21-143
- No07458** 马特洛萨关于采取应急措施致武装力量参谋长电 (1939年9月28日) 21-145
- No07459** 爱沙尼亚海军司令部关于纳尔瓦海湾地区事件的解释 (1939年9月28日) 21-146
- No05670** 苏联与爱沙尼亚互助条约 (1939年9月28日) 21-147
- No07474** 弗洛文关于爱苏条约致德外交部电 (节录) (1939年9月29日) 21-150
- No07475**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会议关于爱苏互助条约的讨论记录 (1939年10月2日) 21-151
- No07434** 德国外交部致驻塔林、里加和考纳斯使团电 (1939年10月3日) 21-161
- No05671** 苏联与拉脱维亚的互助条约 (1939年10月5日) 21-162
- No07436** 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塔林、里加和赫尔辛基公使电 (节录) (1939年10月7日) 21-165
- No05672** 苏联与立陶宛的互助条约 (1939年10月10日) 21-166

- №05673** 契恰耶夫关于拉脱维亚状况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9年10月10日) 21-170
- №05674** 莫洛托夫关于对爱沙尼亚的报道致尼基金电 (1939年10月20日) 21-173
- №05675**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苏维埃化问题致波兹尼亚科夫电 (1939年10月21日) 21-174
- №05676**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人迁移问题致波兹尼亚科夫电 (1939年10月22日) 21-175
- №05677** 莫洛托夫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化问题致尼基金电 (1939年10月23日) 21-176
- №05678**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会见立陶宛总统的日记 (节录) (1939年11月3日) 21-178
- №07452** 拉多涅尔关于爱沙尼亚与芬兰关系的讲话 (节录) (1940年1月1日) 21-179
- №07477** 拉多涅尔关于爱苏关系状况的讲话 (节录) (1940年1月1日) 21-180
- №05679**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国内情况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0年1月30日) 21-182
- №05680**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士兵失踪问题致波兹尼亚科夫电 (节录) (1940年5月25日) 21-185
- №05682**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工人农民书 (1940年5月31日) 21-186
- №05681** 莫洛托夫关于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致驻立、拉、爱和芬兰全权代表电 (1940年6月14日) 21-188
- №05683**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局势问题与乌尔布西斯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4日) 21-190

- №05684**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国内局势与乌尔布西斯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5日) 21-195
- №05685** 莫洛托夫关于拉脱维亚局势与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1-197
- №05686**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进驻爱沙尼亚与列伊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1-202
- №05687**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进驻拉脱维亚与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1-206
- №05688** 莫洛托夫关于拉脱维亚新政府与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1-208
- №05689** 莫洛托夫关于爱沙尼亚组成新政府与列伊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1-211
- №05690** 捷列维亚斯基关于苏军进驻拉脱维亚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40年6月18日) 21-212
- №05691** 捷列维亚斯基关于里加局势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节录) (1940年6月19日) 21-214
- №05692** 尼基金关于塔林局势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 (节录) (1940年6月26日) 21-215
- №05693** 立陶宛群众在玛利亚木波尔集会上通过的决议 (节录) (1940年6月29日) 21-221
- №05694** 立陶宛人民政府关于议会选举的宣言 (1940年7月5日) 21-222
- №05695** 捷卡诺佐夫和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选举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节录) (1940年7月9日) 21-224
- №05697** 斯涅奇古斯关于立陶宛加入苏联提交议会讨论的议案 (1940年7月21日) 21-226

- №05698** 捷卡诺佐夫和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选举致
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40年7月21日) …… 21-228

苏联与 1944 年的华沙起义

(1944年7月至10月)

- 专题说明** …… 21-229
- №07917** 莫洛托夫与米科拉伊奇克会谈纪要
(1944年7月31日) …… 21-230
- №05329**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关于援助华沙起义者致红军
总参谋部的信 (1944年8月9日) …… 21-234
- №02434** 斯大林与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记录
(1944年8月9日) …… 21-236
- №07918**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关于支援华沙国家军致红军
总参谋部的信 (1944年8月13日) …… 21-241
- №07919** 哈里曼关于使用苏联空军基地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8月14日) …… 21-244
- №07920** 克尔关于使用苏联空军基地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8月15日) …… 21-246
- №07921** 莫洛托夫关于援助华沙问题致克尔的信
(1944年8月16日) …… 21-248
- №07922** 克尔关于英政府掌握的华沙起义情报致莫洛托夫
的信 (1944年8月18日) …… 21-249
- №07923** 莫洛托夫关于援助华沙致克尔的信
(1944年9月9日) …… 21-251

- No0243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情况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9月16日) 21-254
- No07924**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 (节录) (1944年9月18日) 21-258
- No07925** 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 (1944年9月19日) 21-261
- No0792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 (节录) (1944年9月20日) 21-264
- No02439**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9月22日) 21-267
- No02441**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9月25日) 21-272
- No07927**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战处关于华沙形势的情报 (1944年9月30日) 21-278
- No07928** 苏军情报员奥列格关于华沙局势的报告 (1944年10月1~2日) 21-281
- No07929** 红军总参谋部关于停止向华沙运送物资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2日) 21-296
- No07930**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准备投降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 (节录) (1944年10月3日) 21-298
- No07931** 红军驻波兰第1集团军代表关于波兰军官证词的报告 (1944年10月3日) 21-301
- No02443**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3日) 21-310
- No02444**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5日) 21-316
- No0244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6日) 21-322
- No02448**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10日) 21-325

- №01897** 德国占领者关于华沙起义的报告
(1944年10~11月) 21-329

苏联战后对德国的占领

(1945年3月至1949年11月)

- 专题说明**..... 21-357
- №01935** 季米特洛夫和潘友新关于在德国开展政治工作
给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3月) 21-359
- №01936** 关于在德国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
(摘录)(1945年7月5日) 21-364
- №01937** 谢罗夫关于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区状况给贝利亚
的报告(摘录)(1945年7月9日) 21-367
- №01978** 关于苏驻德军政府政治部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工作的
总结报告(1945年10月31日) 21-369
- №0193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局《关于德国的政治状况》的
综述(摘录)(1945年11月3日) 21-376
- №01939**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共产党和社民党合并情况给
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6年2月25日) 21-388
- №01940**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关于柏林各区筹备两党合并
情况给巴兰诺夫的报告
(1946年3月14日) 21-391
- №01979** 希金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给亚历山
德罗夫的报告(1946年3月30日) 21-396

- №01941** 别斯帕洛夫关于改进苏联对德国居民无线电广播的措施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6日) 21-401
- №01980** 菲利波夫关于改革苏联驻德宣传工作给洛佐夫斯基的报告(1946年5月25日) 21-403
- №01942**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6月25日) 21-407
- №01943** 萨波日尼科夫关于基督教民主同盟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1946年7月2日) 21-410
- №01944** 秋尔潘诺夫关于萨克森专区全民投票结果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9日) 21-412
- №01945** 秋尔潘诺夫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给希金的报告(摘录)(1946年7月20日) 21-414
- №01946** 秋尔潘诺夫关于德国苏占区工会运动状况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25日) 21-417
- №01981** 希金关于检查从政治上确保苏占区社区选举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1946年8月3日) 21-419
- №01947** 苏斯洛夫关于改进战俘通信组织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摘录)(1946年8月5日) 21-422
- №01948** 秋尔潘诺夫关于自民党柏林组织领导人给希金的报告(摘录)(1946年8月8日) 21-425
- №01982** 苏斯洛夫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1946年8月22日) 21-428

- №01949** 秋尔潘诺夫关于大柏林社民党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的
报告（摘录）（1946年8月26日）…………… 21-430
- №01950** 秋尔潘诺夫和科吉科夫关于柏林选举给苏斯洛夫
的报告（摘录）（1946年8月28日）…………… 21-432
- №01951**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关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
的情报汇总（摘录）（1946年9月14日）…………… 21-435
- №01983** 秋尔潘诺夫在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检查苏驻
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会议上所作总结汇报的
速记记录（摘录）（1946年9月16日）…………… 21-438
- №01985** 潘友新、库扎科夫和布尔采夫关于对苏驻德军政府
宣传厅工作的检查结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摘录）（1946年10月11日）…………… 21-451
- №01952** 谢苗诺夫关于同贝希尔谈话的通报
（1946年11月16日）…………… 21-460
- №01986** 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
的工作给斯大林的报告（草稿）
（不晚于1946年12月25日）…………… 21-464
- №01987** 联共（布）中央关于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的决议
草案（不晚于1946年12月25日）…………… 21-470
- №05111** 苏斯洛夫提交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材料
（1947年1月25日）…………… 21-476
- №05112** 苏斯洛夫提交的社会民主党的材料
（1947年1月29日）…………… 21-483
- №05113** 苏斯洛夫提交的统一社会党的材料
（1947年1月31日）…………… 21-488

- No05114** 斯大林与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纪要
(1947年1月31日) 21-493
- No05115** 苏斯洛夫和科罗特凯维奇关于统一社会党代表团
工作的报告(1947年2月12日) 21-504
- No01953**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工会选举的结果给苏斯洛夫
的报告(摘录)(1947年3月5日) 21-508
- No01988** 米隆诺夫和卡秋什金关于考核苏驻德军政府领导干部给
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4月8日) 21-512
- No01954**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市社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给
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4月29日) 21-515
- No01955**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会
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7月4日) 21-517
- No01956** 秋尔潘诺夫关于检查统一社会党萨克森专区总结
选举运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7年8月9日) 21-520
- No01957**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十三届全会给联共(布)中央的情报汇总(摘录)
(不晚于1947年9月9日) 21-524
- No0195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苏占区基民盟代表大会给联共
(布)中央的情报汇总(摘录)
(1947年9月9日) 21-526
- No01959**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给苏斯
洛夫的报告(摘录)(1947年9月27日) 21-529

- №01989** 马卡罗夫关于在德国居民中举办讲座给苏斯洛夫的
报告（摘录）（1947年10月24日） …… 21-538
- №01960**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给苏斯
洛夫的报告（摘录）（1947年11月15日） …… 21-541
- №01961**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给苏斯
洛夫的报告（摘录）（1947年12月8日） …… 21-543
- №01962** 秋尔潘诺夫关于“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人民
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和希金的报告（摘录）
（1947年12月9日） …… 21-545
- №01963** 巴兰诺夫关于皮克讲话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1月30日） …… 21-548
- №01964**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德国自由民主党给巴兰
诺夫的情报材料（摘录）
（1948年4月16日） …… 21-550
- №01965**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柏林自民主党的材料
（摘录）（1948年4月16日） …… 21-552
- №0196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
理事会第九届全会给苏斯洛夫的情况报告
（摘录）（1948年4月27日） …… 21-555
- №01990** 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
情报厅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8年5月） …… 21-558
- №01967**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市工会的状况给巴兰诺夫的报告
（摘录）（1948年5月11日） …… 21-565
- №01991** 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关于苏驻德军政府的干部工
作给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6月9日） …… 21-567

目 录

- №0196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福音教会全德代表大会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1948年7月16日）…… 21-569
- №01969**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农民民主党占领区代表会议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7月23日）…… 21-570
- №01970**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会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8月2日）…… 21-572
- №01992**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工作给希金的报告（1948年8月17日）…… 21-574
- №01971**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三届全会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9月17日）…… 21-582
- №01972** 鲁斯基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四届全会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10月27日）…… 21-586
- №01973** 科列斯尼钦科关于图林根各党派状况给波诺马廖夫的汇报（摘录）（1948年11月29日）…… 21-588
- №01974** 鲁斯基赫关于苏占区管理机构领导干部组成状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8年12月11日）…… 21-593
- №01993** 苏驻德军政府党的积极分子1949年经济-政治工作会议速记记录（摘录）（1949年3月9日）… 21-595
- №01975**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二十届全会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9年7月26日）…… 21-603

- No01994** 阿巴库莫夫关于菲尔德曼供词给马林科夫的报告
(摘录)(1949年8月9日) 21-605
- No01976**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政治局讨论
西德议会选举结果给联共(布)中央的汇报
(摘录)(1949年8月20日) 21-607
- No01995** 沙吉洛夫关于解除秋尔潘诺夫职务给马林科夫
的报告(1949年9月17日) 21-612
- No01977** 苏驻德军政府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二十二届
全会的情况汇报(摘录)
(1949年11月1日) 21-614

【专题说明】

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

(1937年12月至1940年7月)

波罗的海三国是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爱沙尼亚民族形成于12~13世纪，拉脱维亚于10~13世纪建立了几个早期的公国，立陶宛则在公元1240年形成为统一的大公国。从13世纪起，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遭到外国列强德国、瑞典、波兰、丹麦和沙皇俄国的侵略与统治。立陶宛从1385年起曾三次与波兰联合。到19世纪，这三个国家相继被沙俄吞并。1917年11月，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建立起苏维埃政权。1920年两国分别成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立陶宛在1918年2月宣布独立，也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1920年2月、7月和8月，苏维埃俄国分别与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三国签订和约，与它们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条约规定彼此不得允许在本国领土上建立和驻留敌视对方的组织和集团，并确定了它们各自的国界。1926年9月28日、1932年2月5日和同年5月4日，苏联分别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签订了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冲突条约。

1939年春，希特勒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后，国际局势骤然紧张。英法等西方大国与苏联展开谈判，试图缔结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夹在德国与苏联两大国之间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

脱维亚和立陶宛，为了保证国家的生存，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并进行了频繁的外交努力。但是，由于英法与苏联谈判的失败，特别是德国同苏联于8月23日和9月28日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议定书，波罗的海三国被纳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随后，苏联分别与上述三国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苏联承诺既不打算损害三国的主权，也不触及三国的国家政体，三国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保留自己的内外政策、议会、军队和经济体制，并答应不把共产主义强加于这三个国家。于是，三国政府分别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和秘密议定书，同意苏联在本国领土建立军事基地并驻军。

1940年5月，希特勒在西线打败英法，苏联感到局势不容乐观，于是制造各种借口，以达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保证苏联安全的目的。苏联首先拿立陶宛开刀，莫洛托夫召见该国驻苏联代表，指责该国迫害苏联驻军，造成苏军士兵失踪，随后又召见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驻苏联代表，指斥它们不履行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苏联借口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组成波罗的海协约国，进行反苏活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这三个国家立即改组政府，成立亲苏联的政府，并允许大量苏联军队进驻。同年6~7月，苏联军队分别占领了这三个国家，8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相继宣布加入苏联。

由于缺乏原始材料，特别是苏联方面的档案文献，以往人们对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的内情不甚了解。本专题收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90余件档案文献，其中主要是俄国近年来解密的历史档案。同时，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也收入了部分爱沙尼亚和有关西方国家公布的档案。这些文件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波罗的海地区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和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的实际过程。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和胡昊编辑、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胡昊、李宝强、方琼等)

No 07362

拉多涅尔呈交爱沙尼亚总统的 国防现代化计划（节录）

（1937年12月14日）

目前我国国防在武器和军事物资方面的状况不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在这方面我们缺乏时代要求的战斗准备。我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相应的训练，这是由于武器和作战物资老化和不足造成的。

如果在平时时期没有现代武器，那么在战争时期或者在这之前，特别是与我们的东方邻邦发生冲突时，要提高战斗力是不能实现的。要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各类人员和军事长官，以及形成必要的观念和机构需要数年时间。如果在平时时期获得了使用现代武器和作战物资的应有技能和经验，那么一旦爆发军事冲突，就可以有效地使用它们。

战争爆发时，可供我们支配的时间不多，因为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进展将非常迅速。在战争初期，我们应该作好战斗准备，表现出实力，我们不能因为我国领土回旋余地小和进行抵抗的人力和物资资源有限而使我们的领土遭到损失；如果在靠近边界的地区依靠自然条件形成比较简单和快捷的防御阵地，也是有助于开展军事行动。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在平时时期就在国防问题上采取坚决的步骤。

拥有用现代武器装备的军队、保障供应和战争准备，其目的是除了在战争时期必须使用外，还应该防止战争的突然发生。如果假

想敌确信，一旦进行突然进攻，它用少量部队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它的侵略意图就会减弱。

在捍卫共和国的独立时，我们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这种局势也要求我们及时而全面地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我们在战争初期有力量保卫自己，并且在初次打击下没有崩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外部援助才会出现，而援助的形式并不重要。

我们的经济难以承受同时实现全方位的国防现代化，对某些方面（坦克、反坦克武器等）可以实行合理的改装，而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和完善则会受到限制。我们应该逐步地使我国国防实现现代化，为此首先必须建立可靠的基础。所以，应该根据我们的能力和需求，在某些方面发展国防力量。

根据这些理由，目前国家国防现代化计划的规模应该是使我们的武装力量获得现代武器。在编制计划时，应该对那些武装力量的战斗力具有最强大影响的项目给予优先考虑。

为了实现上述现代化计划，根据当前价格计算，大约需要2800万克郎。由于涨价问题，对任何一个项目不可预测的费用都无法做出规划。超出武装力量部的基本预算和附加预算的部分，应该从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基金中拨出。费用应该按5~6年分配，并且头5年每年500万克郎，第6年为300万克郎。……

在地面武器和作战物资方面，我们面临着四个问题：

- (1) 建立坦克部队和反坦克武器防御系统；
- (2) 炮兵现代化；
- (3) 购买保护步兵的武器；
- (4) 摩托化……

三、空 军

……这样，我们对作战飞机的最低需求是：

——侦察和通讯飞机 24 架

——歼击机 42 架

——轰炸机 18 架

——鱼雷歼击轰炸机 6 架

我们总共需要 90 架战斗机……

四、防空炮兵

……这样我们对防空炮兵的最低需求是：

——75 毫米高射炮连 4 个

——37 毫米高射炮连 10 个

——20 毫米高射炮连 7 个

——探照灯中队 4 个……

五、海 军

……我国海军力量最迫切需要的是购买高速鱼雷快艇。首先必须至少购买三艘有武器和装备的高速鱼雷快艇。……

六、海岸要塞

在奈斯与苏鲁比之间和中部地区装备了 305 毫米装甲炮塔，我们海岸要塞的火力体系大大地加强了。此外，为增加射程而装备了 305 毫米大炮之后，它们就能够用炮火覆盖塔林 - 波尔卡拉一线整个芬兰湾地区。例如，一旦与东方邻邦发生军事冲突，就可以设置显著的障碍，以阻止它的军舰进入奈斯 - 波尔卡拉一线封锁我们的海路，进攻我们的群岛。同时，海岸要塞的火力系统越靠近西部，就越能够防御对奈斯与苏鲁比之间的塔林地区的射击。……

八、加强边界工作。

……上述所有四个重要战略地区（即伯朝拉 - 伊兹博尔斯克战略基地、纳尔瓦 - 约赫维战略基地、塔林地区和群岛）要求长期的筑垒设施。然而，最需要这些设施的是在东部边界，因为塔林的防御有海岸要塞来保障，而群岛没有受到像陆地领土那样大的威胁，

即使对群岛发动进攻，也不会像对陆地领土入侵那样，对我国的国防造成如此重大的影响。……

伊·拉多涅尔中将^①

尼·列埃克^②

① 伊·拉多涅尔（1884～1953），1901～1917年在俄军任职。1917年12月至1918年2月任爱沙尼亚师师长。1934年任爱沙尼亚军总司令。

② 尼·列埃克，时任爱沙尼亚武装力量参谋长，少将军衔。

№07359

梅吉尔列关于访问塔林给德国 外交部长的信

(1938年8月31日)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瑟尔特尔不止一次地邀请笔者访问雷瓦尔^①。爱沙尼亚公使也邀请了我。在与外交部进行磋商后，由于局势不平静，预料爱沙尼亚人可能会对我提出某些建议。我与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进行了两次长时间的谈话：第一次在8月29日，我的朋友财政部长列奥·谢普以及出版部门的领导人也参加了；第二次于8月30日秘密进行。事实上，邀请我访问雷瓦尔的原因是请求帮助在第三帝国出版爱沙尼亚总统皮亚特斯^②的书，就像不久前出版芬兰总统的书一样，而且要写序言，并给予其他协助。我答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实现这个出版计划，而且，爱沙尼亚人十分明确地力争加强与第三帝国的友好关系。我对外交部长从道义上支持上述著作的出版表示感谢。

在密谈中，我们讨论了一旦局势出现复杂化时，爱沙尼亚所应采取的立场。瑟尔特尔声明，爱沙尼亚的目的是严守中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不会允许俄国人经过自己的领土，并将捍卫到最后一刻。它不打算参与国联的任何军事制裁；至于第16条，那么正好准备以上述精神公开声明。当然，这个声明不可能在10

①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在1219~1917年的旧称。

② 卡·皮亚特斯(1874~1956)，1918~1919年任临时政府主席和军事部长。1938~1940年任爱沙尼亚总统。

月前公布，将在爱沙尼亚议会上公布，而不是在日内瓦。我问，在奥斯陆签署协定的各国^① 准备在日内瓦发表一个声明，爱沙尼亚为什么不想参加进去，并指出，一旦出现不可预测的紧急情况，苏俄、法国、英国会利用爱沙尼亚是国联成员国这个事实，作为把爱沙尼亚卷入参加它们方面的军事行动的借口。我认为，以最快速度宣布爱沙尼亚绝对中立是爱沙尼亚消弭在一开始就向它施加压力的更强有力的保证。

看来，我的这些观点对瑟尔特尔产生了影响，就在我飞离雷瓦尔的那天，他通过其新闻部门领导人塔塔尔秘密向我通报，他将与其他部长们讨论这个问题，让他们同意在最近几天里采取相应的措施。所以，如果瑟尔特尔履行自己的决定的话，德国在不远的将来就可看到爱沙尼亚对此问题的声明，拉脱维亚同样也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我未能把这个结果通报德国驻雷瓦尔的外交使团。

至于其他问题，瑟尔特尔强调说，即使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爱沙尼亚也将依赖于同所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贸易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它都需要得到棉花、橡胶、皮毛、谷物等供应，并且希望，经由芬兰和瑞典的交通线将对爱沙尼亚敞开，即使像他认为的那样，在俄国人从海上推进到埃泽尔（萨列马）和阿兰群岛，封锁了芬兰和爱沙尼亚沿岸最重要地方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问，一旦发生侵略，俄国要求其军队通过爱沙尼亚的领土，爱沙尼亚是否会寻求援助。外交部长回答说，会立即向盟国拉脱维亚请求援助，更要向“俄国的敌人”请求援助。他认为，俄国人不会从陆地上发动进攻。

^① 在奥斯陆签署协定的国家是斯堪得纳维亚国家及其比邻小国，1936年这些国家声明，关于国联章程第16条，他们要为自己保留行动的自由，他们将对侵略者采取集体制裁。1938年这些国家通过了中立法。

爱沙尼亚对俄国的担心是十分现实的，因为他们认为，不仅是俄国人构成了军事威胁，而且共产主义也构成了威胁，它能够在某种局势下把 120 万爱沙尼亚人民从肉体上消灭。在雷瓦尔，人们还相信，波兰也会拒绝俄国经过其领土的任何企图。苏俄对速决战不感兴趣，它希望持久战，因为它无论如何都会取胜，而且有可能在某个国家确立布尔什维主义制度。最近，爱沙尼亚与德国的关系很好，瑟尔特尔希望进一步改善这种关系，并对此充满信心。然而，德国的任何预先措施都会引起爱沙尼亚的巨大不安。

谈到立陶宛，不久前我向他的代表提出，对爱沙尼亚来说，与立陶宛相反，不存在失去像梅梅尔这样边境地区小块领土的问题；一旦俄国发动进攻，爱沙尼亚本身也将处于威胁之下。我认为，在德国的正确支持下，波罗的海协约国的领导权将会转到爱沙尼亚手中。由于爱沙尼亚同时与芬兰保持着良好关系，它也是与签署奥斯陆协定国家重要的联系环节。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转达了对帝国外交部长的深切敬意，并说，在 10 月初从瑞典返回的途中，他打算在柏林作短暂停留，如果有可能拜会帝国外交部长，他将非常高兴。因为瑟尔特尔活跃、有权威和重功名，我建议接见他，而不要理会德国外交使团在这个问题上的成见。遗憾的是，我在这里呆得时间太短，未能得到瑟尔特尔所提议的总统和爱沙尼亚“铁碗人物”——拉多涅尔将军的接见。下次去爱沙尼亚时，无疑可以得到接见。

卡尔·梅吉尔列博士^①

^① 卡尔·梅吉尔列，德国记者，德国空军司令戈林的女婿，与德国的外交和宣传部门有密切的关系。

№07363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联席会议 关于购买武器问题的讨论记录

(1938年11月11日)

经济部长列·谢普：我想通报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

德国欠我国的债务为370万德国马克，合我国货币约600万克郎。

为了避免损失，政府希望消除上述余额，并努力避免其以后再度出现。政府委托我制订相应的规划。在编制的规划中，将通过以下方法消除余额：（1）额外购买铁路物资；（2）加速购买军事装备。

现在，在国防基金中有某些款项，可以用来购买装备。众所周知，军事部与德国的一些企业有协议，如果对部分通过划拨进行结算，部分用现汇购买的话，德国同意卖给我们军事装备。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部除了按照计划规定的提前一年购买装备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这样我们就能够消除结算余额。第一年依靠国防基金支付不会有困难。以后怎样行事，我现在还不知道。共和国政府已经同意了 this 计划。

伊·拉多涅尔：应该恢复铁路的秩序。从成立共和国起，几乎对铁路没有任何投资。国防领域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这方面拥有的资产总额超过了国家预算。然而这一切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留下的，大部分是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我们一直依靠着这些原有的储备，而现在一切都已经耗尽。应该向任何大国购买军事装备，重要

的不是武器的制式，而应该是最先进的。小国在和平时期可以出售军事装备，并且可以用贷款的方式，然而在战争时期，如果参加了战争，只有付给黄金才可以出售武器，因为它自己的武器也不够。大国在战争时期也可以用贷款的方式出售武器，但这要看与谁交战。我们的空军是在英国训练的，我们可以从那里购买相应的装备，然而由于所有的工厂已被英国航空部的定货弄得负荷太重，只有得到英国航空部的准许，它们才卖给我们。根据计划，我们必须购买大炮。到处都可以买到大炮。因为它们的质量指标几乎是相同的。制式不起任何作用，我们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大炮，根据口径，弹药随处都可以购买。目前在法国买不到，因为国家的定货已经使工厂满负荷运转了。对于已经接受的外国的加急定货，它们宁愿支付违约金。依靠德国资本的瑞典工业为英国生产武器，然而它的定货也过多，过36个月才能执行定货。有可能在德国购买。德国的大炮不是最好的，但也很不错，因为它们的武器情况早就很好了。在以马克结算的基础上，我们在那里定了货。我们的基金中有一笔款，现在我们可以加紧定货。靠出售旧装备得到的相应外汇存放在爱沙尼亚银行。以后每年支出，要充实基金将出现困难，但是目前没有任何困难。用于国防需要的是预算总额的21%。我知道，拉脱维亚支出比我们多两倍。然而，拉脱维亚的武装力量并没有超过我们的两倍。

经济部长声明说，他在国防基金拨款方面没有硬性的计划。然而可以相信，在实施国防计划时，公民们不得不承受某些困难。因为这将增加税收或发行公债。如果这也不能实现，那么就减少比较容易减少的支出。我们以前的支出不大，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其他国家用于国防的支出很多。我认为，如果增加税收，就应该解释清楚，这些钱将用来干什么，那么这就不会引起怨言。是发行公债、提高税收，还是减少某项支出，这并不十分重要，但是

我们应该得到相应的资本，以满足国防需要，必须实现这项计划。

我们需要防空大炮和某些型号的榴弹炮。此外，应该得到相应的资金，用现代武器装备部队，使部队实现机械化。在购买现代武器时，还会出现一些附加支出：必须建设飞机库和仓库。我们的飞机确实很少，已经与塔林市政当局进行谈判，有可能将增加飞机。然而明显的是，购买现代武器的间接支出也将增加。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那样，我们的全部条件与我们的邻邦相比，支出还不多，应该加以实施。

阿·奥伊纳斯^①：我感兴趣的是发展我们本国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军工厂运作良好。有没有可能使三个波罗的海国家至少建设一个联合工厂。我们在国外购买的越多，我国的财政状况就越严重。

伊·拉多涅尔：对国防问题作公开声明是困难的。显然，我们在国外订购的是我们在国内不能生产的武器。我们不能生产飞机和防空大炮。然而我们国内可以生产教学模拟机和教练机。我们必须得到最现代的武器，因为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缺乏的不是人力，而是武器。为了合理地利用资金和人力资源，我们应该用最现代的武器装备他们。有的武器我们国内不能生产。我们的部分装备，如国防军的载重卡车，虽然应该在国内进行维修，然而不是在国家的车间，而是在私人的装备更现代的车间里进行维修。

我们的兵工厂可以制造步枪，但是没有人需要。武器可以在国内修理，弹药也可以在国内制造。为此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料。甚至大国也不可能靠自己的原料制造武器。这部分是因为制造军事装备需要特种的钢和铁。如果爆发战争，小国就不可能卖给我们弹药，因为它自己的弹药也不够。

如果按照对分制与拉脱维亚联合建立工厂生产弹药，例如，我

^① 阿·奥伊纳斯，爱沙尼亚国会议员。

们生产弹壳，拉脱维亚生产弹头，那么显然，一旦爆发战争，双方就难以生产弹药。拉脱维亚不能向我们提供弹头，我们不能向它提供弹壳，因为他们自己也需要。然而大国在战争时期能够向我们提供弹药，因为他们有可能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生产弹药如此困难，以至根本不可能形成完整的成品。我们在马亚尼克有工厂生产准备使用的弹药。弹药库分散在全国——塔帕、维尔扬迪、伯朝拉、塔尔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工厂使大炮现代化——通过改变海岸防御大炮的压缩机增加其射程。在规划中规定了国内所能做的一切。在这方面与外国合作是不可思议的。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是波兰本国都不能自己保障必要的军备需求。只有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不仅能够完全满足自己的军备需求，而且还可以供应小国。

现在我們不需要射击武器。我們得到了应有的机枪供应。它们不是最新型的，但毕竟是很好的。如果进行替换，那么要花费将近500万克郎。现在我们必须得到防空大炮和某些型号的榴弹炮。

伊·拉多涅尔：听取了经济部长的情况介绍后，我想建议委员会，他们应该了解情况，并赞同这个规划。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们必须或者赞同，或者否决这个规划。

经济部长列·谢普：我想知道，大家是否赞同部分通过加快国防定货，部分通过订购恢复铁路运输所需的机车，来冲销结算余额。

伊·拉多涅尔的建议被通过了。

№07437

爱沙尼亚俄罗斯族教育和慈善协会联盟 与俄罗斯民族联盟理事会主席致总统的呼吁书 (1939年2月)

尊敬的总统先生，我们，代表院中的俄罗斯族代表，认为自己有义务在给您的这个呼吁书中阐明我国俄罗斯少数民族经济、法律和文化状况的特点。

1938年底，我们有幸与您就本呼吁书中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交谈，您当时希望有一个更加详细地阐释我们与您谈话的内容的呈文。在起草呈文时，我们的指导思想是，既意识到自己对爱沙尼亚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的责任，也认识到对整个国家的责任。

首先我们认为有义务阐述那些在与您口头交谈中极少涉及的俄罗斯族居民的生活方面，即爱沙尼亚边区：伯朝拉边区、楚德湖沿岸和纳洛夫河沿岸地区俄罗斯族居民的经济状况，它与爱沙尼亚其他各县的经济状况迥然不同。

大部分俄罗斯族农村的农户缺少土地，牲畜和机械也比较少。正式出版物中采用的一系列数字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上述情况的真实性。

根据各类农户占总数的百分比，可以说明俄罗斯族边区农户土地数量的占有情况：

	1.5公顷	5~10公顷	10~20公顷	20公顷以上
伯朝拉边区	34%	35%	23%	8%
纳洛夫河沿岸	32%	34%	22%	12%
楚德湖沿岸	83%	13%	4%	—
全国平均	18%	16%	26%	40%

上表无疑证明俄罗斯族边区土地极其缺乏。其他县没有这种情况。其中有1到10公顷土地的农户的数量在16.3%（里亚涅马）到39.6%（塔尔图马）之间波动。在伯朝拉边区，这类农户几乎占整个农户的70%，在纳洛夫河沿岸占66%，在楚德湖沿岸占96%。还必须指出的一个事实是：纳洛夫河沿岸和楚德湖沿岸耕过的熟土地很少，沼泽牧场和草场则很多。

在报刊上以及当局个别代表的发言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俄罗斯人自己有过错，他们不怎么关心改善自己的经济，不想提高自己的收入。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情况。边区乡镇的俄罗斯族农民做了很多事，以增加土地的生产力，提高其经济收益。作为证据，列举如下事实就够了：从过分细小的条田土地占有制向独家农庄和独家农田的土地占有制的过渡，在许多边区农村是由农民本人进行的。土地整理工作时期以及随后向新的土地占有形式过渡，要求边区农民投入大量的劳力和资金。可以列举出一系列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收成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纳洛夫河沿岸地区不再购买粮食。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大多数农户的粮食只够吃到圣诞节。伯朝拉的情况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边区农村的俄罗斯族农民付出了一切努力和心血，以提高土地和经济的生产力。尽管付出了这些努力，贫穷仍然如故。问题在于，要提高土地和整个经济的生产力，单靠边区农民个体的力量和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必须进行周密细致的考虑，并经常给予帮助，目前这种帮助还不够。困难就在于此。

边区农村的青年农民对这种困难状况的体会特别深切。老一辈人也有这种感觉。但是青年的要求更多一些，更活跃一些，做出自己的结论和采取行动更坚决一些。这也是俄罗斯族青年逃到苏联去的原因之一。

民族政策使严重的经济状况复杂化，这种政策是近几年政策性

方针的基础。这个政策的实质是，强制使俄罗斯族少数民族爱沙尼亚化，在俄罗斯族边区尤其如此。学校中的爱沙尼亚化表现得尤其明显。俄罗斯族学校被破坏。这种破坏是以各种途径进行的。我们列举一个主要事实：把爱沙尼亚族人任命为俄罗斯族学校的校长。这种任命占俄罗斯族学校全部校长中的百分比如下：

	1935 年	1939 年
伯朝拉边区	13.5	30.0
楚德湖沿岸地区	9.0	36.0
纳洛夫河沿岸地区	4.3	17.4

几乎整个伯朝拉县、楚德湖沿岸三分之一以上和纳洛夫河沿岸地区 17% 的俄罗斯族学校的校长是爱沙尼亚族人。他们的俄语掌握得很差。居民把任命的校长看做是外来者，爱沙尼亚化的组织者，有的地方给他们起了外号，称他们是“间谍”。不难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居民与校长之间不会有正常的关系。根据个人的倡议或学校督导员的命令，校长们经常用爱沙尼亚语作监督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学校生活的正确方向要求学校领导人与居民之间建立最密切的交往，目前这种交往变成了敌对阵营的关系。

接着，就连派给俄罗斯学校的普通教师都是爱沙尼亚族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伯朝拉市的俄语初级学校，那里 7 个教师中 6 个是爱沙尼亚族人，1 个是俄罗斯族。其中一部分，如研究生，甚至没有经过师范训练。县里有这样的师范研究生 5 名。

为了证实俄罗斯族学校某些教师的俄语水平，可以举出如下例子：他们要求学生把正确的俄语拼音写成错误的。试问，这样的教师能向俄罗斯族孩子提供什么呢？这不过是破坏俄罗斯族学校的一条途径而已。

千方百计地把用母语教授的课程缩减。为了学习国语，教学大纲每周划出 5 小时。伯朝拉县的学校督导员要求每周划出 7~8 小

时学习国语。这个要求是靠牺牲母语课程来完成的。担惊受怕的教师只把注意力集中到爱沙尼亚语上。其他的课程，包括母语课程退到次要地位。强迫孩子们对一系列课程进行爱沙尼亚式的死记硬背，尽管这些课程应该用母语教学。在伯朝拉县存在着这种现象，在学校检查时，学校督导员对所有课程都提出这样的要求：不用教学语言回答问题，而是要求用国语回答。学校的教学水平降低了。俄罗斯族学校的这种衰败现象对孩子们有害，对少数民族有害，对国家也有害。

在自治方面也推行爱沙尼亚化。在全部俄罗斯族的乡镇自治机构，书记全是爱沙尼亚人。任命了一个由伯朝拉县自治机构领导的委员会，其中却没有一个俄罗斯族人，尽管该县大多数居民是俄罗斯族。

这种现象在边区的行政机关中也可以看到。行政机关几乎清一色由爱沙尼亚族人组成，他们的俄语很糟糕。还应该指出对俄罗斯族各地区官员任命的一个特点：被任命的人素质最差，不能胜任各县的工作。行政机关的大门对俄罗斯族是关闭的。这是一个规则。只是在中心地区才有某些例外。然而，在这种例外情况下，经常要求把姓氏改为爱沙尼亚的姓氏。在中心地区和边区都提出了改换姓氏的要求。这种要求被披上了“希望”和“建议”的外衣。随后是强迫：如果你不改，你就会失去工作或得不到职务。对边区农民来说，存在着另一种形式的压力：在整顿姓氏名册时，你取了爱沙尼亚姓，那么你就不用花钱，如果没有，那么就缴纳8~10克郎。不应该忘记20年代对姓氏的强制爱沙尼亚化，根据俄罗斯族农民当时形象的表达，对他们“按照爱沙尼亚仪式进行了洗礼”。这种洗礼的结果是，在俄罗斯族居住的村庄中出现了爱沙尼亚姓氏的公民。有许多俄罗斯村庄出现了爱沙尼亚姓氏。这些公民永远不会愉快地回忆他们所接受的洗礼。

政府的代表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改换姓氏是每个人的私事。在这里不存在任何强制性。这些声明使居民感到极大的困惑，因为事实上的确施加了这种压力。

在对青年进行军训时，某些官员尖刻地攻击俄罗斯的文化、俄罗斯族的知识分子，甚至攻击整个俄罗斯族人民。某些公务员在自己的公开讲话中也同样这样做。类似的言论离间着国家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关系。

这种爱沙尼亚化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它有没有创造性，或者相反造成了破坏性结果呢？我们认为应该负责任地说，类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制造了民族争端，加大了与多数民族的裂痕，播下了敌视的种子。

俄罗斯少数民族一直是与爱沙尼亚国家紧密而真诚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不会寻求外国的支持。俄罗斯族不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或瓦巴索夫运动。用不正确的少数民族政策把这种联系打断是无法弥补的错误。由于执行这种政策，民族争斗和敌视就出现了。在这种条件下，敌视会越积越多。这不会加强，而是会破坏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的友好联系，造成对多数民族政策的抗议，病态地加剧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上述说法的最好证据就是俄罗斯族青年逃往苏俄。我们已经指出了逃跑的一个原因：边区严重的经济状况。逃跑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意识到，在目前的少数民族政策下，爱沙尼亚不是亲妈，而是后妈。青年人明显地感到民族受到侮辱，他们对此反应强烈。

俄罗斯族占爱沙尼亚总人口的8.2%。我们是最大的少数民族集体，但是最没有组织性，因为迄今没有自己常设的和独立的代表机关，没有文化自治。行政机关甚至都不允许讨论这个问题。尽管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文化自治的原则，但不知为什么对这些问题有兴趣就被看做是不忠的表现。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对应该实施的措施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我们看来，采取措施，以使俄罗斯族居民的生活健康化，消除在法律方面对他们的侮辱，把俄罗斯族居民的校内外教育提高到应有的高度。

代表院议员

爱沙尼亚俄罗斯族教育和慈善协会联盟理事会主席

俄罗斯族民族联盟理事会主席

1939年2月

№07357

李维诺夫^① 关于苏爱关系
给列伊^② 的照会
(1939年3月28日)

爱沙尼亚人民接受1920年2月2日的苏联-爱沙尼亚和平条约，如同接受1932年5月4日的互不侵犯条约一样，他们推定这个条约将保持完全自主和独立国家的存在，这符合爱沙尼亚人民的意愿。正是根据这个推定，苏联政府使白里安-凯洛格公约^③提前生效，使互不侵犯条约延期10年，并承担了国联的义务。

爱沙尼亚政府知道，最近15年来，为了保证爱沙尼亚共和国的边界不被侵犯，苏联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而且它遵循的依然是同样的推定。从以上所述应该看出，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始终不渝地赋予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独立以巨大的意义，这不仅符合这些共和国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苏联的切身利益。从这些做法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任何协议，不管是“自愿”的或者是在外界压力下签订的协议，其结果哪怕是贬低或限制爱沙尼亚共和国的

① 李维诺夫，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1876~1951），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41~1943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苏联驻美国大使。

② A. 列伊，时任爱沙尼亚驻苏联公使。

③ 白里安-凯洛格条约亦称非战公约或“巴黎公约”。1928年8月27日，美、法、德、比、意、日、波、捷、英等15国在巴黎签订，1929年7月24日生效。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缔约国放弃把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缔约国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只能用和平方法处理解决。但是英法等国宣布保留“合法的自卫权”。条约签订后不久，即被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相继破坏。

独立和自主，无论在爱沙尼亚领土上或者是其港口上，许可第三国政治、经济存在，为它提供任何特殊权利或优惠，苏联政府都认为是不可容忍的，是与目前调整苏联与爱沙尼亚相互关系的上述条约和协定的前提和精神不相容的，对于违背这些协定以及由此产生出的一切后果也是不能容忍的。

本声明的精神是对爱沙尼亚人民表示真诚友好，目的是加强其安全感，使爱沙尼亚人民相信苏联会在事实上证明，一旦需要，苏联将维护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以及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并且深信，对于公开或暗中破坏这种自主和独立的企图，苏联都不可能袖手旁观。

No 07360

波克^① 关于爱苏关系

致德国外交部长电

(1939年4月15日)

爱沙尼亚外交部副部长爱比克在与我进行的谈话中断然否认，无论是爱沙尼亚外交部，还是其驻伦敦的外交使团都没有提出得到英国保证的建议。^② 爱沙尼亚的其他领导人也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谈判，否则爱沙尼亚外交部会对此做出通报。

至于苏联保证的建议，爱比克声明，爱沙尼亚把俄国的声明^③ 看做是占领爱沙尼亚的威胁。尽管爱沙尼亚的答复是礼貌的，但是也以官方的形式强调并证实了这点。所以，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发生于星期一复活节爱沙尼亚边界的苏联炫耀武力并引起边界居民极大恐慌的事件是进一步的威胁，并在报刊上公布了相应的消息，以便引起爱沙尼亚和国际舆论对这些事件的注意。爱沙尼亚多次向莫斯科提出了公布声明的问题。然而，正如李维诺夫再次向爱沙尼亚公使声明的那样，他拒绝做出相应的决定，拉脱维亚对此作了否定的回答。现在爱沙尼亚政府决定不经莫斯科同意就向邻国和各国发出双方声明的翻译文本。他把上述行动的安排交给了我，以转交给柏林，他坚持说，目前对此应极端保密。我问及拉脱维亚的立场，爱比克回答说，爱沙尼亚对它极不

① 波克，时任德国驻爱沙尼亚临时代办。

② 指1939年4月英国、法国和苏联谈判给予波罗的海三国以安全保证。

③ 指1939年3月28日的苏联照会，见本卷文件No07357。

信任，因为事情与苏联有关。我们今天就发出（文件的）译文正本。

波 克

№07388

弗洛文关于与爱比克会谈

致德国外交部电

(1939年4月24日)

外交部长曾建议，爱沙尼亚与德国在政治行动上相互支援，抵制苏俄以德国进攻波罗的海国家为借口而确立对爱沙尼亚的变相保护，外交部副部长爱比克再次谈到了这个话题。他遗憾地指出，尽管政府做出了努力，苏俄的宣传还是在爱沙尼亚的某些阶层中获得了一定成功。不顾爱沙尼亚的坚决要求，迄今苏俄仍拒绝公布众所周知的互换的照会。把它们真正内容对人民隐瞒起来。爱比克把德国与爱沙尼亚之间必要的行动与新闻合作的协议联系起来，这些行动应该是主要政治措施的补充。我重复了自己以前对外交部长的声明，说元首28日的讲话可能会触及到德国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关系。我说，理解爱沙尼亚方面的愿望，然而对问题应该预先有全面考虑。在随后的谈话中，我又补充说，元首准备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声明目前仅适宜与德国接壤的国家。众所周知，我们在答复爱沙尼亚早先提出的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试探时，遵循了这样的立场，即从共同的意愿出发，而与德国—爱沙尼亚的关系无关。爱比克对此回答说，爱沙尼亚不认为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签订协议是绝对必要的。

爱沙尼亚的意图明显地在于反对英国和俄国把波罗的海国家整合到包围体系中的企图。我认为，应该审议交换照会的可能性，或者通过议定书，在议定书中，爱沙尼亚人将以书面形式证实以前交

换过的意见，即他们的中立政策和避免加入大国集团。在我们的复照中，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认为爱沙尼亚的独立以及它的政策是巩固和平的因素，它的存在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

也可以附上新闻协议。

爱沙尼亚人好像预见到与拉托维亚签订类似协议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它可以对后者犹豫不决的立场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弗洛文^①

^① 弗洛文，时任德国驻爱沙尼亚公使。

№07387

瑟尔特尔关于美国呼吁书问题与 波克谈话记录

(不早于1939年4月24日)

1939年4月18日9时45分，德国驻爱沙尼亚临时代办波克先生根据本国政府的委托拜会了外交部长，提出以下问题：

一、爱沙尼亚政府是否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德国总理和意大利政府首脑提出呼吁的发起者，或者爱沙尼亚是否同意罗斯福以爱沙尼亚名义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出缔结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

二、爱沙尼亚是否认为德国对自己构成威胁。

部长对这些问题口头回答如下：

“尽管这些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但我能够马上回答您的问题。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答复是‘不’。注意到美国总统寻求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呼吁（在美国总统的呼吁书中也提到了爱沙尼亚），爱沙尼亚不认为有可能不承认它或否定它。

我请求德国政府在斟酌我们的答复时考虑这种情况”。

1939年4月24日，外交部长把答复文本递交了德国公使，以文件形式证明了口头答复。

№07364

爱沙尼亚国防部对第二号总动员计划的 解释性呈文（节录）

（1939年5月）

第三章 执行动员的干部

19. 执行动员的干部是：

和平时期武装力量部队和军事部机关的干部。

20. 和平时期武装力量和军事部的全部人员为：军官 1786 名，士官 3182 人，士兵 11753 人，总共 16671 人。

实际上武装力量和军事部的人员为：军官 1508 人，士官 2823 人，士兵 11334 人，总共 15665 人。

第四章 军事后备役的动员

21. 为了配备齐全战时编制，必须以后备役人员来补足上一章所指出的动员干部的缺额。

22. 要动员补足现在的部队和组建新的部队，需要 3637 名军官。

有 6060 名预备役军官和年龄不到 60 岁可以担任军官职务的预备役战士。

23. 为了补足现有部队和组建新部队，约需要 85600 人。预备役约有 45 岁以下的士官和士兵近 155000 人。扣除 15% 不报到的和病号，剩下 131800 名合适的。

24. 要召集必要数量的军事预备役人员，需动员：

(1) 根据武装力量参谋部编制的名单，指定担任军官职务的预备役军官和预备役战士；

(2) 预备役士官和士兵：

①全国除了哈尔维军区外，生于1904~1918年这15年年龄段的人。

②哈尔维军区，生于1905~1918年这14年年龄段的人。

25. 在和平时期，军官和被指定担任军官的其他预备役军人和一些士官及具有某种专业的预备役士兵，以委任的方式去军队报到。根据上述命令，被指定范围的预备役军人在宣布动员后立即去相应的部队报到。

26. 没有命令去军队报到的预备役军人，在动员令发出后到命令中指定的地点集合。

来自偏远地方的在编分队和预备役军人应该用大车送达。

为了把预备役军人送达集合地点，少量也可以通过铁路运输。

27. 全共和国共有22个集合点。在这些集合点，接收预备役军人的工作开始于 $\Psi+7$ 小时^①到 $\Psi+9$ 小时，结束于 $\Psi+21$ 小时直到 $\Psi+36$ 小时。接收预备役军人约进行30个小时。

28. 预备役军人应该马上在原地组成20~30人的小组，分批送往在集合点附近地区组建的军队。

在位于本卫戍区之外的集合点接收预备役军人的部队，预备役军人由相应军区的驻军司令部通过铁路运送。如果没有铁路交通工

① Ψ 是军事行动开始时间的代号。当开始军事行动的真实时间尚未确定或需要保密时，就以 Ψ 时算作时间的零值，并以此为基准来计划军队的行动。行动开始后的时间用 $\Psi+$ 时间表示。

具，就从公路由汽车部队把预备役军人送到指定地点。

从遥远地方通过铁路运输的最后几批预备役军人在动员日的大约 20 时前到达自己的部队。

从集合点运往军队的预备役军人共约 12200 人。

第五章 交通工具的征用

29. 动员时，为了充实和组建新部队，对马匹的需求量如下：骑兵 4861 匹、炮兵 3025 匹、重型辎重车 4400 匹、轻型辎重车 8582 匹，总共需要 20868 匹。

30. 全国适用于武装力量的马匹为：骑兵 5429 匹、炮兵 12 匹，248 匹、重型辎重车 3310 匹、轻型辎重车 41, 244 匹，总共 62294 匹^①。适宜于武装力量的马匹是需求量的 3 倍，其中重型辎重车的马匹不够，一旦动员，就必须用轻型辎重车和炮兵的马匹代替。还必须用轻型辎重车的马匹代替炮兵的马匹，因为在某些地方组建军队时炮兵的马匹不够。

31. 其他运输工具如大车、雪橇、马车、汽车和摩托车完全可以满足部队的需要。

32. 为了避免交通工具从一个军区到另一个军区运输时超载，除个别情况外，被动员的部队应该用本军区的其他交通工具来补充征用的交通工具。因此，征用运输工具负担最重的是组建军队最多的军区。

33. 集合点接收被征用的交通工具的工作由军区司令部或军队的代表进行。军区司令部代表接收的交通工具在接收上述工具后，直接在当地转交给部队，并在部队之间分配。

34. 全国共有 44 个国家交通工具接收点。接收工作从 $\Psi + 7$ 小

^① 原文如此，数字有误。

时到 $\Psi + 11$ 小时开始，从 $\Psi + 15$ 小时到 $\Psi + 37$ 小时结束。交通工具的接收工作进行约 30 个小时。

35. 动员时，除以强迫方式征用交通工具外，也可以征用部队以前多余的运输汽车。在军区管理下，由被强迫征用的汽车组成区域性的汽车分队。

第六章 被动员的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

36. 武装力量和战时军事部的编制由 5208 名军官、15448 名士官和 85093 名士兵组成，总共 105749 人，由它们组成以下军队和机构：

- 4 个师和 6 个旅指挥部；
- 16 个步兵团、4 个预备步兵团和 1 个独立步兵营；
- 5 个反坦克连；
- 12 个轻型炮联队、6 个重型炮联队和 1 个预备炮兵联队；
- 1 个骑兵团、6 个独立骑兵连和 1 个预备骑兵营；
- 1 个装甲团；
- 1 个自动坦克团；
- 2 个通讯营、1 个独立通讯连、1 个预备通讯营；
- 2 个工兵营、1 个预备工兵营；
- 防空指挥部、3 个航空营、1 所飞行学校、1 个空军基地、1 个防空联队；
- 海军指挥部、海上舰队、楚得湖海军营、海军岸上步兵和 3 个海岸要塞警备司令部；
- 3 个辎重营（附属第 1、第 2 和第 4 师）；
- 1 个交通营；
- 18 个救护机构；
- 8 个军区指挥部，此外，还有各种后方机构。

37. 把最后一批大幅度扩充的预备役军人或交通工具到达部队的时间作为计算被动员部队准备时间的基础。上述人员或交通工具到达部队之前，根据规定，可以增补 12 个小时，以便部队有组织地集结。对各个分队而言，这个期限或长一些或短一些，根据各部队的情况，可以浮动 3~24 个小时。

38. 经过动员和扩充而组建的战斗部队，达到战时满员编制时，应在下列期限内准备采取行动：

(1) 在 $T+24$ 小时期间内应充分做好准备的有：

- 6 个步兵营；
- 3 个炮兵连；
- 3 个反坦克连；
- 6 个独立骑兵连。

(2) 在动员的第二天结束时应完成准备的有：

- 11 个步兵团和 1 个步兵营；
- 8 个轻型和 4 个重型炮兵联队；
- 5 个反坦克连；
- 骑兵团和 6 个独立骑兵连；
- 装甲团；
- 坦克团；
- 1 个步兵营；
- 3 个航空营；
- 防空炮兵联队；
- 舰队；
- 3 个海岸要塞警备司令部。

在动员第三天结束时，除窄轨装甲团第五营——它的准备情况取决于物资状况，所有军队和机关都应做好准备。

№07365

里利^① 关于爱沙尼亚军备问题在

国防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39年5月25日)

依靠国家国防基金，签订了一系列购买军事装备的合同，已经得到了部分军械，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军备。

炮兵装备：150毫米榴弹炮9门、75毫米高射炮8门、37毫米高射炮16门、20毫米高射炮12门、37毫米反坦克炮40门。为所有的炮订购了相应数量的炮弹。为了使反坦克炮和高射炮机械化，还订购了越野汽车。为75毫米高射炮订购了2套“维克科”火炮控制装置。

上述所有炮兵装备将在1939~1940年得到供应。迄今已得到37毫米高射炮4门、37毫米反坦克炮40门。除反坦克炮外，兵工厂还订购了20挺反坦克机枪。在扩充射击武器领域，应该指出，最大一批供应是购买了600挺“马可辛”轻机枪和修理了250挺“马克西姆”重机枪。

订购了12架歼击机及10架侦察和通讯飞机。同时为飞机订购了各种无线电台13个，机枪116挺。今年8月我们得到了两架歼击机，11月将得到2架通讯飞机。其他飞机将在1940年上半年供应。

为海军订购了3艘鱼雷快艇。靠修建潜艇的专用资金订购了一

① 里利，时任爱沙尼亚军事部长。

艘快艇，要编制其他订购计划还得作准备工作。

在海军要塞方面，现在正在为奈斯的装甲炮塔装备 305 毫米大炮的工作做准备。

在建设方面，应该指出，在伊兹波尔斯克修建军营和辅助设施需要花费 142 万克郎。这些设施的设计方案 6 月 15 前结束，9 月 1 日开始建设。

为了改建塔林机场和飞机修理厂，以及建设 2 个飞机库，预算花 210 万克郎。这些计划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

贷款 125 万克郎用于边界地区的设防，部分贷款已经被使用。纳尔瓦区现在已经开始着手建设工作，同时伊兹波尔斯克的建设工作秋天就已经开始了。

№07389

爱沙尼亚国家杜马关于讨论 爱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会议记录

(1939年5月25日)

出席的委员会成员有：马·汉森、阿·尤利马、弗·卡达里克、阿·卡里内尔、伊·钮曼、阿·皮普、斯·布克、拉·里维斯。

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外交部长助理阿·爱比克、军事部长普·里利、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纳·列埃克将军、国家杜马成员亚·提尼逊。

委员会主席阿·尤利马主持会议。

国家杜马秘书普·马尔维特作记录。

主席阿·尤利马：在会议议程开始之前，我认为有必要解决国家杜马成员亚·提尼逊参加会议的问题。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宣读条约草案)……

当然不想失去老朋友。丹麦、瑞典和拉脱维亚公使试探英国外交部门的口径，试图弄清英国的立场。英国原则上主张协议不超出互不侵犯条约的范围。在与英国驻塔林代表就此问题进行的谈判中，他告诉我，可以签订条约，但是不承担义务。这就意味着，所签订的条约不带有积极性质。波兰也不反对签订条约，因为它是中立的基础。

至于报刊上对此问题的反应，那么，正是在也有类似条约的国家里存在偏见，例如，在英国和法国的报刊上就是如此。

提出签订条约的时机不合适——正好是在试图弄清对波罗的海

国家构成威胁的时候。现在局势比较平静，条约不应该造成不愉快。

如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拒绝签订，这是因为，它们没有政治条约。它们不想把自己与大陆联系起来。芬兰起初同意，后来又反对，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它属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家庭。从莫斯科得到有关芬兰的信息是，关于条约的谈判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为莫斯科认为条约是积极的。芬兰有义务对俄国保持中立，因为它与俄国有互不侵犯条约，而对德国方面，它有行动的自由。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我对俄国对我们与德国签订条约的态度感兴趣。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俄国的看法还不得而知。与俄国公使谈过此事，然而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与莫洛托夫会晤很困难，莫斯科本身既不直接、也不间接表明自己的立场。已委托列伊先生弄清莫斯科在这个问题的立场，然而这很困难。莫洛托夫本人不向大使们通报信息，他认为，如果谁想知道什么，就问他好了。然而，迄今为止，俄国没有做出解释。

阿·皮普：我对与老朋友的关系感兴趣。所以必须在与德国签订条约之前，向那些我们对它们有某些类似义务的国家询问它们对条约的态度。然而，显而易见，这是德国的策略。从向我们提出这个建议起，许多东西都改变了——曾经给过否定的答复。最近，大国对我们谈得比以前多。我很遗憾，部长不知道俄国的态度——这总归是必须弄清的重要问题。俄国公使游移不定的说法使我非常不安。

条约的这个文本不能充分满足我们的利益。它已经引起了英国的怀疑。如果英国与德国爆发战争，我们为英国与德国火上加油，那么德国就会认为这是破坏性条约，因此，这种形式我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担心，这个条约会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类似我们这

样的小国是不应该卷入冲突的。条约把我们纳入了德国的轨道。对这个问题必须三思而行。如果没有别的出路，那么就拖延。

亚·提尼逊：与德国的这个条约不单是个原则问题，而是有比较重大的意义。在此有必要对实际状况做出评价，以便不给以后的关系造成消极影响。如果我们签订自己10年内不能放弃的条约，那么我们就会使自己在北方的中立国家中孤立起来，就会与德国联系起来。当我们与俄国签订条约时，在达成一致意见以前，我们对这个问题讨论了几个月。如果条约中说，一旦发生对方将要卷入的战争，爱沙尼亚将不支持第三国，那么这就与国联的公约产生了矛盾，就意味着我们将站在侵略者一边。我们就将孤立于我们应该与之发生联系国家，但是，考虑到我们的地位，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参加某种国际联合。为了遵守中立，我们应该与不想侵占我们的国家保持联系。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害怕了。英国从来不想占领我们，况且它的经济影响对我们不构成危险。我们应该与同英国良好关系的国家保持联系，它们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不应该放弃我们据以立国的基础。英国的愿望比同德国签订条约具有更大的意义。如果我们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合作，我们的地位就牢固得多。如果德国在这里没有利益的话，德国绝不会来这里保卫我们。德国对这里不会过分注意。但德国的到来，将比俄国到来对我们造成的损失要多。德国将把我们的人民铲除到最后一个人。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他们都要消灭我们。如果不得不签订条约，那么我们将为每个字讨价还价，直到与朋友们阐述清楚相互的关系为止。我想讨论不要只停留在形式上，而要考虑国家的立场。同时，不需要加快速度。这个问题有历史意义。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关于德国的危险方面，政府掌握的信息是，本地的德国人聚集在一起，并认为签订条约对他们不利。他们希望不履行这个条约。对拉脱维亚来说，这个问题更具有紧迫性

质，那里还有其他的情况。他们那里的德国人多。对我们来说，拉脱维亚对德国的政策比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的立场重要。

这就产生出签订条约的紧迫性的问题。我们试图弄清其他国家的立场，然而，这是非常困难的。英国和法国对我们作为缓冲国感兴趣。但是我们没有强大到可以分化俄国和德国的程度。显然，就像任何有文化的民族一样，我们有权成为独立国家。我们应尽可能与一切国家保持良好关系。

亚·提尼逊：我原则上不反对签订这个条约。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就拖延。俄国的条约与现在的条约的草案之间有很大区别，因为后者包含着反对侵略者的义务，与俄国的条约则没有。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这个时期是复杂的。大国试图尽可能把一切力量吸收到自己一边，而这时小国的力量就显得重要了。所以最近产生的印象是，中立并不是光荣的，而是不能容许的。如果我们中立的话，友好的外国人将与我们格格不入。这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到局势，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尽可能长时间地置身于战争之外，尽管我认为，这不会幸免。

怎样保卫中立呢？首先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应该做到思想一致和统一认识。领导人应该关心这些问题。

决议：将提出的各种意见备案。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共和国政府会考虑这些愿望。

会议主席阿·尤利马：会议结束。

会议于 14 时 47 分结束。

主席 阿·尤利马

记录员 普·马尔维特

№07369

列伊关于与莫洛托夫的谈话 致瑟尔特尔的信（节录）

（1939年6月5日）

1939年6月5日与莫洛托夫进行了谈话。

……首先，我对我们与德国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所进行的谈判向莫洛托夫作了必要的解释。莫洛托夫此时以及随后在整个谈话期间提出的问题和看法，表现出对我们的中立政治路线有怀疑的倾向。我感觉他是一个惯于在所有党团会议上论战和用各种问题向对手施加压力的人。芬兰也奉行中立政策，为什么就认为他们可以拒绝与德国签订条约？为什么要求我们限制和平时期正常的贸易规模和过境中转，而在爱沙尼亚—俄国互不侵犯条约中就没有类似的条款？难道我们又想同侵略者做生意，并且又不想站到他们那一边去？我们是怎样看待伦敦、巴黎与莫斯科之间为达成防止侵略的协议所做的努力？我们欢迎这个事实呢，还是持否定态度，或者是抱完全无所谓的态度？

在这些交叉审问的火力中，我开始明白，为什么近日威廉·西兹爵士^①会苦恼或者说的不安地指出，难以同莫洛托夫进行谈判，因为他的手法与我们习惯的外交官完全不同。同时，我觉得，如果说李维诺夫已经非常理解我们在中立政策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我们与莫洛托夫就不得不或多或少从头开始。他谈话的趋势尽管不像去

^① 威廉·西兹，时任英国驻苏联大使。

年2月9日加里宁^①老头试图对我解释时那样幼稚和直率，但是仍然是大致相同的，即如果小国要得到拯救，唯一的办法是依靠苏联。

我们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就爱沙尼亚—德国互不侵犯条约进行争论，结果我的印象是，我没能使他对我国的中立政策思想理解得更清楚。当转到另一个问题时，我说，从他的谈话和报纸的资料可以看出，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之间正在就有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进行重要谈判，我请他解释，为什么这么重要的谈判要绕过这些国家。莫洛托夫作了如下简短的答复：西方国家向我们提出缔结防止侵略的明确协议，特别请求我们对波兰和罗马尼亚提供担保，因为西方国家已向它们提供了担保。起初，我们只注意到最重要的问题，即义务应该是平等的和相互的。当他们在这方面对我们做出让步而转到不太重要的问题上时，我们才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尽管也像波兰和罗马尼亚一样，通过他们的领土也能发动侵略，但西方国家却并没有为它们提供担保。我们想弄明白，伦敦和巴黎是否准备把自己的担保义务也扩展到这些国家，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正进行谈判。在我们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前，向波罗的海国家征询意见还为时过早。然而，一旦我们弄明白，我们在谈判过程中自然会征询你们的意见，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想要忽视你们。

公使 阿·列伊

^① 加里宁，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1875～1946），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07370

莫洛托夫与列伊关于爱德条约的 谈话记录

(1939年6月5日)

谈话开始时，列伊解释了爱沙尼亚与德国最近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原因及条约的性质。列伊说，爱沙尼亚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与不久前德国与丹麦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是同样的。我强调说，芬兰拒绝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却要签订这样的条约，这个事实引人注目。我还说，我们将根据这个条约在事实上有什么意义来评判它。

然后，列伊提出了科钦什^①曾提出过的问题，并更加强调，关于给予波罗的海人担保的谈判却没有波罗的海人亲自参加。我向他作了向科钦什作过的同样的解释。我还指出，我们对爱沙尼亚在中立问题上的立场，将根据爱沙尼亚对三国保障爱沙尼亚中立的建议持何种态度来评判。我说，我们对爱沙尼亚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奉行中立政策有怀疑，因为不能想象如爱沙尼亚这样的小国能够无论对非侵略国家——苏联、英国、法国，还是对德国这样的侵略国家都一视同仁，尽管它希望保持中立。列伊回答说，从形式上讲，无论对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国家，爱沙尼亚都一视同仁，但是实质上，如果遭到侵略者进攻，他们指望得到非侵略国家的援助，首先是来自苏联的援助。对此我指出，如果爱沙尼亚不事先采取相应

^① 科钦什，时任拉托维亚驻苏联公使。

步骤的话，它不能指望别的国家在它一提出希望时就能满足它的要求，也不能指望得到它为抵抗侵略而想要的那样规模的援助。

№07390

爱沙尼亚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1939 年 6 月 7 日)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和德国国务总理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保持爱沙尼亚与德国之间的和平，约定用条约加强这个决定，并委派了自己的全权代表：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的代表

外交部长卡尔·瑟尔特尔，

德国国务总理的代表

外交部长约西姆·冯·里宾特洛甫先生，

他们相互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彼此承认对方证书内容正确，形式合适，随后就以下决议达成一致意见：

第一条

爱沙尼亚共和国和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加入针对对方的战争，并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武力。

如果某个第三方开始针对缔约一方的上述性质的行动，另一缔约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这类行动。

第二条

本条约应该得到批准，一有可能，就应该在柏林互换批准书。互换批准书后条约即可生效。有效期从此时算起为 10 年。如果条约失效一年前缔约国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宣布取消这个条约，那么其有效期继续延长 10 年。依此类推。

但是条约的有效期不能比今天德国与拉托维亚签订的相应条约

更长。如果由于这个原因所述第二段期限到来之前失去效力，那么爱沙尼亚政府和德国政府将根据其中一方的意愿，立即开始恢复条约的谈判。

双方的全权代表将签订本条约，立此为凭。

卡·瑟尔特尔

约·里宾特洛甫

1939年6月7日起草于柏林

签字议定书

今天签订爱沙尼亚与德国条约时，双方同意确认如下：

如果没被卷入冲突的缔约一方的行为符合普遍的中立原则的话，就不得认为是第一条第二段所指的支持。如果没有卷入冲突的缔约方与第三国继续正常的贸易和商品过境，也不应该看做是不能容忍的支持。

卡·瑟尔特尔

约·里宾特洛甫

1939年7月7日于柏林

№07371

斯特拉德曼关于与法国接触结果 给爱沙尼亚外交部的信

(1939年6月7日)

按照外交部的电报委托和外交部长的电话指示，我拜会了此间外交部的秘书长沙尔维利亚先生。当我向他解释了拜会的原因后问他，谈判的进程如何。沙尔维利亚回答说，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然而他不否认，俄国人可能会提出我们不能接受的建议。换句话说，他回避了我的问题。

我向沙尔维利亚先生解释说，俄国人关于我们的建议是极不友好的，如果所签订的条约向俄国人提供这样的权利，那么我们的独立就会受到威胁，所以，我们希望法国政府不支持类似的建议。我补充说，我们已经与前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进行过谈判，他的话使我们非常害怕。

从沙尔维利亚先生总结性的解释中可以获悉，当法国—英国—俄国签订协议时，法国方面准备做出一切努力使爱沙尼亚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

奥·斯特拉德曼^①

^① 奥·斯特拉德曼，时任爱沙尼亚驻法国公使。

№07373

拉脱维亚政府关于苏英谈判 给英国政府的照会（节录）

（1939年6月12日）

……难以理解，为什么莫洛托夫认为英国对中立国的提法不能令人满意。

……在中立政策条件下，拉脱维亚接受某些其他欧洲国家给予的那种类型的保障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政策，拉脱维亚政府激烈反对预先承担为维护拉脱维亚中立免遭破坏而向任何国家请求提供援助的义务。所以，对莫洛托夫演说中提出的问题作出答复是不切实际的，包括上面引述的向拉脱维亚提供担保的话，以及拉脱维亚预先承担义务向某个国家要求援助以回击对其中立的破坏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即使只是为使该国家为给予援助作出明确承诺奠定基础，拉脱维亚也会因此破坏自己的中立。

拉脱维亚政府虽然未被告知英苏谈判的进程，然而，它相信，不会不经拉脱维亚政府同意就达成把拉脱维亚保证主权、政治独立和安全的行动自由置于可疑地位的条款。英国外交大臣（公使）5月30日的通报中曾有对这样条款的暗示。

№07391

爱沙尼亚政府就互不侵犯条约 对国家杜马的解释（节录）

（1939年6月15日）

……众所周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斯福曾给德国总理发出一封信，信中包含向德国政府提出让其与所有欧洲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这个建议引以为据的前提是，欧洲的小国自己难以与德国达成类似的协定。德国总理在其1939年4月28日的讲话中说，“德国政府准备给罗斯福信中提及的每个国家以保证，保证它的武装力量不进攻这些国家的领土。德国准备在有关国家向德国提出相应要求的情况下，在相互基础上给予这种保证”。这个宣言使德国的立场发生了变化，即它只与接壤的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此之前，德国与苏联、波兰、英国和法国已有了互不侵犯条约。

没有等待有关国家提出要求，德国自己就建议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有三个国家——芬兰、瑞典和挪威对此建议作了否定的回答。他们对拒绝的解释是，他们没有看到来自德国的威胁，并满意地指出德国对他们的中立和独立所持的积极态度，因此他们不认为需要共同（瑞典、挪威）或单独（芬兰）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丹麦则作了肯定的答复，经过不长时间的谈判，与德国签订了条约。1939年5月31日，丹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柏林签字。

德国国务总理1939年4月28日的讲话在涉及波罗的海国家时，直接声明德国的利益在于使这些国家根据民族意志在独立和自

治条件下生存。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其实就是上述声明的证明，这也证明，德国既不打算用军事行动，也不用其他某种暴力手段破坏爱沙尼亚的独立和自主。

德国的建议也有助于爱沙尼亚中立政策的巩固。

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消除了德国会威胁爱沙尼亚的国际地位的担心，从而使建立在波罗的海地区恐德症基础之上的国际投机行为得以削弱。

从类似条约有助于稳定国内社会舆论的观念出发，也考虑到我们与苏联已有类似的协定，该协定如果得到本条约的补充，其政治意义有助于加强我们的中立，所以，共和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德国的建议。

条约草案的建议是由德国外交部长转交给我国驻柏林公使的。草案由两条组成，其中第一条没有修改就纳入了条约的最后方案。

在一个月谈判期间，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外交部长保持了个人接触（孟特尔斯^①部长5月6日访问了塔林，同年5月27日，瑟尔特尔访问了里加），主要是讨论爱沙尼亚提出的草案，它规定如下：

1. 对第一条第二部分中提及的行动是如此解释的，根据一般中立规则实施的正常的贸易关系和商品过境不应该看做是对上述行动的支持。

德国接受了这个提议，并以签字备忘录的形式固定下来。后来德国在德国-丹麦条约中也作了这样的补充。

2. 遵守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防御联盟。为此提出了一种解释，即条约不涉及爱沙尼亚承担的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防御联盟产生的义务，或者作为变通方法，爱沙尼亚与德国条约的有效期取决于拉脱维亚与德国条约的有效期，反之亦然。提出这个要求是为了当德国与拉脱维亚的条约失去效力时我们有权放弃与德国的条约。

^① 孟特尔斯，时任拉脱维亚外交部长。

谈判的结果是双方接受了规定遵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条约的以下措辞，即爱沙尼亚与德国条约的有效期相应地受拉脱维亚与德国条约有效期的制约。

由于即使这样措辞也不完全符合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防御条约的意思和内容，所以对这个措辞作了如下补充：双方同意，条约有效期完结后，立即开始恢复条约的谈判。这就是说，如果根据第二条第三部分的规定，条约将要终止，那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有责任着手与德国进行恢复条约的谈判。德国对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也承担同样的义务。

爱沙尼亚与德国的条约仅包含互不侵犯的相互义务。这个义务带有普遍性，除了从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联盟条约中产生出来的义务外，不受任何附加条件的限制。

爱沙尼亚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中不包含类似条约中所有的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的补充说明。在签订爱沙尼亚与德国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进程中，爱沙尼亚方面曾与其他问题一起提出条约中加入关于仲裁法院的保留条件问题。德国对此回答说，因为爱沙尼亚与德国早先（1925~1927年）已经签订了专门的仲裁法院条约，那么，把类似的保留条件加入互不侵犯条约是多余的。德国方面并且对此解释说，依据爱沙尼亚方面的愿望，这个问题可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以口头声明的方式最终解决。根据上述提议，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于1939年6月7日在柏林签署条约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德国外交部长在其答词中声明，在解决由于爱沙尼亚与德国互不侵犯条约中可能产生出来的问题时，使用1927年爱沙尼亚与德国的仲裁法院协定是自然而然的。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也作了类似的声明。

国家杜马 1938~1939年第一届会议
第1、2、3、4次会议速记记录附录

№07374

哈里发克斯关于苏爱条约 给英国驻里加公使的信（节录）

（1939年6月17日）

……先生！6月7日，爱沙尼亚公使拜会了外交部，通报他得到委托，要把一份备忘录紧急转交给陛下政府，该备忘录副本随信附上。他对必须这么做表示遗憾，因为昨天我们共进早餐时，我曾就英国—苏联谈判过程中国王陛下政府的态度请他放心。他则从自己方面保证说，他的政府不想为上述谈判制造困难。然而事实上他的政府对报刊上的报道感到恐慌，认为必须刻不容缓地正式阐述自己的立场，而不管伦敦已经从他本人的报告中明确地认识到了这种立场。

2. 斯米特先生^①得到保证说，据我们所知，现在还不存在英国政府同意引起他的政府担忧的建议的问题。显然，苏联政府希望排除德国在波罗的海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行动尽管事实上没有直接进攻苏联的边界，也会对苏联的切身利益造成威胁。向苏联政府提供这种保护的提法应该不提及德国有可能在其领土上采取上述行动的具体国家，也不对苏联政府提供能作出威胁该国利益的决定的特殊权利。确实，从现在的情况看，尽管苏联提出的建议没有准确地包含“在某种条件下自动向爱沙尼亚提供援助”的句子，但我们认为，上述两点中任何一点都没能得到满足。但预计，一旦达到

^① 斯米特，时任爱沙尼亚驻伦敦公使。

这两点，爱沙尼亚政府就没有理由反对旨在对抗德国对苏联直接或间接侵略的条款了。

3. 公使证实，他的政府也是这样理解这种立场的，并补充说，如果条约中条款的措辞强调有关国家的中立和包括苏联在内的缔约各方尊重这种中立的决心，并保证其他国家也对中立表示尊重，那么，他的政府就会完全欢迎该条约。

哈里发克斯^①

附 录

备忘录（1939年6月7日）

报刊上报道说，目前在英—法—苏之间进行的谈判中，苏联坚持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不征求爱沙尼亚政府的意见，而自动对爱沙尼亚进行援助。如果这些报道属实的话，爱沙尼亚政府不得不把上述提议看做旨在反对爱沙尼亚中立的不友好举动。爱沙尼亚政府愿意相信，英国政府可能不会同意提议中涉及爱沙尼亚的部分。

^① 哈里发克斯（1881～1959），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1926～1931年任印度总督，1938～1940年任外交大臣。

No 07386

弗洛文关于德爱关系 致德外交部的信（节录）

（1939年7月5日）

在使馆吃过午饭后，我得以秘密地与爱沙尼亚总参谋长列埃克少将讨论德国与爱沙尼亚的军事关系。列埃克将军谈话非常坦率。他声称，爱沙尼亚决定对苏联军队进入本国的任何企图给予坚决的武装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因为这里的人很清楚，国家被占领，并为苏俄军队建立基地，就等于爱沙尼亚失去了独立，因为俄国人就再也不会离开我国了。审视了防御苏俄军队的军事前景后，将军声明说，一旦在东方爆发冲突，总共20万人的大军对苏联军队终究是相当大的因素，俄国在派出使中立的爱沙尼亚遭到失败的必要武装力量之前应该加倍考虑这个因素。爱沙尼亚自己能够自卫一段时间，当然，然后它希望得到德国的援助。谈到军事援助，正如我谨慎解释的那样，将军指的是军事装备，这对爱沙尼亚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爱沙尼亚需要的“不是人力，而是装备”。

无疑，在任何情况下，他指的那种援助应该通过波罗的海来提供。涉及到这个问题时，我声明说，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最终感兴趣的是，对波罗的海交通的控制，特别是作为防止俄国破坏这个交通线的措施是否由德国舰队来实施。列埃克将军作了肯定的答复并声明，爱沙尼亚在这方面也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例如，有可能相当容易地在芬兰湾布雷而不引起俄国舰队的注意；还有其他可

能性。因此，爱沙尼亚极其希望改善和扩大自己的海岸军事工事；特别需要海防重炮。

我不愿意深入地探讨军事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不知道德国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所以，我让话题重新回到政治方面，声明我对爱沙尼亚明确而毫不含糊地拒绝苏联军队过境，并且决心在需要时，坚决给予武力抵抗的立场深表满意。如果芬兰也学爱沙尼亚的榜样，而且拉脱维亚也持这一立场的话，爱沙尼亚的这种立场会更有分量，列埃克将军十分肯定地说，情况正是如此。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对爱沙尼亚和芬兰那样对拉托维亚阐述得如此明确和坚定，但是拉托维亚决心在东方发生冲突时采取共同立场，其重要性不可低估。特别是考虑到对波罗的海和交通线的控制问题，如果拉脱维亚向苏联看齐就会使爱沙尼亚的地位相当恶化。列埃克将军同意这个观点，声明说拉脱维亚的立场也正引起爱沙尼亚人的不安，所以他们经常力图说服拉脱维亚人同意他们的观点。

接下来谈到爱沙尼亚感到来自哪方面威胁的话题，列埃克将军毫不犹豫地讲，他感觉到类似的威胁只能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因为德国的扩张越来越以肥沃的、德国居民占多数的东南地区为目标，而不是遥远而荒凉的芬兰湾地区。

一同参加午宴的武官列兴上校认为，爱沙尼亚总参谋长关于军事政策的看法与爱沙尼亚军界在许多场合对他公开和暗示的看法一致。

弗洛文

№07379

哈尔列关于拜访瑟尔特尔 致哈里发克斯的信（节录）

（1939年7月11日）

……先生！昨天我与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就苏联与英国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在美国使馆举行招待会期间，瑟尔特尔先生对我出席感兴趣，邀请我陪同他，用自己的汽车把我拉出塔林到森林散步。散步一直持续到招待会结束。我的谈话伙伴显得忧心忡忡。

2. 部长阁下说，爱沙尼亚驻伦敦公使斯米特先生当天用电话向他通报说，根据他的情报，似乎英国最近提议，在保证国之间磋商后，英国—法国—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保证就会生效。（谈话结束时，我说，据推测，这个建议对爱沙尼亚是可以接受的。瑟尔特尔外长报以沉默，于是我补充说，无论如何，这些都比苏联的建议好。瑟尔特尔外长准备同意这个提议。）

3. 斯米特先生同日应该与巴特勒先生会晤，试图解释爱沙尼亚的观点。瑟尔特尔本人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这些观点，然而没有对已经知道的东西补充更多新内容。他说，英国开始的建议对爱沙尼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不提出相应的要求就给予援助是不能同意的。苏俄对波罗的海国家表现出侵略趋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例如日丹诺夫^①的讲话，当时德国还没有表现出侵略的意图。他

^① 日丹诺夫，安德列·亚历山大罗维奇（1896～1948），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苏联的宣言中明白，一旦爱沙尼亚出现“暴乱”，亲德国的政府上台执政，俄国就要干涉。瑟尔特尔指出，对爱沙尼亚的这种态度与对其他接壤的国家态度不同，这些国家中有的不是民主国家，而实际上是专制国家，如罗马尼亚、土耳其，某种程度上还有波兰。他声明，英国不理解爱沙尼亚的态度，许多负责人士认为，爱沙尼亚只会碍事。

4. 如果瑟尔特尔先生希望得到安慰性的答复，那么结果会令他失望，因为他看到了提出的是回击的可能性。我指责爱沙尼亚人忘恩负义和愚蠢。而他们指责英国，说在他们的主权还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时候，他们就被“它出卖给”布尔什维克了。但正相反，我们已经为爱沙尼亚的利益斗争了三个月。他们公开地表达自己对苏俄的不信任和厌恶；他们指责我们说，我们抛弃他们听凭命运的摆布，他们使部长阁下您的政府局势复杂化了，并使苏联深信，波罗的海国家不会请求他们援助，而当请求援助时则为时已晚。正如我向自己政府报告的那样，最近几年，爱沙尼亚某些国务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对我声明，他们宁愿接受德国的援助，反击苏联的侵略，而不会接受苏联的援助，反击德国的侵略。我说，这不是完全的中立，会使苏联政府有理由坚持说，爱沙尼亚政府对解决要求援助的问题不在行。我进一步补充说，不仅对英国攻讦，而且我还知道爱沙尼亚有亲德国的倾向。我不认为，爱沙尼亚政府或大多数爱沙尼亚人民有亲德情绪，然而，实业界、富人和军人明显有这种情绪。我以不满的口吻说，爱沙尼亚政府接待了许多德国官方人士——卡纳里斯、本特维尔、冯·克莱斯特、本明格等，助长了亲德国的情绪。

5. 瑟尔特尔有点吃惊。他首先回答说，确曾接待过冯·克莱斯特，然而他除了建议在爱沙尼亚建立德国的贸易机构外，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推测说，冯·克莱斯特正在玩一场更大的把戏。瑟尔

特尔部长回答说，他们没有把他看做是重要人物。我提到卡纳里斯，他没有给予答复。至于军队（当然我指的是总参谋长列埃克，而不是总司令拉多涅尔），瑟尔特尔说，士兵们倾向于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然而不是他们决定对外政策问题。至于报刊上的攻讦，他说，记者们有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因为爱沙尼亚的报刊处于当局的监督之下，而半官方的《乌斯艾斯基》^①也在攻击者之列。我指出，《对外政策论丛》资料和《波罗的海时报》的发行处于瑟尔特尔本人的领导之下，不能说它们特别受欢迎吧，据我所知，它们在瑞典和芬兰引起了不良反应。

瑟尔特尔先生指出，瑞典人非常胆小，并补充说，尽管他在5月25日接受《波罗的海时报》的采访时说话极其谨慎，然而还是引起了大国的不良反应。他否定了爱沙尼亚有亲德的变化，他说，如果看到目前有某些反英情绪，那么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过去。

6. 部长阁下随后声明，无论英国与苏联达成协议与否，爱沙尼亚甚至在理论上也不能同意接受苏联的担保，因为那样爱沙尼亚就会失去独立。爱沙尼亚方面也不能对德国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视而不见，并且认为，如果达成这样的协议，德国把波罗的海国家让给俄国以换取在其他地方的让步也是可能的。

7. 谈话结束时，瑟尔特尔先生保证说，只要他一接到斯米特先生的报告，就邀请我一起讨论。

8. 我把这封信的副本通过外交邮件直接寄到外交部。

顺致敬意。

维·哈尔列^②

^① 该词档案原文是“Ус Ээсти”，这里是音译。

^② 维·哈尔列，时任英国驻爱沙尼亚公使。

№07380

哈里发克斯关于爱沙尼亚关注英苏谈判 致英国驻里加公使的信（节录）

（1939年7月18日）

7月10日，爱沙尼亚大使先生拜会了外交部，转交了涉及英苏谈判的备忘录，副本附上。他声明，爱沙尼亚政府对第二节特别关注，并特别强调“它有不承认任何外国干涉其内政的权利”这句话。

2. 他了解了一下英苏谈判的进程。他被告知，报刊上报道的关于“间接侵略”的问题确实是讨论的内容之一。然而，由于苏联完整的答复刚刚到达，不可能向他详细地阐述谈判的全过程，因此建议斯米特注意首相7月10日在众议院听证会上的答复。

3. 斯米特对7月10日首相就国家主权，特别是关于波罗的海国家保持自己独立的愿望问题所作的答复很感兴趣。下面附上问题和答复的副本。

4. 爱沙尼亚公使对答复表示满意，但是他表示强烈担心并希望得到关于谈判的更详细的信息。

忠实于您的 哈里发克斯

附 录

爱沙尼亚政府曾向陛下政府阐述自己关于在某些情况下自动向

爱沙尼亚提供援助问题的观点，问题显然是英国、法国和苏联谈判中讨论的内容。由于报刊上对谈判进程有各种报道，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再次阐述自己的观点是合理的：

1. 爱沙尼亚政府决定坚决地遵循严格的中立政策；它打算用自己拥有的一切手段捍卫自己的中立。在这样的条件下，爱沙尼亚政府不得不把任何不经它要求和同意而自动给予的援助看做是与共和国的中立和主权不相容的。

2. 根据报刊上讨论的关于“间接侵略”时自动给予援助问题，这个措辞完全是指对其他国家内部事务不能容忍的干涉。爱沙尼亚政府完全认识到爱沙尼亚的主权地位，不能允许任何外国干涉它的内部事务。

3. 爱沙尼亚政府高兴地回忆起英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的信任和友好关系。它对陛下政府愿意理解和支持爱沙尼亚的立场表示深深的感谢。爱沙尼亚政府真诚地希望，陛下政府总会找到在所准备的协定文本中不包含上述内容条款的可能性。爱沙尼亚政府认为，这些条款不会加强波罗的海地区的稳定，只会造成不安和失去信心。

№07411

斯米特关于德苏关系动向 给瑟尔特尔的信（节录）

（1939年8月22日）

德国与苏联将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昨天晚上得到了关于冯·里宾特洛甫明天将去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道，这完全出乎当地政界人士的意料之外。昨天，外交部讨论的问题是，德国—俄国新经济协定会产生什么后果，然而，外交部不掌握对这个轰动一时的新闻进行推测的有关情况。

芬兰公使前天从赫尔辛基得到报告，根据从柏林到达那里的情报，星期二（即今天）在柏林将发生某种重要的事情。我们请公使澄清，有关此事有没有更详细的情况。他拜会了斯特朗先生，后者声明说，现在提到的日期很多，不应该认真看待类似的谣言。对今天的事情，斯特朗先生没有作任何推测。……

外交部现在不清楚，莫斯科的政策会有多大的转变，这值得考虑。现在报纸的报道主要来自柏林的消息，莫斯科则相当克制。迄今仅仅从莫斯科得到里宾特洛甫抵达的消息。现在外交部已经清楚，莫斯科与德国人进行秘密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此间竟没有一点察觉。只有在获得有关这些谈判的更多的情报并且新的德苏条约的文本公诸于世之后，才能更准确地说出，这种新情况会对一般政治局势带来何种变化。目前这里有各种谣言。比如，据传德国与俄国不仅谈到波兰，而且谈到波罗的海国家，说德国承认将芬

兰、爱沙尼亚、立陶宛纳入苏联的特殊影响区。然而，我重复说一下，这些目前仅是谣传。官方还没有加以证实。

普遍的意见是，波兰的处境现在越来越艰难。当然，以前波兰也没有想得到俄国的直接援助。然而由于不清楚俄国将对德波冲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迫使德国不得不小心谨慎。如果德俄协定的形式使德国不再担心来自俄国方面的不测，那么德国在东方将会更自由地行动。然而，只有当德苏条约的轮廓清晰后，这些才能有更明确的答案。

最近几天问题就会得到澄清。

斯米特

№07417

瑟尔特尔关于爱德关系
致拉多涅尔的信

(1939年8月24日^①)

8月23日，公使托佛尔拜会外交部，以获取德国与苏联条约的信息，他得到如下答复：

1. 条约的最后文本尚未起草完毕；
2. 条约的基础是明确而简单的；
3. 条约未必会涉及第三国；
4. 德国的朋友在以后也仍然是它的朋友。

卡·瑟尔特尔

^① 档案原件未注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信件内容推断的。

№07418

巴罗关于法国各界对德苏条约的反应

致瑟尔特尔的信

(1939年8月25日)

从昨天起，这里开始全力备战。昨天颁布了两个动员令：早晨就开始征召3类和4类预备役军人。这个命令已经在全国发布。下午，动员范围扩大，有些地区（边界地区）开始征召2类预备役军人。根据大概的统计，昨天已经征召到军人达百万人以上。开始征用汽车，市内的部分公共汽车被调去运送军队。在军工企业工作的人，被认为是在工作岗位上就地动员的。一切休假都被中止等。

德苏新条约在此间引起了极大不满。俄国的行为方式被这里所有的政界人士看做是彻头彻尾的叛卖，只有共产党人例外，共产党人的报纸竭力为斯大林的策略辩护甚至赞美这种策略。然而，有趣的是，在《尤马尼特》和《瑟苏尔》报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评论的只是二流甚至是三流活动家，加香^①、多列士^②和佩里^③完全保持沉默。今天有谣言说，俄国与德国除签订了协定外，还有一个秘密议定书，该议定书放开了俄国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手脚。此间还传说德

① 加香（1869～1958），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1920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0～1944年参加抵抗运动。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

② 多列士（1900～1964），1930～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1935～194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45～1947年曾在政府任职。

③ 佩里（1902～1941），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9年任法共中央委员。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者杀害。

国与俄国将瓜分波兰的部分领土。

阿·巴罗^①

^① 阿·巴罗，时任爱沙尼亚驻法国使馆参赞。

№05665

谢苗诺夫^① 关于立陶宛局势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节录）

（1939年8月25日）

由于外交部指示，立陶宛的主要报纸拒绝对最近的事件做出评论。报刊只限于转载外国报刊的评论。从今天的普遍混乱中仅可以观察到惊慌失措和为立陶宛的命运担忧的感觉。人们得出的结论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地位加强了，因为他们被德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所压垮，而现在这种威胁被推开了。立陶宛人害怕苏联最终不再对立陶宛感兴趣，就像在英国与苏联谈判中那样，它在将来被打入另册。他们害怕，德国与波兰的冲突会触动立陶宛，而苏联对此漠然置之。所以，报纸被建议严守中立，不要讨论德国与波兰间的事情。

临时代办

^① 谢苗诺夫，苏联驻立陶宛大使馆临时代办。

№05666

佐托夫关于苏德条约与科列契克的谈话（节录）

（1939年8月26日）

立陶宛大使馆参赞科列契克顺便到我这里来了。他对目前国际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感兴趣。总的来看，他对苏德条约评价良好。他认为，协定给波罗的海的小国带来了安定，但是他觉得非常不解的是，两个思想上彼此斗争的国家现在竟成了“朋友”，找到了密切关系的共同基础。“难道你们忘记了，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一书中是如何描述苏联的？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

在回答中，我努力向他证明，英国保守的各界怎样极力唆使德国进攻苏联，德国经过现实地考虑，在认为会输掉战争的情况下，它的对外政策发生了变化。在答复中我向他指出，至于苏联，它可以并行不悖地与具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睦邻关系。

伊·佐托夫^①

^① 伊·佐托夫，时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全权代表。

No07419

瑟尔特尔关于苏德条约与 弗洛文的谈话记录

(1939年8月28日)

8月23日13时德国公使弗洛文先生前来与外交部长谈话，他通报了如下情况：

1. 传说德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似乎还进行了某种形式的谈判，或者进行了有损于或牺牲爱沙尼亚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交易，这种谣言没有任何根据。德国与苏联的条约不会以任何形式触及和损害爱沙尼亚的利益。相反，这个条约有助于消除波罗的海国家与其邻国冲突的可能性。

2. 根据从德国外交部门得到的情报，他可以证明，如果波罗的海国家，首先是爱沙尼亚，不在其外交政策中坚定而一贯地遵守中立政策，未必能够签订这种形式的条约。

3. 如果现在就爆发战争，那么毋庸置疑，爱沙尼亚可以保持中立。一旦发生战争，爱沙尼亚也不会被卷入战争，而是置身于危险区之外。

德国大使以谈话口吻作了这些声明。

卡·瑟尔特尔

№07421

列伊关于苏德条约给爱沙尼亚 外交部的信（节录）

（1939年8月31日）

关于德国与俄国的互不侵犯条约。

今年8月23日的德国与俄国协议明显地证明，那些自去年秋天到今年一直怀疑俄国寻求与民主国家寻求协议并准备尽自己一切力量给予“侵略者回击”是否真诚的人们对局势的判断是多么正确。甚至可以问，莫斯科是否真的与英国和法国进行了谈判——至少在涉及最近的军事谈判部分，它不过是为了讹诈柏林，促使它与莫斯科签订协议。最近两年从俄国逃出来并接近克里姆林宫秘密的人士证实，斯大林本人非常关注与希特勒达成协议，如果希特勒愿意的话，早就可以签订某种形式的条约了。根据此间德国使馆工作人员的情报，签订8月23日条约的倡议出自莫斯科，这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正是俄国人在为签订贸易协定进行的谈判中做出暗示，加强经济合作有助于改善政治关系，所以，协定是必要的。

.....

现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后，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回忆一下斯大林在今年3月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言的相应部分和莫洛托夫5月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演讲，就可以看出，从德国人那里获得的情报是符合真相的，因为它们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言论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两次讲话中明显地指出，莫斯科很高兴与德国确立良好关系。莫洛托夫最终取代李维诺夫不就是希望消除形式上的障碍，以使与柏

林进行某些更认真的谈判的一个原因吗（里宾特洛甫不与犹太人讲话）？

关于最近8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判，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说，事实上，里宾特洛甫和高斯（德国外交部条法司司长）的谈判伙伴是斯大林，因为只有当斯大林征询他对某些问题的意见时，莫洛托夫才表示自己完全同意斯大林的看法。在签订协议后进行的私下晚宴上，德国方面出席的是里宾特洛甫、高斯和特命全权大使舒伦堡伯爵，斯大林心情很好，喝了不少酒，看来他酒量很大。晚宴结束时，斯大林甚至为阿道夫·希特勒的健康干杯，据参加了无数次谈判和条约签字仪式的高斯说，他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愉快的气氛。从斯大林8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拍摄并发表在此间次日报纸上的照片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达成的协议很满意。

尽管8月23日条约就其内容来说比一般互不侵犯条约（如我国与德国的条约）走得更远，但没有理由认为，莫斯科和柏林马上就会产生信任和友好关系。日复一日互相威胁的匕首只是暂时藏进了怀里，相互攻讦也只是暂时停歇，但是每一方都十分清楚，纳粹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仍然是死对头，一有机会，他们每时每刻都想置对方于死地。所以，我认为，所传8月23日在莫斯科的谈判中，还就双方关心的独立的波罗的海国家生存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一传闻是可信的、确实的。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对我证实，双方确实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并且达成了有关的“君子协定”（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他强调，他这样说不是根据猜测，而是他掌握的某些情报证明果真如此。还在柏林公布相应的声明前，此间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就强调说，所签订的协定“牺牲”波罗的海国家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德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保证说，莫斯科条约的结果正好相反，假如在西方爆发战

争，那么波罗的海仍将是和平地区。我认为，可以相信这些保证，因为8月23日条约签字后，德国与苏联既没有瓜分“波罗的海国家”，似乎也没有哪一方对建立共同边界感兴趣。如果它们之间有一个缓冲国带，对“新”朋友的每一方都是有利的。

所以，对8月23日照片上斯大林脸上充满满意和愉快的表情，不必大惊小怪。他理想中要达成这样的条约至少也得两年，他未必想象得到，这个理想会这样顺利地实现。反共产国际公约被破坏了，德日友谊遭到打击，不容易很快就恢复过来。俄国能够暂时置身于欧洲大战之外，保持着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机用自己的力量干预并一击奏效的可能性。这样，在把欧洲分为两个阵营的大战中，莫斯科便成了的超级仲裁者。条约对希特勒也有利，这是毋庸置疑的。8月23日在莫斯科爆炸的“炸弹”，并没有造成令人震撼的影响，没能使伦敦和华沙害怕、屈服并接受慕尼黑二号阴谋。在大的外交游戏中，这颗“炸弹”并没有产生希特勒所希望的那种轰动效果。

阿·列伊

№07438

莫林关于拉脱维亚军事动员事
致武装力量参谋部电

(1939年9月1日)

拉脱维亚参谋部向我通报说，此间打算动员最后三个年龄段的人参军，数量约16000人。同时他们请求我通报，我们能够动员多少后备役军人服役。因为军事部长今天或明天将提出建议，他可以把这些信息作为其建议的论据。我请求立即给我答复。这些信息目前应该保密。切切。

莫 林^①

^① 莫林，时任爱沙尼亚驻拉脱维亚使馆武官。

№07439

列奥纳尔德关于苏德秘密协定
致美国务卿电（节录）

（1939年9月5日）

爱沙尼亚外交部和总参谋部认为，关于兼并爱沙尼亚的苏德秘密协定的传闻是没有根据的：他们不相信目前苏军在西部边界的调动正是这样说的证明。

列奥纳尔德^①

^① 列奥纳尔德，时任美国驻爱沙尼亚代办。

№05667

尼基金^① 关于爱沙尼亚对入侵波兰的反应 给苏联外交部的报告

(1939年9月15日)

本报告所涉及的时间仅有16个昼夜，然而却充满了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对爱沙尼亚的整个政治和经济生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新时代的开端。

第一个事件是苏联与德国签订贸易协定及随后两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给人的印象是，这不仅使爱沙尼亚政府，而且使爱沙尼亚社会各界都感到震撼。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使爱沙尼亚政府感到十分震惊，它简直有点惊慌失措，在一段时间完全失去了方向。一个在相当长时间里准备站在德国方面与苏联作战的政府，一个秘密地被英国唆使让德国军队经过自己领土的政府，一个传播和夸张渲染关于苏醒的苏联红色帝国的谣言，说苏联打着为波罗的海国家不可侵犯提供“担保”的幌子实施侵略计划的政府，现在忽然看到，它在这方面的一切努力原来都是徒劳无益的。它一直在人民中精心培植和散布这样的思想，说爱沙尼亚是个小国，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现在，在面临德国与苏联行将搏斗之时，却具有了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成了决定未来斗争的结局时天平倾向哪一边的重要因素，而这个思想忽然变得一钱不值。所有这些为使爱

^① 尼基金，时任苏联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

沙尼亚人民“振作精神”的诡计，终究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事实上，苏联过去没有，现在也不打算向爱沙尼亚提供任何担保，爱沙尼亚能自己捍卫自己的独立，既然苏联与德国间的紧张气氛缓和了，那么，爱沙尼亚人杜撰的两个大国“命运主宰者”的伟大历史使命，过去就不曾需要过，现在更是烟消云散了。爱沙尼亚政府重新发现自己只不过是邻国身边一个作为缓冲的侏儒。这个冷酷的现实使爱沙尼亚的领导层极度沮丧，他们不再异想天开，他们仇视的共产主义巨人迅速垮台的希望也已化为泡影，本来镇压共产主义是那么惬意和赏心悦目。

苏联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是如此鲜明的独立自主的方针，它既不买英国的帐，也不买法国的帐，它重新以自己的力量和强大使爱沙尼亚刮目相看，迫使它清醒地看到周围世界。爱沙尼亚政府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两次长时间的会议。瑟尔特尔勉强地承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具有和平意义因素的索然乏味的讲话就是由此而来的。爱沙尼亚政府所有行为中只有一点很明显，它非常希望看到苏联与德国发生战争，他们计划的失败促使爱沙尼亚报刊起初对莫洛托夫同志在批准苏德条约的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上的讲话表示“沉默”。部分报纸根本没有刊登这个讲话，部分报纸刊登了，但是讲话的最重要的地方，即谈到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性方面，完全被删去了，取而代之刊登的是猜测、怀疑和疑问，使居民很难弄清苏联政府真正的观点。我需要与瑟尔特尔谈话。让大使馆一秘给外交部新闻局打了一个电话，以便外交部准许报纸刊登多少像点样子的社论，即使已经很迟了（9月11日）。

对爱沙尼亚政府的行为路线打上烙印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向波兰宣战和英国和法国向德国宣战。

爱沙尼亚政府看到，苏联没有被卷入战争，起初不仅不阻止，反而鼓励爱沙尼亚报界散布来自英法各界关于苏联的谣言，这些谣

言断定，是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发动了战争，苏联背叛了和平事业，它知道，波兰不允许红军经过它的领土，所以它能预先说不需要与英法的谈判等等。但是在我们的压力下不能不刊登莫洛托夫同志的讲话，该政府终于被迫指示报刊停止诽谤和诋毁，因为既成的对外贸易局势迫使它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07440

弗洛文关于波罗的海国家的心态

致德国外交部电

(1939年9月19日)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今天对俄国入侵波兰表示忧虑。考虑到俄国的行动令人琢磨不定，难以预料，该国在欧洲的扩张是否也是针对波罗的海国家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重要问题，在这种条件下，德国是否打算并能够帮助他们。然后部长对我宣读了摘自土耳其报纸的剪报，其中援用了莫斯科的报道，德国似乎承认，必须把波罗的海国家及其港口归并到苏俄。我当即声明，这些报道来自英国间谍，具有明显的挑拨性质。

武官通报了总参谋部对德国向苏联提供了在波罗的海国家自由行动所产生的忧虑。苏联正为利用这个机会寻找口实。

弗洛文

№07443

列伊关于莫洛托夫召见与爱沙尼亚外交部的
电话记录（节录）

（1939年9月19日）

……13时（我国时间12时）他被莫洛托夫召见。莫洛托夫请他以最严肃的方式警告爱沙尼亚政府并通知它，苏联政府将准许自己的海军在塔林附近地区搜索波兰的潜艇，因为苏联政府不能让潜艇留在海上，因为舰艇装备着鱼雷。

№05668

波兹尼亚科夫^① 关于波兰人 越境的日记（节录）

（1939年9月20日）

武官科罗特基赫同志早上被召到立陶宛军队司令部，他对我说，9月20日夜里，约5000名波兰军人、200辆各种汽车越过了立陶宛边境（我指示让塔斯社报道）。然后他又说，立陶宛军队司令拉斯蒂基斯命令边境（军队）以友好的精神迎接红军部队，帮助他们确定立陶宛边界（我指示让塔斯社报道）。此外，他还向我转告了二局局长杜尔克斯尼斯上校的情绪。后者认为，在维尔纽斯的立陶宛人将来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要比生活在地主统治下的波兰自由得多，立陶宛依靠邻邦苏联，将比近来这段时间感觉好得多。

^① 波兹尼亚科夫，时任苏联驻立陶宛全权代表。

No 05669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居民情绪的

日记（节录）

（1939年9月21日）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所熟悉的工程师维特曼塔斯就日常小事顺便来找我。我试图利用他这次到来的机会摸清总的情绪。他说，在城市公众情绪中可以观察到两个极端：一部分主张考纳斯归苏联，另一部分人坚持维尔纽斯应该归还立陶宛（他们回忆起条约并举行讨论）。对于一些热衷享受并在考纳斯建造了房屋的人（他们中有不少统治集团的代表）来说，认为两种方案都不能接受。之所以不能接受苏维埃，是因为它不尊重私有制，而立陶宛的维尔纽斯也不愿意，是因为迁都将使他们的大量房屋闲置，而这些房屋现在能够给他们带来大笔收入。根据维特曼塔斯的估计，立陶宛的社会舆论近来分成三个方面：一部分倾向波兰，另一部分倾向德国，其他的亲近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波兰方面的拥护者现在已经破产。但其余两派还在：维特曼塔斯认为，第三方面（对苏联）的势力正在加强，由于边界接近，苏联的影响比以前感觉得更强烈一些。维特曼塔斯说，总的说来，许多人对波兰地主遭到报应感到非常高兴。之所以高兴，是因为在农民的立陶宛，还对地主的统治记忆犹新。

记者西蒙到我这里来，他是《立陶宛金斯特》新闻的编辑和出版发行者。首先他表达了对苏联巨大的外交成就的赞扬。他认为，苏联对外政策的英明举动（与德国的条约和以后的事件），归根结底在不远的将来将把希特勒推向死亡。然后，他同大家一样，把话题

转向了最近几天人们议论比较多的事——维尔纽斯的归属。他说，有各种各样的意见。一些人认为，根据条约，现在就应要求苏联把维尔纽斯转交给立陶宛。其他人希望，不须立陶宛的提议，柏林和莫斯科自己就会这么做。另外一些人对苏联有好感，赞成维尔纽斯留在苏联，因为这会加强后者对立陶宛全部日常生活的影晌。西蒙说，在国务政治家中情绪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向苏联提出要求就等于参与战争（他们解释这样做犹如帮助波兰人），因此应该排除这样的方案。还有就是遵循柏林和莫斯科的共同提议，从后者手里把维尔纽斯接受过来，他们认为这也不可能。他们认为，这就意味着立陶宛参与瓜分波兰，英国和法国就会把这看做破坏中立。他们认为西方战争结束之日才是立陶宛政府对维尔纽斯问题表现出积极兴趣的起点，因为那时一切都已明朗了，维尔纽斯问题就可以通过外交谈判，并征得所有有关国家的普遍同意后得到解决。西蒙强调，这样的指导方针来自总统斯梅特纳。

西蒙像许多人一样，对波兰得到报应表示满意。

在这一总的话题之外，西蒙说，德国在芬兰的一家公司很像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中心（这也是他到我这里来的原因）。公司的名称和其他资料我已交给了有关的人。

16时，图劳斯卡斯（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给我打电话通报说，他们在柏林的公使昨天已及时到达但泽，但是不知为什么没有与里宾特洛甫举行会晤。准备今天白天进行这次会晤。随后图劳斯卡斯告诉我，今天晚上的报纸上将出现“埃里塔”的公报，说在许多地点红军的部队与立陶宛保卫边界的军队发生了接触，这些接触是在非常友好的精神中进行的。图劳斯卡斯说，在个别地方，红军的部队侵犯了立陶宛的边界，但是只要指出这一点，红军指挥员在请求指出边界线后，立即道歉并撤回了。图劳斯卡斯说，总的来说，“贵方军队的行为是非常得体和友好的”。

№07444

契科纳尔蒂关于苏联舰艇出现在 波罗的海致意大利外交部电

(1939年9月21日)

俄国海军舰艇出现在波罗的海使居民感到极度不安。

政府通报说，它预先已经得到苏联领导人对此事的通知。俄国军舰是为了搜索波兰“奥尔杰”号潜艇，该潜艇起初在塔林港，后来从当地政府看守下逃跑并消失在公海上。

政府的解释不太让人们满意。他们担心，俄国人以这件事为借口，再也不会离开爱沙尼亚的领海了，而且将进一步封锁其海岸，这只是准备占领这个国家的一个步骤。

海军的示威和预计中的军队在边界的集结，是想使爱沙尼亚最终认识到，任何抵抗都是徒劳无益的。

契科纳尔蒂^①

^① 契科纳尔蒂，时任意大利驻爱沙尼亚公使。

№07445

斯坦因加尔特关于瑟尔特尔访苏 致美国务卿电（节录）

（1939年9月23日）

……明天，爱沙尼亚外长将到达莫斯科。爱沙尼亚使团的工作人员秘密告诉我，外长此行的目的是签署爱沙尼亚和苏联商务协定，旨在改善苏联货物过境和在爱沙尼亚保存苏联货物的可能性，以及相应地改善爱沙尼亚货物在苏联的状况。此外，协定将规定扩大两国间的货物流通。显然，条约的谈判是紧急的，因为9月15日才宣布开始谈判。尽管向我提供信息的人对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但是给我的印象是，苏方是开始谈判的倡议者。

提供信息者还证实，外交部长此行的目的似乎是签署商务协定，但也承认，访问是应苏联政府的邀请进行的，在此期间也可能讨论政治问题，但是他不能确定其性质。

从上述情况可以得出结论，苏联政府与爱沙尼亚签订这个协议是为了改善运往德国的货物的过境能力。所规定的扩大爱沙尼亚向苏联的出口对后者未必非常重要。

我认为可能的是，在爱沙尼亚外长的谈判中，将讨论涉及到芬兰湾河口筑垒的爱沙尼亚岛屿这些意义更为深远的问题。

斯坦因加尔特^①

^① 斯坦因加尔特，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No 07446

舒马尼斯关于瑟尔特尔召见情况 致拉脱维亚外交部电（节录）

（1939年9月23日）

……昨天下午，爱沙尼亚外长瑟尔特尔邀请了我。

……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他与苏联公使尼基金进行了谈话，希望签订新商务协定。过了几天，公使说，莫斯科愿意参与就此问题与爱沙尼亚代表进行的谈判。由于对谈判的现实性缺乏信心，外交部外贸司司长梅里以秘密外交特使身份被派往莫斯科。

谈判是与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进行的，在最后几天，谈判进行得特别顺利。所以，尽管苏联海军在芬兰湾进行示威，瑟尔特尔外长这几天表现得很平静（正如我个人确信的那样，他一直不很顺利）。星期四，梅里通报说，在莫斯科的谈判已经结束，条约可能要签字。起初拟委托其在莫斯科的公使签订该条约，但后来又想使这个条约具有更大的意义，决定为此任命一位政府成员作全权代表。起先打算派经济部长列奥·谢普去，由于他很忙，决定让外交部长去。

已经将此决定通报了苏俄公使，他昨天拜会了外交部，以本国政府的名义向瑟尔特尔部长夫妇发出了去莫斯科的邀请。从部长的解释中，我得出结论，瑟尔特尔外长本人想去莫斯科。我指出，由于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部长此行会引起各种看法和猜测，部长回答时强调说，他对此不会在意。显然，关于苏俄对爱沙尼亚保护关系的谈话和文章肯定不少，但以后大家都会清楚这种保护关系所具

有的性质，以至使其他人也想得到这种保护。与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向全世界证明，在任何情况下，爱沙尼亚的港口都不会对俄罗斯关闭，这符合我国的利益，特别是现在更是如此。几天之前，部长也是这么坚定地表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发展与德国的良好关系。

部长补充说，莫斯科谈判一直严加保密，我是他通报的第一人。外长希望下星期四返回。当时他还允诺向我通报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和一切所见所闻。莫斯科的谈判是在十分良好的气氛中进行的。

弗·舒马尼斯^①

^① 弗·舒马尼斯，时任拉脱维亚驻爱沙尼亚大使馆公使。

№07448

莫洛托夫关于苏爱军事联盟与 瑟尔特尔的会谈记录

(1939年9月24~25日)

应苏联政府的邀请，在经济部商务司司长乌维马的陪同下，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夫妇于1939年9月24日16时抵达莫斯科。

同日晚21时，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爱沙尼亚方参加会见的有公使阿·列伊，苏方参加的有贸易人民委员米高扬。

开始，会谈围绕着爱沙尼亚与苏联之间的贸易进行，指出了瑟尔特尔部长1934年在莫斯科签订相应条约中所起的作用。这个条约为两国的贸易关系带来了变化，从此两国的贸易关系一直平稳和顺利地发展。然后，莫洛托夫把话题转到政治领域，他宣布了如下内容：

莫洛托夫：看起来，贸易关系已经调整妥当，苏联邀请您来莫斯科正式签署的新的贸易协定也已准备好。但苏联和爱沙尼亚之间的政治关系不仅不正常，而且不令人满意。被扣留的波兰潜艇从塔林逃走证明，爱沙尼亚政府不很关心苏联的安全。爱沙尼亚政府或者不想，或者不能维持本国的秩序，从而也使苏联的安全受到威胁。列伊公使转交的爱沙尼亚政府对此问题作的书面解释不能令人信服。您也承认，潜艇的机械出了某些故障。其实，我们的情报也证实了这一点，潜艇在爱沙尼亚得到了维修，装备了燃料，给它留

下6枚鱼雷，并为它逃走提供了可能。爱沙尼亚政府的解释没有能反驳这种怀疑。这样，潜艇出现在海上，对苏联的海军构成了威胁，而苏联在波罗的海具有相当大的利益：列宁格勒有大港口，有巨大的海军舰队和庞大的商船队，即使在将来也得不到任何保护免遭类似突然袭击的伤害。芬兰湾的出口控制在其他国家手里，苏联不得不容忍他们在该湾口的所作所为。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为苏联加强其安全提供真正的保障。苏联党的政治局和政府决定向爱沙尼亚政府要求得到这样的保障，为此提出缔结军事联盟或互助条约，以保证苏联有权在爱沙尼亚的领土上得到据点或海军和空军基地。

瑟尔特尔：爱沙尼亚与苏联的相互关系始终是良好的。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强调这种睦邻关系。

至于您列举的新情况，那么请让我首先指出，在潜艇被扣留和逃跑期间，苏联和波兰尚没有正式处于战争状态。所以首先产生了一个问题，苏联政府能否在某种程度上向爱沙尼亚提出破坏某些国际准则的指责，并用破坏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某些要求。但是，如果说到中立法则，那么根据法则，禁止交战国一方的潜艇进入作为中立国家的爱沙尼亚的港口，除非是某些个别情况。事故即机械受损就是这种情况之一。苏联政府也知道这个情况。在我国的解释中指出，潜艇正是由于事故而进入的，并要求释放它。然而，爱沙尼亚政府认为，机械受损不妨碍潜艇航行，所以不能把它理解为事故。只是因为潜艇有航行能力这一事实使我们有权利扣留它。如果由于机械故障潜艇不能航行，那么我们就不能扣留它。所以，指责被扣留的潜艇被爱沙尼亚修好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不知道，所发现的机械故障目前是否已经消除。

至于波兰潜艇的逃走，那么我可以再次证明，在这件事情中，既没有理由怀疑爱沙尼亚政府协助它逃跑，也不能怀疑它马虎。相

反，爱沙尼亚政府和官方机关尽其所能，使用了一切力量，以扣留住潜艇。如果它还是得以逃跑，那么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不幸事件，我们对此也深表遗憾。从这个事故中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您所说的结论，爱沙尼亚政府自己不能捍卫自己的中立，或者如您所说——不能维持本国的秩序。也不能由此情况中得出某种关于爱沙尼亚与苏联之间关系的不着边际的结论。

对此我要补充一下，对潜艇逃跑的司法调查正在进行，并可望得到其结果。

至于贵方提出的问题——签订互助和基地条约，我没有讨论的权利。我只能说，这与爱沙尼亚特别是最近几年无可指责地奉行的对一切国家保持平等关系和中立的政策背道而驰。这个政策在我国已经生根，我深信，爱沙尼亚不想放弃这个政策，不想缔结军事同盟，尽管是以互助条约为名与大国苏联签订条约。

莫洛托夫：谁不想？是您不想，是统治集团不想，但是爱沙尼亚各界和人民想。我们是知道的。

瑟尔特尔：我敢肯定，中立和不参与大国之争的政策是我国绝大多数人民坚定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他们不想放弃这个政策。

列伊：自从1920年以来，中立就是爱沙尼亚的对外政策。

莫洛托夫：但是你们已与拉脱维亚结成军事同盟。你们也可以与苏联建立这样的关系。

列伊：拉脱维亚是小国，而苏联是大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联盟条约没有与任何一个缔约国的中立产生抵触。因为我们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中立看做是统一的整体。与大国结盟的条约容易把小国置于大国的从属地位，破坏他们的独立。

瑟尔特尔：与大国军事联盟的相互关系会伤害爱沙尼亚自由行使主权的权利，限制我国和人民的和平发展，这些不良后果在苏联作为盟国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时更加明

显。爱沙尼亚国家 20 年来的发展明显地确认了它在主权和独立的条件下生存的权利，这个权利不能因别国的利益以类似的方式加以破坏。

莫洛托夫：请不要害怕。与苏联缔结互助条约不会构成任何威胁。我们既不打算触及你们的主权，也不触及你们的国家政体。我们不打算把共产主义强加于爱沙尼亚。我们不想触动爱沙尼亚的经济制度。爱沙尼亚将保持自己的独立、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议会、内外政策、军队和经济体制。我们不触动这一切。

瑟尔特尔：尽管有这些保证，我仍保留自己的意见。和平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决定了爱沙尼亚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双方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生存和发展，所以在爱沙尼亚，人们十分不解，为什么必须寻求新的基础。您指出的潜艇事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以此提出如此激烈的要求，太牵强附会。

莫洛托夫：我们认为与潜艇有关的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我们还把它看做是一个征兆。这艘潜艇会给苏联的船舶航行造成巨大损失。潜艇事件证明苏联缺乏它非常需要的保障。在这方面，目前这种局面十分不正常。苏联应该有芬兰湾的一小部分。20 年前，我们曾栽在这个芬兰“水洼”中。您是否认为，这种局面会永远保持下去？当时苏联虚弱，现在它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都相当强大。苏联现在是大国，必须考虑它的利益。我告诉您，苏联要求扩大自己的安全体系。因此它必须进入波罗的海。如果您不愿意与我们缔结互助条约，那么，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不得不利用其他途径，也许更激烈，更复杂的途径。我请求您，不要迫使我们为爱沙尼亚使用武力。苏联的要求与它以前承担的责任不矛盾，而是会发展这些义务，同时也加强了安全，本来现行协定应该保证这种安全，却没能做到。

瑟尔特尔：我首先想指出，爱沙尼亚—苏联和约不是强加于苏

联的，这是公平的和平条约。互不侵犯条约当时大大地发展了和平关系，我们认为，现在也应该成为毫不动摇的准则。我们永远认为，爱沙尼亚的中立，以及爱沙尼亚不允许自己与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对苏联有利无害，因为爱沙尼亚因此而有助于波罗的海沿岸保持和平。迄今我们的政策一直是为了借助于友好关系，保持毗邻地区的和平，防止政治紧张。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认为只有互不侵犯条约之类的消极协定才是适宜的。我们担心，只要我们与一个大国，如苏联，缔结军事同盟，就会招致其他国家的猜疑，打破波罗的海地区的正常平衡状态，因此就会有把自己卷入大国之间纠葛的危险。无论是爱沙尼亚，还是位于波罗的海沿岸的其他国家，迟早都必然会因这些争吵而遭难。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在对外政策中，我们坚决地奉行我阐述的和平方针，例如，我们与德国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我们认为，这既不会给爱沙尼亚造成任何危害，也不会通过爱沙尼亚对苏联造成威胁。我们相信，我们以此对波罗的海沿岸的安全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贵方提出的建议与爱沙尼亚－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所体现的绥靖目的明显抵触。

莫洛托夫：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我们与德国有友好关系，为了消除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和稳定东欧的和平，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如果您担心爱沙尼亚－德国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联的要求有矛盾，那么我可以向您保证，德国同意爱沙尼亚和苏联之间缔结互助条约。如果您希望的话，我担保您会得到这种同意。然而，苏联认为缔结互助条约是绝对必要的。

瑟尔特尔：我表达的是爱沙尼亚对外政策的普遍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与其他国家的问题无关。这种共同原则也适用于与我没有提及的其他国家的关系。爱沙尼亚－德国互不侵犯条约只作为我们运用的手段的例子在这里提出的，借助于这些手段，我们迄今对巩

固波罗的海沿岸的和平成功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列伊：然而，如果苏联与德国的相互关系是以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的，那么，在波罗的海就没有威胁，也就用不着苏联用互助和基地条约来防备这种威胁，保障自己的安全。

莫洛托夫：与德国的条约有一定的有效期。因为无论是我们，还是德国，都没有放下武器。在波罗的海，还会出现其他大国的势力，给苏联造成威胁。波兰—德国的战争证明，大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托付于他国。事件还表明，苏联海军的安全不够，所以，苏联自然要把这种安全的保证掌握在自己手中。

列伊：您指的是哪些“其他大国”？

米高扬：比如说英国。

瑟尔特尔：我们对爱沙尼亚的立场已阐述得相当明确，考虑到问题的重要性，我想把今天谈话的这一切内容报告自己的政府。

莫洛托夫：事情不能拖延。我让您与塔林直接联系，然后马上继续谈判，就如同我们与德国外交部长进行的谈判那样。

瑟尔特尔：作为议会任命的部长，除了总统和政府外，我也有责任向议会通报，这是用电话无法做到的，而且这样太匆忙。我明天返回塔林。

莫洛托夫：我再强调一次，这件事很紧急。局势要求刻不容缓地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等得太久。建议您迎合苏联的愿望，以避免局势恶化。不要迫使苏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使用武力。考虑我们的建议，不要把希望寄托在英国和德国身上。英国无力在波罗的海采取某种行动，而德国正忙于西部的战争。现在，一切寄托于外部帮助的希望都是幻想。所以，您可以深信，苏联无论如何都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如果您不同意我们的建议，那么，苏联就会根据自己的愿望，不经爱沙尼亚的同意，用其他方法实施自己的安全措施。

会谈于 22 时 15 时结束。

离开克里姆林宫，外交部长和公使列伊回到使馆，开始准备乘应于次日早晨起飞的第一班飞机回国内。约过了 30 分钟，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通知说，莫洛托夫先生请部长瑟尔特尔 24 时前回到克里姆林宫。

同日晚 24 时，外交部长在列伊公使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克里姆林宫。苏联方面参加的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莫洛托夫通报说，它已经准备了条约的书面草案和附加议定书，苏联政府建议爱沙尼亚签署。把草案作为谈判的基础，谈判可以进行得更快一点。同时，他对草案作了一般性解释：（1）草案文本是初稿，可以在谈判过程中修改；（2）苏联仅仅追求那些巩固自己安全的战略目标，而对爱沙尼亚国家的主权、国家体制及经济制度都不会触动，希望将这些条款在附加于草案的补充议定书中加以确定。

外交部长瑟尔特尔声明，尽管他原则上应该反对这个建议，也没有被授权对它进行谈判，但他还是要提几个问题，以熟悉建议的内容，否则他难以向塔林报告苏联政府提出草案中的某些条款是什么意思。

莫洛托夫：请提出问题。

瑟尔特尔：草案第一节谈的互相援助的情况是，一旦缔约国某一方遭到第三个欧洲国家的进攻或威胁。如果这个欧洲第三国是罗马尼亚的话，在此种情况下爱沙尼亚对苏联援助是什么涵义？

莫洛托夫：指的只是波罗的海的进攻或威胁。草案可以作相应的订正。

瑟尔特尔：第一节提及的“对安全的威胁”，除了对外来侵略外，可否是其他的威胁呢？如果可能的话，怎样订正非常模糊的“对安全的威胁”这一概念呢？现行的法律准则在“进攻”的概念方面包含着众所周知的原则，“对安全的威胁”这一概念是极其不

明确的。

莫洛托夫：外来的进攻可以理解为第三国威胁苏联或爱沙尼亚的安全的一种态势。

瑟尔特尔：这个第三国用什么来威胁安全呢？安全的内涵如此宽泛，它涉及到经济、文化和内政问题。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确定“开战理由”，或者非常困难，或者过于容易。只有在遭到军事进攻的情况下，其他方的军事帮助才成为必要，而在其他情况下，每个国家自己都可以应付“对安全的威胁”。

莫洛托夫：也可能有这样一种状态，虽然还没有侵略，但是存在威胁。

瑟尔特尔：将自动地或是根据另一方的请求才给予援助？在第一种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这样一种局面，例如，如果爱沙尼亚认为，苏联受到来自某个巴尔干国家的威胁，于是自己就主动匆忙给予苏联援助，这种援助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形式上，都很可能是苏联所不希望的。也可能有相反的局面：苏联政府可能认为，爱沙尼亚受到了威胁，而爱沙尼亚本国不仅不这样认为，甚至还认为这种援助是有害的。

莫洛托夫：可以根据另一方的请求给以帮助。从草案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给予援助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利。苏联政府认为，在这个方面没有分歧。

当然，双方都在力求保卫自己免遭侵略，因此需要帮助。

瑟尔特尔认为，这个问题没有在草案中得到足够明确的解决。同时他问，第二节中规定的给爱沙尼亚“经济和外交援助”是否不大合适？不久前达成了贸易协议，它也没有规定给予任何援助，而是在支付平衡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交流。在一般条件下，外交援助是不需要的，而在遭到“进攻”的情况下，根据第一节，有义务给予类似的帮助。

列伊：或许不需要把内容和范围都不明确的条款列入草案，那只会引起误会和争吵。从这个立场上看，第二节的第二部分是不适宜的。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第二节中提到经济和其他援助的部分，如果爱沙尼亚政府认为多余的话，可以删除。

瑟尔特尔：为什么草案中没有提打算在爱沙尼亚哪些港口建立苏联海军的基地？这就不能使人明白，哪个港口要作为基地，哪个港口是自由的。

莫洛托夫：海军基地可以在岛屿上，在塔林，在皮亚尔努，也可能还有其他地方。

瑟尔特尔：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出把塔林作为海军基地，因为塔林是爱沙尼亚的首都。皮亚尔努冬天4个月有冰雪覆盖，因此不合作基地。

列伊：此外，塔林是商港，设置海军基地是极不合适的，即使可能的话，在同一个地点，无论是军港还是商港，都不能完好地工作和发展。

莫洛托夫问：你们还有什么样的港湾，也许，不用塔林和皮亚尔努也行？

瑟尔特尔：据我个人的看法，在萨列马岛上有建港湾的地方。

莫洛托夫：这不够。一个地点是远远不够的。

瑟尔特尔：我说不出，但是或许西乌马是合适的地点。

莫洛托夫：萨列马和西乌马作为空军基地苏联多半会有点兴趣。在大陆上，至少应该有一个海军基地。你们在大陆上还有什么港湾？

米高扬：可以以租赁或租让的方式把领土作为空军基地。这块地方还是爱沙尼亚领土的一部分。

瑟尔特尔：因为塔林和皮亚尔努不能考虑，在这种情况下，爱

沙尼亚还有帕尔迪斯基港。

列伊指着帕尔迪斯基港在地图上的位置，做了解释。

莫洛托夫：可以。帕尔迪斯基是适宜的。但是一个地点还是不够。塔林不是非要不可。岛屿中哪些地方还可以？

瑟尔特尔答：萨列马的塔加拉赫特可能是合适的地方。此时他问，为什么条约的有效期要10年呢？

莫洛托夫：条约的有效期是根据苏联和德国互不侵犯条约的有效期确定的。

话题转到补充议定书，莫洛托夫主动解释说，我们想用这个文件证明，苏联既不想把共产主义，也不想把苏维埃制度强加于爱沙尼亚，总之，哪怕是在最小程度上触动爱沙尼亚的主权及其独立也不想。全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体以及政府、议会和驻国外的代表处等，作为爱沙尼亚的内部事务，都将毫无改变地保留。

瑟尔特尔：得悉苏联政府的这些建议和解释，我将向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政府和议会通报。

莫洛托夫（对瑟尔特尔表示怀疑）：您打算要拖延。

瑟尔特尔：这不意味着拖延。这是讨论问题必须的时间。

莫洛托夫：什么时候您能够返回？

瑟尔特尔：大概在星期四。今天是星期日。

莫洛托夫：事情非常紧急，不容拖延，因为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如果马上可以继续工作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

瑟尔特尔再次做出解释，他是议会任命的政府部长，在向议会通报之前，没有讨论问题的可能性。所以他必须在塔林逗留。

莫洛托夫：同意外长的话。

莫洛托夫在回答瑟尔特尔的问题时说，他已经安排了明天8时从莫斯科起飞的飞机，已经给瑟尔特尔、瑟尔特尔夫人和三名随行人员订了座位。

瑟尔特尔：既然我来莫斯科是为了签订贸易协定，所以必须作某种提及。

米高扬：协定已经准备好，只等签字。由于产生了政治情况，要求例外解决。

莫洛托夫对瑟尔特尔说：等你回到莫斯科，就签署贸易协定。会议于 1 时 10 分结束。

№07449

斯坦因哈尔德关于瑟尔特尔行踪
致美国务卿的电报

(1939年9月25日)

昨天抵达的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昨天晚上从芭蕾舞剧院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回到他下榻的宾馆就收拾行李，在爱沙尼亚使馆度过了后半夜。今天早晨8时经过里加飞往塔林。爱沙尼亚公使明天飞回塔林。

我暂时还不能准确地断定爱沙尼亚外长突然飞走的原因，但可靠的是，克里姆林宫向他提出了某些要求，可能是在9月23日下午5(6)时第599号电报最后一段提到的内容，甚至更为激烈。

副本发往里加

斯坦因哈尔德

No 07450

弗洛文关于爱苏谈判致德国

外交部电（节录）

（1939年9月25日）

今天下午从莫斯科返回的外交部长向我通报了如下内容：莫洛托夫向他提出了苏联和爱沙尼亚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的草案。……

随后部长对我讲述说，莫洛托夫要求迅速答复。但是没有指出期限。他还称，如果得到否定的答复，苏联政府将着手寻找其他途径。爱沙尼亚不能指望得到德国和英国的支持。他表示深信，德国会赞同调整的建议。

我问，是否可以从谈话中得出结论，苏联向波罗的海其他国家也将提出类似的建议，他作了否定的回答。

我得悉这个信息后说将它转达给我国政府。正如部长通报我的那样，政府今天和明天将讨论这一情况，并尽快就此问题做出决定。

弗洛文

№07455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苏联政府 建议的第29号记录

(1939年9月26日)

秘密

国家杜马外交和军事委员会与国务委员会于1939年9月26日17时30分在国家大会堂第11号房间举行联席会议。

国家杜马出席的成员有：姆·哈桑、阿·尤利马、弗·卡达里克、阿·卡里内尔、伊·纽曼、阿·皮普、奥·布克、里·里维斯、拉·瓦赫特尔；国务委员会成员有：弗·阿克爾、亚·苏特斯、伊·拉多涅尔、维·皮亚特斯、伊·布赫克。

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国务委员会主席穆·本戈、总理克·恩帕鲁、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军事部长普·里利、社会保障部部长奥·卡斯克、国家杜马主席第一助理阿·安德尔科普、国家杜马主席第二助理阿·迈列尔、爱沙尼亚驻莫斯科公使亚·列伊、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纳·列埃克、外交部长助理奥·爱比克和国家杜马成员亚·提尼逊。

阿·尤利马主持会议。

国家杜马秘书普·马尔维特担任记录。

会议议程：外交部长提供信息。

1. 阿·尤利马主席宣布会议开幕，根据他的建议，通过了议程。根据总理的提议，会议秘密进行。

2. 关于国家杜马成员亚·提尼逊及国务委员会领导成员和国家杜马成员参加会议的问题。根据国家杜马主席的提议，通过决议，邀请国家杜马成员亚·提尼逊参加委员会会议，准许国家杜马主席第一助理阿·安德尔科普和国家杜马主席第二助理阿·迈列尔参加会议。

3. 外交部长提供信息。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在莫斯科进行的爱沙尼亚与俄国缔结新贸易条约的谈判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谈判是在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结束的。结果，与目前的交易量相比，贸易量增加了3.5倍。我们从俄罗斯进口的主要是原料。我们还能够利用俄罗斯的某些港口，我们也让俄罗斯经过塔林港口过境。总之可以说，贸易协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由于签订了贸易条约，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指出，如果说贸易协定一切就绪的话，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却还不明确，并要求解决这些问题。为此需要签订新的条约——互助条约。我拒绝就此问题进行谈判。我解释说，我是议会任命的部长，所以应该从塔林得到相应的授权，我认为必须返回塔林去。于是我回到爱沙尼亚使馆，但是过了半小时，又把我邀请到克里姆林宫，将建议签订的条约草案交给我。看过草案，我请求就某些条款做出解释（外交部长通报了条约的草案的内容）。

该条约的第一点可以接受。他们答应，如果第二点不适合我们的话，可以去掉。第三点涉及到基地，我要求更详细的解释，而当提及塔林时，我表示反对，因为塔林是首都。然后又问我，我国还有什么港口，我回答说，可以考虑帕尔迪斯基和萨列马岛上的塔加拉赫特。对第四点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莫洛托夫提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联盟条约说，如果你们能够成为盟友，那么这也不应妨碍我们结盟。莫洛托夫指出，签订条约时间比较紧迫，但是没有提出

期限。他还说，我们希望你们的政府同意，否则，我们就不得不采取其他措施。回到塔林，政府协商了这个问题。也通报了拉脱维亚公使。如果这是与资产阶级国家缔结条约，那么这个问题不难解决。现在必须立即认真地权衡一切。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一旦我们准备签订条约，那么条约就是永久的了。政府认为，如果外事委员会不做否定的答复，那么就on应该着手谈判。

武装力量总司令拉多涅尔：应当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从武装力量总司令的观点阐述对局势的看法。不应怀疑，如果我们不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就将发生战争。这个条约的草案不是最后通牒。迄今对我们还比较客气。

现在我对一旦发生战争我们的抵抗能力提供一个概况。我们可以抵抗一段时间。但是究竟可以抵抗多久，就难说了，可以抵抗几个月或者更长一些，但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俄罗斯可能在军事上并不强大，它的军队对付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对它的步兵，我们还可以勉强应付。至于空军，俄罗斯可有的是飞机来对付我们。我们的空军力量非常弱小，在国外的定货还没有完全交付。只有德国完成了部分定货。

我们有没有希望得到援助？我明确地说，我们现在无从得到援助。因为谁也不会对我们提供充足的援助。此外，现在谁也不想帮助我们，因为会被卷入冲突，此时他们的共同愿望是躲在一旁。现在大家都是利己主义者。一个 3500 万人的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就崩溃了，这无疑是很令人沮丧的。别的不说，当有人向你建议缔结互助条约时，你很难对它开战。这对俄罗斯来说是宣传的王牌，它的作用不难估计。无线电广播用纯粹的爱沙尼亚语播音说，在人民被卷入战争的时候，我们^① 建议提供自己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

^① 这里指苏联。

我们很难加以拒绝。因为我们被置于首先开第一枪的境地。

我认为，往条约里加进一些关于主权的条件是极其必要的。

使我国卷入军事冲突是非常轻率的。我们应该做出一切努力，以平静地摆脱这种状况。甚至德国也没有想到波兰会如此迅速地崩溃。

政府决定，我们应该进行谈判。

里·里维斯：正在进行宣传，已经在征集赞成俄罗斯派自己的军队越过边界的签名。

阿·皮普：我国公使对这些解释有没有什么补充？

亚·列伊：莫斯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明的，只是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亚·提尼逊：（对会议程序）希望政府说出自己的立场，打算缔结的条约内容范围有多大，以及在缔结条约时打算走多远。好让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容易些。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最后决定。

阿·尤利马：我们必须讨论——要战争还是要和平。显然，如果我们缔结条约，那么，以后情况也不会变好。也许，我们现在进行自卫还容易些，尽管知道战争失败必不可免。问题是明摆着的：或者战斗，或者完全灭亡——不可能获胜。

如果接受建议，那么还有希望保存爱沙尼亚人民。当然，还只是个希望，这个希望的实现还取决于俄罗斯发善心。我们似乎别无选择。我们现在的武器不允许我们加入这样艰巨和殊死的战争。所以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达成我们可以接受的条约。条约会对我国人民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大多数人民坚决不希望加强俄罗斯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别无选择。

总司令伊·拉多涅尔将军：（以咨询的方式）我再重复一次，我们可以抵抗一段时间。我们无力抵抗几年。为了保卫国家，我们已

经做了许多可能做的事。两年半前我们就订了货。尽管所有定货都过了交货期限，但是供货人没有履行对我们的定货，从有些供货人那里，我们甚至没有得到一半。原因是撕毁了定单。现在给钱也买不到东西。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我们的防卫取决于众所周知的东欧国家体系。我们曾试图向波兰解释，它没能力抵抗德国，他们却认为我们是叛徒。我们不能单枪匹马地与俄罗斯进行战争。现在有四个国家依赖于德国和俄国。显然，我们不应该害怕德国。德国与俄国之间保持着平衡关系，所以建议我们缔结条约。如果俄罗斯觉得自己较强，那么它就会完全占领我们。

弗·皮亚特斯：看来我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不能指望援助。如果开战，那么我们整个国家和所有的文化都将灭亡。我们将损失许多国民财富和人力。另一方面，我们将放弃中立。签订条约会引起我们难以对付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增长。但是别无选择。我们希望，即使将来德国也不希望我们被消灭。在目前情况下，德国自己都不得不做出让步，否则它也难以承受。如果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就会遭到与波兰同样的结局。

阿·皮普：这乃是最后通牒。俄国人对我国所发生的事情感兴趣这个想法并不新鲜。日丹诺夫在俄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当他提到这个问题时，我就马上明白了，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指望别人的援助是没有希望的。尽管英国也不希望小国消失，但它现在却不能帮助我们。缔结苏德条约不是加强了希特勒，而是加强了斯大林的地位。在俄德条约中，军事问题提得比较少。现在德国无力指使俄国，俄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拉脱维亚也虚弱，不能帮助我们。英勇的斗争是可能的，但是我国人民目前没有这样的情绪。

建议签订条约的意图在于，我们必须用各种手段帮助俄罗斯。

怎么帮助——当军事谈判开始时，情况就会清楚了。关于基地的问题是最实质性的。不能不说出具体港口的名字，让这个问题一直留个口子。在塔林建基地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提议把帕尔迪斯基作为基地，就像中国与俄罗斯签订的条约一样——这就是你们的港湾，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如果我们背后有军队的话，情况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空军基地自然要建立在岛上，尽管根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这些岛当然应该给德国。一旦发生冲突，就不得不站在俄国方面。现在情况就是这样，虽然我们与俄国还没有协定。这个条约是隐蔽的保护关系。这一点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还应该明白，我们为俄国人效力最大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亚·列伊公使：不应该把问题看得这样悲观。要知道我们没有另一条路可供选择。否则我们就会遭到与波兰同样的命运。我非常怀疑，会让波兰回复到原来的边界。俄国大概什么也不会还给它。也许，波兰有朝一日会重新崛起，但是我们似乎永远不会崛起了。能够与俄罗斯抗衡的是波兰和德国，而不是别的什么国家。英国的力量不会达到这里，因为它在其他地方还有许多事。法国也无能为力。现在与俄国的条约使德国必须信守中立。看起来，俄国还允许我们与它讨价还价，这表明，德国不想加强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势力。俄国的表现说明，他们与德国的协议中还有模糊的地方。德国想“维持现状”。然而，决不要认为，德国会对俄国示弱，尽管俄国也得到了波兰的大片领土。

乍一看去，基地这件事对我们很不好，但是，如果俄国想要，马上就可以把这些基地夺去。俄国可以向我们要更多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不敢说一个不字。莫洛托夫极其爱好和平地说，我们不会把任何东西强加于你们，既不会把共产主义，也不会其他任何东西强加于你们，一切都将保留——你们的对外政策、政府和议会等。如果你们不想履行这些最低的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使用另

一些途径。莫洛托夫说，他保证德国会同意。这一切是否仍然会这样还难说。如果德国不会变得太贫困的话，那么均势就会保持。我们是乐观主义者，希望得到某种均衡。

伊·布赫克：与俄国的和平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如果不确定基地的界限，那就可以设想，基地会扩展到全部国土。我们试图保全我国人民，因为如果俄国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把我们大家都运到它的领土上去。俄国与我们的条约现在仅是开始——它会扩展到芬兰和其他国家。至少可以这样认为。我们只能尽我们所能签订一个较好的条约。

卡·恩帕鲁总理：不言而喻，议会外事委员会应该通过决议。除了不得不参加谈判和原则上接受俄国的建议外，政府没有其他办法。也许，该建议目前还是有利的，因为没有向我们提绝对的要求。政府现在还不能提交最后方案。政府已经考虑了提出的所有意见。政府代表团的成员有：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国家杜马成员阿·皮普和公使亚·列伊。不派军事专家。如果要求的话，可以派出。公正地说，条约签订容易，执行起来比较难。代表团明天12时从里加乘飞机出发。拖延只会带来坏处。

武装力量总司令伊·拉多涅尔：我们将不派出军事专家，以使俄罗斯方面也不派。我们最大的弱点是，我们背后没有支持。即使邻国想帮助，他们也没有力量。显然，在没有另一条出路的情况下，就不能进行战争。如果能够期望在一个预定时间得到某种援助，那还可以开战。如果说俄罗斯相对大国还比较弱小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它却是足够强大的。还是要有一场大战争的。至于战争如何结束，我们不知道。我们希望，按我们的条件迅速解决问题，对我们将是最有利的。

我们应该清楚，俄国必须有波罗的海。

我们的历史责任是不让我们的人民遭到毁灭，极尽我们所能，顺利地带领他们渡过难关。现对大国间的和平不应存有希望。

卡·恩帕鲁总理：我们没有权利主动向别国提供情报。事情涉及到两个国家，不能单方面这样做。

穆·本戈：我清楚，必须着手谈判。否则莫斯科就会改变自己的决定，我们将更加难办。可能，这还不是最高要求。我们希望代表团一切要最谨慎行事。不应该浪费时间。人民担心情况会变糟糕。

亚·提尼逊：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也支持。我们希望，俄国表现出宽宏大量，让我们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参加谈判。

我不能容忍的是，我们的外事委员会给了缔结条约的全权，但是却没有明确划定相互援助的界限。我认为，我要通报一个在座各位还不知道的情况。我拥有部分从边界得到的情报，从这个情报看，缔结这个条约不是突如其来的事。在苏联的各界人士中，流传着各种关于调整芬兰和爱沙尼亚问题的意见。霍尔斯特^①的莫斯科之行相当有助于加强相互信任。当芬兰的经济代表团去俄国时，俄国答应提供芬兰想要的一切东西，并购买芬兰想出售的一切东西。俄罗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它打算让芬兰也调整自己的政治关系，这个期待甚至引起了神经过敏。俄罗斯不反对在阿兰群岛上建设工事，条件是它们须足够强大，不致落入德国手里。然而芬兰不能做出这样的保证。因此，苏联产生了不信任，担心阿兰群岛落入德国手中。俄罗斯不喜欢这种局面。它宁愿这些岛属于它，而不是德国。爱沙尼亚对德国的态度越友好，这个问题就越尖锐。俄罗斯担心，如果德国进入芬兰，而芬兰不抵抗，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对德

^① 霍尔斯特，当时的芬兰外交部长。

国友好的国家。在俄罗斯看来，芬兰的局势不过是曼纳林^①对德国没有表现出友好的感情而已。还在春天，就从法国传出信息说，德国和俄国正在进行谈判，因此，巴黎对我们和芬兰表现出担忧。我国的总司令未被人认为是亲德的。当我们知道一切情况后，我们才能够正确地确定自己的路线。我们不能陷入恐慌并因此而签订条约。苏联的举止深不可测。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同意它向我们要求的一切东西。苏俄现在谋求的是对它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东西。我们要尽量在可容许的范围内去迎合它。俄国没有掠夺性的意图，但是我们应该谨慎，以便使共产主义革命不再继续扩散。在签订和平条约时，我们本来可以要求得更多——当时我们态度客气，这对现在有利。这成了条约的基础。然而，与德国的友好关系却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谈判时必须建立信任的气氛，以便在实施时没有困难。我们这里还应该讨论我们应该与其他国家建立怎样的关系的问题。这不是坏的开端。如果俄国得到安全，那么我们应该与它有忠诚的关系。据说，除了波兰外，还讨论了爱沙尼亚的局势，这一解释不能使我满意。我有一个情报说，在莫斯科与德国的谈判中，没有提及爱沙尼亚。说是斯大林在谈判中提出条约问题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是德国更需要那个条约。在决定波罗的海国家命运方面，德国现在已起不了多大作用。在战争结束时，英国才能就波罗的海国家问题确定说些什么。俄罗斯不想与英国发生冲突，这是明显的。我们也应该赢得时间，找出决定正确立场的其他可能性。我们应该避免苏联把我们与德国的友好关系归咎于我们的情况出现。这将有巨大意义。现在与俄国的协议比与德国的友谊危险要小。我们不应带着不信任去莫斯科。

^① 曼纳林，卡尔·古斯塔夫（1867～1951），苏芬战争时期的芬兰军队总司令。1944年曾出任芬兰总统。

亚·迈列尔：这个条约将把我们在军事上与俄国联系在一起。如果俄罗斯输掉战争，那么我们将处于何种境地？最好谈谈草案的事，我不相信，它会像我们手里拿的这个东西一样写得这么含糊。

第一和第二点符合条约的性质。第三点这是给予援助的方法。当然，这个草案是仓促起草的。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相信战争会很快结束。德国不会牺牲波罗的海国家。俄国想成为波罗的海的主人是清楚的。我也明白，德国和俄国间存在一条俄罗斯由于担心破坏均势而不能逾越的边界——所有这些在签订条约时都必须注意到。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我们国家真是灾难深重。我们没能预见，苏俄在既成局势下会如此迅速地做出自己的结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非常不幸的文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必须决定：或者是战争，或者是在条约中寻找出路。它无疑要分割我们的主权，从而强烈地震撼我国人民的自我意识。如果我们抵抗，结果我们会被从自己的领土上逐出——苏俄正在使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只能力图保留可能保留的东西。条约是非常苛刻的，至少草案中是如此。我们应该力图使它变得温和一些。这个条约成为对我们致命的东西。我们在莫斯科的努力究竟能取得多大效果还难以预料，但是我们应该接受条约，尽管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沉重得多。我们还应该极大地加强内部团结。要知道俄国还想要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我将尽自己的可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刚才收到塔斯社的电报，报道说，里宾特洛甫明天也到莫斯科。我希望，他的到达会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讨价还价的机会。从我们方面看，没有明确的建议，因为难以提出某些东西，然后再放弃。我们打算提及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和条约，因为它们必须得到遵守。莫洛托夫的声明相当明确，德国不能帮助我们。然而，我认为，德国在东方越强大，对我们就越好。

亚·列伊公使：亚·提尼逊的情报中关于阿兰群岛的部分是符合

事实的。然而，关于爱沙尼亚岛屿的说法，我不清楚。俄国非常担心，芬兰会保持中立还是归附德国。当时，俄国向芬兰声明，它不反对阿兰群岛的工事，如果这些工事相当强大的话。我们没有发现别人怀疑我们亲德。莫斯科没有对我们的中立产生疑问，也没有不信任我们。在签订德苏条约后，我与莫洛托夫打交道就容易多了。甚至在潜艇事件上也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

武装力量总司令伊·拉多涅尔：我们讨论了自己的局势。我们抱有希望，我祝愿谈判顺利进行。然而我担心，在谈判中还会提出新的要求。我害怕，谈判不会像我们预想的那样顺利。

会议主席阿·尤利马：作为总结，我能够确定，委员会一致同意以苏联提出的建议为基础进行谈判，并在可能的条件下签订条约。

主席的结束语没有引起与会者的反对。

会议主席阿·尤利马：没有人再想发言了。议程已经结束。我宣布会议结束。

会议于 21 时 52 分结束。

会议主席 阿·尤利马（签名）

记录秘书 普·马尔维特（签名）

№07461

布留克里梅耶尔关于爱苏谈判
致德国外交部长电

(1939年9月27日)

外交部长亲启

9月26日从塔林发出的164号电报

爱沙尼亚外交部长临去莫斯科之前请求我向德国外交部长通报如下内容：爱沙尼亚政府在强大的压力和使用武力的威胁下，被迫同意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

外交部长瑟尔特尔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将于明天（星期三）前往莫斯科。谈判的目的是制定这个条约，以便国家主权及其内部安全得到保护，不会触动与爱沙尼亚的互不侵犯条约。将提出建议，以便缔约双方在履行互助义务时，它们与第三国签订的互不侵犯协定仍然有效。力图达到：海空军基地只在互助义务生效的战争场合才提供使用，和平时期则只准备基地。俄国人起初要求把塔林作为海军基地，但是，显然对帕尔迪斯基或者是萨列马岛的一个港湾感到满意。爱沙尼亚人打算只让出岛上的飞机场。总的方向是，迎合的程度以避免使用武力，并保持与德国已有的良好关系为限。

布留克里梅耶尔^①

^① 布留克里梅耶尔，德国驻爱沙尼亚使管人员，具体职务不详。

№07462

契克纳尔蒂关于爱沙尼亚与 苏联谈判致意大利外交部电

(1939年9月27日)

现将我与外交部长谈话时他极其秘密地转达的信息补充通报如下：

1. 爱沙尼亚外长正以同意的立场与莫斯科进行磋商。爱沙尼亚政府不可能有其他行动方针。

2. 实际上没有最后通牒。苏联政府没有确定接受自己要求的准确期限。然而，莫洛托夫声称，如果爱沙尼亚政府不接受这些建议，那么，为了实现这些建议，将使用更加现实的手段。

3. 俄国的要求基本上是要爱沙尼亚在沿岸及其附近岛屿提供海军基地。

4. 苏联政府附加议定书草案的出发点是，承担尊重爱沙尼亚宪法及其社会和经济基础的义务。

5. 爱比克先生驳斥了外国报刊传播的似乎苏联方面要求控制爱沙尼亚对外贸易的谣言。

6. 爱比克先生证实，苏联的飞机昨天的确曾在爱沙尼亚的领土上空飞行。

7. 我问爱比克先生，苏联关于海军基地的要求有什么法律依据。他对我说，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已向莫洛托夫提出了反论据。莫洛托夫回答说，不排除将来苏联不加入与英国的战争。

契克纳尔蒂^①

^① 契克纳尔蒂，意大利驻爱沙尼亚使馆人员，具体职务不详。

№07463

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爱沙尼亚代表团 关于缔约谈判的记录

(1939年9月27日)

在星期三(9月27日)18时,为了继续进行关于缔结互助条约的谈判,爱沙尼亚外交部长瑟尔特尔及其随行人员——国家杜马主席乌鲁奥特斯教授和国家杜马成员皮普教授乘飞机从里加抵达莫斯科。

不久,从克里姆林宫打来电话通知,莫洛托夫请瑟尔特尔外长今天20时30分继续谈判,以免浪费时间。决定代表团全体成员,即列伊、皮普教授和乌鲁奥特斯教授一同前往,并将此通报了莫洛托夫。

在指定的时间之前,我国代表团抵达克里姆林宫,会谈地点定在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的办公室。过了几分钟,莫洛托夫接见了他们。互相介绍和寒暄以后,在长长的会议桌后面就坐。与莫洛托夫在一起的还有他的一个助手和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

就座以后,莫洛托夫马上就说:情况如何?

瑟尔特尔:爱沙尼亚政府和议会机关仔细地研究了苏联政府9月24日由您提交的关于互助条约草案中提出的要求。

授权我通报,爱沙尼亚政府原则上不反对苏联政府的此种愿望,同意在提交的草案基础上继续就此问题进行谈判,然而,他希望对草案作某些修改,明天我们就会提交经过修改的书面文件。

爱沙尼亚政府还认为,为了使谈判取得进展,谈判在平静的气

氛中进行是有益的。然而，苏联的军舰和飞机破坏爱沙尼亚领土主权妨碍了这样做，就此我已经向苏联驻塔林公使提出了抗议。

莫洛托夫：我对您所通报的我方破坏爱沙尼亚领土主权的事实一无所知。等我们查清情况，随后给您答复。

爱沙尼亚政府同意继续谈判使苏联政府感到高兴，与此有关的问题将一切正常。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有糟糕的消息。刚才苏联政府得到消息，明天将在报纸上公布，苏联的船只“冶金工人”号在纳尔瓦海湾遭到不明身份潜艇的鱼雷袭击而沉没了。相当数量的船员牺牲（莫洛托夫宣读塔斯社的电报，过了一会把它交给我国代表团）。此外，昨天在卢撒湾发现了两艘潜艇的潜望镜。这些事实使总的局面发生了较大改变，因而苏联政府不能再限于我上次提交您的那些建议了，政府委托我对它们作些补充，这就是：在目前的欧洲战争期间，爱沙尼亚应该让苏联有权在其领土的不同地点保持35000人的步兵、骑兵和空军，以防止爱沙尼亚或者苏联卷入战争，也为了维护爱沙尼亚国内的秩序。

瑟尔特尔：由于这个提议是新的，第一次提出，自然，爱沙尼亚政府不能就此愿望制订出自己的立场。然而我无须与我的政府进行商量就可以答复您，爱沙尼亚是不能接受这个提议的。因为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内容而言，这些提议中指出的手段，都意味着对爱沙尼亚的军事占领。

在任何情况下，无论爱沙尼亚政府，还是爱沙尼亚人民都不能同意这个提议。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遵循双方早先就为自己确定的界限，我们的谈判就将非常困难。

莫洛托夫：如果上次我们能马上就继续谈判的话，那么就会在原来的立场上达成协议。然而，您拖延了。而且正如您看到的，局势发生了变化，新的事件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事件证明，为了苏联的安全，必须提出比上次更多的要求。

瑟尔特尔：指责爱沙尼亚拖延是没有根据的。我在这里是本月24日。回到塔林是为了向自己的总统、政府和议会汇报。今天才9月28日，就返回来了。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更快做出答复是完全不可能的，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爱沙尼亚是议会制共和国的话。在谈判休会期间发生的不取决于我们事件，不能给苏联提出新的要求提供任何权利。

乌鲁奥特斯：我作为国家杜马主席，可以强调，把爱沙尼亚议会召集起来，听取政府的报告，并对苏联的提议制订共同的立场，这个时间是极其短促的，这足以说明，议会对此问题非常重视，认为必须迅速对产生的局面进行调整。所以借口爱沙尼亚政府拖延和产生了新情况而提出新要求是不正确的。我支持外长瑟尔特尔阐述的观点，并且表示担心，如果苏联政府坚持自己的新提议，那么，就很难找到谈判的基础。

莫洛托夫：苏联政府坚持这个提议。如果愿意的话，斯大林会向您证实和解释清楚这个提议。您愿意跟他谈吗？

瑟尔特尔：我愿意。

莫洛托夫：（打电话）斯大林同志，请来一下，瑟尔特尔先生和爱沙尼亚其他先生在我这里。他们反对我们的新提议，并用“占领”和其他一些可怕的字眼称呼它。请帮助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提议是必要的。

过了几分钟，斯大林出现在会议上。莫洛托夫向他介绍了爱沙尼亚代表团的成员和列伊公使，此后会议继续进行。

瑟尔特尔：对斯大林重复了莫洛托夫的提议和自己的反对意见，并补充说，由于“冶金工人”号是在芬兰湾被鱼雷击中的，而不是在爱沙尼亚的领海中，所以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指责爱沙尼亚政府，并且从塔林逃跑的潜艇是朝另外的方向开的，途中在戈特兰岛释放了逃跑时用武力挟持的爱沙尼亚两名水兵。所以，鱼雷也就不

是这艘潜艇发射的。

从上述所有事实可以得出结论，莫洛托夫先生的新建议没有任何根据。正如我指出的那样，实际上意味着对爱沙尼亚的占领，爱沙尼亚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同意。

莫洛托夫：最近的事态表明，苏联缺乏某种安全。应该认为，在芬兰湾有外国潜艇能够停泊和补充燃料的地方。在海上，在列宁格勒门口，苏联的船只被鱼雷击中和沉没，苏联海员被淹死。可能，从塔林逃跑的潜艇没有参与攻击，可能在波罗的海还有某个第三国的潜艇，比如说英国的潜艇，然而，事实是，苏联缺乏海上安全，而爱沙尼亚又无力独自保证这种安全。如果苏联有军队在爱沙尼亚，那么可以相信，谁也不敢进行类似的攻击。

瑟尔特尔：即使推断您所引证的事实是正确的——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那么也不能证明爱沙尼亚在最近的事件中有过错。而没有过错就不能惩罚爱沙尼亚。

米高扬：苏联的提议不是惩罚。

瑟尔特尔：你们的新提议意味着军事占领，因为在爱沙尼亚的领土上有 35000 名外国军队。这些外国军队部署在“不同地方”，保卫爱沙尼亚的内部秩序，即管理爱沙尼亚的内部事务。于是，一切关于保持爱沙尼亚主权及其国体和经济体制的保证成了一纸空文。根据类似理由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的军事占领，不能认为是别的，只能认为是惩罚，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惩罚是毫无根据的和不公正的。莫洛托夫先生指出，“显然，外国潜艇在芬兰湾加了油”，这些不过是一种推测，而且是一种没有被证实的推测。现代潜艇可以在船上储备供 6 个星期航行所需要的燃料。而从战争开始，仅过了 4 个星期。

乌鲁奥特斯：的确，从法律观点看，莫洛托夫先生的提议就意味着军事占领，这是爱沙尼亚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爱沙尼亚政府能

够向议会通报前一个提议，我还可以证明，议会以极快的速度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苏联政府应该考虑到，爱沙尼亚是议会制国家，所以，没有议会，政府不能对类似的事情做出决定。爱沙尼亚议会认为，我们可以在苏联政府 3 天前提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新提议改变了事情的面貌，我们没有继续谈判的法律基础。

斯大林：我们的新提议不是惩罚。这是保卫手段。我们不知道是谁帮助波兰的潜艇从塔林逃跑的。无论如何，过错不在我们。我们也相信，爱沙尼亚政府没有过错。但是，显然在爱沙尼亚窝藏着从事类似活动的国际势力。他们对人民群众也有影响。你们与我们签订条约，但是单有一个条约是不够的。别人会说，他们出卖了我们的国家。会产生内讧和破坏活动。为此，必须在爱沙尼亚部署红军强大的兵团。那就谁也不敢采取类似的行动了。

瑟尔特尔：斯大林先生，您直爽地说，您不相信似乎爱沙尼亚在波兰潜艇逃跑事件上有过错，我们极其满意地接受您这个重要的论断。但是，您推测，某种国际势力可能获得您担心的这种影响，我却不能同意。

皮普：爱沙尼亚人民无疑会满意地接受与苏联的互助条约，所以，没有必要害怕某种破坏活动。

斯大林：各地的人民都是好的。但是在人民中也有不好的人，他们从事人民不知道的活动，他们追求的目标会给人民带来损害。前几天，在奥德萨附近，发生了军用列车被颠覆的事件。但是，你们看看，是谁组织了这次颠覆事件。有人把数千名间谍经过爱沙尼亚派到苏联，我们都抓到了，遗憾的是，其中许多被枪毙了。

瑟尔特尔：我们希望，条约将不伤害爱沙尼亚人民的感情，人民能够满意地接受它。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担心某种破坏秩序的事件。

斯大林：芬兰湾目前的局面是强加给苏联人民的，他们一直容

忍到现在。

皮普：我也参加了爱沙尼亚与苏联的和平条约的准备工作，这是个保证“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条约。

列伊：在爱沙尼亚从来没有人认为，和约是强加给苏联的。相信这个和约符合苏联的切身利益。如果现在这种关系的基础被以此种损害爱沙尼亚的方式而改变，那么现在的良好关系就会遭到损害，对苏联也没有好处。爱沙尼亚人民的友好感情就要打折扣。

斯大林：红军根据今天提出的建议进入爱沙尼亚是绝对必要的，我向您保证，不包括这个内容就不可能签订条约，我们会被迫寻找其他措施，来加强苏联的安全，这是必要的。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你们考虑一下，这只是战时措施。战争过去以后，我们就撤走今天提议中的部队。

瑟尔特尔：我们理解，您是希望在海上基地部署不大的卫戍部队，他们的任务是从海上保卫基地。这些卫戍部队应该符合保护基地上的工事和其他设施的要求，也符合爱沙尼亚人民及其军队的数量。现在还没有为基地选择好地方，而且在这些地点除爱沙尼亚的领土外，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保卫，而保卫这些领土用不着这么多的人。你们先前的建议规定的是发生军事进攻，而且是爱沙尼亚领土遭到侵犯的情况下的军事合作。在缔结了条约的情况下，即使从苏联需求的角度看，领土的保卫也得到了足够程度的保证。如果基地建立起来，不必担心它会遭到任何从陆地上的进攻。爱沙尼亚政府也在用自己的力量相当警惕地关注着这件事。鉴于所有这些原因，除非发生了侵略的情况，否则只能谈判基地的卫戍部队，而且这些卫戍部队的规模也要在协定中规定下来。此外，必须对这些卫戍部队的规模应该是目前欧洲战争时期的规模单独做出规定。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继续谈判。

斯大林：同意根据您刚才阐述的立场，对我们的提议做出修

改。

莫洛托夫简短地总结了瑟尔特尔和斯大林的立场。

瑟尔特尔：如果在现在战争条件下谈海军基地守备力量的数量，那么，35000人太多了。这样数量的军队不合理，而且负担太重，只会造成困难和误解。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数量。

斯大林：我不认为这个数量还可以减少。爱沙尼亚自己有15万军人，所以，25000名红军，这是最低数目。

瑟尔特尔：甚至在解放战争时期，爱沙尼亚也没有15万名军人，而是少得多。现在，当军队没有动员起来时，根本没有15万人。

斯大林：你们要动员起来反对我们？

瑟尔特尔：不是。我们不认为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是应该动员的关系。

列伊：我可以证明这一点。

斯大林：你们军队有多少人？

瑟尔特尔：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无论如何35,000外国士兵相对来说太多了。

斯大林：好。这个数量减少到25000人。

瑟尔特尔：这也太多。

斯大林：这是最低数量。

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陷入了死胡同，建议与共和国政府联系，为此他们建议我们直接从克里姆林宫打电话。我国代表团拒绝了 this 好意，然而，希望尽快地提供使馆与塔林的电话联系。莫洛托夫答应满足这个要求，并立即进行了电话联系。

会议于22时结束。下次会议定于星期四16时举行。

№07464

爱沙尼亚驻苏使馆关于爱苏谈判进程

致外交部电

(1939年9月27日)

以“冶金工人”号被鱼雷击中和我们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中立为借口，对我们提出了新要求，以使苏联有权在爱沙尼亚拥有基地，并为保持内部秩序驻扎25000人。斯大林对这件事稍缓和，补充说明这个要求真正只适用于欧洲战争时期，军队将驻扎在基地并用于保卫基地。我们将坚持，减少军人数量，只限于卫戍部队。要求星期四达成协议。非常难受，但是（次日）16时的谈判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使馆。

№07465

爱沙尼亚代表团关于修订条约文本的 会议讨论记录

(1939年9月27~28日)

22时回到使馆后，外交部长请求代表团成员不要解散，不休息就着手工作。尽管下次会议定于明天16时举行，但是不排除克里姆林宫要求提前开始会议的可能性，以前就有过这样的先例。如果我们想在会议上发言时能准确阐述我们的立场，就应该马上着手工作，以在天亮前作好准备。大家对这个提议没有异议。

在讨论中，代表团成员提出了问题，并通过了决议，这些决议以后还要提到。大家一致同意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和做出的决议。谁也没有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提出特别的看法。

首先注意到，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以前提出的草案基础上与苏联政府谈判并签订条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苏联政府的新要求是否已经使局势改变到我们应该中断谈判并返回国内的程度。代表团确认：

1. 苏联代表——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无疑表明，苏联打算坚决达到实现它签订条约所追求的目的。所以，参加谈判的代表团成员得出的总的印象是，尽管在爱沙尼亚看来，它的反建议已到最低限度，但爱沙尼亚很少有机会中止谈判或坚持自己的反建议，而不必害怕苏联把莫洛托夫和斯大林的警告变为现实。

2.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最终同意了瑟尔特尔的立场，即驻军只能是基地的卫戍部队，而不是他们起初要求的驻扎在全国。

3.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意了瑟尔特尔的立场，这些卫戍部队的任务无论如何不是“维持爱沙尼亚的国内秩序”，而是“保卫基地的外部安全”。

4. 第一和第二点范围内的卫戍部队问题，即使根据苏联政府的前一个建议，也会在明确条约或实施条约时产生。因为，苏联的第一个草案规定，“爱沙尼亚保证苏联在爱沙尼亚港口拥有基地的权利”。显然，在基地上不仅有武器和其他物质装备，而且还有士兵，那么，根据莫洛托夫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已经应该出现人员数量的问题。因此，代表团包括瑟尔特尔认为，局势没有变化到主动提出回国或向政府请求回国的地步。但是，考虑到卫戍部队数量，以及新提议的其他条件，即使采取缓和的形式，这个新建议也仍然意味着局势相当地恶化了，如不是极其必要，不能进一步讨论。只有政府能对此做出决定。所以，根据瑟尔特尔的提议，决定向共和国政府通报新要求并请求指示。

根据瑟尔特尔的建议决定，如果在谈判中苏联坚持要求在爱沙尼亚全境部署自己的军队，并且其目的是保卫爱沙尼亚的内部秩序，那么谈判应该中断。

瑟尔特尔通过电话与塔林举行了联系。他被告知，苏联飞机在爱沙尼亚领空的飞行更加频繁了，但没有向它们开火。瑟尔特尔也通报了自己的情况，说正对新建议进行争论，对此内容将发出密码电报。他还要求政府给以指示。为了节省时间，代表团正在着手技术性工作，即制定自己的立场，以便当政府不希望中断谈判时使用。

关于前言

瑟尔特尔提出了外交部起草的条约的前言部分。它受到一致赞同。

关于第一条

在讨论第一条时，代表团首先确定，共和国政府和国会外事和国防委员会准备按照苏联的要求签订互助条约。对本条中提出的互助问题、援助规模及援助对爱沙尼亚地位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结果，代表团得出结论，互助条约正是莫洛托夫首先关注的问题。如果这个条约一签订，基地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在某种程度上的盟国之间，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即使能够回避互助条约（尽管这没有现实的前景），而同意提供基地，那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由于必须解决在没有条约的条件下建立基地也会或迟或早必然产生的问题，对这种事情发展所设想优势就会减少。在爱沙尼亚建立了基地，苏联就会关心它们的防卫。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如果强大的敌人侵入爱沙尼亚，进攻苏联的基地，我们不能给予可靠的回击。在苏联与第三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爱沙尼亚的中立会保护它免遭侵犯，即此种“有基地的中立”得到承认，这种情况即使有可能，也令人怀疑。因此，可以推测，一旦爆发战争，苏联必然在战术和战役上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基地与它的主力联系起来。为了这种联合，它很可能需要爱沙尼亚的领土；换句话说，苏联会向爱沙尼亚要求让自己的军队过境，从而即使没有条约也把我们卷入战争。这种前景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会恶化与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关系，损害爱沙尼亚的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明确地想达成互助条约。与条约一起还要求基地。显然，没有条约的基地是无从谈起的。所有这些情况在估价这个条款的重要性时必须考虑到。产生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原则上同意签订互助条约，尽管我们也知道，它将给我们带来坏处和危险。代表团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原则上同意苏联提出的关于互助条约的要求，同时同意第一条，这是必然的。

瑟尔特尔在讨论第一条时确定，对于目前谈判的结果，显然，我们取得了苏方同意援助的义务只限于以下情况：（1）爱沙尼亚遭

到外来进攻；(2) 前款所指行动是直接或经拉脱维亚采取的；(3) 直接经过拉脱维亚或者经过其波罗的海沿岸（准确地说，是芬兰湾）对苏联采取的行动；以及(4) 进攻苏联在爱沙尼亚的基地。单独指出基地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指明基地的国际地位，因为一方面基地是爱沙尼亚领土，同时进攻它们也意味着直接进攻苏联，在此情况下，就产生了要求援助的权利。

针对乌鲁奥特斯的问题，瑟尔特尔解释了爱沙尼亚政府的立场，即给以援助不应该是自动的。只有根据遭受侵略一方的要求才可以给予援助。代表团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这些理由，第一条是可以接受的。

根据这一决议，瑟尔特尔修订了第一条的文字。再次进行讨论后，瑟尔特尔委托皮普最终校订了这个材料。

瑟尔特尔：文字中应该补充侵略的一方应该是大国。这样我们就可排除芬兰与苏联冲突的可能性。不明身分的潜艇对苏联舰艇的攻击也不应把我国卷入战争。我们也不应该介入波兰与苏联的战争。

列伊、乌鲁奥特斯和皮普都同意这个意见。据此对文字作了补充。

关于第二条

瑟尔特尔：从苏联的提议中应该排除给予经济和外交援助的句子。涉及到苏联按照优惠价出卖军械的部分可以保留在文本中，因为从策略方面考虑，不要因取消它而引起怀疑，似乎爱沙尼亚对苏联的建议不感兴趣，还想像从前一样从其他国家得到武器。

乌鲁奥特斯、皮普和列伊同意这个立场。据此共同修订了第二条。

关于第三条

瑟尔特尔：在苏联的第一个建议中提到“在爱沙尼亚各港湾的

海军基地”和“在各岛上的空军机场”。我们力求使海军基地仅限于岛上，正如苏联建议中的飞机场一样。此外，不是说每个岛都可作为基地，而只是萨列马和赫乌马岛。基地和飞机场的地点应当确定，其边界应该在协定中指明。

乌鲁奥特斯、皮普和列伊：同意这个提议。大家共同修订了第三条的第一段。

乌鲁奥特斯：希望在这条中指出，基地和飞机场的土地应该是租赁的。

瑟尔特尔、皮普和列伊：同意这个建议。皮普以相应的文字对第三条作了修订。

瑟尔特尔：关于苏联政府有权在基地和飞机场的领土上部署严格限定数量的卫戍部队的宣言性说法——如果政府同意这个宣言的话——放在这一条最适合。必须补充，双方应该协商卫戍部队的最大数量。因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绝对会坚持在这场战争期间大批卫戍部队进驻，所以，当得到政府继续谈判的指示后，必然会涉及到卫戍部队总人数问题。因此，将产生以下问题：（1）在目前的谈判中，我们能否仅限于第三条文本中的宣言性说法，而关于卫戍部队的规模在稍后实施条约的过程中签订协议？

在相互交流意见时得出一致结论，考虑到苏联代表的坚决态度，这未必能实现。还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不把卫戍部队的人数固定下来，这可能会给爱沙尼亚带来损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会被今天的修订（以 25000 人代替 35000 人）所限制，甚至不是起初的 35000 人，而会要求进驻得更多。于是通过决定，如果政府想签订条约，那么应该就卫戍部队的规模达成协议。

（2）是否应该把卫戍部队的规模与爱沙尼亚部队的总人数联系起来？

在讨论中形成的立场是，这不合适，因为坚持类似的观点，我

们就会把自己军队人数的控制权交给苏联。准确地确定苏联军队卫戍部队总人数的优点是，爱沙尼亚军队的人数不受任何前提限制，也不必向任何人报告。

(3) 如果苏联政府坚持在欧洲战争期间要在爱沙尼亚基地部署较大数量的卫戍部队不让步，而爱沙尼亚政府也同意的话，那么，在谈判中应否提出，目前的欧战结束后卫戍部队应有多少人的问题？

在交换意见时得出结论，这不合适。谈论这个问题会引起对那些爱沙尼亚解决起来较容易和较有利的问题的争论——如果将来出现这些问题的话，而现在的时机对谈判不利。

瑟尔特尔：共和国政府的意见是，在条约中应该指出真实的意思，划拨给基地和飞机场的土地，今后仍旧是爱沙尼亚的领土。

乌鲁奥特斯、皮普和列伊：同意这个意见，准备作相应的修订。

关于第四条

瑟尔特尔：苏联关于禁止加入协定和联盟的提议不明确。应该是禁止加入旨在反对另一方的集团或联盟。

列伊、乌鲁特斯和皮普：同意这些意见，准备作相应的修订。

关于第五条

瑟尔特尔：我们从苏联得到的附加议定书中包含的关于不干涉缔约国内部事务的宣言，应该挪到条约的正文中。无论如何，应该对这个宣言做出以下修改：

(1) “条约不触及对方的国家权利”这句话应该用以下方式阐述：“条约的执行不应该触及上述各项权利”。苏方草案的文字不过是本条约不具独立意义的法律定义。而对我们来说，则必须使双方在根据条约产生的权利和义务行事时，不得给对方的上述利益造成损害。这是执行本条约的总方针，这在解释条约的条款时会是有益

的。

根据这一点，每个伙伴对所有讨论的问题都有权独自做出决定。

(2) 应该表达出一个意思，就是执行条约一般不应该触及缔约国的主权。其中必须单独提出某些方面，即国家体制和经济制度。这包含了那些具有极大意义的主权方面的内容。

列伊、乌鲁特斯和皮普：同意这些观点。在交换意见时，大家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单独把“社会体制”作为“经济体制”的一个表现提出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文本中提及国家体制的某些特点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样列举特点就会使文本中没有提及的特点置于被怀疑的地位。

关于附加议定书

瑟尔特尔：在附加议定书的第一条中，似乎可以包括基地卫戍部队规模的协定。

列伊、皮普和乌鲁奥特斯：支持这个建议。

乌鲁奥特斯：在附加议定书中应该进一步规定，在实施条约中产生的一切争论，以及对实施条约进行的监督，应该由按照对等原则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来解决。这就意味着，在审核与这个条约有关的问题时，这样的调整不会触及爱沙尼亚—苏联互不侵犯条约调解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后者是更高级别的委员会。

瑟尔特尔、列伊和乌鲁奥特斯：同意这个建议，并形成相应的文字。

4时，条约草案的文本起草完毕。中间收到了共和国政府的指示，命令继续谈判，做出一切努力，缓和苏联的新提议（军队进入），然而协议还得签订。

№07466

威利关于苏联船只被击沉事 致美国国务卿电

(1939 年 9 月 28 日)

刚才曾与代理外交部长^①会晤。据他说，苏联的要求还包括部署卫戍部队。在莫斯科的第一次会晤定于今天 12 时进行。爱沙尼亚没有采取任何军事措施。武装力量指挥部得到命令，避免任何能够引起事故的行动。

他没有关于在芬兰湾某艘船被鱼雷击中的证据。我在 9 月 27 日晚上 10 时发出的第 63 号电中提到的那艘船，最初是昨天凌晨被发现的，停泊在距离纳尔瓦相当远的地方。下午 3 时，苏联的三艘小军舰向其靠近。所有上述船舶在天黑前都可看到，既没有任何爆炸迹象，也没有听到爆炸声。新闻局长补充说，芬兰和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报道引起对苏联声明的更大怀疑。爱沙尼亚政府研究了正式辟谣的问题，但由于局势极其危险，没敢这么做。他希望，在美国报刊上以某种方式公布事情的真相。

威利^②

① 指爱沙尼亚副外长奥·爱比克，他在瑟尔特尔赴苏谈判期间代理外交部长。

② 美国驻爱沙尼亚公使。

№07467

爱沙尼亚外交部关于签订条约
致驻莫斯科代表团电
(1939年9月28日)

签订条约，做出一切努力，以缓和（条件），全权证书已寄去。

№07468

斯大林、莫洛托夫与爱沙尼亚代表团

关于签约的谈判

(1939年9月28日)

1939年9月28日10时，克里姆林宫通知，原定于16时的会议提前到同日的13时。还是原班人马参加了这第四次会议。谈判进展如下：

瑟尔特尔：我们自己方面准备了条约文本的草案。阐述条文前我预先做个声明，我们稍后准备对其作必要和有益的修改。我们迄今没有得到爱沙尼亚政府对贵方要求的指示，所以，在弄清我国政府的立场之前，我们保留回到这些原则问题的权利，以及在必要时认为这个草案是无效的权利。提交的草案如下：

前言部分（瑟尔特尔宣读）。没有异议。

第一条（瑟尔特尔宣读）。斯大林指出：比前一个文本明确多了，然而不能自动实施援助，只能根据另一方的要求进行，这里不合适，必须把它删掉。

瑟尔特尔：这个补充是我们根据上次谈判的结果修改的。我们认为明确真实的意思极其重要，援助的义务不应该是自动的，因为，比如，进攻苏联的是像第一条中指出的某个大国，如果合适的话，爱沙尼亚就会保持中立。

我不排除在这种情况下爱沙尼亚中立甚至对苏联有很大好处的可能性，因为这会缓和波罗的海、芬兰湾和通向列宁格勒道路上的紧张局势。

斯大林：完全正确。爱沙尼亚在这种情况下的中立对苏联有好处。但还是在条约的另外地方表达这种思想比较合适。

在乌鲁奥特斯、莫洛托夫、列伊、皮普和米高扬就此问题发言后，决定从第一条文字中删除这个补充，把类似内容以更加展开的形式作为附加议定书中的新的第三条。

第二条（瑟尔特尔宣读）。没有异议。

第三条（瑟尔特尔宣读）。

斯大林：这样不行。我们不能同意仅在萨列马和赫乌马有基地。我们需要塔林。

瑟尔特尔：我们不能提供塔林。当一个国家的首都变成外国的军事基地时，就不能保持它的主权了。

斯大林：不会这么糟吧，可以在塔林划出某些地区么。

瑟尔特尔：这种局面是不能忍受的。应该认为，基地应该有明确的军事完整性，这种完整性与我国首都地位相联系的国家职能不相符合。划出地区是不够的，因为苏联的军事舰队很庞大，划定的某个地区根本容纳不下它。无论如何，它常驻塔林，会破坏塔林作为首都所必须具有的国家独立自主的形象。我们不能同意在塔林建立基地。

列伊、乌鲁奥特斯和皮普也在自己的发言中引证了一系列反对外国在塔林占有海军基地的理由。列伊和乌鲁奥特斯指出，塔林作为大贸易港口，不适宜作海军基地，而皮普则指出，苏联海员在塔林的出入会破坏社会秩序。

斯大林：不能没有塔林。我不讳言，会有某些困难，但是我们可以克服，在萨列马和赫乌马岛一无所有。那里还得修建。这要花较长时间。在大陆上必须有现成的港湾。惟一的就是你们的塔林。

瑟尔特尔：我们不能提供塔林作基地。当我上次在这里的时候，莫洛托夫先生说过，塔林不是非要不可。

列伊：我清楚地记得，莫洛托夫先生说，不需要把塔林作为基地。

莫洛托夫：我是说过，如果在大陆上找到另一个合适的港湾，那么不要塔林也行。然而当时也说得非常坚定，如果在爱沙尼亚大陆北部沿岸没有海军基地，苏联的安全体系在目前条件下是不可想象的，当时我对皮亚尔努和帕尔迪斯基感兴趣。

斯大林：我们的军人对我说，帕尔迪斯基的设施不健全，现在不太适合作基地，将来可以成为基地。

乌鲁奥特斯和皮普讲述了帕尔迪斯基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及现状。

斯大林：帕尔迪斯基这是将来的事。我们现在需要海军港口。

瑟尔特尔：帕尔迪斯基与塔林一样，拥有一切必要的设施。作为海港，塔林与帕尔迪斯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提供塔林作基地。这是我们的强硬立场。

斯大林：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有个条件，在帕尔迪斯基港没有准备好之前，我们能够去塔林采购食品、燃料，作为临时停泊在塔林的锚地和港湾，划给我们一个码头。在你们塔林有个所谓的新港。那里会有地方。这个权利仅限于短期，但是不这样不行。这是我们的最终意见。

瑟尔特尔：我努力在下次会议前确定我们的立场。

斯大林：我们对第三条补充一句话，作为基地的土地按照优惠价租赁。

瑟尔特尔：这是多余的。

斯大林：第二条中也有“按照优惠价格”这句话。

瑟尔特尔：我们也可以删除那句话。

斯大林：第二条已经通过。所以这里是需要的。如果您愿意，那么加上“按协议价格”这样的话。否则，通过租赁，你们会剥我

们一层皮。

瑟尔特尔：同意。价格应当是合适的。我怀疑，你们会因租赁费用多少就建不成基地。

瑟尔特尔宣读以下的条款。没有引起异议和反对。当读到不允许加入旨在反对另一国的联盟的条款时，他声明，迄今已经达成的协议不属此列，特别是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联盟条约，不管条约的结局如何，它都要保留。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我们不反对这样。这个条约不触动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同盟条约。这个条约可以保留。因为本条约的这段文字说的是未来的条约，没有必要特别提到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条约。

附加议定书的第一条引起了争议。

瑟尔特尔：我国政府不同意贵方 25000 士兵进入。它认为这个数目太大。我认为，甚至在战争时期，5000 人就足够了。

斯大林：25000 人不是多而是少了。我们的军人责备我不该把 35000 人减少到 25000 人，但是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35000 人是最高数字，25000 人则是某种兵团编制人员的最低数字，也与基地应执行的任务相适应。

瑟尔特尔：军人总是嫌军队不够，25000 人也太多了。如果需要的话，我国的军队会保卫基地。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谁也不会碰这些基地。如果你们的军队进入太多，就会减弱爱沙尼亚人民和军队对祖国防务的关心，你们的行动是不明智的。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可以履行自己的任务，因为只有爱沙尼亚军队友好和善意地参与军事行动才可以保证防卫的成功。

斯大林：我们高度评价爱沙尼亚武装力量的道德状况和两国军队间的合作精神，然而，25000 人这是一支独立兵团最起码的编制。此外，建议中说的也是要达到 25000 人。

米高扬：一个师 17000~18000 人。还应该加上各种专门的机关和为组织独立兵团所必需的部队。

瑟尔特尔：所以，15000 人是最大的数目了。

斯大林找出自己昨天的文本说：这个文本应该是合适的。在这个文本中，可以删除列举的军队分队的种类，添上我这里用铅笔修改的东西。

说明：斯大林的主要意思是在爱沙尼亚的全境部署苏联军队，并且这支军队要保卫爱沙尼亚的内部秩序，这就是说，这是一支占领军。

瑟尔特尔：现在作为基础的是我们新起草的文本。

莫洛托夫：是的，你们的文本较好，可以作为基础。

斯大林：（经过不长时间的沉默后）军队不应该太少，——要不你们会包围和消灭他们。

瑟尔特尔：这是侮辱。我们签订同盟条约，而您这样说，好像我们是最凶恶的敌人，应该时刻相互提防对方的攻击。

斯大林：我不打算侮辱您。然而每个军事部署都有自己合理的最低限度，不能低于这个限度。我们不想给你们带来多余的困难，我们自己建设军营，我们为此有合理而简便的方案。我们还靠自己的力量建设通讯所必需的道路。不要害怕，这个数目不算太大。可能还有点少。这个问题重要的是原则。如果允许外国军队的一个团进入自己的领土，那么从原则上讲，人数多一点并不重要。

瑟尔特尔：当然，破坏原则是最重要的，但是也不应该否认，一个团或者十个团的问题同样有其意义。我不能改变立场。我想再与我的政府商量一下。请想一下，为这些军队提供食品和住房方面会产生多大的困难。由此也会产生相互不满和不愉快。

会议于 15 时结束。下次会议定于 21 时进行。在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们在休息室遇到了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和高斯、舒伦堡及

其他人。瑟尔特尔与里宾特洛甫、高斯握手，列伊与舒伦堡握手。

回到使团，代表团继续交换意见。

从共和国政府的指示中得知，政府认为签订协定是十分必要的。

代表团确认，没有理由终止谈判。应当进行到底并达成协定。代表团得出结论，没有理由拖延谈判，因为这段时间局势未必会改善。代表团也指出，尽管谈判的调子是友好的，苏联代表表现的很固执，而且他们的话中含有威胁和警告——如果拒绝签订条约，等待爱沙尼亚的会是什么样的危险。代表团得出结论，苏联在有争议问题上的愿望是非常僵硬的。但是，代表团从历史赋予它的对爱沙尼亚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出发，不能有其他行动，只能继续谈判，尽一切可能，降低条件，最后达成协议。从而完成政府的训令及对人民所负的责任。否则，国家将面临的不仅是战争，而且是被占领，甚至是部分毁灭的威胁。

代表团成员意识到，他们不能进行类似的冒险，只能牺牲民族的自豪感和使过去斗争得来的独立受到某种限制。保存人民应该是政府的最高目标。被消灭或被摧毁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现在说哈赫^①或莫西齐茨基^②两人中谁会被历史宣判无罪还为时尚早。

考虑到这一切，代表团决定讨论有争议的问题，一致得出如下结论：

1. 坚持不在塔林设基地，建议用帕尔迪斯基取代塔林。由于一开始帕尔迪斯基没有必要的条件，同意苏联舰队进入塔林补充食品储备，补充燃料和临时停泊。这个权利应限制在短时期内。

① 埃米尔·哈赫，1939~1945年任德国法西斯在捷克建立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总统。1945年作为战犯被捕，死于狱中。

② 莫西齐茨基，1926~1939年任波兰总统。

2. 坚持减少进驻的军队人数，如果不行的话，就同意 25000 人。

3. 第一条指出的对塔林的意见，如同第二条中提及的卫戍部队人数一样，都包括进附加议定书中。其中还应该写上排除自动给予援助和缔约国一方在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有权保持中立权的议题。

起草并再次校对了相应的文本。

同日 21 时，在克里姆林宫与苏联代表团开始谈判。除斯大林缺席片刻外，人员照旧。

瑟尔特尔：我们对文本作了修改。建议从头宣读文本。

莫洛托夫：同意这个程序的建议。

瑟尔特尔宣读前言。

莫洛托夫：同意。

瑟尔特尔宣读第一条。

莫洛托夫：为什么要进攻的一方是“大国”的情况下给予援助的义务才生效？当进攻一方是任何欧洲国家的情况下，这个义务都应该生效。

瑟尔特尔：在白天的会议上同意指出是大国。

莫洛托夫：我没有注意到。

瑟尔特尔：斯大林当时也在场。

莫洛托夫：侵略者也不一定是大国。我们删除“大”这个词。这时斯大林进来了，他加入了谈话。

瑟尔特尔：我不能同意这个意见。例如，如果说瑞典进攻苏联，这需要我们的援助吗？

莫洛托夫：不需要。但是它可能进攻你们。

瑟尔特尔：我们自己能对付瑞典。对此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

莫洛托夫：这是什么话！斯大林，请帮助我。你有什么意见？

斯大林：就留下“大国”一词吧。

瑟尔特尔宣读第二和第三条。

斯大林：在第三条中没提塔林，这不合适。

瑟尔特尔：不能把塔林作为基地。

斯大林：我们充其量能同意，这个基地在帕尔迪斯基，同时我们有权临时使用塔林作为停泊点并补充储备。

代表团成员商量后，一致决定同意。瑟尔特尔在此声明，代表团是被迫接受这个建议的。在第三条中添上“在帕尔迪斯基市地区”的词句，因为苏方同意临时使用塔林可在附加议定书中提及。

关于条约生效的段落也引起了长时间争论。

莫洛托夫：一经签署，条约就应该生效。

瑟尔特尔：根据爱沙尼亚宪法，这不可能：在批准之前，条约不能生效。否则，我不能同意。

莫洛托夫：怎么里宾特洛甫能呢？难道你们的宪法与其他国家的不一样？

瑟尔特尔：我明确地知道，爱沙尼亚的宪法不允许我接受您的措辞。

经过长时间争论，瑟尔特尔、莫洛托夫、斯大林、乌鲁奥特斯、列伊和米高扬多次发言，苏联代表做出让步。

斯大林：好，条约3天后生效。

瑟尔特尔：过10天吧。3天期限太短了。

斯大林：过4天生效。

瑟尔特尔：少于10天来不及。

斯大林：那就5天吧。

瑟尔特尔：今天是星期四。明天我回国。星期六我汇报谈判的结果。中间是星期日。我想与妻子和儿子在塔林之外，在里加或塔

尔图度过。今天我已经打电话让他们从塔林到里加，以便会面，得到家庭式的休息，消除在莫斯科的疲劳。我认为，我的同事也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在塔林只剩下2天的时间让议会开会批准条约。这不够。

斯大林：您的儿子几岁？

瑟尔特尔：不到4岁。

斯大林：为了您的妻子和儿子，我们再加上一天。那么就6天吧。

爱沙尼亚代表团同意了。

条约文本的其他部分没有引起争论。

在讨论附加议定书第一条时，关于进驻军队首都人数又产生了争论。

瑟尔特尔：我们坚持最多10000人的数字。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我们认为最多数字是25000人，它是保证苏联安全绝对必需的。无论如何，我们要保证苏联的安全。这些措施也包括人数为25000人的卫戍部队。不要迫使我们寻找其他可能性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不要害怕我们的卫戍部队。我们向您保证，苏联不打算触动爱沙尼亚的主权，也打算不触动它的国家和经济体制，它的内部生活和对外政策。我们不想像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所以，苏联军队将避免一切不符合这些承诺的事情。保持你们自己的军队所需要的人数好了。此外，本条中规定的措施是临时的，即只有当欧洲进行战争时才有效。

代表团当场举行了会议，决定一致同意25000人（最高限额）。

瑟尔特尔：尽管我们坚持认为，这个数字太大和不合理，但是我们准备接受这个提议。

在讨论附加议定书的第二条时，就以下内容产生了争论：

斯大林：草稿中包含的意思是，我们的舰艇可以进入塔林“临

时停泊”。因为在这条的开头已经说，“临时停泊，直到帕尔迪斯基准备好”。那么，下面就没有必要说“临时停泊”了。此外，这会造成混乱。

经过瑟尔特尔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之间不长时间的争论后，代表团协商决定同意，从文本中删除“临时”这个词。

瑟尔特尔：同意删除掉“临时”这个词。根据这个条款，你们的舰队可以进入塔林的时间应该限定为一年。

斯大林：一年太少。三年吧。

经过协商，这个期限规定为“至多二年”。

附加议定书的其他部分没有引起争论。

谈判结束时，莫洛托夫把协议和附加议定书文本转交打印。

斯大林此时面向瑟尔特尔，继续说：协议已经达成。我可以告诉您，与苏联签订条约说明，爱沙尼亚政府行事是明智的，与苏联缔结协议有利于爱沙尼亚人民。否则，你们会得到波兰的下场。波兰是大国。现在波兰在哪里？现在莫西齐茨基、雷德-斯米格^①和贝克^②在哪里？我公开向您保证，您做得很好，有利于自己的人民。

瑟尔特尔：我的政府，我个人和我的同事也持同样的观点。我对您还有一件事情。最近，贵方的飞机经常破坏爱沙尼亚的国境，在我们的领空飞来飞去。我们至今没有向它射击。我曾向贵国公使和莫洛托夫先生提出过抗议。在目前谈判期间，这种破坏行为特别不合适。我们知道，你们的飞机比在爱沙尼亚领空飞来飞去的还要多。我们也知道苏联的国力。为什么你们要显示力量呢？

斯大林：这是些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飞行员。但是我们会制止这

① 雷德-斯米格，波兰被灭亡前任武装力量总司令。

② 约瑟夫·贝克，波兰被灭亡前任外交部长。

些行为。这种情况不会再出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随后邀请所有出席者共进晚餐。

在晚餐时，根据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提议，举杯为皮亚特斯总统、瑟尔特尔外交部长和拉多涅尔将军的健康干杯。瑟尔特尔建议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健康干杯。

协定于 24 时签订。

会晤持续到午夜 1 时。

卡·瑟尔特尔（签名）

No 07469

爱沙尼亚与苏联贸易周转额协定

(1939年9月28日)

为加强和进一步改善爱沙尼亚与苏联的经济关系，发展 1929 年 5 月 17 日爱沙尼亚和苏联签订的贸易条约的决议，爱沙尼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和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阿·米高扬签订了以下协定：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大幅度增加相互之间的贸易周转额。据此，在本协定有效期内，苏联向爱沙尼亚出口 1800 万爱沙尼亚克朗，爱沙尼亚向苏联出口也为 1800 万克朗。

此外，苏联政府有权向爱沙尼亚附加出口价值为 300 万爱沙尼亚克朗的货物，以抵消在本协定签订前形成的逆差。

第二条

双方租用悬挂缔约双方旗帜的船只，在爱沙尼亚货物过境和转运存储、船舶修理和制造工作的费用，以及苏联驻爱沙尼亚贸易代表处和苏联所有驻爱沙尼亚的经济组织的费用，计入贸易周转额。苏方有权附加出口相当于本条所述所有费用逆差数额的货物。

第三条

如果本协定期满时发现缔约的某一方贸易周转额有负账，那么，该方有权在随后的 12 个月内拉平这个负帐。

第四条

苏联向爱沙尼亚出口货物的价值将按在爱沙尼亚边界交货价

格，或者到达爱沙尼亚港口的抵岸价格，根据爱沙尼亚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计算。本协定意义上的苏联出口是指苏联贸易代表处和苏联经济组织运进爱沙尼亚的货物。

苏联从爱沙尼亚进口货物的价值将按在苏联边界交货的价格，或者到达苏联港口的抵岸价格，根据苏联海关的统计资料计算。

每方有权根据文件资料对另一方的统计资料进行订正。

第五条

本协定取代1938年2月26日签订的贸易额协定，从1939年10月1日起生效，有效期至1940年12月31日。

本协定1939年9月28日在莫斯科完成俄文文本，一式两份。

在最短期间把它翻译为爱沙尼亚文，由双方共同进行，之后两个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卡·瑟尔特尔（签名）

阿·米高扬（签名）

№07470

米高扬关于苏爱贸易条约

致瑟尔特尔的信

(1939年9月28日)

部长先生：

您1939年9月28日的信件我已经收悉，内容如下：

“我有幸以爱沙尼亚政府的名义宣布，它根据1929年5月17日爱沙尼亚与苏联贸易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以及该条约对上述条款的最后议定书，同意如下：

1. 截止1939年10月15日之前把1922~1923年苏联经济组织建造的带有必要工具和设备的，并于1934年土地租赁期满后转交给爱沙尼亚的所有仓库，交给苏联经济组织以优惠条件租赁使用，租期5年。如果苏联经济组织承租者在租赁期满前半年内没有提出放弃续租的声明，那么，仓库的租赁期就被认为再延长5年。

2. 根据苏联驻爱沙尼亚贸易代表处和苏联经济组织的申请，按优惠条件，在塔林、纳尔瓦、伊兹波尔斯克和别尔诺夫的铁路沿线和海岸线附近为其提供必要数量的仓库供其租赁或使用，只要那里有这种仓库。

3. 提供塔林港口的大粮仓、冷库及位于仓库和大粮仓的电动起重机给苏联经济组织使用，所有这些设施应处于能够正常使用的状态。

4. 以优惠条件向苏联经济组织出租港口区域的土地，并允许他们在租赁的土地上修建仓库、大粮仓、冷库及其他交通设施。

5. 根据苏联贸易代表处的申请，允许苏联经济组织在爱沙尼亚开设自己的分部，为此信提及的作业服务。爱沙尼亚政府将接受为这些分部缴纳的税收。

6. 根据1929年5月17日第一个贸易条约的条款，准许以下苏联公民进入爱沙尼亚并逗留：作为苏联驻爱沙尼亚代表处和苏联经济组织分部工作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转运工作人员和其他交通运输业务工作人员及对苏联定货的维修建造工作进行技术监督的人员。

7. 不阻碍前来爱沙尼亚港口等待列宁格勒港口开航或等待货物的苏联船只停泊。

8. 协助分配在爱沙尼亚修理和建造的吨位在30000吨以下的苏联船只8艘及小船9艘的生产定货。

9. 装载爱沙尼亚进口或出口货物的船只进入苏联港口时，每次都要就其国籍和悬挂旗帜与苏联驻爱沙尼亚商务代办处协商。

10. 在1929年5月17日签订的爱沙尼亚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贸易条约有效期内，爱沙尼亚政府承担的上述义务仍有效。”

同时，将苏联政府的以下声明通知爱沙尼亚政府：

“1. 迎合爱沙尼亚方面的愿望，苏联政府准备为爱沙尼亚的货物经过苏联领土沿铁路线到摩尔曼斯克和到黑海港口，以及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到索洛克提供过境的权利。

2.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协助爱沙尼亚货物过境，苏联政府准备向苏联的‘列宁格勒对外交通运输’货物发送办事处颁发委托书，通过‘列宁格勒对外交通运输’办事处与爱沙尼亚的组织和商行签订相应的合同，使其承担爱沙尼亚货物经过苏联领土，包括仓储、搬运等工作的一切服务。

3. 苏联政府同意规定，经苏联领土运输爱沙尼亚过境货物的

铁路运价在 400 公里以内时，与爱沙尼亚根据 1933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苏联 - 爱沙尼亚铁路协定实行的铁路运价相同。

当爱沙尼亚过境货物在苏联境内距离超过 400 公里时，将使用根据本条第一段 400 公里距离确定的运费，按照过境货物的距离，按比例增加运费。

4. 对经过白海 - 波罗的海运河运输的过境货物，将按照苏联国内运价收费，按发生支付当天苏联国家银行的汇率，以卢布结算的运费总额换算成爱沙尼亚克朗，如果苏联白海 - 波罗的海运河的国内运价大幅度上涨，那么，苏联方面将根据爱沙尼亚方面的申请，准备谈判今后适用于上述运河运输的爱沙尼亚货物的运价。

5. 苏联政府声明，苏联政府在爱沙尼亚进行维修和船舶制造的定货，将在本信件的条款整个有效期内发出，每年约 15000 吨。

6. 在 1929 年 5 月 17 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爱沙尼亚共和国签订的贸易条约有效期内，苏联政府的上述义务仍将有效。”

同意这封信的内容。

部长先生，顺致对您的崇高敬意。

阿·米高扬

№07456

拉多涅尔关于准备发生战争

致爱沙尼亚各部队电

(1939年9月28日)

如果我们东部的邻邦开始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那么，各师、海军和空军总体上可根据“东方方案”的掩护计划行动，我指的是，战争开始后，在许多地方的通讯可能马上中断。

所以，我要求，各师、海军和空军，尽管通讯中断，但是要勇敢和主动地行动，执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任務——每个人在自己的战线上保卫自己的土地、国家和人民。

我要求每个人在执行任务时应勇敢主动。我再提醒一次，我们不开始战争，但是如果敌人侵入我们的领土，那就要勇敢地迎击它们。动员和开始军事行动——只能根据我的命令执行。

拉多涅尔

№07457

马特洛萨关于爱沙尼亚军方态度 致纳尔瓦军区司令的信

(1939年9月28日)

从武装力量参谋长那里得到有关目前局势的如下信息：

苏俄向我国政府提出缔结互助条约的建议，包括各方面的合作，直到给予军事支持。为了实现这个协议，俄国要求我们提供现有的，并在岛上建设新的港口和飞机场。双方国家互不干涉内政。可以推测，鉴于昨天一艘俄国船只中了鱼雷，除这些要求和建议外，将提出新的更加苛刻的补充条件。谈判应于今日15时重新开始。对外部的援助，包括拉脱维亚、芬兰和德国都别作指望。我们的代表团和政府作了一切努力，以避免战争和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

在军队的态度方面，要求它极其严格地遵守中立，表现出和平意愿。所以必须小心地避免挑衅。不管从海上、陆地和空中向我们挑衅，我们都应该表现出冷静和克制。一旦成建制的军队进攻我们，应该努力与上级指挥机关建立联系，在得到命令前继续行动。在失去联系和东方邻国明显地转入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必须着手实施新的掩护计划。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勇敢地行动，表现出主动，以保卫自己的领土，国家和人民。

要求所有领导人在执行自己的任务时表现出主动，我们不开始战争，但是如果敌人入侵我国的领土，就要勇敢地回击，宣布动员和开始军事行动，只能根据我的命令行事。

应该把这个情况传达到各部队指挥员、边界警备所所长和“保卫联盟”的领导人。

收到后以电话告知。

赫·马特萨洛^①

^① 赫·马特萨洛，时任爱沙尼亚武装力量第一师参谋长。

№07458

马特洛萨关于采取应急措施

致武装力量参谋长电

(1939年9月28日)

纳尔瓦军区司令请求通报，一旦东方邻国发动突然袭击，怎样处置纳尔瓦市内的桥梁：马上埋设地雷、炸桥或采取其他措施。师长不支持在近期布雷。我请您指示。此外，纳尔瓦军区司令认为，今天就应该给他运送 4000 枚反坦克地雷供他支配。可否这样做？

师参谋长赫·马特萨洛上校

№07459

爱沙尼亚海军司令部关于纳尔瓦海湾 地区事件的解释

(1939年9月28日)

黎明6时，在距离托伊尔海上通讯站西北偏北部13海里出现一艘排水量3000吨的轮船，并抛锚停下。该船有双桅，4个舱口，机器在中间。颜色为黑色。船底部吃水线旁可以看到红色，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船上没有装货。

12时15分，两架苏联CB型飞机飞近该船，两次绕船飞行后向西部飞去。

15时，从东北偏北部14海里的地方，出现三艘“C”型苏联驱逐舰，开始靠近上述船只，靠近以后，其中一艘停靠在船旁，另两艘围着它们游弋。

18时40分，由于天黑，所有船只从通讯站的视野中消失，直到此前，所有船只从通讯站处清晰可辨。在通讯站没有听到任何爆炸声。

9月28日黎明，再没有看到船舶。

此材料是根据托伊尔海上通讯站、昨天航空侦察和边界警备站提供的情况编制的。

№05670

苏联与爱沙尼亚互助条约

(1939年9月28日)

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一方，以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为另一方，为了发展1920年2月2日和平条约确立的、建立在承认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友好关系：

承认1920年2月2日的和平条约和1932年5月4日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条约依然是他们相互关系和义务的牢固基础；

确信确定保证相互安全的准确条件符合缔约双方的利益；

承认有必要彼此缔结如下相互援助条约，并为此目的任命自己的全权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

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

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全权代表：

外交部长卡尔·瑟尔特尔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一旦发生任何欧洲大国对缔约双方在波罗的海的海上边界或通过拉脱维亚共和国对他们的陆上边界，以及对第三条所指的基地直接攻击或以攻击相威胁，缔约双方有义务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二条

苏联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其他军用物

资援助。

第三条

爱沙尼亚共和国保证苏联有权在爱沙尼亚的萨列马（埃泽尔）岛、赫乌马（达戈）岛和帕尔迪斯基市（波罗的海港口）拥有海军基地和按合适价格承租的几个军用飞机场。将为基地和飞机场划拨准确地址，其边界由双方协议决定。

为了保卫海上基地和飞机场，苏联有权在划拨为基地和飞机场的地段保持严格限制数量的苏联陆地和空中武装力量，其最大数目由特别协议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有义务不缔结任何联盟或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同盟。

第五条

实施本条约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应该触动缔约双方的主权，其中包括他们的经济体制和国家制度。

划拨为基地和飞机场（见第三条）的地段仍然是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领土。

第六条

本条约在交换批准书后生效。批准书的交换从本条约在塔林市签署之日起的6日内进行。

本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如果缔约双方其中一方在期满前1年不认为有必要声明废止本条约，那么本条约有效期自动顺延10年。

第七条

本条约原件两份，分别为俄文和爱沙尼亚文，1939年9月28日于莫斯科。

维·莫洛托夫

卡·瑟尔特尔

秘密议定书

一、双方约定，为了警惕和制止把缔约双方卷入目前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企图，战争时期，苏联有权在划拨作为基地和飞机场的地段（见条约第三条）保持独立的卫戍部队，其中地面和空中武装力量总数在 25000 人以内。

二、在帕尔迪斯基市的基地（见条约第三条）建好之前，在从本议定书签署之日起至多两年内，苏联军舰可以临时进入塔林港补充食品和燃料并停泊。最近使用该权利的程序由特别协议规定。

三、条约第一条中规定的援助须根据另一方表达的愿望，并且经双方同意方可提供，并且在征得对方同意后，有义务提供援助的一方在另一方与第三个大国发生战争时可以保持中立。

四、为了监督本条约的执行并解决由此产生问题，根据对等原则组成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订出处理办法的文件。

五、本秘密议定书是苏联与爱沙尼亚 1939 年 9 月 28 日签订的条约的附件。

维·莫洛托夫

卡·瑟尔特尔

1939 年 9 月 28 日

№07474

弗洛文关于爱苏条约 致德外交部电（节录）

（1939年9月29日）

爱沙尼亚与苏联签订了军事协议，昨天晚上此间得悉的条约最实质性的条款，使政府各界人士大大松了一口气。……人们曾认为，爱沙尼亚国体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在政府的各界人士把昨天发生的苏联要求出人意料的缓和归功于德国外交部长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影响。因而产生了对德国深厚的感激之情。其中也体现在副外长今天早晨对使馆表达感激的拜访。从与他以及其他著名的国家和军界人士的谈话中了解到，只是在强大压力下和为避免可怕的毁灭，爱沙尼亚才签订了军事联盟。尽管由此产生了爱沙尼亚与苏联联系的单向性，爱沙尼亚仍然特别强调（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德国的良好关系被看做是针对这个问题的，舆论界不知道前天苏联提出的要求，德国被看做惟一能够使国家免于苏联的纠缠并在将来也可以依靠的力量。同时，部分的原因也在于担心如果德国被困于西方或者被削弱，俄国人就会提出新的要求。

报纸以醒目的标题对条约作了报道，报纸对签署条约的评论都是说，不能不迎合俄国使苏联舰队从惟一的港湾中摆脱出来的夙愿，主要的是必须保持爱沙尼亚国家完整的主权。

弗洛文

№07475

爱沙尼亚国务委员会会议关于爱苏 互助条约的讨论记录

(1939年10月2日)

秘密

第30号记录

国家杜马国防和外交委员会与国务委员会 1939年10月2日
11时举行联席会议。

出席者：国家杜马成员姆·哈桑、阿·尤利马（亚尔瓦木）、弗·
卡达立克、阿·卡里乃尔、亚·纽曼、阿·皮普、奥·布克、阿·安德
尔科普、奥·古斯塔弗逊、里·约翰逊、亚·提尼逊、奥·凯斯特尔；

国务委员会成员：弗·阿克爾、伊·拉多涅尔、亚·苏特斯、伊·
布赫克、弗·皮亚特斯、伊·奥拉丝马、阿·奥那斯、赫·劳里、阿·
迈列尔。

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国务委员会主
席姆·本戈、总理卡·恩帕鲁、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社会保障部
长奥·卡斯克、外交部副部长奥·爱比克、外交部政治司司长纳·卡
西克、外交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格·梅里、共和国政府驻国会代表伊·
克来斯孟特。

会议由阿·尤利马主持。

国家杜马秘书普·马尔维特作记录。

会议日程：

讨论爱沙尼亚共和国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

根据外交部长提议，会议秘密举行。

1. 关于国家杜马成员阿·安德尔科普、奥·古斯塔弗逊、里·约翰逊、亚·提尼逊、奥·凯斯特尔、阿·尤利马（塔尔图姆）和国务委员会成员伊·奥拉丝马、赫·劳里和阿·迈列尔参加会议的问题。

按照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的提议，通过决议，邀请国家杜马成员阿·安德尔科普、奥·古斯塔弗逊、里·约翰逊、亚·提尼逊、奥·凯斯特尔和阿·尤利马（塔尔图姆）以及国务委员会成员伊·奥拉丝马、阿·奥那斯、赫·劳里和阿·迈列尔参加会议。

根据会议主持人阿·尤利马的提议，通过了议程。

2. 讨论爱沙尼亚共和国与苏联互助条约。

外交部长卡·瑟尔特尔：根据共和国总统的委托和授予的全权，我们签订了以下协定（宣读协定）。

条约还附加了秘密议定书（宣读政府解释性的报告）。

签订这个协定就迈出了很远的一步。对这个历史上很早就引起纷争的问题，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就是向几个国家提供波罗的海的使用权，并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这一点。我们希望，这个条约能使我们避免任何冲突。我们意识到，我们是第一个签订类似的条约的，我们希望以此促进全面和平。

我们在莫斯科还签订了一个贸易条约，我简短地阐述一下这个条约的内容。这是为了使大家明白，在签订互助条约之前，难以签订贸易条约。他宣读贸易条约。属于这个条约的还有过境协定。

条约对我们是有利的，我希望外事委员会赞同我的活动。

亚·提尼逊：大家都清楚现在发生的事情。当我们的代表在莫斯科谈判的时候，外国的军用飞机就在我们的领空飞行，谁也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有正式报道说，爱沙尼亚政府向破坏中立的行为提出了抗议。所发生的事情表明，我们碰到的事实上不是什么别的问

题，而是事关国家独立的问题。它们向我们表明，我们正在解决波罗的海的国际问题，在此我们看到，人们怎样对待我们的主权。我国宣传部门提供的信息令人吃惊——人民为条约而感谢总统并向他拍来感谢电报。似乎这可以保障爱沙尼亚人民的和平发展。有没有这样的电报，我不知道，但是这似乎是在暗示人们，必须拍发这样的电报。事实上有人在制造一种假象，仿佛我们是胜利者。我们现在没有尊严，尽管本来是应该有的。应该承认，我们的主权遭到了破坏。现在我们应该接受条约，并尽可能做到不损害我国的尊严。

当讨论签订不签订条约的问题时，谁也没有反对签约——因为别无选择。有人强调，既然签订了条约，那么我们就应该忠诚履行它。应该有信任。但是不应该通过这种途径以保持自己执政得到好处，我们不应以这种方式去迎接未来。当我们的事情正在进行时，至少从我们那些声明中就可以看出，我们存在着一条战线——东方战线，在这条战线上我们应该勇敢作战。类似的宣言对我们的东方邻国不可能总是秘密。我们曾希望得到德国的帮助，而且一直遵循着这种方针。我们应该看到明确的前景，应该正确地估计事实。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应该根据条约协调自己的政策。我们应该诚实地作这件事，耍滑头是不合适的，因为这意味着灾难。现在的问题在于，人民能否在既成条件下这样做。如果有人认为，可以这样，那么我认为，这是绝大的错觉。在这个严重的时刻，每个人应该公开表明，他为什么而痛苦及他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不消除存在的障碍，就不能继续前进。共和国现政府应该辞职，以便建立一个新政府——人民团结政府。我们应该一起走向未来。最好是一个民族和谐政府，在这样的政府里，大家彼此都坦诚相待。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拯救我们还能够拯救的东西。如果出现占领的话，那么它就不限于8个月，而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与苏联的条约必须忠诚而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应该睁大双眼走向未来，那时我们才能够保

住我们珍惜的东西。如果我们目前经受的东西还不能使我们变得成熟起来，那就太糟糕了。我们应该明白，一致批准条约，这是我们的共同道路，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命运就是如此。

里·约翰逊：我们不应该用幻想欺骗自己。基地就是一个大要塞，但是我们必须向他们提供，否则没有出路。我们无力反对。他们向我们要求基地的原因就是我们是他们距离最近的邻国。然而，我们发出感谢电报则是消极的现象。政府不应该挑唆类似的举动，应该避免对事实作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我们不应该破坏我们创造的独立。我们对我们的制度不满意。把俄语从学校大纲中排除是大错。必须放弃我们目前的对内政策。应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贫困不应该增长——这对我们来说是自取灭亡。最近，政府表现出惊人的盲目。我们的某些机构应该改组，其他的应该精简。社会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做出评价时必须谨慎。我们迄今采取的措施没有产生结果。把自己军队调到这里的大国，无疑会对我们的国家制度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做出一切努力，以团结力量，保持我们的独立。

国务委员会主席姆·本戈：我深信，我国公民不会对条约抱幻想。大家都明白它会带来什么后果。目前还没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的人也有这种感觉。我不想当预言家，但是我不认为，我们的主权是不可动摇的。小国的主权从来都不能与大国的主权相比。有主权可以为自己人民的幸福做许多事。当大战结束时，谁想拿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不会来问我们。签订条约不会对我们的主权造成损害。然而现在不是说谁感到痛苦的时候，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发表自己对条约的看法。应该重新审视对内政策，但是为此需要另找时间。在内政问题上，我们应该一致。必须放弃互相埋怨，以便不给任何人提供干预我们内部事务的借口。为了进行必要的改革，我们应该彼此协商，而不是首先改变一切，然后再协商。现在还远没有完全失去一切。我们现在直接着手我们聚会于此的问题——其

他事情在别的会议上解决。

会议主席：我提醒一下，今天的会议是为讨论条约的。

阿·皮普：我想从法律角度对条约发表一点看法。应该指出，形式上我们体面地摆脱了既成局面。两国间的这个条约是建立在互惠和平等的基础上的。其中强调了我们的和平条约、主权，说明了条约的有效期。在租出去的领土上，保留着我国的司法权。签署的条约不是新东西——在中国和西班牙也有这样的基地，埃及与我们的状况也相似。在条约中不可能包含一切——为此就有了议定书。在什么地方写了什么东西没有实质性意义。作为专家，签订条约时应该平静地对待事情，权衡一切。在莫斯科，也给了我们发言的机会，与我们平等地讲话，而不是像对下属那样说话。他们说，他们不打算确立对我们的保护关系。整个会谈期间充满了信任。我深信，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能取得的最好结果。斯大林说：你们的行为是很正确的——看看莫西齐茨基现在在哪里。谈判没有给人留下这是我们开始完蛋的印象。它们确立了一个大帝国与小邻国新的和谐关系。我们应该开始保证未来的新的时代。必须自上而下地团结起来，做出一切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必须建立法制秩序。必须清楚，如果我们不对一系列问题做出改变的话，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然而现在应该继续讨论与条约有关的问题。

武装力量总司令伊·拉多涅尔：今天以列宁格勒要塞司令为首的俄国委员会已经启程到这里。我下达了命令，以使谈判在信任而真诚的气氛中进行。我们的委员会里也有来自各个部门的专家。委员会的主席是尼·列埃克将军。我们应该明白，俄国确实必须有出海口，必须考虑到这些。所以，我们应该最充分地考虑他们的要求，因为与大国冲突对小国没有任何好处。我们不能宣布动员，我们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意味着战争。别国飞机破坏我们的空中边界，其意图就是弄清我们是否在动员。大国能够让

自己拥有某些更多的特权。如果俄国想战争，那么，谁也不能禁止它，那时它就是另外的做法了。我们的任务在于，尽最大可能保留我们的人民，带领他们度过一切难关。说我们不能对抗俄国，是难以启口的。但是，我应该这样做，以保留自己的人民。明显的是，我们的主权不同于大国的主权——这些我们在日内瓦已经看到了，那里也没有很重视我们。

现在我们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未来描绘得一团漆黑。让我们这样逍遥自在了20年。而我们却在彼此争吵，这必须停止。我相信，只有那时我们才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将必须在更加严酷的条件下生活。这只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为了人民的利益，并根据它的利益保存我们的国家。

总理卡·恩帕鲁：拉多涅尔将军实质上说出了我打算说的一切。我只谈几个需要解释的某些问题。我们感谢代表团。应该订正发电报的问题——政府没有这样的安排。请相信我。然而，我们不能禁止发电报。我现在应该向人民解释，我们打算忠诚地执行条约——这是很实质性的问题。政府打算根据局势的要求进行改组。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困难的任任务。政府知道这一切，它做了一切可能的事情以战胜困难。

阿·奥那斯：外交部长能否回答，使用铁路的情况如何？

奥·布克：德国如何对待这个条约，就这个问题与它会谈过没有？

外交部副部长奥·爱比克：关于铁路问题正在审议。还不清楚德国的态度。

阿·皮普：（会上插话）我想通报的是，德国人没有参加爱沙尼亚—俄国的谈判，因此，我们与他们没有接触。

奥·古斯塔弗逊：必须原原本本地接受事实。如果我们签订了条约，那么我们当然就是输了的一方，尽管我们取得了可能取得的

最好结果。现在我们应该以信任的态度对待条约，否则不会有好的结果。无论条约怎么样，我们现在都要执行它——没有其他出路。我们也应该解决我们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们将自己做这些事，不要条约伙伴的干预。然而，如果保留着现在这样强硬的条件，那么条约就会失败。我们不接受警察国家，我们应该加强民主。我希望，总理应该履行自己的承诺，那么一切将保持正常。

亚·提尼逊：总司令和总理证明了最近几天政府采取的步骤是正确的。我就我国整个内部制度说几句话，这个制度必须改造。我们应该把事情朝着需要的方向引导。时至今日，大家还像 DNB 所希望的那样向我们描绘，努力向我们证明，不需要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中立国，我经常说，我们因此正越来越接近灾难。这个条约的问题不应该成为施加压力的手段。我们应该就许多问题进行协商，这个时候不会迅速到来，因为大家首先关心的是自己。为此必须做些什么，并且要迅速而正确，否则就会搁浅。批准条约时应该意识到，这样做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应该准备执行条约。显然，会产生困难，这也必须考虑到。我希望，外事和国防委员会联席会议有助于改变对内政策。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在外事和国防委员会最近举行的会议上，我许诺将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和能力为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国服务。我认为，现在谈谈我在莫斯科注意到的一切，应该是正确的。在谈判时，伙伴的个性在谈判中有重要意义。在签订条约时，是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与我们谈判。既没有记录员，也没有其他人。应该指出，斯大林就像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样，绝对是聪明人。所有这些减轻了我们的任务。着手谈判时，我们的出发点是，俄国需要出海的道路。俄国也应该得到邻国的支持，它自己应该关心这件事。在我看来，我们现实地估计了俄国在波罗的海的巨大利益。在谈判一开始，我们马上就强调了我国领导人现实地评

价局势的能力。我们到达那里签订条约就证明了这一点。请他们也考虑我们的愿望。我们善于为签订条约制造有利的气氛。我真诚地尊敬我们的谈判伙伴。我觉得，俄国较好地理解了我们的意图。无疑，斯大林关于签订条约的意见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他了解我们的情况，引证了理由，如果我们提出某个建议，他也会考虑。

已经从法律观点对这个条约做了分析。条约规定了军事合作。因此，我们应该划给俄国某些领土，让他们的海军自由行动。条约事实上在大国侵略的情况下才生效。一切都在条约第一点决定了，其他各点只是关于条约实施的。

在谈判时，俄国一直强调，我国的内部事务——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将极其诚实地、以善意的精神执行条约。我认为，俄国也将忠诚地履行条约。斯大林强调：你们看，布尔什维克是遵守诺言的。当然，我怀疑斯大林会把自己的名字与他们不打算履行的条约联系起来。就我的印象来说，我们的伙伴也不对我们抱有怀疑。现在，我们相互关系的未来就取决于这个条约。如果我们将遵守条约，那么，他们就表现出善意，反之就对我们构成威胁。不应该拒绝。我们有义务诚实地执行一切写在条约中的东西。我们需要无可比拟的纪律，因为我们将面临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我们满怀解决这一任务的希望。我深信，我国领导人拥有足够的道德精神，能够帮助我们执行重大的国际任务。我们必须抛弃很多对我们来说是珍贵的东西。在命运的天平上摆着的是民族的生存。让命运来帮助我们吧。应该指出，代表团是不轻松的。

我希望大家清楚，这对我国人民意味着什么。我们做了能够做出的一切努力。我们尽自己的力量为我们的祖国服务——苍天可鉴。

总理卡·恩帕鲁：应该向国家杜马成员古斯塔弗逊做出答复，在新政府没有组成之前，现政府不能辞职。我们不能允许许多人认

为的那样的民主。不应该让党派掌权。应该指出，我们与工人和少数民族的相互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似乎政府执行了对德国友好政策的断言是不正确的。政府执行的是现实的政策：与各个方面保持良好关系。

伊·布赫克：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前提条件，使得能够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从我国的经济政策和与俄国协定中得到良好的结果。我们也必须就内部政策问题和其他问题进行协商，以便不出现争吵。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迄今关于本条约的发言已经涉及到它的内容。现在应该做出决定——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必须确定立场——召集全会还是由总统批准条约。

如果时间稍微充足一点，最好是召集全会。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长就可以作解释性发言，大家都能得到关于条约的信息。这似乎难以完成，因为总统应该通过相应的决议。我请求大家对此问题发表意见。

共和国政府代表伊·克来斯孟特：对条约的批准取决于它的类别。由议会批准的条约属于第一类；不应该由议会批准的属于第二类；可以由议会批准，也可以由相应委员会对条约审核后总统根据国家利益批准的条约属于第三类。本条约属于后一个类别。

阿·奥那斯：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议会批准合适，外交部长和其他领导人可以在那里作解释性发言。讨论这个问题是合适的。人民已经做好了批准条约的准备。

应该对国内政策做出修改。根据总理的意见，这不过是重复已有的先例。没有必要回到旧的时期。现在局势要求达成协议。我国人民现在应该觉得自己比确立独立之初更加团结。

里·约翰逊：障碍已经克服。总算可以召集议会了。

亚·提尼逊：条约如此重要，应该在议会得到批准。

总理卡·恩帕鲁：我认为，讨论这个问题是没有益处的。政府把条约提交委员会，以便弄清他们的看法。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建议休会 10 分钟。

通过决议，休会 10 分钟。

会议主席：继续开会。我提出如下决议草案请大家审议。

“国家杜马外事和国防委员会与国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了共和国政府关于 1939 年 9 月 28 日于莫斯科签订的爱沙尼亚与苏联互助条约的报告，做出决议，承认批准上述国际条约是必要的。”

提议被一致通过。

国家杜马主席尤·乌鲁奥特斯：我还想指出，在相应的消息中应该提及，条约在议会的相应机构进行了讨论。

会议主席：议程已经结束。我宣布会议结束。会议于 16 时 42 分结束。

秘书 普·马尔维特
会议主席 阿·尤利马

No 07434

德国外交部致驻塔林、里加和
考纳斯使团电
(1939年10月3日)

各位公使

在讨论德国与俄国关系及它们对波罗的海国家可能的后果时，
外交部长请你们必须极其谨慎，避免就此问题做出解释。

魏尔曼^①

① 魏尔曼当时在德国外交部供职。

№05671

苏联与拉脱维亚的互助条约

(1939年10月5日)

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一方，以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为另一方，为了发展1920年8月11日和平条约确立的、建立在承认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友好关系：

承认1920年8月11日的和平条约和1932年2月5日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冲突的条约依然是他们相互关系和义务的牢固基础；

确信确定保证相互安全的准确条件符合缔约双方的利益；

承认彼此有必要缔结相互援助的如下条约，并为此目的任命自己的全权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表：

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

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代表：

外交部长维里格里姆·孟特尔斯

双方的全权代表相互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并确认对方的证书符合应有的形式和应有的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一旦发生任何欧洲大国对缔约双方在波罗的海的海上边界或通过爱沙尼亚或立陶宛共和国对他们的陆上边界以及第三条所指的基地直接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缔约双方有义务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包括军事援助。

第二条

苏联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爱沙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援助。

第三条

拉脱维亚共和国为保证苏联的安全和加强自己本国的独立，向苏联提供在里耶巴亚（里巴瓦）市和文茨皮尔斯（文达瓦）市拥有海军基地和按合适价格承租几个军用飞机场的权利。将为基地和飞机场划拨准确地址，其边界由双方协议决定。

为了保卫伊尔本海峡，在相同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在文茨皮尔斯与比特拉戈之间沿岸构筑海岸炮兵基地的权利。

为了保卫海上基地、飞机场和海岸炮兵基地，苏联有权在划拨为基地和飞机场的地段保持严格限制数量的苏联陆地和空中武装力量，其最大数目由特别协议规定。

第四条

缔约双方有义务不签订任何联盟或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任何同盟。

第五条

实施本条约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应该触动缔约双方的主权，其中包括他们的国家制度、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军事措施。

划拨为基地和飞机场（见第三条）的地段仍然是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领土。

第六条

本条约在交换批准书后生效。批准书的交换从本条约在里加市签署之日起的6日内进行。

本条约的有效期为10年，如果缔约双方中某一方在期满前1年不认为有必要声明废止本条约，那么条约将自动延长有效期10年。

上述全权代表特此签署本协议，并在条约上加盖自己的印鉴，立此为凭。

本条约一式两份，原件为俄文和拉脱维亚文，1939年10月5日于莫斯科。

维·莫洛托夫

维·孟特尔斯

秘密议定书

一、双方约定，为了警惕和制止把缔约双方卷入目前正在欧洲进行的战争的企图，苏联有权于战争时期在划拨作为基地和飞机场的地段（见条约第3条）保持独立的卫戍部队，地面和空中武装力量总数在25000人以内。

二、在条约第一条中规定的援助，须根据另一方的愿望提供，并且征得对方同意，在另一方与第三个大国发生战争时，有给予援助义务的一方可保持中立。

三、为了监督本条约实施，并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根据对等的原则组成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制订出处理办法的文件。

一旦在确定基地和飞机场的地点和边界以及在联合对等委员会整个工作中产生分歧，争议的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或者由政府间直接谈判解决。

四、本秘密议定书是苏联与拉脱维亚1939年10月5日签订的条约的附件。

维·莫洛托夫

维·孟特尔斯

1939年9月28日于莫斯科

№07436

里宾特洛甫致德国驻塔林、里加和
赫尔辛基公使电（节录）

（1939年10月7日）

仅供公使亲启：

……对我们的电报补充通报如下内容，望你们严守秘密，不得外传：

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的谈判中，以极其保密的方式讨论了在东欧，即在前波兰以及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的领土上划分利益范围的问题。同时也在这些土地上发生领土政治变动方面达成了划分相互利益范围的协议。同时关于在前波兰国家领土上确定的边界，社会各界已经从9月28日签订的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第一条中知悉。在其他地方，边界线与德国—立陶宛边界吻合。因此，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不属于上述意义上的德国利益范围。请以后对所提及的内容不要作任何解释。

外交部长

№05672

苏联与立陶宛的互助条约

(1939年10月10日)

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为一方，以立陶宛共和国总统为另一方，为了发展1920年7月12日和平条约确立的、建立在承认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对方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友好关系：

承认1920年7月12日的和平条约和1926年9月28日互不侵犯与和平解决冲突条约依然是他们相互关系和义务的牢固基础；

确信确定保证相互安全的准确条件和公正地解决波兰非法地从立陶宛夺取的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的国家归属问题符合缔约双方的利益；

承认彼此有必要缔结把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交还给立陶宛共和国，以及苏联与立陶宛相互援助的如下条约，并为此目的任命了自己的全权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代表：

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

立陶宛共和国总统的代表：

外交部长尤奥扎斯·乌尔布西斯。

各方的全权代表，相互出示了自己的全权证书，并确认对方的证书符合应有的形式和应有的程序，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为了加强苏联与立陶宛的友谊，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区由苏联转交给立陶宛共和国，并入立陶宛国家领土版图，根据所附地图

确定了苏联与立陶宛共和国的边界，并且在补充议定书中将对这条边界作更详细的描述。

第二条

一旦发生任何欧洲大国对立陶宛的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以及通过立陶宛对苏联侵略或以侵略相威胁，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有义务相互给予各种援助，其中包括军事援助；

第三条

苏联有义务以优惠条件向立陶宛军队提供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援助。

第四条

苏联和立陶宛共和国有义务共同保卫立陶宛的国家边界。为此，苏联有权自费在根据相互协议所确定的立陶宛共和国的几个地点保持严格限制数量的苏联地面和空中武装力量。这些军队准确的部署地点和他们可能驻地的边界，每个单独地点的军队数量，以及所有其他问题，诸如经济、行政和法律性质的问题等由于苏联军队部署在立陶宛领土上所产生的其他问题，根据本条约将由特别协定来解决。

为此目的所需的地段和建筑物将由立陶宛政府按合适价格以出租方式划拨。

第五条

一旦立陶宛受到进攻的威胁或苏联受到经过立陶宛领土的进攻的威胁，缔约双方应立即讨论所形成的局势，采取一切根据相互协定认为必要的措施，以保证缔约双方的领土不受侵犯。

第六条

缔约双方有义务不签订任何联盟或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任何同盟。

第七条

本条约的实施在任何程度上都不应该触动缔约双方的主权，其中包括他们的国家制度、经济和社会体制及军事措施，总之是不干涉内部事务。

苏联地面和空中武装力量（见本条约第四条）的部署地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立陶宛共和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第八条

本条约涉及到苏联与立陶宛共和国间相互援助（见第二至七条）的有效期为15年，并且如果缔约双方中某一方在该期限期满前1年不认为有必要声明废止本条约所确定的期限，那么其有效期自动延长10年。

第九条

本条约在交换批准书之日起生效，批准书的交换自在考纳斯市签署本条约之日起6日内进行。

本条约一式两份，原件为俄文和立陶宛文，1939年10月10日于莫斯科。

维·莫洛托夫

尤·乌尔布西斯

秘密议定书

一、双方约定，为了实施共同保卫立陶宛的边界，苏联有权在立陶宛共和国某些地点（见条约第四条）保持地面和空中武装力量总数在25000人以内。

二、条约第二条中规定的援助，须根据另一方的愿望提供，并且征得对方同意，在另一方与第三个大国发生战争时，有给予援助义务的一方可保持中立。

三、为了监督本条约的实施，并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根据对等的原则组成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处理办法的文件。

如果由于实施本条约产生了某种问题，委员会成员不能达成协议，那么，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通过一般外交途径解决。如果通过这种途径仍不能达成协议，分歧将通过两国政府间直接谈判解决。

四、本秘密议定书是苏联与立陶宛于1939年10月10日签订的关于把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立陶宛共和国及关于苏联与立陶宛相互援助条约的附件。

维·莫洛托夫

尤·乌尔布西斯

№05673

契恰耶夫关于拉脱维亚状况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39年10月10日)

今年10月5日在莫斯科签署的互助条约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各界最近出现的紧张情绪和惊慌失措状况得到缓和。然而，却没有使人们完全平静下来。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对签署条约后形成的局势的可靠性和持久性表示怀疑。鉴于保卫海军基地和飞机场的我国军队即将进入这里，产生了对拉脱维亚可能布尔什维化的恐惧。统治集团也害怕国内革命力量采取行动。这样说的根据就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情绪，他们公开对苏联表示好感。这部分居民深信，拉脱维亚法西斯专政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不久的将来拉脱维亚将是苏维埃的拉脱维亚。据传，拉脱维亚已开始了一个建立目前尚处于地下的革命行动委员会的运动。

政府各界的情绪突出地体现在今年10月6日土地部长比尔斯尼克的讲话中，他声称，“如果世界上形成了要求我们承担某种责任和做出牺牲的局势，那么我们大家也不应该悲观失望，不要废话和闲聊。我们应该像迄今以前所做的那样做自己的事”。可以说，这是正式承认政府被迫做出“牺牲”。非官方的谈话就更坦率，把签订条约说成是在使用武力的威胁面前的让步。拉脱维亚军队司令别尔克斯将军在与我国武官的谈话中就反映了这种情绪，他不无恶意地问，把280辆坦克集结在拉脱维亚边界上是什么目的？

把苏联想象为“侵略者”的欲望也表现在所谓的“民主派”，

包括社会民主党（巴斯蒂安）的某些领导人身上，他们传播卑鄙的诽谤，说“俄国反动派的到来”和“苏联的帝国主义意图”等。

但是，相当大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财政部的瓦尔德曼和信贷银行的代表阿·别尔及尼斯等）把条约看做是“最小的恶”，他们说，处在俄国的影响下比处在德国人的影响下要好，因为在俄国影响下，拉脱维亚人总还可以保持自己的民族性，而德国人不仅要消灭民族文化，而且要消灭拉脱维亚人。

政府各界对条约的态度最鲜明地反映在处于社会事业部严格控制下的报刊的行为中。只是在条约签订4天后，在拉脱维亚的报纸上才出现了有关条约对拉脱维亚的意义的评论文章。在此之前，没有一家报纸表示自己对条约的态度。而且发表的看法都表现得极其谨慎和枯燥。显然是给报纸下达了指示，不得对条约着墨太多，以贬低条约对拉托维亚的价值和益处。最近报刊变得不那么拘谨了，开始对条约给予较多的注意，但目前仍看不到认为条约对拉托维亚有利的抱有真诚愿望的评论。

为了说明政府的立场，指出如下事实很有意义：此间几乎公开地说，条约签订前，乌尔马尼斯政府竭力争取柏林支持它的立场。它只是在得到德国在波罗的海除了经济利益而没有任何其他利益的答复后，才决定签订条约。显然，与西欧大国协商自己行动的习惯至今仍在困扰着政府。

与统治集团的立场不同，拉脱维亚的广大人民——工人、无地的农民特别是俄罗斯族农民、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按捺不住的喜悦心情看待互助条约。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寄信和亲自到我们这里，以表达自己对苏联在波罗的海的影响日益增长的满意之情。他们遗憾的只有一点：苏联从拉脱维亚政府得到的让步太少。我们的朋友想看到拉脱维亚即使不是苏维埃国家，也至少是摆脱了乌尔马尼斯政府专政的国家。

拉脱维亚政府被迫在对外政策上的转变在此间引起了不少对乌尔马尼斯意图的解释和猜测。例如，据说他打算建立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并且还说出了未来社会民主党人部长的名字——普·卡里尼尼西和罗列茨等人。传说这是因为在莫斯科谈判中似乎向孟特尔斯提出了此种要求。他们也这样评价享有亲德国名声的军队总参谋长加尔特马尼斯的辞职。

贸易谈判的拖延引起了许多推测。广泛传播的看法是，莫斯科有意拖延贸易谈判，以恶化经济状况，从而引起人民群众对乌尔马尼斯政府的不满。

最近，德国政府所采取的把当地德国人迁回德国的举措使局势更加复杂化，我已经把此事通过电话通报了您。可以从我们通过塔斯社系统发回的资料中了解此问题的详细情况。

苏联驻拉托维亚全权代表处代办 伊·契恰耶夫

№05674

莫洛托夫关于对爱沙尼亚的报道

致尼基金电

(1939年10月20日)

读了塔斯社驻塔林记者通过外交信件发回塔斯社的报道《爱沙尼亚的状况》。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其作者极力迎合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有害情绪。塔斯社驻塔林记者这种明显的轻率行为只会对苏联的敌人有利，对一切反苏联的挑拨者有利。作为全权代表，您应该明白这一点，并及时制止这种企图。作为全权代表，您应该记得，苏联将忠实而且逐条执行互助条约，并且要求爱沙尼亚也这样做。对这种轻率的挑拨分子必须给予坚决的回击，他们的行为只会引起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谣言，也就是破坏所签订的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同时，要解释清楚所签订的条约的真正意义。我提醒您，尼基金同志，这是您起码的责任。

上述记者将由塔斯社召回。

莫洛托夫

1939年10月20日

№05675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苏维埃化问题

致波兹尼亚科夫电

(1939年10月21日)

您，以及全权代表处全体工作人员，包括武官，绝对不要干涉立陶宛的党派事务，不要支持某一反对派或其他派别。对于你们当中任何企图干涉立陶宛内部事务的人，都要给予最严厉的惩罚。请注意，我方将真诚而逐条地执行与立陶宛的条约。我们也要求爱沙尼亚政府这样做。应该抛弃关于立陶宛苏维埃化的具有挑衅性的有害的胡言乱语。

莫洛托夫

1939年10月21日

№05676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人迁移问题
致波兹尼亚科夫电**

(1939年10月22日)

我向拜访我的卡特凯维奇乌斯通报了以下内容：

(1) 我们不反对立陶宛军队进入维尔纽斯，哪怕今天进入也行；

(2) 我们反对对10月10日条约中确定的边界作任何改变，但是不反对白俄罗斯西部希望（重复一遍，希望）迁回立陶宛的立陶宛人利用这一权利前往立陶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立陶宛政府可以派一个委员会到莫斯科来。委员会也可以去有人愿意迁入立陶宛的地方。

莫洛托夫

1939年10月22日

№05677

莫洛托夫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化问题

致尼基金电

(1939年10月23日)

您不理解与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有关的我国对爱沙尼亚的政策。根据您最近发回的密码电报，特别是今天发回的第201号密码电报，其中您描述了11月7日的特别庆祝会和演讲，以及塔林的工人组织对水兵的欢迎和招待，显然，爱沙尼亚苏维埃化情绪这股风已刮得您晕头转向了，而这在根本上是与我们的政策对立的。最后，您有责任明白，对这些关于爱沙尼亚苏维埃化情绪的任何鼓励，或者即使只是对这些情绪不加阻止，都有利于我们的敌人和反苏维埃的挑拨者。您这种不正确的举动把类似皮普这样的爱沙尼亚人弄糊涂了，显然，他认为，他必须在11月7日发表亲苏联的言论。您只是应该关心，以便让我们的人，其中包括驻爱沙尼亚的军人，准确和诚挚地执行互助条约和不干涉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原则，并保证爱沙尼亚方面对条约持同样的态度。在其余一切事情上，包括在11月7日，您不应该越出全权代表处工作的一般范围。您应该记住的主要东西，就是不允许对爱沙尼亚内部事务的任何干预。

因此，我责成您：

(1) 不允许海军和陆军部队与工人和其他爱沙尼亚代表团会晤；

(2) 以我的名义建议皮普11月7日不举行音乐会和发表演说，

因为这样的音乐会会被爱沙尼亚左派工人解释为他们所希望的苏联对爱沙尼亚的内政施加压力的征兆，这与不干涉爱沙尼亚事务的原则是完全对立的；

(3) 绝对禁止您干预爱沙尼亚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斗争，接见他们或诸如工会之类的任何代表团；

(4) 责成您制止爱沙尼亚苏维埃化的各种各样的谈论，当前这些只对挑拨者和苏联的敌人有利，并合乎他们的心愿；

(5) 我认为在当前情况下，以您的名义邀请爱沙尼亚纺织工人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举行的十一月庆祝会是不合适的；

(6) 在拉多涅尔赴莫斯科的问题上，不要表现出主动，但是如果他自己想来的话，就通报我们。

莫洛托夫

1939年10月23日

№05678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会见立陶宛

总统的日记（节录）

（1939年11月3日）

12时，我受到总统接见，向他递交了国书（讲话文本已经单独寄到波罗的海司）。礼仪以后，在参加仪式的人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15分钟的私人会见，总统在谈话中涉及到立陶宛语言、立陶宛人民的性格等问题。告别时，总统出人意料地抛出一句话，说立陶宛的历史命运永远紧密地并在积极意义上与俄国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最近的事件中。我回答说，听到这些我很高兴，并利用这个机会指出，旧俄国与现在的苏联之间的政策区别极大。……

№07452

拉多涅尔关于爱沙尼亚与芬兰 关系的讲话（节录）

（1940年1月1日）

我们已经做了可能做的一切努力。当9月份我们处于紧急关头时，芬兰外交部长没能接见爱沙尼亚的公使，我国公使只好与某个司长会谈，该司长用很长时间明确地说，芬兰不能对爱沙尼亚做任何事。所有这些芬兰曾答应向我们提供帮助的说法，早已成了空洞的废话和谎言。根本没有这回事，甚至相反，芬兰坚决声明，它不能为我们做任何事。从芬兰的观点看，它没有来自东部的威胁。事情就是如此。我们明白，列宁格勒不仅要从南部，而且要从北部得到保卫，那里与芬兰的边界比与爱沙尼亚的更近。芬兰持另一种看法，因为有人答应向它提供慷慨的援助。……

为什么我如此详细地叙述这些？因为许多人认为，我们与芬兰的联系不够密切是我们的过错。应该说，为了使我们的关系保持友好，我们已经做了一切。

大家知道，为了加强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们已经做了多少事。同时，人们之间的友好接触及音乐会上的温馨感情并不意味着政府人士之间的关系是真诚的。为了与芬兰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国方面已经做了一切，但是，很遗憾的是，并没能做到这样。……

№07477

拉多涅尔关于爱苏关系状况的 讲话（节录）

（1940年1月1日）

还记得我国刚签署和平条约时，谨慎的政治家们就说，不仅爱沙尼亚，而且其他小国只有在新的战争爆发之前，才能够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当然，这是谨慎而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们以十分严肃的口吻表达的，他们说的也没错。众所周知，一个新国家，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大战没有开始前就消失了。而另一个新的、比较大的国家波兰，战争刚一一开始就消失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处于威胁之下。我们可能首批遭到打击，诚然，不是来自德国的打击，而是来自我们的东方邻国。

我们军人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知道，现在苏联的活动家们也说，在20年里，他们被迫与其他国家签订了不利的条约。由于自己国内极其严重的局势，他们必须到处做出让步。他们经历了国内战争，他们遭到了外来压力。他们签订的条约，对他们是很不利的。现在欧洲的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欧洲大国正彼此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这样有利的政治局势，对苏联是千载难逢的时机。所以，它自然而然地要求改善自己的对外政治地位，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因此，对邻国和我们要施加一定的压力。我公开这么说——是有这样的压力。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十分真诚地承认，苏联向我们提供了选择的自由——加入军事冲突或者签订合作与互助条约。这样，让我们二者择其一。当时我认为而且现在还坚持这样的

意见——苏联喜欢后者，即签订条约。为什么我们会首先遭此打击？应该考虑到苏联的地缘状况，它必须有通向波罗的海的出海口。由于我们靠近列宁格勒，我们首先受到它施加的以加强自己立场的压力。我们是否确实是首批受到打击的国家呢？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条约只在时间上有几天的差别。所以，所有的波罗的海国家实际上同时遭到了这些事件的打击。

必须承认，加入与苏联的冲突，我们就会完全单枪匹马孤军作战，因为在波兰的灾难以后，担忧和恐惧笼罩着全世界，忘记了一切承诺和道德义务。

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签订互助与合作协定的道路，我确信我们这个做法是明智的。我们由此得到了什么？我们避免了遭到大国的第一个打击，因此没有处于波兰的状况。……

№05679

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国内情况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0年1月30日)

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塔乌蒂尼克）力图重新把国家的统治权攫取到自己手里，这是资产阶级的立陶宛目前生活中的主要特点和主要政治现象。

克莱佩达夺权以后，当时曾单独掌握政权的民族主义者的地位急剧动摇了。为了避免自己的队伍和在国内夺得的阵地完全毁灭，他们在政治上不经过战斗就退出了权力，把它让给切尔纽斯将军的联合内阁。在不久前举行的民族主义者联盟的年度代表大会上，其主席车谢维邱斯就此公开厚颜无耻地说到这次转变，他声明，切尔纽斯内阁不能令他们满意，他们不过是为了需要才容忍它。

1939年10月，由于从苏联得到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并与它签订了互助条约，西蒙敦作为国家元首和民族主义者联盟“领袖”的个人地位开始显著地加强。苏联—立陶宛条约在立陶宛广大劳动者阶层中得到最良好的反应，民族主义者决定利用它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即把这个成就归功于自己和自己的“领袖”。1939年10月10日签订了条约后，他们立即开展了广泛的宣传运动，其目的是希望说服人们，古立陶宛的首都之所以不流一滴血就收回了，是由于西蒙敦的英明和民族主义拥护者正确的执行了他的政策。应该说，他们获得了某些成功，从而改善了自己的地位。

11月，他们已经开始企图更接近权力。他们镇压了反对派集团

的抵制,取消了切尔纽斯内阁,建立了以自己人梅尔基斯为首的新内阁。除了军队总司令拉斯蒂基斯的傀儡切尔纽斯外,他们还将排斥反对派集团最顽固的代表(比斯特拉斯等人)。然而,在这时候,他们还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没有决定完全夺取政权。他们一方面消除狂热的对手,另一方面还是把这些政治集团的代表留在新内阁中,但已是另一派原则性不强并准备做出妥协的人。

1940年1月初,在民族主义者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演说中,他们走得更远,公开宣布自己从防御转入进攻,直截了当地说,权力应该由“民族主义派”的组织,即民族主义者来掌握。在这个意义上最明显和最露骨的是联盟主席车谢维邱斯的发言。其中有对切尔纽斯政府的批评,也有要与内阁中反对派成员算账的直接威胁,因为他们鼓吹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本集团的利益,而不是西蒙敦的指示等。

1月中旬,他们把自己的进攻转向另一个方面,即通过排除军队领导人拉斯蒂基斯将军,削弱军队对内阁的压力。正如当时我们通报所说,切尔纽斯内阁就是他强加于西蒙敦的。此后,拉斯蒂基斯的政治分量显著地增加,特别在反对派集团中(民族主义反对者),因为他越来越直截了当地反对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主张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即联合内阁。所以,他对民族主义者的积极进攻不满,他特别反对梅尔基斯当总理。他在新年的一篇著名文章中公开表露了这种情绪,引起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极大不满,结果把反对自己的武器交给了他们。拉斯蒂基斯为了捍卫自己的观点,把自己置于与民族主义者联盟的根本利益对立的地位。短兵相接的斗争开始了,拉斯蒂基斯由于没有找到其他集团的有力支持而失败了。在目前条件下,拉斯蒂基斯只有在完全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的条件下,他才有可能回到军队的领导层。

维特考斯卡斯被召领导军队,此人非常熟悉军事,但是意志软

弱，不问政治，即在后两种品质上与拉斯蒂基斯完全相反。

如果民族主义者的进攻将顺利发展并继续下去，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到国内的政治反应会有所增强。在前面提及的代表大会上强调的联盟“领袖”的思想远没有为大家所认识。必须做许多工作，才能拨乱反正。在实践中，这不仅意味着加强宣传，而且意味着警察和行政压力的加强。

西蒙敦对联盟的青年人敞开了大门，让其发展起来，这种状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最近几年，联盟内部成年一代和青年一代经常围绕着联盟内的权力和国家职务的肥缺等进行斗争。这种斗争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者队伍的稳定。在进行新的进攻时，西蒙敦让青年人冲在前面。这就暂时消除了内部争夺，把更新鲜而更有闯劲的力量注入队伍。联盟的新主席车谢里丘斯就属于后者。直到不久前他还鲜为人知。这些青年干部中不少是所谓的“少壮派”和“积极分子”，他们无疑会对国内日常政策打上自己的烙印。

无疑，民族主义者会努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苏联军队进驻所形成的立陶宛的稳定局势，他们将弥补漏洞，即巩固自己的阵地，培植自己的意识形态，加强暴力机器等，而不怕某个第三者妨碍他们。

至于他们对苏联和1939年10月10日条约的态度，那么可以满怀信心地说，在现代国际条件下，他们将忠实地履行上述条约的义务。立陶宛民族主义者对局势的把握要比基督教民主党人更现实和清醒。

然而同样的现实感迫使他们环顾四周，以便确定国际局势中的某些变化是否成熟。他们现在也从事这样的活动，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英国和法国。在他们的下意识中，英法联盟总会是胜利者。这种情况不能不对立陶宛目前对外政策产生相应的影响，使其表现得摇摆和动摇不定。

全权代表 尼·波兹尼亚科夫

№05680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士兵失踪问题

致波兹尼亚科夫电（节录）

（1940年5月25日）

今天，5月25日，我召见了纳特克维丘斯公使，向他作了以下声明，声明的文本已经交给了他：“根据全权代表波兹尼亚科夫的报告，不久前又发生了苏军的两名士兵诺索夫和斯马夫戈涅茨失踪的新事件。我们可靠地获悉，这些军人的失踪是由某些受立陶宛政府机关庇护的人士所为，他们灌醉红军战士，把他们牵涉进罪案，然后安排他们逃跑或者把他们消灭。苏联政府认为立陶宛政府机关的类似行为是对苏联的挑衅，其蕴藏着严重的后果。苏联政府建议立陶宛政府制止立陶宛政府某些机关个别间谍的这些挑衅行为，立即采取措施，寻找失踪的苏联士兵，并把他们交给苏联军队驻立陶宛指挥部处理。

苏联政府希望，立陶宛政府能响应苏联政府的建议，不要迫使它采取其他措施。”

听完我的这个声明，纳特克维丘斯试图说服我，说立陶宛政府不可能参与上述声明中指出的庇护行为。对此我的答复是，请把我的声明报告立陶宛政府知道。

№05682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告工人农民书

(1940年5月31日)

同志们，立陶宛的公民们！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得到和正在从苏联得到巨大的援助。他们把首都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还给了我们。红军保卫着我们的独立。多亏苏联，立陶宛至今避免了那场把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和法国欣欣向荣的城市和乡村变成废墟的可怕的战争。立陶宛的反动人士却在反动的政府机构的支持下，组织挑衅活动，反对这个对我们友好的国家。难道这还不清楚，这些反对苏联的挑衅行为就是对立陶宛的挑衅，就是对我国人民的挑衅！

这些挑衅行为不是资产阶级报刊试图说服我们的是“不愉快事件”或“误会”。一切反苏的秘密宣传，反对一切对苏联给予好评的人的十字军征伐，反对共产党人和整个工人和农民的空前恐怖活动，最后，红军“失踪”的挑衅，这是一连串的行动。

这一切证明，反动政府没有忠实地执行与苏联的条约。这还证明，在政府中有决定性影响的反动人士，与帝国主义者保持秘密联系，现在已经力图阴谋破坏与苏联的互助条约。

我们号召一切人，不管他们在观点上的差异，都起来抗议反苏挑衅。我们号召大家为始终如一地执行与苏联的互助条约而斗争，为与苏联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斗争。立陶宛的未来取决于这种关系。梅尔基斯-斯库恰斯政府是这些挑衅行为的罪魁祸首，我们号

召大家参加反对这个政府的斗争，为争取大赦政治犯、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

打倒反苏的挑衅行为！

打倒反苏运动！

要求彻底遵守与苏联的互助条约！

要求梅尔基斯－斯库恰斯政府辞职！

要求清洗国家机关和军队中的帝国主义间谍！

俄国白卫军和一切帝国主义间谍从立陶宛滚出去！

要求大赦政治犯！

打倒恐怖制度！

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05681

**莫洛托夫关于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
致驻立、拉、爱 and 芬兰全权代表电**

(1940年6月14日)

我就苏联政府对波罗的海协约国目前活动的态度阐述如下：

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以后，波罗的海的协约国——其成员是早就结为军事联盟反对苏联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仅没有取消，而且加强了对苏联及与其所签订的条约的敌视活动，并把立陶宛也纳入了军事联盟，并开始鼓动芬兰加入该联盟。签订条约前，波罗的海协约国几乎一年没有开会。条约签订后，它在三个月间两次召开会议（1939年12月、1940年3月）。在这些事实上背着苏联举行的会议上，秘密拟订了反对苏联在波罗的海影响增长，以及反对互助条约的方法。最近的情况证明这三国在与实施条约有关问题上串通一气——他们都拖延签署某些协定，试图减少苏联驻军数量等。

总的说，从1939年12月开始，协约国的活动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并且在各个可能的方面——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出版和旅游等，在所有这些重要的或次要领域的举措，事实上都带有反苏性质。

最近几个月，在波罗的海协约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背着苏联加强了军事性质的协调措施。爱沙尼亚任命了驻立陶宛武官，立陶宛任命了驻爱沙尼亚武官。1939年11~12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总参谋长举行了会晤。1939年12月，三名立陶宛

将军在外交部官员陪同下，去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从1940年2月起，在塔林开始出版波罗的海协约国的刊物《波罗的海评论》，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发行，并且，例如，在创刊号上，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对苏联和互助条约不置一词，反而强调，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完全合作（意味着军事合作）的所有政治障碍都不存在了。

鉴于上述原因，苏联政府把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看做是对条约的违犯，因为条约禁止参加敌视缔约双方的联盟。

我与正在莫斯科的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严正交涉。现通知你们，使你们心中有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将把进一步的情况通报你们。

维·莫洛托夫

№05683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局势问题与 乌尔布西斯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4日)

莫洛托夫同志对乌尔布西斯声明说，他有一份苏联政府对立陶宛政府的十分严正的声明。他宣读了声明后把它交给了乌尔布西斯（见附录），并强调说，归根结底，必须认真地行动，而不是互相说些客套话。显然，立陶宛政府迄今还没有明白局势的严重性。

乌尔布西斯说，现在是立陶宛生活中复杂和责任重大的关头，他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延缓苏联声明中提及的期限。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向他宣读的是苏联政府的决定，他不能改变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莫洛托夫同志强调说，所作的声明是严正而坚决的，不能对它作改变和修正。

乌尔布西斯问，打算调进多少苏联军队？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3~4个军。

乌尔布西斯要求确定多少个师。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约9~12个师，并解释说，苏联政府想为创造保证互助条约得到完全执行的条件。

乌尔布西斯问，打算把苏军驻扎到什么地点，特别是对考纳斯有何打算？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归根结底这是军人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军队将驻扎到所有重要地点，包括考纳斯。

随后莫洛托夫同志警告乌尔布西斯，如果拖延答复，那么苏联

政府将立即断然实行自己的措施。梅尔基斯对整个局势是知道的。他完全熟悉情况。说了一次，再说一次，然后是第三次，但却看不到立陶宛政府方面的实际行动。玩笑该停止了。

乌尔布西斯反驳了一句，他说，立陶宛政府立即就明白了局势的严重性。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不，它不明白。他知道，个别人士诚实地对待互助条约的执行，但是立陶宛政府远没有这样做。

乌尔布西斯提问说，苏军干预不干预立陶宛的内部事务，莫洛托夫同志作了否定的回答，并强调说，这是政府的事。莫洛托夫同志说，苏联政府是亲立陶宛的，我们希望立陶宛政府也应该是亲苏联的政府。

与纳特克维丘斯公使举行了简短的协商后，乌尔布西斯问，所要求的措施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这些措施带有暂时的性质。但是，归根结底，对这个问题的最终答案将取决于未来的立陶宛政府。随后莫洛托夫同志强调说，不可对苏联政府的上述声明进行拖延，如果它的要求没有得到及时接受，那么，苏联军队将立即开进立陶宛。

纳特克维丘斯问，如果苏联政府的要求被接受，那么有关苏军进入的时间和部署的位置等同不同立陶宛政府商量？莫洛托夫同志简短地回答：“是的，如果这些要求被全部接受并且在期限内接受的话。”

乌尔布西斯提问说，什么样的立陶宛政府是苏联可以接受的？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要说出哪些人是困难的，他强调说，对内阁必须大换班，以便在立陶宛组成亲苏联的政府，新政府不仅能够忠实地执行互助条约，而且积极地为实施条约而斗争，乌尔布西斯提出以下问题——苏联政府怎样对待现内阁的某些成员？莫洛托夫同志回避对此问题做出具体答复，引证了刚才说过的条件，即未来的立陶宛内阁应该是何种形式。

乌尔布西斯问：是否应该在今年6月15日上午10时前组成新内阁？得到莫洛托夫的答复是，不是非如此不可，内阁可以晚些（比如在次日）组成，但是必要的条件是，苏联政府的所有要求被如期接受。

纳特克维丘斯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新内阁的构成需不需要与苏联政府协商，如果要协商的话，要怎样做。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必须协商，至于怎样协商，可以随后商量，或者直接在莫斯科，或者在考纳斯与全权代表商量。莫洛托夫说，有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必须是诚实的政府，能保证互助条约得到百分之百的执行。不能希望现在的内阁会这样做。苏联政府不相信它，认为没有可能与它协商。

乌尔布西斯说，他没有看到可以据以把内务部长斯库恰斯和政治警察局长波维拉基斯送交审判的条款。他问怎么办。莫洛托夫同志说，首先必须把他们逮捕，送交审判，条款会找到的。苏联的法学家在研究了立陶宛的法典后，会对此事给予帮助。

由于时间不够，乌尔布西斯请求允许打电话向立陶宛政府转达苏联政府的声明。莫洛托夫同志强调说，声明的最后部分应该加密。他再次提醒说，他在6月15日10时前等待答复。

乌尔布西斯说，作为互助条约谈判的参加者，他深感遗憾，离1939年10月10日签订互助条约才几个月，立陶宛—苏联的关系就发展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他还为自己祖国的命运担忧。

莫洛托夫回答说，如斯库恰斯等这样一些立陶宛的挑拨者，他们对苏联扮演了十分卑鄙的角色，他们应该承担一切罪责。他们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是立陶宛本国的敌人。

最后，莫洛托夫同志提醒说，他等待的答复不应晚于1940年6月15日上午10时。

会见于1940年6月15日0时22分结束。

附 录

根据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与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梅尔基斯先生以及外交部长乌尔布西斯先生交换意见的结果，苏联政府认为如下事实确凿无误：

1. 最近几个月来，立陶宛发生了一系列立陶宛当局从根据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驻扎在立陶宛领土上的苏军部队中绑架苏联军人，折磨他们，以获取苏联军事机密的事件。经查实，军人布塔也夫不仅被绑架，而且在苏联政府要求交出军人布塔也夫以后，他被立陶宛警察打死了。两名被绑架的军人皮萨列夫和斯马夫戈茨得以从掳掠并折磨他们的立陶宛警察手中逃出。在立陶宛被绑架的军人苏托夫至今下落不明。立陶宛当局竭力用这种行动对待部署在立陶宛的苏联军队，使苏联军队没有可能驻扎在立陶宛。

近来更加频繁的对为苏联军队服务的立陶宛公民——食堂工作人员和洗衣工等进行大肆逮捕和关入集中营，以及对为苏联军队修建军营的工人和技术员大规模逮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无缘无故和肆无忌惮地对为苏联军队服务的立陶宛公民的镇压，旨在使苏联部队不仅不能在立陶宛驻扎，而且也造成立陶宛对苏联军队的敌对态度，并准备进攻这些部队。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立陶宛政府在粗暴破坏它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互助条约，并且准备进攻根据这个条约部署在立陶宛的苏联卫戍部队。

2. 立陶宛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后不久，立陶宛政府就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缔结了军事联盟，从而把所谓的波罗的海协约国变成了三国军事联盟，而原先缔结军事联盟的只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苏联政府肯定地认为，这个军事联盟是针对苏联的。由

于立陶宛加入这个军事联盟，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总参谋部背着苏联的联系加强了。苏联政府还获悉，从1940年2月起，创立了这个军事协约国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并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立陶宛政府粗暴地破坏了苏联—立陶宛政府签订的互助条约，因为条约禁止双方缔结某种联盟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同盟（见条约第六条）。

尽管苏联政府对立陶宛奉行了极其善意和明确的亲立陶宛政策，众所周知，正是根据苏联本国的倡议，把维尔纽斯市和维尔纽斯地区转交给了它，立陶宛政府所有这些破坏苏联—立陶宛条约和敌视苏联的行为还是发生了。

苏联政府认为，类似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苏联政府认为绝对必要和刻不容缓地：

第一、立即把内务部长斯库恰斯先生和政治警察局长波维拉基斯作为针对苏联驻立陶宛卫戍部队的挑拨行为的直接罪犯交付审判；

第二、立即在立陶宛组成能够和准备保证忠实地执行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并坚决控制条约的敌人的新政府；

第三、立即保证数量上足以保证实施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和制止针对苏联驻立陶宛卫戍部队的挑拨行为的苏联军队自由通过立陶宛领土，以把他们部署在立陶宛最重要的中心。

苏联政府认为这些是执行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最起码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苏联—立陶宛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忠实和善意地执行。

苏联政府期待于1940年6月15日上午10时之前得到立陶宛政府的答复。在这个期限前得不到立陶宛政府的答复，将被看做是拒绝履行苏联政府的上述要求。

№05684

莫洛托夫关于立陶宛国内局势与 乌尔布西斯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5日)

乌尔布西斯向莫洛托夫同志通报说，立陶宛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的要求，政府已经辞职，总统已委托拉斯基凯斯将军组成新内阁。

莫洛托夫同志对乌尔布西斯声明说，谁担任内阁首脑，要与苏联政府协商。拉斯基凯斯这个人是不能接受的。乌尔布西斯说，从过去的谈话中他们领会，拉斯基凯斯是苏联政府可以接受的内阁首脑。莫洛托夫同志解释说，拉斯基凯斯只是在证明立陶宛政府对互助条约敌视的事实中被提及。作为总理，他没有被考虑。

随后莫洛托夫同志声明，他将把乌尔布西斯通报的答复对苏联政府汇报，然后着手苏联军队立即进入的军事问题。

乌尔布西斯提议与立陶宛司令部协商苏军进入问题，推荐立方总司令维特卡乌斯卡斯进行谈判，并问，维特卡乌斯卡斯在何地可以与苏联指挥机构的代表会晤。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因等待他们的答复，所以它暂时没讨论实际问题，但是他认为，过几个小时，他可以对他所有的问题给予答复。

乌尔布西斯再次回到总理人选问题。他请求同意拉斯基凯斯作为候选人，并指出，拉斯基凯斯在居民中享有好名声等。莫洛托夫同志回答他说，拉斯基凯斯是个犹豫不决和没有特色的政治人物。需要的是完全另一种人——一个立场明确而且亲苏联的人物。最

后，还必须使人们明白，在立陶宛国家政策中发生了向苏联方面的急剧转变。

乌尔布西斯问，在何地 and 何时可以讨论内阁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必须在莫斯科或者考纳斯做这件事。如果在考纳斯，就可能派遣一个苏联政府的专门代表与全权代表一起去那里。莫洛托夫同志答应与政府协商后给予最后答复。

№05685

莫洛托夫关于拉脱维亚局势与 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今天14时，莫洛托夫同志召见了拉脱维亚公使科钦什，向他声明，大概科钦什已经猜到，将就波罗的海协约国的活动与他进行谈话。然后，莫洛托夫同志向科钦什宣读了苏联政府对拉托维亚政府的声明文本，并把声明交给了科钦什（附后）。

科钦什听取和接受了苏联政府声明的文本后说，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的条约已经存在了十多年，早就为人所知。至于立陶宛，它没有加入这个军事联盟。

莫洛托夫同志向公使声明，莫非他不认为存在这个军事联盟与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互相抵触吗？

科钦什对此嘟囔着回答说，要知道波兰存在时，就已经有了条约。并开始问莫洛托夫，难道不能用其他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声明，莫洛托夫同志应该很熟悉他科钦什本人，他从来都主张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了解科钦什，他个人对他没有任何不满的地方。他相信，不仅科钦什，而且拉托维亚的其他人都主张与苏联发展良好关系。然而，拉脱维亚现政府对苏联不友好，虽然苏联政府奉行了亲拉脱维亚的政策，而拉脱维亚政府却相反。

科钦什声称，他总是问莫洛托夫同志和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对改善拉脱维亚—苏联的关系有什么希望没有，他

从未听到过提出某种要求。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科钦什询问的这些主要是些日常的问题。

科钦什再次开始说，他看不到苏联提出这种声明的理由。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苏联政府有足够的事实。最近在莫斯科与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话不仅证明了这些，而且使我们恍然大悟。我们看到，背着苏联建立了反苏联的军事联盟，波罗的海协约国的活动非常活跃，创立了自己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其中梅尔基斯本人还写文章谈波罗的海国家的密切合作。

科钦什反驳说，这是在经济基础上的合作，莫洛托夫同志指出，那里说的是“也将就经济问题合作”。如果说立陶宛开始以更粗暴的形式表现对苏联的这种敌视（绑架红军士兵等），那么拉脱维亚也在反对苏联，只不过形式更隐蔽而已。

科钦什多次地试图证明，苏联的声明没有根据，然后他转到了这个声明的具体问题。特别是他声明，给拉脱维亚政府提供答复的时间太少。因为他想亲自回里加，在那里他可以为两国利益采取某些措施，于是他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可否对这个期限做出宽限。

对此，莫洛托夫向科钦什声称，交给他的声明不是他莫洛托夫个人的声明，而是苏联政府的声明，所以他不能做出改变。

此后，科钦什请求阐述新政府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本届政府应该辞职。苏联政府将与总统商量，并对我国驻拉脱维亚的全权代表给予相应的指示。此外，莫斯科可能派人去里加。重要的只是一切要根据协议进行。如果拉脱维亚政府不这么办，那么，苏联政府就将采取声明中指出的措施。

随后，莫洛托夫同志声明，拉脱维亚政府和公使的举动使他惊讶。他们昨天就知道了对立陶宛的措施，而拉脱维亚政府和公使对此保持沉默，好像这与他们无关一样。

科钦什称，他只是在早晨才知道这事。后来里加才得到塔斯社

报道的文本。

随后，科钦什问莫洛托夫同志，打算派多少苏军进驻拉脱维亚。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现在也说不出确切的数字，但大约是二个军。莫洛托夫同志告诉公使，这个措施是暂时的。当建立起新政府，就可以协商这个问题。

在谈话结束时，科钦什再次请求对拉脱维亚政府提出答复的日期给予宽限，以便科钦什明天早晨可以回里加，在那里他可以采取某种对两国有益的措施。

莫洛托夫同志再次表示拒绝。

科钦什临离开前声明，昨天一批武装人员从苏联领土上越过拉脱维亚—苏联边界，袭击了两个边界哨所。结果几个拉脱维亚边防军人被打死，部分被拖入苏联境内，拉脱维亚边界警卫队建筑物被烧毁。

科钦什请求调查这起事件。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将委托人调查科钦什指出的事实。

会谈于 14 时 23 分结束。

谈话记录：谢·科济列夫

附 录

依据苏联政府掌握的事实材料，以及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与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梅尔基斯先生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苏联政府认定，拉脱维亚政府不仅没有取消早在签订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之前与爱沙尼亚建立的反苏军事联盟，反而扩大了它，不仅把立陶宛也吸收进这个联盟，还极力把芬兰也拉进去。

在 1939 年秋，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签订前，苏联政府对

存在这样的军事联盟故作不知，尽管实质上它与早先签订的苏联－拉脱维亚互不侵犯条约相抵触。但在苏联与拉脱维亚的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认为，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之间存在旨在反对苏联的军事联盟不仅是不能容许和不能容忍的，而且是对苏联边界安全构成的极其严重的威胁。

苏联政府曾希望，苏联与拉脱维亚互助条约签订后，拉托维亚会退出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使这个军事联盟消亡。但与此相反，拉脱维亚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反而着手复活并扩大上述军事联盟，比如，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召开两次秘密会议，形成了与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的扩大的军事联盟，加强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总参谋部的联系。1940年2月，专门创办了波罗的海协约国的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以英文、法文和德文在塔林出版等事实就是证明。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拉脱维亚政府粗暴地破坏了苏联与拉脱维亚的互助条约，因为该条约禁止缔约双方“缔结某种军事联盟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同盟”（见条约第四条）。

拉脱维亚政府对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的粗暴破坏，正是发生在苏联奉行和继续执行极其友好和明确的亲拉脱维亚的政策，逐条地执行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的一切要求的时候。

苏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苏联政府认为十分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

第一，立即在拉脱维亚组成能够和准备忠实地执行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的政府；

第二，立即保证苏联军队自由通过拉脱维亚领土，以便把他们部署在拉脱维亚最重要的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实施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和制止针对苏联驻拉脱维亚卫戍部队的挑拨性行为。

苏联政府认为，这些是执行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最起码的

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苏联－拉脱维亚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忠实和善意地执行。

苏联政府期待拉脱维亚政府于6月16日晚11时前做出答复。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得到拉脱维亚政府的答复，就将被看做是拉脱维亚政府拒绝执行苏联的上述要求。

№05686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进驻爱沙尼亚与 列伊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14时39分，莫洛托夫同志召见爱沙尼亚公使列伊，向他声明，公使大概已经知道，莫洛托夫同志将同他谈什么。列伊打断了莫洛托夫同志的话，回答说，他已经知道，而且他本人想求见莫洛托夫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就此指出，他本人感到惊讶的是，公使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列伊称，爱沙尼亚政府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发布必要的指示，因为没有苏联对爱沙尼亚政府声明的完整文本。然而委托他声明，爱沙尼亚与立陶宛没有任何联盟。

莫洛托夫同志打断列伊的话，请他就此问题听取苏联政府的声明。宣读完苏联政府的声明，莫洛托夫同志把声明的文本交给了列伊（文本附后）。

听完莫洛托夫同志宣读的苏联政府声明后，列伊声明说，爱沙尼亚政府忠实地执行苏联—爱沙尼亚的互助条约。公使提醒说，在秋天就条约进行谈判时，就提到了与拉脱维亚的军事联盟，当时苏联政府并没有要求取消它。公使本人认为，当然，由于签订了爱沙尼亚—苏联互助条约，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联盟就失去了意义。

莫洛托夫同志声明说，如果说曾经提到过爱沙尼亚与拉脱维亚的联盟，那么从来也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这个联盟可以扩大。在莫斯

科与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的谈判向我们证明，波罗的海协约国的活动在互助条约签订后表现得更加活跃。总参谋部的互相访问，建立专门的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等都证明了这一点。军事联盟正在搞某种阴谋活动，并且这些都背着我们，把它隐藏起来了。

关于波罗的海协约国表现日益活跃，梅尔基斯本人在《波罗的海评论》的文章中就曾公开这么声称。

列伊指出，梅尔基斯在《波罗的海评论》中表达的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除上述一切外，还可以补充的是，最近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开始交换武官等等。此外，我们还知道那个声明，其中直接说，鉴于维尔纽斯交还立陶宛和克莱佩达问题的解决，立陶宛加入这个联盟的障碍消失了。莫洛托夫同志问列伊，照你们看来，军事联盟难道是儿戏？

此后，莫洛托夫同志警告公使，如果 24 小时前得不到爱沙尼亚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就采取它在声明中指出的措施。

列伊问，苏联军队将占领那些地方？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爱沙尼亚的主要城市，包括塔林。

列伊想问什么，开始说“是否可以……”。

莫洛托夫同志打断了他的话说，不行，不行。

于是列伊说，要知道爱沙尼亚政府没有允许像立陶宛那样的挑衅活动。

那么军事联盟呢？莫洛托夫同志补充问道，他个人对公使本人没有任何成见，他并且相信，爱沙尼亚还有他这样的人。但是，爱沙尼亚现政府对苏联不友好。

列伊重新谈到与立陶宛的军事联盟，声明说，对立陶宛政府总是要求接纳它加入军事联盟的所有暗示，爱沙尼亚总是拒绝它。

看到莫洛托夫同志不想继续谈这个问题，列伊请求解释，该怎

样理解新政府，苏联政府是否已有人选，等等。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现在重要的是在原则上解决这个问题。对所有其他问题然后与总统详谈。将给我国的全权代表发出相应的指示。

列伊表示担心，说提出答复的时间太少。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对此无能为力。

离开前，列伊问，将有多少军队进入爱沙尼亚？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约2~3个军。莫洛托夫同志并且告诉公使，这些措施是临时的。

谈话记录 谢·科济列夫

附 录

依据苏联政府掌握的事实材料，以及在最近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与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梅尔基斯先生在莫斯科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苏联政府认定，爱沙尼亚政府不仅没有取消早在签订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之前与拉脱维亚建立的反苏军事联盟，反而扩大了它，不仅把立陶宛吸收进这个联盟，还极力把芬兰也拉进去。

在1939年秋，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签订前，苏联政府对存在这样的军事联盟故作不知，尽管实质上它与早先签订的苏联—爱沙尼亚互不侵犯条约相抵触。但在苏联与爱沙尼亚的互助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认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间还存在反苏军事联盟不仅是不能容许和不能容忍的，而且是对苏联边界安全构成的极其严重的威胁。

苏联政府曾希望，苏联与爱沙尼亚互助条约签订后，爱沙尼亚

会退出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联盟，从而使这个军事联盟消亡。但与此相反，爱沙尼亚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反而着手复活并扩大上述军事联盟，比如，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于1939年12月和1940年3月召开两次秘密会议，形成了与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扩大的军事联盟。背着苏联加强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总参谋部的直接联系；1940年2月创办了波罗的海军事协约国的专门机关刊物《波罗的海评论》，用英文、法文和德文在塔林市出版，等等。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爱沙尼亚政府粗暴地破坏了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因为该条约禁止缔约双方“缔结某种军事联盟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另一缔约方的同盟”（见条约第四条）。

爱沙尼亚政府粗暴地破坏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正是在苏联奉行和继续执行极其友好和明确的亲爱沙尼亚的政策，逐条地执行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一切要求的时候。

苏联政府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

苏联政府认为十分必要和刻不容缓的是：

第一，立即在爱沙尼亚组成能够和准备忠实地执行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的政府；

第二，立即保证苏联军队自由通过爱沙尼亚领土，以便把他们部署在爱沙尼亚最重要的中心，其数量足以保证实施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并制止针对苏联驻爱沙尼亚卫戍部队的挑衅性行为。

苏联政府认为这些是执行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最起码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苏联—爱沙尼亚互助条约就不能得到忠实和善意地执行。

苏联政府期待爱沙尼亚政府于6月16日晚12时前做出答复。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得到爱沙尼亚政府的答复，就将被看做是爱沙尼亚政府拒绝执行苏联的上述要求。

№05687

莫洛托夫关于苏军进驻拉脱维亚与 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19时45分，拉托维亚公使科钦什来见，通报说他已经与里加联系上了，向本国政府转达了苏联政府的声明，得到如下答复：

1. 拉脱维亚政府准备保证苏联军队自由进入拉脱维亚，然而，由于今天是拉脱维亚的重要节日，在洛加什地区聚集了大量公民，他们将在那里呆到深夜，这使拉脱维亚政府担心，由于大批人聚集，会不会在进入拉脱维亚的苏军与过节的人们之间产生某些不希望出现的事故。所以，拉脱维亚政府请求把军队进入时间延期到6月17日早晨前。

此外，拉脱维亚政府请求指出苏军在拉脱维亚领土上行进的
道路。

2. 由于不是拉脱维亚政府的全部成员都在位，不够通过关于
现行政府辞职和关于召集新政府的决定的法定人数，拉脱维亚政府
请求向它提供一个机会发出通知，晚上8时前将召集到法定人数。

此外，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请求通报，他将与谁就组成新政府
进行接洽。

3. 拉托维亚政府请求不要在报刊上公布苏联政府的声明，因
为最后通牒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不公布这个声明对两国政府的关系
有益一点。

在答复中，莫洛托夫同志指出，苏联军队明天，即6月17日

早晨 3~4 时开始进入拉脱维亚，所以军队进入不影响过节。

关于苏军将要通过的道路，莫洛托夫同志与科钦什商定，双方将任命全权代表，他们彼此将就这些问题进行协商。1~2 个小时之后交换全权代表的姓名。

莫洛托夫对科钦什声明，苏联政府将向拉脱维亚政府发出一份专门呼吁书，要它向地方当局和居民发出指示，不要在苏联军队进入拉脱维亚时产生某种误会。

关于拉脱维亚政府的辞职问题，莫洛托夫同志声明，既然法定人数晚上 8 点能够达到，那么科钦什在期限到来前来得及给予答复。

至于总统请求通知，他能够就组成新政府问题与谁进行接洽，那么，会把这个人通知他的。

莫洛托夫同志拒绝科钦什的不公布苏联政府声明的请求。于是科钦什请求莫洛托夫同志拖延一段时间再刊登声明。莫洛托夫同志问，拉脱维亚政府希望拖延多长时间公布声明，科钦什没有回答，说他难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因为没有向他指示这个期限。

莫洛托夫同志答应公使，把不公布声明的请求向自己的政府报告，然而，他不能承诺会肯定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能成为秘密。

谈话记录 科济列夫

№05688

莫洛托夫关于拉脱维亚新政府与 科钦什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2时40分，科钦什来见，并根据自己政府的委托声明说，所有内阁成员（六人）除了两名内阁成员尚未回到里加外，都已经辞职。这样，科钦什正式向莫洛托夫同志通报说，苏联关于政府的要求已经被接受。

随后科钦什说，塔林委托他打听，关于新政府的构成，总统应该与谁联系。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明天，即6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维辛斯基将去里加，他将和全权代表捷列维亚斯基同志一起与总统就新政府问题进行谈判。

科钦什证实了拉脱维亚政府关于苏联军队自由进入拉脱维亚的决定。科钦什就此通报说，拉脱维亚方面授予总参谋长助理乌登第内什上校全权与苏军指挥部联系。

科钦什请求在早晨9时前不要开始越过边界，因为要接纳苏联军队，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

莫洛托夫同志声明，关于苏联军队越过拉脱维亚边界的时间和地区，他将另外通报科钦什。苏联方面任命巴甫洛夫将军为全权代表。

随后，科钦什打听他关于不公布苏联政府声明的请求有何结果。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向苏联政府报告了公使的请求，后者认为不公布声明的最后通牒部分是可能的。

科钦什请求发表这样的公报，其中简单地说，根据苏联政府的建议，拉脱维亚政府同意扩大苏联驻拉脱维亚军队的人数。

莫洛托夫同志问：那么关于政府呢？

科钦什回答说，第二点应该说，拉脱维亚政府已经辞职。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不能回避声明中提到的那些事实。所以声明应该公布，只是删掉结尾部分，即最后通牒部分。在这个声明的结尾将说，拉脱维亚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声明中提出的条件。不能接受公使不公布这个声明的建议，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对社会舆论隐瞒问题的实质，他们将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问题从哪里来的。尤其不希望对此问题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问题的实质是明摆着的——这就是军事联盟。试问，为什么需要这个联盟，为什么必须把立陶宛吸收进这个联盟？等等。

科钦什试图再次证明，拉脱维亚政府对苏联友好。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当然，在拉脱维亚有人对苏联很好。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你们有个巴拉基斯将军，他对苏联很好，可是你们把他撤了。还有干嘛要开这些秘密会议，总参谋部互访，创办波罗的海协约国专门的机关刊物，立陶宛被吸收进军事联盟等？

科钦什以拉脱维亚政府的名义声明说，立陶宛没有进入联盟。

莫洛托夫同志向公使指出，“您说的是您的政府委托您说的，而不信任这个政府。您声明的是您的政府委托您声明的。您有义务做这件事，但是必须睁大眼睛看事情。拉脱维亚政府对苏联的态度不十分诚实，我们不久前在莫斯科与立陶宛总理梅尔基斯会谈时就确信了这一点”。

科钦什重新谈到自己日内向莫洛托夫同志发表的声明，他在与

莫洛托夫同志和捷卡诺佐夫^①同志的谈话中经常问：在两国相互关系问题上是否曾有过某种希望？他从未听说提出过某种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这些问题主要涉及的是一些现实问题。

谈话结束时将好，为了通报与苏联军队越过拉脱维亚边界有关的苏联的措施，科钦什将被另外召见。

谈话记录 科济列夫

^① 捷卡诺佐夫，时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05689

莫洛托夫关于爱沙尼亚组成新政府与 列伊的谈话记录

(1940年6月16日)

23时，爱沙尼亚公使列伊来见，他声明说，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接受了苏联政府声明中提出的条件。爱沙尼亚政府已经辞职。列伊补充说，没能早点做出答复是因为总统正在休假，回到塔林需要一定的时间。

随后，列伊声明，根据爱沙尼亚宪法，在新政府组成前，旧政府将履行自己的职责。

然后，列伊询问与苏联军队越过爱沙尼亚边界有关的实际问题。

莫洛托夫同志回答说，他将另外召见列伊，给他答复。苏联军队越过爱沙尼亚边界将在什么时间和经过什么地点。

为了与爱沙尼亚指挥机构代表联系，苏联方面任命了梅列茨科夫将军为全权代表。

谈话记录 科济列夫

№05690

捷列维亚斯基关于苏军进驻拉脱维亚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40年6月18日)

只是到6月17日中午12时，才在广播中宣布并在晚报上公布了我国的照会和拉脱维亚政府的答复。约下午1时，先头坦克部队开始进入里加，迅速占领了城市及其最重要的地点。拉脱维亚当局没有料到我方来得如此快，行动如此神速，因为12时30分，乌尔马尼斯还在城市的大街上平静地乘车兜风。我军的部署是由罗济奥诺夫同志根据自己的系统转交的。居民热烈地欢迎我国军队。人群中发出欢呼声“谢谢把我们从走狗的制度中解放出来，打倒战争的贩子！”等等，还喊着“乌拉”向苏联、红军和斯大林同志致敬。群众围住了坦克，拥抱和亲吻红军战士，并敬献鲜花。在个别地方试图组织游行示威。人群中打出了红旗。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冲突中，计有30多名警察受伤，受伤的群众也又同样数量。我正在核实这些情报。晚上8时下班后，特别多的示威者集聚起来。运动具有自发性。拉脱维亚当局试图把军队和坦克开到街上，对付示威者，但是根据我们的要求，他们撤走了。我们的指挥人员采取措施，恢复了城市的秩序。我们的指挥员对居民有足够的号召力——请要保持平静和秩序，于是在30分钟内就完全恢复了秩序，晚上11时市内已经平静。一夜平静无事。我和我的指挥机关要求拉脱维亚当局把他们在我们军队进入后从军营中调来的似乎是维持秩

序的炮兵从里加撤出去。几乎没有穿制服的艾兹萨尔格^①出现，但是今天在拉特加利亚郊区部属了由正规军和警察组成的加强卫队。我和指挥部要求不要用武力镇压示威和骚动，如果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没有获得从6月17日夜到18日晨到住宅抓人的情况。据从列热茨市传来的情报说，在拉特加利亚红军部队受到了特别热情洋溢的欢迎，欢迎群众呼喊欢迎口号和打着红旗。开始当局没有阻拦，但是过了一会，警察开始压制欢迎热情，并拘捕了一些人。在列热茨，因此而发生了与警察与士兵的冲突，然而没有开枪。今天6月18日，等待着组成新政府，在国内建立新的制度，其中包括是否将释放政治犯。城市中一片欢腾。发生了抢购商品和食品事件。传来了在城市郊区和工人住宅区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所有的企业和机关，包括银行，电话和电报局都在正常运转。昨天晚上我们允许电台广播，条件是转播节目之前要与我们协商，不允许转播反对苏联和红军的报道。今天早晨港口恢复了正常工作。要求颁布一项专门命令，禁止在商店出售货物时只接受苏维埃纸币而不接受当地货币，立即得到了执行。要求组成专门机关向我国部队供应一切必需品，该机关由加尔特马尼斯将军担任领导。总统和部长们目前仍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捷列维亚斯基

^① 即拉脱维亚正规军士兵。

№05691

**捷列维亚斯基关于里加局势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节录）**

（1940年6月19日）

里巴瓦的工人们打着红旗上街示威。内务部和拉脱维亚军队指挥部向警察下达命令，不允许示威并调来了卫戍部队。我要求拉脱维亚当局不要妨碍和平示威，无论如何不要使用武力。不要用警察措施激怒群众。向我们在里巴瓦的指挥部也下达了命令，以保证进行示威的和平环境。

№05692

尼基金关于塔林局势 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节录）

（1940年6月26日）

……

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爱沙尼亚政府辞职和补充一定数量的军队进入爱沙尼亚共和国领土的要求使统治者马上清醒了，凯撒资产阶级人士的军事狂热冷却了，迫使他们迅速地接受了所提出的条件。晚上8时，外交部长皮普召见我，声明说“爱沙尼亚政府同意辞职，同意数量上足以保证条约执行的红军进入爱沙尼亚领土”。同时皮普向我通报，拉多涅尔将军根据总统的委托要与我谈话。这是前政府的第一个企图，他们重新判定了方向，作了改组，试图保持原来的立场，继续执政。拉多涅尔将军告诉我，他是根据总统个人的委托行事的，十分保密，他问我“苏联政府是否认为整个爱沙尼亚政府执行条约不力，所以它应该退出舞台，或者是它看到因为个别人士没有充分执行互助条约，应该由这些人承担全部责任？”我回答他说，我只能重复莫洛托夫同志在将声明转达给爱沙尼亚政府时说过的一句话：爱沙尼亚共和国政府应该辞职，因为它不能保证执行1939年9月28日所缔结的互助条约。

“既然条约没有得到执行，所以从总理开始，所有的人都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随后拉多涅尔试图向我打听，苏联政府希望任命谁为总理，因为他们（爱沙尼亚人）不想重复立陶宛的错误。我回答说，现在我

不能就这个问题说出任何明确的东西。

在日丹诺夫同志到来前，爱沙尼亚政府对既成局势举行过一系列会议。就新政府人员构成讨论了一系列方案，并提出了主持新政府的各方面人士：列伊、扬·托尼逊、巴尔瓦得列等人。据说，皮亚特斯在会议上似乎声明，他不允许苏联政府把自己的候选人强加于他。国民经济部长谢普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卡·皮亚特斯毫不抵制地同意苏联提出的要求，那么这是明智的，否则事情就会恶化。列伊关于日丹诺夫将到达以组成爱沙尼亚新政府的最后一封电报结束了关于这个内容的一切争论，仅仅存有一丝微弱的希望：也许可以玩点花招，能够保持以列伊为首的政府（他们对此寄予很大希望）。

三、日丹诺夫同志行将到达和拉多涅尔—尤利马政府辞职的消息像闪电一样迅速地传遍了爱沙尼亚。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马上行动起来。尽管总司令拉多涅尔将军根据“加强保卫条例”发布命令禁止各种集会，示威和游行，工厂的工人们开始集合起来，要求让他们能够讨论苏联的要求，因为他们希望对尤利马政府破坏与苏联的条约表达自己的态度。

警察开始驱散这些集会，甚至进行了逮捕，但是人民感觉到了苏联的支持，全体群众向往自由，他们试图以这种未经官方许可的方式参与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

卡普里区（工人区，在沙皇时期是造船厂）的事件特别说明问题。这里部署有红军部队。老工人聚集在红军战士旁边，年轻人也加入进来，参与了谈话。工人们公开地说：“红军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另外一些人说：“这里有没有我的儿子？他去了俄国，也应该在红军中当兵。”有一个便衣特务隐藏在人群中，大喊：“红军来了又怎么样，它还会从这里飞走，就像1917年飞走一样。”工人们顺着这个声音看见了他，许多人都认识他，一个工人按捺不住说：

“你昨天还穿着警察制服，怎么今天就改头换面了？”那个特务吹了一声口哨，警察跑到他跟前，抓住并殴打那个工人。工人们相信，人们不会冤枉他，就抓起石头打警察。他们抓住了他并拖到管区。所有这些事发生在红军指挥员眼皮底下，不过他们没有干预。警察看到红军这种态度，胆子大起来，在另一个地方逮捕了15人。国家杜马成员文特等人进行了干预，过了一夜，被捕的人全部获释。

四、日丹诺夫同志的到达和来自莫斯科的不允许对警察镇压采取消极态度的指示使局势急剧变化。所有的工厂开始了广泛的集会，从6月19日到20日晨持续了一整夜，遍及爱沙尼亚全国。拉多涅尔-尤利马政府亲眼看到，它不能保住任何阵地，因为传说苏联政府将亲自参与爱沙尼亚政府的组织，这个消息传遍了最偏僻的角落，到处得到了同情的欢呼，但是在个别人头脑中却有着十分错误的看法。部分人不理解我们的政策，把更换政府看做是革命，把6月20日的示威游行注入了十月革命的成分。6月21日下午13时前，我们应该去见共和国总统卡·皮亚特斯，以提出总理候选人约·瓦列斯-巴尔巴鲁斯。中午12时，开始了示威游行。工人们唱着革命歌曲和苏联歌曲“我们的祖国多辽阔”和“卡秋莎”等，高举着自己旧的职业旗帜，步调一致地前进。当队伍路过苏联全权代表处时，人群中总是发出欢呼声“乌拉”和“斯大林同志万岁”！日丹诺夫同志从阳台上向他们致意。

示威游行期间，我们去见总统。他非常惊慌失措地迎接我们。惊慌的原因是，我们到达前，工人正到总统府示威。队伍在总统府前停下来。人群中走出演说者，他们向总统提出请愿书，要求：（1）解散拉多涅尔-尤利马政府；（2）释放政治犯；（3）给工会自由。

卡·皮亚特斯走上阳台，向示威者发表声明说，他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因为这是未来政府的事情。这时从人群中走出一人，他

面对群众说“同志们，你们认识我吗？”大家齐声回答说“认识，认识”。“既然你们认识我”，演说者继续说，“那么就不应该相信这个滑头。让我们分成三路，一部分去弹药库，夺取武器，另一部分去监狱释放政治犯；第三部分占领邮局、电报局和警察局”。示威者们听了这个号召，马上就去执行。

皮亚特斯听到这些吓坏了，当我们走到他跟前，他才稍微恢复了知觉，惊慌失措地重复“我们古怪的人民，一点儿组织性都没有”。我们提出的总理候选人约加涅斯·瓦列斯（巴尔巴鲁斯），他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并且惊慌地重复“只是请尽快组织政府，恢复一切秩序”。我们的拜会不到8分钟就结束了。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我们用于最终组成爱沙尼亚政府。……

十一、示威的教训。

正如我上面提及的那样，6月21日下午1时根据一个演说者的号召，示威的工人离开总统府：一部分人去夺取军火库，另一部分人占领警察局，其他人去监狱释放政治犯。塔林市其他公民沿路加入了队伍。

示威者沿路停下，举行短暂的集会然后继续前进。约3时或4时，人民运动越出了示威的范围。占领了武器库，分发了武器，警察惊恐地作鸟兽散，到处躲藏。城市不知不觉地落到了武装工人和其他公民手中。和平进行的示威忽然变成了革命行动，原因何在？

原因就在于，可恶的拉多涅尔-尤利马制度20年来把城市和乡村居民激怒到这样的程度，只要稍有可能他们就会起来对付自己的奴役者。还有一点是，长期沉默之后，他们一下子跑到街上，成了自由的公民，仅此一点就足以空前提高示威者的情绪。激昂的情绪在他们路过全权代表处大楼就感觉出来了。卡·皮亚特斯的讲话激怒了示威群众，热情洋溢的演说者则火上浇油。这里必须提及军政治部主任伊凡诺夫同志，他不理解当时的局势，决定进行革命，

并对示威者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演说的确极大地鼓舞了示威者的情绪，而不知怎么融入示威者中的装甲车加强了这种情绪，又受到模仿伊凡诺夫同志的其他演说者的鼓动，人们越出了界限。开始了逮捕。工人确实有高度组织性的。他们迅速选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他们肩膀上披着红色绶带，建立了革命秩序。老工人们立即登记加入了近卫军，肩上挎着步枪，领头巡逻，以保卫最重要的机关。

挑拨分子利用这个机会，唆使居民起来报仇。6月20日晚上过得不平静。在某些地方，爱沙尼亚军官向我们的军队和坦克所在地射击。在部队医院有射击（打枪的是军队医院的委员会和两个爱沙尼亚军人），在军校也有射击（我们的军队不得不解除军校中400人的武装），商务代表处遭到枪击（打枪的是凯撒立陶宛人）。战士和军官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迅速做出决定，消灭武装军官、凯撒立陶宛人和前政府准备的反苏组织的埋伏点。

在寻找和消除潜在的武装冲突发源地时，工人自卫队给予了积极协助。在敌对行动中，出现了牺牲，10名爱沙尼亚工人负伤，2~3人被打死。

6月21日晚上，日丹诺夫同志召见了文特，命令他制止革命行动，解除工人自卫队的武装。6月22日晚上采取了措施，次日早晨恢复了平静。但是前政府被这场运动吓坏了，他们惊恐地向全权代表处打电话，请求保卫。拉多涅尔将军通过电话向我提出请求，卡森卡米尔将军打电话，甚至请求派装甲车去保卫“人们想冲击”的军事部。

约晚上6点钟，在肩膀上披着红色绶带的工人全权代表的陪同下，罗特别尔格将军来到全权代表处领事处，经过与他谈判，我们把确定他为军事部长候选人。

我认为，这里的结论是：（1）工人运动的领袖：文特、鲁斯、

安德列捷对示威游行放任不管；(2) 我们也有过错，没有牢牢控制住工人运动的领袖；(3) 政治部主任伊凡诺夫同志没有任何权利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并号召采取革命行动。

十二、我们在现阶段的任务：

因为爱沙尼亚居民对我们非常友好，非常信赖，这种信赖的关系必须发展和巩固，因为我们在目前：

第一，用自己的建议帮助新政府实现它拟订的宣言。

第二，在开展军事建设时，千方百计地吸收爱沙尼亚工人，从而消除失业。

第三，在爱沙尼亚全国发展与苏联友谊协会网络，把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吸引到这个网络中，组织图书馆网络，举行苏联电影展，把我们苏联最好的演员，歌唱家和音乐家派到爱沙尼亚所有的城市。莫斯科应该千方百计地帮助我们。

第四，在组织中的俄文报纸上，广泛地发表有关苏联在国民生活的一切领域（技术、文化和艺术）建设的文章。

第五，由于工作量的增大，也必须扩大我们的机关。现在我重新提出必须在纳尔瓦开设领事馆的问题。它距离塔林 25 公里，在全权代表处没有多余人手。我们极少去那里，我们对这个地区还没有详细地研究，但我们在最近的将来需要它。

第六，必须有一个人，他能够直接帮助全权代表处对爱沙尼亚领土上的各种苏维埃工作进行监督。

第七，由于在集会上工人提出了组织合法共产党的要求，必须考虑这个问题。

苏联驻爱沙尼亚全权代表 尼基金

№05693

**立陶宛群众在玛利亚木波尔集会上
通过的决议（节录）**

（1940年6月29日）

1. 剥夺地主的土地及动产和不动产，把这一切交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2. 立即没收逃跑的人民敌人的财产。
3. 禁止强行将人们从住宅中迁出，把房租降到最低限度。
4. 医院收费处民主化，完善医疗救护，收费合理，并特别使低收入的人更容易接受，免除工人在医院收费处交款。
5. 消灭剥削劳动人们辛迪加。
6. 废除低收入工人的劳动收入累进税。
7. 重新审查雇工法，取消各种“工作分配”部门，取消反对工人的条款。
8. 保证失业者有工作。
9. 立即实行8小时工作制。
10. 惩罚诽谤者，投机者和挑拨者。

№05694

立陶宛人民政府关于议会选举的宣言

(1940年7月5日)

告立陶宛人民书

西蒙敦制度垮台后组成的人民政府在其存在的不长时间里，就实施了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健康化的一系列刻不容缓和首要的措施，打碎了束缚和奴役立陶宛劳动人民的奴隶制枷锁。现在政府转向了同样重要的任务——对国家生活的一切领域举行进一步的改组。但是在着手这个工作之前，人民政府想向自己的人民报告它所做的工作。然后它想听取我国人民的真正意志和愿望，以根据他们的倡议和在他们的支持下，继续自己的工作，建设祖国和平而幸福的生活。

民族党金融寡头政治的政府及其专制制度，只为一小撮人发财致富服务，他们害怕人民代表机构。因此，他们10年多没有召集议会，随后通过选举法则对包含某些民主和给议会某些权利的条款连提都不提。

人民政府认为必须制订一部选举法，使选出的议会与人民休戚与共，成为真正民主的、反映我国劳动人民意志的机关。

政府决心毫不动摇地与人民保持密切联系，做好自己的国家工作，特此决定：

1. 颁布新的人民议会选举法；
2. 宣布新的人民议会选举；
3. 组成主要的选举委员会；

4. 考虑到国家刻不容缓的任务，把人民议会选举日定在 1940 年 7 月 14 日。

代理共和国总统、总理 尤·巴列茨基斯

№05695

捷卡诺佐夫和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 选举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节录）

（1940年7月9日）

竞选运动以正常速度进行。紧随着最高选举委员会的建立，到7月6日傍晚，又建立了区选举委员会。7月8日，组成基层选区委员会的工作大体结束。最高选举委员会已经对选举法作了通俗的解释。吸收了报刊、广播为竞选服务。根据竞选计划，7月11日将有约1000~1500人组成的大型农民代表团抵达考纳斯，与考纳斯的劳动人民和士兵会面。对这件事给予了很大关注。拟于这几天在考纳斯开设农民之家。

7月7日，在维尔纽斯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参加者近8万人。提出的主要口号是“苏联的第13个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斯大林同志万岁！”等。约有3000名士兵有组织地参加了集会和示威游行。在集会上通过了向苏联和红军致敬的决议。随后提名和通过了《劳动联盟》集团提出的议会候选人。集会后，集会参加者们排着秩序井然的纵队在维尔纽斯大街上游行。示威者们和苏联领事馆及指挥部的代表互致问候。示威游行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故。例如，聚集在教堂周围的人群中，有人提议士兵们唱教堂赞美歌。被士兵们拒绝了。于是人群开始祈祷，并同时向士兵们投掷了几块石头。晚上，原波兰政府的政党代表与具有左倾情绪的工人之间发生了打斗，没有重伤。7月7日，为了答谢白俄罗斯军区红军歌舞团的演出，立陶宛军队举行了业余文娱音乐会。立

陶宛军队以有组织的纵队出现在音乐会上，他们打着红旗，喊着政治口号，举着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季米特洛夫的画像。士兵纵队沿途受到热烈欢迎。立陶宛军队开始的业余音乐会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立陶宛军人和当地居民参加的集会。立陶宛方面参加音乐会集会的有总统、一些政府成员、将军们的代表，苏联方面出席的有笔者，全权代表处和苏联指挥部的工作人员。

来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为遣送波兰被拘押者的特别代表今天与立陶宛当局进行了接触。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7月10日开始，7月13日结束装载和遣送被拘押者工作。经调查，大量波兰军官的家属也来了。我们对他们进行准确的统计，如果人数不多，就把她们也一起遣送，如果多的话，就向你们请示。

每月发给驻立陶宛苏联军人的工资基金约为500万立特。然而，以前为一个军确定的军人专门商店购买当地日常消费品的每季度4.4万立特的限额将继续存在。

这样就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军官和士兵有钱，但是禁止他们在普通商店买东西，军人专门商店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为该商店无法采购足够的货物，请求把军人专门商店采购地方日用品的限额扩大到500万立特，并指示立即发放。

在竞选的日子里，群众的情绪普遍高涨，如果借此展示苏联的艺术就太好了。为此目的，苏联演员到立陶宛演出是非常合适的。请求指示立即派米哈伊洛夫、列缅谢夫、诺尔诺夫、西列尔、达维多娃、鲁斯兰诺夫、科佐鲁诺夫和列别申斯卡娅和一个芭蕾舞团到立陶宛。^①

捷卡诺佐夫

波兹尼亚科夫

^① 文件上有莫洛托夫的亲笔批示：“给米高扬。我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尽可能派演员去）。维·莫洛托夫。”。

№05697

斯涅奇古斯关于立陶宛加入苏联 提交议会讨论的议案

(1940年7月21日)

斯涅奇古斯^①：代表同志们，我们通过了格里加拉维丘斯代表就立陶宛国家制度问题的提案。我不怀疑，人民议会作为人民意志和人民愿望的真正体现者，它会顺应全体立陶宛人民的要求，实行世界上最民主的苏维埃制度，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同志们，如果我们仅限于解决这个问题而在中途停止的话，我们就对立陶宛人民有罪。

立陶宛全体劳动人民今天都要求并入强大的苏联民族大家庭。
(鼓掌)

所以，我们考纳斯、维尔纽斯和斯亚乌梁选区的代表们商量以后，决定把并入苏联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在立陶宛实行苏维埃政权，还不能为社会主义的立陶宛免遭帝国主义对它生存的蓄意侵害提供可靠的保障。

在自己身上戴过外国枷锁并饱受战争和占领磨难的立陶宛人民知道，只有加入苏联人民的兄弟大家庭，它的生存才能得到这样的保障。(鼓掌)

代表同志们，我们大家应该明白，如果立陶宛人民希望幸福和自由地生活的话，它就只有这一条路。这条道路就是加入苏联。任

^① 阿·斯涅奇古斯是立陶宛人民议会的代表。

何其他的道路对我们国家都是死路一条。(鼓掌)

所以，我以考纳斯、维尔纽斯和斯亚乌梁代表团的名义，提议把立陶宛加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鼓掌)

7月21~23日人民议会第一次会议速记记录

№05698

捷卡诺佐夫和波兹尼亚科夫关于立陶宛 选举致外交人民委员部电

(1940年7月21日)

7月21日莫斯科时间18时，人民议会工作的第一天结束。

代理总统职务的巴列茨基斯的开幕词多次被响彻整个大厅的向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苏联政府和红军致敬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

然后听取了报告，就今天议程的头两个问题通过了宣言。

1. 关于立陶宛的国家制度。

2. 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入苏联。

无论是报告、还是宣言都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

宣言在议员和来宾强烈而持久的鼓掌欢呼声中得到一致通过。

议会的工作一直是在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团结一致的气氛中进行的。

由于下雨，考纳斯劳动人民今天准备的示威游行和与议员的见面被迫延期。所以，关于议会第一批决议的报道也只好通过无线电广播进行。

捷卡诺佐夫
波兹尼亚科夫

【专题说明】

苏联与 1944 年的华沙起义

(1944 年 7 月至 10 月)

1944 年 8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在华沙爆发了一场反对法西斯德国占领者的武装起义。起义是在苏联红军和波兰人民军逼近华沙，且得到苏联支持的波兰人民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刚刚宣告成立的背景下发动的。而充当起义主要力量的，是驻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所属的国家军，其意图是要抢在苏军到来之前夺取华沙，迎接流亡政府回国执政。这次起义无论是对苏联在华沙方向的军事行动，还是对波兰未来的政治走向，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引起苏联、英美盟国以及波兰不同政治力量的极大关注。本专题收集了起义过程中及失败后，苏英美三国之间就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援助展开交涉的来往信函，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与斯大林等人的会谈记录，距华沙最近的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整理的情报报告，以及镇压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华沙区总督菲舍尔给上司的报告。这些文件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华沙起义的组织过程、领导者的目的、外界的援助以及失败的原因等多方面情况。

(本专题文件由吴伟编辑和校注，参加翻译的有安方明、王奂、李多鹤、乔立良、吴伟、周绍珩、袁瑶等)

№07917

莫洛托夫与米科拉伊奇克会谈纪要

(1944年7月31日)

莫斯科

1944年7月31日21时

出席会谈的还有格拉勃斯基、姆尼舍克和罗麦尔^①。

米科拉伊奇克^② 问候莫洛托夫。

莫洛托夫说，欢迎米科拉伊奇克到莫斯科来。

米科拉伊奇克对在莫斯科期间为他提供的一切表示感谢。同时，他提出与约·维·斯大林进行会晤的请求。不久前，格拉勃斯基已将米科拉伊奇克的这一愿望告知列别杰夫。^③ 现在，他（米科拉伊奇克）想谈两点。

第一，波兰政府现正积蓄力量，以便在苏军同德军作战的关键时刻协助苏军。波兰政府和不久前从波兰来的塔鲍尔^④ 将军一起研究了波兰人的行动计划，并建议英国政府将该计划转交苏联政府。

去年10月，所有波兰武装力量得到命令，要他们与苏联武装力量联合作战。也许维·米·莫洛托夫已得到消息，联合作战已经实

① 格拉勃斯基为波兰流亡政府民族委员会主席，罗麦尔为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长，姆尼舍克为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工作人员。

② 斯·米科拉伊奇克为波兰流亡政府总理。

③ 维·扎·列别杰夫，苏联驻伦敦联合流亡政府大使。

④ C. 塔塔尔，化名塔鲍尔，波兰流亡政府武装力量司令部作战处处长。

现。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是有一些消息，但却不是这样的。

米科拉伊奇克说，波兰政府已预先制定了动员所有力量对德军作战的计划。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和波兰政府间重要的是找到共同语言，以便为今后波苏间的友好合作奠定基础。他（米科拉伊奇克）得到几乎全体波兰人民的信任，波兰人民是支持他的。他（米科莱奇克）是代表那些希望同苏联合作并与那些不太想同苏联合作的政党进行斗争的波兰政党。

莫洛托夫指出，他不完全明白米科拉伊奇克所说的。波兰政府中有不同党派，其中包括这样一些持无可争议的敌对态度的党派。

米科拉伊奇克声明，波兰没有这样的党派。政府中的四个党派^①都希望与苏联合作。

莫洛托夫说，这个问题最好放一放。

米科拉伊奇克指出，他相信苏联和波兰政府间没有大的分歧。他（米科拉伊奇克）希望同苏联政府商谈所有事情，并使苏联政府相信波兰政府的诚意。

莫洛托夫表示，最好和波兰民族委员会谈判。^②

米科拉伊奇克声明，正如他所考虑的，他最好同其英勇的军队

① 指组成波兰流亡政府的四个党派，即国民党（由国家民主党改组而成）、劳动党（由基督教民主党等组成）、农民党和社会党。本专题文件中出现的“波兰政府”、“在伦敦的波兰政府”、“伦敦波兰政府”、“伦敦政府”等均指波兰流亡政府。

② 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7月22日，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颁布法令，成立了行使临时政府职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同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兰的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会执掌解放区政权；认为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是非法政权。苏联政府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8月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迁往卢布林市，以此为波兰的临时首都。本专题文件中的“卢布林委员会”、“卢布林政府”、“波兰委员会”等均指此。

正在打击德国人的苏联政府谈判。苏联政府正显示出自己领导欧洲的国家实力。当他（米科拉伊奇克）谈到这个历史时刻时，他想强调，如果苏联政府慷慨地愿意接受波兰政府，那么波兰人民将与苏维埃俄国结盟。如果他（米科拉伊奇克）去同民族委员会谈判，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结果。

莫洛托夫回答说，他认为，米科拉伊奇克最好同更熟悉波兰情况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他（莫洛托夫）想补充一点，斯大林元帅通过丘吉尔告知 he 可以与米科拉伊奇克会晤这一点，仍然有效。由于斯大林元帅军务繁忙，他可能如他（莫洛托夫）根据莫斯科的情况做出安排的那样在周三或周四接见米科拉伊奇克。他（莫洛托夫）将向约·维·斯大林转告米科拉伊奇克拜会的请求。

米科拉伊奇克说，在答复莫洛托夫关于波兰委员会了解波兰状况的意见时，他想要指出，已在伦敦的波兰代表熟知波兰的情况。

莫洛托夫回答说，在波兰本土有比波兰代表知道的更多的消息。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并说，塔鲍尔将军可以随时从伦敦飞来，报告波兰的情况。波兰政府仔细考虑了在波兰全面起义的计划^①，并请求苏联政府轰炸华沙周围的机场。

莫洛托夫指出，到华沙总共只有大约 10 公里。

莫洛托夫问米科拉伊奇克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米科拉伊奇克表示他没有问题了，并愿意回答莫洛托夫的问题。

莫洛托夫问米科拉伊奇克是否还有其他愿望，他（莫洛托夫）

① 1944年7月下旬，波兰国内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地下武装力量——国家军领导人，制定了进行起义的计划。波兰流亡政府在7月25日举行的政府会议上讨论了该计划，决定流亡政府在国内的最高代表有权选定开始起义的时间。8月1日17时，国家军发动了代号为“风暴”的起义。

可以转告斯大林元帅。

米科拉伊奇克回答说，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愿望是请莫洛托夫转告斯大林元帅，他（米科拉伊奇克）是全体波兰人民意愿的代表。

莫洛托夫说，他已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米科拉伊奇克最好去会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米科拉伊奇克说，他打算同委员会对话。但是他很清楚，他和委员会只能讨论部分问题，而他同苏联政府可以谈判一切问题。

莫洛托夫说，同苏联政府应当讨论那些涉及苏联政府的问题。

罗麦尔问米科拉伊奇克是否可以给伦敦发一封密电。

莫洛托夫说，他想是可以的。

罗麦尔请莫洛托夫同志发出有关命令。

会谈持续了 30 分钟。

No 05329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关于援助华沙起义者 致红军总参谋部的信^①

(1944年8月9日)

莫斯科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

斯拉文少将^②：

英国司令部委托我把下面所附情报转交您

索斯科夫斯基将军^③ 请我们将苏军大尉卡卢金^④ 从在华沙的波兰国家军^⑤ 司令部获得的以下情报寄送给斯大林元帅。

情报开始这样写道：“我同华沙卫戍部队司令部进行了个人接触。这支部队进行着保卫家乡、反对希特勒匪徒的英勇的游击战争。

① 此信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阿·因·安东诺夫大将于当日呈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② 尼·瓦·斯拉文，红军总参谋部外事处主任，1944年9月任红军总参谋部外事局局长。

③ 卡·索斯科夫斯基，1943年7月起任波兰流亡政府武装力量总司令。

④ 康·安·卡卢金，苏军炮兵大尉，1942年被德军俘虏。次年他作为在苏军战俘中进行工作的“宣传员”来到华沙，年底与人民军和波兰工人党的代表建立了接触，受领并完成了人民军交给的任务。1944年7月底，他偶然来到华沙区国家军参谋部，表示希望与莫斯科，或是与正在逼近华沙的苏军取得联系，以一名苏联军官的身份通报华沙的情况。

⑤ 忠于波兰流亡政府的波兰国内武装力量。1942年2月组建，1944年发展到25万~35万人，是华沙起义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了解了基本战状后我得出结论：尽管部队和全体华沙公民表现出英雄主义，但他们还存在不足。如果能圆满解决这些不足，就会加快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

他们缺少自动武器弹药、手榴弹、反坦克武器。

把武器空投在：威尔逊广场、伊瓦里多夫广场、格托、克拉辛斯基广场、热拉伊瓦·布拉姆广场、拿破仑广场、波列士·莫卡托夫斯基、科布扎里·日瓦列夫杰夫（骑兵营房）、巴维斯尔及布耶拉尼。

识别的信号为：白色和红色条状。

德国空军摧毁了城市，屠杀平民。

请炮击华沙区的维斯杜拉桥、石头公园和耶路撒冷大道，这些都是德军活动的基本路线。敌人从阿基茨和皮耶拉尼机场开始轰炸。英勇的华沙居民相信，过几个小时，您会给予他们武器援助。请帮助我同罗科索夫斯基^①元帅建立联系”。就此结束。

总参谋部上校、陆军分部长官 拉·恩·布林科曼

①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该方面军是苏军在华沙方向的主力部队。

№02434

斯大林与米科拉伊奇克的谈话记录

(1944年8月9日)

莫斯科

1944年8月9日21时30分

出席者：波兰方面——格拉勃斯基、罗麦尔、姆尼舍克；
苏联方面——莫洛托夫同志、翻译帕甫洛夫。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感到十分荣幸，斯大林元帅不顾自己工作繁忙，能在他（米科拉伊奇克）离开前接见他。昨天莫洛托夫就波兰流亡政府代表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谈判问题接见了他（米科拉伊奇克）。他（米科拉伊奇克）希望尽快到伦敦去，以便将这次谈判报告他的同事，因为他没有把谈判进行到底的全权。他（米科拉伊奇克）相信，伦敦波兰政府将与委员会合作，因为波兰政府希望如此。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非常好。

米科拉伊奇克说，他的理解是，斯大林元帅希望波兰政府是民主的。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理解是正确的。

米科拉伊奇克说，斯大林元帅说过，波兰“向左倾了”。然而正如他（米科拉伊奇克）所理解的，这并不意味着波兰应该是共产主义的。他理解此话的意思是，波兰所有的民主党派应该彼此向对方伸出手来。

斯大林同志说，他正是这样理解的。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波兰政府已经从宪法中删去了所有反民主的段落。

斯大林同志问，是否能从宪法中删去一些段落。宪法是被接受还是被废除。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不打算保留 1935 年的宪法。^① 他将寻找到 1921 年宪法^② 基础上的途径。他（米科拉伊奇克）想着重指出，假如以 1921 年的宪法为依据有一位总统，他就不会有什么困难。然而他（米科拉伊奇克）不能现在选举总统，因为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他就会失去最高权力机构，这个最高权力机构现在是根据 1935 年的宪法而存在着的。按照贝鲁特^③ 的意见，这一最高权力机构是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④ 的形式存在的。他（米科拉伊奇克）认为，假如在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有代表的政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团结一致并组成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就找到了摆脱困境的最简单的办法。

斯大林同志指出，临时政府可以没有总统而存在。总统可以在以后，在普选后选举。

① 指 1935 年 4 月 23 日通过的宪法。该宪法把国家权力中心从议会转到总统手里，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同时对议会和公民的选举权给予很大限制。这是一部反民主的极权宪法。

② 指 1921 年 3 月 17 日通过的宪法。该宪法根据三权分立原则，对总统权力给予很大限制；议会不仅拥有全部立法权，而且还决定政府的工作方针；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这是一部比较民主的宪法。

③ 鲍·贝鲁特，波兰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

④ 1944 年 1 月 1 日在华沙秘密成立。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农民党、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青年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它以维护波兰民族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以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为自己的任务；宣布波兰流亡政府无权代表波兰人民。同年 1 月组建波兰人民军。得到苏联和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同盟的承认，成为与波兰流亡政府对立的权力机构。7 月 22 日，它颁布法令建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想请求斯大林元帅援助在华沙战斗的波兰人。

斯大林同志问：指什么样的援助？

米科拉伊奇克回答，是指援助武器。情况是这样的：德国人现在并不是强大到足以把波兰人从他们占领的华沙那些地区赶出去。波兰人需要武器是为了坚守阵地。

斯大林同志声明，他认为华沙的波兰地下军队所有这些起义举动都是不现实的，因为起义者手里没有武器，而德国人仅在布拉格^①地区就有三个坦克师，还不算步兵。德国人会轻而易举地打死所有波兰人。这些波兰人实在可怜。

在维斯瓦河和皮利察河交汇处，苏联部队已强渡维斯瓦河，并在维斯瓦河对岸建立了30公里长、25公里纵深的登陆场。开始时进展良好，但德国人已将两个坦克师调到我方登陆场地区。苏联部队当然会制服德国人的抵抗并夺取华沙，但这需要时间。

斯大林同志说，我们不吝惜武器。我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诸如机枪、反坦克炮这样的武器，但问题是怎样完成这件事。重武器不能从飞机上空投。此外，如果从市区上空空投武器，也没有把握确信这些武器不会落入德国人手里。斯大林同志问，市内是否有可以空投武器的地点。

米科拉伊奇克说，这样的地点是有的，但他现在难以说出它们的名称。

在华沙的波兰部队司令部里有苏联大尉卡卢金，他希望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取得联系，以便向他介绍必要的情况。他（米科拉伊奇克）只知道有这样的地点，如果在那里空投武器，不至于落入德国人手里。

^① 华沙市区之一，在市内维斯瓦河以东。

斯大林同志问，可以相信这一点吗？

米科拉伊奇克说，完全可以相信。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这是指向华沙市内波兰部队空投手榴弹、反坦克炮和弹药。

斯大林同志说，空投武器容易，因为我们的部队就在华沙附近。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如果斯大林元帅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完成空投，他将十分感激。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有呼叫信号和密码。他（斯大林同志）将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最好向波兰部队驻地空投一名苏联军官以便联络。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将在最短时间内为此事提供所必需的一切。

斯大林同志声称，他将尽一切可能。

米科拉伊奇说，在与斯大林同志告别时，他想表示确信，波兰与苏联之间将建立信任和友谊。

斯大林同志声称，我们政策的基础是与波兰联盟。必须让波兰人相信，今天俄罗斯的领导人不是沙皇政府时的领导人。那时俄罗斯的领导人想征服波兰。

我们的政治家常被同沙皇的政治家混为一谈。这是不正确的。我们没有征服任何斯拉夫民族的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反对斯拉夫主义，它认为俄罗斯应成为斯拉夫各民族的首领，而这些斯拉夫民族应该受俄罗斯压迫。我们承认斯拉夫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如果波兰领导人能懂得，苏联领导人希望建立波兰人民和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并在此意义上把历史翻转过来，那就好了。然而他（斯大林同志）认为，现在的波兰活动家不相信这一点，因为在波兰的波兰政府代表向波兰人民声称，德国压迫者要走了，新的压迫者——俄国人要来了

米科拉伊奇克说，斯大林元帅有可能赢得波兰人民的心。

斯大林同志说，波兰人民不应该跟在苏联后面走，他们应该和苏联一道走。波兰人民有自己的道路，苏联也有自己的道路。苏联不希望受波兰支配，波兰也不应该这样做。需要的是苏联和波兰一同反对共同的敌人——德国人，互相给予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援助。如果波兰将来与苏联结盟，那么任何危险都不可怕。波兰也应该和英国、法国及美国结盟。

米科拉伊奇克感谢斯大林同志对波兰说的这一番话。他声明波兰无意将什么强加给苏联。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我们不能也不应彼此将什么强加给对方。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力求与波兰结盟的根据是，不管怎样限制德国，它终究会获得再生并恢复元气。德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之后，到1914年进行新的侵犯用了40多年的时间。1939年德国又一次侵犯，而它为准备侵犯所需要的时间缩减到25年。我们认为，现在这场战争后的20~25年时间内，德国可能重新再生。

米科拉伊奇克声称，他很了解德国人。首先，需要更猛烈地轰炸德国的城市、工厂，而且需要在德国土地上将德国击溃。战争结束以后，需要切断德国赖以向欧洲国家扩张的所有经济途经。应该长时期占领德国。

斯大林同志指出，反正德国能够站起来。对这种情况需要持剑以待，这柄剑就是波兰和苏联的联盟以及将组建的支持和平的国际组织所掌握的部队。

米科拉伊奇克说，他在离开伦敦前读到了德国俘虏的供词。一位德国军官在供词中声称，德国将在共产主义制度中获得拯救。

斯大林同志指出，共产主义对德国来说是水牛配马鞍，极不相称。

告别时，米科拉伊奇克感谢斯大林同志热情接待，并表示受到斯大林同志接见是他极大的荣幸。

No07918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关于支援华沙国家军 致红军总参谋部的信

(1944 年 8 月 13 日)

叶夫斯基涅也夫少将：

在伦敦的参谋长官委托我向您转达以下情况，并请告知我苏联总参谋部将对这些情况采取何种措施。

华沙已通知伦敦，须即刻给予支援，否则波兰秘密武装力量将会在几天之内被消灭。

鉴于地中海空军部队仅进行过几次极为有限的空投弹药及装备的军事行动，因此波兰政权请求更多的实质性援助。

波兰政权的请求如下：

1. 增加提供武器弹药；
2. 轰炸华沙的一些特殊目标；
3. 空投波兰伞兵部队。

英国空军参谋部已将增加补给规模的重要性告知了空军元帅斯列瑟尔。此项行动应在夜间进行，专门指定的航空大队应立即补充力量，以确保英方大规模援助的进行。通过地中海沿岸地区提供必要数量的补给武器存在一系列的的限制因素。为此调集了补充的英国及波兰的飞行队，以有助于增加空投这种补给的航空部队的数量。

波兰人请求将增补的可供 3000 人使用的武器弹药空投在华沙以北 10 里的坎皮诺斯森林区。由于这一地区相当大，可以动用美

军第15航空军的飞机。最初，那种在白天从高空空投补给的行动，看来实际上难以实现，在任何情况下空投都不可能准确到保证补给落到只控制着华沙较少地区的波兰人手中。

与此相适应，美国参谋长请求英国空军参谋长对动用美军第15航空军飞机运输这些补给的可能性作进一步研究；由地中海沿岸地区提供类似援助更为有利。

英国空军参谋长通知美军参谋长，英方不反对美国人从他们在俄国的基地完成此项行动，从那里他们可以向波兰人提供缴获的德军武器。但是类似的行动看来相当困难，因需要空投武器的相应地区并不明确，因而可能毫无结果。

波兰人指定了以下一些轰炸目标：

1. 奥肯切机场；
2. 布耶拉尼机场；
3. 别姆要塞；
4. 城堡；
5. 体育学院。

波兰人认为这些目标的范围相当大，应易于实施打击。但是由于波兰部队现今所处位置距这些地点非常近，因此要求轰炸必须做到相当准确。

考虑到这些目标不利于夜间轰炸的事实，将不考虑动用科罗廖夫轰炸机军。假如执行此项任务的美国空军从高空实施轰炸，那么，就会给位于目标附近的波兰部队造成损失。为完成这项任务美国空军至少需要1800米的能见度。因此英国参谋长认为，只有从低空执行此次行动的俄国战术空军，能对准确轰炸目标给予惟一可能的帮助。

波兰人还请求将波兰伞兵部队从意大利空运到英国。由于抽调如此众多的运输机干扰了其他任务的完成，这一请求不可能实

现。除此以外，我们认为执行如此长距离的运输行动的损失毫无疑问将是巨大的。

英国驻苏军事使团陆军分部长官、
总参谋部上校 拉·恩·布林科曼

№07919

哈里曼关于使用苏联空军基地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8月14日)

维·米·莫洛托夫阁下：

我空军联队收到紧急指令，要求向苏联红军空军部队弄清一个问题，即如果作战条件和天气条件许可，明晨动用美国四引擎轰炸机部队在由英国起飞的歼击机部队护航下执行任务。行动计划为：联队飞机的一部分向华沙地区的波兰抵抗力量空投武器，另一部分对邻近机场进行袭击。此后它们将降落在苏联基地。沃什将军正按通常的办法将此问题提交红军空军参谋部。而我同时也向您提出这一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政治方面的考虑。

如果苏联红军空军部队在这一天将进行类似的向华沙空投武器的尝试，那么双方的行动有必要在时间上相互协调。但是这一问题以及其他技术问题应由我们相应的部队参谋部来解决。我被告知，英国轰炸机部队前不久由意大利起飞，在夜间向华沙空投了数量不多的弹药。但是从意大利飞到华沙以及返航的飞行距离给此类行动的实施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而所空投的装备数量又太少。所以英美联军司令部认为，我们所能提供的最有效的行动是在苏联基地上的美国轰炸机部队在白天的穿梭飞行。我国政府非常希望这一尝试能得以进行，尽管它有些冒险又存在一些难度。在此我请贵方尽快同意该请求，使此行动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能在明天早上得以进行。

忠实您的 威·艾·哈里曼^①

^① 威·艾·哈里曼，1944～1946 年任美国驻苏联大使。

№07920

克尔关于使用苏联空军基地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年8月15日)

附对英国外交部来电内容的说明

英国大使馆

1944年8月15日

莫斯科

尊敬的维·米·莫洛托夫阁下先生：

一、今天下午美国大使和我同维辛斯基^①先生讨论了向在华沙进行斗争的波兰武装力量提供补给的问题后，我收到了安东尼·艾登^②先生的来电，在来电中他告知，首相先生及他本人都在特别关注此事的进展。

二、艾登先生表示，盟军空军当局前天夜间派出28架飞机从巴里^③起飞向华沙空投物资，波方部队司令官已确认收到该物资并表示感谢。昨天夜间又执行了一次任务。以后的行动也已做出计划。但是这种通过地中海战场进行的飞行行动，您也能理解，只有靠在法国南部的盟国空降兵部队的支持才能实行，同时由于需要护

① 安·扬·维辛斯基，1939～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安东尼·艾登，1941～1945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③ 意大利西南海岸。战时美国驻欧战略航空队基地。

航的飞行距离太长，而这些飞机要返回在意大利的基地，所以通过这种途径向华沙波兰人提供援助的规模相比其力量投入来说太小了。

三、如果美国第 8 航空军的飞机在完成的任务后能降落在苏联基地，那么他们就能够空投更多数量的物资。并且艾登先生表示，他的政府特别希望能尽可能地减轻美国空军部队准备采取的行动的负担。

四、我已经提到了，艾登先生的电报是在我今天下午同维辛斯基先生会面后收到的。在艾登先生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美国飞机在完成向华沙空投物资的任务后降落在苏联基地之前，电报已经发出了，那么，在我看来，此电报可以作为我在与维辛斯基会谈时根据个人意见使用的那些论据的有力的补充。

忠实您的 阿·克拉克·克尔^①

^① 阿·克拉克·克尔，英国驻苏大使。

№07921

莫洛托夫关于援助华沙问题致克尔的信

(1944年8月16日)

莫斯科

1944年8月16日

尊敬的阿·克·克尔大使先生：

已收到您8月15日来函，来函中您告知您收到了艾登先生关于给华沙空投武器及美国飞机在完成此任务后在苏联基地降落的可能性的来电。我认为有必要告知您：苏联政府当然不会反对英国或美国飞机向华沙空投武器，并认为这是英美自己的事。但是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或英国飞机完成向华沙地区空投武器的任务后在苏联领土降落。因为苏联政府不想直接或间接地被牵扯到在华沙的冒险中去。

大使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维·莫洛托夫

№07922

克尔关于英政府掌握的华沙起义情报

致莫洛托夫的信

(1944 年 8 月 18 日)

1944 年 8 月 18 日收到

亲爱的莫洛托夫先生：

8 月 14 日我同您会面时您曾问我，我国政府是否事先得知华沙起义一事。

我把从我国政府收到的一封有关此问题的电报的复印件寄给您，我以为以这种方式来回答您的问题是再好不过了。我本想在昨晚您接见我和美国大使时把此电交给您，但是没能得到机会。

阿·克拉克·克尔

随信附件

1944 年 8 月 16 日英国外交部发至莫斯科的电报稿

一、帝国政府自然一直就波兰地下军队的组织、活动和对其供应问题同波兰军事当局保持着紧密联系。在进攻法国前波兰当局通报我方说，他们预计进行三个阶段的行动：

(1) 积极的牵制措施和小规模的进攻行动，例如一直在进行着的袭击火车等。

(2) 为了同已转入进攻的苏联武装力量配合，在相应地区进行

部分动员，如沃伦地区。

(3) 进行总动员并在波兰全境总起义。

二、如果不能同尚未实现合作的苏联当局形成合作的话，他们就想根据盟军在西线战场的军事行动而调整自己的计划，并请我们来决定各阶段主动行动的日期。当时我们提出的观点是，为了对号召波兰人投入第三阶段行动负责，行动地点对我们来说相距过远。并且这只有与苏联当局取得一致才能富有成效地实行。

三、在为解放波兰而进行的战斗中打击敌人的理所当然的愿望影响下，以及在苏联不只一次地号召进行更加积极的行动的影响下，波兰人已经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

四、7月底，波兰的部长们多次通知我们说，他们有消息表明，在华沙和全总督区^①举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而且他们于7月26日向我们提出给予这次起义积极援助的若干请求。我们告诉波兰人，很遗憾，他们的要求我们一个也不能满足。我们同这些部长们和波兰政府商定，总起义的日期应由在波兰的波兰总司令决定。

五、苏联部队直接向华沙地区推进的行动及德国人开始从华沙撤退的事实，无疑对波兰总司令做出决定产生了影响。

六、形势的发展开始与计划背道而驰，但是地下军借助非常有限的外援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及在华沙坚持了两个多星期这一事实说明，起义的准备工作进行得并不像苏联政府想象的那样糟糕，而且它已成为德国人一个很大的麻烦。

① 根据希特勒1939年10月8日和12日的命令，波兰的波莫瑞、大波兰、西里西亚地区各省及罗兹、克拉科夫省的一部分地区被称为德意志人省，并入德国版图；其余德国占领区组成所谓“波兰被占领区的总督管辖区”，后简称总督区。总督区下辖克拉科夫、华沙、卢布林、拉多姆四个行政区。

№07923

莫洛托夫关于援助华沙 致克尔的信

(1944 年 9 月 9 日)

尊敬的大使先生：

请您转交所附的苏联政府对英国政府 9 月 5 日关于华沙问题来函的答复。

至于您 9 月 3 日与华沙事件有关的信^①，我首先接受您的看法，即认为 8 月 17 日的会谈是必要的说明。就上述信件的实质，我认为有必要重新论证您在信中谈到的事实。确实，苏联当局从来没有拒绝向损坏的英国或是美国的飞机提供帮助，否则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不可能稳定。但应当指出，既然华沙地区不断发生同德军的地面战斗和空中战斗，而在这条战线上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不属于苏联空军的飞机，这可能引发可悲的误会，我要提醒您注意这一点。

请大使先生接受我诚挚的敬意。

维·莫洛托夫

① 在 1944 年 9 月 3 日的信中，克尔对英国政府关于向华沙地区空投武器和英美两国飞机在苏联机场着陆问题的态度做出解释。在信中克尔对苏联在近 10 天内曾给两架遇难的英国飞机以帮助表示谢意。同时大使请求，“希望将来在华沙上空执行任务的英国飞机能在遇到类似的不幸事件时，允许他们由此向东降落在为夜间飞行补充供给的苏联机场上。”

苏联政府对英国政府9月5日来函^①的答复

9月5日苏联政府收到英国政府关于华沙问题的来函。

苏联政府已把自己的意见告知英国政府。对未经苏联军事指挥部同意并破坏了作战计划的华沙冒险行动，驻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的活动家应承担 responsibility。

苏联政府希望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来查明，是以谁的名义下达了在华沙开始武装起义的命令，谁对没有提前通知苏联军事指挥部负责。世界上没有一个指挥部，无论是英国的或是美国的，能够容忍自己前线的军队未经指挥部同意并违反其作战计划在大城市进行武装起义。当然，苏联指挥部也不例外。毫无疑问，如果华沙起义前，有人询问苏联指挥部，8月初在华沙进行武装起义的安排是否合理，那么苏联指挥部会劝说放弃这种想法，因为苏联军队离作战地点有500多公里远，并已相当疲惫，当时没有准备以强攻夺取华沙，因此德国人有足够的时间从西部调来坦克封锁华沙地区。

没人能指责苏联政府没有向波兰人民提供足够的援助，其中也包括华沙。最有效的援助方式是，已解放了波兰1/4以上地区的苏联军队对占领波兰的德国侵略者的积极军事行动，所有这些都是苏联军队做出的，也只有苏联军队在为解放波兰而流血牺牲。

利用从飞机上空投武器、药品、食物这种形式帮助华沙人，收效甚微，但仍在继续。我们已经几次向华沙起义军空投了武器和粮食，但每一次都收到情报说，空投物品落入了德军手中。如果您深

① 此函件阐述了英国战时内阁对华沙问题的态度。函中对苏联政府进行了指责：“由于贵国政府拒绝让美国飞机在俄国机场降落”，使华沙不能得到援助“这一事实，现在广为人知了”。“本战时内阁很难理解贵国政府拒绝注意英国和美国政府向华沙的波兰人提供援助的义务”。

信这种帮助有效，并坚持希望苏联指挥部进行组织，联合英国人和美国人采用这种方式运输，苏联指挥部可以同意，不过，这种援助必须根据预先制定好的计划进行。

至于您试图让苏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华沙的冒险行动和华沙人的牺牲负责，苏联政府不能听任别人嫁祸。关于苏联政府在华沙问题上的立场似乎违背了盟国合作精神的说法也是一样。不能怀疑，如果英国政府采取措施，让苏联指挥部及时得知打算在华沙起义，那么华沙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为什么英国政府没想到有必要预先通知苏联政府？同样的事情在 1943 年 4 月不是没发生过。当时波兰流亡政府在英国政府不反对的情况下，怀着对苏联的仇视发表了关于卡廷的诋毁性声明。^① 我们认为，盟国之间的合作精神能够提示英国政府采取另一种行动方式。

至于说一个或另一个国家的社会舆论，那么苏联政府表示完全相信，华沙事件的事实真相为毫无保留地指责华沙冒险事件的制造者和正确理解苏联政府立场的社会舆论，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应当努力让社会舆论很好地了解华沙事件的真相。

^① 指卡廷森林事件。1943 年 4 月 13 日，德国宣布在所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地区，发现了大批被害的波兰军人尸体，德方咬定是苏联所为。苏联政府坚决否认。1990 年 4 月，苏联正式承认对卡廷森林事件负责。

№0243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情况 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9月16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关于华沙事件的情况通报。此通报于今日，即9月16日收到。

谢尔巴科夫^①

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现将华沙事件的情况通报呈报如下：

一、今晚波兰第1集团军侦察部队得以在南桥地区潜入维斯瓦河西岸。侦察兵将拉多斯拉夫中校和两名起义士兵带至我方河岸。拉多斯拉夫领导着150名起义者，他们继续坚守在这个地区。他本人和他的人属于支持卢布林政府的保安军。

拉多斯拉夫说，沿南桥附近维斯瓦河西岸，起义军至今控制着如下范围内的地区：北至柳德纳街，西至罗兹布拉特—梅斯利维茨卡街，南至泽津科夫斯克街，东至维斯瓦河岸，包括沙滩和堤坝。从我们进攻开始起，德国人加强了对这个地区的进逼，每天好几次飞机轰炸，炮火袭击，还动用了坦克。结果，敌人给起义者造成巨

^① 阿·谢·谢尔巴科夫，苏联副国防人民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大损失，并将他们压制在靠近河岸的一个街区（华沙城 71 街区。71 街区位于南桥以南，西北以维利扬诺夫斯卡街为界，西南以切尔尼亚科夫斯卡街为界，东以维斯瓦河为界）。

这个小组的情况极其危急。今天我调派波兰第 1 集团军的一个营到维斯瓦河右岸，他们清除了 71 街区的德国人，并和起义者一起牢牢控制着这个地区。已给起义者必要的帮助。

二、据我们掌握的全部情况确定，起义者在华沙城内占据了以下地区：

第 1 区，北面是威尔逊广场北沿，向西沿罗辛斯基街到斯托列奇诺街，向南沿斯托列奇诺街到波兰军大道，然后沿此大道向东到八角广场，再由此广场向西北沿米茨凯维奇街到威尔逊广场。这是由起义者控制的抵抗中心。

这个区的包围圈从北面的马里蒙特、斯洛多维茨的北部起，然后由斯洛多维茨沿铁路向东南到布郎尼教场，再从科尼奥夫斯卡街和索斯恩科夫斯基将军大街之间向北到克拉辛斯基大街，再沿克拉辛斯基大街向北到马雷蒙特大街。

第 2 区，从新圣街起沿特劳古特大街、克鲁列夫斯克大街到加尔日雅夫斯克大街，然后沿托瓦罗夫大街向南到赫缅尔纳大街，再沿赫缅尔纳大街向东到马尔沙尔科夫斯卡娅大街，沿马尔沙尔科夫斯卡娅大街向南到耶路撒冷大道，再沿耶路撒冷大道向东到新圣街，沿这条街向北到特劳古塔大街。

第 3 区位于车站南侧。其边界从北向西起于新圣街，沿耶路撒冷大道到埃米利·普拉捷尔大街，然后沿埃米利·普拉捷尔大街和波尔纳大街向南到诺沃捷耶伊斯克大街，沿此街向东到乌雅兹多夫斯克大道，再沿大道向北到耶路撒冷大道，至此合成一个正方形。

第 4 区为莫科图夫区，其边界从北面铁路起，沿马德林斯基大街向西到下一个没有名称的街道，其西侧便是涅波德列赫洛斯季大

道，沿大道向南到拉茨拉维茨街，沿拉茨拉维茨向东到铁路，再沿铁路向北到马德林斯基大街。至此合成该区的正方形。

第5区，在维斯瓦河西岸上，即上面谈到的第71街区。

三、今晚继续投放弹药物资。

向第1区投放反坦克枪68支，冲锋枪439支，反坦克枪弹4960发，毛瑟枪弹1500发，TT型手枪子弹442000发，巴拉贝伦枪子弹15000发，面包干1940千克。

向第3区投放步枪子弹915000发，毛瑟枪子弹24000发，面包干8925千克。

起义者发出信号，表明投放的物资已收到。

夜晚德国人从博尔布拉库耶夫地区用大炮轰击第1区。

第2区的信号微弱可见，第5区未发出任何信号。

四、有情报证明，布尔将军^①对波兰工人党代表、人民军^②和保安军采取敌对立场。如9月11日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派来我方的两位姑娘声称，派她们来没有得到布尔将军的同意，他不允许她们来我方。

下面的事实是：9月10日从保安军来的马尔凯维奇少尉也证明，布尔将军不允许任何人和我们建立联系。马尔凯维奇声称，布尔命令保安军占领最危险的地段，那里一直处于德国人猛烈火力射击下，并把国家军的队伍从那里换下来，看来希望保住自己的拥护者。

① 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化名布尔，意即“森林”。1943年7月至1944年10月任波兰国家军司令，少将军衔。

② 波兰工人党组建并领导的反法西斯武装力量。其前身是1942年3月成立的人民近卫军。1944年1月与农民营等联合组成波兰人民军。同年7月，遵照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命令，人民军与在苏联建立的波兰第1、第2集团军共同组成波兰军。

今晚向第 1 区空投物资的飞行员报告，许多街道发出要求空投食物、军备和武器的信号，这也反映出每个起义支队力求不通过布尔获得这些物资。

根据一系列证明材料断定，布尔控制着这个地区，当然也有其他区的全部后备物资，他以陷于饥饿和军备匮乏相威胁，迫使起义者——卢布林的支持者屈从他的命令。在华沙的伦敦领导人向起义者解释，似乎起义符合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的意图，它们同情起义，答应给与必要的援助。伦敦来人的这类解释也得到许多布拉格居民的证实。

五、我提议用必要的传单向起义者说明事情的真相。希望就传单的内容得到您的建议。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07924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 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节录）

（1944年9月18日）

1944年9月18日16时至19时15分

——捷列金在电话旁。

您好，希金同志^①。还没收到来自波兰军队的文件，虽然3小时前送文件的飞机已经起飞了。现报告已掌握的材料。

关于1944年9月18日14时华沙市的局势。

一、波兰军队继续控制西岸的登陆场（第516号街）和东南第514号街的一部分（早先我在给您的1944年华沙城市图上称其为第71号街），在1944年9月18日夜间打退了敌人9次反攻，其兵力每次约一个排到一个连。9月18日早晨在登陆场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步兵连，一个师侦察连，两个迫击炮连，两个反坦克枪连，两个机枪连，两个营的炮兵部队和大量武器装备：重机枪18挺、82毫米口径迫击炮16门、反坦克枪72支、45毫米口径远程炮9门、76毫米远程炮1门。

贝林格第2师侦察部队共一个步兵排和侦察排，今夜强渡维斯瓦河，占领湖区以东第80、81号街的登陆场，并准备夜间侦察1号起义地区。

^① 约瑟夫·瓦西里耶维奇·希金，时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 80、81 号街的位置靠近维斯瓦河西岸，在起义第 1 区的东部。

二、为了和第 1 区的起义军建立联系，今天拂晓我们的军官带着无线电报务员和电台，跳伞顺利降落在起义第 1 地区的第 65.66 号街，并报告：

1. 与第 1 区的起义军开始联络；

2. 在这一区约有 2000 名起义者，其中 700 人有武器装备。起义军急需武器，弹药和粮食；

3. 在第 1 区激烈的射击不断。这是目前的第一份报告。

三、今夜我空军在第 1 区空投了反坦克枪 102 支，50 毫米迫击炮弹 504 枚、手榴弹 400 枚、反坦克枪子弹 7640 发、步枪子弹 43,980 发、毛瑟枪子弹 12500 发、压缩食品 2142 公斤、肉罐头 1338 公斤、面包干 760 公斤、烟草 4 公斤。其余的夜航执行了轰炸第 1 区周围敌军迫击炮阵地的战斗任务。

——捷列金同志，我没听清楚空投了多少 50 毫米口径的迫击炮弹。

——我重复一下：50 毫米迫击炮弹空投了 504 枚。

——我明白了，请继续。

——我继续说，华沙还在燃烧，整个城市昼夜燃烧。我方空军和高射炮掩护华沙的一些地区免遭敌军空军的空袭。英国电台于 9 月 17 日 20 时通报：布尔将军告知，他已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参谋部建立了联系。

就是这个电台于 9 月 18 日 8 时 30 分通报：“布尔将军告知，他的行动现在要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行动协调一致。苏联飞机不断空投武器和粮食。苏联空军和高射炮保卫了华沙免遭德军飞机的轰炸。”因此，一方面布尔将军承认我们的措施给起义军提供了帮助，但却广泛宣传并歪曲已建立的联系的性质，他大概是在积累政

治资本，并想恢复自己的名誉。

目前在第1区有我们的军官，所以可以不断收到必要的消息，如果侦察队能在第1区边缘设防固守，那么我们就可以着手准备同该地区建立直接联系。

——捷列金同志，应采取最积极的措施以同其他起义地区建立直接联系，那时我们双方都将有关于华沙局势的详细消息。

№07925

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 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

(1944 年 9 月 19 日)

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①：

我报告：

一、在布拉格西区发现了波兰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将军的命令文稿。文稿用波兰文印刷，形式是一张纸（通知及命令），用来张贴在墙上。我已得到该文件的复印件。这是一份充满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文件。

现向您原文呈报该文件的结尾部分：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惶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① 格·康·朱可夫，1942 年 8 月起任苏联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和苏联武装力量副最高统帅；1943 年初获苏联元帅衔。

自由波兰万岁。

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

无人对此传单负责。未署明日期。为阅读方便使用的是大号铅字。我只向您呈报了此传单的结尾部分，它清楚地表明了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一些政治派别的性质。传单中指出：伟大的、独立的波兰很快会同我们的盟友——美国和英国一起奋起，并将永不再在沦入德国人的铁蹄和苏联的压制之下。所以，我请您决定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实际情况。

二、我报告有关华沙起义者各集群的传闻：

(1) 北部集群（若利博什地区）约有 2000 名官兵和 500 名平民。由国家军和人民军组成。

武器装备有：步枪、冲锋枪、反坦克枪——大部分是我们的。同华沙其他地区起义部队没有联系。从 1944 年 9 月 18 日起通过电台和通讯员与波兰第 1 集团军第 2 步兵师建立了联系。

弹药依靠空投，也常靠战利品来保障，而且还经常能获得战利品。国家军指挥员是日维采利中校，人民军指挥员是沙涅夫斯基大尉。

(2) 中心区保卫者 A 部由人民军的官兵组成，占领着特瓦尔达、采戈良纳、赫洛特纳地区。B 部由国家军士兵组成，占领着从克鲁列夫斯基到布梁茨巴维切立的街区。这两支中心区保卫者分散的部队由巴古斯拉夫中校指挥。在过去的三天里，在试图占领位于克拉科夫—奥切科夫斯克大街的大学失败后，德国人将起义者从一系列地区挤压到了这一地段。从 1944 年 9 月 14 日起失去了同上述集群的联系。

(3) 东部集群占领着布拉诺夫斯基地段。在过去的三天里，曾企图通过对伏拉斯卡斯奇方向实施打击来重新恢复同中心区集群的联系，但是未能成功，结果使其占领区现在收缩到维斯瓦河左岸的

军事基地。东部集群同波兰第 1 集团军第 3 步兵师建立了联系。起义者在此地段的主要力量是近 300 人的农民营。

指挥部在阿克伦卡大街 2 号。这一地段的指挥员是拉多斯拉夫中校。

参谋部在扎谷尔那大街 24 号。

1944 年 9 月 16 日夜，这一地段得到了波兰军队第 3 步兵师第 9 步兵团各分队的加强。

(4) 1944 年 9 月 12 日位于莫科图夫地区的南部集群失去了同东部集群拉多斯拉夫中校的联系。

据已掌握的情报，莫科图夫地区的形势可以说是相当有利，因为起义者并未感到来自德国人的压力。在莫科图夫有几处起义基地，具体地区及界线不详。目前第 3 步兵师部队同拉多斯拉夫中校的东部集群已经协同起来。

起义者需要武器弹药及食品支援。

第 2 步兵师部队同日维采利中校的北部集群建立了联系，并组织起了协作。

四^①、在对波兰军队各部队作局部的重新部署之后，今天强渡维斯瓦河的行动将于 16 时 10 分重新开始。

报告完毕

红军总参谋部代表、少将 莫洛特科夫

① 原文如此，疑编号有误。

№0792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 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节录）

（1944年9月20日）

——您好，捷列金同志。

——您好，希金同志。我向您报告作战情况：

9月20日一整夜，敌人向位于南部两座大桥间的登陆场发动了多次猛烈的进攻，驻守大桥的贝林格^①第3步兵师的两个步兵营受到了一些压制。到9月20日晚部队仍然坚守着登陆场，但是一整天由于不明的原因失去了与他们的联系。

占领514和516街区的两个营遭到敌人强大压力，两个营损失巨大，被迫放弃了一部分街区而坚守南部街区及中心地段。据该集群来电可知，其情况严重，各连剩下的人员很少。敌人企图切断他们同我们的联系。

据驻该登陆场的团指挥部副手报告，与其在登陆场共同作战的拉多斯拉夫指挥的起义者放弃了自己的阵地，并经下水道跑到了另一地区。

在第1区作战的第2师第6团的北部侦察小队依然坚守着西岸的登陆场，但他们几次向起义者方向突破的尝试都未成功。

我们来自第1区的军官报告，他们知道侦察小队的存在，但没

^① 齐格蒙特·贝林格，波兰军队将领。1939年流亡苏联，是在苏联组建的波兰人民军队的领导人。从1943年起，历任波兰第1师师长、波兰军队第1集团军司令员、波兰人民军副总指挥。

有与其直接联系上。

我炮兵全天从东岸给予登陆场以积极的援助。空军轰炸了碉堡和迫击炮兵阵地。随着夜幕的降临，加强和支援南部登陆场的增援力量已准备就绪。

敌人全天把渡口地区置于强大火力之下，这阻止了与登陆场联系的恢复和部队渡河行动的进行。

必须指出，波兰第 1 集团军指挥部对与登陆场恢复联系的不懈努力并未表现出足够的关心，一天来对登陆场情况的了解非常糟糕。9 月 20 日一整夜和早晨对组织支援，特别是对南部登陆场的支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担忧和关心。直到 12 时波兰第 1 集团军参谋部对登陆场的形势的认识仍是模糊不清的。正在波兰第 1 集团军的方面军副司令特鲁勃尼科夫直到 12 点对此事也未搞清楚，未能及时干预组织支援一事。

观察发现，各城区这一天都有激烈的枪战，并有几处燃起大火。

两个高炮师和空军对敌空军攻击下的各城区渡口和全城实施了掩护。

9 月 20 日夜我空军向第 1 区空投了冲锋枪 207 支、反坦克枪 58 支、手榴弹 3798 枚、50 毫米迫击炮弹 4170 发、反坦克枪弹头 26280 发、手枪子弹 268896 发、步枪子弹 227360 发、驳壳枪子弹 15000 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 244400 发、德制子弹 50000 发、药品 255 公斤。至此我空军在实施行动期间总共向波兰起义者空投了冲锋枪 1143 支、50 毫米迫击炮 60 门、反坦克枪 228 支、步枪子弹 657580 发、图卡列夫式手枪子弹 1279984 发、50 毫米迫击炮弹 11658 发、手榴弹 9708 枚、反坦克枪弹 28880 发、驳壳枪子弹 53000 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 259400 发、7.7 毫米子弹 50000 发、德制榴弹 500 枚、食品 60489 公斤、药品 255 公斤。

一切都清楚了吗？今天我们将把物资投在第 2、3、4 区。当方

面军参谋长马利宁中将同志问及华沙形势时，昨天来自第2区的卡卢金大尉报告：……^①

这就是卡卢金讲的基本点，他所述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可信的，但是起义武装部队的人数不包括在内，这个数字他是引自的曼达尔^②的话。他得出起义人数实际上不超过6000人的结论无疑只是大概的，甚至有些夸张。

今天又从华沙曼达尔参谋部来了7名军官，他们受曼达尔的委托来建立红军参谋部与波兰指挥部之间的联系。据他们证实，各地区起义者人数如下：在第1区起义者总数为2500人，其中30%的人有武装；在第2和3区有近1500人，他们装备了20挺机枪、手枪及600支卡宾枪；第4区起义者总数有5000人，其中武装了近1500人，拥有10挺轻机枪、50支冲锋枪、250支卡宾枪及步枪、600支手枪。

起义者完全没有重武器，弹药极度缺乏，由于起义者不能采取积极的尤其是进攻行动，因此实际上无法成为任何现实的力量。

对这7名军官详细询问的结果我明天报告。

这7名军官中有一人作了一个重要声明，说布尔将军好像在国家军内发布了一道秘密命令，该命令强迫倾向于卢布林政府的所有武装部队服从他的命令，直到实行肉体迫害。我已受托当即通过向其他军官详细问讯的方式对此加以确认。

另据查明，在华沙起义者当中确实有少量的俄国人、法国人、捷克人、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还没有情报表明这些罗马尼亚人来自何处。

有关华沙形势报告完毕。

^① 原文如此。

^② A. 塔塔尔，化名曼达尔，国家军华沙军区参谋长。

№02439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 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 年 9 月 22 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关于华沙和布拉格的情况通报。

谢尔巴科夫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关于华沙情况

一、鉴于保持联络的困难和在登陆场登陆的部队遭受的巨大损失，今天我发出将他们从西岸撤到东岸的命令。第 6 步兵团第 2 营转移到东岸 162 人，其中有 11 名军官，以及受伤的营指挥官。留在西岸的个别部队天黑前继续着无组织的战斗，黑夜来临时应该撤出。第 8 步兵团的两个营遭受了巨大损失，分成小股的部队仍在第 458 街东部的废墟中继续战斗。

据转移到东岸的 39 名士兵和负伤的营指挥官提供的情况可以断定，这个登陆场的部分战士已进入中心起义地区（第 2 区和第 3 区）。

第 9 步兵团在 516 街区东部继续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反击敌人

的不停进攻。同这个团保持着无线电联系。经过一昼夜，该团40人已转移到东岸。1944年9月22日夜晩，小船给第9步兵团所属各分队送去了无线电台、弹药和粮食。

二、在过去一昼夜，没有得到关于起义者占领地区变动的新情报。通过波兰第2步兵师与第1区保持着稳定的无线电联系，并应他们的请求，对敌人的炮队组织了火力攻击。

据起义者的无线电报告，1944年9月21日这一天，他们消灭了129名德国人，这证明第1区局势稳定，也证明敌方压力的加强。

从我们的军官那里获得的无线电报告说，第1区起义者现有武器：德式重机枪3挺、手提机枪21挺、冲锋枪123支、步枪260支；苏式反坦克枪54支、重机枪5挺、冲锋枪181支、步枪32支、50毫米迫击炮18门；英式手提机枪2挺、迫击炮9门、冲锋枪129挺；波式步枪15支；奥式81毫米迫击炮3门。这份报告证实，9月21日夜晩收到反坦克枪54挺、冲锋枪181支、50毫米迫击炮18门、手榴弹3082枚、反坦克枪弹11030发、图卡列夫型手枪子弹32750发、步枪子弹7680发。

9月22日夜晩收到：迫击炮6门、迫击炮弹615发、手榴弹240枚、德式子弹100000发、反坦克枪4挺；粥470千克、面包干1255千克、盐78千克、烟叶23千克。

关于收到物资的材料表明，一部分物资看来是送到了单独的部队，而没有考虑到，正如上面所报告的，每个组织都极力保证自己单独地获得武器和粮食。

三、早先来到的雅盖洛·弗拉季斯拉夫中尉（外号“克鲁尔”）是人民军的宣传官，他谈到华沙居民这样说：“被占领前华沙有150万居民，现在剩下大概不到30万~40万人。大量居民特别是犹太人被德国人残害和赶走。大约有10万人被赶进特鲁什科夫地

区的集中营。因为华沙的粮食情况非常严重，许多人死于饥饿。”

据他所述，华沙不同政治团体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内讧，主要是在以下几派之间：（1）投降派份子，（2）支持坚持起义的伦敦人，（3）卢布林政府的支持者。居民没有组织起来，由于起义失败和德国人的疯狂镇压而经常生活在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和惧怕之中。

今天在 516 街区，集中了 1000 多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想要转移到东岸以求生存。我已命令贝林格采取措施将他们转移到我们这一方。

四、我方人员自琴斯托霍瓦区送来的报告证明，维斯瓦河彼岸不同倾向的政治组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内讧。报告说：“在琴斯托霍瓦区，国家军和人民军有很大的矛盾。国家军的领导人宣称：红军没有力量进攻，不能把波兰居民从德国人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只有英国在国家军的帮助下才能解放波兰。地主和富农支持国家军，工人和贫农支持人民军”。

五、根据我部军官从第 1 区发回的报告可以确定，在获得武器和食物的情况下，该区能增补 3000 人投入战斗。

六、9 月 17 日在第 47 集团军地段拘留了国家军 53 营列兵帕尔采什·扬，此人 1925 年出生，波兰人，华沙出生，是起义的参加者。他说：“我在 53 营听到军官和士兵们说，这次起义的目的是把德国人赶出华沙，然后与红军部队一道把德国人赶出波兰。起义前夕布尔将军的通告指出，莫斯科知道起义。后来，所有的起义参加者相信，这一方案仅仅来自伦敦，莫斯科对此并不赞同。起义的最初几天，国家军参加起义的普通士兵对起义表示不满，后来军官也开始表示不满。”

帕尔采什接着说：“虽然 8 月 20 日前，来自各地的国家军战士向华沙靠近以支援起义，但国家军参加起义者开小差现象大量发生。

德国人动用坦克和大炮，我们除步枪外一无所有。起义初期有过的小口径炮已被毁。如果说起义前华沙的国家军多达5000人，则现在剩下的不过1000人。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或逃跑了。许多士兵表示想转到贝林格将军的波兰军队，但没有人带头这样做。国家军指挥部极力说服起义参加者相信拉多姆的起义进展顺利，那里国家军战士几乎每天都要解放一些居民点。”

七、今天白天我们的空军在起义地区上空进行了侦察飞行。据飞行员报告，街道上除单个行人外没有发现交通往来，地面也没发出任何信号。应该说，这是由于敌人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炮击、起义者进入地下室所致。只有在加强对起义者的武器、弹药、粮食和药品供应的情况下，他们才能进一步活跃起来。

关于布拉格的情况

一、由于德国人加强对城市的射击，一部分居民继续迁往农村，另一部分则藏身地窖。居民中有牺牲。为了给予他们帮助，组织了8个有医务工作者服务的民用医院。

二、9月21日天前，到国家军集合点来的有240人，其中50人来自人民军。布拉格国家军前司令茹罗夫斯基对报到人数少所作的解释是，国家军的队伍分布在不同的地区和布拉格郊区，号召书还没有送到他们手里。

三、9月21日来了两位国家军的联络员，他们的部队共有90人，据称他们的部队应于9月21日满员到达集合点。来到的这些战士情绪高昂，全都准备参加波兰军队，但某些人有所担心，害怕因他们属于国家军而被捕。

四、波兰人民军一个师的前司令科特诺夫斯基中校曾发出命令，号召波兰人民军所有成员参加波兰第1集团军。此命令与茹罗夫斯基的呼吁书相比并没有什么新内容，只是对伦敦分子和新法西斯分子采用了更直率和更尖刻的语调。

补 充

英国和美国空军在空投物资时，实际上没帮助起义者，而是供应了德国人。歼击机和强击机在华沙城区上空的专门观察和地面人员的观察发现，9月18日15时20分至15时25分，100架“飞行堡垒”飞机在华沙城区空投1000个携带物资的降落伞，其中落入起义者占领地区的21个，落入我们部队占领地的19个，而960个降落伞落入德国人之手。空投在4000米的高度进行。这样的高度实际上不能指望投到起义者占领的地区。

一架“飞行堡垒”将10个降落伞投在明斯克—马佐维茨基区，即距华沙40公里处。经查看发现有：炸药、带20发炮弹的迫击炮、两挺带子弹的机枪、10支冲锋枪、3支手枪、冲锋枪子弹、4枚手榴弹、缓燃导火索，以及食品包装盒（100个小罐头、6箱饼干、干饼和巧克力）。武器坠地时被损坏。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02441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战况 给红军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9月25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关于华沙和布拉格的情况通报。

谢尔巴科夫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关于华沙的情况

一、波兰集团军于9月24日一昼夜间采取措施从华沙前沿阵地撤退了各部队的余留人员。据初步材料，423人撤至东岸。位于前沿阵地的共计：人员2289人、手提机枪96挺、重机枪71挺、反坦克枪98挺、45毫米口径火炮22门、85毫米迫击炮28门、火焰喷射器40个。

经询问撤退的官兵们得知，第6、第8、第9步兵团各部队由于多日与优势的敌人进行严酷的战斗，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暂时未能确定伤亡的数字。他们指出，军队的装备基本被毁。部分人员单个地，或者分成小组，进入了起义地区。敌人的空军，总计60架飞机，轰炸了莫科图夫区。

二、在过去一昼夜，没有得到有关起义者占领地区变动的新情报，与第 1 区继续保持着无线电联系。昨天，我们从飞机上向第 3 区投空了军官、报话员和无线电台，但未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通过第 1 区的军官得知，军官顺利地第 3 区着陆，但报话员胸部和头部严重受伤而不能工作。

9 月 24 日凌晨前，在第 1 区南边通宵可闻猛烈的机枪和迫击炮射击声。今天白天和夜晚第 1 区的起义者没有受到敌人的猛烈进攻。

起义者在无线电报中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已进入防御阵地。如果有炮火和空军的支援，如果组织好以后的机枪、冲锋枪、迫击炮、弹药、食品、医药的后勤供应，我们能够守住已占领的地区。敌人在小股步兵的支援下用炮火圈包围我们。在布拉维茨和马雷蒙特有 3 个营的步兵和坦克，你们的反坦克枪使我们能顶住他们的攻击。”

波兰集团军的炮兵今天应第 1 区请求进行炮击。高射炮和空军从空中掩护起义者地区。击落了 5 架敌机。今天 2 时 40 分，我们的军官从第 1 区通过无线电报告说：“请空投粮食，人们饿得浮肿了。”

三、9 月 24 日凌晨前，我们的飞机向起义者占领的地区空投了：45 毫米口径火炮 1 门、火炮炮弹 100 发、50 毫米口径迫击炮弹 2548 发、手榴弹 6500 枚、面包干 1653 千克。

在连续 9 个夜晚的时间内，我们总共给起义者空投了：45 毫米口径火炮 1 门，冲锋枪 1378 支、50 毫米口径迫击炮 156 门、反坦克枪 405 挺、步枪 170 支、德式步枪 350 支、45 毫米口径炮弹 100 发、50 毫米迫击炮弹 34570 发、步枪子弹 1312600 发、图卡列夫式手枪子弹 1360964 发、德式步枪子弹 75000 发、毛瑟枪子弹 260600 发、巴拉贝伦枪子弹 312760 发、手榴弹 12208 枚、德式手

榴弹 9860、粮食 87921 千克、药品 225 公斤、80 型无后坐力炮电池 12 组。

不能肯定这些物资已经全数收到。我们得到的报告只有很小数量送到。但经询问所有来自华沙的人，也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可以认为，没有落入起义者手中的，可能只是极少量的食品。

四、9月23日报告的南区起义者支队（拉多斯拉夫支队）投降德国人成为俘虏一事，已经从不同方面得到验证。已确认投向德国人的人中主要是住在第516街区的平民，也有一部分是拉多斯拉夫支队和贝林格集团军第9步兵团的伤员。

按照我的委托已经询问了从前沿阵地撤退到东岸的第3步兵师第9步兵团的士兵。被询问者中有5人证明，当他们师的部队进入前沿阵地时，国家军支队领导人拉多斯拉夫中校对他们并不友善。第一天入夜时，拉多斯拉夫中校及其指挥部离开第9步兵团支支队驻守的地区去向不明。

这5名被询问的士兵谈到居民、受伤的起义者及第9步兵团战士投降德国人的情形，据他们所述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9月22日晨，起义者支队有大尉军衔的队长（姓名不详，在拉多斯拉夫中校失踪后留下来带领起义者）与波兰第9步兵团参谋长洛德舍诺克少校一道，于9时正向德国人派去军使，建议停火并接受位于前沿地区的大群居民和受伤战士。德国人接见了军使，停了火。此后，由居民和少数的负伤起义者及第9步兵团士兵组成的一大群人被带到中立的广场。当这群人来到广场以后，德国人开始了以暴风雨般的炮火轰击前沿阵地，并向前沿阵地发起猛攻。对这些士兵和军官的询问由奥泽良斯基少校进行。

五、在波兰集团军中已经不是第一次以恶劣的作法对待陷入困境的自己人的命运。

例如，在波兰部队试图夺取普拉瓦区的登陆场失败以后，他们

在一个岛上留下第 2 步兵师的一组士兵，历时 7 天，没有食物和医药。这件事被接替登陆场上的波兰人的高加索第 7 军发现。

在维斯瓦河东岸，在几艘被敌人打坏的平底船里，发现了 15 具严重腐烂的波兰士兵和军士的尸体。这些尸体没有及时运走和埋葬。

就此我于今日对贝林格中将和政治教育部部长发出严格的指令。我要求他们调查这些事件并严加惩处。

关于布拉格的情况

一、9 月 23 日 16 时整，国家军 335 人来到布拉格市集合点，其中军官 49 人、准尉 24 人、军士 103 人、列兵 114 人、妇女 45 人。

波兰人民军来到集合点的计 43 人，其中军官 3 人、准尉 1 人、军士 6 人、列兵 18 人、妇女 15 人。

国家军的人员交出了武器：手提机枪 6 挺、冲锋枪 6 支、手榴弹 235 枚、步枪 34 支、手枪 4 支，反坦克枪 2 挺、各种子弹 17000 发。波兰人民军的人员交出 4 支手枪。

二、布拉格市第 5 区（第 5 区占布拉格的较大部分）国家军副指挥官索斯尼茨基·安德烈在与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巴格诺夫斯基谈话时声称：“起义开始前，国家军第 5 区多达 2000 人，起义时前来登记的约有 1500 人。起义后第 5 区留下的人数不超过原国家军人数的四分之一。”

曾在国家军第 5 区司令部负责情报工作的索斯特莫诺克上尉声称，他们区的绝大部分人来到了集合点。曾任国家军第 5 区连长的佩达凯维奇证实了他的话。

9 月 23 日，从来到集合点的国家军人员中挑选了 162 人加入

波兰第1集团军。在出发前往部队时，第5区指挥官博布罗夫斯基少校宣称：“波兰人，你们现去第1师，这是意想不到的，基涅维奇将军（基涅维奇将军是来自波兰第1集团军的布拉格市城防司令）在某种程度上欺骗了我们，因为按照贝林格的命令我们要去另一个方向执行别的任务。等着吧，我们的指挥官快要来了，我们将证明，我们的部队没有垮。”

博布罗夫斯基少校做出这样的声明，是因为国家军的领导要求红军司令部将国家军第36团留在布拉格市，不解除其武装也不改编。这个问题由罗拉-日米尔斯基解决，但不知为什么他拒绝了他们的这一要求，尽管我个人以为在更换一部分军官后可以保留团队的番号和团队的旗帜。

三、根据布拉格市第5区国家军军官们的声明已查明，9月17日16时整，第5区的军官们举了会议，会上博布罗夫斯基少校向与会者宣布，他们应该到波兰军第36步兵团和他们一道同我们的敌人德国人战斗。军官们完全支持这一建议。9月23日，一部分国家军人员知道他们将要被调往波兰第1师后试图逃跑。

巴格诺夫斯基上尉（方面军政治部工作人员）从国家军第5区的5名军官那里，没收了他们发行的5期简报。

1944年9月18日的第43号简报说：

“从昨天起，在华沙被称作波兰第1集团军的战士参加了解放华沙的战斗，这个集团军是在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参与下由苏联政府组织的。这支军队是在一年半以前组成的以科希丘什科命名的波兰第1师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由克拉科夫国家军前参谋长、经斯大林授衔的贝林格中将领导。”

在这期简报中，一篇为“贝林格份子”的文章说：

“关于在俄罗斯组织波兰集团军的问题曾在地下刊物上长时间广泛地讨论过，现在有必要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在俄罗斯的波兰

军不服从波兰部队的总指挥，而且与国家军及在英国和近东的波兰部队不协调一致，其结果是不好的。波兰的部队应该是统一的，而且将会是统一的。”

据军官们声明，这种简报现已停止发行。

我请求就以下问题给予指示。

必须在多大规模上进一步给予起义者武器弹药、粮食的援助？起义者的情况确实严重，他们除了红军以外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别人的援助。为了给予最大限度的援助，必须拨给前线 500 吨 Б-70 航空汽油，2000 具载重降落伞。并从中央基地运去缴获的武器：步枪、机枪、迫击炮，因为所有这些已由前线汇集并运往中央基地。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07927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作战处 关于华沙形势的情报

(1944年9月30日)

1944年9月30日20时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捷列金中将同志：

一、敌人在消灭了莫科图夫地区起义队伍后向若利博什地区施加了更大压力，并开始向中央地区起义者发动进攻。

在1944年9月29日一天内，若利博什地区的起义者同有空中支援的、占优势的敌人步兵及坦克部队进行了苦战。1944年9月29日18时40分该地区起义者通过电台报告说，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涅果列夫斯基大街以南地区，他们同时请求炮火及强击机支援。从1944年9月29日夜到30日晨，敌人的大炮和迫击炮以强大火力轮番轰击若利博什地区。

根据起义者请求，白天波兰第2步兵师的炮兵在空军第16集团军战斗机的协同下，压制住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及炮火。据初步统计，全天出动飞机156架次，炸毁大炮6门，汽车4辆，并压制住了敌4个野战炮兵连和2个高炮连的火力。

波兰第1集团军指挥部已采取措施以保证若利博什地区起义队伍向维斯瓦河东岸撤退。

通过波兰第1集团军指挥与中央地区起义队伍的电台联系已恢

复并得到维持。

至 1944 年 9 月 30 日前，这一地区并未感到敌人的很大压力。显然，敌人在向该地区集结军队，并已从 9 月 30 日晨开始了坚决的进攻。

在 1944 年 9 月 30 日 13 点 15 分发给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电报中，“波尔”^① 将军报告：“莫科图夫于 9 月 27 日失陷。我们被包围在城市中心和若利博什两个大包围圈中，食品极其匮乏。如果苏联红军在三天内不能占领华沙，如果我们不能立即得到空中支援，以及空军及炮兵部队不能对早些时候指定的目标实施猛烈炮击，我们可能坚持不了三天。”

在这份电报之后，紧接着收到了来自中心区的简短的电报：“形势严重。”

按照起义部队的请求，波兰第 1 集团军炮兵及我空军部队压制了敌人火力及地面部队。

二、今天 12 点我们驻中心起义地区的军官通过电台报告：“国家军指挥部于 9 月 28 日决定，就将居民从起义者占领的各街区撤离问题同德国人举行谈判。请采取紧急措施，因为这种谈判将会导致起义者的全面投降。”

居民们对援助食品的行动非常欢迎，并在各种集会、会议和谈话中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1944 年 9 月 29 日夜我空军没有向起义地区空投物资。

在 13 个夜间总共向起义者空投了 45 毫米炮 1 门、冲锋枪 1378 支、50 毫米迫击炮 156 门、反坦克枪 505 支、步枪 170 支、卡宾枪 522 支、德制步枪 350 支、45 毫米炮弹 300 枚、50 毫米迫击炮架 37216 个、反坦克枪弹 57640 发、步枪子弹 1312600 发、图

^① 即布尔。下同。

卡列夫式手枪子弹 1360984 发、7.7 毫米子弹 75000 发、驳壳枪子弹 2606000 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 312760 发、手榴弹 18428 枚、德制手榴弹 18270 枚、50 毫米迫击炮弹 11658 发、药品 515 公斤、电话机 10 部、电话电缆 9600 米、电话交换机 1 部、电话电池 10 箱、80 型无后坐力炮电池 22 组、食品 126681 公斤。

作战处副处长、上校 克拉马尔

No 07928

苏军情报员奥列格 关于华沙局势的报告^①

(1944 年 10 月 1~2 日)

1944 年 10 月 1~2 日夜

与波兰起义者建立联系

我于今年 9 月 21 日跳伞降落在华沙中央地区的郭日大街。在这一地区果然有人民军的部队在活动。我立即被送到人民军指挥部森克少将^②那里，他和他的参谋长罗曼一起接见了我。

森克少将很高兴会见我，并向我描述了华沙的总体情况。据他讲，形势非常严重，居民和起义者在挨饿。起义被无限期拖延下去。森克表示，非常高兴我作为红军代表的到来，同时警告我不要太信任国家军代表，他们对红军和苏联持敌对态度。

9 月 22 日斯卡科夫斯基将军接见了，斯卡科夫斯基将军身兼人民军、波兰人民军部队、保安军的领导人。他许诺给我全力的支持，开列了急需的武器弹药及食品清单。他还警告我对国家军必

① 奥列格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员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科洛斯中尉的代号。1944 年 10 月 9 日，苏联政府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尼·阿·布尔加宁将此文件寄送最高统帅斯大林。

② 尤瑟夫·森克·马列茨基，人民军总司令部长官。

须持谨慎态度。

随后我被送到中心起义地区的曼达尔将军司令部。曼达尔将军和其副手瓦赫诺夫斯基中校及参谋长希鲁尔克中校接见了。参加会面的还有一个穿着便装的人，这个人我不认识，而实际上是他在主持会议。在事先未同此人进行协商的情况下，曼达尔不能作任何答复。

在我说我是红军军官，来此是为了建立联系之后，曼达尔将军的第一个问题是：“您是否有全权解决政治问题？”在我做出否定的回答后，曼达尔失望地说：“您不是作为政治代表来的？很遗憾，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再次强调了我是作为军事代表和联络官前来的，以协调武器弹药和食品的空投问题，互通敌军情报及向红军指挥部转达起义者的计划和愿望。

曼达尔在谈话中说：“我们只需要武器弹药，不要食品，因为食品有美国人和英国人提供。”曼达尔答应提供一张所需物资的书面材料，同时许诺提供敌军情报。会谈气氛比较拘谨，可以看出他们对我这个红军代表所持的态度并不友善，并且心存疑虑。

会谈后我被安置在一个有警卫的特别处所。我的电台报务员先前在跳伞着陆时严重受伤，而在建立电台联络时又触雷，再次受了致命伤。

波兰华沙起义者行动计划和过程

起义筹划和准备已久，英国提供的武器弹药储备被存放在若干个秘密仓库里。由伦敦政府领导的国家军组织充当起义的领导。包括民主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没有参加起义的准备工作。起义的目的是在红军部队占领华沙前控制整个城市，占领华沙之后，以米科拉

伊奇克为首的波兰政府应立即抵达华沙。国家军制定的任务之一是占领政府及各部所在地。

从 1944 年 8 月 1 日 5 时起，国家军在全体市民协助下开始了武装行动。人民军、波兰人民军、保安军等民主组织被置于既成事实面前，但他们仍决定支持起义。

起义初期进展顺利，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城市的中心区，包括政府及各部所在地。他们曾预计很快会占领全华沙。注意到苏联红军部队在谢德尔采地区的迅速推进，国家军司令部才发动了起义。

起义的准备和行动是由伦敦政府的代表领导的，其中有几位长期在波兰的部长。此外特地从伦敦来了一位米科拉伊奇克总理的副手，他常驻华沙。（未能查明他姓什么。）波尔将军是正式的领导人（波尔现名格拉夫·科莫罗夫斯基）。波尔的个人身份严加保密。官兵中没有一个人见过他，可以接近他的只有曼达尔和几名上校。所有个人特征都保密，因此没有人能说出波尔在不在华沙。

以波尔的名义出来说话的是他的副官古捷克将军（个子不高，55 岁左右，着便装）。古捷克主持了官方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通报了伦敦政府和波尔将军本人的命令。

斯卡科夫斯基将军始终没有受到波尔的接见。

我在曼达尔的指挥部得到的正式侦察报告注有“供波尔将军签阅”。

到 9 月 10 日起义明显受挫。食品及武器储备消耗殆尽。由于在各组织之间，特别是在国家军和人民军之间存在分歧，使得不能同德国人进行有效的斗争。为了消除分歧，国家军和人民军进行了纯军事性质的接触。

在起义的第一阶段，人民军领导人不敢反对国家军，因为组织上更强大的国家军曾以彻底消灭人民军相威胁。但是在持续的残酷的战斗之后，国家军领导人又被迫同人民军进行军事接触。人民军

部队由曼达尔统一指挥。起初在每个地区都有国家军和人民军的连队活动，后来国家军和人民军取得了几个独立的防御地区。

初期全力支持国家军的平民，在同德国人战斗的过程中看到了国家军计划的失败。居民们明白，起义是在与红军没有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开始的。反动分子发起的反苏宣传开始失去民心。居民中出现了反对国家军领导的抗议行动，也出现了惊恐和投降情绪。9月18日发生了平民反对国家军领导的武装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国家军，因为它成了致使红军没有进入华沙和向平民提供援助的因素。

在我抵达华沙的时候，整座城市都在挨饿。士兵们一天中所能得到的食物早上是热水，白天和晚上是热的咖啡代用品。没有面包和米。而平民甚至得不到任何食物。同时在城中存在着猖獗的食品投机倒把现象。在市场上什么都能买到，包括荤油和面包。买卖只用黄金和美元。

显然在城里的大工厂主和大地主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食品储备，这些食品都有武装人员看护。受伦敦政府领导的市议会没有对解决居民供应问题采取任何措施。每天都有数百人因饥饿和生病而死亡。

国家军领导的正式宣传部门每天发布一次消息公报，确认英美空军部队为平民空投食品、为起义部队空投装备的行动是富有成效的。而事实上英美空军的行动没有任何效果。9月14日组织了一次有80架重型飞机的大张旗鼓的行动，他们在近3000米的高空空投了大量物资，其中至少有95%落到了德国人手中。

对红军和苏联所持的态度

根据伦敦政府的命令，国家军领导人在起义者及平民中间开展了公开的反苏宣传。出现了“在维斯瓦河创造‘第二奇迹’”的口号，即不让俄国人进入华沙。国家军宣传断言，红军将把波兰人大

规模地从波兰迁往西伯利亚并让俄国人在波兰地区定居。卡廷的名字不只一次被提及。

起义初期，苏联和红军受到了大肆攻击，因为他们未能像英美一样援助起义者。在苏联空军开始向华沙空投物资之后，国家军领导人依然认为空投的物资来自英国，它先运到莫斯科，再从那里由苏联飞机运送。

反动政治组织选派一些专门宣传员，让他们深入到士兵与平民中间，鼓动他们反对苏联红军。

众所周知，苏联飞机是在低空、不用降落伞空投物资的，所以一些物资破损了。上面提到的反动宣传员对此解释为，破损了的物资都是苏联的，而完好的物资都是英国的，英国的物资包装得好。

随着苏联红军空投物资和从空中掩护华沙行动的开始，苏军炮兵炮轰了德国人在城里的炮兵阵地，国家军反苏宣传在广大群众和起义者中开始失去立足点。平民开始改变对红军的态度，特别是在把来了一名红军联络官的消息公诸于众后，这种态度上的转变更加明显了。如果说一开始在国家军宣传的影响下，贝林格的波兰军队被认为是“来自西伯利亚的投敌分子”，那么在占领了布拉格之后，居民们开始转向支持红军和卢布林政府的民主组织一边了。

利用有利形势，人民军及其他民主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每天发布若干公告阐明形势和卢布林政府的要求。到起义后期，所有居民都急切地期待着红军的到来，并指责国家军发动了导致数千和平居民丧命的起义是犯罪。类似的情绪也出现在国家军内部。

在国家军指挥部里，对我这个红军联络官的态度都很谨慎。我的各种要求曾多次被拒绝。比如，当我要求把一张字条转交给若利博什地区的苏联军官时，开始他们保证过三个小时一定会送去，后延长至三天，到最后表示不能办到。

那些反动分子，首先是国家军地下战斗组织，即所谓的“波兰

保安军”，他们很明显地奉行民族主义政策。

所有留在城中的乌克兰居民都被驱逐或是枪杀。德国人没来得及杀害的犹太幸存者也被“波兰保安军”消灭了。

“波兰保安军”发动了几次对从德国人手里跑出来的苏联战俘的专门搜捕，他们企图抓住这些人质以便今后同苏联红军作交换。例如，在国家军手中作人质的有尼古拉·鲁米扬采夫大校、尼古拉·戈洛杰茨基少将和医学博士亚利山大·达尼洛维奇·叶尔绍夫。

国家军代表曾企图枪毙沃尔科夫少将，而且一名军官扬言：“在卡廷你们枪杀了我们的人，我们也要枪杀你们的人。”这样被杀害的有波兰第1集团军第9步兵团的官兵，他们是在切尔尼古夫地段被德国人击溃后跑到中心区的。告诉我这些情况的梁赫诺团的一名中士在同我谈话后不久就被杀死在街角。

考虑到居民和士兵总体情绪的变化，国家军官方宣传机器很快被迫调整了自己的宣传政策，由公开污蔑苏联变成间接中伤。例如，当苏联飞机开始大规模空投物资后，国家军的政要们不能像以前那样对事实保持缄默了。仅是在近日的一份公告上发表了一篇以《感谢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为标题的文章。这是第一次官方承认红军参与了援助华沙的行动，但同时国家军并未放弃诋毁苏联和红军的会。

曼达尔将军几次把必需的武器的清单转交给我，同时交了一份他自己的“战略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建议红军以侧翼迂回突击，而不是正面强攻的方式火速夺取华沙。在曼达尔司令部，军官们对为什么红军至今没有发动进攻曾多次表示不满。

国家军和人民军之间的关系

国家军和人民军是起义者中的主要军事和政治组织，在他们周

围聚集着其他一些成分。国家军和人民军之间的关系一直紧张。

尽管他们之间建立了军事接触和合作，但国家军并不把人民军看成是平等的组织。不邀请人民军的代表参加军事会议，尤其是政治会议。人民军指挥员森克少将只能自己去了解形势的所有变化情况。

初期，波兰保安军受命搞针对人民军领导人的恐怖活动，在人民军内部扶植代理人。人民军的士兵因为很小的过错就被拘捕或被枪毙。

在中心区人民军部队不到 2000 人（包括波兰人民军和保安军在内），而国家军有 5000 到 6000 人。起初国家军没有发给人民军任何英美空军空投的武器。此外，在我抵达之前，国家军领导人不允许人民军部队点燃火堆以便得到苏联空军空投的物资。只是后来人民军才得到这种权利。

领导人民军、波兰人民军和保安军联合部队的斯卡科夫斯基将军被认为是一名纯粹的军人，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曼达尔将军曾试图把斯卡科夫斯基将军拉到自己一边，好几次把他叫来密谈，但一无所获。

随着事态的发展，人民军主张同红军和卢布林政府合作的政治口号得到越来越广的传播。开始有大量的国家军官兵请求加入人民军部队。由于不希望同国家军发生冲突，人民军领导人拒绝接收这些人，但是对这些人作了专门登记。此外还有大量各种各样的民间民主组织和团体加入了人民军。这样，人民军领导人注意到在国家军背信弃义的情况下有可能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但是人民军并不想这样做，他们要保持在对德斗争中不可或缺的统一。

国家军领导人迫害倾向人民军的官兵。例如，国家军米契拉夫·尼齐杰茨基少将由于同情人民军而被捕，并被以好像战前有海外关系等罪名送上法庭。

人民军的立场在居民中赢得了广泛支持。人民军、波兰人民军

和保安军致信最高统帅斯大林大元帅同志，感谢他所给予的援助，并许诺与罗拉·日米尔斯基上将的波兰军队一起开展对德斗争。

据我估计，近来有近80%的国家军士兵和下层军官准备投向人民军。由于同卢布林政府没有联系，人民军领导人感到有很大的困难。常驻华沙的两名卢布林政府成员没有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①取得联系，因为没有电台。

在军事方面，人民军部队夺取了一些独立的地区，并对这些地区负起全部责任；这些部队虽隶属于卫戍部队长官曼达尔的领导，但实际上是独立的。全部侦察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武器和食品也得靠自己。

空军空投物资的接收

国家军领导人没有设立有组织的物资接收与分配系统。起初物资全部集中到了国家军部队手中，而在9月下旬国家军和人民军组织了起来。规定物资落在谁的地区就归谁所有。

此外，大量的物资，主要是食品，落到了平民手中，而在平民中也没进行有组织的发放。近来士兵和平民吃的只是苏联供给的面包干。在部队中不发热饮而是浓缩汤料食品，偶尔发些面包干。

伦敦政府代表的活动

起义初期，在国家军的伦敦政府代表，其中包括米科拉伊奇科的副手，从地下转入公开活动。

^① 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1944年7月22日，被选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主席兼外交部长。

但在开始显现失败迹象后，他们很快就重新转入秘密活动。

伦敦的代表通过市议会机关和国家军宣传部门进行活动。其活动的主要方面是：

一、动员所有居民帮助国家军。

二、迫害所有试图同红军接触的人。

三、解决涉及平民的问题。后来伦敦政府代表倡议把和平居民移交给德国人和让起义者投降。

国家军投降的准备和行动

由于起义失败，国家军指挥部开始准备将来的投降并转入地下活动。伦敦政府通过自己的代表下令将国家军指挥部的几个处转入地下，准备几个秘密仓库等等。波兰保安军在其中起了特殊作用。

转入地下的波兰保安军的任务是：在红军进入华沙后，进行针对波兰贝林格军队、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准备在城里发动第二次起义的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启用藏在华沙城外的未曾动用过的武器弹药储备。

此外，在苏联空军向华沙空投军用物资期间，国家军部队将获得的武器弹药藏了起来。包括曼达尔指挥部在内，总是将得到的物资数字少说一些。

莫科图夫陷落后，国家军军官们每人都带走 4~5 挺苏制冲锋枪，而当时在作战部队中的冲锋枪很少。

9 月 24 日，德国人用近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在炮兵和坦克协同下向莫科图夫发起猛攻。此前国家军领导中对此地段并未给予充分重视。莫科图夫没有设防。

国家军军官们表示：“我们不需要红军，我们自己就能解放华沙。”部队中充斥着无纪律现象。这导致了 9 月 27 日莫科图夫的全

面溃败。地区指挥员卡洛里上校跑到了中心区，在那里他似乎被送上了法庭。

国家军领导人开始在士兵和居民中间散布谣言，说德国人向起义者发布了强硬的最后通牒，以此为投降作舆论准备。似乎市议会的人已经就平民疏散问题开始同德国人进行谈判。国家军早些时候曾试图就疏散平民问题同德国人谈判，希望以此恢复自己在华沙居民中的威信。9月10日有近3000人离开华沙，他们被德国人安置在华沙以西30~40公里的几个集中营中。

然而在红军占领了布拉格之后，居民开始抗议国家军的投降主义情绪，后者被迫停止了谈判。

国家军指挥部于9月28日执行伦敦政府的命令，重新开始了与德国人的谈判。国家军指挥部同德国人在钢铁大街就当前的投降事宜举行了首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曼达尔将军、斯拉夫波尔上校、吉戈蒙特中校，还有三名德国军官，都是驻华沙地区德军指挥官的代表——党卫队及警察局冯·登·巴赫^①将军的代表。在会上讨论了以下问题：

- 一、投降的条件。
- 二、制定德军行进路线。
- 三、为国家军指挥员们撤离制作专门通行证。

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军领导人要求所有国家军军官宣誓绝对执行国家军的一切命令，不管是什么样的命令，同时发出指示，只有国家军代表签署的文件才被承认。

国家军指挥部在平民和士兵面前肯定地说，就城市居民疏散问

^① 冯·登·巴赫—齐列夫斯基，党卫军上将。因领导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爱国者反抗，被称为德军中镇压起义的专家。1944年8月上旬，奉命来到华沙，是镇压华沙起义的德军部队总指挥。

题进行的谈判是由市议会的代表主持的，国家军指挥部与这次谈判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次会议在博尔曼工厂举行，讨论了和平居民疏散问题。会上德国人建议由波兰组织的代表组成两个委员会：

一、由伦敦代表和红十字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应到华沙西区由德国人为早些时候从城内出来的平民建立的集中营去一趟。应让这个委员会相信，德国人似乎为疏散居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由国家军军事指挥部代表组成委员会，视察德国在华沙的部队和阵地。应让委员会相信德国的兵力占优势。

这两个建议都被采纳了。第一个委员会到集中营进行了视察并报告说，在那里每个居民平均每天得到 250 克面包，拥有医疗保障等等。而事实上很清楚，德国人为居民提供的条件让人难以忍受。盖世太保组织很快速捕并枪杀了所有民主分子。年青人被运到德国做工。集中营内死亡率很高。

第二个委员会由曼达尔的副手瓦赫诺夫上校领导，转遍了所有驻有德国人的地区。回来后瓦赫诺夫向国家军指挥部报告说，德军兵力相当强大，与其对抗毫无意义，所以必须投降。同时，国家军领导人和其他反动分子在居民和士兵中展开广泛宣传。有谣言说，似乎德国人同英美签定了停战协订，并同英美一起开始对俄国作战。另有谣言断言，苏联部队已经撤离了布拉格。

为了给投降作舆论准备，有谣言说，投降之后，在英美的帮助下，会顺利地用德国俘虏把波兰人换回来。

德国宣传机器号召波兰人立刻投降，说将会把武器还给所有波兰起义者去抵抗苏联红军。

由于持续不断的饥饿，缺水，经常遭到炮击和轰炸，平民倾向于投降。同时士兵中特别是在国家军中的不坚定分子也被这种情绪所控制。

人民军对投降的态度

人民军指挥部及其他一些民主组织并没有得到国家军代表有关准备投降的通知。人民军的领导人坚决反对投降行为并要求继续斗争下去。

9月27日在同我进行的会谈中，斯卡科夫斯基将军表示：“我将以行动反对投降。”斯卡科夫斯基将军赞同与贝林格的军队联合的计划。人民军部队的领导人也支持继续斗争下去，支持与红军接触。

但是人民军的政治领导人考虑到形势特别困难，尚未决定同国家军公开决裂。国家军中的民主分子及大量寄希望于红军的和平居民，也附和反对投降的人民军。

国家军内部的分化

军事及政治问题上的巨大分歧，使国家军领导层，特别是中下层组织发生了分裂。

国家军和伦敦政府的反苏路线彻底垮台了，并自毁了在平民及国家军普通士兵心目中的威信。伦敦的代表再也不能抑制在起义者心目中对红军的赞许之情。

我与一些军官有私交，他们最初坚决反对同红军和贝林格的军队联盟，而到最后，他们开始对此表示赞同，并表示自己准备转到人民军的立场上来。

波兰保安军的恐怖活动开始引起抗议。国家军领导人未做出继续搜捕俄国战俘的决定。如果说原先在国家军部队中的俄国人得不到任何食物的话，近来国家军指挥部被迫承认了他们完全平等的权利。国家军指挥部甚至允许原俄国战俘沃尔科夫少将组建由俄国战

俘组成的战斗分队。

在国家军领导成员中也有一些人反对投降。比如地区指挥官之一的博古米尔上校。

国家军开始寻找在伦敦政府的政策与起义者要同红军建立牢固联系的要求之间达成妥协的可能性。甚至像瓦赫诺夫斯基这样的反动分子，为了恢复自己的威信，也表示希望在罗拉-日米尔斯基与伦敦之间达成妥协。而与此同时，他们又为全面投降进行准备。

国家军领导人在军事问题上表现出漫不经心。只是近期才加强了构筑战壕的工作。街垒工事并不完善。在国家军军官当中多次出现酗酒现象，特别是在莫科图夫地区。

在国家军组织中表现出政治分化的迹象。众所周知，索斯科夫斯基将军被解职，而用波尔代替了他。有不明确的传闻说波尔将退休。伦敦来的通知证明了在政府内部存在着矛盾，在米科拉伊奇克与部长们之间有分歧。

9月29日，米科拉伊奇克的副手（军衔似乎是上校）将斯卡科夫斯基将军请去，谈话内容涉及两个问题：

一、斯卡科夫斯基将军对投降行动所持的态度问题。对此斯卡科夫斯基坚决反对，他要求继续进行抵抗运动，直到最后。

二、斯卡科夫斯基将军对由他接替波尔将军任总司令的问题持什么态度。

米科拉伊奇克的副手强调，不论是伦敦政府和卢布林都会批准斯卡科夫斯基的候选资格。斯卡科夫斯基似乎对此问题没给予进一步答复。

投降活动的进行

在9月29~30日之前，国家军指挥部完成了投降的准备工作。

150万兹罗提的货币储备被埋藏起来。相应的组织作好了转入地下的准备。

根据与德国人签订的协议，9月30日开始了第一批平民的疏散。时间定在每天的5~19点，其他时间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国家军的官兵中开始惊慌失措，他们换上平民的服装，同和平居民一起走了。人民军仍然抗议投降。

9月28日晚上我拜访了曼达尔将军。出席会谈的有巴赫诺夫斯基上校和参谋长希鲁尔克上校。

我向曼达尔将军表示：“作为苏联军官，我建议仔细研究转移到维斯瓦河对岸的计划。为确保维斯瓦河东岸的炮兵掩护和步兵支援，同红军协调行动问题由我来负责。必须集结一切起义者兵力以打击敌人；有足够数量的冲锋枪、反坦克枪和弹药给他们。我请求仔细研究您的计划并把它告诉我。”

曼达尔将军回答说：“我会考虑这个问题。但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红军不来支援我们？”巴赫诺夫斯基上校宣称：“计划很好，但我们没有足够的弹药。”

对我的提问——起义部队怎么会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得以一直坚持，巴赫诺夫斯基回答说，起义没计划进行这么长时间等等。

就这样，我没有得到对我建议的答复。

在同斯拉夫波尔上校和博古米尔上校的谈话中，我向他们阐述了这一计划。他们对此热烈赞扬，但他们说将服从于国家军指挥部，不会违背它的命令。

正如我上面说过的，人民军指挥部同意我的计划。

9月29日，我通过书面和电话两次同曼达尔联系以寻求答复，但没有任何结果。这一天在曼达尔指挥部人们拒绝向我提供敌人的情报，理由是似乎没有什么情报可提供。

10月1日晚上，曼达尔将军的代号“篮子”的副官博古斯拉

夫斯基大尉拜访了我，他一直对我和红军持同情态度。博古斯拉夫斯基大尉警告我以下内容：

一、国家军指挥部决定全面投降。

二、我必须立即离开，因为正准备谋害我这个红军代表。

对形势做出判断后，我决定撤离，并通过电台报告了此事。我通过城市下水道，沿着提前侦察好的路线来到维斯瓦河，泅水到达东岸的波尼亚托夫斯基桥地区。这一路线我也告知了留在华沙的卢布林政府成员。

有关卡卢金大尉的活动

到华沙后我了解到，在我抵达前 3~4 天，有一位卡卢金大尉离开这里去了苏联。他曾在曼达尔司令部供职，被认为是苏联指挥部的官方代表。人民军的军官们对我说，卡卢金曾得到曼达尔的充分信任并被曼达尔称为“苏联武官”。卡卢金参加了国家军指挥部的所有军事会议。

卡卢金起草过传单，向德国军队中的俄国哥萨克叛徒发出呼吁，号召他们站在红军和起义者一边。这些传单由飞机进行空投。

卡卢金的个人特征是一只手少了两或三个手指。卡卢金被曼达尔派往东岸，他似乎带着重要的计划。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处副处长

上校 奥泽利斯基

大尉 别兹明斯基

№07929

红军总参谋部关于停止向华沙运送物资 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4年10月2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同志：

现提交美国军事使团团长达恩少将有关向在华沙的游击队员提供帮助的信件副本。

能否通知迪恩少将，由于波兰起义者已停止抵抗，不宜继续实施向华沙空投食品的行动。

请您批准。^①

红军副总参谋长、大将 安东诺夫

附件：

美国大使馆

美国军事使团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莫斯科

红军总参谋部

尊敬的马卡罗夫上校：

① 档案原件上有莫洛托夫的批示：“同意。维·莫洛托夫。”

我驻波尔塔瓦总司令克斯列尔将军收到了苏联指挥部关于同意实施从英国向在华沙的游击队员空投食品行动的通知。但由于天气恶劣，10月1日未能实行。

克斯列尔将军现通知我，当向苏联指挥部提出于10月2日开始实施这一行动的问题时，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并指出不会批准任何更晚的日期了，因为所有的游击队员已从华沙撤退。我刚收到斯巴兹^①将军的电报：他请我从红军总参谋部获得正式证明。能否请您不晚于今晚通知我，苏联政府是否因在华沙的游击队员已经开始撤离华沙，打算取消向华沙的游击队员空投食品的决定。

您真诚的 约翰·P. 迪恩
美军少将、美国军事使团团
长
1944年10月2日

^① 卡·安·斯巴兹，时任美国驻欧洲战略航空队和驻意大利第15航空队司令官。

№07930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准备投降 给总政治部的电话报告（节录）

（1944 年 10 月 3 日）

1944 年 10 月 3 日 22 时 25 分至 23 时 50 分

——希金中将在电话旁。

——捷列金中将在电话旁。您好，希金同志。我转告您一些情况。
关于华沙的局势。

在 10 月 3 日一直保持着同中心区的无线电联络，但信号极不稳定。

在 9 时 30 分曾接收到无线电报，其内容未能破译，这就多少证实了我们的猜想，这一地区还存在着当时没有向我们发报的另一部无线电台。

我们已有资料表明，同时伦敦电台的通报也证实了，昨日 22 时中心区已经投降了。昨天从中心区撤出的方面军参谋部情报员“奥列格”大尉和女情报员、无线电报务员“维多利亚”向我们提供了如下材料。

一、“1944 年 9 月 29 日在华沙召开国家军新闻记者招待会的通知”，内容如下（文件用打字机打出）：多次试图加入同国家军的谈判后（8 月 18 日和 9 月初，两次向若利博什和莫科图夫提出建议），9 月 28 日德国人又一次提出进行谈判。其主题是涉及平民命运的一些问题。德国人强调指出，战斗的持续进行使和平居民遭受

了巨大的损失，并造成粮食不足这一严重后果，他们还散发了冯·登·巴赫（德军指挥官）的声明，据此，在占领华沙之后全部平民将从华沙撤出，因为华沙将被视为前线城市，平民不能再留在那里。

谈判期间德方建议，由专门的波兰军事与平民委员会对已从华沙撤出的居民和在莫科图夫被俘的国家军士兵生活状况进行检查（食品、住房条件、医疗帮助）。

德军司令部建议，为把平民撤出华沙送至各解送站，波兰红十字会政权和 PTO 曾保证向伤员和病人提供交通工具。

说明：PTO 是一个帮助居民的非军事组织，成立于 1939 年。该通知是“奥列格”在国家军一支部队的参谋部获得的。

第二份文件是国家军中校扬·奥冈奇克－米里文斯基博士寄给罗拉－日米尔斯基的。

内容如下：

“致波兰军队总司令米哈依尔·罗拉－日米尔斯基上将，扬·奥冈奇克－米里文斯基中校向将军暨波兰军队总司令敬礼，并报告我本人和国家军全体军官听候您的命令。这些军官是未来华沙师的基础。请像索列尼赞特^①那样，接受热烈的祝福（索列尼赞持一词我们无法翻译，只能这样表达）。

由于招募军官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将继续进行招募。请对此保密，请不要公开这份电报。请发布允许继续招募军官的书面命令。扬·奥冈奇克－米里文斯基博士，国家军中校。”

关于中心区和其他地区准备投降的情况，“奥列格”大尉讲述如下……^②

^① 索列尼赞特，指过命名日的人接受人们美好的祝福。

^② 原文如此。

——捷列金同志，您刚才所说记录中提到的留在第1区的军官是“奥列格”大尉，还是其他某位军官？

——是“奥列格”，他是我们的军官，和无线电报务员一起留在中心区，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因此，毫无争议，国家军领导阶层已在9月27~28日决定投降问题了。所以，布尔的电报^①和米科拉伊克就此向我们询问挽救起义者的措施，毫无疑问是政治诡计。所有材料都表明，国家军领导人已经进行了充分接触，并且拖延时间，以为自己争取某些优待。

“奥列格”所讲的伦敦方面的行动，被和他一起撤离的无线电报务员“维多利亚”的话所证实。

明天我将再同他们谈一谈，并汇报更重要、更具实质性的内容。我的话完了。

有关布拉格局势的最新的实质性材料还没有收到。

——“奥列格”大尉的姓是什么？

——“奥列格”是我方的情报员，除非有必要，我只能提代号以代替他的姓。我的话完了。

^① 指布尔将军1944年9月30日发给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电报。参见前面文件№07927。

№07931

红军驻波兰第 1 集团军代表 关于波兰军官证词的报告

(1944 年 10 月 3 日)

致苏联元帅朱可夫同志

红军总参谋部上将什捷缅科同志

现汇报 1944 年 9 月 30 日至 1944 年 10 月 1 日投奔我方的 7 名人民军和国家军军官的审问材料。

上述提到的人民军和国家军军官在审问材料正本上签了字。人民军和国家军的军官是于 1944 年 10 月 1 日在布拉格市机车场地区穿过前线到达维斯瓦河东岸的。

1. 扬·宾科夫斯基少校（曾用名“沙尼亚夫斯基”和“什维德”），若利博什地区的人民军部队司令员，1903 年出生，华沙市民，曾任工会工作人员。

2. 泽农·克列什科中尉（曾用名“泽农”）。1908 年出生于罗兹市，曾为工人活动家，最近任人民军政治处副主任。

3. 爱德华·格罗夏利克大尉（曾用名“亚历山大”），人民军参谋长，1892 年出生，华沙市民，过去是一名建筑师。

4. “康拉德”大尉，人民军参谋部作战处处长。

5. “格夫里克”少尉，人民军排长。

6. “齐格蒙德”少尉，人民军军官。

上述军官做出如下声明：

一、1944 年 9 月底前的华沙起义。提出了对立观点的国家军

和人民军两个组织，在1944年9月底前的华沙起义中起主导作用。如果说所有承认伦敦政府的团体都追随国家军的话，那么人民军就是当时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意愿的中心。

在战斗过程中形成了4个主要的起义中心：

1. 莫科图夫——由来自国家军的卡罗尔上校指挥（约1200人，5个营，连同非武装人员达5000人）。

2. 中心区——由来自国家军的格若克上校指挥（15000人，其中包括非武装人员）。

3. 切尔尼亚库夫——由拉多斯拉夫·扬上校指挥（1944年9月24日德军占领该地区并镇压了起义）。

4. 若利博什（1944年9月30日投降）。

二、若利博什起义军的人员和武器。1944年9月29日起义者有：国家军4个营共1300人，人民军2个营总数约400人。80%的个人武器是步枪。此外，起义者有30门50毫米口径的迫击炮、80支反坦克枪、450支冲锋枪（其中350支苏式冲锋枪）、2~3挺重机枪和14~15挺机枪。该地区的国家军力量由“日维采利”中校指挥（其假名“沃尔采霍夫斯基”较为人知，真实姓名好像是涅泽利斯基）。

若利博什的人民近卫军部队由少校“沙尼亚夫斯基”指挥。该地区同莫科图夫保持联系，并同伦敦直接联系。同中心区没有联系。在1944年9月16日至19日曾与红军和波兰军队建立联系，并定期进行无线电通讯联络。

三、政治派别和他们的相互配合。在若利博什地区有如下的政治派别：

1. 波兰工党，其中包括了最革命的、纲领亲共产党的革命分子。

2. 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左翼党派，并同波兰工人党结成统

一战线。两个组织拥有共同的领导核心——“政治局”和共同的登陆场——沃尔西乌，达成协议并协调自己的策略。

3. 波兰人民近卫军是由具有革命精神的原工会联盟的成员组成的，但却对作为“另一个大国”工具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明确表示出自己的敌对态度。

4. “自由、平等、独立”派^①是由原波兰在社会党的最反动分子组成，同“德芬杰瓦”^②和毕苏斯基^③分子联系紧密。国家军有一个登陆场。这些组织间的本质区别可以归结为：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主义工人党，即人民军是拥护卢布林政府的，而其他组织保留了自己独立的政治观点，拥护并完全服从于伦敦。在军事方面，两个派别有紧密联系。与“日维采利”中校的关系是适当的。只是“罗曼”少校的行为和对人民军军官的轻蔑批评才使一切变得复杂了。（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四、战斗行动的领导、隶属和协调。根据现存的力量对比，由“日维采利”中校负责总指挥。

人民军指挥部随时通告正在采取的措施，并在 1944 年 9 月 30 日前参加了所有战术问题的讨论。尽管“罗曼”少校企图把人民军部队归于自己的指挥下，但人民军指挥部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性，并在若利博什地区拥有两块划分出来的区域。（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五、^④9月底的军事情况（1944年9月29日至9月30日）。1944年9月29日，经过三天的炮火准备，约两个团的步兵在30

① 指 1939 年 10 月由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在华沙重建的波兰社会党派别。

② 指 1918 年至 1939 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的保安警察。

③ 毕苏斯基，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19～1922 年为国家“元首”，1926 年 5 月策动军事政变，成为波兰的独裁者。1939～1945 年参加波兰流亡政府。

④ 根据上下文应为“五”，原文此处脱漏编号。

辆坦克的援助下，发起坚决的进攻并迫使起义者退却。

“1944年9月30日，即德军进攻的第二天，起义军还控制着地区有：克拉辛斯基大街2~20号，斯托列奇那亚—格丹斯卡大街，鲍霍莫里查到普罗梅克大街。”（引自“亚历山大”大尉的证词。）

局势绝对不是毫无希望的。若利博什地区同波兰军队第1集团军就1944年9月30日早上撤退至维斯瓦河右岸及此次行动的空中和炮兵掩护达成协议。在1944年9月29~30日夜由“日维采利”中校召集的会议上讨论了下一步的行动。国家军指挥部建议把各营分成小组，在每幢建筑物里的小组都应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人民军提出了自己的计划：由于同波兰军队有把起义军的基本力量向维斯瓦河方向转移（至米茨凯维奇大街一线）的协议，所以要在新的阵线上防御到最后时刻，但如果防御无法继续坚持，那么就同居民一起撤至右岸。会上基本赞成并接受了这项计划。起义军占领了新的防线，然而，需要通向维斯瓦河道路的人民军得到了最远的西边的地段。（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1944年9月30日早晨未开展行动。在同人民军指挥员的谈话中，“日维采利”宣称：“1944年9月30日早上我们无法撤退，我们应在烟幕的掩护下通过，但风向不利于形成烟幕。行动推迟到1944年9月30日晚。”（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六、^①9月战斗时期的政治情况。正如前面所说，在战斗过程中，各政治党派仍坚持自己以往的主张。“自由、平等、独立”派的公报继续诋毁苏联，认为红军应对城市的毁灭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负全部责任，因为它不允许英国人建立空军基地，以便向起义军提供切实的帮助。波兰人民军猛烈抨击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国内

^① 根据上下文应为“六”，原文此处脱漏编号。

的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国家军的上层领导人，包括“罗曼”少校和“日维采利”中校的副官“斯科奇斯利亚斯”少尉，在谈话中说，苏联打算等到城市完全毁灭之时再进驻。

国家军提出口号：“打败德国人后，剩下的是更强大的敌人——布尔什维克”。布尔将军的公告不顾事实，继续坚持只有美英空军才能给予起义军有效的帮助，认定波兰军和苏联空军的行动是软弱的，而且没有什么有特殊意义。

反对波兰军的宣传持续不断。让军官们害怕的是贝林格似乎要枪决他们或是把他们送往集中营。（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在战斗分队的人员中发生了很大分化。根据近来发生的事件看，国家军的军官和士兵们开始明白，布尔将军的起义是政治性和示威性的。“这不是军事起义”。（引自国家军军官“齐格蒙德”少尉的证词。）“军官和士兵，不分政治属性明确表示对布尔将军领导的不满，有些国家军的军官这样议论：如果不能用政治理由把他赶走，那就让他退休。这样就会更容易同贝林格和俄罗斯人达成协议。”（引自“亚历山大”大尉的证词。）

也有过用尖锐的言词反对布尔将军政治路线的代表“罗曼”少校的事。

国家军的士兵非常讨厌他，认为他是政治投机家。（引自国家军军官“齐格蒙德”少尉的证词。）

“很多军官明白了国家军政治游戏的意义，并在最近去找人民军的代表，希望加入他们的行列。比如，声明加入的有‘日明科伊’大尉、‘什科特’大尉和其他许多军官。为了保持一致，只好暂时拒绝他们。”（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大部分军官气愤地拒绝投降做俘虏。1944年9月29日至9月30日进行的会议结果表明，撤退至维斯瓦河东岸是惟一正确的出路。（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七、国家军领导层对待进步主张的态度。面对所处的困境，人民军领导人和国家军的进步分子认为必须向东突破，与此主张相对立，国家军的上层，其中包括“罗曼”少校、“斯科奇利亚”中尉、“斯塔雷”少尉，他们在1944年9月29日至9月30日夜间的会议上对向东撤退的可行性表示怀疑，而指出另一条出路——投降。

1944年9月29日人民军的领导人有意向波兰第1集团军派去联络人员，“日维采利”中校知道了这一情况，而国家军指挥部却拒绝了人民军以该方式安排建立联络的一切建议。人民军领导人多次坚持在华沙马雷蒙特的工人街区进行防御，在那里人民军有很大的影响，国家军指挥部害怕这种影响继续扩大，用尽办法暗中破坏马雷蒙特的防御，后来又把它让给德国人。这一街区的8000名和平居民或惨遭德国人杀害，或被押往集中营。力图保卫该地区“日米”大尉的营被国家军解散，“日米”大尉被解职。曾表示愿意加入人民军部队的“日米”大尉立刻被召回，以后便失踪了。尽管美英提供帮助的范围很小，而且收效甚微，国家军的领导人却千方百计称赞盟军空军的行动，有意贬低苏联帮助的规模和效果。接收英国物资的国家军军官“什科特”大尉说，英方提供的这些物资起义军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物资都让德国人得到了。由于他表述了这种意见并且同人民军关系很好，“什科特”大尉被撤职了。

八、向东突围的准备和国家军领导人的意见。

起义军很清楚，根据同波兰第1集团军指挥部的协定，1944年9月30日他们应冲过登加-辛斯基大街向维斯瓦河河岸靠近，在那里，第1集团军应为撤退准备好足够的船只。波兰第1集团军应以炮火的拦阻射击和拦截射击，以及从空中轰炸德国军阵地的方式来掩护起义军的行动。但由于能见度良好会妨碍渡河，所以决定在当天晚上再采取行动。

1944年9月30日18时瓦赫诺夫斯基上校来到“日维采利”

中校的指挥所，稍后“日维采利”向人民军和国家军军官宣布，瓦赫诺夫斯基带来了布尔总司令部的投降命令。“泽农”中尉问瓦赫诺夫斯基是如何到达指挥所的，“日维采利”中校开始回答说：“他是乘车来的。”“泽农”中尉第二次问，既然所有的道路都已被封锁了，瓦赫诺夫斯基是如何乘车来的，“日维采利”中校说：“他是从运河潜入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运河的所有出口已在德国人的控制之下。由此很值得怀疑，瓦赫诺夫斯基上校是德军派来的。（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亚历山大”大尉、“泽农”中尉的证词。）

没有征得人民军军官的同意，“日维采利”中校就在瓦赫诺夫斯基上校到来后命令几个营停止射击，并于 18 时在左翼阵地召开会议，通知所有的军官已经收到投降的命令。由于到会的军官都很气愤，“日维采利”中校想方设法力图劝说他们。他拉住他们的手，提醒他们平民所处的困境，设法说服所有的军官，其中包括人民军的军官，说德国人不会杀他们的。（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日维采利”中校向一些动摇不定的军官（“斯拉沃米尔”大尉和“尤尔”大尉）说：“不要绝望，我们不能盲目地去死。投降实际上是保存了我们的将士，我们的时代就会来到的。”（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亚历山大”大尉及“泽农”中尉的证词。）

这一说法在人民军军官引起了怀疑。

因为一些军官（“斯拉沃米尔”大尉、“尤尔”大尉）拒绝执行命令，于是“日维采利”中校散布了谎言。

他宣布：“德军截获了我方所有的电报和波兰第 1 集团军的答复密电。他们知道密码，他们了解局势，为粉碎我方的撤退计划，在通往维斯瓦河的方向建立了一个无法穿越的地带。老鼠也无法在那里停留。通往河岸的通路已被坦克、地雷、铁丝网和步兵布下的

密集的散兵线封锁。‘日维采利’声称，局势要求无条件投降，这是惟一的出路。”（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九、向起义军提供的物质帮助。提供给起义军的帮助是非常令人满意的。从1944年9月13日起苏联空军就没有停止过空投武器和粮食。在1944年9月13日至9月24日期间运送过350支帕金式冲锋枪、122支反坦克枪、32门迫击炮及大量的面包干、粥、豌豆、压缩食品和油脂。大部分空投物品落到了起义军手中。

盟军的空军只在1944年9月17日试图提供帮助。80架美英式飞机从4000米高空空投物资。这一批物资没有落入若利博什地区，而是全部落入了德国人手中。“尽管事实如此，布尔将军的公告继续认定，应把希望主要放在英国方面提供的帮助上”。（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十、全面投降就是这样被挑唆的。可见，进行撤退的所有因素都具备了。武器有了，波兰军队为行动提供的保障有了。在会上，“日维采利”中校说服了其他军官后就派他们到各分队中，准备投向德军。在19时30分，德军司令部的代表，一名党卫军军官来到“日维采利”中校的指挥所。“日维采利”中校称密电被截获的说法被证明是谎言。当20时50分波兰第1集团军的炮兵开始炮击时，“日维采利”找到人民军指挥部，请求“科罗里”大尉保持同波兰第1集团军的联系，通过无线电要求停止炮击。

答复如下：“中校先生，既然知道德国人知道密码，就让他们用密码联系吧！”无言以对。（引自“泽农”中尉的证词）

波兰军非常猛烈而且准确的拦阻炮击白费了。在“日维采利”中校所说的德国人似乎建立了坚不可摧的防线的影响下，倾向于投降的国家军军官宣布需要2~3小时这样的火力，以为撤退打开大门。在炮击进行时，士兵小队在克拉辛斯基大街16号集合以便投降。

“瓦赫诺夫斯基”和“日维采利”达到了投降的目的。（引自“沙尼亚夫斯基”少校的证词。）

尽管人民军指挥部，包括“日维采利”中校相信，德国人建立了不可突破的阻击地带，通往维斯瓦河方向的地区有坦克、地雷区、铁丝网和散兵线，人民军的指挥官“沙尼亚夫斯基”少校仍决定组织自己的小队，并同波兰军合作，冲过这道“拦阻体系”。在向东的路上，小队除了遇到一个被抛弃的炮架和一挺轻机枪外，没有遇上任何坦克和阻碍。只有留在“日维采利”中校参谋部的无线电联络官，从 1944 年 9 月 27 日起便失去了联系，后来失踪了。

波兰第 1 集团军的一个波兰报务员换上便装，留在若利博什地区。

这个波兰联络官大概牺牲了。

1944 年 9 月 30 日作为支撑点的若利博什不复存在了。

给论：

1. 投降是有预谋的，并有国家军指挥部的挑唆，是违背广大士兵和部分国家军军官的意志的。

2. 国家军领导人很清楚，波兰第 1 集团军为起义军和居民向维斯拉河东岸撤退提供了一切可能。为了服从自己的中央——布尔将军的代表瓦赫诺夫斯基的命令，若利博什地区的国家军指挥部宁愿投降，也不同波兰第 1 集团军的部队合作。

3. 若利博什地区的国家军指挥部，由于害怕起义军和波兰第 1 集团军部队联合，早在 1944 年 9 月 30 日前就暗中破坏人民军部队准备同波兰军队正规部队联合的一切措施。

以上所述真实性由人民军、国家军的 7 名军官签字证实。

红军总参谋部驻波兰第 1 集团军代表、少校 莫洛特科夫

№02443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 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3日)

红军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关于华沙的情况

一、渡到我岸的人民军军官希尼亚夫斯基少校（若利博什区人民军部队指挥官）和他的副手泽农中尉、康拉德大尉、亚历山大大尉、亨格夫克少尉，及国家军西格蒙德少尉，报告了以下关于华沙情况的补充材料：

国家军和人民军在第1区的人数有近2000人，其中人民军战士近350人。他们拥有的武器是：50毫米口径迫击炮30门、反坦克枪80支、冲锋枪450支（包括350支苏式冲锋枪）、重机枪3挺、手提机枪16挺。步枪和卡宾枪的保证率为80%。

国家军的部队以排为单位组成（40人一个排）。最大单位是近400人的支队。第1区有4个这种相当于营的支队：第1支队为“日拉法”支队，指挥官是维托尔德上尉；第2支队是“茹布尔”支队，指挥官是谢尔布少校；第3支队是“扎格列维茨”支队，指挥官是尤尔上尉；第4支队是“日比克”支队，指挥官是斯拉沃米尔上尉。

若利博什区的国家军部队在日维采利中校指挥下组成第22“区”（日维采利广为人知的化名是“沃伊采霍夫斯基”，其真实姓氏似乎是涅泽利斯基）。日维采利中校的副手是罗曼少校，他是边

防军被公认的更为反动的基干军官。日维采利中校的副官是斯科奇利亚斯（真实姓氏是代涅利）少尉。罗曼少校利用日维采利生病的机会控制了第 22 “区”。起义前若利博什区从属“北方”军队集群，该集群由瓦赫诺夫斯基上校指挥。最近归华沙军区领导。

人民军各支队的人员以排为单位组成，每个排 23 人。3 个排组成 1 个连，2~3 个连组成 1 个营。人民军在若利博什区有两个营（第 3 营和第 4 营）。第 3 营的指挥官是斯库拉上尉，第 4 营的指挥官是科布拉上尉。若利博什区的人民军武装力量组成第 2 “分区”，由希尼亚夫斯基少校指挥。他的参谋长是亚历山大上尉，政治处主任是泽农中尉，安全处长是柳德维格中尉，作战处长是康拉德大尉。

在若利博什区，国家军指挥部和人民军指挥部之间有着经常的联系，而且国家军的军官总试图指挥人民军的支队。尽管如此，人民军指挥部仍然得以收回两个独立的区：波兰军队大道和位于格但斯克街和米茨凯维奇街之间的一个区。一般的行动与日维采利中校相协调一致，武器供应由每个组织独立解决。

当空军开始空投武器时，国家军指挥部拒绝人民军分享英国的物资，他们说：“这是给我们送来的，你们等着苏联物资吧。”从 9 月 13 日起，由于只有苏联空军空投物资，规定了正式的分配标准。空投物资的三分之一归人民军，三分之二归国家军。国家军指挥部的士兵说，50% 的武器给了人民军各支队，而事实上只给了三分之一。食物也按相同的方式分配。如果说日维采利中校的态度还算正确的话，那么罗曼少校和斯科奇利亚斯少尉所做的一切，他们对人民军军官们的轻蔑评论则恶化了双方的关系，并激化了矛盾。

二、9 月 29 日，敌人经过三天的炮火轰击后，以近两个团的兵力，在 30 辆坦克的支援下，转入了进攻。9 月 30 日，起义者仍然坚守着以下地区：从克拉辛斯基街（从 2 号到 20 号）、斯托莱奇纳街、格但斯克街（从 4 号到 7 号），直到巴霍莫利茨街（巴霍莫

利茨街包括在内)。

敌人进攻部队由警察支队和乌克兰人组成。国家军指挥部采取被动防御，未采取任何坚决的行动。9月29日在日维采利中校主持的部队军官会议上制定出下列防御计划：各小队士兵占据更便于行动的建筑物，抵御到最后一粒子弹。人民军指挥部则提出如下有针对性的计划：鉴于和波兰部队有着联系，应该把起义的主要兵力移至维斯瓦河附近（越过密茨凯维奇街一线），在新的阵地上抵御到最后一粒子弹，然后，如果防御已无望，便连同居民撤到右岸。

人民军指挥部关于转移到维斯瓦河的建议未被采纳，但这一计划总体上被认为是可行的。所有参战军官都赞同这一计划。但在1944年9月29日的会议上，罗曼少校、斯科奇利亚斯少尉和斯塔雷中尉就已谈到投降的必要性。会后起义者占据了新的阵地，并且把更靠西的地区让人民军支队占领。

9月30日18时整，瓦赫诺夫斯基上校来到日维采利中校的指挥所，带来了布尔将军关于投降的命令。日维采利中校未与人民军指挥部商量这个问题，立即命令几个防区停火，并于18时15分召集会议，会上向军官们宣布了已执行的命令。必须投降的理由是：德国人截获了全部密码，知悉一切计划，并沿维斯瓦河建立了不可逾越的防线（由坦克、地雷带、铁丝网和密集的步兵线构成的防线）。日维采利补充说，在最近两天内中心区大概也会投降。由于大多数出席会议的军官对这一决定感到气愤，日维采利中校指出，必须拯救普通平民，为了未来的波兰保全性命是合理的等等。拒绝执行命令的有斯拉沃米尔上尉和尤尔扎格洛维茨上尉。然而经过长时间商谈之后，他们也同意无条件投降了。人民军的军官们得到许诺说，不会出卖他们，不会对德国人说出他们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

正如后来查明的，日维采利中校关于截获密码的说法是谎言。当波兰炮兵的拦阻射击开始时，日维采利中校请求人民军指挥部，

要联络官卡罗尔上尉通过无线电要求停止右岸的射击。

在炮兵射击时，几群士兵开始在克拉辛斯基街集中以便投向德国人。19 时整，一名德军指挥部的代表（供应勤务官）来到国家军指挥部。

来到右岸的军官证明，对进步分子的惧怕导致了国家军指挥部的无条件投降。由于这个原因而放弃了华沙无产者区——马雷蒙特。在 9 月 1 日以前，这个街区是中立地带。人民军指挥部所有关于加强该地区的建议，都在由国家军巡逻队保证马雷蒙特安全的借口下被驳回。显然，守住这个地区是不可能的，但完全有可能挡住德国人的猛攻，并利用这个时间撤走居民。为此目的，人民军曾建议沿波托茨基街构筑防御阵地。国家军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 9 月 19 日德国人在没遇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马雷蒙特区，并把居民赶进集中营。当泽农中尉对日维采利中校说“必须对马雷蒙特负责”时，日维采利把全部罪责推给已被解除指挥职务并从军队退役的日米上尉。他的连队已被解散。日米上尉不愿当“替罪羊”，他开始收集败坏国家军名声的材料，并表明想加入人民军的愿望。为了避免丑闻，日维采利中校任命他为莫科图夫区一个支队的指挥官。

据日米上尉的意见，对于马雷蒙特区的丢失，罗曼少校负有全部责任。主要是他暗中破坏旨在保卫这个街区和撤退居民的所有措施。

军官们证明，从 9 月 13 日起，若利博什街区开始得到苏联红军空投的武器和粮食。从 9 月 13~29 日，起义者得到什帕金式冲锋枪 350 支、反坦克枪 122 支、50 毫米口径迫击炮 32 门。捡回大量的食物（面包干、粥、豆制压缩食品、油）。绝大部分物资来自红军。至于说盟国的空军也空投了物资的话，那其大部分落入德国人手中。例如，9 月 17~18 日，多达 80 架“空中堡垒”飞机从 4000 米高度空投物资，只有两个降落伞落在中心区，至于其余物

资，德国人就要感谢盟国了。

关于国家军对红军和波兰军的态度，军官们这样说：1944年7月15日，希尼亚夫斯基少校出席了“复仇”先锋队的军官会议，这次会议由国家军的尤兰特上校召开。上校声称由于红军部队的推进，国家军将分成小组转入地下，并将千方百计抵制被解放的各省建立新秩序。特别强调了必须禁止地方政权机构选举的进行。尤兰特宣称，国家军组织将枪毙候选人，捣毁进行选举的场所。

1944年7月30日，国家军印发了传单，其中说，第二个占领军（指红军）正在进入华沙。传单提醒人们特别注意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比盖世太保的代理人更加危险”）。早在起义者行动时（9月14~15日），一个名叫“自由、平等、独立”的组织印发了简报，其中声称，苏联对华沙遭到破坏和居民贫困负有全部责任，因为它不准许英国人在它领土上建立空军基地。

布尔将军在简报中一再强调，苏联空军给予起义者的援助微不足道，尽管这在所有的人看来是明显的谎言。布尔吹嘘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给予起义者援助方面的行动卓有成效。国家军散布流言说，红军故意不进军华沙，要等到全部居民被残杀一光的时刻。国家军的全部宣传鼓动带有这样的性质，好像这个组织准备采取反对红军而不是反对德国人的行动。国家军的口号也与此一致：“德国人已被粉碎，还留有更加强大的敌人——布尔什维克。”

有关波兰军的传言说，这个苏联特务机构与波兰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可言，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遭到亲伦敦的各个组织包括波兰人民军的抨击。

三、从昨天起，与第1区的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关于我们的无线电报务员的命运也没有消息。

中心区的情况极不明确。今天有三人自该区来至我方河岸，其一系我部军官，曾携电台被派往该区；第二人是少校飞行员，强击

机空军团团长，曾从被击落的飞机上落入敌区被德国人俘虏，后从华沙集中营逃出投奔起义者；还有一位女侦察兵话务员。初步的简短询问表明，事实上中心各区两天前便已开始投降，国家军领导人极力隐瞒这一点。

布拉格的情况

一、今天着手分配面粉，已经开设 9 个面包房并且正在工作。周末将有 22 个面包房开始工作。将按每份 400~500 克的标准配给面包，这是德国人配给量的两倍。为了配给面包，准备开设 250 个商店和售货亭。8 万人的名单即将编制完成。

地方政权机关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尽快编制需要者名单并发给他们面粉和面包，这就迫使我们采取加快办理面包配给的措施。

二、居民热烈欢迎和感谢苏联政府向他们提供面包的援助。

女公民博兹斯卡·雅德维佳说：“以前我更多地指望来自伦敦的波兰伦敦政府的救济，现在我看到，这种援助是俄国给的。多亏我们的民族解放委员会展开活动，多亏它与俄国的友谊，布拉格的波兰人将永远感激俄国人民和公民斯大林，感谢他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没有忘记我们。让上帝为人类的幸福保佑斯大林先生长寿。”

女医生索菲娅·斯佩特凯维奇今年 32 岁，她说：“我们支持在与德国人斗争的时期从人民中产生的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便是这样的政府。我们应该赞扬和支持委员会旨在与我们伟大的邻国苏联保持友谊的政策。请想想吧，俄罗斯人民多么慷慨。他们把我们我们从饥饿的死亡线上解救出来，为此我要表示由衷的感激，并请相信，我们知识分子中大多数都是这样想的。”

№02444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 给总政治部的报告^①

(1944年10月5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关于华沙和布拉格的情况通报。

谢尔巴科夫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一、据来自华沙的人们的陈述和现有文件，可以确定：伦敦冒险家们出于政治阴谋，牺牲了上万华沙市爱国者和和平居民。他们在华沙发动起义，不是为了实现从后方打击德国占领军并以此支援波兰人民解放事业的目的，而是力求夺取全部政府机构和市政机关，并宣告成立自己的政权。

二、我部军官“奥列格”曾在华沙逗留10天，他根据自己与国家军和人民军领导人的交谈，根据他本人的亲自观察以及看到的文件，谈了以下情况：

起义经过长期计划和准备。从英国运来备用的弹药和武器，分

^① 文件上有谢尔巴科夫亲笔批注：“重要”。

藏在秘密仓库内。起领导作用的是国家军组织，其他组织包括民主组织都不了解起义的准备情况。

起义的目的是在红军部队占领华沙前夺这个城市。夺取华沙以后，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波兰政府应立即到来，国家军提出的任务之一是首先清理政府和各部所在地。

今天收到的文件证实了“奥列格”的话。这份文件是“关于华沙起义的通报”，是人民军的中尉莫拉夫斯卡娅·甘卡于 1944 年 9 月 18 日从人民军秘密发来的关于起义的报告。她在报告中写道：

“国家军向起义部队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国家和市府行政机构大楼。占领市政厅大厦、邮政局大楼、电站、燃气厂、中央电话站、一系列学校、‘泽齐翁特卡·埃祖斯’医院、一系列银行、有价证券发行所，以及一系列其他机关。没有占领任何一处火车站，没有炸毁铁路线，这样就让德国人在整个起义期间可以随意使用。没有占领桥梁、科希丘什科沿岸和公路干线，而把它们留在德国人手中。一句话，没有占领任何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据点。

市区所有街道上都筑有街垒。这是普通居民构筑的，多数情况下没有军队指导。街垒不坚固，没有壕沟，对坦克不构成任何障碍。用它们只能抵挡步枪火力，但因德国人不派步兵进攻，所以没有步枪射击；这些街垒也可用作步枪和机枪射击的掩体。

国家军部队的武器最好的情况下只有冲锋枪和步枪，通常只有手枪和手榴弹。许多部队只是部分士兵有武器。剩下的士兵只有等待有人受伤后，得到伤员的武器。开始完全没有反坦克装备，后来得到英国飞机投送的为数不多的反坦克火箭筒。重机枪和手提机枪几乎没有。

在对目标展开攻击几天后，起义指挥部选择防御为自己的战

略。在协商军事行动的时候，他们让人民军指挥部也服从这一战略。国家军指挥部断言，德国的目的只是占据出城的主要交通干线：1) 波尼亚托夫斯基大桥，五三大道，耶路撒冷大道，格鲁耶茨卡娅大街；2) 卡尔别济亚大桥，扎姆阔夫广场，议会大街，选举大街，凉街，沃尔斯卡娅大街；3) 戈尔切夫斯卡娅大街，列什诺，特洛马茨科耶，卡尔别济亚大桥，而位于其间的起义策源地不会受到触动。根据这一理由，他们不进攻而只防御，尽管当时完全有进攻的可能性。这样的结果是，起义地区被压缩，形成彼此完全分割的起义小岛，单靠通讯渠道保持相互联系。在若利博什甚至有过这样的情况，即不准向位于我方阵地射击范围内的德国人射击，以免引起他们反击而向起义者的工事发起猛攻。”

还有许多材料证明，伦敦人害怕红军和波兰部队最先进入华沙而使他们一无所得。

从华沙撤出的人提供的情况证明，起义的准备和进行是由来自伦敦流亡政府的代表，也包括几位留在波兰的部长专门领导的。此外，米科拉伊奇克总理的副手也特意从伦敦赶来，此人一直留在华沙（其姓氏未能查明）。起义的正式领导人是布尔将军。布尔个人行动十分神秘。士兵和军官谁也见不到他，获准接近他的只有“曼达尔”和几个上校。他的所有个人行踪都保密，以致无人能说出他在或不在华沙。“奥列格”提供的情况表明，代表布尔出面的是他的副官古捷克将军，由他主持记者招待会，说明伦敦政府和布尔将军本人的指示。甚至斯卡科夫斯基将军本人一次也没有被布尔召见，也没有见过他。

有一次“奥列格”被“曼达尔”召见，除了他的副手瓦赫诺夫斯基中校和参谋长希鲁尔克中校外，还有某个非军界人士在场。不经此人同意，“曼达尔”一句话也不说。然而这位非军界人士是什么人呢？谁也没说。

当起义的失败已成定局后，国家军领导人重新转入地下，建立秘密武器库和地下组织。特别是重新建立了名为“波兰保安军”的国家军地下战斗组织，给它提出任务是：在红军和波兰部队占领华沙的情况下，对波兰军和民族委员会^①的领导人进行恐怖活动。

“波兰保安军”这个组织奉行明确公开的民族主义政策。所有留在城内的乌克兰居民都被杀死或枪毙。“波兰保安军”的部队还用武力消灭了德国人来不及杀害而幸存的犹太人。

“波兰保安军”还对从德国人手里逃脱的俄国战俘进行专门搜捕，想捕获后与红军交换人质。例如，国家军逮捕了尼古拉·鲁缅采夫中校、尼古拉·戈罗杰茨基少校、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叶尔绍夫医学教授作为人质。国家军代表枪毙了在他们起义地区的沃尔科夫少校，当时一位军官宣称：“你们在卡廷枪毙我们，我们也要枪毙你们。”他们还打死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区登陆场失败后突围到中心区的波兰第 1 集团的军官和战士。第 9 团的利亚赫诺中士在他与“奥列格”谈了此事后，很快就被暗杀了。

三、从昨晚起，与华沙断绝了一切联系。今晚来自中心区的 5 个人证实，今年 10 月 2 日，第 3 区全部投降，只有几小块地区有来不及撤走又不愿向德国人投降的人，仍在继续抵抗。

四、第 47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明上校于 10 月 3 日在布拉格主持了区拉达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决定：1) 每个区建立售货亭以便配给面包，按每 1000 人建一个售货亭计算；2) 从居民中选举每个售亭的监督员；3) 每个区动员 200 人为面粉仓库、面包房服务并给售货亭运面包。

我们拨出 40 辆汽车运送面包和给面包房运送燃料和面粉。

^① 指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944年10月3日一整天，配给布拉格居民30331公斤烤面包和81900公斤面粉。已经装备和开设了333个食品店，9个面包房已开始工作，每天烤出11200公斤面包。烤面包的总需求量是每昼夜80吨左右，而9个面包房总共能供应14吨，因此，第47集团军的部队决定建一个露天烤炉，其产量为一昼夜14吨，在临近布拉格的市镇开设产量共50吨的几个面包房，这样来保证居民对烤面包的需求。

地方政权极不情愿执行区里动员200人的决定，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被吸收参加装卸工作和烤制面包的人常干损公肥私的事，他们要求每人一天奖励20公斤面粉和500克肉罐头。

为了协助地方政权组织对居民的面包和蔬菜供应，从波兰第1集团军中抽调了30名军官，其任务是在10月10日前组织好对布拉格居民的供应。

政治部代表巴格诺夫斯基上尉访察了配给面包的商店，并与居民交谈。女工玛丽娅·阿涅舍克在与巴格诺夫斯基交谈时说：

“现在布拉格居民的生活十分艰难，这里靠近前线，常有德国人射击。但我们的居民并没有被抛弃不管，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我们的盟友俄国关怀我们。公民斯大林给布拉格居民赠送了1万吨面粉和药品。对这一切我们衷心感谢公民斯大林和苏联政府。”

电车工人沃伊采多夫斯基·埃杜阿尔德说：

“我的家庭现在已经不挨饿了。我得到了70公斤马铃薯，每天得到午餐，现在定期获得面包。现在我参加了恢复电车站的工作。每天我们急切地等待红军胜利的消息。我们感谢斯大林同志和苏维埃国家给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转入地下的国家军组织展开破坏参加波兰军的动员工作。布拉格电车站工人斯塔尼斯拉夫·斯基宾斯基在与巴格诺夫斯基谈话

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国家军成员亨里克·萨利亚克来找他的儿子，接纳他为国家军战士，对他说：“我们的领导人说，不要去波兰军，因为按伦敦政府的命令，马上要开展参加国家军的动员工作。”

近日来由于敌人加紧破坏入伍动员工作，国家军战士到集合点登记的人减少了。10月2~3日两天内，总共来了15人。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02446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局势 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年10月6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的情况通报。

谢尔巴科夫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一、10月4日夜从华沙转移到我方河岸的6位军官中，有2人来自保安军，其余的来自人民军和波兰人民军。他们全都证实，中心区的投降发生在10月2日。他们还证实，华沙市各阵地的武装起义者总人数多达1.5万人，其中属国家军的1万人，属人民军和保安军的5000人。

据这些军官所述，9月末起义者拥有数量充足的武器和弹药。苏联空军空投了相当数量的迫击炮、冲锋枪、反坦克枪和很多手榴弹。近期德国人没有主动积极的行动，他们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在起义的中心区，几乎都是防御性的。由于苏联空军和炮兵采取的行动，起义者近期没有遭到德国人轰炸。

他们认为，从军事的角度看，可以继续战斗，完全没有必要

投降。

据来自起义地区的军官和其他人提供的大量情况断定，起义是按伦敦政府直接命令发动的。起义的目的是在红军部队到来之前夺取华沙政权，宣告伦敦政府的政权成立，不允许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红军进入华沙。为此目的，以米科拉伊奇克的副手为首的半数部长被派到华沙。

以下事实勿庸置疑：9月28日，布尔在给罗科索夫斯基发出请求立即给予华沙起义者援助的电报的同时，也与德国人就投降一事进行着谈判。国家军关于起义者缺少武器和弹药的借口完全没有根据，因为从9月14日起，我们空投了大量的武器和弹药。

所有出来的军官都证实，我们的炮兵、空军和高射武器对起义地区作了有效的掩护。完全有可能将起义者撤至维斯瓦河西岸与红军和波兰军的部队会合。

无线电联系尚未恢复。据从我方河岸观察，华沙市内一片沉寂，参加清理起义基点的部队已转至我们方面军的防区，即华沙以北。

二、昨天和今天对布拉格居民进行了普遍的面粉和面包的分配，这掀起了对斯大林同志和苏联政府的慷慨馈赠热烈响应和感激的新浪潮。

昨天发放给居民 121 吨面粉和 30400 公斤面包。今天发放了 65 吨面粉和 17000 公斤面包。从昨天起，为支援市区，我们部队的面包房开始工作。今天发放面包是通过售货亭有组织地进行的。总共已向布拉格运送了约 700 吨面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我们的交通工具分运给各面包房的。地方政权不得不承认，他们认为难以承担这样的任务的担心是没必要的。

居民们说，德国人不关心居民们的温饱。如果说德国人也分发某些食品，其方式与其说是援助不如说是嘲弄。居民们谈到这样的

事实：德国人从汽车上沿街抛撒为数不多的食物——饼干和糖果，当孩子们奔向这些食品时，德国的摄影师就把他们拍摄下来。

由于地方政权机构至今没有得到汽车运输方面的援助，所以他们提出这方面的要求，以维持面包房和供应点的正常工作。到目前为止，卢布林只有10辆汽车运送物品。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02448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关于华沙起义 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1944 年 10 月 10 日)

致斯大林同志

兹送上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同志的情况通报。

谢尔巴科夫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谢尔巴科夫上将同志：

兹报告：

一、被审问的《民主派》报记者波贡斯基·列什科证实了以前关于华沙起义进程的材料。

波贡斯基工作的《民主派》报属于波兰社会党和波兰社会主义者工人党的左翼，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它宣传复兴的波兰与英国、美国及苏联之间的友好联盟。

波贡斯基说，在起义最初的日子里，在华沙的房屋墙上张贴着给居民的布告和号召书，其中明确地说，起义是按伦敦政府的命令发动的。这些号召书是由伦敦政府的国内全权代表和国家军司令布尔将军签署的。

华沙居民满怀热情地接受了与德国人进行武装斗争的事实。在最初几天可以看到居民对起义表现出兴奋和关心的举动，人们向起

义者抛撒鲜花，几乎所有的大门口都摆着放有食品和香烟的桌子。居民们积极行动，开设医务看护所和收集药品，参加构筑街垒和防空工作。但当居民们看到起义者如此差的武器装备时，他们知道没有外部支援要与武装到牙齿的德国人斗争是力所不及的。因此，他们焦急和紧张地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关于米科拉伊奇克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的结果^①。

起义初期，由于起义者取得了某些成功，各种政治团体的刊物便开始秘密发行。在起义的第三周已经出现了54种以上的刊物。

亲伦敦的报刊从起义最初几天起就继续推进它在地下时开始的反苏运动。在米科拉伊奇克谈判失败并离开莫斯科以后，所有的亲伦敦报刊就像听到口令一样猛烈抨击卢布林政府，骂它是莫斯科的奸细，是祖国的叛徒，是把波兰并入苏联的支持者，是共产党等等。按照萨纳齐时代^②的榜样，那时把每个对立派都叫做叛徒，他们也把波苏协定^③的支持者叫做共产党和人民的叛徒。

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甚至民主派左翼即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

① 1944年7月30日至8月10日，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期间，与同在这里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由于双方在苏波边界、废除1935年宪法及未来波兰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会谈毫无结果。

② “萨纳齐”，波文原意为健全化。1926年5月，对1921年宪法不满的约·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现政府，组成了以卡·巴尔泰尔为首的新政府，毕苏斯基自任军政部长。新政府立即着手修改1921年宪法，并在国家政治健全化口号下，大肆清洗反对派。此后，习惯上把以后的波兰政府称为萨纳齐政府。波兰现代史上的独裁政权时期由此开始。

③ 指1944年7月26日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苏联红军与波兰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协定”。协定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已解放的波兰领土上设立的行政机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与苏军最高统帅部相配合，以保证苏联在波兰领土上的军事行动。

会主义者工人党的报刊，如《华沙之声》和《自由街垒》，这段时间也没有发表一篇文章，来表明对于俄波边界问题^①的立场。伦敦的报刊让社会舆论相信，红军向西的攻势被故意拖延，为了给镇压起义提供机会。政府报刊的立场依旧未变，在边界问题上坚定地站在里加条约^②的立场上。关于波兰军的存在政府报纸什么也没写，称贝林格将军的部队为雇佣军，说它是由强迫征集的波兰人组成的，而且代表苏联的利益。关于莫斯科的波兰爱国者联盟^③，由于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书面和口头宣传不力，在华沙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波贡斯基说，到 8 月底华沙死伤 15 万多人。在起义的最后几天，居民的情绪急剧变化，其原因之一是德国人对首都的野蛮破坏和居民伤亡巨大。华沙的居民和起义者开始懂得，他们成了伦敦流亡政府反动分子手中的玩物。这表现在开始对起义政权的公开批评，不执行国家军的命令和对政府报刊漠不关心。居民开始对卢布林政府的活动感兴趣，特别是工人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它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小市民和资产阶级大多对卢布林政府怀有敌意。亲伦敦的报刊则完全不刊登有关卢布林政府及其措施的材料。

在起义者被迫退却后，居民中有关失败不可避免的谈话增多。

-
- ① 1939 年 9 月 17 日，苏军出兵波兰。几个月后，苏联把所占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并入相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从而形成新的苏联西部边界线。波兰流亡政府对此边界不予承认，坚持主张恢复 1939 年 9 月 1 日前的波兰边界。苏联则认为 1939 年 9 月 17 日后的边界不容改变。
- ② 1921 年 3 月 18 日苏维埃俄国与波兰在里加签订。根据该条约规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地区并入波兰版图。1939 年 9 月 17 日，苏联宣布废除该条约。
- ③ 由波兰爱国者在苏联境内组织的反法西斯组织。1943 年 2 月在莫斯科成立。它积极参与组建波兰的人民军队，在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后，支持苏联政府。1944 年 7 月，与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共同组成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

14日占领布拉格的红军和波兰军队的进攻挽救了局势。居民们吁了一口气，焦急地等待我们的部队进驻华沙，人们公开表达对空军和高射炮从空中掩护华沙的感激之情。

波贡斯基说，尽管国家军战士和军官与人民军和波兰人民军有着战斗合作，国家军的领导人仍然随时表现出对这些军队的明显敌意。国家军领导人故意不充分供应食物、武器和弹药，不容许他们补充志愿人员，从而掌握了大量物品并控制了起义及行政机构。

二、10月8日布拉格举行了人数众多的群众集会，纪念在华沙牺牲的起义者。所有天主教堂都举行了追悼亡灵的祭祀。所有出席群众集会的组织或是当地居民，都一致谴责过早挑动群众举行起义的伦敦政府。人民怀着仇恨和轻蔑谈论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及其他叛徒，表达了要为华沙牺牲者报仇的愿望。

在布拉格和以前地下组织积极活动的许多县，近期变得相当平静，传单和宣传品发得少了，其他积极的反动活动也少了。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 捷列金

No 01897

德国占领者关于华沙起义的报告

(1944 年 10~11 月)

译自德文

秘密

路德维希·菲舍尔给汉斯·弗兰克的报告^①

前 言

以我们时代的最大事件为背景，我们的注意力一天比一天更加注视着各条战线上决定欧洲命运的军事行动。所有其他事件与它们相比都相形见绌了，仅被我们极其肤浅地记录进一般事件的范围。

有一件事却是例外。这一事件从 1944 年 8 月初起，连续几个月，最高统帅部的通报一次又一次地提到它，被几百万人以极其紧张的心情关注着——这就是波兰抵抗运动的华沙起义。

尽管在这一情况中，从地理角度看，问题仅仅涉及到一个城市的范围，但这一事件不仅吸引了德国人，而且超出德国国界，吸引

^① 路德维希·菲舍尔，华沙区总督、冲锋队总队长。汉斯·弗兰克，德国国会议员，1939 年 10 月起任德国驻波兰辖区最高行政长官，即驻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管辖区的总督。此报告原文为德文，原件上未注明日期，据俄国档案整理者判断，该报告写成于 1944 年深秋。报告的俄译本在 1946 年 12 月前，由当时任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的谢洛夫送交给内务人民委员拉·贝利亚。后该报告被转送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秘书处。

了全世界社会人士的极大注意。世界报刊上的简讯和报告就证明了这一点。

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华沙起义不是局部事件，而是政治行动。这一行动一定会对华沙范围以外的东线军事行动产生巨大影响，同时对战争的今后进程也一定会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所以，有理由期望关于这次起义的总结报告引起普遍的兴趣。

所呈报告以个人观察为基础，描述了起义形成经过、起义过程和被镇压情况。

同时，报告还列举了一些政治观察结论。这些结论是在起义期间做出的，将来能在解决涉及华沙的政治问题时起一定作用。

起义的形成

描述华沙起义应从回答它如何能发生这一问题开始。

近来，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一问题，而且还同时指责说，起义对于华沙领导机关，特别是对于民政当局、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来说，完全是意外事件，如果具有应有的警惕性，起义是可以预见并能采取相应对策的。

任何一个了解情况的人都承认：这些指责没有任何根据。华沙起义不是由于德国机关缺乏情报而发生的，而是多年运动合乎逻辑的后果，并且，从抵抗运动政治领袖们的观点看，起义自然是发生在他们认为特别有利的时期。

为了证实这一论点的正确性，必须对事件的过程（从1939年起）作一个简短的概述。

当1939年10月波兰战局结束时，波兰军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1939年10月1日德军开进华沙，以及1939年10月4日有元首出席的在乌亚兹多夫斯基林阴道（已改名为胜利街）的检阅，向全世界表明了波兰国家的完全失败。

然而，这一军事失败并没有让人们有理由认为维斯瓦河流域地区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

熟悉波兰历史的人都知道，波兰人，至少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者，每次失败后，总要竭尽全力秘密准备起义。华沙正是所言之最好例证，因为民族主义分子指向俄罗斯国家的所有秘密阴谋几乎都来源于这个城市。^①

在一部分积极的波兰人有这种明确目的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完全清楚的，那就是 1939 年失败后，波兰民族主义分子并不认为自己的命运已经决定了，而要全力以赴倒转历史车轮。

华沙是进行类似发动的最好地方。在本次战争前华沙就是波兰民族主义分子的堡垒。所有打算开始反对帝国斗争的主要知识界阶层都有代表在这个堡垒中。

同时，波兰战局结束后，从并入到帝国的德意志人省，首先是从瓦尔塔省和但泽省（西普鲁士）疏散了几百万波兰人和政治上不可信赖的知识分子。波兰知识界的这一主要阶层是因有十分明确的民族主义政治企图被从帝国的一些省送往总督区的。他们被送到了华沙这个多少年来收容不可靠分子的垃圾场。虽然由于 1939 年 9 月底的军事行动华沙惨遭破坏，但它的居民却猛增了，以致居民人数有时超过 150 万人，其中有疯狂仇视德国人的犹太人 50 万。

聚集在波兰共和国原首都的这一大群人由数量上极少的德国当局统治。在这里要适当提醒一点，最繁荣时期，在华沙区指挥部工作的一共有从帝国派遣的 55 名官员，另外还有 283 名男性职员。这 5 年间，华沙警察—行政当局的人数也少得不可思议。有时，在

^① 波兰在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沙皇俄国参与了所有瓜分，并在所得到的领土上实行残酷统治，引起波兰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为反抗民族压迫，波兰各地出现了众多的秘密团体，其中有些是在华沙建立的。如 1798 年的“波兰共和者协会”，1839 年的“波兰人民同盟”，1861 年的“红党”等。

这个百万人口的都市中，国家领导机关总共才有240名执行官实施德国的统治。^①

华沙领导机关多次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希图却总是遭受挫折，因为警察机关是为别的目的使用的。

能量极大的波兰积极分子对此情况了如指掌并不足为奇。因此，1940年初开始出现了波兰抵抗运动的最初征兆。但是，经过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的无情干涉，当时得以将抵抗运动的发展镇压在萌芽之中。

同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由于尽职尽责的德国官员的警惕性，地下运动总处于受打击的境地，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表现。到1942年底，总督区和上百万人口的华沙市，正如实事求是地查明的那样，是完全平静的地区。

后来，当1942年末，德国节节胜利后发生了最初的军事反攻时^②，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民族抵抗运动将此视为德国威力从它在1939年打败波兰，并首先迅速战胜西方后开始变弱的征兆。

1942~1943年之交的冬季，袭击德国官员和其他德国人的事件频频发生。这些事件逐渐频繁，它不仅是涉及一小撮狂热分子单独行动的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渐渐形成的抵抗运动的有组织的工作问题。

这一运动由完全对立的分子组成：一方是以消灭德国统治和建立自由波兰为目的的民族主义分子，另一方是追随布尔什维克立场，与苏联串通一起的共产党人。

这两种运动尽管在观点上有矛盾，但提出的目的是一致的——

① 这里显然未把驻守在华沙的德国军队计算在内。据统计，在1944年7月，仅党卫军和国防军部队就有23000人驻防华沙。

② 从1942年11月19日起，苏军进行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1月22日，苏军完成了对斯大林格勒地区德军的合围。

消灭德国统治。

1943 年抵抗运动达到了顶点。当然，这一年实施了大范围有系统的反措施。

1943 年 2 月，成功地逮捕了从伦敦秘密派来的一名波兰民主政府的政府代表，由此揭露了抵抗运动的今后计划。

1943 年 6 月 30 日，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进行了一次更大的打击。这一天，在华沙逮捕了波兰国家军司令罗韦茨基。因此，抵抗运动遭到镇压，只得放弃组织反对德国统治的大规模起义。

这里必须指出，出于不同的信仰并由于在波兰人民中缺乏统一性，波兰抵抗运动分成了许多组织、分组和小组。但是，尽管有各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把各类小组联合在一起的组织壮大起来：一个是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波兰人民军，另一个是代表抵抗运动的波兰国家军。

由于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的警惕性，渐渐弄清了两个组织的打算和意图。此外，还查明了加入这两个组织的部分波兰人的名字。因此，在实施由不停地杀害德国人引起的反措施时，几千名这类狂徒被军事战地法庭执行了枪决。所以，抵抗运动大大减弱了。

另外，从 1944 年 2~4 月，当波兰抵抗运动加紧准备起义时，我们在华沙起获了几个相当大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库。在其中的一次行动中，我们缴获喷火器 600 个和已安装好的手榴弹 6 万颗。这也极大地削弱了抵抗运动。

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也得到了支持，因为飞机经常空投伞兵，这些伞兵穿越总督区的森林，然后身着老百姓服装到达目的地。包括有英国冲锋枪、轻机枪和其他武器在内的武器装备也连续不断地空投下来，但没能查明空投武器的全部情况和截获这些武器。

1944年初，东线战事的惨重失败又唤起了波兰人的很大希望。外国宣传机构到处报道说，帝国的威力已被摧毁，胜利的时刻就在眼前，并号召波兰人要做好迎接胜利之日的准备。

当1944年7月德国中央集团军群被粉碎，德国数万军队开始向西撤退时，大部分波兰人坚信，德国军队已被击溃，到帝国彻底失败之日仅剩几个月，甚至很可能只剩几周了。

当波兰人得知，盟国成功地西方登陆后^①（尽管多少年来德国宣传机构总声称这种登陆是不可能的），他们的这一信念就愈加坚定。

所以，在业已形成的这种情况下，这一点并不奇怪，即波兰抵抗运动认为实施坚决打击和推翻德国人统治的时机已经到来。

华沙的德国领导机关不止一次地报告过业已形成的局势，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坚持要求加强特别薄弱的华沙警察局，以便能成功地应付即将到来的危险。

所有这些要求都成了泡影，相反，在1944年7月初，党卫军和警察局第22和第17团被调到了前线。

这些当然也没有瞒过波兰人。他们十分准确地了解到守卫华沙的德国兵力减少到了什么程度。

1944年7月23日，危机达到顶峰。有消息说，在此之前已经越过总督区边界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在不停的进攻中正通过卢布林省，向华沙挺进，他们的坦克已拿下普瓦维！^②华沙总司令部就此发布命令，建议军事机关的所有女性人员当日离开华沙。

这一命令及其匆忙的执行，再加上仓慌撤退时不可避免的所有

① 指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

② 苏军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部队于1944年7月24日凌晨攻克卢布林，26日夺取普瓦维。

伤脑筋现象，在华沙引起了真正的慌乱。

民政当局没有加入执行这一命令的行列，相反，它采取了所有可能制止慌乱的手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但是，对于波兰民族主义分子来说，在紧急关头德国指挥部仍把许多部队调往后方的这种举动，成了德国统治末日来临的勿容置疑的证据。当后来几天俄国坦克真的出现在接近华沙的地区时，波兰抵抗运动首领布尔-科马罗夫斯基便下令开始起义。

起义的经过

起义在时间上分为 4 个时期：

1. 从 1944 年 8 月 1 日到 10 日为德国机关的防御时期；
2. 到 1944 年 9 月 2 日为在包括旧城在内的华沙北部镇压起义时期；
3. 到 1944 年 9 月 28 日为在郊区镇压起义和在大包围圈内合围起义者时期；
4. 1944 年 10 月 2 日前为投降之前关于投降的谈判时期。

每一时期的经过是这样的：

德国机关的防御

8 月 1 日这一天华沙起初完全正常。有工作的居民，除少数例外情况，都按时到机关上班，或到达生产岗位。城市表面上也没显示出任何特别的情况。然而，到 15 时，第一次有报道说市内出现一些骚乱。尽管当局方面没有任何号令，但大部分商店顿时关门停业。16 时 50 分，许多街道上开始射击，到 17 时，射击遍及城里各区，毋庸置疑，早已预料的起义开始了。

20 时 15 分，华沙军事代表施泰尔中将与华沙区总督经过商讨后，通过市内无线电网用德、波两种语言向居民宣布：

“我宣布，华沙从今天起进入军事状态。如若街上出现老百姓，

要向他们开枪射击。向德国人射击的楼房和单位，将被夷为平地”。

向华沙德国机关进攻是按统一计划进行的。因事先料到会遭受进攻，我们立即组织了环形防御，并开始自卫。

当然，在像华沙这样的百万人口的城市里，要把所有德国机关安排在城市的一个区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也不符合防空规则（防空规则把分开配置规定为安全的一种手段）。况且，在几年中，已建立起两个大的德国街区。

其中一个称作政府街区，在阿道夫·希特勒广场。它包括布留尔宫、军事代表处大楼、总司令部、驻扎有军事机关的“欧洲”饭店和一些称作“德国人之家”的建筑群。而“布里斯托尔”饭店是警察街区，位于胜利街和警察街。

此外，还有一些德国独立机关，这些机关因技术原因——由于庞大而笨重的设备——不能安置在这两个街区。如统计机关、发电厂、自来水站和邮局。为了保障对波兰居民的不断监视和为安全起见，同样也把一些警察分局部署在市内所有地区。

看来，抵抗运动的计划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抢占所有德国机关、兵营和德国人的其他防御基地，并拟定把主要打击放在了政府街区和对准了“不共戴天”的党卫军和警察局，特别是对准了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正像后来俘虏供认的那样，起义者打算彻底消灭这些机关。

政府街区住着华沙军事代表施泰尔中将、华沙区总督、冲锋队中将菲舍尔博士和街区最初的防御司令罗尔少将。这一街区保卫者的主要任务是坚守到早已答应的援兵抵达华沙。这一任务被波兰狙击手搞得相当复杂，他们躲在剧院广场和柯尼奇大街的楼房和废墟里，对着布留尔宫不断射击。因此，我们每天都遭受很大的人员伤亡。

在这种形势下，德国机关不能只局限于防御，而不得不几乎每

天进行出击和派出突击组，以便歼灭步步逼近的敌人。

8月6日晚，从布留尔宫采取了有力的反冲击，目的是夺取艾伯特大街角上的建筑物。狙击手从这里射出的枪弹造成了特别严重的伤亡。此外，“德国人之家”和“布里斯托尔”饭店的保卫者们采取了几次夜间反冲击，尽管有伤亡，但由于冲锋队的勇猛精神和作战技能，常常使反冲击大获成功。

警察街区从起义最初几天便转入进攻，该区这时已在党卫军和党卫军警察长官——盖伯尔总监领导下，合为“盖伯尔战斗队”，加入这一战斗的还有安全警察局和党卫军保安处。

还在8月2日就解除了对一号中心邮局的围攻。战斗的第4天，由警察和党卫军保安处组成的冲锋队在坦克支援下试图与被包围在皮乌斯电话局的守兵取得联系，但由于敌人的扫射造成的伤亡太大，这次行动只得停上。第二次尝试也未奏效。

然而，却成功地肃清了利捷夫和马尔沙尔科夫街角建筑物中的起义者。从这里继续展开解放警察街区的连续战斗。

8月9日，保卫政府和警察街区的各小组的英勇战斗获得了应有成功：从帝国来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从里茨曼什代尔大街朝萨斯基公园方向往城内突破，并从瓦维尔斯克方向恢复同警察街区的联系，他们一直推进，到8月8日17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当然，到现在政府街区还三面被围，而警察街区的守兵继续进行着非常艰苦的斗争，但是，同其他兵团的联系牢牢建立起来了。

从这一天起开始清楚了，抵抗运动的起义未达到目的。敌人的计划规定在几天内将德国人赶出华沙，该意图主要建立在袭击的突然性和德军的疲惫上。

这一计划完全落空了。只有不多的德国机关由于敌人的环形攻击投降了，例如，华沙区领导人驻地的守兵。总的讲，所有德国机关都坚守到了援军的到来。

争夺华沙北区的战斗

继续战斗的战略目的是将起义部队分割开来。

由于十分果断的进攻，成功地将从里茨曼什代代尔大街到布拉格对面的城市大桥一线夺回到我们手中，这样便将华沙的起义者分割成了南北两翼。

将起义者这样分割后，8月里战斗的目的是歼灭敌人北翼的力量。

展开的战斗异常激烈，主要是起义者系统地筑起了几百个牢固的街垒。同时，在北部大包围圈内，有发行银行、波兰市政管理局大楼和其他许多建筑群。这些建筑群都变成了强大的工事，这些工事由于其结构原因很容易自卫，而不致有大的人员伤亡。

尽管如此，到1944年9月初，成功地肃清了北部大包围圈内的抵抗，并且旧城也落到了我们手中。起义者想从北部大包围圈向南部大包围圈突围的企图未能奏效。9月2日，整个华沙北部地区，除若利博什和马雷蒙特两个别墅郊区外，均掌握在德国人手中。

夺取南部大包围圈的战斗

肃清北部大包围圈后，打响了夺取南部大包围圈的战斗。德国突击队的行动是在强击机支援下进行的。强击机以连续集中的冲击波，用爆破炸弹和机上拥有的武器向建筑物中的守军发起进攻。此外，战斗中还投入了德国的重武器：臼炮、喷火器和火炮。高射炮兵连和坦克也向变成堡垒的建筑物展开攻击，起义者在这段时间内已将这些建筑物的地下室改筑成了永久火力点。新编的迫击炮队必须彻底将起义者从这些地下室驱走。

就这样，抵抗基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9月上旬，成功地全部扫荡了维斯瓦河西岸，从南面控制了所有市区，包括莫科图夫郊

区，该郊区的防御曾进行得特别激烈并持续了很长时间。

9月27日，除市中心大包围圈和若利博什郊区外，实际上整个华沙的起义者都被歼灭了。

关于投降谈判

9月28日，开始了有关结束起义的谈判。

但在此之前，德方已采取一系列步骤以停止作战行动。

还在8月7日，华沙区总督与华沙军事代表施泰尔中将就准备好了号召居民放下武器的呼吁书。发表这类呼吁书的时机当时是最有利的，因为已准确查明，广大居民群众不支持起义，部分居民甚至抗拒起义，居民们不止一次地掩蔽受伤的德国人，并保证通过地下室和其他途径把他们送回作战部队。起义者自己中间当时也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现象，因为他们确信，突然袭击完全没有得逞，而德国人的抵抗令人吃惊。

俘虏的供词越来越证实，居民们要求停止武装斗争，因为他们已确信起义无望，并担心整个城市遭到严厉惩罚。写好的向居民呼吁书由于当时出现了新情况不得不在最后时刻搁置了。

在后来几天，通过谈判结束起义的任何试图都已不可能了，因为这时卡明斯基的部队^①来到了，这支部队的行为和作战行动导致了以前未加入起义的波兰居民成千上万地转向起义者一方。

德方迅速抓住恰在9月中旬出现的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因为起义持续的时间要比预计长得多，而且布尔什维克在这段时间又在维斯瓦河东岸取得了可观的战绩，再加上他们占领布拉格形成了更具

^① M. 卡明斯基，原苏军大尉，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投敌，吸收红军战俘组成“俄罗斯人民解放军”。在华沙起义期间，他率部与党卫军一起残酷镇压起义者，并滥杀平民。后被德军指挥部枪毙。

威胁性的情况，现在他们的军队和起义者之间只剩维斯瓦河之隔了。

总督区政府同样希望开始谈判，因为波兰总委员会代表声明，如果向他们保证战俘的权利，起义者准备放下武器。天主教堂大主教什拉戈夫斯基博士也不止一次地号召起义者停止作战行动。

但是，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实际结果，因为起义者仍抱有帝国因在西方的失败而垮台的希望。此外，起义者还抱着能得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帮助的梦想不放。英国每投下一枚带供给品的空投弹就唤起起义者得到有效帮助的希望，尽管几周来，这些希望都无情地破灭了。

只是在9月底，当英美的背叛行为完全暴露时，才终于可以开始谈判了。

谈判是在这样一种形式中进行的，这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少在波德合作中使用，它由于首先关注波兰人举行的起义而被许多德国人认为是一种不寻常的形式。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新方法达到了完全成功，它在未来可能有意义，所以我们要对谈判和直至起义者彻底投降的过程详加描述。

1944年9月29日，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通报说，起义军司令布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请求开始谈判，并希望预先察看一下普鲁什库夫集中营，以便使他的代表能相信，那里对待波兰平民是否真的像外国新闻界所大量的报道的那样残酷无情。

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委托当时任代理总督（总督因公务暂时不在）的华沙区指挥部长官在普鲁什库夫开始谈判，同时，他表示希望吸收天主教堂大主教什拉戈夫斯基参加这次谈判，目的是使波方谈判人员也能从他嘴里得到普鲁什库夫集中营的消息。

1944年9月29日，星期五，14时50分，3名波方谈判人员到达普鲁什库夫，来到当地城市委员的办公室。他们是从华沙市内

的分界线被送到这里的。他们中有：布尔将军的代表、总参谋部的博古斯拉夫斯基^①中校、波兰红十字会代表塔尔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和作为波兰总监管委员会代表的一名医生。

在彬彬有礼、十分得体的谈判中，塔尔诺夫斯卡娅伯爵夫人首先提出问题：国际红十字会是否察看过普鲁什库夫集中营？红十字会寄来的食品分给了难民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并出示了由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维斯博士^②拍摄的照片。对下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在普鲁什库夫集中营察看载有波兰国家军战俘的列车，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谈判结束后，给布尔将军的代表们提供了半小时与这时到来的大主教什拉戈夫斯基博士单独交谈的机会。德国人没有参加波兰人之间的这次谈话。然后，安排几小时察看普鲁什库夫集中营。这样布尔将军的代表们可以详细察看。他们特别注意按照协议让 3 个代表能在无干扰情况下与难民交谈。

察看装载战俘的火车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了，因为火车在这个时间开走了。大概，因为 3 个谈判人员认为火车是被德国人故意在他们到来之前发走的，所以又把火车截住，并开回了普鲁什库夫。这样，布尔将军的代表们有机会详细察看这列火车，并相信，对待火车上的人——波兰国家军的参加者——是严格执行军事法规的。

代表们察看了集中营的所有设备后，行政长官指出，参观集中营时，德方没有设置任何困难，波方谈判人员按照其请求，能自由和无干扰地检查一切。波方代表完全同意这一论点。

翌日，即 1944 年 9 月 30 日，早晨，在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在奥扎罗夫的指挥员避弹所，同联合委员会举行了会谈。参加

① 博古斯拉夫斯基，真实姓名为 Ф. 戈尔曼，波军中校，国家军侦察参谋长。

② 保罗·维斯，国际红十字会驻波兰的代表。

联合委员会的有波兰国家军和波兰总监管委员会的代表；除其他成员外，加入这一委员会的还有原波兰自助委员会副主席瓦霍维亚克博士。

谈判结束后，波兰代表声明，说他们没有被授予签署协议，但要将一切情况向布尔将军报告，后者的决定将在天黑前禀告。

在这次谈判基础上，9月30日晚上宣布，1944年10月1日，星期天，从5时到19时停火，在这段期间内，波兰平民可以不受阻碍地离开华沙。

1944年10月1日，星期天，德方认真履行了停火条件。所有集中营做好了接受平民的准备。但是，除极个别人外，波兰平民没有撤离华沙。所以，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于10月1日晚发表声明，说波兰人没有利用向他们提供的撤走平民的机会，现在将恢复作战行动。

夜间，波兰人又表示了进行谈判的愿望。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声明，1944年10月2日他准备再度进行谈判，但这次不是关于撤走平民，而是只涉及投降问题，并且他只是在委员会受权签署协议的正式委托的情况下才开始谈判。

1944年10月2日，波方谈判人员再次到来，谈判仍在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的指挥员避弹所开始。晚上，这次谈判以华沙投降而结束。条件记录在详细的书面条约中。

条约规定，1944年10月2日德国时间20时和波兰时间21时整在华沙界内作战的波军和德军之间停止作战行动。此外还规定，波兰各部队士兵应在条约中确定的时间内放下武器，以整个分队形式同自己的长官整队开到集合地。允许波兰国家军军官保留冷兵器^①。国家军保证交还他们俘虏的德国士兵和被波兰当局拘留的德

^① 即不带火药的兵器，如刀、剑等。

籍人员。

答应国家军士兵，包括 8 月 1 日后俘虏的国家军士兵，待作战行动结束后，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①的所有规定也将适用于他们。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国家军参加者，不分性别，也保障享有这些权利。同时还规定，属于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的国家军参加者有：司令部女技术工作人员、女通信兵、军需官和医务人员、出版和新闻部门工作人员、军事记者等。

投降条约第 8 条称，不追究任何一个战俘在华沙作战期间或过去对自己军事和政治活动所负的法律 responsibility，同时，这一条件还扩展到从战俘营释放后的时间。根据波方代表的愿望，这一条还适用于违犯德国法律的人，特别是从战俘营逃出后没有登记的军官，也适用于秘密回到波兰的人。

最后规定，对在战斗期间住在华沙的平民不进行大批镇压，谁也不会因在作战期间在单位和行政机关（社会保障、社会慈善组织）工作以及参加战斗和进行军事宣传而受到迫害。

条约的后几条规定了平民疏散和收回军事当局所要的艺术、文化和教堂珍品的方式，以及进行投降的军事方面事宜。

在华沙持续了 63 天的起义于 1944 年 10 月 3 日以这次投降而告终。

最高统帅部 10 月 3 日的通报用极其精彩的简洁语言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一事件：

“华沙起义已被镇压。经过几乎完全毁掉城市的数周战斗，孤立无援的起义者残余力量停止抵抗并投降了。”

① 指 1929 年 8 月 27 日在日内瓦制订的《战俘待遇公约》。公约明确了落入敌方手中、可享受战俘待遇的人员界定；规定对战俘必须始终给予人道主义待遇，平等对待战俘，严禁以任何不法行为致使战俘死亡或严重危害其健康，等等。

华沙的疏散

从军事观点看，华沙的投降标志着起义结束。现在，一个巨大的任务出现了，即从华沙疏散平民和完全清理华沙。

还是在起义的最初几天，很大一部分华沙平民为了从战斗中逃生，就从城里逃往农村。为了不使省里难民爆满，立即在普鲁什库夫建立了一个难民集中营，从8月6日起，所有从华沙来的难民通过它得到供应。

普鲁什库夫的这个审查集中营被敌对新闻界描述成血雨腥风的地狱，在这里德国人用残忍的方法每天残酷折磨可怜的波兰难民。犹太人的《灾祸》宣传机构称，在这里成千上万的人被枪杀，难民们被剥光衣服，将孩子与母亲分离等等。

在这些报道中，一句真话也没有。

当然，普鲁什库夫审查集中营的设施是纯军事的，但它完全符合要求，里面对待难民是人道主义的。

集中营设在东方铁路局过去的修理厂；由于前线临近，修理厂于1944年7月底撤走了。这样，必须开始按集中营的需要改装住房，即重新修建伙房和卫生设施。此外，为接待难民，必须准备好一些相应的大房间。

波兰自助委员会抽调了必要的辅助人员，其中有医生和护士。此外，一些部队卫生勤务军官也来了，这些军官同华沙行政区卫生处领导人共同担负了集中营的卫生服务工作。

从德国卫生管理部门仓库调拨了供集中营使用的必需的药品和包扎材料。

集中营的食品供应由华沙农业局局长实施，他通过供应处和农业处与难民和疏散司令部共同从华沙其他地区弄到了补充食品。

从8月10日到10月7日集中营存在的时间内，共提供的食品

数量如下：

面包	615318 公斤
土豆	194683 公斤
蔬菜	224768 公斤
咖啡代用品	10000 公斤
面条	12138 公斤
食盐	6000 公斤
果冻	2710 公斤
糖	3276 公斤
米	7568 公斤
燕麦米	360 公斤
油	100 公斤

难民一到集中营后马上就能领到面包。热食平均一日两餐。很有意义的是，难民没有提出任何对饮食不好的抱怨。相反，倒可以发现，由于德国人对从华沙来的难民表现出如此大的关怀，人们表现得极为惊讶。

相当一部分难民状况十分糟糕，因为他们许多人在华沙打仗期间好几周没有足够的食品，首先是缺水，还有许多其他苦难。恰恰是这些难民因为在集中营不仅找到了暂时避难所并得到了完全满意的饮食，而表示出特殊的感激之情。同时，他们特别贪婪地想吃面包，因为华沙好几周就没有面包，只发给米。

到这里的难民领到食品后，要经过医生检查，以检查他们能否进行工作。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从普鲁什库夫送往总督区的各个地区。病人立即从集中营放出，但不用载难民的火车运送他们。还没有为这些病人在皮亚斯图夫修好大的临时医院。孩子一般没有与母亲分开，因为这里讲的是 16 岁以下的孩子。母亲只要有 3 个孩子就不送往帝国尽劳动义务，即使她们有劳动能力也一样。将她们与

无劳动能力的难民一起留在了总督区。

根据党卫军长官的号令，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要送往帝国。

很自然，当有劳动能力的人与自己家人分别时，常伴随有声泪俱下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反复向波兰人解释说，近5年来男子与家人的分离对德国人来说是一种能被很容易理解的需要。这种解释在大多数情况下起了安抚作用。此外，还建立了卡片，它使这些家庭可以在几周内确定某个家庭成员的居住地。

华沙投降后，10月初在普鲁什库夫周围很有远见地又建立了3个审查集中营，因为波兰自助委员会计算过，还留在华沙的居民数量有28万人，然而，布尔将军的代表却指出，难民人数有40万。

在华沙，一开始就认为这一数字被夸大了，因为根据区里计算，华沙最多有15万平民。

在新集中营中，仅有乌尔苏斯集中营用了几天，因为已查明，波方调查人员报告的数目原来太高。实际上，投降后，只有不多的10余万平民从城里出来。此外，还有国家军参加者和非战斗人员17,500人。因此，起义者的数字也大大夸大了。

到1944年10月14日，通过普鲁什库夫和乌尔苏斯集中营的难民共有350617名，其中347488名是后来分配的。这一数字是这样划分的：送往帝国服劳动义务的153810人，作为无劳动能力者安置在华沙、拉多姆和克拉科夫区的167752人，因病放走的29926人，共347488人。

剩下的近3000人，被暂时留在普鲁什库夫集中营就地或在华沙继续劳动使用。

在普鲁什库夫审查集中营存在的全部时间内，德国人总感到十分担心，担心由于许多难民身体状况不好可能爆发流行病。所以，采取了卫生措施。同时，军事当局也给予极大帮助。尽管部分人员的身体坏到极其危险的程度，但在短时间内仍把35万人从华沙送

到了新居住地。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爆发流行病这一事实，是负责集中营卫生工作的所有德国机关的卓越功绩。

总的讲，可以肯定，疏散华沙的波兰平民，德国进行的有条不紊，并对待难民在各方面是人道的。

这一事实在中立方代表系统参观普鲁什库夫集中营时得到了绝对肯定。例如，天主教堂大主教什拉戈夫斯基博士就不止一次地察看过普鲁什库夫审查集中营，目的是让他亲自认定，外国新闻界提出的指责是否正确。他察看后确认，尽管按照审查集中营的要求难民按军事化管理得很严格，但德方在所有方面遵守着人道主义原则。

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保罗·维斯在带着同样目的察看了普鲁什库夫集中营之后，同样也因集中营在各方面组织正确、职能发挥无可指责和难民得到足够的食物而表示满意。

波方也承认，对待难民是人道的。

正像上面所讲的那样，1944年9月29日察看过集中营的布尔将军的代表，确认了国际红十字会代表团所说的。看来，普鲁什库夫集中营使布尔将军的代表出乎意外地产生了良好印象，它极大地影响了起义者做出停止起义的决定，因为他们开始相信，对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是人道主义的。

被吸收参加普鲁什库夫集中营工作的波兰自助委员会不止一次指出，德国当局对难民的照管引起了各方面的感谢。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对起义后波兰居民的总的行为给予了一定影响。广大居民都作了实施大规模镇压的打算。令他们惊喜的是，胜利者不仅以如此宽宏大量的方式宽恕了和平平民，而且还给予他们慷慨的援助。

难民的安置

德国当局面临的特别困难的任務，是将难民从审查集中营送往

总督区。首先得到车箱就非常困难，因为由于东西方的军事形势，车厢极度缺乏。多亏东方铁路局的协助和总裁维廷斯博士个人的主动精神，所有困难才被克服。几乎每天都能从审查集中营发出满载的10列火车。这样，难民们平均在集中营只住一昼夜。

有33089人被送到克拉科夫区，107224人被送到拉多姆区。

毋庸讳言，克拉科夫和拉多姆区对接待难民毫无热情的。但是，大家明白，疏散华沙平民不是华沙区的专门任务，而是整个总督区的问题。总督区（内务部管理总局）领导通过一系列长远措施，创造了能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

从普鲁什库夫和乌尔苏斯两个审查集中营往华沙西部地区运去51554人。但是，不应该忘记，华沙西部地区不得不至少多接纳三倍的难民。第一，相当一部分华沙居民由于布尔什维克军队的逼近，7月底即开始疏散前就离开了城市；同时，有10多万人去了华沙区的索哈切夫和洛维奇地区。此外，在起义的最初几天，华沙尚未完全封锁，这样，又有几万人离开城市，也去了华沙西部。结果，成千上万的按计划运往拉多姆和克拉科夫区的难民又返回索哈切夫和洛维奇地区，因为他们在那里的亲人和熟人中找到了靠近华沙的栖身之地。

这使仅在洛维奇和索哈切夫两个地区就聚集了20余万人。这是目前的一个严重问题，特别是如果考虑到在这一时期相当大的一部分华沙区已成为战场。

然而，在这里同样也顺利安置了大量难民，并且主要是保障了完全的秩序和安全，尽管前线逼近，但所有管理任务都没遇什么困难完成着。

起义的结果

从华沙投降之时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既从军事方面，又从政

治方面，来公正地观察事件和评价起义的结果。

从 1944 年 7 月初起，布尔什维克军队就进入了总督区，而且毫无疑问把主要突击对准了华沙。7 月中旬，进攻部队的推进直接威胁到了华沙。布尔什维克军队的力量众所周知，所以形势特别危险。

华沙起义使军事形势变得更加困难。现在不仅必须在维斯瓦河防御突击的布尔什维克军队，而且还需要在河西岸从进行顽强不屈战斗的敌人手中，在不可想象的巷战的困难条件下，夺取一个个街区、一群群建筑物、一幢幢楼房。

成功地将布尔什维克军队阻挡在维斯瓦河以东几个月和同时在华沙城内镇压了波兰历史上最大的起义，是具有巨大意义的军事成就。

在多次军事失败后，这在很长时间内是德国武装力量毋庸置疑的新胜利。

胜利者的荣誉同样归于在维斯瓦河阻挡住布尔什维克军队的部队和在华沙城内镇压了起义，同时又没有让俄国人渡过维斯瓦河的那些德军部队。

尽管敌人的攻势有时是压倒性的，但原第 9 集团军司令冯·福尔曼坦克兵将军提出“我们屹立在维斯瓦河上，我们要坚守维斯瓦河”的口号，已由第 9 集团军的所有部队英勇地执行好几个月了。

这对东线军事行动总的发展来说，具有最伟大的意义。

要知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在华沙区渡过维斯瓦河和按照他们的计划得以成功地从这里越过华沙的话，那么，东普鲁士战线就会处于十分严峻的形势下。这一战略目的至今未能达到，是德国士兵英勇精神的最好证明。

最高荣誉也属于那些德国部队，他们在 8 月和 9 月期间镇压了

起义并同时完成了超人之举。

很可能，这一任务是曾经摆在德国军队面前的所有任务中最困难的任务，因为在这里必须进行巷战。关于这些巷战的规模和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只有亲身经历这些英勇博战的人才会有所认识。

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通报中，一直强调德军在这几个月的功绩。德国士兵的精神在此期间又全面显示出来了。对德国军队功绩的高度评价也反映在这样的事实中：华沙战区总司令、党卫军陆军上将和警察将军冯·登·巴赫因对作战实施总的领导而荣获铁十字骑士奖章。两名在最危险地区指挥战斗的部队指挥官荣获了更高的德国奖章：党卫军中将赖涅法尔特荣获橡叶骑士十字奖章，党卫军首席长官季尔列万格尔博士荣获铁十字骑士勋章。

政治意义

但是，华沙的胜利不能只从军事观点去评价，这是一件具有更大政治意义的事件。

波兰抵抗运动提出了通过起义消除德国在华沙统治的任务，夺取城市政权后，在整个总督区开始起义，目的是以此建立新的波兰国家。这个“自由波兰”必须在布尔什维克到达之前建成，用自己的力量解放的这一独立国家本身来对抗苏联。

对许多起义领导人的审查清楚地证明，起义追求的就是这一目的。

斗争的结果表明，此目的无论如何也没有达到。相反，却使拥有百万居民的华沙城、波兰国家的原首都彻底被毁，现在成了一片废墟。

极度震惊的波兰积极分子们公开声明，起义失败和华沙城被毁——这是波兰整个历史上的最大失败。

如果考虑到波兰居民在这次斗争中遭受了骇人听闻的血的损

失，那么，以上所言千真万确。当然，确定死亡人数的准确数字是不可能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尸体至今还在废墟下埋着。但粗略计算，波兰死亡人数至少有 18 万，极有可能超过 20 万。

所以，不足为奇的是，这一惨重失败可以与波兰人 150 年前在马切约维采城下大战^①中受到的另一次失败相提并论。在这次大战中，波兰起义者的领袖塔代乌什·科希丘什科 1794 年 10 月 10 日被俄国人彻底击溃。波兰的民族英雄当时宣布说“波兰完了”。是否真的讲过这句话，或者这只是历史的传说，无人知道。但事实上，当时马切约维采城下的失败与华沙的失败之间有一种十分相似的现象。在国家军评述投诚的无线电广播中说：“它是波兰军队的末日”。

华沙的失败同时也是英国的惨重失败。

伦敦鼓动波兰人民起义，号召进行公开斗争。在用波兰语反复播放的无数次无线电广播中指责国内的波兰军队还没有投入与德国人的斗争。华沙起义的信号是从伦敦发出的。

波兰人怀着得到英国帮助的希望开始了斗争，但又一次大失所望，因为在 63 天里，英国伙同美国只把他们在这一时期几乎每天空袭德国城市时投入的飞机中的极少部分，用于支援华沙波兰人的行动。

这种行为完全符合英国人的性格。英国对波兰共和国的保证早在 1939 年就被践踏了。波兰人同样在起义时也被出卖给。这一次，伦敦将他们出卖给了苏联。

当起义结束时，英国发表了抱怨华沙的文章，丘吉尔讲了有关“华沙英勇史诗”的富有同情的话，波兰“斯维特”电台用极其尖刻的语言对英国的背叛行为进行了抨击。当时，这家电台宣布：

^① 马切约维采位于华沙东南约 53 公里。

“所有给华沙签署了死亡判决书的人，请让华沙安宁吧。”

这句话是最有力的批评。这一批评是彻底失望的波兰民族主义者对实际上给华沙签署了死亡判决书的英国说的，因为英国除了从飞机上空投几次装备外，没有给予任何实际的援助。波兰人对英国这种完全拒绝态度的失望是普遍的。几个月前波兰人对英国抱有的那种深信不疑的感情，现在被这次背叛彻底动摇了。

最后，华沙的失败是斯大林的失败。

当然，斯大林用自己的战术成功地使大部分在波兰国家军战斗的波兰知识分子或是阵亡，或是被俘。这是布尔什维克的惟一胜利，因为在其他方面，起义的结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不利的。

很早以前，大多数波兰人就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因为他们充分研究了布尔什维克制度，因为在波兰时刻充满对俄国人的仇恨。尽管如此，广大波兰居民从战术观点出发，仍准备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结盟，因为许多人认为，这样他们将能推翻德国统治。这种推测结果同样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已查明，甚至当国家军在起义最后的日子绝望地进行最后抵抗时，斯大林也没有给予波兰民族主义者援助。对于波兰人来说，现在十分清楚的是，他们即使从战术观点出发也不应该指望俄国人，因为从俄国人身上等到的只是危害，而绝不是恢复自己原先的国家。

在莫斯科举行的对波兰人毫无结果的会议^①，再次在全世界面前证实了这一点。

^① 指1944年7月30日至8月10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访问莫斯科期间，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会谈中，斯大林允诺向华沙起义者提供援助。参见档案№02434。

起义期间波兰居民的表现

分析华沙起义时，还有一条具有巨大政治意义的结论。这里指的是整个居民界的表现问题。当波兰国家军开始斗争时，其领导人明确指望他们将把广大居民群众吸引到自己一边来，那时华沙起义将成为联合所有波兰人起义的信号。

国家军领导人的这种推测完全错了。

首先应肯定的是，华沙市内广大居民群众从最初几天就对起义持否定态度，至少不支持起义。不管怎么样，起义最初十天的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平民们没有给予起义者任何自愿的援助，筑街垒也只是由于国家军官兵威胁强迫才参加的，俘虏的供词和老百姓都证实了这一点。

华沙居民总的表现在 8 月 10 日至 20 日期间暂时有了变化，当时攻入华沙的卡明斯基的哥萨克人，对波兰妇女和儿童下手。当时，国家军成功地影响了居民，同时在宣传中肯定说，哥萨克人将这样对待所有波兰妇女和儿童。这以后，许多人便加入了国家军或以别的方式支持起义。

当卡明斯基的军队因自己的行为不符合德军纪律而从华沙撤走后，广大居民群众很快与国家军断绝交往，从此采取了消极态度。

最后时期，大部分居民越来越坚决要求停止起义。这不仅被波兰人的供词所证实，而且首先被当了起义者俘虏的德国人的供词所证实。

农村居民的表现更加明显。他们自始至终都不支持起义。他们拒不提供实际支援，甚至在华沙附近构筑了主要是对付起义者的防御工事等，都是证明。

此外，农村居民不赞成起义还有一点证明，甚至当部分国家军在专门措施期间从华沙逃出，冲入坎皮诺斯草原向南流窜时，农村

居民也没有给这 1600 名士兵任何支援，结果这些起义者在 24 小时内就被查出和消灭掉了。

波兰农村居民对待有关加入起义、在农村地区组织起义或至少组织匪帮从后方打击德国人的所有暗中宣传，也是如此。在这几个月，没有由农村居民建立的一个匪帮组织，也没有发生过一次怠工行为。不但如此，农村居民以及农村地区的城镇居民正是在这几个月认真和忠顺地执行了德国的命令。

这一点最明显地表现在构筑防御线上。尽管伤亡人数每天达 40 人，波兰人仍不顾一切地在直接邻近前线的一部分每天处于扫射下的地区从事构筑工事的工作。

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广大波兰居民群众完全否定华沙起义的最好和最显明的证据。

此外，贝林格波兰师的俘虏的供词也证实了波兰居民的这一普遍立场。贝林格师是惟一由波兰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的一支部队。这个师的俘虏在审讯中始终如一地证明，波兰居民在该部队进入华沙区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作胜利者欢迎，而正相反，十分冷淡和审慎，甚至怀有敌意地接待了他们。按这些俘虏的口供说，波兰居民对该部队军人提出的奇怪问题总是解释说，虽然德国人对他们很严厉，但是毕竟经常关心居民的工作和面包，所以波兰人没有想念布尔什维克。

这再次证实了我们的看法：广大波兰居民群众由于内心的信念，不接受在波兰替换德国统治的所有企图。

政治结论

华沙起义再次肯定了大多数波兰居民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这一事实。现在也清楚了，波兰人觉得自己被英国出卖了，不相信英国的保证了。在这种形势下，波兰人觉得自己完全孤立无援。所以，

许多人开始清楚地意识到，欧洲有一个惟一的大国——德意志帝国，波兰人民应指靠这个国家。

毋庸置疑，广大波兰居民群众根据华沙起义的结果，修正了自己对我们——德国人的态度。他们一定会在某个时候弄清楚，臆测中的帝国灾难没有发生，正相反，正是在华沙地区镇压起义和击退俄国人进攻上，德国人证实了力量和威力，这种力量和威力波兰人谁也没预料到。

以后，对德国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党卫军陆军上将冯·登·巴赫在与起义者谈判投降时骑士般的态度和德国民政当局对华沙平民表现出的巨大关怀，在波兰居民对待德国人的情绪上起了特殊积极的作用。

惟此才可以解释目前在华沙所有地区都气氛平和（除匪徒的少量活动外），才可以解释，尽管前线逼近，但所有向波兰居民提出的重要军事措施，他们都以最忠实的方式执行着。

对于波兰人的这种情绪，我们德国人应该善于利用。

不需要向波兰人保证，说他们现在就将被广泛地吸收到基层行政当局的合作中，虽然这种保证毫无疑问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尽管如此，类似的举措不是决定性的。

最重要的是在德国宣传中彻底停止用“犹太人、波兰人和茨冈人”相提并论的方式诽谤波兰居民。那部分规规矩矩的波兰居民有理由将这种相提并论视为侮辱和鄙视。假如帝国能在这方面做出引人注意的政策改变，那么，这会符合居民的意愿。

而且，作为承认波兰居民的很好表现，应当停止所有专横措施。遗憾的是，近 5 年来，这种专横措施往往太多了。波兰人完全理解由战争决定的那些严厉措施，但专横行动侮辱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我们停止类似的专横，以自己严格的，但公正的对待波兰人的态度让他们觉得对他们是公正的，那么，这对波兰居民现在

表现出的对我们的良好态度，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会使波兰人有一种只有帝国才能维护波兰人民利益的信念。

德国政策又有了一次绝好地机会，它在发动反对布尔什维克战争时就有过一次。失败引起的波兰居民的压抑情绪，特别是他们经受着自己被盟国出卖和抛弃的这种感情，再次给了我们通过有远见、有智慧的政策，使维斯瓦河地区安于接受德国统治的机会。

欧洲思想在波兰人民中广泛盛行。但是，迄今为止波兰人经常担心他们在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找不到位置。如果现在给他们在这个新欧洲中按照自己的风格和传统生活的希望，那么，现在恰好可以赢得大多数波兰人民的好感，以实施德国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在未来的欧洲中，德意志帝国为了西方国家的利益，应当成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如果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评价华沙起义的结果，那么，给几十万波兰人带来无限苦难的这次起义，可能对维斯瓦河流域地区具有良好的意义。

【专题说明】

苏联战后对德国的占领

(1945年3月至1949年11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了分区占领，由四国占领区最高军事长官组成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拥有德国临时政府的职权，而签订对德和约及处理战后德国诸问题的权力则交由四国外长例行会议解决。战后初期，美苏在德国问题上颇有合作趋势，美国支持苏联在第一次外长会议上提出的建立全德中央政府和鲁尔区实行四国共管的建议，在法国全力反对的情况下，美国甚至积极主张组建美、英、苏三国占领区的管理机构。苏联由于未能实现其建立全德统一管理机构的计划，便率先在苏占区开始实行非军事化、非纳粹化的民主改革，并为此策划了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运动。此举引起西方盟国的疑虑，美国遂建议美国与英国的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以实现德国经济统一的目标。此时，苏联的态度也从原来的统一德国的主张转变为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美国在其使德国中立化的计划破产后，转向对苏实行遏制政策，并开始加速推行单独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美国宣布马歇尔计划以后，苏美关系明显走向对抗。随着伦敦六国会议召开、法国加入美英双占区、苏联代表退出德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西占区和苏占区分别实行币制改革，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冷

战日趋激化，终于导致“柏林危机”爆发。尽管由于苏联的让步，危机表面上得以化解，但伴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先后成立，德国终于人为地分裂成两个政治、经济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

对于苏联是如何对东部德国实行占领以及如何制定和贯彻其占领政策的具体情况，由于过去缺少相关档案材料，研究者知之甚少，这一状况在俄国档案大量解密后有所改观。这里刊登的65个档案文件，主要是关于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后改名情报厅）与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往来电函、报告、指示等文献。苏联在德国的占领机构重叠复杂，矛盾重重，缺乏统一协调，但宣传（情报）厅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负责人们想像中的对舆论宣传、新闻媒介的控制和监督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把占领区内部的政治事务集中在自己手中，甚至曾一度参与了制定苏联对德国的占领政策。1945年10月苏联人民委员部决定在军政府下设谢·伊·秋尔潘诺夫领导的宣传厅（后改名情报厅），其目的是利用各种方式在德国居民中间进行监督、组织和宣传，促进反法西斯党和组织思想的传播。宣传厅利用应该属于总司令或军事委员会的职能，很快便填补了军政府政治活动的真空。到1946年初春，宣传厅已经扩大到拥有10个处和1500名苏联工作人员，成为军政府最大的分支机构。这时的宣传厅实际上领导着与德国民主化改造有关的所有方面，即关于政党、社会团体、工会和德国居民中的一切政治工作，同时对包括教育、文化和新闻检查等一系列部门进行监督。秋尔潘诺夫甚至可以越过总政治部及其第七局，以及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向党中央请示和报告工作。因此，对这些文件的研究和理解，可以使人们对苏联占领东部德国四年半期间的政策变化及其实施过程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

（本专题文件由沈志华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刁邵华、熊建国、赵洪、方琼等）

№01935

季米特洛夫和潘友新关于在德国开展政治工作
给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5年3月)

致维·米·莫洛托夫同志^①

格·马·马林科夫同志^②

随着红军向前挺进并占领德国领土，必须改变我们在德国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和内容。

与德国同志讨论了这个问题，考虑到总政治部的情报资料，并且了解了总政治部工作人员的看法，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在红军占领的领土上的工作

一、宣传工作的组织和性质

宣传工作的全部领导集中在红军政治机关手里。他们在德国共产党员和其他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宣传采取两种形式：

1. 直接以红军的名义；
2. 以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名义。

(1) 以红军名义进行的宣传。由方面军政治部出资创办报纸。

① 莫洛托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1890～1986），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

② 马林科夫，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亚诺维奇（1902～1988），时任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党中央第二书记。

报纸在红军占领的德国地区居民中间以及敌军作战部队中间散发。

各政治部现有的报纸工作人员队伍由于吸收经过考核的德国共产党员以及其他在苏联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而壮大了。

红军政治机关应广泛开展印制并在德国居民中间散发传单和小册子的工作。

政治机关还应向德国居民进行无线电广播。鉴于居民的收音机均已被没收，故可在适当地点安装扩音器。

(2) 以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名义进行宣传，是为了更便于使德国居民接受，德国人向德国人讲话更容易被理解。为此目的而创办另一份报纸，编辑部由经过考核的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编辑部在红军总政治部领导下进行工作。红军总政治部通过自己的全权代表来实现其领导。

这份报纸取名《德国人民报》、《德国人民之声》比较合适，或者取个其他类似的名字。

报纸可在红军占领的德国地区某个最重要的中心出版。

报纸基本上在红军部队占领的领土散发，也可在战线对面散发。与此同时，以该报的名义进行无线电广播，出版传单和小册子。报纸的编辑工作以及以它的名义进行的宣传工作，完全不依附于“自由德国”委员会，不与它发生联系。^①

推荐鲁·赫伦施塔特（主编）、卡·马隆、弗·艾尔本贝克参加报纸工作。亨·格莱弗、汉·马莱、马·沃尔夫参加无线电广播的编辑工作。

宣传的内容：

1. 以红军名义进行的宣传。解释战争的目的、红军进驻德国领土的目的和德国居民对红军的义务；阐明苏联的政策，提供有关

^① “自由德国”委员会是1943年7月在莫斯科成立的德国反法西斯组织，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该委员会于1945年10月30日解散。

苏联的信息；宣传苏联的文化及其成就；揭穿法西斯宣传机关散布的所谓红军要消灭德国人民的谎言；广泛地介绍德国在苏联犯下的暴行及其造成的破坏；揭露法西斯的战争罪行以及德意志民族的参与和责任；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愚昧，等等。

2. 以德国反法西斯战士名义进行的宣传。揭露德国法西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元凶，是给德意志民族造成惨剧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宣传还应揭示德意志民族本身对希特勒体制罪行的参与。应阐明红军作为消灭法西斯统治的救星的作用；证明希特勒集团很快就要灭亡，这有助于德国人拯救尚可以拯救的东西，首先是拯救德国居民的生命。报纸应面向居住在法西斯领土上的德国人，号召他们立即停止反对红军和盟军的军事行动，为反对希特勒而进行武装斗争、怠工、成立战斗小组和组织破坏活动等等。报纸应解释，为了恢复德意志民族的声誉，重建富裕的生活，为了取得苏联和其他各国人民的信任，必须履行如下的先决条件：

承认德意志民族对法西斯主义罪行负有责任；诚实地劳动以弥补法西斯给别的国家造成的损失；尽快地无情地根除所有的法西斯分子；清除德国人民思想意识中的法西斯主义影响；用民主主义的进步的精神对德国人民在道德上和政治上进行最深刻的重新教育，放弃沙文主义的“种族”优越感；放弃帝国主义政策和军国主义；惩办法西斯罪犯；全面解除德国武装和消灭它的军事工业，等等。

报纸应揭露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反动性，解释与从前的可耻遗产彻底决裂的必要性，说明这种决裂将在德国历史上揭开新的篇章。

报纸应报道地方的生活，特别是各主要中心的生活，阐述恢复经济—公用设施等任务。

报纸应向德国居民指出，惟有真心诚意地配合红军及其各个机构，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希特勒掠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沉重负担。

二、组织德国反法西斯战士与红军的配合

为了配合我们的军事当局（驻军首长、卫戍司令、政治机关等）在红军部队占领的领土上对居民开展工作，我们认为最好能在德国占领区最重要的中心建立临时协同机构。这些机构由苏联军事当局任命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党员和其他人）组成。其首长应该是德国共产党员中最可靠和最坚定的工作人员。

协同机构的任务是：协助苏联军事当局清查暗藏的法西斯分子，制止怠工；协助组织公共设施，建设和维修道路，发动居民；协助组建小型民事法庭、学校和图书馆，供应特别是清查食品储备以及应该没收的财产。协同机构协助发现和核查地方居民中的共产党员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士。

为了开展协同机构的工作，推荐下列德国同志：阿克曼^① 和乌布利希^②（均为德共国外局委员）、弗·沃尔夫、艾·赫伦莱、彼·弗洛林、古·索鲍特卡、斯维塔拉、沃·莱昂哈德、Г. 卡曼（附上有关材料）。

三、从战俘中培训在德国工作的反法西斯干部

鉴于在德国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经过审核的人员数量将要增多，应该加强和扩大在战俘营发现和核查共产党员和其他反法西斯人员的工作。

为了给新的学校培训教师，应该注意在被俘的教师中间开展工作，在第27战俘营（克拉斯诺戈尔斯克市）组建为期两个月的反法西斯师资培训班。计划第一期招收300人。

吸收德国共产党员教师和战俘中其他的反法西斯人员着手筹备编写新的教科书。

① 阿克曼，安东（1905～1973），1945～1946年为德共中央委员，1946～1950年为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

② 乌布利希，瓦尔特（1893～1973），1945～1946年为德共中央委员，1946年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49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挑选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其他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医生，以便在德国开展工作。

挑选不少于 100 名这样的知识分子送入第 27 战俘营的反法西斯学校。

在被俘的牧师中间加强反法西斯教育工作，从反法西斯的牧师中挑选一批积极分子进行这一工作。为此目的，可将反法西斯的牧师（30~40 人）集中在一个战俘营里，做他们相应的工作。

在红军占领的德国领土上和在被德军中的宣传工作

这项宣传工作按从前的方式进行：

1. 利用各方面军政治部的力量；
2. 通过“人民之声”和“德国基督教之声”广播电台（第 205 研究所^① 系统），并且……
3. 通过“自由德国”委员会系统。

继续出版《自由德国》报是适宜的，但印数可从 50000 份缩减到 20000~30000 份，还要限制其范围。

报纸在战俘和德国作战部队中散发，但不在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德国居民中散发。

格·季米特洛夫^②

亚·潘友新^③

1945 年 3 月

① 该所是 1943 年 9 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新闻处基础上建立的。

② 季米特洛夫，格奥尔基·米哈依洛维奇（1882~1949），自 1935 年起担任共产国际总书记，1945~1946 年为联共（布）中央机构工作人员。

③ 潘友新，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1905~1974），1944 年 9 月起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局第一副局长，1947~1952 年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

№01936

关于在德国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的 情况汇报（摘录）^①

（1945年7月5日）

随着红军进入德国领土，政治机关在德国居民中开展了大量的政治工作，揭露希特勒的宣传，解释苏联对德政策和动员居民恢复城乡的正常生活。

我军进入德国领土最初的日子里，居民受到法西斯欺骗宣传的迷惑，惊惶地躲避红军的进攻部队，或者藏在很深的地下室里，不敢在街上露面。尽管恐惧逐渐被谨慎所代替，但确信不久就会遭到杀害或被流放西伯利亚，这种情绪在大多数德国居民中占主导地位。曾经发现多起居民由于对红军的恐惧而单独和集体自杀的事件。

为了帮助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三方面军的政治机关，总政治部于今年5月派出30名做政治工作的军官，6月又派出40名军官，他们在为德国居民出版的报纸编辑部工作，也有人在德国居民中间从事其他的宣传鼓动工作。

为此目的，派遣了70名住在苏联的德国流亡者和将近300名在反法西斯学校里受过政治培训的反法西斯战俘到地方自治机构去工作。

^① 这个材料是由总政治部第七局局长 M. 布尔采夫签署，呈报总政治部代主任约·希金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格·亚历山德罗夫的。

还派遣了 10 名第七局^① 的工作人员，他们通晓德语并且具有创办德文报纸和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经验。

红军政治机关初期在德国出版了四种日报，总印数为 45 万份。现在其中的一种移交给柏林市政厅，一种为波兰的德国人出版，两种正处在改组阶段。

创建了柏林广播电台，每昼夜工作 20 小时。此外，还有将近 30 个广播站，每天都为居民播音。

在总政治部第七局设立了专门对德语文字和口头宣传进行指导和监督的处，以及为德国居民出版的报纸供应宣传材料的报刊局。从 5 月 17 至 7 月 2 日，共提供文章和通讯达 145 篇以上，主要是阐述苏联军事和经济的强大实力，阐述苏联人民的生活，揭露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用德文出版了斯大林同志的《论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艺术宣传画《斯大林同志论德国和德国人民》，以及“克里米亚会议决议”^②，并且已经运抵德国。

遵照最高统帅部的指令，各政治机关在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厅和村长会）、警察局和法院，从地方居民中选拔相应的反法西斯干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政治机关还实施对主管政治工作的卫戍副司令的领导。

为了审核和选拔大市长、市长及其副职，各司法部门的负责人，村长等德国地方行政人员，与地方居民进行过数百次谈话，从而可以发现和吸收反法西斯人士参加工作。许多市长及其副职和谘议员都是以前的德共党员。……^③

个别地区，司法部门配备的人员完全是德国共产党员，他们充

① 总政治部第七局负责在敌人军队中开展反宣传工作。

② 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该决议确定了完全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等原则。

③ 此处内容是俄国发表文献时删节的。下同。

满了宗派思想，缺乏正确的信息，采取了错误的措施。譬如把市谘议员叫做“政治委员”，要求居民悬挂红旗，以德国共产党活动家的名字更换了许多街道名称或为其命名。对所有类似的情况，均已采取措施消除了所犯的错误和过失。

目前，在苏占区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机构。建立并遵守严格的占领制度。……

在居民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群众措施：召开会议、群众大会，以及进行集体的和个别的谈话。

全市居民大会具有最大的群众性。譬如约有 10000 名当地居民出席了居斯特罗市的全市大会。部队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市卫戍司令、市长和反法西斯战士在大会上的讲话，通过功率强大的广播站进行了实况转播。……

市民通常很愿意参加会议，提出许许多多问题，对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反应很活跃。德国青年受法西斯思想毒害最深，他们在会议上往往表现出敌对情绪，经常提出挑衅性问题。……

政治机关在清查和消灭法西斯地下恐怖组织和破坏团伙的工作中，积极配合卫戍司令部和反间谍机构“锄奸部”，对法西斯分子继续进行反苏宣传的企图（散布谣言、张贴手抄传单、投寄匿名信等等）进行斗争。……

德国共产党的重建，其他反法西斯党派和自由工会的即将建立以及其刊物的创办，将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在德国居民中间施加政治影响的可能性。

№01937

谢罗夫关于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区状况 给贝利亚的报告（摘录）^①

（1945年7月9日）

……今年7月3~4日，盟军已撤离到克里米亚会议规定的分界线。^②

现将盟军解放的图林根和萨克森各地区状况做一汇报。

盟军解放的各个城市没有空袭和地面战斗造成的破坏痕迹。在莱比锡、埃尔富特、梅泽堡市存在着盟军空袭造成的并不严重的破坏。

大多数工厂和煤矿已开工并出了产品。在开工的工厂中，有大型合成燃料厂、蔡斯光学仪器厂、皮革厂、制鞋厂以及其他许多工厂。还有10家兵工厂和大炮厂。

许多工厂都有未被盟军运走的制成品，例如莱比锡的前“福克乌尔夫”工厂（现未开工）存有约600台各种型号的航空发动机。

一些仓库的食品、成品鞋和皮革制服未被盟军运到自己的占领区去，已经做了统计。

① 档案原件上有朱可夫1945年7月14日的签字：“阅过。”该文件还分送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谢罗夫，И. А.（1909~?），1945~1947年任苏驻德军政府主管民事工作的副总司令。贝利亚，拉夫季米·巴夫洛维奇（1899~1953），时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委员。

② 克里米亚会议即雅尔塔会议规定苏联与美英法三国共同占领德国，而西占区和东占区之间的分界线基本上是1944年9月的占领区议定书确定的，苏占区包括萨克森、图林根、梅克伦堡-福尔波梅恩、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勃兰登堡。

铁路交通正常运行。

机床和工业设备未被盟军运走。

城市和居民点里住着许多居民，据他们说，他们在战争期间没有外逃，因为盟军没有经过战斗就占领了这些城市。……

我们查明，图林根和萨克森两省存在着政治观点相当坚定的工会，特别是共产党组织。然而，共产党员有极端倾向。譬如在许多城市里，在红军部队到达前的两三天里，共产党组织就准备并且悬挂出欢迎红军的标语口号：“红色莱比锡向红军致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苏维埃的萨克森，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万岁”，“我们埃尔富特居民要求与苏联合并”，还有一系列摘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口号。

此外，共产党员立刻参与了地方自治的事务。地方自治机构的领导人不知所措，开始放弃对居民的管理工作。譬如今天在莱比锡市的会议上，大市长宣布说：“鉴于红军的到来，我认为我处在不该是我的位置上，请求接受我的辞职。”我们查明，这位大市长无论是在希特勒时期，还是在美国人时期，都不是名声不好的人。

乌布利希同志对所有这些问题都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答应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给党员指出正确的方向。……

美军撤出的这些城市和省份的居民对待苏联官兵的态度目前还很谨慎小心。我们的军人与德国人交往时，后者彬彬有礼，但保持着警惕。……^①

^① 档案原件上有手写字：“阅过。朱可夫。1945年7月14日。”这份文件还分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

№01978

关于苏驻德军政府政治部宣传和书刊 审查处工作的总结报告^①

(1945年10月31日)

为了在报刊、广播电台、剧院、电影院等方面对宣传进行监督，在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部^② 属下设立了宣传和书刊审查处。任命政治部副部长兼任该处处长，同时也是苏联军政府首席书刊审查官。

该处最初的任务是确保对这个时期在柏林出版的柏林市政厅四家党报进行出版前的审查，还必须对柏林广播电台的工作进行严格的监督。随着对这两个最重要的宣传部门严格监督的确立，书刊审查机关的工作开始扩大并且涉及到政治文化活动的其他领域，具体地说，就是出版社、剧院、电影院。

初期，安排书刊审查工作时遇到一些困难，这是因为各卫戍司令部也从事书刊审查活动，尽管规模很小。这种重复现象削弱了统一的领导和对这项工作的责任感。为了消除这一缺点，朱可

① 该报告是由军政府政治部主任谢苗诺夫和副主任、书刊审查处处长菲利波夫签署的，于1945年11月11日提交给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

② 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部是1945年5月在军政府总司令政治顾问的领导下成立的。根据联共（布）中央1945年5月30日的决议，指定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为军政府的政治顾问，8月6日指定阿尔卡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波列夫继任。根据1945年9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由第一副政治顾问领导军政府政治部，根据1946年5月15日的决议，由政治顾问谢苗诺夫领导。1945年10月军政府政治部的一部分职能转交给宣传厅。

夫元帅^①于8月18日发布了第29号命令，对柏林以及苏联占领区各省的书刊审查工作进行了整顿。这项命令说：

“把开展和指导书刊审查活动的一切职能交给苏联军政府政治部宣传和书刊审查处，以及各省、各专区苏联军政府的政治部。”根据命令，各卫戍司令部属下任命书刊审查官，他们应该根据宣传和书刊审查处的指示进行工作。

这项命令还规定了宣传和书刊审查处的职责。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在上述时期里做了哪些工作呢？

一、对印刷厂和出版社的监督

书刊审查机关的任务是不得让一个未经书刊审查机关批准的出版物（图书、报纸、简报、传单）出版。必须建立出版社和印刷厂工作的统一秩序，防止非法出版活动。为此目的，准备了由朱可夫元帅签署的第19号命令（8月2日），所有的印刷厂以及复制（油印、胶印、珂罗版印刷）机构的业主和经理人员均需在相关的卫戍司令部注册。作为对这项命令的补充，首席书刊审查官发布了《印刷厂工作的暂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印刷厂只有得到苏联军政府书刊审查机关的批准，才有权印制报纸、图书、杂志、张贴画、各类政治传单、号召书、党派出版物等。印制业务用的印刷品（表格、公文纸、海报等）应得到相应的卫戍司令部书刊审查官的批准。

德国人严格地遵守了这些规定。违反这种制度的只是个别情况。譬如在潘科夫区（柏林）有一家印刷厂未经书刊审查机关批准

^① 朱可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1896~1974），时任驻德苏军和军政府总司令。

而给区剧院印制了两本关于艺术的小册子。按照书刊审查机关的指示，印刷厂由于违反有关规定而被勒令停业两周，其业主被罚款300 马克。

按规定，任何一家印刷厂均不得承印没盖书刊审查专用章的印刷品。

对于各类出版机构的活动，也采取了措施，凡未经书刊审查机关批准，均不得从事任何出版活动。

根据朱可夫元帅的命令，所有的出版社均在区卫戍司令部注册。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授权他们印刷图书、小册子、传单。为了从事这种活动，出版社还必须得到朱可夫元帅或者军事委员会的专门批准。

至今为止，批准了以下几家出版社：

1. 苏联军政府的图书出版社
2. 德国文化协会的图书出版社，社名是“建设”
3. 共产党中央的新道路图书出版社
4. 德国国民教育中央管理局的教学出版社
5. 德国公众出版社（出版杂志《新柏林画报》）

所有这些出版社的出版物均应事前接受审查。譬如书刊审查机关审查和批准了德国学校用的教科书20种、文艺书籍约15种，政治书籍20种以上。

此外，书刊审查机关还批准了柏林市政厅出版各类管理事务的小册子，批准各党派出版政治号召书、张贴画、小册子和各类宣传鼓动材料。

书刊审查机关允许私人出版社出版目前德国居民最感兴趣的读物，如儿童图书、俄德和德俄教科书和辞书。然而，这些出版物的封面上不注明“出版社”的商标，只注明出版人的姓名。

二、对报纸和杂志的审查

在柏林共有下列经苏联军政府批准的期刊。

报纸

1. 《德国人民报》——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
2. 《人民报》——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
3. 《晨报》——自由民主党的机关报
4. 《新时代报》——基督教民主同盟的机关报
5. 《柏林报》——柏林市政厅的机关报
6. 《自由工会报》——德国自由工会的机关报
7. 《每日评论报》——苏联军政府的机关报
8. 《人民意志报》——勃兰登堡省共产党的机关报（在柏林印刷）

杂志

1. 《建设》——文化协会出版
2. 《法令报》——柏林市政厅出版
3. 《新柏林画报》——《柏林报》出版的私营画报
4. 《新生活》——柏林市政厅青年委员会的机关刊物
5. 《企业与工会》——德国自由工会的机关刊物
6. 《理发与美容》——为理发师出版的私营刊物
7. 《柏林时装杂志》——私人出版的时装杂志

所有这些报纸和杂志均得接受苏联军政府的事先审查。这方面的审查工作是以下述方式进行的：

书刊审查机关从事对报刊的监督，设在印刷厂集中的地区（柏林市中心），报纸和杂志在那里印刷。与印刷厂经理部有严格的约定，任何一篇短评如果上面没有书刊审查公章和书刊审查人员的签

字，均不得在报上发表。因此，报纸和杂志编辑部在报纸或杂志付印之前必须把该期的全部材料按照版面送交审查。每个书刊审查人员固定负责某一家报纸和杂志。材料审查完毕之后，书刊审查人员在上面签字，然后上交首席书刊审查官，与他一起解决所有的疑难问题，决定撤下某篇文章，或者删除文章中的某些地方。做完这一切之后，首席书刊审查官批准材料付印，在上面盖章和签字。书刊审查人员在每一种出版物上写上自己的审查编号。

对报刊的审查工作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因为某些报纸，如《新时代报》、《晨报》，往往企图刊登旨在反对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基本任务或者不正确地评价某个德国国内的问题。有时书刊审查人员不得不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从《新时代报》撤下 20 篇文章和短评。在开展这项工作期间，书刊审查机关从《人民报》、《柏林报》，甚至从《德国人民报》和《每日评论报》中撤下了许多材料。

书刊审查处出版的被查禁的材料简报就是这一工作的总结。简报已出版了 7 期。

因为《新时代报》的编辑多威法特在报纸中推行明显的反动政策，书刊审查处要求朱可夫元帅撤掉多威法特的职务。报刊中出现的材料彻底揭露了多威法特是个嚣张的法西斯分子。10 月 19 日，多威法特被解除在《新时代报》编辑部里的工作。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在这方面还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向报纸编辑提示社论的题目，直接向某些报纸推荐使用一些材料。宣传和书刊审查处为了配合土地改革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三、对广播电台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柏林惟一面向全德国广播的广播电台，经常处在宣传和书刊审查处的监督之下。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制定了广播电台政治宣传内容

的计划，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一计划制定自己的工作计划。广播电台的这个工作计划经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审批之后，再报请政治顾问的政治处主任批准。

广播电台里有常驻的书刊审查人员，他在每一次播音前都审查将要播放的材料并且签字。凡是重要问题，他均请示首席书刊审查官。

如果党派、文化协会等领导人参加广播大会，他们的讲演稿须事先送交审查。有一次，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的一个领导人拒绝在广播大会上讲话，因为书刊审查机关删节了他的讲话稿。但是在告诉他书刊审查机关不能恢复所删掉的内容后，他同意了播放他的经过修改的讲话。

四、对电影院和剧院的监督

长期以来，书刊审查处由于缺少工作人员而不能抓电影院和剧院的工作，这个部门的工作在柏林由中央卫戍司令部负责。然而，随着朱可夫元帅的命令的发布，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开始参与这方面的工作。

书刊审查处每周在“未来”电影制片厂对德国的和苏联的影片进行三次审查。每一次审查之后，书刊审查人员都决定准许或者禁止放映这部或那部影片的问题。对于获准放映的影片都发给专门的许可证，使电影院有权放映这部影片。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只对四家主要的市级剧院进行监督：

1. 德国剧院
2. 德国歌剧院
3. 艺术剧院
4. 轻歌剧剧院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在德国剧院上演尤利乌斯·盖伊的剧本时做了大量工作。书刊审查机关建议对这个剧本的最后一场戏重新改写。书刊审查人员参加了两次彩排，对最后一次彩排组织了广泛的讨论，邀请威廉·皮克^①、阿克曼、约翰·贝希尔、文茨莱尔等人参加。

这个剧本现在还在剧院里演出，得到德国舆论界的好评，在居民中享有盛誉。

上述剧院中每一家的上演剧目均经过书刊审查处的批准。至于区级剧院和歌舞厅，则由区卫戍司令部的书刊审查机关负责。书刊审查处只监督它们的工作。

五、对地方书刊审查工作的领导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首先大量印刷朱可夫元帅关于部署书刊审查工作、整顿出版和印刷工作的命令以及印刷厂工作暂行规定，分发给各省。

此外，该处通过与政治顾问驻各省全权代表通信的方式，在一些必要的问题上对书刊审查人员的工作予以指导。

该处由于书刊审查处的督察员不足而不能组织有关人员到地方去，而在实践中把各省主要书刊审查员召到卡尔斯豪斯特来。譬如说，萨克森专区的主要书刊审查员叶欣同志就被召到卡尔斯豪斯特来汇报情况。书刊审查处还把柏林市和市内各区卫戍司令部的书刊审查员召来汇报情况。

1945年10月末，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定，苏联军政府把书刊审查工作移交给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

^① 皮克，威廉（1876～1960），德国共产党主席，1945～1949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

No0193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局
《关于德国的政治状况》的综述（摘录）^①

（1945年11月3日）

德国苏占区里的各个政党

一、共产党

共产党是当代德国最有组织和最积极的政治力量。共产党根据柏林会议^②的精神领导着为建立一个新的民主德国而进行的斗争。共产党员在一切最迫切的问题上持有正确的和坚定的立场，如主张完全消除法西斯残余，根除纳粹主义意识形态，德国解除武装和非军事化，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等等。共产党向德国人民说出了全部真相，不管这个真相是多么的痛苦。

共产党员坚持不懈地解释说，对于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负有罪责的不仅仅是纳粹分子，也不仅仅是资产阶级，还有整个德意志民族。……

至今还有人称赞德国士兵的功勋，有人号召纪念在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有人说德国伤兵有权指望得到祖国的感谢，而共产党及其刊物则坚决地揭露所有这些人。……

① 这份文件是呈报给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的。

② 即波茨坦会议。

土地改革^①的进行从上到下激发了共产党组织的工作积极性。党的积极分子队伍成长起来。农村中要求入党的浪潮高涨。然而，并非各地的共产党员都善于在组织上巩固自己在农民中已经提高了的威望。共产党在解决土地改革问题时善于吸引其他政党站到自己一边来，并且带领他们前进。这无疑是共产党的贡献和巨大成就。然而，共产党却不善于唤起其他政党参加土地改革，而且他们也没有努力这样去做。这无疑是共产党的一个错误。

进行土地改革时发现，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还没有摆脱宗派主义的因素。他们不仅不希望吸引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土地分配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排斥他们，力求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一切事情。

共产党在组建自由工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选举参加全柏林工会代表会议代表而在各地召开的工会代表会议表明，共产党在工会中的影响显著加强。在萨克森的省代表会议上选出的工会委员会中，有 36 名共产党员和 14 名社会民主党员，在占领区代表会议上选出的 29 名代表中，有 23 名共产党员和 6 名社会民主党员。

但是在组织和团结这些工会的工作中，共产党还未能克服固有的老毛病——宗派主义。近一个时期，共产党犯了一系列组织上的错误。特别是与召开柏林工会代表会议有关的问题上，共产党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共产党未能确保得到其他反法西斯政党的支持，也没有得到盟军柏林卫戍司令部的批准，就将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各区组织。反动分子立即利用共产党组织上的失误，在一系列工会中做出延期召开代表会议的决定。……

共产党的一系列口号虽然符合柏林会议的决议，但却不能得到广泛拥护，因为纳粹主义的和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德国还是根深蒂固的。共产党员公开地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地说，德意志民族对

^① 德国苏占区于 1945 年 9 月进行了土地改革。

希特勒的战争负有责任，应该赎罪。共产党及其报刊向德国人断言，希特勒军队在被占领的国家犯下了骇人听闻的兽行和极其严重的罪行，并且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共产党员说，德国人民应该赔偿这些损失。当然，千百万德国人都不喜欢这一点。这些口号遇到了消极的，甚至公开的反。然而，共产党的这样一些口号，如坚决反对法西斯的斗争、分配地主的土地、恢复大柏林的计划等，却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热烈的同情。

纳粹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煽动反对共产党，宣称德国共产党不是德国民族的政党，而把它与苏联占领军当局等同起来。

红军官兵的违法乱纪行为至今尚未消除，也妨碍了共产党的发展。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很善于利用这类事情来达到自己党的目的。他们对工人们说：“你们打算成为共产党员吗？请看看红军在干些什么事，红军是些什么人？这就是共产党员。难道你们想成为这样的人吗？”

共产党州委会和区委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也阻碍了德共的发展。德共的严重缺点是群众工作薄弱，固步自封和宗派主义。

共产党克服了各种困难而成长起来，变得更加坚强。党在继续发展，尽管速度还不够快。至1945年10月1日止，它的队伍拥有18万人，其中有4.5万人在柏林。共产党在人数上不如社会民主党多，但在对群众的政治影响方面却超过了社会民主党。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社民党）

德国社民党是目前德国人数最多的政党。至10月1日为止，它拥有约22万党员，其中有4.2万人在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数量上的优势可以用如下的原因来解释。首先，在希特勒制度下，它的党员没有像共产党员那样受到残酷的迫害。社会民主党的干部队伍基

本上保留下来。其次,加入社会民主党比加入共产党容易得多。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在一系列问题上不符合社民党成立时发布的宣言中的原则。社民党的领导人力图把广大居民阶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曲意逢迎德国人民,讲他们听起来感到愉快的话,用来取代讲真理。特别是他们竭力为德国工人阶级恢复名誉,证明它对战争不承担责任。德国社民党中央主席奥托·格罗提渥在9月14日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非常会议上宣称:“大部分有组织的工人阶级不能被宣布为是有罪的。他们在内心里从来都没有屈服于希特勒,没有同情过战争。他们在与希特勒的斗争中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德国工人阶级在战争罪责问题上也可以像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等国的工人阶级一样高高地昂起头来。”……

为了讨好广大居民群众并迎合他们的情绪,社会民主党人企图扮演德国人“捍卫者”的角色。德国社民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的一篇文章说:“人们想要知道,或者起码是要感觉到,他们的困苦确有自己的捍卫者,这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做决议,或发号召。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只是行动。让我们公开地说,少量的面包或黄油比所有的群众大会都重要。”这篇文章被我们审查时禁止了。

可以看到诬蔑柏林会议某些决议的企图。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格罗提渥在哈拉布里施塔特的群众大会上抱怨说:“德国被夺去了一些农业区,那里以后将要住上波兰人。”

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右翼,反对拆迁企业的设备。

初期,社会民主党人,除了右翼,积极支持共产党人关于没收占地面积达100公顷以上地主的土地的建议。诚然,许多人这时有左倾过火行为,建议不要分配土地,而要集体耕作。右翼社民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土地改革。

现在,社会民主党人对待土地改革采取消极态度,而在许多情

况下则想方设法阻碍土地改革的进行。维斯马市（梅克伦堡省）的行政长官，社会民主党人布林克曼宣称：“像这样进行土地改革是不行的和有害的。可是既然俄国人要求这么做，那就不得不进行。”

社会民主党人开展强有力的活动，企图控制工会。社会民主党吸引保留下来的工会官僚机构的干部并且依靠他们。这些干部具有丰富的工会工作经验，在相当一部分工人中间享有威信。

原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领导人中最突出的代表是施利梅，他是柏林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书记。他倾向于流亡伦敦的社会民主党的前领袖，并且力图重建改良主义的工会。施利梅不久以前通过英国人收到流亡伦敦的社会民主党人一封指示信。施利梅遵循英国的目标，并希望德国只被英美军队占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里反对共产党人的斗争中得到英国人无条件的支持，这是不言而喻。

为了取得工人的信任，社会民主党人采用一些笼络人心的口号。正是1933年以前鼓吹阶级和平的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如今提出给工人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提供休假等要求。在他们的影响下，萨克森省一系列企业的工人通过了要求提高工资的决议。在工会领导机关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通过各种计谋企图安插自己的领导人。

社会民主党在最初一个时期坚定地走与共产党接近的道路。社民党首脑格罗提渥不只一次宣布希望与共产党人合作。格罗提渥的确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他真诚地与共产党人合作并且维护统一战线的政策。最近的一些事件证明，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中发生了某些动摇。

一段时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老干部集会和抱团的情况。这些老活动家们重新投入了社会民主党的怀抱，企图在党内发挥领导作用。他们反对与共产党人结成统一战线，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施加强大压力，推动他们走上分裂的道路。这些分子在一定程

度上得以动摇了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立场。社民党中央主席格罗提渥在社会民主党积极分子柏林会议上对共产党人进行了攻击。威廉·皮克发言并且宣布说，共产党人有真诚的愿望并且希望在一领域里与社会民主党人合作，这时座位上响起了呼喊声：“您本来应该早 20 年到我们这里来”。……

三、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德国基民盟）

德国基督教民主同盟成立于 1945 年 6 月底，是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和民主派的联盟。

同盟正式的政治纲领在其领导人《告德国人民书》中做了阐述。其中正式宣布了民主主义口号，谴责了希特勒主义，提出惩办战争的发动者的要求，宣布必须“忠诚地履行由于战争失败而应该承担的一切义务”等等。

基民盟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许多方面是反动的。这是德国大资产阶级的路线，力求逃避支持希特勒的责任并且为复活德国帝国主义而保存一定经济的和政治的可能性。

基督教民主同盟的首领是经验丰富的和老奸巨猾的政客安德列阿斯·赫尔梅斯博士。在魏玛共和国^①，赫尔梅斯不只一次担任过部长职务。他做过多次旅行，到过许多国家。赫尔梅斯与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有牵连。红军把赫尔梅斯从监狱中解救出来。

同盟理事会第一副主席瓦尔特·施莱贝尔博士，是个地主的儿子。1925~1932 年间，瓦尔特·施莱贝尔曾是帝国的和普鲁士的工商部长。

^① 魏玛共和国是 1919~1923 年法西斯上台之前，根据魏玛宪法建立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基督教民主同盟中央机关报《新时代报》的主编直到不以前一直是柏林大学教授艾米尔·多威法特博士。这个新出现的基督教民主分子曾经忠诚地为希特勒和法西斯制度效劳。多威法特曾是法西斯报纸学的理论家，在其著作中吹捧和颂扬戈培尔创办的肮脏的法西斯新闻。

譬如他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曾出版《报纸学》一书，他在其中写道：“对于报刊工作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领袖的国家得到了全体人民的支持，而不是极权，例如像在苏维埃俄国那样。”（第1卷第20页）

同盟用民主的词句作掩护，实际上执行沙文主义的反动政策。赫尔梅斯以公开的或隐蔽的形式反对苏联军政府，反对柏林会议的决议。他鼓吹德意志民族在战争中没有罪责的论点，宣称对战争及其后果的责任只应该由希特勒及其政府来承担，而不是整个德意志民族。

基督教民主同盟及其报纸《新时代报》千方百计地为德意志民族开脱罪责。为此目的，他们吹捧7月20日事件^①，并且竭力赞颂阴谋参加者的作用。为此目的，他们不断地提出新的和最新的发现，似乎是曾经有过为数众多的反对派反对希特勒制度。同盟的领导人企图证明，几乎整个德国在12年的过程中一直进行着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几乎每一个德国人都勇于把手放在衣袋里向希特勒做出轻蔑的姿势，宣布是“无畏的反对派和斗士”。……

四、自由民主党（自民党）

自民党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了如下一些口号：根除纳粹主义和

^① 指1944年7月20日发生的德国军人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

军国主义，惩办战争罪犯，在民主主义基础上改造社会生活，等等。然而，自民党领导人并没有坚持在正式纲领中宣布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在一系列问题上推行反民主的、对苏联军政府不友好的政策。该党反映和维护旧的职业官僚、房产主等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

自民党的首脑是瓦尔德玛尔·科希（生于1880年）……

自民党的副主席是威廉·居尔茨博士（生于1875年）。居尔茨是个亲英分子。他在新克尔恩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一句也没提到红军和俄国人，但却两次强调说英国人是德国人的朋友。他宣称：

“英国是民主发展的典范，因此应该向英国学习民主主义。”

自民党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与基督教民主同盟相一致。自民党领导人也尽量缩小德意志民族对希特勒战争的责任。……

简单谈谈柏林的报刊

柏林现在出版10种报纸：

1. 《每日评论报》——苏联军政府的机关报
2. 《柏林报》——市政厅的机关报
3. 《德国人民报》——德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4. 《人民报》——德国社民党的机关报
5. 《新时代报》——基督教民主同盟的机关报
6. 《晨报》——自民党的机关报
7. 《自由工会报》——工会的机关报
8. 《柏林人报》——英国军事当局的机关报
9. 《公共报》——美军的机关报
10. 《每日镜报》——得到美军许可而出版的私人报纸

四个反法西斯政党的报纸、市政厅和工会的报纸从苏联军政府

情报局获取德国国内和国际的消息。这几家报纸都要通过苏联书刊审查机关的审查。盟军的报纸以及所谓的私人报纸《每日镜报》则是另一种情况。它们是英美宣传的喉舌，刊载有倾向性的报道，有时对苏联、红军和苏联占领军当局进行攻击。……

《每日镜报》把美国的民主以及美国的一切都吹捧到了天上，对美国人阿谀奉承到了无耻的地步。很容易猜测到，这家报纸是用美国人的钱出版的。某些文章很像是编辑部开的收据，编辑部用自己报纸的版面做交易，表明如数收到了美国人发的薪俸。……

无线电广播空中之战

除了报刊，无线电广播也是对德国人民施加影响这一斗争的强大工具。盟国认为某些言论不便于刊登在英美军事当局出版的或者按照许可私人出版的报纸上，于是便通过电台播发。

这时各种电台之间存在着独特的劳动分工。慕尼黑、汉堡、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等地的广播电台，由英美军事当局管制，主要是从事“正面宣传”。它们大力吹捧“西方民主”的优越性，阐述盟军占领当局的各项措施。……

伦敦和华盛顿无线电通讯社专门进行反苏攻击。这些通讯社驻柏林的记者把自己的报道寄回伦敦和华盛顿，在那里用无线电播放。英国路透社和伦敦广播电台在这方面特别积极。美国的通讯社——美联社和合众社有时也攻击苏联的政策。

应该考虑到这些通讯社是私营的，形式上不服从政府的主管部门。这样一来，英美占领军当局形式上好像是与此无关，并做出一种姿态，这个或那个对我们不友好的消息似乎并非来自当局，而是来自享有无限的“新闻自由”的私营通讯社的记者。……

国际形势对柏林状况的影响

英美和法国军队进驻柏林以后，城里的政治情况变得复杂了。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就暴露出对被占领的德国的不同政策。

苏联占领当局对各民主党派和自治机构给以积极支持。盟军对于各政党的重建和自治机构的建立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我们挑选的柏林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司法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员非常不合英美占领军的心意。后者认为这一人员组成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其中多数是左翼民主分子。英美当局马上开始攻击反法西斯战士，力争从政治上可靠的，也就是右翼的和反动的德国人中间挑选自己人来取代他们。

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以及苏联与英美之间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也反映到柏林的状况中来。英美占领当局越来越努力巩固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削弱苏联对居民和市内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

英美当局对我们建立的柏林市政厅和其他自治机构的攻击，就是柏林市内这种斗争的开端。……

英美占领军当局的政治策略

……英国力求保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决定了它对德国政策的转变。英国宣传机构立刻停止了对德国民主党派公开的攻击，而选择了另一种策略。英国宣传机构千方百计地煽动和夸大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某些分歧，力图挑拨反法西斯联盟队伍的不和，尤其是竭力分裂目前已经形成的德国工人阶级的统一，竭尽全力企图使社会民主党脱离共产党，然后把社会民主党变成英国政策的工具。

英国宣传机构把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对立起来，挑拨社会

民主党人，推动他们与共产党决裂，号召他们投靠西方，并应允支持他们。……

英美广播电台大肆报道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工会机关选举问题上的分歧。报道说，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相反，坚持主张进行秘密选举，英国宣传机构强调说，共产党人依靠苏联占领当局的支持，而支持社会民主党人的则是“西方大国”的代表。

这样，英国宣传机构就把社会民主党人描绘成“以西方为靠山”的代表者，而共产党人则是红军的傀儡。

这时，英国宣传机构直截了当地宣称，社会民主党人可以成为一切敌视苏联力量的旗帜。它指望德国人对于拆迁工业企业设备的不满和红军个别官兵的违纪事实可以扩大社会民主党人的声望，使其超过共产党人。……

很明显，美国占领当局企图依靠社会民主党人与资产阶级党派的联盟，来反对左翼民主运动。

美国宣传机构现在鼓吹德国国家生活的地方分权制，把各联邦政府与全德中央政府对立起来。美国全德无线电通讯社于10月18日宣布：

“各联邦政府不能对中央政府唯命是从。”

美国人提出这种方针显然是出于担心德国未来的中央政府有可能是左派的，并且与苏联占领当局紧密合作。因此，美国人准备在自己的占领区里成立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组成的联邦政府来进行对抗。……

苏联占领军当局的政策对盟国军事当局的影响

根据柏林会议的决议以及关于在全德国范围内建立德国人的管理机构的决议，在苏联占领区建立了德国人的管理机构，这一举动

与我们在德国组织和发展政治生活方面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一样，引起了盟军报刊和电台的激烈攻击。

盟军的宣传机构想要把这些措施说成是对柏林会议决议的破坏，同时企图败坏我们所提拔的德国领导人的名声，说“他们没有担任领导和在中央政府工作所必备的素质”。

这种行为举动的原因是：德国苏占区政治生活的迅速复苏，我们对肃清国内法西斯分子的工作实行坚决果断的政策，促进了新的具有民主倾向的德国活动家的涌现。这当然不可能让英国人和美国人喜欢，他们所依靠的是老的身败名裂的“魏玛政客”和尼梅莱尔牧师^①之流的宗教活动家，此人从前曾因其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观点而臭名远扬，而现在则不断发表反民主的声明。显而易见，盟军担心国务办公厅^②以后将成为德国未来的政府的基础。

我们对德政策的成功，预示了盟国在其占领区政策的失败，这毫不奇怪。他们执行中立的政策，有时还直接支持纳粹分子，同时禁止和压制一切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这样难于取得人民的同情。

英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政策。他们公开宣布了对德“新方针”。如果谈到这一政策的本质，那么用一句俄国成语就再好不过地说明这种“新方针”了：“同样的菜汤，就是稀了一点儿”。……

① 尼梅莱尔，马尔金（1892～1984），1947～1964年担任黑森和拿骚福音派教会主教。

② 1945年7月27日在苏占区设立的德国中央行政机构。

№01939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共产党和社民党
合并情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①

（1946年2月25日）

围绕着两个工人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的问题，在整个苏占区里与统一的敌人展开了一场顽强的斗争。

柏林市在这方面显得尤为复杂，因为这里设有盟国军事当局和所有四个占领区的报刊。盟军在自己的占领区实施反对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政策。今年2月19日，统一的狂热敌人舒马赫博士^②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抵达柏林，盟军在报刊上竭力宣传他，说他是德国西部各占领区社民党的全权代表。舒马赫在抵达的第一天便决定亲自会见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罗提渥。格罗提渥同意在自己的寓所接见舒马赫，但要有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在场。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主席格罗提渥在自己的寓所里会见了舒马赫（他由一名英国军官陪同），有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在场，那一天格罗提渥拒绝就合并问题进行谈话，建议舒马赫在今年2月23日到社民党中央理事会去谈这个问题。

今年2月20日，舒马赫在英国军官和秘书陪同下来到社民党中央理事会，仿佛是用来参观中央理事会的房间。实际上，这一天在

① 档案原件上有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局顾问Г. 科罗特凯维奇1946年3月26日的标示：“文件已被采用，以此为基础制定的报告已于1946年3月5日呈报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

② 舒马赫，库尔特（1895~1952），1946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主席。

中央理事会的房间里正在举行社民党柏林市委的会议，舒马赫决定出席这次会议。然而，与会者们接待舒马赫时非常拘谨。

今年2月23日，社民党柏林市委扩大会议（与会的有市委理事会全体成员和柏林20个区的社民党区委书记）在统一的反对者的提议下，企图通过一项决议，对社民党中央理事会、社民党市委，特别是对格罗提渥表示不信任。

然而，经过热烈辩论之后，右翼社民党人收回了不信任决议案。格罗提渥在这次全会上决定在德共和德国社民党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之前单独召开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市代表会议。不排除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将通过敌对决议的危险性，统一的敌人——舒马赫派企图利用这次会议来实现自己的要求，反对合并。

柏林许多社民党区委书记和个别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继续反对合并。

统一的右翼敌人在与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中，还依靠社民党中央理事会的个别成员——合并的反对者的支持以及柏林个别的居民点，利用他们做出反对德共与德国社民党合并的决议，以及对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表示不信任的决议。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就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和反对统一的敌人的斗争问题加强了在企业 and 两个工人党基层组织以及柏林市工会组织中的工作。

工人报刊以及《每日评论报》和《夜间快报》等报纸刊登了宣传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文章，以及揭露合并的敌人（舒马赫等）的材料。

德国社民党中央理事会主席奥托·格罗提渥目前在合并的问题上立场坚定，为反对右派，其中包括反对舒马赫，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今年2月3日，格罗提渥给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报》撰写了文章，反对舒马赫的反动立场。

结 论

在柏林市，反对德共与德国社民党合并的人依靠盟国军事当局的支持，继续顽固地抗拒两个工人政党的合并。

统一的敌人企图在即将实现的德共与德国社民党的合并中制造分裂。一旦两个工人政党在组织上合并，他们便企图单独建立一个德国社民党组织（右翼社民党人在柏林市已经准备好出版自己的报纸，将在该市一个盟军占领区出版）。

虽然右派顽固地反抗，最近几天，在柏林的一些区里，可以见到在争取合并的运动问题上情况有某种好转，建立了4个区的和12个基层的筹委会。

坚定不移地继续实行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的政策，其中特别是格罗提渥提出的在采取有组织的措施反对合并的敌人之前，先在苏占区实行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才能指望在柏林实现组织上的合并。

№01940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关于柏林各区筹备
两党合并情况给巴兰诺夫的报告^①

(1946年3月14日)

致巴兰诺夫同志^②

潘科夫（柏林的苏占区）

社民党的区领导成员中合并的反对者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该区领导中的主要人物都是统一的反对者（施密特、巴尔特尔曼、阿姆贝格尔）。大多数分区的社民党组织中存在着嚣张的舒马赫派分子（克留格尔、林斯凯、达乌等人）。社会民主党区组织成员有80%处在右派的影响之下。最近一个时期，右派在破坏合并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普林茨劳贝格（柏林的苏占区）

统一的反对者在这个区继续顽固地进行破坏合并的工作。在区委会和大多数基层社会民主党组织中，右派窃取了领导职务。社民

① 档案原件附有说明：“该资料已被采用。根据该资料编写的情况报告已于3月25日呈交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日丹诺夫。”

② 巴兰诺夫，Л. С.（1909~?），1944~1946年担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对外政策部副部长。

党区委第一书记留第格尔是狂热的合并反对者。为参加今年3月16日召开的社民党区代表会议，右派得以选出这样一些代表，其中大多数人反对合并。这次会议上将就一些基本问题做报告，他们安排了右派发言。

米特（柏林的苏占区）

合并的筹备工作在这个区进行得很不好。合并的反对者活动猖狂而且手法高明，而合并的拥护者则很消极并且孤立无援。社民党的区领导人麦维斯和福斯对党的合并进行凶猛的抗拒。他们抗拒建立区筹委会，在本区内召开了五次社民党地段会议。这些会议没有获得卫戍司令部的批准。舒马赫派分子出席了这些会议。该区德共的领导极其软弱。德共区委书记冯威尔声称，只要麦维斯继续担任社民党的领导人，两个工人政党的合并就是不可能的。

魏森济（柏林的苏占区）

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工作在该区极其混乱。无论是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人员还是共产党员，对于合并工作的状况都没有应有的认识。柏林宣传处也不了解该区这方面的情况。该区直到最近还没成立合并筹委会。工作上的这种薄弱被右派所利用。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工作。他们得以把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一些地段，选举出的参加区代表会议的代表是有利于右派的。个别地段的代表多数是统一的反对者。党纲和党章的讨论在社会民主党组织里还没有开始。召开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联席会议的工作做出没有付诸实施。该区德共与社民党的第一次大型会议计划在今年3月16日召开。

利希腾贝格（柏林的苏占区）

合并工作在这个区也很混乱。德共区委和社民党中统一的拥护者直至今年3月10日才进行全体党员投票的准备工作。合并的反对者利用这个机会广泛鼓吹柏林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3月1日的决定。他们向该区的各个组织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在社民党会议之前拼凑成一些团伙，在统一的拥护者发言时进行捣乱。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右派准备进行非法的全党投票：德共区委的工作人员对社民党党务人员研究得不够；尚未召开区两党联席会议；没有建立统一的筹委会。

特列波夫、科佩尼克、弗里德里希斯海因 （柏林的苏占区）

这些区合并的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好。在特列波夫，社民党区委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以前反对合并的区委领导人伊凯特和克尔斯腾在内）以及社民党许多地段小组的领导人（马特恩、巴斯基等）坚持主张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积极参加合并准备的宣传工作，社民党科佩尼克区委四名领导人中间有三名是合并的积极拥护者。这个区召开了社会民主党党务人员代表会议。代表会议选出16名参加社民党市代表会议的代表，其中大多数是统一的拥护者。3月10日，奥贝舍涅瓦尔德区召开了德共与社民党党员联席会议。在这次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赞成两个工人政党合并，谴责了舒马赫的立场，向柏林市社民党和德共全体党员发出关于合并的号召。3月11日，区筹委会召开会议制订实行合并的措施。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在社会民主党党员中间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

下面汇报我们所得到的柏林个别区社民党组织就两党合并问题非法举行的党员投票的材料：

潘科夫（柏林的苏占区）。在第三分区有107名社民党党员参加，其中36人投票赞成立即合并，50人赞成全党投票决定，17人主张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决定，4人反对合并。参加第三分区投票的还有市政厅财政局的社会民主党小组，有100名社民党党员参加，其中有60人表示拥护合并，40人反对合并。在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有3个地段进行了党员投票。在第五地段，表示赞成合并的有300人，反对的有6人。在第六地段，130人表示赞成合并，2人反对。在第十一地段，85人表示赞成合并，15人反对。在普林茨劳贝格区第六十一段，19人表示赞成合并，15人反对。在第六十二段，108人表示赞成合并，180人反对，12人弃权。

3月10日，在莱尼肯多尔夫区（柏林的法国占领区）组织了德共与社民党的群众大会。格罗提渥和皮克在会上讲了话。参加会的达7000人。格罗提渥和皮克的讲话变成了主张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的强大示威。会上通过决议，欢迎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社民党区委书记、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诺伊曼^①在这次会上也讲了话，但并不成功。诺伊曼的讲话常被打断。

我们的措施

宣传厅和柏林宣传处的工作人员继续在柏林的苏占区里从事两个工人政党合并的工作。未经卫戍司令部批准而进行的党员投票均被我们废止。在普林茨劳贝格、潘科夫、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的个别组织中禁止了未经卫戍司令部批准的会议和代表会议。社民党区

^① 弗兰茨·诺伊曼，1947~1949年担任柏林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

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凡是当选代表多数为统一的反对者的，一般都被宣布作废。我们协助组建筹委会，对已经建立的合并筹委会协助其开展工作。在柏林的各个苏占区，正在进行准备工作，拟于3月15日召开全柏林工业企业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全市大会。正在全市所有的社会民主党组织中统计统一的拥护者，准备召集他们开会。正在采取措施筹备和召开德共和社民党党员联席会议，讨论统一社会党的党纲和党章草案。

请让秋尔潘诺夫同志了解本电报的内容。

№01979

希金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 给亚历山德罗夫的报告

(1946年3月30日)

致格·费·亚历山德罗夫同志^①

根据政府1945年10月5日的决定，在苏联军政府编制之内设立了宣传厅。

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通过对苏驻德军政府的工作检查，查明了以下几点：

1. 宣传厅的设立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苏联驻德军政府现在有宣传厅作为自己坚强的政治机关，可以依靠它来控制和指导德国苏占区的社会政治生活。

2.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里，宣传厅正确地履行了对各党派和社会团体在德国苏占区居民中间进行的民主的反法西斯宣传的领导；组织了对德文报刊、无线电广播和影剧院的监督与审查；通过报刊、广播和电影在德国居民中开展了宣传苏联的工作。

3. 宣传厅及其地方机构在贯彻德国民主改革的基本措施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在实行土地改革、学校和司法改革以及肃清自治机关中的法西斯分子的过程中；在建立和巩固四个反法西斯政党的联盟和为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政党而创造先决条件的过程中；在组建工会和开展其活动的过程中；在组建反法西斯青年团的过程中。

^① 亚历山德罗夫，格·费·（1908～1961），时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

现在，苏联占领区的民主力量的阵地已大大巩固，在民主建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群众团体，首先是德国共产党。

彻底贯彻苏联军政府的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生活的迅速正常化，居民的安定及其广泛参与经济恢复工作。

苏联占领区相当一部分劳动者开始对苏联在德国奉行的政策产生好感。

苏联占领区实施的深刻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及民主力量的成长，也对德国各盟军占领区的政治形势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苏联的以及受苏联军政府监督的德国报刊，能渗透到西部各占领区，而柏林广播电台也受我们的领导和监督，在全德国都享有越来越大的声誉。

与此同时，检查也暴露了宣传厅及其地方机构工作中的缺点。

1. 宣传厅没有充分重视依靠反法西斯团体的力量在德国中间阶层的居民——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中间开展政治工作。

2. 青年和妇女的广大阶层，虽然近来积极性大大提高，但仍然停留在政治影响之外。

3. 宣传厅及其地方机构没有使自己的监督覆盖许多对群众有思想影响的渠道，特别是教会的活动、各党派尤其是基督教民主同盟的口头宣传以及民众夜大学的工作。

4. 通过报刊、广播、电影和其他手段宣传苏联的工作，还没有广泛地开展起来，而且进行得不够巧妙和通俗易懂。至今没有组织用德文出版苏联文学作品。在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完全没有安排介绍苏联的讲座和报告会。

5. 宣传厅最薄弱的地方是其基层环节——区卫戍司令部的宣传督察员。这些督察员多数没有政治工作经验，不能很好地分析情况，往往在工作中出现严重的失误和错误。

6. 在苏联军政府驻基层军代表的管辖区里，也就是在那些应该直接做广大居民群众的工作的地方，却没有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监督和领导。

7.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有组织过系统的反宣传。可是英美和一部分法国宣传机关在苏占区进行反宣传的积极性却大大增长。

各盟军军政府的机关采取积极的措施，不仅不允许民主思想和苏联的影响渗透到西部各占领区去，而且削弱苏联在柏林的影响，甚至使自己的政治影响覆盖苏联占领区的德国居民。

盟军尤其加强了在柏林的活动，在那里设立各种专门的宣传中心：有美利坚合众国的情报局，其首脑是国防部心理战处前主任迈克-克留尔将军，有英国的情报局，其首脑是有经验的军事外交家比肖普将军和特莱德-沃尔将军；盟军在柏林设立了广播电台，进行大规模的出版活动，组织为数众多的讲座；广泛地提倡学习英语，这成了在德国人中间进行亲英宣传的重要手段。

在柏林根据美国许可出版的私人德文报纸《每日镜报》，得到广泛流传，成了吸引反动分子的中心。

考虑到业已形成的局面，苏联驻德军政府面临的政治任务不断增加，为了全力加强我们对德国居民的政治影响，抵制英美对他们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 由于宣传厅实际上成了苏联军政府监督德国苏联占领区整个政治生活的机构，便产生了迫切的必要性——把宣传厅变成“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监督厅”。

2. 为了完成日益增加的任务，在政治监督厅的编制里增设：组织指导处、青年工作处、自治机关工作科、农民工作科、知识分子工作科和教会团体监督科。

3. 由于不久以前在盟军联合监督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宣传委员会，在政治监督厅的编制里专门设立盟军宣传协调处是适宜的。

4. 苏联军政府的情报局应隶属于宣传厅，成为后者的一个机构，以后可命名为：“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监督厅情报局”。

5. 为了加强政治监督的基层环节，在每个区卫戍司令部增加两个人员编制：主管政治监督的卫戍副司令和宣传督察员，取代现有的高级宣传督察员一职。

宣传厅机构和编制中的上述变更，要求扩大编制，增加 500 名军职人员。武装力量总政治部现在有能力提供政治工作人员，以便把编制配备齐全。

6. 为了在居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而更多和更好地使用德国反法西斯干部，有必要：

(1) 成立在苏联监督下进行工作的德国通讯社，该通讯社的职能是为德文报刊和广播电台提供国际和国内消息。

(2) 准许成立德国股份电影公司，其任务是拍摄纪录片，将来也可拍摄故事片。

(3) 在实践中可以更广泛地发给德国出版社许可证，但要保证对后者工作的相应监督。

7. 鉴于我们有把德国战俘中的反法西斯人员派回德国进行工作的有益经验，有必要从在苏联经过反法西斯学校和培训班培训的德国战俘中增选 2000 人，把他们派回德国，由苏联驻德军政府政治监督厅掌管，在自治机关和民主团体的宣传工作中使用。

8. 为了加强在德国宣传苏联的工作：

(1) 允许政治监督厅为德国居民出版一种大众化的介绍苏联的画报，以及苏联报刊文章汇编和苏联文学优秀作品的德文译本。可把这一任务交给《每日评论报》出版社，相应地加强出版社和编辑部的机构。

(2) 在柏林建立苏联文化宫，设立讲演厅、图书阅览室和电影放映厅，文化宫由苏联军政府政治监督厅管辖。文化宫的任务是普

及宣传苏联经济、政治 - 文化成就，宣传苏联对外政策，推动德国人学习俄文。

(3) 从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系统向德国派遣艺术团体以及苏联科学和艺术活动家，组织介绍苏联的报告会和讲座。

(4) 电影部组织为国外，特别是为德国拍摄介绍苏联的纪录影片。

以上报告是否得当，请您决定。

希 金^①

1946年3月30日

^① 希金，约瑟夫·瓦西里耶维奇（1906～1973），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总政治部主任。

№01941

别斯帕洛夫关于改进苏联对德国居民 无线电广播的措施给莫洛托夫的报告

(1946年4月6日)

致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

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同志

目前英美在德国的宣传机构已具有极其巨大的规模。英国人和美国人在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广泛地广播电台网，此外还着手在伦敦播放庞大的德语广播节目。如果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国内的报刊和广播宣传中，在形式上还能维持在德国人面前不与自己的盟国争吵的原则，以极其隐蔽的形式进行反苏宣传，那么伦敦的德语广播宣传则带有公开反苏的性质。

我们不能随时在德国国内还击这种宣传，因为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反对盟国的评论和无线电广播也会立刻引起英美方面的外交行动。美国人已经提出了全面监督在苏联军政府领导下工作的柏林广播电台的问题。这样，我们在德国国内一定程度上被束缚住了手脚，因为我们也应该在形式上遵守在德国人面前不与盟国争吵的原则，我们不能对英美的宣传给以足够的还击，特别是没有可能通过柏林广播电台组织我们的评论员文章，不能以应有的和正确的观点阐释英美的真实政策。莫斯科的德语广播德国人接收不到，这是由于不清晰，再加上德国人不准拥有三灯收音机。

事实上我们没有进行对德广播宣传。因此，完全有必要迅速地在苏联领土距德国较近的地方，最好是在柯尼斯堡或利沃夫建立无

线广播电台，在这个中心设置一套小型设备，专门用于对德广播宣传。

请您就这个问题给邮电部、无线电委员会和苏联驻德军政府军事委员会下达指示。

驻德情报局局长 Г. 别斯帕洛夫^①

1946年4月6日

^① 别斯帕洛夫，Г. М. (1904~?)，1945年起担任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局局长。

№01980

菲利波夫关于改革苏联驻德宣传工作

给洛佐夫斯基的报告

(1946年5月25日)

致外交部副部长

索·阿·洛佐夫斯基同志^①

近两三个月以来，盟国大大加强了在德国的宣传。这种宣传带有向我们在德国的阵地发动进攻的性质。盟国的宣传机构积极干预德国生活中的一切政治问题，竭力从反对我们的利益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盟国宣传的目的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阻碍苏联驻德军政府的一切民主措施。从不利于苏联的方面来描绘这些措施。破坏苏联在德国人民心中的威望。

2. 在德国人民中树立盟国的威望。把盟国描绘成德国的恩人。积极干预由监督委员会和柏林卫戍司令部解决的盟国之间的共同问题。动员德国一切反民主分子支持盟军的措施。

3. 向真正的民主分子进攻。恫吓共产党人和左派社会民主党人。

4. 为盟国宣传服务的有：设在西部（汉堡、卢森堡等地）的众多广播电台，以及伦敦广播电台；大量的德文报纸（仅美占区就出版近40种报纸）；机构庞大的通讯社（德国的德通社，美国的美联社、合众社），它们发的消息渗透到德国所有的编辑部，其中也

^① 洛佐夫斯基，原名索罗门·阿布拉莫维奇·德里佐（1878～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包括受我们监督的报纸。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盟国在德国的宣传工作，在每个占领区里都由一个中心来组织和指挥：美国人的是情报服务局（由迈克-克留尔将军领导），英国人的是情报处（由比肖普将军领导），法国人的是情报服务部（由霍菲特准将领导）。

有理由推测，这三个宣传中心之间相互协调自己的工作。

根据上述的一切，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我们在德国宣传工作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缺点：我们的宣传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对盟国的攻击进行反击，但即使是这项工作也很薄弱，进行得很笨拙，经常落后。我们对盟军的宣传缺乏战斗精神，缺乏主动性。我们没有反宣传。

我们的宣传几乎不能协助苏联军政府机关解决与盟军相关的问题，诸如在德国规定工业生产水平，而盟军的宣传却利用英国人提高工业水平的要求，把它说成是英国人的“善意”的标志。在战争赔款和其他一些盟国共同的问题上，也可以这么说，我们的宣传对这些问题避而不谈。

我们的宣传不去积极维护德国的民主和民主分子。错误地担心“得罪盟军”，导致美国人在柏林更加蛮横无理，公开动用警察的力量袭击共产党和左派社民党的组织，逮捕民主人士，保护反动派。对美国人的这些行径没有给以真正的还击。

我们在德国宣传工作薄弱的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宣传中心。事实上谁都没有实行领导。只是偶尔有这个或那个编辑部根据政治顾问的指示发表一篇经过深思熟虑的文章。没有一个能够指挥反宣传工作的中心，它不仅应该给德国报纸，而且也应该给苏联报纸撰写文章。迄今为止，我们在德国的宣传机构体系的形式如下：

一、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秋尔潘诺夫上校）。

宣传厅想要抓什么就抓什么（党派、工会、妇女和青年团体等等），只是不抓真正意义上的宣传。虽然在这个宣传厅里设有报刊处，可是这个处却不给宣传部门制定方针。只是偶尔给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下达几点指示。

宣传厅与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的联系只是通过自己的书刊审查人员，众所周知，他们另有任务，并不从事宣传工作。

二、苏联军政府情报局（别斯帕洛夫同志）。

情报局向德国报刊和广播电台提供国际的和德国国内生活以及有关苏联的消息。情报局的全部工作具有宣传的性质，但是这里明显地缺少目的性，缺少宣传工作的计划性。情报局和宣传厅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明确，后者妄图领导情报局，但结果只是妨碍它的工作。情报局力求在国际问题上由政治顾问为其制定行动方针（它确是这样做的），而在德国国内的问题上，则力求由宣传厅领导并从事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提供基本材料）。

三、还有第三家为苏联报刊提供消息的苏联机构，这就是塔斯社。塔斯社柏林分社至今仍然勉强维持，五名塔斯社记者驻在纽伦堡，每天工作两个小时，而在柏林这个德国一切政治事件的中心，只有一个经验不足的记者工作。因此，德国许许多多的政治事件在莫斯科报刊上得不到反映。

迫切地要求根本地改变我们在德国的宣传工作。为此目的，必须：

一、明确地规定在德国的宣传工作由谁领导。

二、用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来加强宣传机构。

三、改革宣传机构体系可按照以下途径进行：

1. 在苏联军政府情报局属下成立报刊广播宣传和反宣传处。处长由情报局副局长兼任。担任处长的人应该熟悉德国并在宣传问题上具有丰富的经验。最合适的人选是科诺年科上校（现任苏联情

报局协调处处长)。必须为科诺年科同志配备5~6个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和宣传人员。

2. 在对外政策问题和涉及盟军在德国的政策问题上,宣传和反宣传处接受政治顾问的指令。

3. 宣传德国国内问题(党派、工会、选举等等)的政治路线,在宣传厅领导之下并且按照其指示由该处制定。

4. 宣传和反宣传处的工作内容应该是:

(1) 编制对德报刊和广播宣传一至二周的工作计划。

(2) 为德国报刊和电台准备材料(评论文章、反驳文章、制造舆论的材料、对盟国攻击的答复)。

(3) 为莫斯科报刊和电台准备文章,协调塔斯社驻地方记者的工作。

改革我们在德国的宣传工作必须马上动手。毫无疑问,盟国将进一步加强在宣传领域里对我们的进攻,这里指的是我们的占领区和柏林将要举行地方管理机关的选举(1946年8~9月)。一些全德性的问题(消除各占领区、占领期限、领土问题、战争赔款等等)也将尖锐地提出来。

我们的宣传在这项工作中应该成为苏联驻德军政府的支柱。

驻德政治顾问政治处副处长 И. 菲利波夫^①

1946年5月25日

^① И. Ф. 菲利波夫, 时任苏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政治处副处长, 宣传和书刊审查处处长。

№01942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 理事会全会给苏斯洛夫^①的报告（摘录）

（1946年6月25日）

……今年6月19~20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举行了党的理事会全会。

会议议程中有下列问题：

1. 确认了党的理事会上一次全会的记录。
2. 关于中央书记处上个月的工作（报告人威·皮克）。
3. 关于市政选举（报告人奥托·格罗提渥）。
4. 关于德国统一（报告人费希纳）。
5. 英国占领区的状况和即将到来的选举（报告人莱曼）。
6. 在萨克森专区举行全民投票的进程（报告人B. 柯依）。
7. 妇女运动的组织问题（报告人凯特·凯恩）。
8. 青年工作问题（报告人霍内凯尔）。
9. 其他。

对于党的理事会全会的工作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

1. 党内在德国国家统一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坚决否定了联邦制和分离主义。这种立场以及向德国其他各党派提出谈判的建议，将起到积极作用，将为党开辟更广阔的前景，如格罗提渥所完全恰当地形容的，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最大的成功”。

^① 苏斯洛夫，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1902~1982），1946年5月起在联共（布）中央工作，历任宣传鼓动部部长、中央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

2. 党内就苏占区将要举行的选举可能出现的结果存在着担心。该党认为与此相关的最大困难在于：其他各党派公开提出重新审查东部边界问题，而统一社会党不得不采取策略排除一切在这个问题上要求重新审查波茨坦决议的建议，迄今未能解决的与关押在苏联的战俘通信问题以及仍在继续的个别军人违法乱纪行为都会对统一社会党的地位产生不良影响。

3. 党的理事会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和来自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反对，通过了关于改变在西部创建统一社会党的斗争策略的决定，这是完全正确的。目前在西部缺少德共与社民党合并的现实条件，如果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同意统一社会党在西部地区开展活动，其目的首先是通过创建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来贬低统一的思想，其次，要求在苏占区承认社民党作为补偿。考虑到这些情况，全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开展争取德共与社民党在一切实际问题上合作的运动，而目前，即使在个别有条件的地区也不建立统一社会党的组织。

4. 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对允许社民党在苏占区活动的问题持否定立场。他们认为既然社会民主党党员群众已经一致决定与德共合并，那么社民党便不复存在了，它的重建没有任何根据，任何企图重建的目的都是分裂苏占区的工人阶级。

5. 党的理事会成员中有些人（留贝、托尼·沃尔格穆特等）持反苏立场，通过其反对派的发言力图在党的理事会中引起混乱和制造摩擦。

6. 党的理事会缺少应有的警惕性。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甚至就最重要的原则问题与苏联军政府进行的谈话，有时在相当范围内被机关工作人员得知。这就要求苏联军政府工作人员必须保持特殊的警觉，并且对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成员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

7. 思想工作工作在党内开展得比较薄弱。只是在党的理事会

做出决定一个月之后才着手这项工作。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只出版了一本党内学习用的材料汇编，其中只讲到一个题目。理论文章在报纸或杂志中非常少见。

8. 英美占领当局猖狂攻击统一社会党理事会。英占区拒绝批准统一社会党理事会成员赴柏林，美国当局要求共产党员申请退出党的理事会（导致三名理事会成员施佩林格、菲舍尔和布希曼声明退出，但在理事会全会上没有通过），巴伐利亚共产党的四名领导人由于非法越过占领区分界线而在今年3月份受到指控，等等，这些事实都足以证明英美当局反对统一社会党的理事会。

与此同时，开始了破坏统一社会党个别领导人的声誉的活动。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豪泽（格罗斯海森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全会第二天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西占区的报刊就乌布利希1940年在瑞士杂志《人世间》发表的一篇文章对他大肆攻击，保尔·莱贝主编的柏林《电讯报》（6月20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再次挑起这个问题，^① 乌布利希必须对这类攻击做出回答。

统一社会党的理事会例行的全会拟于7月16~17日召开。

全会之后，通过与中央书记处成员乌布利希举行座谈，向他指出统一社会党工作中存在的一系列缺点，他一一承认，并拟定了具体的克服措施。

在宣传厅系统内给各省的宣传处下达了采取一系列措施的指示，以保证进一步开展党的活动，特别是在党员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和提高警惕性方面。

^① 乌布利希根据共产国际当时的立场，于1940年2月9日发表文章，批评了英国的政策，高度评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和平的保证。1946年8月9日《电讯报》刊登了乌布利希答复保尔·莱贝的声明，声明承认自己的批评已经过时，特别是在建立了反希特勒同盟之后。

No 01943

萨波日尼科夫关于基督教民主同盟
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6年7月2日)

……6月16~19日，在柏林举行了基民盟代表大会。大约有2000人出席大会。与会者中间有来自苏占区各省和专区的代表，大约有80名德国西部占领区的来宾。

基民盟的第一主席雅可布·凯塞发表了长篇讲话《德国和基民盟》，他发挥了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即“阶级和平和社会改革”的思想。凯塞宣布自由民主党是个过时的政党，批评舒马赫采用不正派的方式反对基民盟。凯塞没有公开地反对统一社会党，然而声称，基督教社会主义否定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继凯塞之后发言的是巴伐利亚（美国占领区）督基教民主同盟主席缪勒尔，他宣称，将来“全德国将会感谢在柏林和苏占区所做的工作”。缪勒尔接着谈了基督教民主同盟在巴伐利亚选举中取得的成功。

基民盟第二主席莱默尔在报告《基民盟的道路》中强调了朱可夫元帅第二号命令^①的历史意义，这项命令准许在苏占区内组织政治党派。他宣布：“基民盟的思想产生在苏占区，传播到全德国。”莱默尔反对把德国变成自治体制的国家的计划。他还要求继续根除法西斯意识形态。莱默尔接着强调，“基民盟欢迎土地改革，

^① 1945年6月10日发布的苏驻德军政府总司令第二号命令，允许成立反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并开展活动。

认为这一历史举动保证了民主制度的稳定”。

对所有的报告都进行了讨论，讨论时向盟国军事当局提出要求：消除各占领区的界线，东部各州、鲁尔区和萨尔州还保留为统一德国的组成部分，遣返战俘，停止从波兰移民。

由于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人员事先做了工作，右翼反动派——英美代理人未能对代表大会的进程产生影响。

总结代表大会的工作，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 代表大会具有相对进步的性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原理事会成员重新当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处在苏联军政府政治机关的影响之下；

(2) 代表大会称赞了业已进行的土地改革，对萨克森的全民投票给以好评；

(3) 代表大会防止片面依赖西方，强调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的重要性。

2. 代表大会实际上具有全德性质，从而有可能把苏联军政府的影响扩展到西占区的基民盟。

3. 代表大会表明，基民盟中央领导中反动分子已经基本清除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在基层组织里还在起作用。

以上汇报供您了解情况。

总政治部第七局副局长 Б. 萨波日尼科夫

№01944

秋尔潘诺夫关于萨克森专区全民投票
结果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9日）

……1946年6月30日，萨克森专区就苏联军政府将其以前扣押的战犯和纳粹罪犯的工业企业^① 移交给德国自治机关问题举行全民投票。

享有选举权的人总数为3676441人，其中有3459658人参加了投票（占94.1%）。投赞成票的有2683401人（77.7%），投反对票的有561000人，占参加投票总人数的16.5%。被认为是无效的票数为204657张，即5.8%。无效票中有一半以上是空白票，或填写不正确。这组无效票中有一些票上写有各种各样从亲苏的到公开法西斯的字句……

结论：

1. 全民投票的结果良好——这首先是统一社会党的胜利，并且证明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支持它的经济—政治计划。
2. 全民投票的结果说明萨克森专区存在着强大的无产阶级核心，他们依靠苏联，用行动支持统一社会党的政策。
3. 投反对票的人占16.5%，是反动派以及受反动派指使的落后阶层，他们在情绪上敌视苏联，因为显而易见，全民投票是根据苏联军事当局的指示并在其直接支持下进行的。

^① 根据苏联军政府总司令1945年10月30日和10月31日的命令，扣押了前帝国和纳粹党的全部财产，以及所有被工厂主抛弃的企业。

4. 某一部分居民赞成把战犯和猖狂的纳粹分子的企业划归公有，并非出自内心深处的信念，而是由于害怕如果全民投票一旦失败就会强化占领制度，减少食品供应标准等等。

5. 在全民投票的准备过程中，发现相当一部分工人的阶级意识水平还很低，他们很容易受到敌人宣传的影响，接受工厂主的煽动，不愿意承认把企业移交给自治机关将会保证他们未来最好的福利。

6. 资产阶级政党——自民党和基民盟与统一社会党合作，更多的是由于不希望和害怕使自己与苏联军政府的关系恶化。此外，他们参加全民投票指望把居民中更广泛的劳动群众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换句话说，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在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中可以利用来与统一社会党进行斗争。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基民盟，由于参加全民投票无疑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

7. 更清楚地暴露出统一社会党的弱点：在其队伍里，尤其是在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存在着机会主义分子，他们有时甚至公开地反对中央领导的路线；统一社会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工作的组织活动缺少必要的灵活性，存在着前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错误。

……

№01945

秋尔潘诺夫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
理事会全会给希金的报告（摘录）^①

（1946年7月20日）

……7月16和17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在柏林举行
全会。

会议议程中有下列问题：

1. 统一社会党的市政政策（报告人费希纳）。
2. 各省委员会关于竞选准备工作的进程。^②
3. 关于英国占领区即将举行的社区选举的情况（报告人缪勒
尔）。
4. 中央书记处关于上个月所做的工作的情况（报告人格罗提
渥）。
5. 其他。……

根据全会工作的材料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结论：

1. 竞选工作在各省开展得很不力。在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中，
主要倾向是有相当的盲目乐观情绪，没有采取与社区选举相关的必
要的组织上和鼓动群众的措施，没有为反对党内右翼社会民主党
分子派别活动而进行足够彻底的和顽强的斗争。

2. 最近一个月中，党内对评价即将举行的社区选举的前景发
生了重大转变。不仅中央机关的领导成员，而且在各个环节的工作

^① 该报告于1946年8月2日由布尔采夫提交给联共（布）中央苏斯洛夫。

^② 指拟定于1946年9月至10月将在柏林苏占区进行的地方行政机构的选举。

人员中，除了柏林，主要倾向都是乐观主义和自信，认为统一社会党将获得良好的结果。

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上述情况：

(1) 党的所有领导成员都认为，莫洛托夫同志的声明^① 是统一社会党在选举运动中的强大武器；

(2) 苏联军政府的措施（提高食品供应标准，提出供应居民煤炭，妻子可凭着丈夫的存折提款的问题，释放 12 万战俘等等）提高了统一社会党的威信；

(3) 党在组织上的巩固和党内生活的普遍活跃。

3. 有一个严重问题要求在 8 月 1 日以前迅速解决，这就是在一系列社区里没有建立能够在选举中提出候选人的党组织。譬如，图林根专区现有社区总数是 2350 个，其中 852 个社区没有建立党组织，而且其中许多社区近期内还不可能建立，因此也不可能提出候选人，因为这些社区百分之百是纳粹分子的。在梅克林堡省，社区总数是 2300 个，其中存在党组织或者立足点的只有 1000~1100 个社区。

4. 在党员群众和党的工作人员中间，许多人认为把非党人士列入统一社会党的名单和单独提出妇女名单是不适宜的。还有人担心市长和地方行政长官的工作总结将会对统一社会党的地位产生不良影响。关于提出候选人的程序和对待各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问题，还没有完全明确的主张。

5. 统一社会党的报刊还没有根据竞选运动而改变自己的工作，还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有理由担心由于技术问题而拖延一部分选举用的文字材料的出版。

^① 1946 年 7 月 10 日，莫洛托夫在巴黎四国外长会议上做了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的发言，其中主要讲了三点：政治主权、领土完整、自由发展和平工业。

6. 党执行正确的政策，并且在全力巩固选举联盟方面把这一政策贯彻到底，不能允许由于竞选运动而使各反法西斯党派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7. 统一社会党柏林市委员会至今还没有在对待柏林社民党的态度方面制定出策略方针，也没有利用赫尔梅尔^①辞去社民党柏林理事会领导职务这一有利形势。

8. 上个月发生的各种事件证明了改变在西部各占领区争取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策略的正确性。放弃建立统一社会党的松散组织，采取共产党与社民党合作的政策，粉碎了盟国军事当局计划，为共产党争取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开辟了更好的前景。

^① 赫尔梅尔，卡尔（1913～？），1946年担任柏林社会民主党理事会主席。

№01946

秋尔潘诺夫关于德国苏占区工会运动 状况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7月25日）

……工会运动目前在德国苏联占领区成了该区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

工人阶级的统一和工会运动的敌人——德国和外国资本家的代理人，以及盟国军事当局的直接代表，在这些情况下寻求一切可能性来贬低苏联军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在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问题上，并且利用苏联军政府个别机关和个别工作人员所犯的错误。

为了保持和扩大苏占区在德国工会运动中所取得的地位，为了防止为我们的利益而唤起的工会会员群众的巨大积极性服务于我们敌人的目的，必须立即和最大限度地加强宣传厅从事监督工会活动的各个机关，在苏联军政府系统内消除做德国工会工作中的一切重复现象。

为此必须采取如下刻不容缓的措施：

1. 给宣传厅工会处配备业务熟练的科员（尚缺4名），在各省宣传处建立工会科并配备人员（18名），在各县宣传科任命科员（23名），为工会处提供交通工具（3辆汽车）。

2. 为了将来在苏联军政府系统对德国工会的领导中不再出现重复现象：

（1）在苏联军政府工人力量厅和苏联军政府宣传厅之间明确分工，以便把与工会的联系和对工会全部政治和实践活动的监督绝对

集中在宣传厅手中；

(2) 保留苏联军政府工人力量厅驻盟国监督委员会^①的代表处，在法律上解决工会的问题，建立这样的工作秩序，务使关于工会和生产委员会问题的一切建议草案以及涉及工会利益的建议、指令和命令草案都能同宣传厅协商。同时应该保证宣传厅有可能参加盟国监督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

拖延执行这些措施，有可能带来严重的，有时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① 盟国监督委员会是1945年6月5日根据苏美英法四国签署的《德国战败及同盟四国政府取得对德最高统治权的宣言》而成立的。监督委员会负责保证四个占领区总司令行动的协调一致性。

№01981

希金关于检查从政治上确保苏占区社区 选举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①

(1946年8月3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今年9月，德国苏联占领区将举行社区选举，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为此而检查了苏联军政府宣传厅从政治上确保这次选举而进行的工作。

检查表明，宣传厅直接参与编制了选举文件：社区选举条例、各反法西斯政党统一战线委员会告全体选民书和统一社会党的竞选纲领。根据宣传厅的指示，基督教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党对自己的竞选纲领做了重大改动，删掉了其中我们不能接受的条款和口号。

由于所进行的工作，可以认为所有这些指导性的选举文件符合我们在德国苏联占领区所奉行的政策。在选举条例和统一社会党的竞选纲领中采取的路线是确保统一社会党在进一步巩固各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联盟的基础上取得选举的胜利。然而，为了保证统一社会党在选举中获胜而开展的组织方面和群众鼓动方面的工作却极其薄弱。

统一社会党在各省和社区的竞选活动还没有真正开始。给选民

^① 档案原件上有日丹诺夫的批示：“同意希金同志及亚历山德罗夫同志的建议。8月5日。”日丹诺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1896～1948），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的宣传鼓动材料由于各种原因而迟迟不能问世。党的基层鼓动员网络刚刚开始建立。对鼓动员没有系统地进行政治工作。统一社会党的报刊没有大力宣传、普及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德国命运的讲话和统一社会党的竞选纲领。

此外，统一社会党某些省组织和许多地方的党委内部继续存在着派别斗争。相当一部分市政领导人（统一社会党党员）中间占主导地位的是落后的和缺乏党性的情绪。其中许多人不懂得党的政策，不知道党的纲领。不少市长（统一社会党的代表）在居民面前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大量的社区至今没有建立地方党组织，从而也就提不出自己的实际可行的选举名单。这一切都要求采取迅速的组织措施，以便在选举前加强统一社会党的地位。

统一社会党开展竞选活动迟缓，而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特别是基督教民主同盟，却日益积极，这种反差可能会大大影响社区选举的结果。在选举准备工作中行动迟缓，除了统一社会党的软弱之外，还因为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苏联军政府军事委员会成员博科夫同志^①和宣传厅厅长秋尔潘诺夫同志得不到认真的帮助，不能完成从政治上确保统一社会党竞选活动成功的任务。宣传厅的各个部门及其在地方上的机构，由于人员编制有限，难于完成自己的任务。

总政治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进宣传厅的工作。但是这些措施是不够的。因此，我认为必须：

1. 竞选期间向德国派遣一批党的政治领导人员和新闻工作者以协助苏联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

2. 加强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领导。从有经验的党的政治工作

^① 博科夫，费多尔·叶菲莫维奇（1904～？），1945～1947年为驻德苏军军事委员会主管政府工作的委员。

人员中间挑选合适人选充任宣传厅副厅长以及报刊处处长和文艺处处长。

3. 责成部长会议下属的编制委员会尽快审批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及其在地方的各个机构新的编制，这个新的编制是苏联军政府军事委员会提出的。

4. 在竞选期间向德国派出一个歌舞团以及一个歌剧和音乐演出队，以便向德国苏占区的居民展示苏联的艺术。

请您委派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会同总政治部就这个问题准备一份联共（布）中央的决议草案。

约·希金

1946年8月3日

№01947

苏斯洛夫关于改进战俘通信组织工作 给日丹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8月5日）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以及苏联驻德军政府（索科洛夫斯基、博科夫）都坚决地提出了关于根本改善关押在苏联的战俘与其在德国的家属通信的组织工作的问题。奥地利和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提出了这个问题。

战俘与其家属通信的组织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譬如说，今年从1月1日到7月30日，战俘寄给国外家属的信件有1493000封，其中寄往德国的有1127000封；同一时期从国外寄到苏联的有1331000封，其中寄自德国的有945000封。

这样，通信的规模没有超过战俘可能寄出的信件数量的10%—15%（如果按规定来组织通信工作，本来允许每个战俘每月可寄出一张明信片）。

战俘通信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的形成，首先是由于内务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对这件事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内务部战俘事务管理总局没有给战俘营的战俘供应专用的明信片。譬如说，关押在伊万诺沃州战俘营里的战俘由于没有明信片从今年3月末开始便没有可能给国内自己的亲属写信。一个月以前，从莫斯科向伊万诺沃发出70000张空白明信片，可是直到最近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关押在莫斯科州战俘营里的战俘最近一次领取写信用纸是在今年第一季度。第74战俘营

(高尔基州)的战俘6个月没有领到写信用纸。第241战俘营(克里木州)的多数战俘在一年的过程中每人只有可能给亲属寄一封信。

内务部没有组织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战俘的信件的审查,因此大量信件放在战俘营里无人过问。譬如说,第144战俘营(伏罗希洛夫格勒州卡季耶夫卡市)管理处从今年4月以来积压了8000多封战俘的信件,由于没有通晓匈牙利语和罗马尼亚语的工作人员,无法对这些信件进行审查。

也没有组织寄自苏联的战俘信函在广播电台播放,没有通过苏联的以及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民主主义的报刊发表。必须指出,我们的盟友在德国和奥地利则组织战俘定期与其家属通信。此外,有关战俘的报道还在广播电台播放,在报纸上刊载。

由于缺少有关在苏联关押的战俘的信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战俘家属中间出现了不满,并且被敌对分子广泛利用来破坏苏联的威信和进行反苏宣传。

德国的苏联占领区9月将举行社区选举,与此相关,战俘与其家属通信的问题就具有头等的政治意义。缺少有关战俘的信息,使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工作变得复杂起来,并导致不健康情绪的传播,从而给各种反苏言论和挑衅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整顿好关押在苏联的战俘与其家属的通信工作。

改进战俘的通信事务,会改善他们的精神状态,并有助于改善战俘家属对苏联和左派政党的态度。

在苏联的以及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倾向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战俘的信件,会大大增加报纸的发行量。在苏联广播电台播放战俘的

信件，会加强相应国家听众对苏联无线电广播的兴趣。

附上联共（布）中央就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①

^① 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1946 年 9 月 2 日通过了关于完善在苏联的战俘与家人通信工作的决议。

№01948

秋尔潘诺夫关于自民党柏林组织领导人 给希金的报告（摘录）^①

（1946年8月8日）

……以豪斯贝格为首的自民党柏林组织的领导人大多数是反动的，他们最近几个月推行这样一条路线，其目的在于反对苏联，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马克思主义，篡改波茨坦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决定。

与此相联系，自民党柏林组织的领导集团（豪斯贝格、菲劳、赖夫、歇普柯、施莱佩尔等）企图组成反对自民党中央领导人居尔茨和利奥特南的反对派，指责他们“亲俄”。

这个“反对派”在自民党埃尔富特代表大会（今年7月6~8日）上做了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反对居尔茨的路线，并且要达到更换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利奥特南）的目的。

关于自民党柏林组织一系列领导人的反对活动，宣传厅早在今年4月份就已获悉，但是考虑到即将在埃尔富特召开的自民党代表大会，决定将清除自民党柏林组织领导人中的反动分子的事推迟到自民党代表大会以后。

早在埃尔富特代表大会之前，居尔茨和利奥特南就在原则上同意停止豪斯贝格在自民党柏林组织中的领导工作。与利奥特南商定，应该选施温尼柯工程师（在此之前是豪斯贝格的副手）取代豪

^① 1946年8月14日第七局局长布尔采夫将该报告转呈联共（布）中央苏斯洛夫。

斯贝格为自民党柏林组织的主席。

施温尼柯住在潘科夫，在西门子工厂工作，据潘科夫区卫戍司令部掌握的材料，他曾经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①党员，但在登记表中隐瞒了这一点。可是考虑到他对我们友好，害怕被揭露，能执行我们所有的指示，所以（与柏林宣传处商议后）决定让他担任自民党柏林组织的主席。

7月19日和20日，自民党柏林理事会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柏林自民党个别区组织提出的对豪斯贝格的不信任案。会议开得很激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争论，还对施温尼柯进行了攻击。但是，由于反动分子在柏林理事会内部以及柏林自民党一系列区组织中拥有强大的势力，豪斯贝格仍得以留任自民党柏林理事会第一主席。不仅如此，在今年7月19日柏林理事会会议上，还把反动分子赖夫和歇普柯作为柏林代表选进了自民党中央理事会。

利奥特南与豪斯贝格进行了一次长谈，后者在这之后声明辞职。7月31日，豪斯贝格给施温尼柯发出一封信，他通知说，“根据您所知道的情况，我为了党的利益，辞去理事会的领导职务。我请求您担任党的理事会领导职务”。

按照奥特南所宣布的，施温尼柯从7月31日起担任柏林组织的领导职务。他同时宣布，任命新的人员取代菲劳主管自民党柏林理事会的管理工作。

今年8月5日，将召开柏林自民党理事会扩大会议，施温尼柯在这次会上将被选为自民党柏林理事会主席，由于柏林组织不超过两万人（它应该选一名代表参加自民党中央理事会），7月19日的

^① 德国工人党成立于1919年1月5日，1920年2月24日改名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根据1945年5月2日柏林苏联卫戍司令的命令被取缔，德国投降后又被盟国占领军统帅部所取缔。

选举将被宣布无效，将选一名代表——马尔凯维茨。

在这以后，柏林理事会中其他一些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人也将被清除。

这样，在勃兰登堡省自民党组织的反动领导人（格隆代、魏斯）被撤职（今年6月）之后，自民党柏林理事会也清除了反动分子，这是近一个时期自民党队伍清洗反动分子工作中的第二个重大举措。

№01982

苏斯洛夫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 的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6年8月22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

安·亚·日丹诺夫同志

德国的社区选举将于9月1~15日在苏联占领区举行，10月20日在大柏林举行。

对外政策部掌握的材料说明，反苏和反民主分子由于即将举行的选举而日益加紧活动，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大柏林尤为猖獗。

另一方面，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大柏林的统一社会党组织的领导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在统一社会党柏林组织的领导机构中，工作人员不了解柏林，没有威信。

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最近几个月以来大大巩固了，人数有所增加。由于不久以前进行的工会领导机构的选举，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诸如电话机工厂、鲍尔济格等柏林一些大型企业的工会组织领导的多数职位。社会民主党人在施潘道区冶金工会理事会中获得了多数职位，在米特区（柏林苏占区）的6个区工会理事会中，右翼社民党人保住了自己的主席职位。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我们对大柏林即将进行的选举结果的担心。

对外政策部还得到一些情报，说明苏联驻德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夫同志与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厅长秋尔潘诺夫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正常，影响了他们的工作。

对外政策部认为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1. 派遣由亚·谢·潘友新，M. T. 约夫邱克和 M. И. 布尔采夫组成专门委员会赴柏林，对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情况进行为期 2~3 周的检查，并且就德国苏联占领区和大柏林即将进行的与选举有关的工作给以实际帮助。^①

2. 联共（布）中央应尽快做出决定：

(1) 关于加强苏联在德国的宣传；

(2) 关于整顿和改进关押在苏联的战俘与其家属通信的事宜。

米·苏斯洛夫

1946 年 8 月 22 日

^① 1946 年 9 月 5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派出由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第一副部长潘友新、总政治部第七局局长布尔采夫和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库扎科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进行检查。委员会于 9 月 14~30 日进行了检查工作。

No01949

秋尔潘诺夫关于大柏林社民党代表大会 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8月26日）

……8月17和18日，在夏洛腾堡区（柏林的英占区）举行了“柏林社会民主党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柏林舒马赫派认为两个工人政党合并和社民党分裂之前，1945年11月柏林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是自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结论：

1. 社民党是一个具有公开反苏性质的政党，在其周围麇集着一批不满分子，并且利用了——用统一社会党主席格罗提渥的话来说——“战败者的反动情绪，这些战败者认为只差五分钟自己就是胜利者”。

2. 必须巩固统一社会党的基层组织，特别是在柏林西部各占领区和那里的企业，以便在那里消除反苏影响，并且使社民党失掉在工人群众中的立足点；在统一社会党中发扬党内民主，加强领导与群众的联系，特别是在柏林的大企业中，社民党在那里还有势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

3. 通过国际反法西斯民主运动，以及国外各工人政党的支持来巩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威信。

4. 代表大会表明，英美幕后策划者未能拼凑成以社民党为首的集团。这有可能加快社民党领导的瓦解并使其名誉扫地。

5. 必须利用社民党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攻击，从而阻碍其联合

的企图。与此同时，巩固各反法西斯政党的团结，并且揭露社民党拒绝在新德国的建设中进行合作的怠工行为。

6. 必须毫不松懈地进行主动的反对社民党的宣传，使其在将要举行的选举中成功的希望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粉碎英美在柏林反苏宣传的锋芒。彻底揭露社民党的反动本质和蛊惑人心的夸夸其谈，使其在未来修订党纲时困难重重，逼迫社民党越来越处于守势。

7. 在柏林的宣传工作中更广泛地利用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苏占区内牢固的统一以及由于这种统一而取得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成就。有效地利用苏联占领区各省的选举结果。

№01950

秋尔潘诺夫和科吉科夫^①
关于柏林选举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6年8月28日)

……柏林的选举运动是在反动势力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苏联对居民影响日益加强的尖锐斗争的环境中开始的。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整体的攻击，特别是对其在苏占区和柏林的领导人的攻击，越来越具有公开的性质。……

为了给柏林统一社会党在选举中创造必要的条件，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政治上、组织上和经济上的措施：

1. 从柏林组织上彻底改善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制订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在柏林进行选举准备工作的计划，考虑到吸收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领导人（皮克、格罗提渥、费希纳、乌布利希、凯恩、格尼弗柯、施米特等）参加。

2. 确保在市政选举的准备工作中对统一社会党市理事会执行计划的有效监督。

3. 考虑到大部分选民一方面是妇女（在总数 2500000 人中共有 1450000 人），另一方面是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在总数 2500000 人中共有 1301343 人），统一社会党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妇女工作及企业和机关工作上。

考虑到在希特勒以前时期工人政党在选举中取得主要成就的是

① 科吉科夫，А. Г. (? ~1981)，1946年4月任柏林苏占区卫戍司令。

在韦丁格、普林茨劳贝格、弗里德里希斯海因、诺凯隆、特列波夫、利希腾贝格、魏森泽、莱尼肯多尔夫等区，应把统一社会党市理事会的基本力量派往这些区，因为统一社会党在这些区里的成功就能保证在整个柏林的成功。

4. 按照如下系统采取组织措施来削弱柏林社民党的势力：

(1) 通过报刊，以及口头的、直观的和广播宣传的方式揭露社民党领导人政策的反动本质。

(2) 破坏诺伊曼、斯沃林斯基、苏尔、沃尔弗以及社民党其他领导人的声望，揭露他们政治活动的反动本质，指出其目的在于分裂德国工人运动和煽动反苏宣传。

(3) 支持社民党中不满于诺伊曼政策的普通工人群众，组织他们退出社民党并且转到统一社会党中来。在报刊上并以其他方式广泛宣传所有这些事实。

(4) 揭露社民党活动的片面性，指出其目的只是反对统一社会党的政策，而没有自己的正面纲领。

5. 搜集有损于担任市长和议员职务的资产阶级政党党员以及列入社民党、基民盟和自民党候选人名单的人员名声的材料，目的是在报刊上和选举前的会议上败坏他们的声誉。

6. 由于苏联股份制企业中存在一系列不正常的现象（拖欠工资，不给假期，总经理、军代表和生产委员会之间缺乏联系），苏联军政府工人力量厅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调节生产委员会和苏联军政府之间的关系，改善在直接受我们监督的企业工作的工人的状况。

7. 为了调配和正确使用以及分配有关柏林的所有情报资料，向情报局派出一名负责人（或行动小组），情报局应该在受我们监督的报刊中协调和确定有关柏林的题材。

8. 使《前进报》更具有党性和原则性，以期这家报纸成为统

一社会党市理事会真正的机关报，并能满足统一社会党的工作人员和党员的需求。

9. 近期内在柏林盟军卫戍司令部提出在市里建立自由德国青年团的建议。

10. 柏林广播电台与柏林市宣传处商议并制订使用柏林材料广播的计划（专题广播），应考虑到选举运动的各个不同阶段。

11. 为柏林市出版《每日评论报》和《柏林报》星期日专刊。

12. 在选举的准备阶段，利用经济手段对苏占区选民施加影响。改变蔬菜供应方式，基本上集中用来改善对工人食堂、幼儿园、学校、孤儿院、养老院、印刷厂等的供应。加强房舍的修复，特别是学校的修复和住房的维修。发给苏占区居民6万~6.5万吨煤砖，发给有哺乳婴儿的母亲3万~4万立方米木柴。

13. 确保用业务熟练的干部加强柏林宣传处。……

No01951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关于柏林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情报汇总（摘录）^①

（1946年9月14日）

……9月14日，柏林社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继续在新世界电影院（柏林的美占区）举行。

代表大会讨论了社民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提出了各区和市的候选人名单。露伊沙·施罗德对于名单中妇女很少表示不满。就斯沃林斯基当候选人一事，一些人投票反对，一部分人弃权，但他在名单中保留下来。就某些候选人问题，曾发生争论。统一社会党关于把剩余选票集中起来的呼吁淹没在呼叫声和口哨声中，并被一致否决。

诺伊曼做了题为《我们站在何处，我们想要干什么？》的政治报告。他在讲话中宣称：“我们感谢贝尔纳斯^②，他提出了德国问题。他的讲话很恳切，明确地提出了问题，使我们充满希望。德国必须在经济上实现统一。拆迁设备造成的结果是德国某些和平工业部门完全被消灭，这将给整个欧洲市场造成威胁。于是出现来一个问题：通过导致贫困和失业的途径能够获得和平吗？贫困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吗？它迫使人们铤而走险。7000万德国人不能只靠农业养活自己。……”

……根据贝尔纳斯的说法，奥德河不是德国的政治分界线。德

① 这份材料是秋尔潘诺夫提交给布尔采夫的。

② 贝尔纳斯，詹姆斯·弗朗西斯（1879~1972），时任美国杜鲁门政府国务卿。

国人徒步离开了历来属于德国的地区，而且他们在途中遭到了抢劫。我们应该注意到，红军坚决地反对这种做法。（鼓掌）奥德河的另一边在犯罪，这些罪行却被指控为关押在纽伦堡的那些人所犯下的。斯大林的话‘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①写在成千上万的标语牌上（场内笑声）。……

……苏占区的选举给统一社会党带来的是巨大的失望。^②假如两个民主党派在各个社区里分别提出各自的选举名单，那么这种失望还会更大。在城市里，工人阶层强大，而多数选票却被资产阶级政党获得，在农村有小资产阶级阶层，而多数选票却被统一社会党获得。这证明，选举没有表现出居民的意见。大量社会民主党选民没有可能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他们面临着选择：要么由于害怕而选统一社会党，要么投基民盟或自民党的票。纸牌游戏中共有四种花色，谁都没有想到打出红桃，而只出了黑桃（文字游戏：‘红桃’即‘心’，‘黑桃’暗指皮克）。（场内欢呼声）在没有选择的地方进行选举，那不是选举。我们在纳粹时代见过这种选举。……”

诺伊曼接下去重复了一系列在会议上和社民党的报刊上不只一次提出过的论点。

在柏林社民党反对统一社会党的斗争中，可怕的一点是社民党的候选人名单中列进了大量工人。但这一措施是由于社民党缺少人民所熟悉的工作人员而引起的，是一种笼络人心的手段。

我们曾经估计到，代表大会将拒绝统一社会党关于把剩余选票

^① 这句话曾写在斯大林 1942 年 2 月 23 日的命令中：“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而德国人民、德意志国家却留了下来。”

^② 这里指的是苏占区 1946 年 9 月所进行的自治机构的村社和区机关的选举结果。统一社会党在村社的选举中所占的票数是 58.5%，在区机关所占的票数是 50.3%，在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所占的票数是 47.5%。在 10 月 20 日的柏林选举中，赞成统一社会党的票数占 19.8%，而赞成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占 48.7%。

集中起来的建议，因此事先准备好了统一社会党党员中前社民党人致柏林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信。我们在竞选中特别重视这封信，近日将发表。

此外，还准备了广播讲话和报刊文章，批判诺伊曼在柏林社民党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论点。他承认，在苏占区许多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党员投了资产阶级政党的票，特别是这一点可以利用。（这是个最容易突破的地方，因为即使是在专门挑选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反苏的小资产阶级代表大会上，这一声明也没有得到完全赞同。）

№01983

秋尔潘诺夫在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检查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会议上所作
总结汇报的速记记录（摘录）

（1946年9月16日）

我想要谈以下以几个问题。首先，非常简短地谈谈我们现在开展工作的政治环境，这是由于对德国的占领和苏联军政府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其次，说明一下各个政治团体和党派的特点。第三，分析一下社区选举的结果。第四，宣传厅各处的具体工作以及我们工作中的缺点。

我们苏联占领区进行了根本上不同于其他各占领区的政治活动，其结果在今年夏初显示出来。德国人起初把四个占领区仅仅看成是地理上的划分，可是如今却完全不同了。发现各占领区以各自不同的的方式发展着，充满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内容。

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占领区里，这时不仅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农民已经完成了一次收成，然后又进行了一次播种。这样，在去年秋天看来还不是很稳定的状况，现在在农民和城市郊区的人们的意识中，已经成为可以信赖的新事物。土地改革关系到36万个家庭，或者说是150万个新型农民及其家庭——这极大地扩大了农民的中间阶层。

其次，从今年夏天6月份开始，而后来根据命令，在其他各省进行了把战犯的工业企业划归国有的工作，这实际上意味着几乎是所有的大型工业企业都转到了自治机构手中。

这是第二个重大打击，是目前占领区实现民主化的第二个重大的经济前提条件。谈到这一点时应该指出，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区进行第一项改革时，甚至在把战犯的工业企业划归国有时，都没有遇到坚决的反抗。

在萨克森专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发表了告人民书，号召他们投票赞成实行国有化，这不免有些反常。当然，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他们能够这样做的基本原因，是这个问题从政治的角度提得非常尖锐——德国人民惟有从政治上与战犯划清界线，才能证明自己是区别于战犯的。由于这样提出问题，就必须投票赞成把企业归还给自治机构，而不是拥护把企业重新还给战犯，这一点不仅对于居住在中心地区，以及居住在像格拉豪这样一些小镇的工人来说，而且对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

因此，我们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像莱比锡、德累斯顿等大城市里，得到的无效票的百分比是很微不足道的。

这两项重大措施表明，苏联占领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截然不同于西部占领区。因此，有人开始从本质上谈论把两个占领区分为东占区和西占区，这并不是偶然的。出现了把两个占领区合并的思想，要求消除经济区域划分的压力也有所加强。

具有重大经济或政治意义的其他的措施之一是彻底清理国家机关，这项工作一直在继续，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机构，尽管也许还不完善，带有各种官僚主义的异常现象和亲西方倾向，但这毕竟是新型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市政厅和中央理事会，但是，还不能说这些机构完全是我们的。可以说，我们没有对它们实行很好的领导，其证明就是：苏驻德军政府所有的中央管理机构都设在柏林的米特区，而我们建立统一社会党的工作恰恰是在这里遭到了失败。这表明，一批官吏还远远没有被我们所征服，正如列宁主义原

理中指出的，旧的专家有可能为反对我们而工作。

在原省级管理机关中大约有 35%，区级大约有 60% 的人参加了新的国家机关，他们的职务是靠着我们获得的，因此，他们拥护这个新政权。一般说来，过去的官吏和职员保持了他们原来的职务，在我们的占领区里他们多数是统一社会党党员。

这是第三个影响到整个政治局势的政治前提。

一系列激进的改革并没有超出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的范围，但却严重地削弱了反动势力的影响。甚至像政教分离这样的改革，虽然还没有完全实现，但在苏联占领区里毕竟是一个原则——学校脱离了教会，学校里只是自愿讲授神学课，除了柏林，这项原则已经确立，并且在今年得到了巩固。

一系列其他措施与改善工人状况有关，现在工人阶级和城市中的政治情绪有了某些好转。事情是这样的：拆迁企业设备这件事，直到最近以前在这里还起着消极的作用，这在统一社会党合并时期表现得特别强烈。

在稳定工资和与黑市斗争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受到统一社会党的极大重视，并显示出这项工作的意义，而这一事实本身就给工人队伍带来了安定。必须对工人供应充足的食物。今年夏秋两季，我们改善了对居民的供应。这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提高对统一社会党的政治同情，有助于提高统一社会党所采取的措施的声誉。……

大量工人，特别是一些小型工业企业、小城镇工业企业和纺织工业企业的工人，谈起德国各阶级状况、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时，表现得极为谨慎。这一点，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从一开始，即早在去年 10 月份就知道，必须进行选举，必须为民主分子获胜创造条件。我记得，早在去年 10 月就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像两党合并的问题。11 月，我们向

军事委员会提交报告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能实现两个工人政党政治上的合并，那末在选举中我们就要失败。这是一份最重要的文件，当时还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寄给了约·维·斯大林一份，文件指出合并的前提条件是对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都做认真的工作。但是，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开展这项工作时却有某些片面性。直到5月份，我们只有一种观念，就是两党合并，而对于党内建设和组织巩固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这都是由于这个基本观念造成的。

我们今天在各个党派中，首先是在统一社会党中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应该轻视我们在柏林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情况是，合并在我们苏联占领区已经具备了很多政治条件，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看到了这一点，从工会来看，也表现出对统一的某种倾向。但是，对反动势力还有某种惧怕，如果各党派按照他们所说的进行选举前的工作，那么，尽管在政治上和地理上还存在着许多尚未消除的不清楚的地方，尽管这些党派在苏战区仍然有许多条件保持自己的地位，而反动势力无疑还会加强。由于基层组织的压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尤其是中层领导人非常明显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走合并的道路，那么下层就会提出来，而实际上党的下层已经开始有组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柏林的分裂向我们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说明直至今今天统一社会党本身还有许多这样的成员，他们至今仍然留在统一社会党里，只是由于受到外部的压力。

在我们的占领区里，合并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对待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都没有进行认真的淘汰，如果认真对待，就要淘汰10个百分点。在这个期间，我们看到党又有相当大的成长，党目前拥有党员1460658人，也就是说，大约是居民的7~7.5%，统

—社会党的社会成分如下：工人占 51%，职员占 16%，农民占 11%，手工业者占 8%，知识分子、教师和没有任何工作的家庭主妇占 10%。

也就是说，今天工人的比重是 51%。诚然，这个数字应该订正，因为党的一些工作人员从前是工人，也把自己列为工人，尽管他们早就从事工会或党务或其他国务工作，但这些人数量并不多。

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也是最应该否定的一点就是年龄构成。统一社会党的队伍中青年人非常少。如果您参加一次大型会议，经常都会看到，没有青年人，如果有，那也是在基民盟里，而统一社会党里面青年则很少。的确，21 岁以下的只占党员总数的 5.7%，40 岁以上的则占 58~59%，50 岁和年龄更大的占党员总数的 30%。从 21 到 30 岁的占 8%。

这说明青年，甚至无产阶级青年，距离党还非常遥远。……

今天党内的状况如何——我认为还绝对不可过高地估计统一社会党在社区选举中获得的胜利。统一社会党内明显地存在着一系列严重的缺点，非常严重的缺点，如不克服，将威胁这个党的正常发展，而把这个党建设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和情绪上亲苏的政党，实际上是这个党成立时以及这个党开展工作时的最重大的任务。

合并以后，首先暴露出这个党的党内工作有一定的衰退，产生了某种政治上的消极性，首先是那些前社会民主党党员的政治消极性，这种消极性在统一社会党内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社民党员感到自己的自尊心有些受到伤害，我们的机关和一些卫戍司令对待他们的态度过于戒备，使他们感到没有完全信任他们，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们。

这一点现在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克服，但还远远没有彻底克服。其次，最有远见的共产党员在每一个问题都必要与社民党人协商，

不要使他们感到委屈，要考虑到他们的特点，这样就会减少流动性，党也就稳定了。我们在选举和全民投票时特别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也可以感觉到。

过去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组织工作问题上，而没有从政治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似乎一切都是党的组织问题，而机关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问题，特别是在柏林的群众工作问题则明显被疏忽了。这表现在领导人几乎不到大型企业中去，于是社会民主党人便利用了这一点，他们在柏林正是在大型企业中和在基层组织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

虽然两个党形式上合并了，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存在着两个集团。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萨克森党组织讨论选举总结的情况。对选举的总结变成了激烈的论争。首先，他们被结果弄得惊慌失措，他们本来指望得到更多的选票，这说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对群众的影响。他们满足于我们行政当局的支持。他们感到满足，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纸张、张贴画和一切物质条件，而一旦发生什么事，他们就感到有某种压力。这种满足感在萨克森导致了过高地估计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在这次萨克森党组织全体参加的党员积极分子会议上，立刻就看出来，这是一批社会民主党人在讨论问题，那是一批前共产党员在讨论问题。这种情况处处都可以看到。问题并不仅仅是存在着两个办公室，两个书记。

党内和组织上的不完善之处还有——甚至没有更换党证，或者进行了这一工作，但还是旧的党证，只是在上面盖了一个新的印章。社会民主党人保留着旧的党证，共产党员人也保留着旧的党证。当你跟他谈话时，他会掏出旧的党证来并且说道：“我是从前的共产党员，现在的统一社会党员”，也就是说，在内心不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内还有一系列重大问题说明，已经到了明确地提出它们的时

候了，否则党内就可能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妥协分子。党内存在着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极大危险性。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工人占51%，小资产阶级则占40%。党内现在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不懂得如今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应采取新形式，不懂得开展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形式，不懂得德国统一社会党要取得政权，不是依靠策略手段，而是要创造一系列的条件。……

然后是如下的问题：党非常容易滑到民族主义立场上去。我和我的同志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格罗提渥在哈雷一次群众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当他谈到社会问题时，谈到男女平等时，与会者都很心平气和地听着。可是当他稍一接触到民族问题时，全场44万人便一致鼓起掌来。

不久以前，在赫姆尼茨一次党的大型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既不应该依靠苏联，也不应该依靠英国。我们应该依靠德国。别人对我们说，俄国工人生活得并不好，我们是德国人，所以应该考虑的是德国工人阶级。

在这里我只能这样说。我不知道，到现在为止，对这个问题党的领导成员在正确的民族提法与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提法之间是否划清了界限。……皮克有一次在与波兰接壤的边界上声称，另外那一半不久就会是我们的。莫洛托夫讲话之后，现在允许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作为德国的政党，欢迎重新审查边界，这将会改善德国的处境。可是他们并没有由此而提出选举的口号——基民盟和自民党的表演是骗人的；巴黎会议将会比以往更多地考虑到我们的利益。

他们这样提出问题是会得到允许的，但对统一社会党本身来说，这是一个很细小的问题，很容易被忽略，而中层组织往往忽略这个问题。很遗憾，苏联军政府的宣传机关始终没能使居民相信，统一社会党是真正的德国政党，而不是占领军当局的代理机构。宣

传工作中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缺点和失误。……

现在我要评价一下自民党。我们经常把自民党看成是基民盟的对立面，去年解放初期，即整个 1945 年和 1946 年初，这是一个基本的政党（在民主团体范围内），其参加者有反苏情绪的反动分子，他们在这个党里寻找发泄不满的方式。

我从基民盟开始讲起。我们清楚地懂得，无法改变敌对阶级的政治组合，因此无法让这个政党变成亲苏的。但是，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即剥夺它发表反苏言论，发表模棱两可的言论的可能性，加强这个党内部的民主成分——这个党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如果这个党成为明显的威胁，这个党成为一切反动分子的同义语时，我们就要采取行动，搞掉赫尔梅斯，并把凯塞拉过来，我想，这个党站在极端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这里只能让它存在到选举之前。……

自民党长期以来被我们看做是基民盟的对立面。我甚至可以说，我们有些人为地抬高了它。去年 10~11 月间，每当我们需要向基民盟施加压力时，我们都利用它。可是，我们却养虎为患。……的确，这个党到 9 月 1 日为止共有 165000 名党员（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了），而 3 月 1 日以前只有 105000 名党员，党内根本没有工人。那里工人的数量是最微不足道的，这些工人也许是柏林最熟练的上层工人，是上层的工人贵族。农民——也是如此，比重很小，而且都是具有自由思想的富农。其余大约 90% 左右，首先是中产阶级，还有职业官吏，这就是为什么像莱比锡、柏林、德累斯顿这样的城市成为该党堡垒的原因。然后是第三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自民党在所有的大学城里，在教授中间，在知识分子中间，在文化协会里影响很大，而在大学生中间正式党员并不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它自己对此也直言不讳。从形

式上来说，这个党甚至没有纲领。在埃尔富特党代表大会上，居尔茨直截了当地声明，我们不需要任何纲领。我们的一切宗旨都通过言论表现出来。这些宗旨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是唯一的反社会主义的政党。他激烈地批评了基督教社会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声称，我并不了解（这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他们主张私人经营企业，他们反对任何专政，拥护私有财产。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保留康采恩和垄断资本，后来遇到行政上的禁止，现在他们只是秘密地鼓吹这个口号。他们直截了当地声明，鞋匠应该做鞋，而不能领导国家。如果现在可以说，这个党已经把所有最反动的分子聚集在自己周围是它所赢得的最重要的时机，那么，它就成了反动分子的同义语，它煽动法西斯分子进行地下活动，我们在该党的会议上，甚至比在基民盟的会议上听到了更多公开露骨的帝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反苏言论，以及法西斯地下组织的言论。

这些自民党分子在我们占领区里状况就是这样的。这些自民党分子的前途如何呢？自民党在这次地方自治代表会选举中将会有很强大的势力。自民党因其在城市里很强大，它的地位对于统一社会党便构成了重大的和严重的危险，况且我们宣传工作最大的缺点之一，尤其是在萨克森的选举中，就是我们低估了自民党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当然，基民盟和自民党各得票20%，这比集中在一个党要好一些。在任何情况下，对自民党这个统一社会党的敌人，都应该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政治斗争，揭穿其阶级本质，这是完全可能的，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削弱自民党在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的影响。……

现在我非常简要地介绍一下我们所依靠的其他社会团体，现在，特别是将来，它们可能并且应该起到重大作用——这首先是自由德国青年团。这个团体是在反法西斯青年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的。……

工会。这里是关于历次代表会议的全部材料，但已经过时了。没有新的材料。我们完成了工会组织的组建，是按照生产行业的原则进行的，保留了德国工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导作用。现有 18 个生产行业工会，它们全都是秘密投票的方式通过真正民主的途径选举的。

应该说，在我们占领区里组建工会，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政治积极性，这是维护统一，甚至是维护党的统一的重要条件之一。……

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在其分裂活动中不能依靠工会，相反，统一社会党提出了维护工会运动的统一的主张，认为这是反对反动势力的保证，因此不仅在我们占领区里，在柏林的苏占区里，而且在西部各占领区里都要依靠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工会表示他们在一切基本问题上都追随统一社会党。他们参加了萨克森的全民投票，参加了地方自治机构选举的准备工作，他们现在准备了一份很好的告柏林居民书，提出了与康采恩斗争的纲领，签署这个文件的不仅有现任柏林德国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赫瓦列克，而且有老工会工作者、前社民党人施利梅，现在具有社会民主党人倾向的基民盟的第二主席莱默尔也签了名。……

我要谈的最后一个组织，就是教会，准确地说，是我们的态度，是我们在这方面执行的路线。

首先是占居民 85% 的福音派教徒和 15% 的天主教教徒。由于移民的增加，天主教徒的比重加大了，这些移民来自东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部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其余的来自图林根、萨克森专区的部分地区和梅克伦堡，这些都是移民。梅克伦堡是个典型的新派教徒的省份。

关于天主教会，现在可以完全确认，它拒绝接受我们的所有措施，在学校改革方面，在土地改革方面，在大工业的国有化方面，

在妇女工作方面，等等，总之它在任何方面都不愿意与苏联军政府发生关系。……

在福音派教会方面，其上层在基民盟里与天主教教会结成了联盟。迪贝利乌斯完全加入联盟了，但福音派教会一向是国家教会，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它作为纯德国的教会，将支持德国统一的口号，而巴伐利亚和莱因地区的天主教会对此则不支持，将来也不会支持。

根据这一点，可以使这个德国国家教会实行某种中立，并对我们抱有某种好感。德国国家教会不是受到国外约束的天主教教会，因此，如果能够保证它的自由，它就可能拥护相当激进的民主制度。……

现在我要谈谈柏林的报刊和口头宣传的情况。

关于文化协会，首先介绍一些文化协会的材料。文化协会大约拥有 50000 名会员，各省均设有理事会。文化协会有自己的杂志《建设》，在苏联占领区发行 74000 份，在西部占领区发行 35000 份。有面向知识界读者的报纸，即《区报》周刊，在苏占区发行 70000 份，在国外发行 44000 份，这样，它在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文化协会的领导。如今我们坚信，应该撤换贝希尔，不能再容忍了。我曾长期反对这样做，我们曾经犹豫不定，可是现在，特别是由于阶级界限的划分和政治斗争的加强，不能让文化协会仅仅成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聚会，而应该使它成为德国民主复兴的真正的民主机构，使它成为与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协会。这一点我们没有说，但应该加强对它的积极领导。没有这一点，只会带来害处，而不是益处，贝希尔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这么做。

就其全部精神追求来说，贝希尔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直接依靠英国和美国，而是依靠西欧的民主。他是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

会委员，可是却羞于谈到这一点。他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

还有一点。贝希尔与乌布利希的关系极为亲密。贝希尔时常为乌布利希出主意，他敏锐地察觉到我们宣传工作的缺点。不能在一方面都相信他，但是也应该听听他的意见。……

总体上来看可以说些什么呢？——在我看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现在的问题在于从政治上划清界限。现在应该使文化协会获得真正的民主面貌，而现在却没有。听听元老们的意见，听听基民盟理事会主席弗里登斯堡的意见。他是个狡猾而聪明的政客，曾经帮助在基民盟内部推行或多或少可以接受的政策，但他与垄断资本有联系，他组织党的工作人员会议。现在他不可能再继续留任了。重要的是，我们要向他介绍我们苏联占领区现在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因此，我请求元帅再留他两个月。……

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掌握住知识分子。这是我们整个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之一。统一社会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不是一面旗帜，如果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在文化协会里工作，那么他们尊敬的或是阿克曼个人或是建筑师亨泽尔曼，或者是别的什么人，但却不是统一社会党。魏纳特和沃尔夫都受到尊敬，就是说他们可以替换贝希尔。

……

现在我想要转到介绍柏林的状况上来。首先谈一些能够说明情况的一般性材料。……

今天柏林各政党的相互关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应该说，统一社会党在合并以后曾经处于严重危机的困境，但现在已经有些缓解。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盟军在自己的占领区里直接禁止合并，摧毁了业已成立的统一社会党的一些区委会，逮捕人员，占领房屋，禁止一切集会。我要说，政治顾问处和卫戍司令部的失策，对于柏林的困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没有承认统一社会党的合并。它在柏林处于

半非法的状态，因为政治顾问没能立即——或者在合并后尽快或者与合并同时——取得卫戍司令部的承认。应该做的不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而是在它之前，这样的结果是我们虽然有合法的根据，却不能提出抗议，于是便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使统一社会党在西部占领区不能工作，统一社会党的队伍开始大规模的流散和惊慌失措。

.....

№01985

潘友新、库扎科夫^①和布尔采夫关于对
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的检查
结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摘录）^②

（1946年10月11日）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是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45年10月5日的决定而成立的。这项决定规定宣传厅担负着如下的任务：利用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通过报刊、广播电台和其他手段在德国居民中间组织和开展宣传；对德国报刊、广播电台和出版社进行监督和审查。

宣传厅设有以下几个处：宣传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指导处、报刊处、广播宣传处、文化艺术处、书刊审查处和情报处。在

① 库扎科夫，K. C.（1909~？），1944~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② 该报告还附有一封未署名的信，信中建议使用受过培训的干部加强宣传厅的领导，指派新的厅长，并挑选两名副厅长及一些处长，责成武装力量部总政治部派出一批政治成熟的干部加强宣传厅的基层工作。建议撤换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夫上校。提议联共（布）中央在今年11月，即苏占区地方自治机构和区政府选举以后，听取军事委员会的报告。

外交部、总政治部和联共（布）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和讨论了这一报告。1946年12月10日，联共（布）中央责成以亚历山德罗夫、苏斯洛夫、希金、洛佐夫斯基、马立克、潘友新、库扎科夫、布尔采夫、秋尔潘诺夫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10日内向联共（布）提交关于军政府宣传厅工作的报告和决议草案。1947年1月2日和3日，亚历山德罗夫将报告和决议草案提交给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等人。是月，联共（布）中央各部门对这些文件进行了讨论。

工作的过程中，根据部长会议的决定，宣传厅增设了德国工会指导处。

根据政府的决定，在苏联占领区各省、州和大城市成立了宣传处或科，而在区卫戍司令部设立了宣传工作高级督察员之职。

宣传厅积极参与巩固地方政权和创建反法西斯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的工作。在德国苏联占领区内，除了地方自治机构之外，还建立了统一社会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同盟、工会、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德国青年团、知识分子文化协会。所有这些政党和团体都有自己的报纸，其中有的还有自己的出版社。此外，还建立了六个广播电台，其中两个大功率的设在柏林和莱比锡。苏联军政府创办了自己的出版社和日报《每日评论报》。宣传厅通过这些团体的力量在德国居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

宣传厅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是为了保证在苏联占领区所进行政治运动：土地改革和学校改革、积极的纳粹分子和战犯的财产国有化、工会机关选举、社区选举，等等。

然而，宣传厅对宣传内容的基本问题解决得很肤浅，主要是只局限于与某一运动有关的问题。宣传厅没有制定宣传工作的总体计划，这个计划应该决定德国各民主团体以及苏联驻德各机关宣传工作的政治路线。因此，像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当代资产阶级反动势力，阐述德国民主发展的必要性和途径，以及苏联的对德政策等最重要的问题，在宣传工作中只占有次要地位。

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宣传的基本民主政党，是统一社会党。……

统一社会党工作中的重大缺点之一是理论问题研究薄弱。党的理论出版工作只是出版了三期《统一》杂志和几本小册子。这些出版物中阐释的问题理论水平很低，题材带有偶然性。有些重要问题完全没有研究，如党的纲领问题、统一社会党建设的原理、德国民

主化等，没有对德国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进行揭露。报刊上登载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

统一社会党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得不好。统一社会党组织举办政治学习夜校，通常学习政治时势问题，但很不正规。党内的政治学习被认为是党员的负担。党员参加政治学习的人数只有10%到20%。党的积极分子（党的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也组织得不好。以小册子形式为党的工作人员出版的资料，主要内容是党的实际工作问题，很少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理论知识。统一社会党中央和各省理事会均办有党校，但听课人数极其有限。在这些党校学习的只83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苏联工人阶级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等问题，在党校的教学大纲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不善于动员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参加对统一社会党党员进行思想团结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统一社会党在社区选举期间的工作缺点可以归纳为：

党内缺少统一，竞选期间前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因平分候选人名单而发生公开的斗争，并且导致统一社会党的右派分子直接的分裂活动，把一系列党组织带到了分裂的边缘；

统一社会党忽视国内日益发展的阶级斗争，因此工农联盟的问题没有在纲领口号和竞选鼓动中得到应有的反映。某些工人，其中包括不少统一社会党党员，还把农民看做是反动力量；

统一社会党的竞选鼓动不具体，论据不充分，提出的政治论点缺乏尖锐性。竞选鼓动对待居民的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加区分，因此缺少说服力。

宣传厅和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在民主的群众团体——工会、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青年团和知识分子的联合会即文化协会中进行的政治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到9月1日为止，苏联占领区的工会大约有300万会员，也就是占全体雇佣工人的56%。工会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的领导人员有94.5%是统一社会党党员。然而，工会里几乎没有进行群众政治工作。工会会员会议只是由于进行运动才召开。统一社会党通常只局限于在工人大会上的讲话，借以取代在地方工会组织中的日常工作。在大型企业里的工作尤其不好。统一社会党在柏林许多工人众多的工厂（鲍尔济格、达伊姆列尔、阿克萨尼亚、西门子、通用电气公司等）生产委员会的选举中遭到彻底失败。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选票投给了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旧传统的影响之下，把工会视为非政治、非党派的团体。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反对工会在社区选举时发表告工人书，认为发表这一文件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

在苏联占领区有6000多个反法西斯妇女委员会，在其周围大约团结了25000个积极分子。然而，这些委员会多半是从事福利事业的。委员会在妇女中间通常不进行政治教育工作。这些委员会对德国妇女的影响极其微弱。

自由德国青年团拥有324000名团员。宣传厅和统一社会党很少注意做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团的活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活动。对青年没有组织必要的政治教育。青年团对知识青年的影响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知识界的团体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简称文化协会）拥有近50,000名会员。宣传厅和统一社会党对于通过文化协会在知识分子中间开展工作的意义也不重视，因此文化协会至今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民主团体。文化协会常常脱离政治生活，没有同反动势力展开思想意识的斗争。

社会民主团体没有变成统一社会党的政治支柱，仍然是教会分子活动，资产阶级政党扩大其影响，特别是盟国加强其影响的良好

土壤，盟国近来在妇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

宣传厅没能充分利用各反法西斯民主党派联盟以加强德国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各反法西斯党派的联盟至今还没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这种共同的政治纲领本来应该在统一社会党手中成为约束自民党和基民盟的反民主活动，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加强对其影响的手段。

从宣传厅方面对反法西斯联盟的各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局限于形式上的监督，对这些党派宣传活动的內容没有进行积极的干预。

还应该指出，宣传厅及其地方的工作人员过于迷恋对资产阶级党派施加行政影响的方法，宁可采用这种途径，而不在群众中开展揭露这些党派以及在其内部培养民主反对派这种严肃的政治工作。

苏联在德国的宣传工作由军政府的各个机关——《每日评论报》社、情报局、苏联军政府出版社以及受苏联军政府监督的广播电台和苏占区的文化机关进行。这些团体的工作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缺点：

《每日评论报》社在宣传苏联方面的工作不能令满意。所刊登的关于苏联的文章，对于德国读者来说不是通俗易懂的。近来报纸停止刊登关于德军在苏联领土进行破坏的材料。报纸从而在让德国居民相信我们向德国提出的战争赔偿的公正性方面放弃了一个重要论据。

《每日评论报》近三个月来没有刊登一篇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文章。

报纸在8~9月份完全没有发表宣传莫洛托夫同志7月11日在外长会议上的讲话的文章。《每日评论报》对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的讲话的本质以及美国的对德政策揭露得很不够。

报纸的反宣传进行得不能令人满意，没能及时地揭露右派和盟国反对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挑衅。报纸通常只是自卫，而且对于反苏攻击的反应总是非常迟缓。

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首领诺伊曼今年9月15日在社民党代表大会上的诽谤性讲话中胡说在德边界以东数百公里的范围内正在犯下罪行，这些罪行与纽伦堡法庭现在正在审判的罪行相类似。《每日评论报》至今没有进行还击。

苏联军政府情报局为苏占区的报刊提供情报资料。此外，情报局还为苏联军政府司令部和莫斯科中央机关提供内部消息。情报局至今没有规定其职能的工作条例。情报局工作中最严重的缺点是对宣传苏联认识不足。负责宣传苏联的部门由八名德国人和仅一名苏联工作人员组成。

情报局形式主义地对待为报刊提供关于苏联的材料，对来自塔斯社和苏联情报局的文章不进行加工。因此，情报局发给报社的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不适合于报刊。8~9月份柏林各报刊登的87篇文章中，只有8~10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其余的材料没有价值。其中有这样的文章，如《在太平洋捕沙丁鱼》、《卡拉干达的蔬菜》、《土库曼的地毯》等。

情报局没有及时组织接收来自塔斯社和苏联情报局的材料。莫洛托夫关于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的讲话^①在柏林苏占区发表晚了两天。由于来自情报局的材料迟到，苏占区的报纸发表国际形势的消息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英国和美国通讯社的材料。

情报局里没有设立反宣传处。反宣传的工作不尽人意。揭露反动报刊反苏的诽谤性宣传的材料，到达民主报刊总是延误。

^① 这是指莫洛托夫1946年9月14日在巴黎和会上的发言，在讲话中他同意将南斯拉夫与意大利有争议的的里雅斯特宣布为中立的和非军事化的自由区。

《电讯报》挑衅性地报道苏联军事当局驱赶德国儿童的消息，情报局只是到了第六天才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段时间里，反动报刊得以利用民主报纸的沉默，围绕着《电讯报》的声明大规模地掀起了反苏运动。

为德国人出版读物的工作也组织得不好。出版社没有完成德文图书的出版计划。1946年度按计划应该出版122种图书，但问世的只有35种。尤其是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书籍出版特别糟糕。计划出版32种，只有4种问世。

宣传厅对广播电台的工作没有认真监督和检查。广播宣传中对苏联劳动者的生活、苏联的内外政策没有很好阐述。德国中部广播中心（莱比锡市）8月份只播放了三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从8月16日至31日，在柏林广播电台“民主论坛”的播音节目中，计划三次播放自民党和社民党关于妇女的播音，而统一社会党则一次也没有；在“问答”栏目中，计划组织关于英国青年团体工作的座谈，然而在电台工作的整个期间，对苏联青年的工作和生活则没有一次播音。广播电台在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希特勒分子罪行方面的工作开展得很差。苏联占领区没有一家广播电台播放苏联起诉人在纽伦堡法庭上的总结讲话。

在德国居民中间宣传苏联科学、文化和艺术成就的工作开展得很差。苏联占领区和柏林苏占区共有106家剧院，其中只有7家上演俄国古典和苏联的剧本。推动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剧本走上德国舞台的工作做得尤其不好。演出剧目的遴选带有偶然性。在译成德文的26个剧本中，有一些在苏联舞台上并不受欢迎，没有反映出苏联艺术的水平（拉斯金和斯洛博茨科伊的《寻找的那个人》、卡达耶夫的《休息日》、施瓦尔茨的《阴影》等）。

宣传厅对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文化艺术处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该处的领导人是前社会民主党人魏曼，此人对于艺术完全是外

行。统一社会党中央机关艺术处主任金德不学无术。他对戏剧演出的评论很荒唐，遭到德国知识分子的嘲笑，引起了他们的困惑。金德在一篇这样的剧评中谩骂苏联剧本《玛申卡》，认为当时柏林剧院不该演出，而这个剧本却在德国苏占区和西部各占领区43家剧院里演出获得成功。

苏联在德国进行宣传的组织和机构隶属于宣传厅，但它不能胜任对这些机构的领导。

英美集团加强了对德国苏联占领区，特别是对柏林苏占区居民的影响，而抵制这种影响的斗争开展得非常不够。苏联军政府采取的社会经济措施旨在使德国民主化，恢复德国苏占区的经济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状况，苏联宣传机关对此宣传完全不能令人满意，德国各民主党派在宣传中也很少利用这些材料。

宣传厅至今没有制定自己的工作条例。宣传厅破坏了政府决定建立的体制。规定在宣传厅的编制内设立宣传处，但宣传厅的领导人事事实上撤销了这个处。宣传厅的书刊审查处实质上成了政治顾问的机构。政府决定苏联军政府的出版社和苏联军政府的机关报《每日评论报》归宣传厅管辖，但在这一决定也被破坏了。

宣传厅及其地方机关的编制中现有489名负责的工作人员，其中宣传厅本身有85人。教育状况：受过高等教育的212人，受过中等教育的263人，受过初等教育的4人。民族状况：俄罗斯人253名，犹太人180名，乌克兰人43名，日耳曼人10名，亚美尼亚人4名，格鲁吉亚人2名，拉脱维亚人2名，阿塞拜疆人1名。

宣传厅及其地方机构，其中包括柏林苏占区宣传处挑选和配备干部的工作很不得体。宣传厅共有8名直属处处长，其中5名以及相当一部分省市的处、科长，特别是区卫戍司令部的高级宣传督察员，在业务素质上与其所担任的职务不相适应，必须更换。

宣传厅报刊处共有10名工作人员，其中只有2人具有新闻业

务技能。其余的工作人员均不熟悉报刊业务问题，不能保证对报纸的领导。

工作人员业务修养不足，理论水平低下，必然造成解决重大问题时出现严重的政治错误。

宣传厅在其一年的工作中没有对自己的干部进行再培训，也没有培训新干部。现有的宣传人员不进行政治学习。

驻德政治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上述组织上的和内容上的缺点，是因为军事委员会对宣传厅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以及宣传厅本身领导的软弱无力。

宣传厅厅长秋尔潘诺夫在组织方面软弱无力，没有能力领导宣传厅的机构。他在工作中常常犯严重的错误，没有足够的纪律性，好闹纠纷。副厅长兹多罗夫在理论方面准备不足，不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宣传厅的工作人员中间没有威信。

军事委员会很少过问对德国居民进行政治宣传的问题，只局限于定期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开会，多半与进行一定的运动有关。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不讨论宣传内容的问题。

军事委员会委员博科夫同志对宣传工作的领导不能令人满意。宣传组织和内容的许多问题，不是由博科夫同志决定，往往不通过他。

从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顾问方面来看，对宣传厅工作领导中存在着平行、重复的现象。……

№01952

谢苗诺夫^① 关于同贝希尔谈话的通报

(1946年11月16日)

约·贝希尔声明辞去文化协会^② 主席的职务，因此，我受索科洛夫斯基元帅^③ 的委托把他叫来。

我对贝希尔说，他认为苏联军政府不信任他，这是没有根据的。假如我们对文化协会的工作问题或贝希尔的个人行为有重大意见，那么我们会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切。贝希尔说，他从主管文化协会的苏联军政府工作人员帕坚特那里听到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话。后者甚至由于他们从苏联军政府领取口粮而指责他的妻子，并声称他不是以一个同志，而是以占领当局代表的身分进行这次谈话的。我向贝希尔指出，帕坚特这么做违背了苏联军政府领导的指示，他将受到惩处。贝希尔回答说，他看出苏联军政府领导对他是信任的，因此他撤回辞职的声明。

接着，贝希尔谈起柏林和苏联占领区政治局势的一般性问题。

① 谢苗诺夫，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1911~1988），1945~1946年任苏驻德军政府总司令的副政治顾问，1946~1949年为政治顾问。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45年6月6日《关于成立苏驻德军政府》的决议，责成军政府总司令的政治顾问向总司令提交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所有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的报告，同时向政府提交军政府管辖范围内的所有问题的情报。政治顾问还参与对政治处、人民教育处、法律处的领导。

② 文化协会是在苏驻德军政府的倡议下于1945年7~8月成立的一个艺术和科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

③ 索科洛夫斯基，瓦西里·丹尼洛维奇（1897~1968），1945年6月任驻德苏军副总司令，1946~1949年任驻德苏军和军政府总司令。

他认为苏联军政府排斥资产阶级政党中某些忠诚可靠分子，而单纯依靠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譬如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辞掉了从前担任德国燃料工业管理局局长的基民盟理事弗里登斯堡^①。贝希尔曾经跟弗里登斯堡进行过多次谈话，他确信此人忠诚可靠，懂得与苏联合作的必要性。

我回答贝希尔，听说弗里登斯堡对苏联是忠诚的。弗里登斯堡从其以前的职位上退下来，是因为他与德国垄断资本家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企图利用自己在燃料管理局的职位来拯救垄断资本家。决定把弗里登斯堡调离这个职位，换到另一个职位上去，这样，他与垄断资本家的联系便不会这么危险了。贝希尔同意弗里登斯堡与垄断资本家有老关系，但他认为弗里登斯堡至今还没有工作，这是不正确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十分高兴接受他的。贝希尔认为，我们对那些在英国或美国占领区工作的德国人存在着不正确认识。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是从苏占区跑过去的，他们觉得同英国人一起工作比同俄国人在一起好些。然而，据贝希尔所知，他们中间许多人对英国人完全失望了，他们对英国人在德国推行殖民政策很愤怒，想要恢复与俄国人的友好关系，但是，从我们这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却组织普遍的迫害。譬如说，德国大出版商鲁道夫·佩歇尔目前在英占区出版周报《每周评论》，他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及其在德国的政策持反对态度，当然他也反对拆迁设备。然而，他愿意同俄国人合作，打算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关于苏联的正面文章。佩歇尔曾请求贝希尔把这些文章拿给某个苏联军官看看，让他把他认为不准确或不正确的地方更正过来。可是佩歇尔对会不会同他谈话有疑虑，因为柏林苏占区的报纸痛斥他为“人民的

^① 弗里登斯堡，费尔季南特（1886~1972），1945年为柏林和苏占区基民盟创始人之一，任大柏林市副市长。

敌人”等等。贝希尔认为，我们排斥那些对苏联友好态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做了一件错事。我回答贝希尔说，我们并不打算单纯依靠统一社会党，并准备支持那些对苏联持友好态度的资产阶级政治家，还请求贝希尔在这方面为我提供较为详细的和具体的想法。

贝希尔指出，应该纠正苏联军政府的报纸《每日评论报》的方针，因为这家报纸在这方面执行了过于片面的方针，只支持统一社会党，这是不策略的。他还说，自由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同盟成员抱怨拨给他们报纸的纸张太少。我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家从前不曾抱怨，因为他们要多少纸张就有多少，而那时工人政党却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物质材料。现在工人政党有了这种可能性，并且是按其党员数量的比率来领取纸张的，因此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能认为是完会有根据的。此外，在基民盟和自民党的政策中，有许多对苏联军政府不忠诚的地方（在罗斯托克组建地下印刷厂，支持修改东部边界，在赴苏联的德国专家问题上模棱两可的举动等等）。贝希尔同意我的理由，但是建议直截了当地告诉凯塞^①：玛丽娅·谢韦尼希^②在英国占领区的讲话中号召建立非法的国防军，采取武装行动重新确定东部边界，他们为什么在自己的党里容忍她，而没有反驳她。贝希尔认为应该对资产阶级政党施加影响，推动他们采取更加民主的立场，自民党和基民盟中央委员会中有些人懂得建立苏德睦邻友好关系的必要性，所以应该关心他们。

贝希尔谈到柏林选举的结果时明显地表现出激动情绪。他把这看成是党的失败。谈话时，他不安地对我说：“我们彼此是同志，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话。请您告诉我，作为一个国家，德国的前途如

^① 凯塞，雅科布（1888～1961），1945年柏林苏占区基民盟创始人之一，1947年12月任基民盟主席。

^② 谢韦尼希，玛丽娅（1907～？），1945年黑森基民盟创始人之一。

何。德国知识分子现在看不到前途。”我回答贝希尔说，统一社会党在柏林选举中的失败是因为党本身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柏林的意义，选举前在群众中做的工作不充分。不能悲观主义地评价目前的局面，应该利用一切力量和可能性来改变这种局面。这些失败对于统一社会党柏林组织来说是一个教训，党组织应该认真分析自己的工作，加以改进。我还对贝希尔解释了德国的前途问题，所依据的是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关于德国问题讲话中的论点。

总体来说，我的印象是：贝希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他对许多政治问题根本认识不清。然而，贝希尔在主观上是站在我们一边的，真心诚意地努力探索他认为的我们在德国工作的正确方法。目前让贝希尔从文化协会辞职是不适宜的，然而需要经常加强我们对文化协会领导工作的影响，避免不策略的和在琐碎事情上的干预，这种干预在宣传厅的实践中曾经有过。帕坚特应该受到处分。

No01986

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苏驻德军政府 宣传厅的工作给斯大林的报告（草稿）^①

（不晚于1946年12月25日）

致斯大林同志

受联共（布）中央委派，对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是根据苏联人民委员会1945年10月5日的决定而成立的。宣传厅的任务是：利用德国各反法西斯党派和团体的力量通过报刊、广播电台和其他手段在德国居民中间组织和进行宣传，对德国报刊、广播电台和出版社进行监督和审查。

检查表明，宣传厅为了从政治上确保苏占区内各种社会经济措施的贯彻实施，做了一定的工作，然而总体上来说，宣传厅没有完成赋予它的任务。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是苏联驻德军政府司令部方面没有对宣传厅的工作进行应有的领导。苏联军政府里实际上没有军事委员会。苏联军政府的领导人在相当程度上把对德国国内政治工作的领导问题转交给了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因此，苏联军政府负责宣传问题的各个机关（司令部、政治顾问处、宣传厅、情报局）工作不协调。工作中存在着重复现象，这些机关之间缺乏相互配合，这给宣传工作造成了重大损失。对于在德国居民中

^① 这里收入的是报告的第一稿，在1947年1月29日正式提交给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进行审议的报告草案中，删去了报告中的楷体字部分。

间进行政治工作的基本问题和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计划，没有进行集体讨论。苏联军政府主管宣传问题的各个机关之间行动不协调，宣传机关和苏联军政府机构的其他环节之间缺少相互配合，结果是没有围绕着苏联军政府的许多经济和行政措施开展政治工作。

苏占区贯彻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使德国实现民主化和根除法西斯主义残余，宣传厅没能围绕着这些措施在应有的程度上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宣传厅没有长远的总体的宣传计划，主要是伴随着运动进行工作，没能对法西斯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里的表现组织系统的有效的揭露以及解释德国民主化发展的必要性和途径。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在解释苏联政府对德政策方面的组织工作进行得很糟糕。没有充分向德国居民解释约·维·斯大林同志 1946 年 10 月 29 日的答记者问和维·米·莫洛托夫同志就苏联在德国政策的基本问题和德国发展前景的讲话。宣传厅也没有开展必要的宣传工作以揭露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德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对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讲话的反动本质的揭露也是软弱无力的。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有组织系统的和行之有效的反宣传，没有及时地揭露右派报刊和盟国报刊反对苏联及其对外政策所进行的挑衅。我们在德国的宣传工作通常带有消极被动的自卫性质。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能向各反法西斯政党和团体提供对一些德国居民关心的问题的正确解释，如遣返战俘、拆迁企业设备的终止日期、现行生产的日用工业品的输出，等等。因此，各反法西斯政党对这些问题也就回避不谈，而敌对报刊则利用它们进行反苏宣传。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负责监督 37 种报纸、5 家广播电台和 52 种杂志，但没有充分地 and 有效地利用这些手段积极开展反对反民主的和反苏的宣传斗争。德国出版社出版反法西斯书刊的工作也不能令

人满意。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能很好地利用各反法西斯党派和团体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它没有帮助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德国居民中间，首先是在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工人中间，在妇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开展政治工作，也没有协助它在工会、青年团和其他群众团体里组织思想政治和教育工作，因此，统一社会党没能牢牢地掌握住大部分德国居民阶层，特别是工人阶级。

苏联军政府司令部及其宣传厅过高地估计了统一社会党在德国人民中间，特别是在柏林的地位的巩固性及其影响，那里正在为争夺对群众的影响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反动派得到英美集团的支持，其压力日益增大。在对待社会民主党方面，也没有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社民党的反动领导人是外国的代理人，他们与该党的工人群众之间存在着矛盾，而对这些矛盾并没有加以利用。因此，在1946年10月20日进行的柏林市议会选举中，统一社会党仅仅获得19.8%的选票。

统一社会党在柏林的失败激化了党内业已存在的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导致前社会民主党人在一系列组织里建立地下派别集团，并且加剧了一部分前共产党人的宗派主义倾向。在统一社会党书记处中，前共产党人和前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关系恶化了，特别是想要败坏乌布利希的名声并把他排挤出党的领导的企图有所加强。党在1947年2月将要举行的柏林工会领导人选举中遭到新的失败的现实危险性，使统一社会党可能面临深刻危机的威胁。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能充分利用各反法西斯党派联盟来实现德国的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并战胜基民盟和自民党内的反动倾向。宣传厅没能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作进行应有的监督，对其宣传活动的內容很少进行干预。宣传厅没有为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分子而进行坚决的斗争，没有对其中的进步分子给以彻底的支持。没有

达到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培养民主反对派的目的。

苏联驻德军政府司令部及其下属机构对各个政党以及对其活动的行政干预采取了不正确的领导方法，这又加重了德国政治工作中的上述缺点。苏联军政府司令部、军政府宣传厅和各地区卫戍司令没有帮助统一社会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培养党的干部，而是采取了琐碎监管的方式，突出地显示出自己只信任统一社会党，在各种民主机构的领导岗位主要安排的是统一社会党员，从而损害了统一社会党的名声，使它在德国居民的眼中成为“俄国的代理人”。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在宣传苏联的成就方面所做的工作很不得力。宣传厅和苏联驻德组织没有向德国报刊提供关于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及其旨在巩固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对外政策的全面信息。来自苏联情报局和塔斯社的文章和图片资料，在形式上不太容易被德国读者所理解，因此往往失去了应有的政治内容和针对性。向苏联占领区德国报刊提供国际的和苏联的信息，与柏林西部各占领区相比，通常总要迟到1~2天。因此，柏林苏占区和德国苏联占领区的报纸不得不根据英美通讯社的材料报道相当一部分国际消息，这样就把讲坛让给了英美宣传机构。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编制和机构与其工作的规模和它所承担的任务不相适应。宣传厅没有设立指导青年、妇女和宗教团体工作的部门，以及反宣传和组织监督部门。完全没有预先规定在自治机构中的工作。

对苏联军政府宣传厅领导机关人员的挑选不能令人满意。厅里有五个处的处长：书刊审查处处长胡佳科夫同志，宣传处处长希什科夫同志，工会处处长洛沙科夫同志，情报处处长帕尔霍缅科同志，广播宣传处处长穆林同志，均不称职，必须更换。宣传厅副厅长兹多罗夫中校不具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也没有组织才干。

宣传厅厅长秋尔潘诺夫上校缺乏组织工作能力，无法保证对该机关的领导。

地方宣传机构的许多工作人员不能很好地分析形势，没有必要的业务技能。

宣传厅及其各地方机构的编制为480名工作人员。其中1941年以前担任过党的政治工作的只有68人。478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有222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263人。民族状况：俄罗斯人247名，犹太人180名，乌克兰人43名，日耳曼人10名，其他民族9名。^①

为了从根本上改进在德国的政治工作，调整苏联军政府各机关的行动，我们认为成立苏联军政府军事政治委员会是适宜的，其任务是讨论苏占区管理工作的一切原则问题，审查和审批苏联军政府在德国所采取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的计划。

由于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机构和编制与其日益增长的工作规模不相适应，而“宣传厅”这一称呼在德国人民中名声不好，因为在法西斯体制中也有这个称呼，我们建议将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改组为苏联军政府情报厅。

呈请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审查在德国现行政策中存在的一切问题。为联共（布）中央书处准备关于在德国的工作问题和考察苏联军政府情报厅活动的任务，可交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局和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承担。

为了协助苏联军政府军事政治委员会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派遣米·亚·苏斯洛夫和约·瓦·希金同志赴德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工作是适宜的。^②

① 原文如此。疑原文数字印刷有误，因各类数字相加超过总数。

② 楷体字部分是删去部分。

呈上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的决定草案请您审阅，其中规定了改进在德国政治工作的措施。同时，我们提出《关于在苏联驻德军政府内成立军事政委员会》的建议。^①

① 后来，这个建议是以联共（布）中央决议草案的形式提出的。决议建议由下列人员组成军事政治委员会：主席索科洛夫斯基（军政府总司令）、副主席马卡罗夫（驻德占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委员库罗奇金（军政府副总司令）、委员布尔采夫（情报厅厅长）、委员谢罗夫（军政府副总司令）、委员谢苗诺夫（政治顾问）等。军事政治委员会讨论军政府的所有原则性问题，研究和批准军政府所实施的经济、政治措施的计划。

№01987

联共（布）中央关于苏驻德军政府 宣传厅工作的决议草案^①

（不晚于1946年12月25日）

联共（布）中央关于苏联驻德军政府 宣传厅的工作的决议（草案）

联共（布）中央指出，苏联驻德军政府宣传厅为了从政治上确保苏联占领区内各项社会经济措施的贯彻实施做了一些工作。

然而，宣传厅的工作尚不能令人满意，它不能胜任赋予它的各项任务。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和当代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解释德国民主化发展的必要性和途径等问题，在对德国居民的宣传中被置于次要地位。宣传厅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向德国居民解释苏联的对德政策上，没能系统地和有效地组织反对英美集团在德国进行的反苏运动的反宣传，在宣传工作中多半处于消极的自卫状态。苏联

① 这里收入的是决议的第一稿草案，提交该草案时，希金于1946年12月25日提出对决议草案的下列补充意见。1. 应按照情报厅的机制改组宣传厅各省区分支机构；2. 决议中不仅应写明免除秋尔潘诺夫的厅长职务，而且还要明确他担任情报厅副厅长的职务；3. 决议中应写明由武装力量部总政治部负责向情报厅及其地方机构指派军事-政治干部，而指派非军事的党的干部则由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负责；4. 决议中的第11条第3段应表述为：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准备关于德国工作中的问题以及监督和考察军政府情报厅工作的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和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承担。1947年1月对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和修改。1月29日提交给中央书记的草案，删去了文件中的楷体字部分。

军政府宣传厅往往用琐碎的监管和行政手段来取代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活动的监督，从而犯了错误。尽管联共（布）中央指出必须利用德国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力量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宣传工作，但宣传厅利用各反法西斯的群众团体（工会、妇女和青年组织等）的活动很不得力，在他们中间没有充分开展政治工作。

宣传厅没有在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加强统一社会党队伍团结的工作中给予统一社会党以必要的帮助。宣传厅没能从根本上改进统一社会党的群众工作，首先是在大城市和大企业的工人中间，以及在妇女、青年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工作。宣传厅没有正确地估计柏林选举前夕的形势，低估了社会民主党人对群众的影响程度，没能组织有效的斗争来反对英美集团对柏林苏占区居民日益加强的影响。

联共（布）中央指出，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没有向德国报刊提供关于苏联的经济和文化成就及其旨在巩固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的对外政策的全面信息。

联共（布）中央确认，宣传厅领导机关的人选不能令人满意。宣传厅的某些处长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不能很好地分析当前的局势。

地方宣传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没有足够的业务技能。

苏联军政府宣传厅的工作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其基本原因之一是苏联军政府司令部方面缺少对宣传厅应有的领导。军政府和政治顾问方面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存在着重复和不协调的现象。

联共（布）中央决定：

1. 把苏联军政府宣传厅改组为情报厅，使其归苏联军政府军事政治委员会管辖。

规定情报厅利用各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力量，通过报刊、广播和其他手段在德国居民中间进行政治工作。

赋予情报厅实行监督和审查德国报刊、广播和出版社的任务。

任命_____同志为情报厅厅长，解除谢·伊·秋尔潘诺夫同志的这一职务。^①

2. 在德国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使德国进一步民主化，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根除法西斯主义残余，消灭希特勒主义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中的后果；

向德国居民解释为了建立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必须将德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非军事化进行到底；

向德国居民系统地解释苏联的对德政策并且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国和英国旨在对德国进行经济奴役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

为确保苏联实现在德国的经济利益而进行政治工作，并且向德国居民解释苏联军政府旨在恢复德国苏联占领区的经济和改善居民的状况的各项政治和经济措施；

阐述苏联国家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成就和优越性、苏联为争取巩固的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3. 情报厅在统一社会党和各反法西斯群众团体方面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帮助统一社会党争取工人阶级、农民，吸引半无产者和知识分子，加强党在各民主党派联盟中的主导作用，把它变成德国群众性的党；

^① 在1947年1月2~3日提交给中央书记的决议草案中，建议厅长职务的候选人为军政府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马卡罗夫，并在这一条中补充：确认秋尔潘诺夫同志为情报厅副厅长。在1947年4月25日联共（布）中央的决议中，责成库兹涅佐夫、亚历山德罗夫和希金于10天之内挑选一名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厅长，并呈报联共（布）中央批准。但没有见到有关执行这一决议的结果的文件，此后秋尔潘诺夫继续担任情报厅厅长。

帮助统一社会党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加强党的队伍的团结，开展党员的政治学习和编印马克思主义读物；

从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德国自由工会、德国自由青年团、文化协会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团体，并加强统一社会党对其影响；

帮助统一社会党巩固它在柏林工会组织中的阵地，广泛开展将要进行的工会选举的准备工作。

4. 情报厅在对待资产阶级政党（基民盟和自民党）和社会民主党方面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实现对各资产阶级政党工作的监督，积极干预它们宣传活动的內容，禁止其反民主的宣传，为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分子而斗争，发现并且支持这些党派中的先进分子，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内培养民主反对派；

揭露社会民主党领导政策反动、反人民的实质及其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附；

利用社民党内部的矛盾并帮助统一社会党实现与社民党基层组织 and 社民党普通党员的联合。

5. 情报厅应该特别关注向西部各占领区传播苏联的信息，坚决揭露盟国在其占领区内实施的反动政策。

苏联驻德国的情报部门对盟国驻德宣传机关提出的一切问题均应该及时地和坚决地做出反应，揭露其反动的和反民主的对德政策，反对篡改柏林会议的决议。

6. 责成情报厅从根本上改善关于苏联的信息，通过苏联在德国的报刊和广播电台解说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系统地介绍恢复被德国占领者所破坏的国民经济的工作情况以及苏联在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

为 此：

(1) 责成苏联情报局（洛佐夫斯基同志）认真地提高苏联情报局发往德国的材料的质量，为报刊和广播电台撰写文章应该考虑到德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苏联情报局就英美在德宣传的重要问题组织人力准备反宣传的文章；

(2) 建议塔斯社（帕利古诺夫同志）确保准时地向德国发送塔斯社的德文和俄文消息，消除传送苏联对外政策的消息迟于英美的现象；

(3) 责成全苏无线电广播委员会（普津同志）坚决地提高对德短波德语广播的质量，应考虑到德国国内当前政治局势的特点；

(4) 责成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凯梅涅夫同志）确保向设在德国的苏联文化宫提供能展示苏联人民生活的直观材料，经常向德国派遣苏联学者、演员、作家，宣传苏联的文化成就；

(5) 苏联军政府情报厅设立以下几个处：宣传处、报刊处、书刊审查处、工会处、反法西斯民主团体处、妇女工作处、青年工作处、德国自治机关工作处、文化处、无线电广播宣传处、组织监督处、信息处、讲座小组、干部处、总务处。

7. 国家编制委员会（麦赫利斯同志）在两周的期限内审查和批准苏联军政府情报厅的编制。在编制内设立三名副厅长的职务。

8. 将苏联军政府情报局和苏联军政府出版社德文图书部划归情报厅厅长直接管辖。

9. 为了加强对各省苏联军政府中的政治领导，增设省军政府主管政治的副主任一名，其任务是领导各省的政治处和情报处。

10. 责成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和宣传鼓动局在两周的期限内选拔20名业务能力强的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担任情报厅的领导职务和各省军政府主管政治工作的副职。

11. 请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分析研究德国当前政治的一切问题。

确定由书记处向政治局提出对德国工作的原则性问题。

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准备关于德国工作中的问题以及考察军政府情报厅工作的任务，由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和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承担。

12. 委派索科洛夫斯基、希金、马卡罗夫同志在一个月期限内制定出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工作规章并上报联共（布）中央审查。

13. 派出米·亚·苏斯洛夫和约·瓦·希金同志协助苏联军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期限为一个月。

№05111

苏斯洛夫提交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材料^①

(1947年1月25日)

威廉·皮克 (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

1876年出生于古本城的工人家庭。德意志人。毕业于人民学校。职业：细木工。

他是工人运动和共产党的老活动家，在创立“斯巴达克”联盟和共产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②他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一起工作过好多年，后来和恩·台尔曼在一起工作过。他担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和书记达十余年。

在希特勒德国被粉碎以后，他参加了恢复德国共产党和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的领导工作。作为工人运动的老活动家，在国内声名卓著。

然而，他现在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中，所起的作用与他的声望不相适应，还有与他作为党的主席的地位也不相适应。在制订和贯彻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路线方面，并不总是起主导作用，而是让位于格罗提渥和乌布利希。

他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开始政治活动的，在党内他担任一系

^① 该文件是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的。

^② 1918年11月11日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组织。主要领导人有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梅林、约吉希斯、皮克等。1918年12月30日联盟与其他左派组织联合创建了德国共产党，从而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决裂。

列领导职务。1895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到1916年；然后从1916年起参加“斯巴达克”同盟到1918年；从1918年到1946年参加德国共产党。

从1890~1905年在不同企业里当木工，同时积极参加不来梅统一工人党地方组织的工作，任不来梅地方自治代表会的代表。

1906~1910年任社会民主党柏林党组织的书记。

1910~1915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15年因革命活动被捕并被派往前线。

1916~1917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的创建和领导工作。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监禁，关在碉堡里，后摆脱看守逃跑。

1917~1918年侨居荷兰，为德国军队中的逃兵出版《战斗》报。

1918~1919年为“斯巴达克”同盟的领导成员。1919年1月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及罗莎·卢森堡在柏林被捕，后摆脱监管逃跑，然后又被捕，六个月后又逃跑。

1920~1929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普鲁士地方自治代表会代表。

1929~1935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国会议员。1935年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和德国共产党布鲁塞尔代表会议代表。从193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主席。

1935~1943年任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1943~1945年任在莫斯科的“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成员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主席。

1945~1946年，任在柏林的德国共产党主席。

作为1946年4月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代表，会上被选为统一社会党理事会成员和德国统一社会

党主席。

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成员）

1893年出生于莱比锡市工人家庭。德意志人。受过中等教育。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实际主持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机关的全部组织工作和行政工作。与苏联占领当局保持联系。一位能干的组织者，能够独立地分析复杂的政治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

过去犯过一系列政治错误。1927~1928年属于调和派；1930年在工会问题上流露出宗派主义情绪；后来在挑选和分配干部方面犯了近似于丧失政治警惕性的错误。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批评他是行政—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表现出个人独自解决实际问题的倾向而忽视其他领导人。这一点他迄今还没有摆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的集体领导制的障碍。

他受到来自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猛烈攻击。

1919~1946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08~191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联盟；1912~1916年参加社会民主党；1916~1919年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

共产国际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

1907~1915年在不同企业当细木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1915~1919年为德国军队的上士，参加反战运动。

1919~1923年为共产党报纸编辑，担任德国共产党数个州的州委书记。

1923~1924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书记。

1924~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组织部督察员。

1925~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工作人员、在莫斯科的附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29~1933年任德国共产党柏林-勃兰登堡州的政治工作领导人。

1933~1938年任在巴黎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领导人。

1938~1943年任在莫斯科的附属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3~1945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成员，“自由德国”民族委员会成员。由于瓦解希特勒军队有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令授予他卫国战争一级勋章。

1945~1946年任在柏林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作为1946年4月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和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的代表，会上被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理事会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奥托·格罗提渥（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

1894年出生于不伦瑞克省的一个工人家庭。德意志人。毕业于列伊勃尼扎学院、高等经济学校和大学。画家。

德国统一社会党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和有经验的记者，在国内享有声望，特别是在参加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前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在群众的压力下，尽管不无动摇，他还是赞成工人阶级的统一，赞成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联合为统一的党。

在实际活动中常常表现出摇摆性和矛盾性。举例来说，1945年11月在右派分子的压力下，提出必须保持社会民主党的独立性；

否认德意志民族对战争的责任；至今认为德国的东部边界尚未最终确定。

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混乱的和令人怀疑的论点。

1912~1946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任社会民主党省组织领导人十年左右，属于党的左翼。曾为国会议员。

1914~1918年在德国军队服役。

1918~1921年任医院收银处的职员，后来任保险处主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杂志及不伦瑞克报纸的工作人员。

1921~1925年任不伦瑞克省政府的内务部长、人民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同时担任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主席、自治市政府代表，后来是不伦瑞克省地方自治代表会代表。

1925~1933年任议会议员。

1933~1938年在汉堡和柏林做各种不同的工作。1938年被控企图恢复社会民主党而坐了一个月的牢。

1939~1945年在汉堡和柏林工作。

1945年6月被增补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并任德国苏占区社会民主党第一主席。

1945年7月签署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共产党和反法西斯党团建立共同行动委员会的协议。

1945年12月参加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扩大会议，最初在会上反对党的联合，后来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并成为制订党章的原则与目标的委员会成员。

1946年2月至3月重新成为建立统一社会党的坚决拥护者，并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反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

作为1946年4月社会民主党四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统一社会党成立代表大会代表，会上被选为统一社会党理事会成员和主席。

马克斯·费希纳（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成员）

1892年出生于德国里克斯多尔夫市的工人家庭。德意志人，毕业于民族学校。

统一社会党重要活动家，工人阶级统一的维护者，反对舒马赫和其他工人运动分裂分子的反动活动，在柏林工人中享有声望。

以前是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之一。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秘密中央的领导成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社会民主党的恢复工作，该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工作，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德国共产党的联合工作。

但是作为党的活动家，他有着一系列的缺点：爱慕虚荣、缺乏理论修养、政治上不够坚定，有时表现出对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不满。

1920年由于抗议Д. П. 格列茨公司生产委员会法令被开除出生产委员会。同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独立社会民主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后一度为党的理事会的成员。

1922年任新克利（柏林区）区会议代表和副主席。

1924~1933年为社会民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社会民主党报纸《公众报》的出版人。

1927~1933年任社会民主党柏林执行委员会第一主席、普鲁士地方自治代表会代表。

1933年7月被控叛国和参加社会民主党，被盖世太保逮捕关入监狱。1934年转送至奥拉宁堡集中营，同年4月被释放。

1935~194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秘密领导机构成员。

1945年6月在德国苏占区重建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签署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建立共同行动委员会的协议。

1945~1946年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主席。

1945年8月在中央理事会的秘密会议上发言，赞成社会民主党奉行东方政策。

参加建立统一社会党的组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把社会民主党右翼的代表赫梅尔和诺伊别克尔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

作为1946年4月社会民主党四十次代表大会和统一社会党成立大会的代表，会上被选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理事会和中央书记处成员。

No05112

苏斯洛夫提交的社会民主党的材料^①

(1947年1月29日)

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45年在德国西部地区恢复活动，比在苏占区晚几个月。当英占区允许社会民主党活动时，在柏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已经开始工作，其中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占主导地位。当时执政的英国工党给英占区社会民主党人以大力帮助，力图立即使他们与在柏林的党的领导相对立。以舒马赫为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组织的领导层打算将所有西占区社会民主党人联合在自己周围。

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后，舒马赫宣布拒绝服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这以后不久（1946年5月），舒马赫在汉诺威召开了西占区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建立了中央理事会和实际上领导党的中央委员会（基本上由英占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从侨居伦敦返回的舒马赫的亲密助手组成）。

该党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西德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在那里，正如社区和区自治机构选举所表明的，党是非常受欢迎的。然而，该党的领导模仿英国工党，采取了争取小资产阶级、官吏、知识分子等最广泛居民阶层的方针。该党为前纳粹分子，特别是青年中的纳粹分子广开大门，舒马赫宣布免去这些青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所犯的罪行。这样的结果使党相当快地发展起来：1946年9月30日

^① 该文件是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的。

党内计有 7500 个地方组织，联合了 63.3 万人。

在最近社区和区自治机构的选举中，赞同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在英占区占 36.7%，在法占区占 27.7%，在美占区地方自治代表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占 33%。

在柏林市会议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得票占 48.6%，居第一位。

在一些地方和省的地方自治代表会中，社会民主党保证了自己稳固的地位。在符腾堡—巴登、黑森、巴伐利亚的地方自治代表会的 380 个代表中，社会民主党占 124 人。顺便说，在英占区地方自治代表会上，社会民主党人在（区自治机构）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数仅在基督教民主联盟之后。

在宪法会议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代表委托书（南巴登、符腾堡和莱茵—法尔茨省）属于社会民主党。

在黑森、符腾堡—巴登、巴伐利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和其他地方的地方政府中，社会民主党主持工作或居于领导地位。在汉堡参议院 12 个成员中，有 8 个是社会民主党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从 1914 年起的德国经济发展，按党的经济顾问阿加尔茨的说法，看做是“资本主义经济向新的社会经济的转变过程”。党的另一个理论家弗里茨·塔尔诺夫则断言，“具有广泛计划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来到了”。该党认为自己的历史任务，正如弗里茨·塔尔诺夫所表达的，是对“（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给以恰当的领导，并加快这一进程”。在这个基础上，对德国工业的主导部门（煤炭、制铁、铸钢）实行社会化的要求，“通过将危害德国人民的那些人的大企业转变为公有制来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的要求，占据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目标和宣传鼓动的中心位置。

1947 年 1 月 9~11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理事会在慕尼黑的决

定确认了该党 1946 年 9 月 26 日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提出把工业社会化的要求作为最低纲领，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党人同意参加德国自治机构的工作并承担责任。

实际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做得却很少。社会民主党黑森地方组织（美占区）和除德国自由民主党以外的其他一些党，维护和实施宪法第 41 条规定的在黑森一系列工业部门实行的社会化。社会民主党的柏林组织在柏林市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社会化方案。该方案规定“对有利于德国人民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特别是康采恩和那些适宜国有化的参加康采恩的企业”。

社会民主党要求工业社会化的最终目的是拯救德国的军事—经济能力免遭毁灭，除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一要求还帮助社会民主党人积累了政治资本，即在广大群众的眼里，他们是作为德国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出现的。

在农业领域，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了农业改革的要求。这项改革将没收超过 100 公顷土地的田庄，但实际上大地主还存在，因为他们只是失去了部分土地，从他们那里没收的土地不是进行分配，而是准备出租的。

关于德国未来的体制问题，在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英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赞成德国的政治和国家—法律的统一。在党的汉诺威代表大会（1946 年 5 月）上他们确定的基调是，要求“德意志共和国应在被认为是民族形成基础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未来”。

正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次代表大会上，库尔特·舒马赫承认，“就是现在，在社会民主党的圈子里有反动的联邦制的拥护者”。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萨尔地区组织的领导人赞成让该州并入法国。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区组织的领导人（黑格纳）与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杰伊切商谈了关于由巴伐利亚、奥地利、匈牙利和符腾堡—巴登组成联邦国家的问题。社会民主党巴伐利亚地区组织的领导人

支持巴伐利亚宪法，而该宪法把德国看做是一个在自愿基础上把德国的专区和省联结在一起的联盟国家。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在对外政策领域也是不统一的。法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同意将萨尔区在实际上并入法国，而英占区和美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人却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领土改变。

舒马赫声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将为每一寸德国土地而进行政治斗争。”

有鉴于此，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将莱茵州和鲁尔州从德国分离出去”，尽管它不反对对鲁尔州实行旨在使德国无法在经济上重新武装自己的国际经济监督。然而，正如该党汉诺威代表大会的决议所说，这一监督应当“有德国民主力量参加”。

1946年1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反对法国政府在萨尔州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

1946年11月27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东威斯特伐利亚和利珀（英占区）区会议表示反对荷兰对德国的领土要求。

对于划给波兰的土地，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波茨坦会议的决定是暂时的，并坚持要收回德国的这些土地。社会民主党人的理由是，波兰无力开发奥德—尼斯河以东的地区。

德国社会民主党迄今一直在宣传欧洲合众国思想，并公开引用丘吉尔的论据。近来，通过在英国工党领导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欧洲这句口号，把这一思想伪装起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力图将共产党和统一社会党孤立在大劳动群众之外。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口头上不拒绝与共产党人合作，实际上坚决阻挠统一社会党的建立。赞成与共产党人联合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被撤职和开除出党，而由一些右派来代替他们。

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结成联盟，要比与共产党人或德国统一社会党结成统一战线好些，在北莱茵—威斯特伐

利亚、巴伐利亚、黑森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和柏林的市政会议上，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在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结为同盟。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英国工党党员的挑动下，持反苏立场。在社会民主党报刊上，在其工作人员的讲话中，都进行了公开的反苏宣传。苏联体制被称为极权体制，苏联驻德军政府的管理方式被抨击为纳粹方式等等。舒马赫在自己的纲领性讲话中反对柏林会议决议^①的下述内容，即首先涉及苏联利益的部分，如德国东部边界、战争赔偿、拆除设备等问题。为了推卸德意志民族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责，社会民主党柏林组织的主席诺伊曼直截了当地宣称，1939年8月23日的条约^②推动了希特勒向波兰宣战。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舒马赫及其助手去过伦敦后，更加紧了反苏宣传，但最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反苏宣传有所收敛。舒马赫在1947年1月12日慕尼黑的讲话中宣称，苏联不仅在政治上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且在文化上也是欧洲的一部分。在经过长时间宣传欧洲合众国要排除苏联的思想后，这是一个新的声明。这种宣传上被迫发生的变化，大概是由于即将在莫斯科讨论德国问题。

① 指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政府首脑商谈共同对德政策的柏林（波茨坦）会议。

② 指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秘密条约。

№05113

苏斯洛夫提交的统一社会党的材料^①

(1947年1月31日)

—

9个月前两个工人政党的联合^②在政治是正确的，也符合所有人的愿望。德国统一社会党已成为苏占区政治上的主导力量。现在工人群众的力量比1933年以前强大了，那时的数量是：

社会民主党	总计	100万人
德国共产党	总计	35万人
在德国两党共计		135万人

今天只在一个苏占区内德国统一社会党就有166.3万人，其中40万人是两党联合后入党的。

在苏占区选举时它是最强大的党。在德国工人运动史上，工人政党第一次在农民阶级中发挥了影响。此外，德国统一社会党对群众组织（工会、妇女、青年等组织）也有很大影响。

柏林是这种良好发展的例外，在这里，最终也没有顺利地实现联合。大约有20,000社会民主党人没有参加联合，这将为以后在

① 该文件是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的。

② 指1946年4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统一社会党。

柏林建立社会民主党打下了基础，这种发展的原因是：

1. 在柏林其他三个占领区的占领当局采取了反对联合的措施。
2. 在三个西占区，所有公开的报纸都进行了反动和反苏的宣传。
3. 由于上述两点的影晌，在柏林这两个政党的政治状况不像在苏占区那样。在苏占区，由于长期开展统一的活动而形成了合并，但在柏林，由于存在着德国共产党的宗派主义倾向和社会民主党沉重的传统包袱而没有开展统一的活动。

二

由于民主的建设和我们党的教育工作的发晨，逐渐加强了党的组织。这一进程的内容、规模和速度，暴露出缺乏业务熟练的干部。对党来说，严重的问题在于两个党的干部还没有完全相互融合在一起，这是由于：

1. 两个党从前的工作方法完全不同；
2. 还没有充分考虑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教训；
3. 因此党内的自我批评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4. 占领当局下属机构对党内问题某些愚蠢的干预起了有害的作用。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为完成各项任务挑选、发展和使用党的干部。这要求：

1. 克服在党的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公式化；
2. 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开展思想工作；
3. 在报刊和广播中，特别是在有助于培养新闻干部方面加强我们的工作。

三

上述缺陷在柏林发生了作用，这是选举结果不好的部分原因，^① 而柏林选举结果的主要原因在其他方面，诸如：

1. 我们的敌人在选举前的宣传鼓动中充满了沙文主义的攻击（东部边界、战争赔偿、战俘、占领等问题）；

2. 三个西占区占领当局阻挠德国统一社会党选举前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们公开支持其他一些党，特别是社会民主党；

3. 柏林的反动舆论展开了疯狂的反苏攻击（拆除设备、驱赶儿童、侵犯领土等），因此苏联占领当局的有益帮助就未能发挥政治作用；

4. 因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为管理机构提供了大批负责人员，从而把希特勒战争后果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它；

5. 在宣传鼓动方面，尽管该党在选举前的斗争中占有优势，但由于以上述原因，我们选举前的宣传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四

在苏占区德国统一社会党是主导力量，而在西占区，思想上倾向于我们的德国共产党就谈不上这一点。在其余三个占领区的德国共产党共有党员 27.3 万人。与 1933 年前的情况相比，这一人数有了很大的增长，那时德国共产党在整个德国总共有 35 万人，但是该党在三个西占区却无法起到与其党员人数相适应的有积极作用的

^① 在柏林市政选举中，德国统一社会党只得到 19.8% 的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得到 48.7% 的选票。

影响。其原因是：

1. 占领当局对德国共产党活动的阻挠（纸张供应匮乏，缺少报纸，禁止从东部输入社会主义的文献和书籍，阻挠组织会议和其他活动）；

2. 在西部和南部，所有政党都竭力通过直接地强烈地反对德国共产党的方式进行反苏宣传；

3. 由于这些事实，在西部还不存在实行积极的联合政策的条件；

4. 我们西部的党组织在工作中存在以下缺点：

(1) 在批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同时，没有一贯地、经常地贯彻统一战线的政策；

(2) 轻视一些大区的工会工作；

(3) 党的教育工作不力，其后果是发展干部不够；

(4) 未能完全克服宗派主义。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千方百计地在自己的工作中支持德国共产党的情况下，西部占领当局则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没收从苏占区运去的报纸和书籍，禁止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代表进入西部地区，以及其他等等）。

尽管困难重重，德国共产党在德国的西部和南部地区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表现为党在鲁尔州的矿工运动中，在工会参加决策的斗争中，以及在为创建生产委员会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在西占区的选举中，该党为自己争取到 305.8 万张选票。由于反动的选举章程，这一投票数字中有一部分将被取消议会代表资格。

五

在联合代表大会之后，我们最初设想的在德国西部和南部地区

进行直接的联合没有取得成功。由于西德的危机，由于舒马赫转向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结成同盟的政策和双占区的政策，同时拒绝与德国共产党的任何合作，我们认为在社会民主党内开展更为尖锐的意识形态斗争，并在企业和工会里开展争取统一的行动是可行的。当上述过程达到我们认为所必须的成熟程度时，我们认为一旦西占区占领当局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那么在西部地区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是适宜的。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地区的共产党及其 27.3 万党员将是基本核心。可以预计，如果对社会民主党工人采取正确的政策，我们将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争取到其中的约 10 万人。此外，根据企业里工人的情绪和主张来判断，我们还能争取到 10 万人。这样，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西部地区将有约 50 万人，这样，它和社会民主党大概就可以势均力敌了，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力量还在于它和苏占区统一社会党党员加在一起共有 220 万人，由此，应当考虑是否还允许社会民主党在东部地区存在的问题。

我们认为，我们要求允许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西部地区存在不会引起要求允许社会民主党在苏占区存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即没有必要在苏占区再允许建立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实行了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的联合，这是两党所有成员都一致接受的，建立新的社会民主党或德国共产党都是多余的。如果占领当局允许在苏占区建立社会民主党，那么德国统一社会党就要为反对这个党的分裂而进行坚决的政治斗争。

№05114

斯大林与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谈话纪要^①

(1947年1月31日)

参加谈话的有：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皮克同志、格罗提渥同志、乌布利希同志、费希纳同志、厄尔斯纳同志、苏斯洛夫同志、谢苗诺夫同志。翻译：沃尔科夫同志。

一、谈话总的情况：

1. 皮克同志热烈问候斯大林同志，并向他转达德国劳动人民对伟大帮助所表示的感谢；

2. 格罗提渥同志作了关于德国现状和德国统一社会党任务的报告，几乎逐字逐句对他们的三个文件^②作了解释，这些文件是昨天由我分发出去的；

3. 在报告过程中（翻译时），斯大林同志不断即兴插话和发表一些意见，莫洛托夫同志也讲了一些意见；

4. 斯大林同志发言的内容包括：对德国现状的评价，关于在即将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我们对德问题的外交立场，以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一些任务；

5.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提出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二、（奥·格罗提渥）报告的主要内容：

^① 这个谈话纪要是苏斯洛夫整理的，谈话时间是1947年1月31日21~24时。

^② 这三个文件是《关于和平条约与全德政府》、《我们对双占区协定的立场》和《我们对形势的估计》。

在卫国战争期间，您，斯大林同志说：“希特勒分子来了又走了，而德国人民和德国国家还存在。”您的话在德国人民中引起了很大的希望。

德国现状是严峻的，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之前，我们希望得到您的建议。

1. 和平条约或和平宪章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签订和平条约，因为和平条约：

(1) 为成立德国中央政府创造了条件，这个政府将保证履行和平条约，保证德国作为和平和民主国家的发展；

(2) 要求所有政党为和平条约承担责任，以限制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美国顾问）墨菲的建议，即盟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宣布对德国和平宪章，以代替和平条约，因为这会促使沙文主义的发展，危害民主化，使德国某些政党有可能推卸履行和平条款的义务。

2. 是否需要进行关于和约的全民投票？

我们从美国方面听到应当在德国对和平条约进行全民投票的建议。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全民投票，因为这样做会引起强烈的，特别是围绕东部边界问题的沙文主义运动和蛊惑宣传，破坏德国的民主化，并使德国的国际地位复杂化。

3. 德国方面谁来签订和平条约？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和平条约由德国中央政府签订。

4. 一些德国政党在统一国家问题上的立场。

社会民主党实际上维护联邦制。

基督教民主联盟也维护联邦制。

自由民主党赞成德国统一。

德国统一社会党是惟一赞成通过分散管理的德意志统一国家的

政治上的维护者。

5. 是否需要就统一国家问题进行全民投票？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这样的全民投票，认为这种全民投票会削弱德国的反动势力，有可能开展广泛的民主运动，而且德国统一社会党将作为德国人民民族统一的最积极的维护者出现。

我们期望在这种全民投票中取得成就，即努力做到在 5000 万张选票中为赞成国家统一争取到不少于 3000 万张的选票。

盟国方面将反对全民投票。

（斯大林）插话：“他们还反对德国中央政府，反对民主化，反对德国振兴，目的是不允许来自德国方面的竞争，竭力不让德国兴起，这就是他们的政策。”

6. 关于全德中央管理机构

我们认为在柏林会议的决议中提出这样的建议是适宜的，即不是建立“一些德国中央管理机构的重要部门”，这些部门相互平行地开展工作，而是建立一个德国的中央管理机构。（我说：“那么，这些管理部门就不建立了”。）

在柏林决议中规定的五个德国管理机构（财政、运输、通信、外贸和工业），应当作为德国管理机构的部门进行工作，还应增补经济计划部门、外贸部门和农业部门。

这是建立德国中央政府的第一阶段。

在苏占区还没有这种协调的管理机构，而在英、美占领区里设置了类似的管理机构。

如果在占领区建立这种机构，会不会加剧德国的分裂？不会，如果不拖延建立中央政府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加剧德国的分裂局面。

（斯大林）插话：“即使我们的伙伴不同意建立德国中央政府或中央行政机构，我们也支持这样做。”

7. 应当如何建立德国中央政府？

德国统一社会党赞成德国中央政府应由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并吸收工会参加，以使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推卸责任。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联邦制，反对从各联邦专区和占领区管理机构中选出代表组成中央政府。

（斯大林）插话：“你们赞成统一的德国、反对联邦制的立场是正确的。在反对联邦制的宣传中，你们提出了什么样的论据？”没等回答，（斯大林）就说：“现在德国的联邦制是一种手段，靠着这种手段，反动阶级力图保存自己的特权并摆脱社会主义。”

听了同志们支持建立由所有政党和反法西斯组织的代表，而不是由各联邦专区及类似形式的代表组成中央政府的理由后，（莫洛托夫）同志说：“联邦机构并没有得到全民的最后表决，而这里说的是要建立全德政府。此外，联邦机构也不是民主选举的机构，实质上是由占领者组建的。”

8. 关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之间的协议

德国统一社会党反对英美占领区之间的协议，认为这一协议目的是致力于为美国和英国资本家获取市场，为了出卖德国和奴役德国人民。

（斯大林）插话：“占领区的联合（美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叫喊），是占领者的联合，而不是德国人民的联合，这与德国人民有什么相干？”

关于国家的政治状况

为了国家的民主化要建立什么样的前提？

在各占领区是完全不同的。

消灭法西斯的斗争在各占领区也是完全不同的。

（斯大林）插话：“西德的法西斯势力的实力如何？

全民投票时他们可能占多大比重？

必须把积极的反动分子、卖身的纳粹分子与纳粹分子中的爱国分子区别开来，应当同前纳粹分子中的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应当把爱国的、正直的分子从他们中间争取过来。”

在苏联占领区进行了清理康采恩、大银行和法西斯经营的部门的工作，没收了大地主的土地。

在西部占领区则相反，竭力阻挠清理康采恩，大银行继续存在。没有触动大地主、军国主义的支柱。

进行反对纳粹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

这一斗争在各占领区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开展的。

9. 政党力量的相互关系

工人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得票比例发生了变化，与1932年相比，工人政党得票增长了10%。

	1932年	1946年
社会主义者得票	36.7%	46.6%
资产阶级政党得票	63.3%	53.4%

4970万选民的选票（指1946年10月20日在苏占区地方自治代表大会，1946年10月20日在柏林选举的投票，以及10月13日在英占区和法占区，1945年11月24日和12月1日在美占区所进行的投票）在以下各政党中的分配：

单位：千张选票

工人政党		资产阶级政党	
德国统一社会党	5071	自由民主党	5400
德国共产党	3059	基民盟	17634
社会民主党	14681	中派	1138
全力救援农民联盟	283	人民自由党	1405
其他团体	36	其他团体	965
总计	23131	总计	26543

根据我们现有的资料，各党的组织力量如下：

德国统一社会党	166.3 万人
社会民主党（包括柏林）	66.3 万人
德国共产党	27.3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仅苏占区）	约 18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美占区	约 40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英占区	约 30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占区	约 15 万人
基督教民主联盟总计	103 万人
自由民主党（仅苏占区）	15 万人

接着，同志们对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等进行了评述。

在评述社会民主党时报告人提出了该党的内部矛盾：

1. 国家的统一—联邦制，分离主义—欧洲合众国；
2. 国有化—社会化—工人参股；
3. 工人阶级统一—加深分裂，承认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

这些矛盾更加深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这些分歧又加深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提供了在社会民主党内部打开缺口以及争取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可能性。

（斯大林）插话：“也许要对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这些矛盾进行投票表决？也就是说，看居民喜欢什么？”

在西部最危险的是要确立社会民主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结盟的方针。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德国的民主发展，防止魏玛时代的结盟政策。因此，最主要的是要为工人阶级的统一而斗争，为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在企业 and 工会中采取统一行动而斗争。

10. 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状况

实践证明，两党联合是正确的。党在不断发展，联合以后增加了10万人，现在共有166.3万人，除柏林外，其他地方发展得都很好。

任务：把1600万人培养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我们还缺乏有经验的干部，前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人还没有结合在一起。

为了培养干部，建立了130所区级规模的政治学校，而在柏林建立了中央高级政治学校。

德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计有27.3万人，1945年底选举时获305.8万张选票，对比1933年前的情况，这样的数字是很大的增长，那时，德国共产党在整个德国共35万人。

占领当局对共产党的活动千方百计加以阻挠。

德国共产党没有为统一战线进行持久的斗争，许多组织轻视大区的工会工作，没有完全克服宗派主义。

（斯大林）插话：“在西部地区的社会民主党里有没有著名的左派领导人？”

舒马赫分子不让左派分子在社会民主党内部积极活动，毫不迟疑地把他们孤立起来，并把他们开除出党。

（斯大林）插话：“应当鼓励在西部地区建立左派社会民主党，也许舒马赫不让这些左派生存？”

从前我们曾认为需要让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在西部地区联合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但没有成功。在进行了一系列解释工作后，我们认为只有在占领当局承认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情况下，在西部地区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才是适宜的。

（斯大林）插话：“如果在西部地区有一个统一社会党，那就太好了。在那里，只有德国共产党代表你们，那里的居民看了德国共产党的纲领，而民主无产者一类人则违背和破坏了这个纲领，这吓坏了许多工人。对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在那里有统一的社

会主义政党更为有利，这便于使大多数劳动人民了解社会主义，不必追求人数。”

有人说：“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例如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4月和10月期间）。”

我们认为，我们在西部地区要求允许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会引起在苏占区要求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问题。我们的立场是，没有必要允许在苏占区建立社会民主党。

（斯大林）插话：“应当允许。”

“怕什么？要允许它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批评。”

“对此不需要害怕。”

“你们应该对宣传进行监督。”

“用占领当局禁止的办法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如果没有占领当局你们就无法坚持反对舒马赫的斗争，那么你们是虚弱的。”

在进行拆除设备、战争赔偿引起严重问题，以及困难的经济状况等条件下，党开展工作很困难。

（斯大林）插话：“是啊，党很困难。”

三、维·米·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

对德和约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看来，这个条约要拖延下去，因而，建立中央政府也会拖延。

因此，在波茨坦协定基础上提出建立这些部是适宜的；不仅仅是波茨坦协定中规定的五个部（尽管这些部还没有建立），还要建立其他的部。除了军事部和安全部，其他部的建立不要拖延到建立中央政府的时候。

在建立这些部的同时应建立中央联合机构。

大概，我们的伙伴会反对这么做，但是在三月会议上应当提出

来。^①

这将是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的一个阶段，成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有波茨坦协定。

四、[斯大林的讲话]

英国和美国非常害怕德国作为国际市场竞争者而崛起，一切都源于此。他们想有一个在自己监督下的国际市场，保证商品的垄断价格。

他们认为，既然德国已经战败，这就意味着不允许它复兴并进入世界市场。他们是从这些前提出发的。

因此，所有可能加快德国发展的事情，盟国都拒绝接收。

以联邦制和分离主义代替德国的统一，因为这意味着削弱德国，而德国被削弱就将难于进入世界市场。

为削弱德国，就不应让它建立中央政府。

我们的观点相反。对人类有利的是让德国和日本进入国际市场，那样的话，商品价格将会低廉，劳动人民将首先因此而受益。

美国垄断集团的霸权控制意味着高价格和劣质商品，这对人类是无益的。

要使德国站起来并进入国际市场。

不能把德国及其 7000 万居民从历史中勾销。

应当考虑到，如果不让德国进入世界市场，它就会衰弱，而它的居民就会贫困，整个欧洲是需要商品的。

德国需要振兴还因为，如果德国不站起来，不走上世界舞台，它将成为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和复仇主义倾向的土壤。此外，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同情德国的无产阶级，他们备受折磨，我们希望德国的无产阶级生活得更好一些。

^① 指莫斯科四国外长会议。

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没有完全的联合，就不可能有经济的统一。单纯的经济联合就只能是占领者的联合。

中央政府建立得越快，德国的恢复也就越快。

德国联合的口号应当在你们手里。

如果不能在短时期内争取建立中央政府，就需要（这是最坏的情况下）在苏占区里联合起来。

实际上，我们的伙伴希望有四个德国存在，并千方百计地隐瞒这一点。

我们的方针是这样的：应当建立有资格签署和平条约的中央政府。

我们再也不提出拆除设备的要求了。军队将缩编，对他们的供应也会减少。我们将不催促战争赔偿，这一点可以延缓。这样，将为改善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创造前提条件。

五、各种问题和意见^①

能否指望在东部边界有一些小的修正？

“恐怕不会有任何结果。”

交换了关于乌泽德岛西部的意见。^②

关于召开德国所有政党代表的协商会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可能性，您有什么想法？

“应当摸一下底，以免你们的党在会议上陷入孤立。我们的伙伴会拖延签订和平条约，并将指责是我们在拖延。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签订和平条约就必须建立中央政府。”

什么时候开始进行全民投票的活动？

“应当找到开展活动的理由。”

^① 根据苏斯洛的记录，无法确定这些问题是谁提出的，是谁答复的。

^② 乌泽德岛在奥德河出海口。

关于战俘问题

已经接收 12 万人。^① 妇女们要求继续遣返。

我们想加强对战俘的民主教育。

“请提供一些德国人，让他们进行政治工作。”

在战俘营里有一些民主分子，但没有充分加以利用。

我们希望联共（布）中央过问这一问题。

“联共（布）中央的负担太重了。”

我们请求让受过培训的反法西斯战俘在战俘中进行宣传，我们还请求根据反法西斯分子的名单派几百人回到德国。

“我们会派的。”

^① 这里是指 1946 年夏季到秋季从苏联遣返的德国战俘。

№05115

苏斯洛夫和科罗特凯维奇关于统一 社会党代表团工作的报告^①

(1947年2月12日)

绝密

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威·皮克同志、奥·格罗提渥同志、瓦·乌布利希同志和马·费希纳同志，还有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弗·厄尔斯纳同志于1月30日抵达莫斯科，并于2月7日飞回柏林。

1月31日约·维·斯大林同志接见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谈话持续了三个多小时，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对接见表示满意，对斯大林同志充满了敬佩之情。从克里姆林宫返回后，奥·格罗提渥对谈话的总的印象是这样说的：“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者，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之父。”M·费希纳说：“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肩负着世界的命运。”

格罗提渥在那天晚上说：“好吧，我们回到柏林就着手扎扎实实地工作。”

在莫斯科逗留的一个星期中，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大克里姆林宫和兵器陈列馆，参观了国立特列季科夫画廊、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以及该工厂的文化宫和选民区、列宁博物馆、革命博物馆和约·维·斯大林纪念品展览会、国立列宁图书馆，并游览了地铁；两次到大剧院观看了戏剧《纨绔子弟》和

^① 该报告是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等人的。

在大剧院分院上演的歌剧《五月的夜晚》。除此而外，还给客人们（在他们下榻的别墅里）放映了苏联电影：《宣誓》、《列宁在1918》、《夏伯阳》、《纳西莫夫海军上将》、《石头花》、《苏维埃的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红色十月〉集体农庄》。

2月3日，在参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就企业里党和工会工作的问题与该厂的党委书记列维金同志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谈话。2月4日，应皮克和格罗提渥同志的请求，苏斯洛夫同志向他们讲解了联共（布）的组织原则，联共（布）中央机关、党的州委会和党的区委会的结构，以及党的机关的实际工作。谈话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在以上谈话过程中，皮克和格罗提渥同志就党的实际工作提出了很多问题，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作了记录。

应该指出，在参观博物馆、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列宁图书馆，游览地铁，以及在剧院观看戏剧和看苏联电影时，威·皮克对这一切反映都很活跃。皮克多次说，尽管在莫斯科住过很久，现在参观这一切，兴趣仍不减当年。与威·皮克相反，乌布利希表现得兴趣较少。

奥·格罗提渥对所有这一切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在参观博物馆，游览地铁，参观列宁图书馆等时，他对一切都很着迷，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并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之情，他的这一切表现使人感到他很真诚。在参观地铁后，他沉思了片刻说：“是的！这是真正的文明。这一切只有在这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可能存在。”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兵器陈列馆后，格罗提渥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了解布尔什维克是怎样破坏文化珍品的了。”

格罗提渥对苏联的选举制度和社会主义竞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非常认真地了解了选民区，仔细地观看了宣传画。他请求给他翻译写有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自传

以及选举委员会决议的宣传画的内容。格罗提渥热情地赞誉了我们的选举制度和选举前的鼓动工作。他说：“这是真正的、具体的鼓动，甚至连候选人的自传都公布出来了。很遗憾，在我们那里，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了。我们那里是直接要求投票赞成这个或那个政党，而谁是候选人这一点经常被忽视”。

当问到选民积极性的问题时，选民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位妇女回答说，选民们亲自去投票，对此她并不担心，格罗提渥很满意地说：“这真是好极了，而在我们那里，不得不拉着选民去投票。”

在参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的一个车间时，格罗提渥在一块黑板前停下了，黑板上写着社会主义竞赛的责任项目，他请求给他逐条翻译这些项目，并非常认真地听完了翻译。

格罗提渥对在博物馆里、工厂和剧院里遇到的人们表现出了最大的兴趣。在特列季科夫画廊时，他聚精会神地观察大厅里的人们，并非常满意地发现，来参观特列季科夫画廊的有各种人——工人、军官和青年学生等等。他还注意到，很多年轻的姑娘在笔记本上记录了画的名称和画家的名字。格罗提渥本人就是个画家，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一点。他表达了自己的赞赏之情，说我们这里如此众多的人这样热爱和珍视他们所能接触到的艺术。

格罗提渥在走过列宁图书馆的一些阅览厅时，特别注意到读者数量很大，并且有各种各样的人。走出图书馆时，他说道：“非常出色，整个俄罗斯都在学习，整个俄罗斯都在工作，都在创造。”

在格罗提渥的一举一动里可以感觉到，他在深深地思考着所有看到的和听到的。电影《宣誓》、《列宁在1918年》和《夏伯阳》，他是第一次观看，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格罗提渥和皮克在交谈对这些影片的观感时，说道：“我们看到，共产党员是如何善于领导群众，引导他们跟自己走，这是我们德国人现在所不足的地方。”

马·费希纳与格罗提渥不同，他不露声色，小心谨慎。他很少对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意见，常常只说一些一般的话：“是的，这很有趣”，“好”，“很喜欢”。在谈话时只有涉及德国事务时他才介入。在吃饭时，当皮克和格罗提渥频频建议举杯为苏联、为苏联人民、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而干杯时，费希纳一次也没有建议举杯。

下面的事实很有意思：在克里姆林宫谈话以后，费希纳在深夜洗澡时说：“今天我更换了改良主义的旧内衣。”很难说，他这是心里话还是装装样子而已。

在谈话中，皮克、格罗提渥、乌布利希和费希纳常常谈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及其首领舒马赫。在这些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到皮克、格罗提渥、乌布利希和费希纳都非常仇视舒马赫，而且他们不仅是作为政治敌人仇视他，而且作为个人也仇视他。费希纳谈了自己对舒马赫个人的恶感，把他描述为一个有反常嗜好的人（有吗啡瘾的人等等）。不过，鉴于有可能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占区活动，他们明显地表现出担忧。乌布利希对此强调说，“首先要巩固我们的队伍。”他特别担心地说，一旦允许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占区活动，大概舒马赫就迁到柏林来，他将从这里领导反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斗争。

№01953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工会选举的结果
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3月5日）

……1947年2~3月柏林的工会选举是在各盟国军事当局之间以及德国各政党之间为争夺在工会中的影响而进行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下进行的。

英美和法国当局在1946年柏林工会机关选举中遭到了失败，为了在1947年选举中进行报复，也就是保证对工会的领导权，使他们有可能在工人中间实施自己的反苏政策，不惜采用强化其影响，甚至直接干预工会内部事务的政策。……

结论和任务：

1. 1947年的工会选举再一次表明德国工人阶级要求工会运动的统一，要求加强自己的组织以便与国内日益增长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选举还证明德国和外国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当中的代理人正在进行着猖狂的活动。

2. 工会选举以工会运动统一的拥护者的胜利和所谓工会反对派^①中的分裂分子的失败而告终，尽管社民党及其工会政策对工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过低估计在盟军联

^① 1946年出现在柏林的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中的独立的工会反对派，是由德国社民党人组成的。1949年工会反对派成为西柏林工会的独立组织，1950年并入了德国工会。

合卫戍司令部批准选举条例时苏联观点的胜利，这对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是一个有利条件，同时，这种有利条件也加强了统一社会党的地位。

3. 选举促进了工会进一步民主化和工会会员，特别是工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把一批新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推上了领导岗位，为进一步开展德国的民主化、保护工人和职员利益、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而加强了工会。

4. 工会选举暴露了统一社会党和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在争取工人阶级的工作中的重大缺点，暴露了宣传机关在监督和指导统一社会党在组织群众工作上的缺点。

这些缺点表现在：

- (1) 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机关和工作人员对工会不够重视；
- (2) 忘记了在工人和职员中间，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
- (3) 对个别区的企业和机关中工人状况和情绪缺乏具体的了解；
- (4) 在一些企业和机关中，统一社会党的劳动党小组组织涣散，在许多企业中没有建立统一社会党的小组；
- (5) 揭露工会运动的分裂派的宣传工作脱离了维护劳动者日常需求的斗争；
- (6) 忽视了“工会反对派”对工人的影响，在组织和政治方面，揭露他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5. 柏林工会选举表明，如果苏联军政府的各个机关同心协力，相互合作执行其政策，它的政策就会强而有力，并且能够发挥效力。

选举再次造成英美当局工会政策的失败，并在一定程度上使英美当局各自对德国工人阶级施加影响的不同利益和策略之间的对立

尖锐化了。然而，应该预料到英美当局将会活跃起来，首先是给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的工作制造困难，并推动“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活动。

6. 不能认为统一社会党在选举中的胜利是全面的，因为“反对派”还没有被彻底粉碎，它在一系列大型企业中，在五个生产工会中还保留着自己的影响，它还企图重新组合力量，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向，通过生产工会和工厂委员会，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给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以决定性的打击。

7. 统一社会党为了在工会领导机关中巩固自己的阵地，没有任何理由自满，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自己所有组织的工作，首先是按照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在生产企业，特别是在大型企业的工作：

(1) 加强与垄断资本的斗争，反对使德国经济处于从属地位，把它变成英美资本的附属物；

(2) 进一步动员工人阶级把战犯和上层纳粹分子的企业，以及康采恩和垄断企业移交给民主自治机构；

(3) 在成为人民财产的企业里改进工作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4) 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的阶级觉悟，揭露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意识，巩固作为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工会；

(5) 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基础上，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粉碎“工会反对派”；

(6) 在各生产工会中加强工作并且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阵地；

(7) 准备并参加生产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确保统一社会党在生产委员会，特别是在大型企业中的胜利；

(8) 坚决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改善劳动者生活日常物质条件而斗争（签订工资合同、劳动保护、同工同酬、提高业务技术、休假和组织休息、社会保险等等）；

(9) 积极参加全德统一工会的建设，同时坚持德国各工会团结

统一的原则。……

8. 苏联军政府必须克服忽视工会工作的现象，特别是在苏联股份制的企业中，按照德国的法律，为工会和生产委员会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苏联军政府的各宣传机关应组织对德国工会活动的监督，以便在工会中更加巩固真正民主的传统，为加强工会对工会会员和全体德国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教育而斗争，促进工人阶级的团结及建立全德统一的自由工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01988

米隆诺夫和卡秋什金关于考核苏驻德军政府
领导干部给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摘录）^①

（1947年4月8日）

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武装力量干部处在1946年11~12月对苏联驻德军政府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考核。……

军政府司令部对宣传厅、《每日评论报》编辑部、出版社和情报局的干部关注不够。……

宣传厅现在的编制不完全符合宣传厅当前面临的任務。宣传厅旧的编制中任命从事在德国妇女和青年中间工作的人员甚少，没有指导机构、干部处、组织监督处和反宣传处。因此，对各省宣传机关活动的监督很不得力。

宣传厅创建于1945年10月。它的干部是武装力量总政治部配备的。选择干部时确定工作人员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通晓德语。选择干部这种片面的做法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宣传机关配备的大多数是在党的政治工作中缺少经验的年轻干部。所有的宣传机关共有1196人，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892人，其中548人（61%）是在卫国战争年代入党的。从民族状况来看，这批干部配备得特别不合适。全体工作人员的25%是犹太民族的同志，而在某些机关

^① 米隆诺夫，H. M.（1906~?），1946年8月起任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副局长。卡秋什金，И. Г.（1906~?），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武装力量干部处处长。库兹涅佐夫，阿·阿（1905~1950），1946~1949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和干部管理局局长。

里比重还更大。在《每日评论报》编辑部里为 36%，在勃兰登堡省宣传处里达到 40%，在德累斯顿达到 75%。这种状况在被感染上反犹太主义的德国条件下显然是不正常的。……

应该特别指出，柏林市苏占区各卫戍司令部宣传工作人员的挑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那里不仅要在德国人中间开展工作，而且要与盟军一起讨论和解决对大柏林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监督问题。……

宣传厅厅长秋尔潘诺夫同志是个有知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作人员。在德国人中间有个人威信，受到欢迎。可是由于组织能力不强，无力照顾到工作的各个方面。对工作人员不了解，不研究，也不培养他们。解除秋尔潘诺夫同志这一工作，让他留任副职是适宜的。

宣传厅副厅长兹多罗夫同志不能胜任工作，没有威信。最好让他担任省级宣传处处长的职务。

宣传厅的名称是不恰当的。首先，它没有反映宣传厅的工作内容。其次，这个名称给盟军提供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宣传的口实，因为他们把类似的机关叫做监督机关。再其次，这个名称引起德国人的反感，我们对此不能不有所考虑。因此宣传厅的名称需要更换。

按照我们的建议，宣传厅新的编制应该设立干部处以及其他一些机构，这是在德国妇女、青年和德国自治机关中开展工作所必须的，为了改进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干部工作，我们认为必须：

……

3. 委托苏联武装力量部总政治部主任（希金同志）在 1947 年 4~5 月份向苏联军政府宣传机关派遣必要数量的政工人员以代替不称职的人员。

4. 建议苏联武装力量部总干部局（戈利科夫同志）向苏联军政府派遣必要数量的军官以替换在工作中名声不佳的人员。此外，

1947年第二季度，向军政府宣传机关派遣30名德语译员。

5. 把军政府宣传厅改名为情报厅。^①

6. 建议苏联军政府司令部成立翻译培训班，学员总数为50人。

^① 该条没有列入1947年4月25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关于米隆诺夫和卡秋什金报告的决议草案。

№01954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市社民党第四次 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4月29日）

……今年4月25~27日，举行了柏林市社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结论：

1. 社民党领导中一部分最反动的社民党工作人员在全会上取得了胜利。这主要是因为统一社会党在社民党基层、工厂和区组织中缺少正确的日常性工作，改正这个缺点是统一社会党主要的和刻不容缓的任务。

2. 英美当局和诺伊曼集团^①从奥斯特洛夫斯基辞职的事件^②中汲取了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与统一社会党对社民党党员的影响进行斗争，并且挑选出经过考验的最反动的中高层领导干部。因此，统一社会党做进步的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的工作时，必须向他们提出更加明确的任务，帮助他们巩固自己在社民党中的地位，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建立基地。

3. 统一社会党的宣传应该利用社民党的一系列纲领性声明（“没有改良主义的、基督教的或国家的社会主义，只有一个社会主

^① 1946年3月联合在诺伊曼周围的德国社民党党员，他们反对社民党与共产党的合并。1946年4月7日他们成立了大柏林社会民主党。

^② 1947年4月17日，柏林社民党领导人对社民党员、大市长奥斯特洛夫斯基投了不信任票。在此之前，奥斯特洛夫斯基与统一社会党和苏驻德军政府建立了联系，以便于采取措施帮助柏林居民度过寒冬。

义，就其本质来说，它是革命的社会主义”——摘自罗伊捷尔^①报告中的声明——及其他)，在做社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时揭露它，利用它。

4. 统一社会党在实际组织工作中应该利用社民党暴露出来的弱点，例如关于党内自由民主的宣言与社民党领导人强制推行反动路线之间的矛盾；舒马赫分子活动的不得人心；他们的方针摇摆不定；在群众组织中相对薄弱的影响等等。

5. 必须加强理论解释工作，特别是揭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平等等口号，普及正确的民主观念。必须编写反对舒马赫分子的观点鲜明和通俗易懂的鼓动员手册。

6. 必须指出统一社会党在工作中有一定的进步，给诺伊曼集团造成了不小的困难。必须充分利用社民党的防御立场，坚持不懈地同它争夺无产阶级群众，以实现完全的转变。为此，统一社会党目前应该把力量集中在市政厅和市议会的工作上，首先应该消除近几个月来市委和党团在反对舒马赫分子的斗争中所犯的错误和动摇行为。

7. 应该进一步揭露舒马赫分子就是反苏分子，列举他们在西部柏林的活动，更坚决地要求他们对其一切试图反苏的活动承担责任，并在宣传方面详细地制定这些措施。

8. 柏林社民党与舒马赫派组织的合并，可能需要得到盟军卫戍司令部的批准。然而，阻止这一举动未必有意义，因为这一举动在形式上把柏林社民党组织与将来可能出现的苏占区的社民党割裂开来，也就是说，建立全德性的政党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此外，柏林社民党组织如今也要对西部占领区社民党的行为举止负责，而迄今为止它拒绝承担全部责任。

^① 罗伊捷尔，艾恩斯特（1889~1953），时任大柏林第一市长，1948年任西柏林第一市长和执行市长。

№01955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十二届全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7月4日）

……今年7月3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会。会议议程中有下列问题：

- （1）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结（报告人马克斯·费希纳）
- （2）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治准备工作^①（报告人奥托·格罗提渥）
- （3）在反对联邦制、争取建立德国中央管理机构斗争中的党（报告人瓦尔特·乌布利希）……

结论：

1. 中央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会是在非常热烈的气氛中召开的，讨论基本是高水平的。

2. 奥托·格罗提渥的报告给与会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证明他进一步迅速地转向我们方面。然而，应该指出这个报告包含着一系列不正确的论点：过分夸大了反苏战争的威胁，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做了不正确的评价，认为它现在是垄断资本的基础，是工人阶级队伍里的破坏者，没有充分地把领袖人物和群众区分开来。

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1947年9月20~24日召开的。

3. 慕尼黑会议问题^① 仍然是党内争论的对象，况且党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西部各占领区的共产党员，客观上受到英美宣传的影响，而他们本人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4. 讨论了进一步开展为西部各占领区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建立统一社会党而斗争的方法问题，讨论的过程表明，西部各占领区的工作人员对前途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对下一步在这方面该怎么办的问题，最后也没有得出具体的和令人满意的答案。许多共产党的活动家在私人谈话中也表现出对中央书记处的不满，指出他们自作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指示，不仅与东部占领区缺少行动配合，而且各区之间，甚至各地段之间也缺少协调，而目前由于英国和美国占领区在经济和政治上实际已经合并，这种协调配合就显得尤其必要。

5. 洛哈根^② 的建议值得注意，他建议在西部建立争取德国统一斗争委员会，吸收各党派的活动家和无党派人士、站在国家统一立场上的科学艺术工作者参加。这是特别需要的，因为西部各党派之间没有其他形式的合作，而对于统一问题，在几乎所有各党派内部都存在着分歧。

6. 党内，特别是在基层组织，由于食品的困难而存在着强烈的反对农民的情绪，极不理解苏联军政府对待农民的政策，而苏联军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农民的额外出售以物质奖励，等等）则被党组织所拒绝。

7. 在党的组织中，甚至在党的工作人员中间，滋长了这样的

① 慕尼黑会议是由巴伐利亚总理Γ. 艾哈尔特倡议召开的德国四个占领区政府首脑会议。1947年6月5日东部占领区的代表不同意将德国统一和建立中央政府列入会议日程，由于没有找到一个折衷方案，他们退出了会议。

② 艾伦斯特·洛哈根（1897~1971），1946年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成员、莱比锡州委会第一主席。

情绪，认为“金元帝国主义”具有无限势力，有可能获得美国贷款来恢复德国经济。统一社会党的某些领导人中间也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即宣传苏联将取得好收成，目的是唤起人民的期望，认为有可能从苏联为德国获取粮食。

8. 在讨论第二次党代会的决议草案的过程中，非常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希望，即要求把党对东部边界、对拆迁设备、对挂名的纳粹党员、对个人自由的态度的条款加进去。

9. 讨论代表大会决议草案时，还发现在党内对一系列理论问题，特别是对东部占领区建立的制度是“人民民主”还是沿着建立“反法西斯的民主共和国”方向的发展这个问题缺乏明确的认识。

10. 决议的文本经全会专门选出的委员会最后通过以后，发给党的基层组织讨论，因为它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宗旨》的补充。

我们的机关将协助统一社会党基层、区和省的组织准备9月代表大会，并就提交的决议开展理论上的讨论，从意识形态方面克服舒马赫主义和宗派主义。

决议草案最后定稿将寄给您，关于讨论的进程我将每月专门汇报两次。

№01956

**秋尔潘诺夫关于检查统一社会党萨克森专区总结
选举运动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7年8月9日）

……呈上检查德国统一社会党在萨克森区总结选举运动过程以及各情报处、科协助德国统一社会党筹备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工作总结结果的报告。

检查是由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工作队在德国自治机关监督处主任近卫军少校留利克领导下进行的。

检查结果如下：

一、萨克森专区统一社会党的状况

1. 今年6月和7月，寄到本专区各地的反苏和反统一社会党的传单、小册子和信件猛增，其内容主要是在边界、战争赔偿、拆迁设备、民主改革等问题上破坏苏联在德国的威望，也破坏统一社会党的声望，说它似乎无力解决德国面临的问题。最近一个时期，出现了号召在1947年8月20日举行起义的传单。

2. 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易北河社会民主党地下分部”（许多传单上是这样署名的）领导的，使本区统一社会党地方组织内部的地方舒马赫分子以及托洛茨基分子猖獗起来。他们的活动变得更加公开、更加无耻和更具有挑衅性，并且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各种形式。

例如：

（1）混在统一社会党省理事会里面的著名舒马赫分子——德利

奇、麦斯纳和舒斯特尔企图利用今年7月4日召开的统一社会党理事会全会扩大会议（讨论进行总结选举运动的计划），把关于德共与德国社民党合并“过早”问题的辩论强加于萨克森专区统一社会党组织，他们说这次合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统一社会党内部“没有统一，这都是共产党员的过错”，统一社会党“不能影响西部各占领区”。

（2）统一社会党德累斯顿市委书记处成员麦耶尔（他也是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和市委理事会成员霍恩由于不同意统一社会党在反对舒马赫派斗争中的强硬路线而提出辞职。许多公务人员（前社会民主党员）拒绝在党组织总结选举会议上做报告。施托尔贝格区区长棱奇（前社会民主党员）这时宣称：“在开姆尼茨，一个报告人遭到喝倒彩，我不愿意像他那样。”……

上述的一切在施托尔贝格、兹维考、奥沙茨和格罗森海因等区引起一系列统一社会党的工作人员放弃自己的职务，拒绝被选进党的领导机关，甚至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自己妻子的名下。在齐陶区党校，所有的党员都拒绝拍照。

这也影响到党的发展。萨克森专区统一社会党人数的增长，在4月份为10000人，5月份为8000人，6月份为5000人，在个别区下降幅度更大：施托尔贝格区5月份接受了339名新党员，而6月份仅有2人。

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退党的人数猛增，特别是在更换党证的时候。全专区到7月为止，每月退党的平均为500人。7月上半月，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在统一社会党里萨市铁路局生产小组中，23名前社民党党员拒绝领取新的党证。这类事情在所有的区都有发生。所有不愿意更换党证的人只有一个动机——“不久就会在苏占区批准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党，我们要参加这个党。”

3. 舒马赫分子如此猖獗，而且没有与之斗争，这就在相当一

部分统一社会党党员队伍中播下了缺乏信心的种子，严重地影响到与筹备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相关的党的会议思想水平的降低。反苏言论很少遇到与会者的驳斥。这又进一步使反对势力鼓干劲来发表挑衅性言论。在莱布尼茨（兹维考区）一次地方小组会议上，前共产党员迪特里希发表了纯粹托洛茨基主义的言论，攻击苏联“忘记了国际主义团结”，称赞美国人履行他们许下的诺言，批评苏联军政府“不履行”统一社会党一月公报中所阐述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谈话中许下的诺言。他煽动会议承认统一社会党的对外政策是不正确的。他的讲话得到一片掌声。

在迪特里希之后，另一个统一社会党党员宣称：“战争时期说，俄国人是作为解放者而来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领土划到俄国人那里去了。”在一系列会议上，发言者攻击党的领导者“对待苏联军政府太手软”。

在梅丁赫斯村（格罗森海因区）一次地方小组会议上，统一社会党党员汉斯证明说，苏联没有任何社会主义，而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在里萨市菲克尔和费斯尔特尔造船厂统一社会党小组会议上，在格罗森海因邮局，在德累斯顿、齐陶、开姆尼茨的一系列会议上，发言者攻击苏联军政府“把一切都从德国运走了，让德国人饿死”，要求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站出来，不仅保护西部的国界，而且也保护东部的国界。有的发言为德意志民族辩护，在提到战争及其后果时只指责希特勒。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发言称赞“马歇尔计划”，批评苏联退出巴黎会议会场，对德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统一的口号持怀疑的态度。

4. 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区委和州委的职员没有经过良好的训练，没有用批判上述言论的论点武装起来，对统一社会党内部肆无忌惮的反动势力没有给予应有的还击。最好的情况是，他们听到反苏言论之后警告说，“这不会有好结果”。……

5. 萨克森专区统一社会党理事会和统一社会党各区委面对舒马赫分子反苏宣传的新浪潮，面对会议出现如此的思想水平，显得惊慌失措。统一社会党理事会主席柯依直截了当地宣布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未曾料到的。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干部。”统一社会党州委书记处成员格罗塞和施利布斯谈到这样一种担心：党内对领导人不信任的危机正在增长。劳什把这种情况归纳为“由于客观原因而产生的领导与党员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紧张状态”。

州委的惊慌失措还表现在：他们没有制订批驳舒马赫分子宣传的论点，也没有动员党员积极分子克服目前组织中出现的状况，却在州委会下组建了一个专门“与舒马赫分子斗争”的科，把它当作救命的稻草。统一社会党州委和区委的惊慌失措还表现在他们对会议的组织问题、准备问题和人选平等问题放任自流。很多组织中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利用了这一点。譬如说，在德累斯顿市选举产生的209个生产单位和街道党小组组长中，有117名是前社民党党员，60名是前共产党党员，32名年轻的统一社会党党员。包岑区统一社会党区委未来的组成方案规定，区委委员32名，其中只有3名工人。拟定中的施托尔贝格区统一社会党区委新的成员中，多数是前社民党成员，其中有6名嚣张的舒马赫分子……

我采取了如下措施：

1. 建议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立即有效地帮助萨克森专区统一社会党理事会改变统一社会党的组织状况，特别是更好地筹备召开统一社会党代表会议。

2. 我要求萨克森专区情报处所有的工作人员及处长改变自己对各科的领导和对统一社会党工作的监督方法，更经常地下到各个区去，就地给区情报科和统一社会党以实际的帮助。……

№01957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
理事会第十三届全会给联共（布）
中央的情报汇总（摘录）

（不晚于1947年9月9日）^①

……今年8月20~21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三届全会。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

1.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
2. 各专区理事会主席关于讨论第二次党代会决议草案的总结报告。
3. 关于食品供应状况。……

结论：

1.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三届全会是在非常热烈的气氛中进行的，但也反映出统一社会党各专区组织的领导人和中央理事会许多成员没有认真地分析相当一部分党员消极，基层党组织讨论决议草案的水平低下，以及特别是大城市出席会议人数稀少的原因。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原则上得到了所有党组织的一致赞同。

2. 各省和柏林的总结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基层党组织的会议没有成为教育党员的学校，其思想政治水平很低。会议很少讨论党内的问题（党在组织上巩固，党员的思想教育，党的队伍壮大，

^① 该文件未标明日期，但有一个1947年9月9日签署的批注：该汇总应提交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党的文件的交流等等)。在生产中，特别是在成为人民财产的企业里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没有成为大会和代表会议讨论的对象。

在决议草案的讨论中，食品供应和经济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有些地方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要求把修改东部边界、停止拆迁设备和延期支付战争赔款（图林根、柏林），以及强烈的反对农民的情绪写进决议草案中去，在讨论中没有充分揭露舒马赫“思想政治”的目标，更有甚者，还在一系列会议上公开发表了舒马赫派的言论。

3. 在许多情况下，党的报刊在阐明党内辩论问题时持有不正确的立场。党的成就，党的工作中的优点，在报刊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阐述，但是对党的不足之处却大肆渲染。

4. 中央理事会对西部共产党的领导很不得力。西部三个占领区党组织的行动路线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参加政府、在肃清纳粹主义影响委员会中的工作、对待双占区^①的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许多重要问题的态度上没有协调一致，有时还导致错误发生。在德国西部对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开始得很晚。辩论没有广泛吸收社会民主党人和主张统一的无党派人士参加。

5. 中央理事会的某些成员（阿克曼、布希维茨）在经济困难面前（食品供应状况、拆迁设备）陷入悲观情绪，在党内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什么党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对群众失去影响力的威胁、领导脱离了基层，等等。

6. 应该指出，虽然讨论的问题很激烈，但来自前社会民主党的很多中央理事会成员，如费希尔、麦耶尔、格尼弗柯，即那些在组织上和在上政治上负责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人，却没有在讨论中发言，总之，没有表现出任何积极性来。

^① 指 1946~1949 年间，英美在德国西部的联合占领区。1946 年 12 月 2 日，英美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和行政统一的联合占领区的协定。

№0195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苏占区基民盟代表大会给联共（布）中央的情报汇总（摘录）

（1947年9月9日）

……基民盟代表大会于9月6日在柏林歌剧院开幕，气氛相当紧张。3位美国将军在12名全副戎装的军官陪同下示威性地出现在剧场的中央包厢里，给代表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还有许多美国军官在前排就坐。

莱梅尔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

秋尔潘诺夫上校代表苏联军政府致贺词。贺词强调，苏占区的基民盟参加了占领区进行的全部工作，因此基民盟中央理事会对这项工作负有责任。贺词指出了基民盟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中的贡献，并提出建立由各主要党派首脑组成的国家政府的倡议。接着，激烈批评了英美分裂德国和支持反动分子的政策。最后指出，苏联军政府祝贺基民盟代表大会的召开，就来自西部各占领区的来宾和代表的数量来说，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超出了区域性，苏联军政府认为，这事实上是承认各政党有权在全德国范围内联合的开端，英美当局不愿意让德国人民这么做，但无法阻挡。

贺词得到大会代表们的赞同，不只一次被掌声打断。

凯塞在代表大会上做了主报告。……

结论：

1. 基民盟代表大会没能变成一次反苏示威，变成一次赞扬“马歇尔计划”的大会，尽管美国人竭力想做到这一点，而且在他

们的压力下，以凯塞为首的基民盟一部分反动的领导人也的确是这样做。

在代表讨论中，多数发言者，尤其重要的是各省的理事会主席，维护了苏占区实施的措施，表示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企图把尚未恢复的国家主权出卖给美国资本，表示拥护继续实行各党派的联盟（虽然附带各种条件）。

2. 代表大会的结果，使基民盟党内的分歧尖锐化了。在筹备代表大会期间，基民盟内部便形成了反对凯塞的反对派，如今加强了基民盟进步分子的势力，虽然左翼还没有形成组织。在代表大会的进程中，右派不得不做出一系列让步（选举洛别丹茨为第三主席，希克曼为第四主席，努什柯等人为理事；凯塞的拥护者法舍尔作为第三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落选，等等）。

有根据推测，代表大会之后，基民盟内部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斗争还会加强，况且左翼分子将进行更加公开的反对右派的斗争。可以预料，这首先会出现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勃兰登堡，也有可能出现在柏林。基民盟很多主要工作人员对凯塞的个人愤怒情绪会在一定程度反映到这方面上来。

在代表大会上，基民盟右翼和左翼之间已形成的界线比以前更分明了。代表大会表明了基民盟左翼分子变成现实力量的可能性。

3. 代表大会表明，基民盟里面一大批拥护与苏联以及苏联军政府建立良好关系的人正在成熟，准备公开站出来，他们在代表大会上原则上表示维护苏联占领区内实施的措施。

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在代表大会以后对待基民盟方面的任务在于：

(1) 巩固和扩大业已产生的左翼的地位，为在今年年底召开反对凯塞作为主席的代表会议打好基础。

(2) 在占领区内进一步破坏基民盟右翼的势力，把凯塞的拥护

者们从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

(3) 在报刊上开展批判凯塞现行的政治立场的活动。

(4) 开展对凯塞及其拥护者们的理论观点的批判。

(5) 考虑到在理事会中业已存在反对派，因此准备把反动分子，凯塞的拥护者和以凯塞为首的美国人的走狗从党中央理事会中清除出去。

(6) 不允许在占领区内实施修正民主改革的政策。加强反对怠工分子的斗争。

(7) 消除任何想要批评现存的德国边界的企图。

(8) 继续反对鼓吹马歇尔计划和英美在西部各占领区的政策的斗争，美国人力图把基民盟变成美国政策在苏占区的体现者。

(9) 建议统一社会党加强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反对基民盟的反动路线和诽谤马克思主义的斗争。

No 01959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9月27日）

……1947年9月20~24日，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柏林举行，出席大会的有840名代表，他们代表1791000名党员。此外，代表大会决议授予西部各占领区的271名代表以大会代表的资格，他们参加了代表大会前夕举行的统一社会党和德国共产党工作合作委员会会议。

由苏斯洛夫和波斯佩洛夫同志^①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代表团参加了代表大会的工作。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典、挪威、法国、卢森堡共产党和瑞士劳动党的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和荷兰共产党以及波兰工人党都派出代表作为观察员。代表大会收到了奥地利和意大利社会党，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巴勒斯坦共产党，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贺电。

外国党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其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和书面致词给大会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大会上以及在劳动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一点在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同志宣读贺词时表现得尤为突出：代表们热烈鼓掌，一致起立，转向联共（布）中央代表团的包厢，唱起了《国际歌》。

这一切都促进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一工作是在国际团结、克

^① 波斯佩洛夫，П. Н.（1898~1979），时任苏联《真理报》主编。

服民族主义倾向和同反苏情绪作坚决斗争的旗帜下进行的，由于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困难，民族主义倾向有所加强。柏林市劳动群众大会也检验和证实了这一点，出席这次群众大会的有25000多人。外国党代表团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时，特别是在第二次宣读联共（布）中央的贺词时，群情振奋。

代表大会听取了下列报告：

1. 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总结报告（威·皮克、艾·格尼弗柯、奥·卡尔斯腾）
2. 为争取国家统一和德国民主化而斗争（奥·格罗提渥）
3. 对经济和管理机关进行民主改革（瓦·乌布利希）……

代表大会的全部过程、报告和讨论表明：

1. 德共与德国社民党在苏占区合并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统一社会党在人数上增长了（增加38%，新吸收党员500000人），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了。所进行的合并完全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党在发展，越来越牢固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过去断绝了关系。以秘密投票的方式一致选举出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证明了党内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

2. 建立一个工作效率高的、党可以依赖的党的机构的工作，在所有基层组织基本上都已完成。在合并代表大会以后的一段时期，新的党务工作者干部队伍经过党校的理论培训，获得了实际工作经验，已经成长起来了。

从中央理事会清除了一系列前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前共产党员中无所作为的成员，巩固了党中央的领导，使其变得更有工作能力。

3. 代表大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方面采取了正确的策略路线，开展了争取社会民主党群众的斗争，同时利用与其进行工作辩论的方法，坚决地揭露了舒马赫派领导集团。

格罗提渥发动了争取社会民主党群众的斗争，其策略路线完全是明确的，但也必须指出，皮克在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作的闭幕词中有一系列不恰当的提法，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社民党纽伦堡代表大会^①是法西斯主义的，对社会民主党使用了一系列粗暴的措词，特别是在闭幕词中，这样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此外，皮克还讲了这样看法，有如此众多的外国代表参加大会，这有可能成为重建新的社会主义共产国际的开端。

4. 格罗提渥以及一系列其他前社民党人激烈地批评魏玛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这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格罗提渥声称，社会民主党在1914年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对工人运动的分裂负有罪责，一年半以前他还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声明。代表大会对这项声明予以赞许，格罗提渥还说了这样的话：“假如我们在1918年能更多地向俄国人学习，而不容忍反布尔什维克的迫害，那么我们的人民会更好过一些。”在代表大会以前，前社会民主党人未曾有过如此明确的提法。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抽象地承认必须考虑以前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代表大会上反对舒马赫分裂主义政策最鲜明的发言都来自前社民党人（奥·布希维茨、科尔霍菲尔、科特柯、舍普弗林等人）。

批评社会民主党以前的错误和舒马赫派的观点，在意识形态上为党对在统一社会党队伍里进行分裂活动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采取组织措施做好了准备。

早在代表大会之前，由于在各个专区和柏林举行了党的代表会议，统一社会党的理事会就承认：党内的政治状况使之有可能转变为对舒马赫分子和党内的右派在理论上和在政治上进行无情的揭

^① 德国社民党代表大会于1947年6月26日至7月2日在纽伦堡召开。

露；对隐蔽的舒马赫分子（所谓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采取组织措施。代表大会证实了以前这种决定的正确性。

5. 代表大会完全明确地提出了为争取德国统一而斗争，为建立民主的、爱好和平的、没有垄断资本的统一的德国而斗争的任务，在代表大会上响亮地提出了为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思想和要求，因为惟有在这些道路上才能使德国各占领区的工人团结起来，从而达到德国人民的统一。格罗提渥在报告中对这个思想是这样表述的：“假如德国人民想要变成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那么德国人新的国家就应该成为劳动者的祖国，他们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6. 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等等）遭到代表大会一致的批驳，因为它旨在分裂和奴役德国。在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和发言中提出立即废除双占区协议和建立全德政府的要求。除此之外，在格罗提渥的报告中还对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了要求：允许德国代表参加会议的工作，就德国统一问题进行全民投票，立即撤销占领区分界线并在规定的期限内遣返战俘。

7. 英国和美国驻德军政府的政策维护德国垄断资本以及所有的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地位，从而遭到了苏占区代表和西部各占领区代表的激烈批评。消灭康采恩和垄断以及不允许在德国建立外国垄断资本的要求得到代表大会的一致赞同。

8. 在党的主要工作人员队伍里可以看出对待苏联态度的转变。党从保持一定的距离转到坚决维护旨在保卫和平和建立各族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的苏联政策上来，承认必须学习苏联的经验（并非把它机械地搬到德国来）。

自统一社会党存在以来，党第一次在代表大会高声宣布承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续，并且高度评价了它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意义，也包括对德国工人运动的意义。格罗提渥说：“我们承

认，在 20 世纪继承和应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特别是由列宁和斯大林所继承和应用的学说，并从中汲取新的和适合于德国条件的东西。”他的话在代表大会上得到称赞，足以证明这一点。

如果说这条路线在统一社会党各区代表会议上仅仅是提出来，而在各专区代表会议上提得更明确，那么，在代表大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专门发言中（阿克曼、厄尔斯纳^①、茨威林格等人）对此则“放声”谈论了。

9. 代表大会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在代表大会上没有反映占领区某些阶层居民落后情绪的发言，没有谈论食品供应的困难、拆迁设备等等，而在基层组织的会议上对这些谈得较多，在区的和专区的代表会议上虽然谈得少一些，但毕竟还是有所表露。

应该考虑到，代表大会反映了党的领导层的情绪。在党的下层，理论水平仍然很低，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残余很严重，甚至有亲法西斯的情绪。在党的中层，还存在着前社会民主党人与前共产党员的分歧。毫无疑问，代表大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将会对党员群众和广大居民产生正面的影响。

10. 代表大会上总的气氛，在对苏联的态度和对列宁主义的评价（认为它是马克思学说的继续）等问题上的根本转变，以及针对舒马赫的激烈发言，给来自前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奥·麦耶尔、斯采拉特等人）留下了反面印象。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到某种压抑。麦耶尔同我们的顾问谈话时表示，给代表大会定的基调是不正确的，过分显示了对苏联的依附和忠诚，这将使反动派有借口说德国统一社会党依赖于苏联。总体来说，整个代表大会进行得过分共产主义化了。他宣称：“给人造成一种印象，我们成了共产党人的

^① 厄尔斯纳，弗雷德（1903～1970），1945～1946年为德共中央书记处成员，1947～1958年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委员。

俘虏，我们被共产党人利用了。”这些人的动摇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把他们从中央书记处中清除出去，目前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

11. 代表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经济问题（为全德制订三年工业计划，巩固在苏占区进行的改革成果，要求在西部占领区也实施这样的改革），明确了对待转到人民手中的企业的态度。谈到苏联股份公司时说，对待它们也和对待转到人民手中的企业一样，而且表示希望苏联政府逐渐把这些企业归还给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十分关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的问题，指出，“先给我们好的食品，然后我们再好好劳动”是个笼络人心的口号，应该针锋相对地提出：“我们好好劳动，就会生活得更好”。

除此之外，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如限制苏联军政府的经济干涉，把制订计划的职能移交给德国机关，确定战争赔款与当前产量的硬性百分比，农业经营的集约化，农民将剩余的农产品出售给合作社，等等。关于限制苏联军政府的经济干涉，关于把一系列职能移交给德国机关，关于确定战争赔款的硬性数额等建议，在代表大会上得到赞同，有时引起不健康的反应，敌对的报刊企图把这说成是对苏联军政府的不满。

苏联军政府关于经济问题的建议没有得到解决，它们将来也还会引起各专区苏联军政府与德国机关、统一社会党理事会和地方工会之间，以及苏联驻德军政府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化，这是一个薄弱环节，是最不理想的后果。

12. 代表大会表明，格罗提渥在党内威信异常迅速地提高了。现在他是统一社会党公认的领袖。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一次柏林劳动者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中，格罗提渥被称作是“当今的倍倍尔”。如今在党内已经不把格罗提渥看成是前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对于前共产党员和合并以后入党的人来说，他同样都享有威望。与此同时，他能够如此激烈地反对社会民主党人，甚至连皮克和乌布利都

无法做到。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中的前共产党员对格罗提渥是完全信任的。目前在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中的前社会民主党人，不想与现在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关系复杂化，所以他们不反对格罗提渥，而是跟着他走（关于个别例外的情况上面已经谈到），从而卷入了与舒马赫分子的坚决的意识形态斗争。

9月25日，召开了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组织工作全会。全会决定增加两名中央书记处书记，原有的书记全都再次当选，又补选了贝林格（中央理事会组织部部长，前共产党员）和艾贝尔特（统一社会党勃兰登堡专区理事会主席，前社会民主党人）。

达莱姆报告了与外国代表团会谈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建议。为了加强党的国际联系，全会决定用德文和法文为国外出版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活动的简报，向国外进行广播，派遣代表到别的国家去传播有关德国统一社会党状况的信息，还要派出文化、科学活动家出国访问。

格罗提渥在全会上发言，对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了总结，指出，代表大会显示了对领导人的信任，党在代表大会以后取得了内部的团结。现在需要深入研究争取社会民主党群众的论据，开展和平宣传，把这种宣传与宣传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结合起来，着手解决在转到人民方面的企业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加强劳动纪律，以及加强党与工会的联系的问题。

格罗提渥指出，由于外国代表出席代表大会，有可能与几乎是欧洲所有国家的党建立联系，特别重要的是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的执政党建立最密切的关系。令人高兴的是，正是这些党的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喊出了“德国人民万岁！”的口号，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然而不应该在代表大会上提出重建社会主义的共产国际。

全会通过决议，开展总结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运动，

拟于今年10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理事会例行全会将听取运动进展的情况。

据现有的资料，代表大会的工作和外国代表团，特别是联共（布）中央代表团的到达，以及联共（布）中央的贺词，在德国居民中和党的各个组织中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

代表大会给来自西部各占领区的代表，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代表大会前夕，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西部各占领区没有看到组织上建立统一社会党的可能性，曾经有过绝望情绪。代表大会为德国西部各占领区加强争取工人阶级团结的斗争开辟了前景，给他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使他们产生了信心。西部各占领区的代表们懂得，不应该因为占领军当局禁止在组织上建立统一社会党而停止和削弱争取统一的斗争。在争取西部工人阶级统一的斗争中，主要是宣传统一的思想，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人采取正确的态度，在企业内部与他们共同斗争，一起反对德国垄断资本，反对对德国的奴役，反对把德国的工业变成英美垄断集团的附庸，反对本国和外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这条路线应该引起争取德国统一的广泛运动，最终造成一种政治环境，使西部各占领区无法继续禁止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

公开提出争取社会民主党群众的斗争，以及确立社会主义和同苏联友好的方针，在社会民主党的队伍里引起了惊慌失措。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是在代表大会上还是在各专区统一社会党代表会议上都遭到失败之后，决不会甘心，他们无疑将在最近一个时期在苏占区和柏林开展反对统一社会党的坚决斗争，努力破坏代表大会的成果，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社会民主党人受骗了，他们成了共产党的俘虏，等等。他们还会加强在苏占区建立社民党地下小组的工作。舒马赫不久以前在柏林社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已经提出在苏占区对前社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有

资料表明，留在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成员中的某些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在最近召开的全会上批评党的路线。

与此同时，必须支持统一社会党在代表大会期间表现出来的热情，绝不允许统一社会党满足于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绩，忽视阶级斗争的新形式（资产阶级政党提高了其组织在地方自治会和区政府中的积极性，各部机关对苏联军政府巩固民主改革成果的措施进行消极对抗，德国社民党试图在统一社会党个别组织中制造危机，等等）。

与我们相敌对的报刊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也表现出惊慌失措，没有试图批评代表大会的工作（但在报道代表大会的工作时并非没有歪曲）。

出席代表大会的外国记者声称：“俄国人开始坚决进攻了——在维辛斯基讲话^①之后，联共（布）代表团的抵达和联共（布）中央的贺词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一点。”

^① 指 1947 年 9 月 18 日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其中批驳了杜鲁门和马歇尔宣布的美国对外政策。

№01989

马卡罗夫^① 关于在德国居民中举办 讲座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10月24日）

1947年5月以前，情报厅在德国居民中间没有举办过讲座。情报机关的军官也很少向德国居民讲述苏联的情况。

5月份，情报厅宣传处增添了4名讲座员。同时，该处成立了编外讲座小组，由情报厅其他各处的工作人员组成，共有15人。6月，苏占区各省（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勃兰登堡、梅克伦堡）的情报处也都成立了编外讲座小组。

军官们最初几次关于苏联情况的讲座就表现出在德国居民中间进行政治宣传的这种形式的生命力和重大意义，并且受到欢迎。

……

大部分讲座带有直接的反宣传性质。举几个例子：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极力企图证明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占统治地位的似乎是国家资本主义。在社民党的报刊里，这个“理论”是靠着援引马克思的话和各种各样的“事实”为“依据”的。根据这个“理论”得出一个简单实用的结论：既然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那就没有必要依靠它。……

统一社会党没有为反对这个“理论”而进行斗争，没有揭露它。因此，这个“理论”不仅在社民主党人中间，而且在统一社会党

^① 马卡罗夫，瓦西里·叶梅利亚诺维奇（1903～1975），1946年4月至1948年5月任苏驻德军政府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总司令。

许多党员和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行。

苏联军官第一次讲座的题目是：“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旨在就这个问题直接批驳社民党的宣传（直接批驳社民党的理论机关刊物《社会主义世纪》），引起了德国劳动居民的极大兴趣，也引起了社会舆论界的极大关注。柏林苏联文化宫讲演大厅容纳不下所有希望听课的人，根据公众的要求，不得不在柏林重复了数次。根据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要求，在德累斯顿、莱比锡、哈雷、梅克伦堡给数千名党的积极分子举办了这个讲座。所有的报刊，其中包括西部的报刊，都报道了讲座的内容。缩写的讲稿曾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并且数次在电台播放。统一社会党领导人之一奥托·格罗提渥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及10月15日和16日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上的报告中使用了讲座的论点。在讲座的影响下，统一社会党理论机关刊物《统一》杂志就“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这个题目发表了数篇文章。令人感兴趣的是，社民党报刊发表了关于讲座的消息，但至今没有决定为维护自己的理论而反驳讲座。我们的同志举办了这次讲座一个月以后，舒马赫在柏林两万公众面前抱怨说：“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连苏联军政府的军官们都加入了反对我们的政治论战。”

众所周知，社会民主党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报刊不断叫嚷所谓苏联的极权主义，这一诽谤的主要“依据”是苏联没有反对党，他们像流氓一样，企图把苏联的政治制度与德国法西斯制度相提并论。有鉴于此，我们准备了一次题为“为什么苏联只有一个政党？”的讲座。讲座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述了苏联的一党制，揭露了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诽谤。同样，这次讲座也像“社会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一样，受到热烈欢迎，取得极大成功。“极权主义”和“一党制”的问题，由于其重要性，在其他一系列讲座中也有所涉及，如“社会主义国家30年”、“苏联和德国”、“专政与民主”。

鉴于需要经常不断地向居民讲解我们的对德政策和必须揭露纳粹分子、右翼社民党和盟军宣传机关就这一政策所散布的系统的反苏诽谤，我们的军官们经常做题为“苏联与德国”的讲座。这些讲座阐释和讲解我们对德政策的基本要点和苏联代表团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对德国问题的立场，揭露关于德国“布尔什维克化”、“殖民地化”、关于“割让”德国领土、“战争赔偿政策”、“德国战俘在苏联死亡”等等的反苏宣传。

“专政与民主”的讲座在我们的宣传中起了重大作用，在战后的德国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讲了苏联的工人阶级专政。在此之前，我们的宣传机关对此实际上是闭口不谈，害怕给资产阶级宣传家提供口实，使他们得以再次发表关于苏联没有民主的谰言。讲座的基础是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的论点，这种国家是新式民主的（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是新式专政的（反对剥削者）。讲座人发挥了这个论点，表明苏维埃国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资产阶级民主不是别的，只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和少数人的民主。……

讲座的材料，除了少数例外，均由宣传处准备，集体讨论，定稿以后分发给编制内和编制外的讲座员。准备充分的讲座员都针对他们的具体听众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加工，而准备不足的讲座员则把这些材料当成讲稿来使用。

准备讲座材料时，必须讨论听众就这个题目可能提出的问题的答案。目前，宣传处对于听众最流行的和最复杂的问题（战争赔偿政策、苏联在德国的股份公司、战俘的状况、关于德国边界问题，等等）已经编写出答复材料。……

№ 01960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全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11月15日）

……11月12~13日，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举行了例行全会。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

1. 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威·皮克）。
2. 关于贯彻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弗·达莱姆）。
3. 关于伦敦会议前夕的国际形势（奥·格罗提渥）……

结论：

……

2. 关于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总结运动取得了良好结果。……

然而，总的国际局势和美国当局在德国开始的反共产主义进军，与舒马赫派加强非法宣传相互配合，不能不影响到基层党组织的状况。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征兆：党的发展出现停滞，缴纳党费的党员数量下降，出现了悲观主义情绪，对党的工作和党的教育漠不关心，观望等待。同时，伴随着舒马赫分子和德共党内反对派残余分子活动的猖狂（不久前在英占区布朗什维格召开了共产党反对派代表会议，约有10个来自苏占区的代表参加；共产党反对派现在的基本路线是不进行派别活动，而力图钻到统一社会党和德共的领导岗位上去）。

3. 全会忽略了美国人的暗中破坏活动——他们召开了一些德国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的会议，其任务是破坏各党派关于成立参加伦

敦会议的德国代表团的协商会议。^①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没有认清这一点，批准自己的一些著名活动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由弗里登斯堡博士起草的宣言，从而犯了一个错误。……

^① 1947年秋在东占区进行的阻止德国分裂的民族运动第一次提出了建议各大国应在伦敦外长会议上听取德国公众的呼声的任务。

№01961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全会给苏斯洛夫的报告（摘录）

（1947年12月8日）

……12月8日，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举行了例行的全会。

全会议程中有下列问题：

（1）关于如何利用“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人民代表大会的成果（报告人艾里希·格尼弗柯）。

（2）关于各占领区妇女组织最近一次会议的情况报告（报告人艾利·施米特）。

（3）关于工全代表团访问苏联的情况报告（报告人赫尔曼·施利梅）……

结论：

1. 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全会讨论了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和召开的情况，显示出这一举动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巩固了党，使党充分认识到继续宣传大会情况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保证在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这次总结工作以及建立人民代表大会的专区委员会和出版日报，有助于该党在德国人民中进一步取得阵地。

2. 报告人施利梅讲述了苏联之行，得到中央理事会成员们的肯定。然而，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关于苏联之行的口头和书面总结报告中的赞美之词，特别是关于在苏联关押的战俘状况的问题，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对其他印象的真实性的怀疑。

3. 威·皮克激烈地攻击文化协会的领导人，特别是贝希尔，全会以前，他就这个问题在中央理事会会议上已经与奥托·麦耶尔发生了不必要的尖锐冲突，冲突的结果促使麦耶尔打算离开会场，造成了紧张气氛。贝希尔在文化协会当面威胁要辞掉主席的职务，这在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4. 应该指出，威·皮克的开幕词是不合适的，在政治上考虑不周，他向中央理事会全体成讲述了筹备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和过程（统一社会党如何做个别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家的工作等等），还讲述了一些完全不允许讲的和没有必要讲的事，他最后说：“我们的呼吁书得到赞同。只有两点意见，我们接受了其中一点。”全会的多数参加者都明白，这指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

№01962

秋尔潘诺夫关于“实现德国统一与 公正和平”人民代表大会给苏斯 洛夫和希金的报告（摘录）

（1947年12月9日）

……1947年12月6~7日，在柏林将军宫举行了“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人民代表大会。……

结论：

1. 人民代表大会的进程表明，统一社会党成功地选择了召开大会的时机。一些主要政党和团体参加大会，结果使大会超出了原定的规模，并体现为争取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的全德国人民的运动。这种情况提高了统一社会党作为德国人民的代表和全德性政党的威望，是挫败西部占领区企图把统一社会党置于孤立地位的一个重要举动。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给今后继续攻击统一社会党是“非德国的”党造成了困难。

大会的结果为从思想上粉碎暗藏在统一社会党内部的舒马赫派地下小组，削弱其对统一社会党党员的影响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 从德国进步分子克服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方面来说，大会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唤起统一社会党和西部占领区的共产党以及所有与其相关的群众团体提高其政治积极性。

3. 所有政党的代表在报告和讨论的发言中都欢迎苏联代表团

在伦敦会议上的立场^①，这有助于克服反苏情绪并将促进苏联在所有占领区德国居民中间威信的提高。

4. 由于大会的参加者包括了所有占领区的代表，以及西部各占领区代表在大会上发言的性质，使得在将来宣传大会精神的工作中可以把这次大会看做是一次具有全德意义的大会。

5. 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不顾社民党领导人的禁止而参加了大会，这是大会非常重要的成果。这无疑反映了社民党内部的不满，标志着在党内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反对舒马赫分子的斗争，加强社民党和统一社会党基层组织在德国民主化最重要的问题上共同采取措施打下了基础。

6. 基民盟一大批重要的活动家参加了大会，这是凯塞的失败，是基民盟进步活动家的胜利。这给近期内在基民盟理事会里因凯塞推行亲美的路线而对他提出不信任和撤销他的基民盟主席职务提供了理由。

7. 大会上的一系列发言表现出民族主义的腔调，这就要求统一社会党经常不断地进行工作，以便防止资产阶级分子企图将某些地区“实现德国统一和公正和平”的运动引上民族主义的轨道，否则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复杂化（可能重新提出东部边界问题，等等）。

8. 为了领导“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的人民运动而建立了常设委员会，这样就可以从组织上巩固统一社会党在大会上取得的成就。这个委员如果工作正确，可以成为集结反对分裂德国的一切力量的中心，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将阻止出现打着德国统一的旗帜的其他任何团体。

^① 伦敦四国外长会议于1947年11月25日至12月15日召开，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东西方在德国的政治统一和政治体制问题上的分歧，会议无果而终。

“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运动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成为形成以统一社会党为首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基础。

9. 经苏联许可出版的报纸广泛而全面地报道了大会的筹备和进展情况。西部各占领区的报纸激烈地反对大会的思想，企图把大会说成是具有狭隘性质的一党措施。

随着大会的结束，即将开展实现大会精神的斗争。为了把大会的精神贯彻到真正的人民运动中，使它影响到各占领区，影响到所有的党派和群众团体，统一社会党无疑将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

为了巩固人民代表大会的成果：

1. 12月14日，在苏占区和西部占领区的各个专区召开了“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的专区大会，在会上将提出关于柏林人民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

在专区大会上，将建立“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运动的专区委员会，以后逐步在区和基层也建立这样的委员会。

2. 在报刊和广播电台加强对人民代表大会的过程和结果的宣传。拟定出版“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运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大量出版有关大会的材料。

3. 新建立的“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委员会的注意力应集中于把一切新成立的要求德国统一的团体吸引到“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运动中来。

№01963

巴兰诺夫关于皮克讲话给苏斯洛夫的报告

(1948年1月30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

苏联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在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五届全会的报告中汇报了党的主席威·皮克同志在这次全会上在政治上考虑不周的和错误的讲话。

皮克同志在开幕词中完全多余地、详细地向中央理事会全体成员讲述了统一社会党中央书记处筹备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和书记处事先做个别资产阶级政党的活动家的工作情况，也就是通报了只有少数党的领导人才应该知道的情况。皮克同志因而向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提供了反对统一社会党的宣传中可以利用的材料。

皮克同志在全会上还宣布说，统一社会党起草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呼吁书得到了赞同，只提出了两点意见。全会的多数参加者从这个声明中知道了这指的是来自莫斯科的意见。

众所周知，皮克同志以前也曾发表过考虑不周的和给党的工作带来麻烦的讲话。

皮克同志还粗暴地和不策略地攻击党的个别领导人。在中央理事会第五届全会前夕，皮克同志激烈地攻击德国民主复兴文化协会的领导人，特别是攻击其主席贝希尔。在中央理事会会议上，皮克就这个问题与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麦耶尔发生了尖锐的冲突。由于这一冲突，在全会上出现了紧张气氛，麦耶尔准备离开会场。由于这一点，贝希尔在文化协会上威胁要辞掉主席的职务，这产生了非

常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与英美在德国的占领军当局联系起来，他们在自己的占领区里禁止这个团体活动。

情况如上所述，谨向您汇报。

№01964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德国自由民主党 给巴兰诺夫的情报材料（摘录）

（1948年4月16日）

.....

1. 1947年下半年和今年，可以看出自民党政治路线的重大调整。党内的反动集团——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活动更加猖狂，并在党内这样一些社会阶层中得到了支持，他们觉得党目前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解决政治问题，而竭力把该党推上亲美的新路线，拒绝在苏占区实行民主改革，竭力让自民党加入克莱宣布的反共产主义进军。^①

2. 必须使自民党继续坚持居尔茨博士的政治路线，尽管他在1948年4月10日去世了，但他的路线的宗旨却是支持民主改革，参加各民主党派联盟，参加人民代表大会运动，与苏联军政府忠诚合作，总体上是依靠东部的。

3. 由于居尔茨博士的逝世，反动分子活动更加猖獗，企图把党的领导抓到自己手中，使党脱离目前的进步路线。必须在这场斗争中全力以赴地协助党内的进步分子，确保他们在1948年底召开的党代会上获胜。

4. 必须给自民党一些社会阶层提供一个出路，在使用进步的旧官吏、利用个人的积极性等方面做出某些我们可以接受的“让

^① 1947年10月，美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克莱将军发布了关于在美占领区允许公开批评苏联的命令。在此之前，是禁止公开反对同盟国的。

步”，就像在肃清纳粹主义问题上所做的那样，从而吸引党的这些社会阶层参与进步阵营未来的工作。

5. 我们没有及时地注意所谓“柏林反对派”。^① 没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从而使其有可能得到巩固，给我们做柏林自民党的工作造成了困难，并且成为我占领区的自民党队伍里反动分子的带头羊。

必须在最短的期限内，在柏林苏占区各区完成对自民党的组织改造工作，使之成为直接服从自民党中央理事会领导的独立组织，并且继续开展工作，使柏林西部各区的自民党组织同它联合起来。

6. 必须把反动分子从自民党中央理事会和自民党的领导机关中清洗出去，为此可利用自民党工作人员总结改选的运动、业务活动和经营活动，以及其他可能的活动，全力以赴地协助党的进步活动家占据自民党从下到上的领导岗位。

^① 柏林反对派是自民党中反对亲近统一社会党的领导方针的集团。

№01965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 柏林自民主党的材料（摘录）^①

（1948年4月16日）

……柏林自由民主党拥有20个区级组织，104个基层组织，党员总数将近6000人。……

为了说明柏林自民党近来的特点，首先应该指出党内右的倾向有所增长和加强，他们公开维护康采恩和垄断资本的利益，反动的反苏分子（施温尼柯、赖夫、马尔凯维茨、鲍尔姆）在党内势力的加强，使柏林自民党变成了社民党和基民盟全面合作的反苏核心。……

在1947年6月举行的苏占区自民党代表大会上，柏林代表团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反对党的中央理事会及其主席居尔茨博士，柏林人指责他犯有机会主义，对统一社会党卑躬屈膝，直接执行苏联军政府的指示，等等。……

自民党市理事会的宣传活动是按照如下的方向开展的：

1. 批评苏占区实施的民主措施。编造关于苏占区的诽谤性谣言。把这里的制度与纳粹制度相提并论。施温尼柯集团在报刊上和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中极端恶毒地攻击转到人民手中的企业以及受管制的企业的工作。

2. 攻击苏占区执行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政策。与此相联系，施

① 该文件是前件（№01964）的附件。

温尼柯分子不遗余力地继续攻击居尔茨博士及其拥护者，要求后者退出党的领导。

3. 要求立即停止拆迁设备和从现在的生产中支付战争赔款。

4. 要求重新审查东部边界线，并且与此相联系，煽动沙文主义。

5. 鼓吹和广泛支持马歇尔计划，认为这是德国政治和经济复兴惟一可行的途径。

6. 支持英美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反对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倡议下开始的争取德国和平与统一的运动。

所有这些宣传口号都用为自由和民主、反对极权主义而斗争的词句加以装饰，这在1948年2月13~14日举行的自由民主党柏林市代表会议上得到了最全面的表现。

这次代表会议就其性质来看，是一次经过预谋的反苏示威，它企图表明柏林自民党党员完全赞同施温尼柯及其走卒按照美国人的指示所确定的路线。……

苏占区各区的代表近80人示威性地拒绝出席这次代表会议，这一事实没有影响美国代理人准备的反苏示威：施温尼柯是个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特务和前纳粹分子，却再次当选为自民党市理事会主席，极端的反苏分子和美国的代理人赖夫和马尔凯维茨则当选为党的副主席。……

这样，柏林自民党的状况便成为苏联占领区自由民主党总委员会上讨论的问题，该委员会于1948年2月初通过决议，把柏林自民党开除出占领区组织并且激烈地谴责了党的柏林组织中的施温尼柯路线。

与占领区自民党总委员会的决议一样，苏联卫戍司令部的措施也对进一步巩固党内反施温尼柯的势力产生了良好影响。不仅在苏占区的各区，而且部分地在西部占领区，一些工作人员发表声明退

出自民党的施温尼柯派组织（什瓦尔茨分区的小组退出了夏洛腾堡区组织）。

这时，在苏占区的各区成立了以自民党利希腾贝格区理事会主席亨泽克、弗里德里希斯海因区主席施米特、特列波夫区主席赫尔曼为首的倡议小组，着手创建与柏林自民党平行的组织，称为“柏林自由民主党人工人联谊会”。……最近几天举行了苏占区自民党五个区理事会主席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区的一些代表。会议决定宣告在柏林成立与自民党平行的组织，并且选举出由亨泽克、施米特和赫尔曼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该执行委员会被授权与占领区党的领导建立正式关系，并且组建柏林自由民主党人联谊会。……

№01966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关于德国统一
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九届全会给
苏斯洛夫的情况报告（摘录）**

（1948年4月27日）

……1948年4月14~15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九届全会。

全会讨论了三个问题：

1.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奥·格罗提渥）
2. 关于党的报刊（奥·麦耶尔、奥·文采尔）
3. 党的青年工作（保·威尔纳）

奥·格罗提渥在报告中讲了当前的一系列问题。他强调，由于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改组^①，干部问题成为一个基本问题。格罗提渥提到这个问题的困难时，要求统一社会党各地区理事会克服和消除地方利益，帮助党为经济委员会和中央经济管理局配备干部。

格罗提渥讲到，中央理事会决定帮助西部占领区的共产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建立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协调中心，该中心将使西部各占领区的工作互相协调起来。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成立了以

^① 德国经济委员会是根据苏驻德军政府总司令1947年6月4日的第138号命令成立的，目的在于协调和计划东部占领区经济的恢复工作。委员会由各专区经济管理局的领导人、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的代表和农民互助联合会的代表组成。根据1948年2月12日第32号命令，经济委员会具有立法权，并于1948年3月9日对经济委员会进行了改组。

马克斯·莱曼^①为首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对德共的状况给以评价并对政治任务进行分析。……

格罗提渥在一次专门的秘密会议上继续做报告，向全会通报了莫斯科会谈的结果。^②他谈到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在苏联占领区逮捕人的问题。格罗提渥指出，被逮捕的只是那些政治上不可靠的和值得怀疑的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占领区的民主化。现在对这个问题将进行重新审查，那些曾经参加过社会主义运动的人，经过相应的审查之后将获释。在必要的情况下，将举行公开审判。

第二个问题——关于统一社会党目前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的问题。现在给党的拨款将得到保障。统一社会党每个季度将多得到2000吨报纸和杂志用纸。

第三个问题——涉及到统一社会党在苏占区的经济政策。将结束对企业的管制。被管制的企业将移交给经济委员会管理，成为人民的企业。被管制的企业数量占占领区企业的8%，它们提供全部产品的30%。今后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将移交给经济委员会。将编制两年计划，通过计划对经济实行领导。至于原料、煤炭、棉花、钢铁将按照合同由东欧和东南欧各国提供。苏联在这方面将给以支持。……

谈到那些挂名的纳粹党员问题时，格罗提渥提出了吸引他们与党结成联盟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成立一个新党的任务，那些挂名

① 莱曼，马克斯（1898~1977），1946~1949年为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中德国共产党代表，1948年任德国共产党主席。

② 1948年3月25~31日，以皮克、格罗提渥、厄尔斯纳组成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对莫斯科进行了秘密访问。3月26日，斯大林接见了代表团，3月29日和31日，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分别接见了代表团。谈话的中心是关于1948年的经济计划问题。

的纳粹党员也可参加这个新党。新党将是一个小企业主、手工业主等阶层的政党。成立农民党的问题很特殊，农民党将团结小农，将站在土地改革的立场上。^① 这些政党的成立会加强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运动。……

结论：

1. 全会讨论的问题对于统一社会党来说都具有现实的迫切的意义。这些问题得到了委员们的肯定。然而，关于成立新的政党和德共更名的问题却使许多人感到突然，没有思想准备。这些问题没有得到一致的赞同。许多人表示担心新的政党由于没有足够坚强的领导，前纳粹分子可能会占据优势。在德共更名的问题上，表示担心占领军当局会同意取缔德共，但以后不批准新党的成立。

2. 由于讨论成立新党的问题，全会完全没有涉及必须从组织上巩固统一社会党的问题。假如统一社会党不抓加强党的团结的问题，不在行政和经济机构中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不改进对党员的政治教育工作，那么成立新的政党会引起很多困难。不排除统一社会党中的某些前社民党员不满意统一社会党的政策，怀着重建社民党的目的，转到新的政党中去的可能性。因此，巩固统一社会党内部的政治状况和党员的政治教育仍然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① 德国农民民主党联合了一部分农民和农业工人，德国国家民主党联合了手工业者、小商人、移民、原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军官及所谓的挂名纳粹党人。这两个党都是根据苏驻德军政府的倡议于1948年春天成立的，并于1948年9月初加入了由统一社会党、基民盟、自民党、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和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组成的民主联盟。

№01990

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工作给日丹诺夫的报告

（1948年5月）

受联共（布）中央的委派，对驻德军政府情报厅的工作进行了检查。^①

检查结果确认，最近一年来，情报厅在德国的工作有所改进。然而，情报厅的活动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其工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没有确保完成其承担的各项任务。

情报厅没能使德国人民的政治情绪发生本质的变化。占领区居民的道德政治状态非常令人担忧。反动派的地位仍然十分巩固。统一社会党在占领区里不是主导的政治力量，没有成为德国人民的真正领袖。占领区相当一部分居民追随着资产阶级政党。统一社会党在1946年9月社区政权机关的选举中获得了57%的选票，在1946年地方自治会和区政府的选举中获得47%的选票，而在柏林仅获得19.7%的选票。目前的事实，特别是社区的补充选举表明，统一社会党的影响并没有增长，反而有所下降。1948年在柏林进行的工会选举以及正在进行的生产委员会的选举，都证明统一社会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有所削弱。在柏林个别部门工会区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中，统一社会党1947年获得50.5%的选票，而1948年

^① 由A. 索博列夫、B. 波利亚科夫、B. 费多谢耶夫、B. 涅姆钦诺夫、Г.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等人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于1948年3~4月对情报厅的工作进行了检查。

只获得 38% 的选票。在柏林正在进行的生产委员会的选举中，据截至 5 月 5 日的材料，统一社会党获得 27.6% 的选票，而在西部各占领区仅获得 11.3% 的选票。

情报厅没有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团结占领区内各种民主力量，没有建立各民主党派牢固的强有力的联盟，没有利用各种后备力量在德国人中间开展政治工作，没有让德国居民了解苏联对德政策的本质。

关于苏联占领政策的本质，关于德国的发展道路和前景，情报厅已有明确的和准确的指示，但却没有制定实施这一政策的具体计划。情报厅的领导没有明确形成关于德国发展的社会纲领。

苏联军政府司令部和情报厅对占领区内某些居民阶层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这影响到在德国的整个政治工作，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本来准备与我们合作，可是苏联军政府司令部和情报厅却忽视德国历史状况的特殊性，错误地对待国内非无产阶级，没有采取果断措施把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苏联军政府各个机关在实践中执行在经济上窒息中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分配原材料、能源、商品时，没有考虑到私人企业家和商人的需求。税收政策不仅不鼓励中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而且也不鼓励小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这给中小资产阶级造成一种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情绪。迫使他们占领当局和统一社会党持怀疑态度，并把他们推进反动势力的怀抱。

对待占领区中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态度，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缺乏准备的和为时过早的，这给德国民主化的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给经济恢复增加了困难，使占领区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化。

情报厅不懂得各反法西斯政党联盟的意义，没有把这看成是解

决现阶段德国发展的主要政治任务——争取人民群众的杠杆。情报厅把这种联盟完全看做是各政党上层的合作，是为了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实际问题而建立的，因此没有为巩固这种联盟而采取重大措施。

情报厅对基民盟和自民党执行了不正确的路线。情报厅现在把这两个政党看做是完全敌对的，没有为在其内部建立进步的核心和孤立右派分子而斗争，没有达到使这两个政党内部发生真正变化的目的。

秋尔潘诺夫同志承认，基民盟里没有真心同意苏联军政府的政策的人，自民党中央理事会没有得到普通党员的支持，随时都可能被推翻，现在只是由于来自苏联军政府方面的压力才支撑着。

在统一社会党一系列文件中，坚持不懈地强调，它是惟一能够参加建设新的民主德国的政党，而自民党和基民盟则被描绘成维护垄断资本的政党。这种政治上的目光短浅，与联盟原则相抵触，破坏了非无产阶级集团对它的信任，排斥了资产阶级政党。

情报厅未能在资产阶级政党内部找到可以依靠的力量，便粗暴地干涉其事务，热衷于赤裸裸的行政手段，接二连三地发动“宫廷政变”。这种工作方法特别有害，这表现在：资产阶级政党表面上的友好态度被当成其政治情绪的变化，这样就给资产阶级政党内部本来非常令人担忧的状况披上了伪装，使人看不清这些政党的大部分人是站在反苏立场上的。

由于党内斗争的尖锐，柏林的一些自民党和基民盟组织脱离了占领区的自民党和基民盟组织，与舒马赫派分子一起推行嚣张的反动政策。

自民党和基民盟害怕被取缔，害怕统一社会党确立统治地位，因此更猖狂地进行反苏斗争以及反对统一社会党的斗争。资产阶级政党的疑虑增加到这种程度，他们认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就是消灭

他们的一项措施。这一切导致的结果使贯彻各党联盟的政策遇到重重困难。

情报厅对统一社会党至今没有采取正确的路线，继续奉行明显错误的琐碎监管的做法。给统一社会党造成温室式的条件，党不能在与敌人进行不断的斗争中得到锻炼，因此统一社会党许多领导人降低了对德国命运的责任感，表现出回避解决复杂问题，在困难的条件下依赖苏联军政府的倾向。

情报厅没有认真帮助统一社会党从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党，消除现存的建立党的领导机关平均分配的原则，这会严重地降低党的战斗力。社会民主党的传统在统一社会党内慢慢地消失了，显露出领袖主义的危险倾向，完全不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没有进行认真的工作。到党校听课的党员不超过15%，而在某些组织里只有5~7%，培养和提拔新干部的工作完全不能令人满意。

统一社会党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开展得很不得力，谈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时很不理直气壮，对工人运动、国内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等基本理论问题不进行研究。党的理论机关刊物《统一》脱离阶级斗争实践，勉强维持着。杂志中常常出现理论上和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青年和妇女团体处于极度困难的状态。德国青年团拥有50万人。妇女民主联盟拥有265000名会员。情报厅忽视这些团体，没有为把他们变成群众性的团体而进行斗争。无论是青年团还是妇联都没有明确的宗旨和工作目标。

情报厅在宣传领域的工作水平不能确保解决对德国居民进行民主主义再教育的任务。

情报厅拥有报刊和广播电台这样强大的宣传工具，监督数量巨大的报纸和杂志。但在解释苏联对德政策方面至今没有开展强有力

的宣传工作，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工作事实上等于被取消，介绍苏联成就的工作进行得很糟糕，不能使德国居民相信苏联的占领政策有利于德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情报厅没有目的明确的长期的宣传计划，没有揭露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计划。

最近一个时期，稍许多一些注意了宣传苏联的成就，介绍苏联的文章和广播节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他们都是千篇一律的，抽象的，德国人难以接受。没有鲜明、具体、形象地展示苏联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

苏联军政府情报厅政治和宣传活动的严重缺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缺少高水平的有威信的领导人的。

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承担着领导苏联军政府总体问题的繁重任务，很少能注意情报厅的工作。

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总司令马卡罗夫同志因病事实上不能工作。

在德国的政治工作是一项重要而责任重大的事业，事实上全都落到情报厅厅长秋尔潘诺夫同志身上，他不能确保这些任务的解决。

秋尔潘诺夫上校不了解德国历史发展的前途，未能弄清占领区内各种阶级力量的配置，只热衷于微小的谋略。他不具备国务活动家的灵活性、政治策略和深谋远虑的能力，没有掌握组织工作所必需的材料，不能领导德国的政治工作。他粗暴地干涉各个党派的事务，喜欢自吹自擂，不能让他留在厅长的岗位上。

检查情报厅的工作时也发现了苏联军政府整个机构普遍存在的缺点，迅速消除这些缺点对于改进在德国的政治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在占领区做德国人工作的苏联人进行政治教育时，没有考虑到在德国工作的特点，苏联军政府的军官和领导人不研究占领区复杂的政治生活的迫切问题。没有根据德国的条件对党的教育纲要

和计划进行重新审查。由于对集团军和苏联军政府的人员没有进行很好的政治教育工作，思想上和道德上不坚定的苏联人发生了许多不体面的行为。这给做德国人的工作增添了困难。

苏联军政府的领导人低估了做德国居民的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没有为此目的而充分发挥苏联军政府为数众多的中央机关的作用，更何况其基层机关了，甚至没有给他们提出诸如此类的任务。他们认为苏联军政府机关的全部活动仅仅在于解决经济问题。在苏联军政府机关所有工作人员中间广泛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有害的看法，认为做德国人的工作仅仅是情报厅工作人员的职责，其他在德国工作的苏联人与此没有任何关系，不应该做德国人的工作。

这个缺点由于苏联军政府领导人不正确的行动而更加严重，首先是政治部主任安德烈耶夫同志，他采取的方针使苏联军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情报厅的工作人员，脱离德国居民。与德国政界的个人交往，本来是工作必需的，但却停止了，因为这被看成是不可靠的举动。由于上述原因，苏联军政府的工作人员害怕并且不愿意做德国人的工作。

一系列工作人员把驻扎在德国当成不幸，认为可能毁掉他们整个人生的道路，因此他们对于占领区的政治生活很少发生兴趣，没有表现出主动精神，往往对工作漠不关心。

害怕做德国居民的工作，给苏联的国家利益带来了巨大损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缩小了我们对德国人可能产生的影响范围，这可能发展为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问题。

苏联军政府的基层机构（卫戍司令部）必须改组。目前，卫戍司令部的职能降到次要地位，经济—政治任务则成了中心。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多数卫戍司令是缺乏准备的，因为他们不具备必要的知识和经济—政治工作的经验。占领区共有 171 名卫戍司令，其中 88 人以前是战斗指挥员，38 人是参谋人员，28 人曾当过区政委、

城防司令或在州军事委员会工作过，4人是政工人员出身，13人担任过其他各种军事职务。卫戍司令的素质也是不能令满意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仅有11人，受过中等教育的有52人，108人只受过初等教育。卫戍司令的思想理论水平，如检查所认定的，非常低下。

苏联武装力量干部总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卫戍司令部的人员构成，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地对待卫戍司令的更换，派来充当卫戍司令的人完全没有能力解决经济—政治任务。

为了事业，有必要改组卫戍司令部，将其改为苏联军政府区分支机构，配备具有丰富的经济—政治工作经验的人员，即相当于党的区委书记的人员担任其领导。

所有这些事实证明，在德国苏联占领区德国居民中间开展的政治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我们认为必须召开一次专门的会议研究在德国的工作问题，并且做出相应的决议。^①

附上决议草案。

^① 1948年9月制定的联共（布）中央“关于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工作”决议草案建议，由勃兰登堡省军政府管理局局长沙罗夫少将担任情报厅厅长，将秋尔潘诺夫调回国内工作。1948年10月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对该决议草案进行了讨论，并做了补充和修改，建议免除秋尔潘诺夫的厅长职务，责成库兹涅佐夫和希金挑选一名情报厅厅长候选人，呈报中央审批。在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没有对该决议草案做出一致结论。

№01967

秋尔潘诺夫关于柏林市工会的状况 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5月11日）

……柏林工会的状况在1948年5月1日以后更加复杂化了。工会反对派得到美国和英国占领军当局的命令，在柏林工会制造分裂，其途径是把反对派掌握的生产工会从柏林自由工会联合会中分离出去。这一命令已经开始实施。……

鉴于柏林工会业已形成的状况，苏联驻德军政府情报厅给统一社会党和柏林自由工会联合会提出如下建议：

1. 制定工会统一的拥护者的策略，其内容是：工会联合会通过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揭露工会反对派首领作为分裂分子正在执行美国反动势力的命令。

向柏林的工人和职员解释，如果独立工会反对派分裂统一工会的阴谋得逞，柏林的工人阶级必须蒙受巨大的损失。

必须在柏林所有劳动者阶层中掀起抗议分裂分子的浪潮。

2. 必须广泛地宣传，惟有自由工会联合会全柏林代表会议才是柏林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有它才有权决定自由工会联合会未来的理事会人员的组成，对于那些只有自由工会联合会代表会议才有权决定的问题，联合会的理事会不能与任何人进行幕后的秘密谈判。

3. 加强对反对派拥护者的揭露，揭穿他们是英美当局和劳联^①的公开代理人，企图通过分裂柏林工会的途径来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使工人阶级成为英美帝国主义意志的顺从的执行者。

自由工会联合会柏林理事会无权与工会反对派的“行动委员会”^②进行任何谈判，因为后者是个自封的机构。

4. 按行业召开区级和市级的生产委员会主席会议，主要是提出关于工会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及与其斗争的问题。会议应在“生产委员会中不要一个分裂分子”的口号下进行。

5. 在柏林所有的企业和机关成立“维护工会统一委员会”，吸收社民党、基民盟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这些委员会。

自由工会联合会未来的理事会人员组成要吸收社民党、基民盟成员和无党派人士参加。

应指出柏林卫戍司令部情报处对柏林市工会的状况注意不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提高统一社会党和自由工会联合会与分裂分子斗争的积极性，建议柏林情报处主任杰米多夫中校改革该处的工作，把工会工作作为注意的中心。

科吉科夫将军必须制定我们驻盟军联合卫戍司令部的代表处理柏林反对派工会问题时的行动策略路线。

① 即美国劳工联合会，是1886年成立的美国全国性工会组织。劳联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但反对工人进行政治斗争。

② 行动委员会是由独立工会反对派于1948年5月5日成立的。

№01991

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关于
苏驻德军政府的干部工作给
库兹涅佐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6月9日）

致联共（布）中央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干部管理局武装力量干部处检查了对联共（布）中央1947年4月25日《关于苏联驻德军政府干部工作中的缺点》的决议贯彻执行的情况。……

情报厅对德国苏联占领区各政党和民主团体活动的领导和监督很不得力。对资产阶级政党基民盟和自民党的领导和监督，仅仅归结为在上层中施展计谋，有时也直接采用行政手段。没有为在这些政党里培养和集结最进步的分子和民主主义分子而认真地开展工作。各情报机关在对统一社会党各种组织的领导中继续奉行琐碎监管的政策，人为地为统一社会党造成温室式的工作条件。这对该党在政治上的战斗能力及其干部成长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1947年和1948年第一季度这段期间，青年和妇女民主团体在数量上没有增长。知识分子的工作开展得很薄弱。在宣传苏联的成就方面，事情不能令人满意。书面的和口头的宣传质量低下。联共（布）中央的决议已经下发一年了，过去一年的情况表明，情报厅厅长秋尔潘诺夫同志无法提高各情报机关的工作水平。我们推荐以下人选取代秋尔潘诺夫同志：А. Н. 谢尔巴科夫、Г. К. 采涅夫、Д. А.

波利卡尔波夫^① [联共（布）中央宣传局工作人员的报告对情报厅的工作做了详细论述]。

在情报厅和《每日评论报》编辑部里，对党内的的工作无人过问。编辑部里形成了任人唯亲和停滞不前的局面。

主管政治工作的副总司令马卡罗夫同志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实际上不能长时间地领导苏联军政府各机关的工作。建议任命 A. Г. 鲁斯基赫同志取代马卡罗夫同志……

1948年6月9日

^① 谢尔巴科夫，A. H.（1905～？），时任苏联军政府情报厅主管干部工作的助理。采涅夫，Г. К.（1907～？），当时任职不详。波利卡尔波夫，Д. А.（1905～1965），当时在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01968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福音教会全德代表大会 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7月16日）

……今年7月11~14日，在爱森纳赫市（图林根）举行了福音教会全德代表大会。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德国福音教会的统一宪章，从而实现了三个新教派（圣公会派、路德革新派、加尔文派）的联合，组成统一的德国福音教会。……

结论：

在苏联占领区举行全德福音教会代表大会，具有重要意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对苏占区的良好宣传。西部各占领区的福音教会活动家们与苏联代表的积极交往，有利于消除他们许多不正确的认识和反苏偏见。甚至代表中一些反动分子也没有胆量利用代表大会的讲坛来反对苏占区和苏联的占领政策，代表大会没有超出讨论纯教会问题的范围。

由于代表大会的结果，苏占区福音教会的威望及其对全德国宗教生活的影响都有所提高。

教会在德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要求苏联军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对福音教会活动的关注，并充分利用一切可能性按照我们需要来影响宗教界的进步分子（包括西部各占领区）。

№01969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农民民主党 占领区代表会议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7月23日）

……今年7月16~17日，在什未林市举行了德国农民民主党占领区代表会议，与会的代表有123人，代表着德国苏联占领区的各个专区。

占领区筹备委员会主席恩斯特·霍尔登鲍姆就筹委会的活动和党的任务做了详尽的报告。……

选出了党的临时中央理事会和党纲党章起草委员会，后者应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前完成修订文本。

理事会由19人组成，其中15人是统一社会党党员，4人是无党派人士。当选者中间有4名妇女。

一致选举恩斯特·霍尔登鲍姆为党的主席，鲁道尔弗·阿尔布莱希特（勃兰登堡专区党的筹委会主席）为副主席。

管理党务的负责人是中央理事会成员保尔·肖尔茨（统一社会党党员，农民互助会报纸《自由农民报》副总编）。……

结论：

1. 代表会议基本上是高水平的，符合我们在筹备过程中规定的政治路线。

2. 代表会议表明，许多被提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人，在政治上都很成熟，在建立党组织的活动中有能力正确估计形势和寻找所需要的策略方法。另外一部分工作人员（当然人数不多）是从统

一社会党中选派到农民党中来的，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新岗位的特点。譬如，有一位代表认为有必要在代表会议上仔细地讨论铁托等人关于南共溶入南斯拉夫人民阵线的错误。

3. 由于党在农民居民中间很受欢迎，党的个别工作人员，其中包括统一社会党党员，沾染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尤其是表现在他们过分强调农民党将在德国农村中起重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通过检查发现，他们有时已经不愿意听取统一社会党的建议和指示。这一点尤其危险，因为统一社会党本身在个别情况下对监督不久前派到农民民主党里去的党员的工作也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

4. 党内，有时是由于疏忽，有时是出于自觉，推崇这样一种论点，认为农村没有阶级差别，农民普遍具有“革命性”。

清除这种论点是很重要的，以便杜绝富农和投机分子钻进党的队伍中来。

5. 在代表会议上发现农民害怕新的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当发言者谈到党关心保护农民的私有财产时，每一次都在会场里同时出现一些呼声：“让党明确地和公开地声明，它将保护农民现有形式的财产。”

会上不只一次提出意见，认为在党的临时纲领中的如下表述是不够的：“……我们正在争取以最快的速度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从而实现土地改革的宗旨，并建立起健康有效的农民经济，这种农民经济是私人所有制，是农业生产的基础。”

上述结论已向党的主席霍尔登鲍姆和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通报。

为了尽快在各级组织把党的工作机关配备齐全，已经采取了措施。

№01970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十二届全会给巴兰诺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8月2日）

……1948年8月28~29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二届全会。

全会讨论了两个问题：

1.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报告人瓦·乌布利希）
2. 十一月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报告人奥·格罗提渥）……

讨论格罗提渥的报告时有11人发言。……

厄尔斯纳谈到左派的错误时指出，不能把它与社会民主党领袖的叛卖行径相提并论。

谈到苏占区的国家性质时，他认为这是从资产阶级国家向人民民主国家过渡类型的国家。……

阿克曼批驳了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特殊的德国道路的流行“理论”。他认为，通往社会主义只有一条道路，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所指出的道路。阿克曼还特别强调，没有苏联的援助和友谊，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

结论：

1. 全会具有很高的政治水平。所有在讨论中发言的人都第一次使用了准备好的发言稿。

2. 乌布利希的报告不同于以前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报告，具

有充实而深刻的政治内容，集中讲了中央书记处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他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人，这是以前不曾有过的。

3. 奥·格罗提渥的报告证明，格罗提渥个人以及整个党在其良好的发展中无疑地向前迈进了一步。然而，报告中也存在许多细节上的疏漏，一系列论点尚需补充和修改，尤其是涉及帝国主义特征的那些章节，以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社民党中三种思潮的评价。报告中还存在着对于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过去各打五十大板的倾向。对右派的批判很激烈，但另一方面多少夸大了左派在策略方面的错误。

该报告以及报告中所提出教育党员方面的任务，在进一步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将起到良好的作用。

4. 对报告的讨论表明，某些前社会民主党人对于苛刻地评价社民党过去的领导政策过分敏感。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讨论中发言的11个人中间只有3个人是前社会民主党人，虽然中央书记处事先要求书记处全体成员都发言。

譬如，费希纳曾答应发言，甚至报了名，可是第二天却没有到会。

卡尔斯腾没有发言，借口说理论准备薄弱。弗·艾贝尔特保持沉默。

5. 全会根据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公报^①向党提出了明确的任务。

^① 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6月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背叛国际主义，走上了民族主义道路。

№01992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关于检查苏驻德军政府 情报厅工作给希金的报告^①

(1948年8月17日)

致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

约·瓦·希金上将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我从今年6月22日至7月24日赴柏林和德国苏联占领区出差，任务是按照今年3~4月份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检查情报厅工作时所做的指示精神，协助情报厅重新安排其工作。

在协助情报厅和研究它在中心及地方各个机关的工作过程中，我得出了结论：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下达指示之后过去了一年的时间，在一系列问题上，主要是在统一社会党的工作方面，工作有一定的改进。例如，根据情报厅的建议，统一社会党对党内教育体制进行了改革，重新审查了专区和区级党校旧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增加了关于苏联、关于新型的党的新课题。尤其是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列宁和斯大林阶段的学说。

为培训党校在职教师而举办了专门培训班，为占领区各大学举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师培训班。统一社会党内部开始更坚决果断地开展反对舒马赫派分子的斗争。采取措施加强统一社会党在工会

^① 1948年9月11日，总政治部副主任沙吉洛夫将该报告提交给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并建议中央听取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的工作总结。联共（布）中央关于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工作的决议草案利用了该报告。

和其他社会团体中的领导作用。

特别是由于新任主管政治问题的副总司令鲁斯基赫中将同志到任，^① 苏联军政府的政治机关和所有其他环节对于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的态度有所好转。

然而，在大多数问题上，而且是在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情报厅的工作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1. 在关于联盟的政策问题上，也就是关于吸引德国居民非无产阶级阶层——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中产阶级——参加德国民主重建的事业，情报厅完全没有按照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指示的精神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情报厅不仅没有根除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而且更有甚者，实际上走上了加深这些错误的道路，修正和批评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指示。譬如情报厅厅长秋尔潘诺夫上校援引政治顾问谢苗诺夫同志的话，不只一次公开地向自己的工作人宣布，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做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作的指示是不正确的，在莫斯科被联共（布）中央否决了。于是对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所有其余的指示也都出现了怀疑主义的态度，这不利于动员各机关改进工作和纠正错误。

因此，在苏联军政府和情报厅机关的领导人中间关于德国发展道路、关于统一社会党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至今还流行着不正确的认识。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就所有这些问题的指示和解释并没有真正传达给各专区情报处的工作人员，更不要说区级情报科和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了。

评价苏联占领区政治发展的近期前景中的左倾错误和想要跨越

① 根据联共（布）中央 1948 年 6 月 2 日的决定，批准鲁斯基赫替代马卡罗夫担任主管政治问题的副总司令。

还没有完结的发展阶段的企图，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论调：

(1) 苏占区里现在已在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工作。

(2) 各反法西斯政党联盟已经过时无用了。到了从各党联盟转到人民阵线的时期。

(3) 争取实现德国统一与公正和平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该成为人民阵线的机关，管辖人民监督团体，实质上就是取代地方政权机关。

下面是这类错误的几个鲜明的例子：

图林根专区召开了卫戍司令、副司令和各区情报科科长会议，专区军政府管理局局长科列斯尼钦科少将在会上发表的讲话维护这样的论点：“我们在德国要建立的不是一般的爱好和平的民主共和国，而是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列斯尼钦科指责统一社会党“讨好各资产阶级政党”，他宣称，“应该发动阶级斗争，而不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转来转去。”

梅克伦堡专区军政府政治部副主任尼基佩洛夫同志在7月上旬召开的卫戍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上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统一社会党在我们占领区不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分掌政权”。

梅克伦堡专区情报处处长别利亚耶夫上校宣布，在我们面前摆着的任务似乎是“不准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妥协”。

联盟的政策似乎已经过时了。例如，图林根专区情报处处长马卡鲁申少校在6月30日召开的各情报机关领导人员会议上发表了这样的论点，“关于联盟已经没有什么可操心的了”，一些新的政党——民族民主党和农民民主党——成立以后，似乎“已经到了从各党联盟转向人民阵线的时候了”。情报厅的领导人并没有对他予以纠正。不仅如此，这种观点在同一次会议上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副厅长阿勃拉莫夫上校的总结讲话中得到了间接的肯定，他宣称：“不需要让联盟活跃了。对于加强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在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现在存在着比各党派联盟更有利的条件。”秋尔潘诺夫上校在会上的插话中也表示了这种观点。

这些左倾错误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各党派联盟以及统一社会党在这个联盟中的领导作用，造成统一社会党的自我孤立，给团结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进步分子的工作造成了困难。

所有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苏联军政府情报厅的领导人时至今日在各反法西斯政党联盟的问题上仍然持有不正确的立场，这无疑将给我们在德国的政策带来直接的损害。

2. 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向情报厅指出了一个最严重的错误，这就是它不了解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实际情况，不了解这些政党的领导干部，对待这些政党内部的进步分子没有进行教育、调查和团结的工作，并且逐渐地用他们取代自民党和基民盟领导中的反动势力。最近三个月以来，在这方面没有出现任何好转。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全部工作同以前一样，只局限于在上层施展计谋，提拔自民党和基民盟的一些人，把另一些人排斥到次要地位上去。在当前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化的条件下，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各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中持续不断的“危机”。

情报厅不了解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干部，这从图林根专区银行行长阿尔封斯·格尔特纳逃往西部占领区这个事例中便可看出来，情报厅几个月以来一直十分卖力地想要把他推上自民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岗位。^①

不了解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实际情况，不理解做这些政党工作的任务，可以证明这种情况的是在情报厅为苏联军政府各专区领

^① 1948年8月格尔特纳在逃往西占领区前给自民党理事会的信中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说，他不希望被选为自民党主席，也不可能苏占区按自己的想法开展政治活动。

领导人会议编写的指示草案中提出了如下提纲，这个文件说：基民盟和自民党所举行的各专区代表会议证明，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了，这些政党里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反动分子。这些党内存在着领导之间的矛盾，在我们的协助下，党的工作人员以及相当一部分“反对德国苏联占领区里实行民主改革的普通党员”缓慢地，但毕竟是在贯彻民主路线。

在这个提纲中一切都被颠倒了。情报厅的领导人竭力间接地为自己对各资产阶级政党采取的错误政治路线辩护，企图把各资产阶级政党的普通党员群众划到“反动分子”队伍中去，而把这些政党领导人的个别宣言当成“民主路线”。因此，情报厅并非偶然地把自己对各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作只局限于在上层施展计谋，而忘记了在基民盟和自民党的队伍里存在着数万名真正误入迷途的德国工人和农民，应该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役中拉出来，而不是把他们打入“反动分子”的行列。

3. 不正确地对待各党联盟，没有认真做各资产阶级政党的进步分子的工作，这也与另一个严重错误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不正确地依靠统一社会党，认为它是德国苏联占领区惟一的“统治”党，是“占统治地位的执政党”。统一社会党还远远没有根除宗派主义错误，在这种条件下如此依靠它，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统一社会党在各反法西斯党派联盟中的自我孤立，削弱联盟，并且人为地煽动起其内部的斗争。这也势必加强各资产阶级政党对统一社会党的不信任，给团结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进步分子和使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增加了困难。

自民党一些代表要求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拉乌接见，可是在会客厅里等候了三个小时之后，却遭到这位统一社会党党员的拒绝。这个事实可以成为鲜明的例证，足以说明联盟遭到了削弱，联盟内部斗争毫无理由地尖锐化了，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内部额外地、人为

地引起了反对统一社会党的情绪。

情报厅建议统一社会党进行反对舒马赫派分子的斗争，认为这是党的主要危险，这是正确的，但同时却完全忽略了必须帮助统一社会党克服宗派主义错误。而在目前德国处于分裂的条件下，在前德国共产党人中间却暴露出宗派主义情绪的增长，这也势必会削弱联盟政策。

这种排斥中间阶层参加德国的民主改造的左倾宗派主义性质的错误，在苏联军政府和统一社会党的基层组织中经常可以见到，在情报厅的中央机关和统一社会党的各中央机构中也存在着。

4. 自从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对情报厅的工作进行考察以来，在协调苏联军政府各个机关对德国居民进行政治工作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也没有发生任何好转的变化。同以前一样，政治宣传往往与苏联军政府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行政措施相脱节。苏联军政府各个中央管理机构——财政、经济计划、交通、农业等等，都根据自己的方针制定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没有及时向情报厅通报所拟定的措施，也不关心以最好的方式从政治上和宣传上确保苏联军政府这些行政和经济措施的贯彻实施。譬如说，在苏占区进行货币改革时，情报厅的各个机关没有得到财经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精心指导，不了解苏占区民主的货币改革与德国西部占领区进行的反人民的货币改革相比的各种社会优越性。

另外一个例子：今年6月，国家安全机关开始释放被拘留的和被逮捕的下层纳粹分子，并且建立了关押被捕人员的新制度，宣传部门对此也完全没有做好准备。因此，这一重大的政治措施完全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没有产生任何政治效果，本来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台和报刊对它进行全面宣传，那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政治效果。

自从新任主管政治问题的副司令鲁斯基赫中将同志上任以后，确保协调的工作开始有某些进展。遗憾的是，苏联军政府总司令索

科洛夫斯基元帅同志对于这种协调没有给以必要的注意。这从下面的事实可看出来：本来想要在苏联军政府里成立一个宣传委员会，其任务是协调苏联军政府各个环节的工作，并为此制定一个条例草案，送交元帅签署批准，可是却被他驳回了。毋庸置疑，在主管政治问题的苏联军政府副总司令下属正式成立宣传委员会，或者最好是在总司令下属成立这样的机构，会大大减轻和改善协调工作。……

结论：

1. 从上述的一切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必须彻底解决苏联军政府情报厅的领导问题。秋尔潘诺夫上校继续留在情报厅厅长的岗位上是不适宜的，这只能给事业带来损失，因为他不希望而且也没有能力改正所犯的错误，尽管联共（布）中央专门委员会和武装力量总政治部都对他进行过批评，可是他却并没有从这些批评意见中做出自己的应有的结论。有必要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解除秋尔潘诺夫上校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厅长职务的问题。我认为，讨论任命现任柏林市卫戍司令科吉科夫少将为情报厅厅长的可能性是适宜的。在当前的条件下，他的副手叶利扎罗夫上校完全能够胜任卫戍司令的工作。如果从国际形势考虑，认为调动科吉科夫将军担任别的工作是不合适的，那么我则推荐现任勃兰登堡专区苏联军政府管理局局长沙罗夫少将同志作为人选。

2. 请求联共（布）中央尽快审查情报厅的工作问题，就情报厅工作的最重要的问题给苏联军政府的领导人下达指示。

3. 为了协调苏联军政府各个环节在德国居民中间开展政治工作方面的步调和确保集体决定宣传内容及其基本要点问题，建议苏联军政府总司令在自己的领导下成立宣传委员会。

4. 组织对情报系统工作人员的干部培训，不是按照手工业方式，而是按照国家的要求来进行。为此，应在苏联军政府情报厅下

面设立经常发挥作用的为期半年的培训班，人数为 205 人。联共（布）中央机关可通过特殊动员的方式，在苏联国内，主要是从有良好理论知识的党的宣传员和党的组织员中间为这些培训班招生。只有培训干部才能消除工作人员的不配套和确保逐渐更换在德国工作三年以上的人员。

5. 将现在独立存在的苏联军政府情报局合并到情报厅。任命苏联军政府情报局局长科尔狄宾中校同志为情报厅副厅长，让他领导统一的宣传处，该处将直接领导报刊和广播电台。

6. 建议苏联军政府政治部协助情报厅成立一个充实的编外讲座团，其成员可从苏联军政府其他管理机构和各部、处的工作人员中挑选有足够政治水平的和熟练掌握德语的人员。建议苏联军政府政治部给各地方苏联军政府政治部下达指示，协助情报机关克服个别做德国知识分子、德国党政领导和国家干部的工作时仍然存在的有害弊病。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中校^①

1948 年 8 月 17 日

^① 康斯坦丁诺夫斯基，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第七局四处副处长。

№01971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十三届全会给波诺马廖夫^①的报告（摘录）

（1948年9月17日）

……1948年9月15~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举行了第十三届全会。

会议议程中有下列问题：

1. 中央书记处的总结报告（报告人赫尔穆特·莱曼）
2. 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在理论上和实践中的意义（报告人瓦尔特·乌布利希）
3. 理论委员会的总结，题目是《十一月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报告人弗莱德·厄尔斯纳）

全会开始时，全体成立，为安得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默哀，威廉·皮克讲述了他的生平道路。……

厄尔斯纳在报告中阐述了修订过的关于1918年十一月革命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教训的基本论点，然后展开讨论，具有很高的思想理论水平。

在对这项议程的讨论中，有八个人发言，其中有两名前社会民主党人（格罗提渥和莱曼）。

发言者注意的中心有三个问题：（1）关于对苏联和联共（布）

^① 波诺马廖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1905~?），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所属情报局副局长、局长，1947年9月起任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的态度，(2) 关于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的德国道路，(3) 关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中所提出的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与民主的道路。

几乎所有的发言人，特别是威·皮克、万德尔、厄尔斯纳和瓦尔特·菲什，都强调必须与反苏言行进行斗争，并且在党内和人民中间解释苏联和联共（布）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主导力量的作用。

安东·阿克曼做了长篇自我批评性的发言（虽然在涉及个人对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理论”所负有的责任方面还有严重的缺点）。^①

他认定关于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理论”是一种虚假的、腐朽的、危险的“理论”，这种理论已经成为党的意识形态，正在毒害着党。阿克曼声明，这个没有遭到批评的“理论”的出现，是党在反苏情绪面前退却的结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曾经存在过的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道路，脱离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倾向。从南斯拉夫事件中引申出来的教训，对党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这个“理论”给舒马赫分子、半机会主义分子和民族主义分子提供了伪装，他们实际上打着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旗帜，要求脱离列宁主义。这个“理论”必然导致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基地苏联的敌对态度。这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必然导致这样一种结果：其代表者会成为阶级敌人的工具，成为反革命的旗帜。阿克曼声明说：“我对这个‘理论’负有特殊的责任，因为我在1946年率先发表了《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是可行的吗？》一文，现在我比任何人都更有责任促进在党内消除它。”

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委员保尔·万德尔指出，安东·阿克曼评

^① 1945~1946年阿克曼将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理论作为党的正式路线确定下来。

价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时还有许多东西没有说透，他认为关于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理论”的提出是在合并时社会民主党对机会主义分子的让步。

弗莱德·厄尔斯纳在发言中声称，关于德国通往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的“理论”加强了党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导致把德国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对立起来，在统一社会党内许多人把在德国可以通过和平道路通向社会主义的提法看成是存在着一条没有尖锐阶级斗争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厄尔斯纳接着指出，阿克曼还有另外一种性质的错误，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苏联工人阶级统治的特殊形式，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中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统治”的论点，不是别的，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关于这一点现在不必在社会公众面前大喊大叫，但在党的工作人员当中则需要对这个问题加以明确。……

结论：

1.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三届全会就其开展的辩论内容和性质来说，是前两届全会的继续，旨在从思想意识和组织上巩固党。

在全会的讲坛上第一次把《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原则和目标》中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统治”的论点解释为无产阶级专政。

对这些问题的辩论是具有高水平的。

2. 关于党与工会的相互关系，关于苏联占领区和柏林工会运动中的意识形态上的弱点，关于许多工会工作领导人的活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等问题的提出，在全会工作中也是值得赞许的。

3. 中央书记处总结报告指出，必须改正第十二届全会决议中关于从组织上巩固党的个别不正确的论点，全会决定从情报局关于

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公报和波兰工人党内的事件^①中汲取教训，决定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并且在今年 11 月召开党代表会议，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进一步从意识形态上和从组织上巩固党。

4. 一些前社会民主党人消极地参与第十三届全会的工作，很值得注意。几乎没有一个主要的党的工作人员（格罗提渥和莱曼除外）参加辩论：22 个发言者中间只有 5 个前社会民主党人。在前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可以看到一种压抑感，以及对提出讨论的理论问题无动于衷。

统一社会党勃兰登堡、萨克森和萨克森—安哈尔特等专区理事会的领导人或是没有发言，或是发言时只字不提与舒马赫分子的斗争，这足以说明全会几乎没有注意与舒马赫主义进行思想意识上的斗争问题。可是与此同时，在这些组织里现在已经揭露出舒马赫分子的老巢，他们的活动是相当公开的。

5. 全会工作在组织方面有重要缺陷。瓦尔特·乌布利希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些不足之处，特别是涉及到德国的教训问题，这个报告应该与弗莱德·厄尔斯纳的报告，而不是与中央书记处的总结报告结合起来讨论。如果讨论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就会具有更高的思想理论水平，对厄尔斯纳的报告的讨论也是如此。

提交全会讨论的文件写得很匆忙，因此具有严重的缺陷，需要修改。

① 这里指的是波兰党内出现的所谓哥穆尔卡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危机。1948 年 7~9 月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和波兰工人党积极分子协商会议谴责哥穆尔卡对工人力量估计不足，不理解联共（布）以及苏联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

№01972

鲁斯基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十四届全会给波诺马廖夫的报告（摘录）

（1948年10月27日）

……1948年10月20～21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十四届全会。

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

1. 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总结和党的代表大会^①筹备情况（报告人瓦尔特·贝林格）
2. 党在企业中的工作（报告人弗兰茨·达莱姆和恩斯特·洛哈根）
3. 党内青年工作（报告人恩斯特·霍夫曼）……

结论：

1. 统一社会党第十四届全会的决议将有助于党从意识形态上和从组织上的进一步巩固。

全会提出统一社会党生产组织的工作问题，并且邀请大型人民企业和苏联股份公司企业党组织的领导人列席全会，这是所有的党组织在把注意力转向生产问题和生产党小组的工作方面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一个有利的事实就是工厂的代表在全会上批评地区和专区的党理事会与生产组织联系不密切，领导不得力。党中央理事会的一些

^① 这里是指将在1949年1月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监察员也受到了激烈的批评，因为他们不懂得生产组织方面的工作。

然而，应该指出，改变工作方法，即成立大量的监察委员会，带有官僚主义性质，未必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2. 全会非常注意在苏占区，特别是在柏林，与反苏情绪进行斗争的问题。全会要求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为反对反苏情绪进行坚决的斗争，指出了苏联在保卫和平，维护德国的统一与独立的斗争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全会明确地提出了宣传国际主义思想，加强与各兄弟党首先是与联共（布）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党的联系。

3. 讨论表明，党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进行得还不能令人满意。参加筹备会议的人数很少，出席会议的人平均只占党员人数的10~40%，党员在会议上的积极性不高，批评和自我批评带有泛泛的性质，对社会民主党的思想意识的揭露缺乏针对性。给人的感觉是党肃清舒马赫分子和其他敌对分子的工作止步不前。党的代表大会筹备工作问题在全会上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因为统一社会党各专区组织的领导人不掌握代表大会筹备进程的业务情况，宁肯保持沉默。

4. 对青年工作问题的讨论草率了事，因为没有时间，统一社会党大多数中央理事会成员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01973

科列斯尼钦科^①关于图林根各党派状况 给波诺马廖夫的汇报（摘录）

（1948年11月29日）

……图林根的基督教民主同盟

……

1. 基督教民主同盟今后还是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占领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敌人。

其危险性正在于它适应工人运动，并且尽一切可能从内部瓦解工人运动。

尽管自民党在现阶段气势汹汹，但反对它的斗争并不困难，因为它至今还提出那些陈旧的在劳动者中间不受欢迎的泛泛反对社会主义的口号，直到今天还在公开地歌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的“黄金时代”及其与中世纪相比的优越性，坚决地抵制一切新生事物，而基民盟却不是这样，它在自己的报纸上甚至笼络人心地赞扬企业积极分子开展的亨内柯运动^②等等。

自民党没有基民盟在德国西部所拥有的基础，它的同名党派在那里苟延残喘，在西部三个占领区，这个党的党员总数不超过50000人。在选举期间，无论是1946年还是1948年，它得到的选

① 科列斯尼钦科，И. С.（1907～1984），时任图林根专区苏联军政府管理局局长。

② 阿道夫·亨内柯是苏占区的一名德国矿工，他在1948年的工作中超额完成了定额。效仿他的活动被称为亨内柯运动。

票都没有超过6%。可是直到现在，基民盟在西部各占领区也还是最有政治威信。

在1946年的选举中，基民盟获得了所有选票的31.08%，在整个德国占第一位，包括苏占区在内，还在地方自治会里得到598项委任。

不久前在莱茵-威斯特法伦举行的选举表明，基民盟与前几次选举（1946年获得47%选票，1948年获得37.8%）相比丧失了相当一部分选票，但是仍然居第一位，况且9.6%的选票由那里新成立的中心党^①抢去了，这个党与基民盟相去不远。这一切都说明，苏联军政府应该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基民盟。

2. 苏联军政府对待基民盟所采取的策略路线如果是发现“进步”分子，支持他们与反动分子的斗争，那么这条路线虽然在党内危机时期是惟一正确的，但在现阶段则不能证明是正确的。

这条路线能够导致凯塞及其同伙的灭亡，但同时也会提高其对立派的威望，因为这个党现在给人的表面印象是完全不真实的，是与其实质相矛盾的。这些被推选到苏联占领区各民主机关团体领导岗位上作为代表的所谓“进步”分子，其中大多数人是依据个人想象而不是思想信仰推选出来的。他们目前在人民代表大会的人民委员会^②和其他各种代表机构中代表着党。他们在这里的发言对于不了解事情本质的劳动群众来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社会舆论界根据这样的言论来判断这个党，而实际上在这个招牌的后面却隐藏着基民盟的全部反民主的本质。

因此，现在有必要提出这样的任务：处处揭露基民盟一些工作

^① 中心党成立于1945年，只在战后存在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② 这里指的是德国人民委员会，该委员会是1948年3月17~18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二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

人员的反动活动，无情地戳穿他们。与此同时，统一社会党组织应做好准备，通过这些事例向整个党发动全面进攻。

3. 基民盟正在准备参加市政选举。它表面上做出忠诚于民主改革的样子，侈谈赞同各党派联盟与阶级和平，指望以此来拉拢最多的选民，以便选举之后能把地方自治会、区政府和社区代表机构变成阶级斗争的真正战场。

毫无疑问，选举前的斗争将不可避免地震动这个党的各个角落，并将唤起几十个、几百个迄今还默默无闻的反动分子的积极性，这些人也是苏联占领区里反对统一社会党和新秩序的基本斗士。事情还会由于如下的情况而复杂化：目前有效的议会席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基民盟的成员所占据，他们远不属于进步阵营，而他们首先会积极参加新一轮选举的准备活动。必须事先查清这类活跃分子，密切注视他们，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他们名声扫地，并且逐渐使他们脱离政治生活。

对基民盟的基本任务现在可以归结为：削弱它在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

因此，必须做到：

1. 使除了富农之外的农民转到农民党中来，使工人、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转到民族民主党或统一社会党中来。凡是可能的地方，都应使基民盟的所有地方小组自行解散。

2. 严格监督这个党派的活动。不给它以任何特权。少数地方小组，只要发表反动言论或者个别成员有反动行为，以及有逃往西部占领区者，即可予以解散。

3. 不准在企业建立生产小组。凡是业已建立的，统一社会党组织即应该组织反对他们的活动，在股份公司的企业里，总经理不应该准许这类小组存在。

4.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允许基民盟的成员混进农民互助会的领

导机构、合作社和赖菲森会^①中来。

5. 鉴于目前正在缩减机构，可从地方行政机构的领导岗位上把不合心意的基民盟成员撤掉。

6. 在农村和企业查清通过欺骗手段拉进基民盟的成员，这种人在妇女中往往更多，组织他们公开声明退出，并且指出拉他们进入基民盟的工作人员的姓名。

7. 系统地揭露基督教的主要口号的欺骗性和笼络人心的性质，通过实际的事例来证明其领导成员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经济委员会里通常是一些企业主和富农），证明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纯粹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与基民盟的整个斗争中，应该吸收社会民主党以及民族民主党和农民民主党参加。在工作中查清党内的反动分子之后，将来还是要继续使用真正的进步分子。……

图林根的自民党

……

1. 自由民主党的队伍里笼罩着危机，这是最近一些事件引发的。

2. 从统一社会党和工会方面来揭露自民党的反动活动，引起自民党的个别党员，甚至整个小组退党。

3. 为了努力解脱危机和防止进一步退党，自民党更加强烈地强调自己作为有产阶级利益的保卫者的作用。

4. 党的左派还有微弱的影响，不敢公开地和更坚决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我们对待自民党的策略应该遵循下述目标：

^① 以创始人赖菲森命名的农民互助组织。

(1) 协助统一社会党揭露自民党的反动意识形态，为削弱它对某些居民阶层，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影响。

(2) 坚决制止自民党的反动宣传，干扰（但要巧妙）它举行各种会议；对其报刊宣传尽量挑毛病，但不是通过苏联军政府的机构，而是通过德国的机构和团体，它们应该将其注意力放在揭露和制止自民党的反动活动和宣传上。

(3) 在自民党的基层开展工作，组织自民党党员单独地和集体地退党。

(4) 设法使自民党专区理事会成员之间产生分歧，让党内危机经常使党不得安宁，把其注意力从影响群众的斗争中引开。

(5) 在即将到来的选举（1949年）前的斗争中，千方百计地削弱自民党在这场斗争中的能量，使其失去在1946年曾投了自民党票的大部分选民。

民族民主党和基督教民主党

这两个党派人数还很少，力量薄弱，暂时在群众中没有影响，目前我们只是在物质和组织问题上以及在城乡吸收党员方面帮助他们。……

№01974

鲁斯基赫关于苏占区管理机构领导干部 组成状况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8年12月11日）

……建议：

1. 必须采取更大胆地从工人阶级、贫农中农群众、经过审核的技术知识分子中提拔德国管理机构领导人的方针。必须使占领区和专区各种管理机构的领导职务中的工人比例达到50%以上。

2. 如上所述，行政管理机构严重不纯，但德国管理机构在实现经济发展和保障经济不依附于西方而保持独立的纲领中的作用却日益加强，考虑到这些情况，必须在3~4个月以内依靠德国人的力量对整个国家机构进行一次详细的清查，同时以工人阶级和居民的其他劳动阶层的优秀代表来充实它。

3. 必须特别注意对管理干部的培养。现有的专区行政党校和不久以前开学的占领区的行政学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干部日益增长的需要。

对行政工作人员的政治教育及其业务能力的提高，应该获得更广泛的基础。……

4. 统一社会党的党组织在管理机构中的作用还非常小。管理机构中的统一社会党小组在组织上服从地区和分区的小组领导。这就削弱了统一社会党党组织在管理机构中，特别是在像国民经济委员会、占领区各部门管理机构、各专区政府这样大型的机构中的意义。应该使统一社会党在国民经济委员会中的党组织归统一社会党

中央书记处领导，对于占领区其他机构中的党组织也应该这样做。专区政府中的党组织应归统一社会党相应的专区理事会管辖。

5. 所提出的任务在仔细研究管理干部状况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地实现，况且这种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审阅自传和登记表（顺便说一下，这些登记表都是德国人填写的）。主要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考核干部的工作、对待我们的态度、对待建设和平与民主的德国这一根本问题的态度。

№01993

苏驻德军政府党的积极分子 1949 年
经济 - 政治工作会议速记记录 (摘录)^①

(1949 年 3 月 9 日)

苏联元帅索科洛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

关于苏驻德军政府各机关工作的某些问题

整个德国，特别是苏联占领区内形成的新局势，以新的方式在苏联驻德军政府各个机关面前提出了对德国各民主党派和团体进行监督的问题。这样一来，我们对各社会民主团体的工作就应该促进统一社会党在这些团体中影响和威信的提高。首先需要使统一社会党对这些团体进行领导。这有助于统一社会党干部的培养。

对待德国民主党派和政权机关应该避免使用命令的方法，可是在我们很多卫戍司令部的工作中却存在着命令的方法，而且并不只限于卫戍司令部。斯大林同志不只一次地警告过我们党的工作忽视民族特点的危险性，如果不考虑到这些特点，在工作中不考虑该民族的阶级构成、文化、生活方式和历史的特点，就会使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庸俗化，从而也就歪曲了党的政策。斯大林同志说：“这种情况会偏离共产主义，导致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

① 1949 年 3 月 26 日苏驻德军政府政治厅厅长鲁索夫将该记录提交给苏斯洛夫。

罗斯沙文主义。”

若不是某些同志头脑里殖民主义思想作祟，何以解释这样一些事实，例如在施特拉尔松卫戍司令部里，司令官开始指挥市长、区党组织的领导人，不愿意倾听他们的意见，而是进行粗暴的侮辱性的谩骂。

这种情况与苏联的占领政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苏联的占领政策应该是善于巧妙地把列宁、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应用于德国的条件，尊重别的民族，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应该同时保障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德国得以实现，这涉及到战争赔款，也涉及到对社会生活的民主改造。

最近一个时期，苏联军政府各机关在对德国各民主党派和团体的工作方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目的是使双方更加密切。我认为党的积极分子应该赞同这条正确的路线，因为只有我们在劳动群众相互信任和自愿要求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德国的政策才是牢不可破的。

英国、美国和法国占领当局企图在殖民主义或半殖民主义基础上建立自己在德国的占领政策。他们也不可能有另一种做法，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

我们有一切可能形成与此针锋相对的自己的占领政策，也就是这样一种政策，能够创造确保苏联人民和德国人民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的条件，这就意味着必须更接近当地的劳动群众，了解他们的困难、需求和利益，在占领区内实施社会的和经济的政策时，必须注意到我们在德国所遇到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以及历史的特点。

苏联军政府在德国赢得了德国社会进步人士，首先是统一社会党的信任和爱戴。应该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驱散德国帝国主义势力在德国培植的劳动群众对苏联人民不信任的气氛，使两国人民建立起平等与和平共处的关系。这不仅能加强我们在德国的地位，

而且将撕下帝国主义分子的假面具，他们伪善地喋喋不休地侈谈什么要照顾到德国的利益，可是却竭力控制它，使它处于帝国主义统治的范围之内，奴役德国人民，唆使他们反对苏联。……

秋尔潘诺夫同志（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厅长）：

完成经济计划和战争赔款计划，巩固在占领区内进行的各项民主改革并且使占领区在政治上健全起来，对于巩固我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有着巨大的影响。如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所指出的，这是在非常复杂的条件下，在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占领区内，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在进行着斗争，德国反动势力以及在双占区恢复了自己地位的德国垄断资本，在我们占领区里与进步分子展开了斗争，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企图把双占区变成在欧洲进行反对苏联的军事冒险的前哨阵地和桥头堡，力图削弱我们占领区的经济。

如果我们不能使德国居民的基本群众相信巩固占领区的任务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只是苏联军政府的事情，使他们相信发展经济、提高政治热情、巩固民主改革，这一切都是他们所加入的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切身事业，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胜任巩固占领区的伟大任务。

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家的艺术不是要把尽可能多的人和整个阶层推到或划到我们敌人的营垒去，而是相反，要找到能够扩大与臭名昭著的敌人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民主统一战线的道路，找到能够使广大居民群众，甚至其他政党中的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近统一社会党的道路。因为这些都是德国的政党，我们占领区各政党之间存在着矛盾，这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但是除了这些矛盾之外，还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把他们连在一起，例如为德国民族统一、为签订和约而斗争，改善居民物质状况的问题等等。因此，巩固报告人所讲到的各党联盟，对于完成两年计划，对于改善我们占

领区普遍的经济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巩固各党联盟，意味着首先是巩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统一社会党的影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不只一次说过，只要整个阶级，只要所有的广大群众还没有占领阵地，或是从根本上支持先锋队，或是采取必要的中立政策，仅仅靠着先锋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我们的党，我们政府的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团结德国民主力量。这首先是我们为统一的民主的德国，为签订和约，为反对美国的殖民化和剥夺德国主权的政策而进行的斗争。

斯大林同志在《列宁主义问题》中，在关于战术和战略的章节里不只一次地指出，必须找到敌人最薄弱的地方。美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就是他们对德国人民政策的反人民性和反民族性。这是一条很长的战线，我们可以组织统一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同盟中最进步的力量、自由民主党以及加入各种社会团体的广大非党群众在这条战线上进行共同的斗争。

各资产阶级党派参加共同的反法西斯联盟，有一系列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是单独一个统一社会党所不可能拥有的。例如，基督教民主同盟主席努什柯到了西部占领区。他在吕贝克和汉堡发表讲话，用具体的事例表明，德国的分裂意味着这些城市经济地位的削弱和经济的衰退。他不仅向工人群众，而且也向小企业主、小资产阶级说明他们的状况正在不可避免的恶化，并呼吁他们起来反对分裂德国的美帝国主义。

这条支持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解放运动的路线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占领区的政权维护了德国人民及其基本群众的利益。这特别表现在对人民委员会运动的支持。这些人民委员会的地方组织不仅具有对外政策的意义，而且对于解决我们占领区存在的具体问题

也有重要意义。两年计划及其基本的社会经济目标使我们可以吸引暂时还不信任统一社会党而参加了其他党派并服从他们的那些阶层来完成这一计划。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计划的一些要点，如改善劳动者的物质水平，吸引了各个党派广大阶层的原因，尽管他们在一系列其他问题上与我们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完全有可能吸引居民的各个不同阶层来完成两年计划的各项任务。我们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治措施，如成立机器出租站，加强了我们的力量。

对于争取那些加入了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群众的斗争来说，基督教民主同盟和自由民主党在其最近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的纲领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个党的纲领承认所进行的民主改革，这是一个进步，给我们提供了武器，使我们能够在这两个党的范围内，在合法的基础上，依据其代表大会以及代表大会的决议孤立反动分子，消除其影响。做这项工作不能采取行政手段。诚然，当我们筹备自由民主党代表大会时，我们曾积极地参与了各项工作，可是现在的任务却在于依据自由民主党的纲领，在其内部提拔能够参加执行两年计划的和维护基本的民主改革的最进步的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巩固这两个党，我们确实需要把这两个党作为政党列入我们的共同工作。只有建立在对反动分子进行系统揭露和孤立的基础上，才能把这两个党列入我们的共同工作。这也能为反法西斯的统一联盟中各个党派的工作提供基础。……

我们还有两个政党，我们在这里谈得很少，工作也做得很少，但赋予了他们自己应有的使命，即加强进步分子在资产阶级政党中的影响，这就是民族民主党和农民民主党。这两个党履行着非常重要的政治使命——吸收目前由于一系列条件没有加入统一社会党的人员并在他们中间巩固自己的影响，并将与统一社会党一起为影响

尚处在基民盟和自民党影响之下的群众而成功地开展斗争。这两个新的政党是这样成立的，那里没有旧的活动家，不像基督教民主同盟那样直到现在老人也没有被新人所替代。加入民族民主党和农民民主党的新人受到了进步政党的影响，这些政党用民族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引导他们与统一社会党建立联盟。从而削弱了另外两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地位，这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我们只要观察一些结果，便会发现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请看有关农民互助会改选的材料。25%的委员会（共有12000个互助会应该选举委员会）进行了改选。我们看到统一社会党的影响在逐渐缩小，这是由于非党人数的增加，在农民党委员会中的影响增加得极其微弱。前一次，我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靠着行政手段才取得了统一社会党党员的较大比例。这是需要的。可是后来争取群众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够，而因为我们不能采用行政措施，于是我们便发现我们自己的地位没有巩固。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反对统一社会党的激烈斗争。

（谢苗诺夫同志插话：关于党派和无党派的问题不是这样在我们的工作中提出的）。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对我们现在的情况的分析，说的是工作中的缺点，这也是我要注意的。对于“提拔”无党派人士需要分析。它意味着统一社会党影响的缩小，这并不是好事。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迫使富农和具有反苏情绪的分子脱离基督教民主同盟，披上无党派的外衣，他们在这种外衣下有更多的机会参加某个社会团体。因此，这不是抽象提出的关于党派和无党派的问题。当然，提拔无党派人士本身，如果不分析这是什么样的无党派，就不能向我们说明任何问题。

阶级斗争的形式是非常复杂的。我举几个与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有关的例子。首先，这是工会里的斗争，那里改革的倾向很强烈，至今也还远没有消除。我们遇到的是反对亨内柯运动的斗争，这个运动受到责难，被说成是剥削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更好地完成劳动任务针锋相对，过分地要求急剧地改善物质状况。

敌人的反抗是各种各样的，例如高等学校笨拙的官员不接收股份企业和国有工业企业工程师的子女，说什么因为必须保证大学里工人成分占大多数，而厂长的儿子会破坏“社会成分”。但当时这个厂长正在为工作条件与我们进行联系，与我们的占领区进行联系，自然，假如我们不给他提供让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条件，他就会到西部去。

我可以这样说，这样做是如何败坏了苏联军政府整个政策的名声，这样人家就会散布谣言说，俄国人不允许洛伊纳工厂厂长的孩子进入大学。

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统一社会党的基层组织阻止我们的厂长提出让一个以前挂名的纳粹党员继续任职，而他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重要的专家。他已经工作了三四年，我们的厂长对他给予好评，可是统一社会党地方组织却从宗派主义出发表示不同意，即使托洛茨基分子没有对此进行攻击，但这种事实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厂长没有同意统一社会党党组织的这种理由。他再次进行了考核，决定把这位专家留在我们的占领区。

还有许多阶级斗争的其他事实，特别是在德国人中间选拔关于苏联文化问题的报告人方面，他们本来应该宣传苏联的成就，可是却在德国人眼里败坏我们国家的名声。譬如说，前两天送来苏联文化研究会一位活动家的报告提纲，他说他到过列宁格勒，亲自确认了“苏联银行的无限权力”，其权力似乎是如此之大，如果企业不能完成计划，无论是厂长还是工人都领不到工资。

还有另外一件事。一个“目击者”从战俘营归来，证明苏联一

一切都组织得很好，譬如说，在纺织厂里，如果是织布车间女工的孩子，他就穿蓝衣服，如果是看管纺纱机的女工的孩子，他就穿红衣服，因此一下子就能断定孩子的母亲是哪个车间的或看管哪种机器的。

应该看看这是否是偶然的，是出于不理解，还是有意败坏我们制度的名声。因此，提出宣传苏联的任务时——我们越来越多地吸收德国人参加宣传工作，就应对这个部门给以特别的注意，进行特别的监督。远非每一个德国活动家都可以允许参加宣传苏联的工作。否则，这只能带来损害。……

№01975

秋尔潘诺夫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二十届全会给联共（布）中央的报告（摘录）

（1949年7月26日）

……7月20~21日，在柏林举行了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第二十届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

1. 政治局工作总结（报告人奥·格罗提渥）

就改进党的组织工作问题的副报告（保·威尔纳）

2. 关于民族战线（报告人弗·厄尔斯纳）

3. 关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居民生活水平（报告人亨·拉乌）

关于生产定额的副报告（弗·泽尔布曼）

……全会的工作进程表明，建立民族阵线问题上，甚至在党的中央理事会成员中也存在着许多模糊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与居民中资产阶级阶层和活跃的前纳粹分子合作的问题上，以及民族阵线与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如何把建立民族阵线的任务与巩固苏占区反法西斯的民主秩序的任务结合起来的问题上，以及关于民族阵线的组织形式及其实际行动的问题上，存在着思想混乱。

全会表明，党内像以前一样忽视组织工作的意义。其证明是没有对《关于改进党的组织工作》的决议进行有效的讨论。

我认为全会决定在党的组织机构中保留所谓督察员领导的分区机构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机构是党的基层组织与区理事会之间的障碍。此外，督察员身在分区机构，不可能对区理事会进行监督。

关于撤销区理事会下属的青年和妇女书记处的决定，有些为时过早。此外，这也与政治局关于加强妇女和青年工作的决定相矛盾，这个决定规定党中央理事会每个处都设专职的妇女工作人员。

格罗提渥在报告中广泛利用了情报厅工作人员对统一社会党一系列组织考察的材料。

№01994

阿巴库莫夫关于菲尔德曼供词 给马林科夫的报告（摘录）^①

（1949年8月9日）

……苏联驻德军政府情报厅的工作人员约·莫·菲尔德曼被苏联国家全部逮捕，现将审讯此案过程中得到的材料汇报如下。

约瑟夫·莫伊谢耶维奇·菲尔德曼，1905年出生，犹太人，苏联公民，1928年的联共（布）党员，因被怀疑与外国人有特务联系而被捕。……

菲尔德曼在审讯时供认，情报厅厅长秋尔潘诺夫知道他的罪行，并纵容他，同他一起参与犯罪交易，进行勒索。

据菲尔德曼说，1946年夏，他从特别快车出版社基金中转交给秋尔潘诺夫10000马克“医疗费”。后来，秋尔潘诺夫不只一次向菲尔德曼要求从该出版社给他拿钱。

1946年，秋尔潘诺夫要求菲尔德曼以出版社的名义以礼品的形式向他赠送艺术作品。根据这一要求，菲尔德曼在不同时间里用德国特别快车出版社的钱为秋尔潘诺夫购买了德国雕塑家雷诺·欣特尼斯的雕塑，价值25000马克，法国画家的小型彩画，价值1200马克，德国画家佩希施坦因的两幅绘画，价值6000~7000马

^① 档案原件上有苏斯洛夫的批示：“让沙吉洛夫同志召秋尔潘诺夫到莫斯科来，理由是为解决一些必要的工作问题，听取秋尔潘诺夫的解释和他所提出的建议。”阿巴库莫夫，B. C.（1908~1954），1946~1951年任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

克。

从菲尔德曼的供词中可以看出，秋尔潘诺夫卖给特别快车出版社一辆轻便汽车，通过这笔买卖赚了15000马克。

菲尔德曼一案的审理还在继续。

考虑到菲尔德曼关于苏联军政府情报厅厅长秋尔潘诺夫直接参与菲尔德曼犯罪活动的供词，认为有必要把秋尔潘诺夫召回苏联。

请求您的指示。

1949年8月9日

No01976

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关于统一社会党
政治局讨论西德议会选举结果给
联共（布）中央的汇报（摘录）

（1949年8月20日）

……会议听取了马克斯·莱曼关于选举结果的汇报。^①……

秋尔潘诺夫同志声明说，必须向共产党员讲清选举运动期间所犯的 error 和出现的缺点，以便教育全党，同时分析各方面的形势，指出巩固党的影响的途径。秋尔潘诺夫同志说，选举结果说明，美国的政策在居民中是有“威望”的，共产党没有向居民证明美国政策的反民族性，没有揭露基民盟是曾经把德国引向毁灭的那种势力的维护者，等等。他们还谈到出现了某种向右的转变。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共报刊中出现了这样的论点：“选举的结果是选民的重大错误”。需要坚定地 and 耐心地解释这种关于选民错误（错误决定）^②的论点。与此同时，不应该忘记，如果能够正确地利用客观的条件，就会大大提高德共的影响。

秋尔潘诺夫同志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诸如美帝国主义使西德经济遭到损失、美国大兵的行为、部分居民对“马歇尔计划”的失

^① 联邦议院的选举是1949年8月14日在西占区进行的，赞同德国共产党的有136万票（占5.7%）。1949年8月19日，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皮克的办公室对西德议会的选举结果进行了讨论。

^② “错误决定”一词在德语中与“公民投票”相似，这里暗喻选举结果是人民的决定。

望、西方大国的占领对民族尊严的伤害、失业、一些小企业的破产。秋尔潘诺夫说，这些因素在选举的进程中产生了影响，可是对增加拥护共产党的选票却没有起到作用。那一部分不满于现状的居民没有向左，而是向右转了，这就促使像“德国党”、“德国右翼党”、“巴伐利亚党”、洛里茨党^①这样一些党派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秋尔潘诺夫强调说，不应该随着选举的结束而停止向广大居民群众说明他们所犯的错误，也不应该停止揭露选举和选举法的反民主性质，以及占领军及其德国代理人在选举期间的暴力行为和限制自由制度的行为。他说，德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很淡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不强。二者相互影响。向群众解释所成立的西德国家的反民主性质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揭露阿登纳^②分子、舒马赫分子、洛里茨分子及其一伙所推行的政策，他们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

从这个立场上首先应该宣传苏联。宣传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德政策，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这种宣传应该从各个方面具体地、令人信服地用实际材料来进行。秋尔潘诺夫同志说，许多人对苏联的评价是以苏联占领区所做的一切为基础的。由此产生了让外界了解占领区的任务。但这样做的时候，不能只是通过抽象的一般性的形式。应该向西德工人介绍，苏联股份公司这样的企业是人民的企业，这些企业拥有什么样的条件，苏联占领区如何消灭了旧秩序，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这样做很重要，因为完全可以推测，不久将要建立的西德傀儡政府一定会发表宣言，说它是德国主要部分的

① 洛里茨，阿尔弗莱德（1902～1979），1945年创建和领导了经济恢复委员会。

② 阿登纳，康拉德（1876～1967），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创建人之一，1946年当选为该党主席。1949年8月该党在联邦议会选举中获胜后，阿登纳出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

政府，是所谓未来的“国家核心”，苏占区应该加入这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向群众说明，这个“国家核心”是帝国主义国家美国建立的，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为实现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服务的。秋尔潘诺夫同志还谈到，必须推广苏联占领区建立各反法西斯党派民主同盟的政策，并开展活动，把这一政策同西德多数党派无原则联盟的政策对立起来，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执行的是外国帝国主义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揭露“国家核心”的领导人，揭露美国人在自己的代理人右派政党协助下所推行的政策，应该把斗争的火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唤起群众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应该强调，美国人和英国人在西德能够贯彻自己的政策，是由于他们在德国的代理人所进行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活动。应该对美国人及其德国代理人发起猛烈的进攻，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应表明德共反对的是什么样的政策，是为什么而斗争。这也有助于群众摆脱基民盟和社民党的领导。

秋尔潘诺夫同志说，另一方面，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未来的傀儡政府可能发表的宣言将在苏联占领区引起强烈的反响。为了预防这个宣言可能产生的各种影响，我们为了占领区的政治发展，现在就应该揭露这个“国家核心”。不应该忘记，如果我们在苏联占领区有所建树，那么就会遇到自民党和基民盟的反抗，关于“国家核心”的论据将成为他们反对我们的计划的斗争的补充论据。现在有理由认为，资产阶级政党正在孕育着一种想法，反对所谓双重壁垒，即在苏联占领区建立国家机构的可能性。有鉴于此，必须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并首先同建立民族阵线联系在一起。……

西德国家的成立使西德和苏联占领区之间相互关系变得明朗化了。因此必须广泛地利用苏占区，使它成为共产党力量的源泉。讲到这一点时，秋尔潘诺夫同志强调说，对于共产党和西德其他的进步分子来说，必须在思想上坚信自己的力量，对自己充满信心，因

为没有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就难于把群众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

秋尔潘诺夫同志接着说，必须考虑到，美国从其帝国主义利益出发，将要努力在西德收买广大居民阶层，因此特别重要的是有说服力地向群众说明，美国人给德国人的“援助”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援助后面隐藏着什么。这时要特别注意展示，未来等待着西德的是什麼，美国把西部各占领区变成殖民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德的经济结构，把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变成一个获得工业原料的对象。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为转变西德人民的思想意识而斗争，考虑到帝国主义占领者四年的统治实际上是希特勒十二年统治的继续，美帝国主义分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的正是导致希特勒窃取政权并且支持他的那些力量。必须使德国人民懂得这一点。

在秋尔潘诺夫同志之后，乌布利希再度发言，他又一次申明了自己关于主要打击对象的观点。厄尔斯纳实际上也符合了乌布利希的讲话和阿克曼讲话的第一部分，但关于必须主要打击社民党的观点，他与阿克曼展开了争论。

讨论就此结束。莱曼做了简短的总结发言。莱曼在其结束语里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在谁应该是主要打击对象的问题上，他同意乌布利希和秋尔潘诺夫的观点。莱曼激烈地强调，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打算放弃阶级斗争的立场，民族阵线以及这个运动的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意味着德共放弃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莱曼简短地谈了领导机构的变动（书记处的扩大）和书记处准备为加强党的中央机关而采取的措施，以及在党内积极开展反对敌对分子斗争的必要性，特别是考虑到鲁特·菲舍尔和布兰德莱尔^①在西德开展的活动。

莱曼声明说，他同意同志们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已经进行的讨

^① 鲁特·菲舍尔和根利赫·布兰德莱尔均为在西德的共产党活动家。

论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巨大帮助。

皮克做了总结发言。皮克强调了全面加强共产党工作的必要性。他说，关于主要打击对象的问题，并不像应该朝什么方向做工作的问题那样重要。他说，必须把工作集中到社民党和工会问题上来。向议会提出符合工人利益的实际建议，维护农民的利益。皮克说，应该善于把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联系起来，而主要的是从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因为这才是基本的。

谈到到宗派主义时，他说，这种病症在统一社会党里还没有根除，但是它对共产党来说则更具有现实主义和迫切意义，因为共产党面对着更强大和更狡猾的敌人。皮克说，必须坚决果断地进行反对党内敌人的斗争，使党纯洁起来。……对待苏联以及苏联占领区里发生的一切，在党内必须形成一种明朗的态度。必须让人们懂得，世界上存在着两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民主与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向群众讲清，谁拥护美国，谁就是德国人民的敌人。

№01995

沙吉洛夫关于解除秋尔潘诺夫职务 给马林科夫的报告

(1949年9月17日)

致联共（布）中央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同志

请求解除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秋尔潘诺夫少将苏联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厅长的职务，将他交给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处理。

现查明，秋尔潘诺夫少将的父母因从事特务活动被判刑：父亲在1938年，母亲在1940年。秋尔潘诺夫弟弟的妻子与莫斯科一家大使馆的秘书——英国侦察机关的间谍有联系，她的父亲作为右翼托洛茨基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被判处死刑。秋尔潘诺夫的弟弟和弟媳与谢·伊·秋尔潘诺夫少将一家关系密切。

1948年底，秋尔潘诺夫的司机卢金因其叛国的意图和反苏煽动被国家全部机关在德国逮捕。卢金的父亲于1928年叛国，逃往伊朗。

秋尔潘诺夫少将向党隐瞒了父母和亲属被逮捕和被判刑的事实，在自传中没有提到他们。^①

最近一个时期，情报厅各部门有一系列工作人员因被怀疑从事

^① 据1955年6月27日秋尔潘诺夫给苏联总检察院的申诉书，关于他的父母的材料1948年12月曾被调到联共（布）中央。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希金和鲁达科夫将有关材料通知给他。秋尔潘诺夫认为：“有关我父母的材料有许多是伪造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出身，劳动一生，直到年老。对我父母的政治指控和逮捕是没有根据的，这在当时就清楚了，因为1949年初我再次被派往国外工作，并于同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特务活动而被逮捕，有些人因政治上不可靠从德国遣送回苏联。对待政治上的可疑人员采取这些措施并非出自秋尔潘诺夫少将的提议。他对实施这些措施持不赞同的态度，尽管没有直接表现出来。

已经被逮捕的秋尔潘诺夫的司机卢金供认，秋尔潘诺夫在他面前表露过消极情绪。据情报厅的前工作人员，现已被逮捕的菲尔德曼供认，秋尔潘诺夫参与了其下属的犯罪勾当，进行过勒索，并非法地得到过钱财。在秋尔潘诺夫的寓所查抄出 35 种有法西斯主义内容的各类书籍。

秋尔潘诺夫在性格上不坦率，不诚恳。他最近一年来的表现特别神经质，采取种种办法探询莫斯科领导机关对他的态度。

我认为，秋尔潘诺夫少将继续留在苏联驻德军政府工作是不适宜的。为了事业，有必要解除他现任职务，不准许他到德国来。总政治部打算让他在国内工作。

华西列夫斯基和崔可夫^① 同志支持关于解除秋尔潘诺夫少将在苏联驻德军政府的工作的建议。^②

沙吉洛夫^③

1949 年 9 月 17 日

① 华西列夫斯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1895～1977），时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崔可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1900～1982），从 1949 年起任驻德苏军和军政府总司令。

② 1949 年 10 月 18 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谢·伊·秋尔潘诺夫同志”的决议，同意总政治部的建议，免除秋尔潘诺夫苏驻德军政府情报厅厅长的职务。从 1950 年起，秋尔潘诺夫担任列宁格勒陆海军军事学院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③ 沙吉洛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副主任。

№01977

苏驻德军政府关于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 第二十二届全会的情况汇报（摘录）

（1949年11月1日）

……1949年10月4日，在奥托·格罗提渥的主持下，于柏林举行了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理事会例行全会。

全会讨论了下列问题：

1. 关于民族阵线决议草案起草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人弗兰茨·达莱姆）
2. 关于国家的措施。（报告人威廉·皮克）
3. 总结改选会议的经验。（报告人奥托·申）

在关于民族阵线的决议草案起草的报告中，达莱姆指出起草委员会对决议草案初稿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动，具体的就是，更加强调民族阵线的民主性质，但这并不排除坚持为争取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所有人在民族阵线中的合作。决议草案中特别指出了德意志民族对于德国遭受的悲剧负有罪责，德意志民族还没有克服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精神，西德在1949年8月14日进行反动势力获胜的选举以及苏占区里反苏的和沙文主义的情绪，都证明了这一点。……

德国人民对英美的殖民政策报以广泛的民族反抗运动，其宗旨是恢复德国的独立和主权，缔结和约，取消俄国和其他各国的占领状态，恢复经济的统一，等等。

民族解放运动应该在自己的队伍里团结所有的德国爱国者，而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在这场斗争中则承担着特殊的责任。工人阶级与

农民和知识分子结联盟，应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基本力量，因为民族问题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成了最重要的和最现实的政治问题。既然民族问题当前是德国政治生活的核心，那么党就充满决心与德国一切爱国者建立真诚的合作，不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和观点如何。因此建立民族阵线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战斗团结，而且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应该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它的主要打击力量应该对准垄断资本和容克地主的反动势力，它们曾经把德国人民推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其遭受了最大的民族灾难。西德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为在那里建立民族阵线造成了良好的前提。

统一社会党要求建立民族阵线，应该为反对自己队伍里的宗派分子而进行坚决的斗争，同时也反对有人打着民族阵线的旗号，企图鼓吹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反苏政策，否则就不可能完成所提出的任务。……

威廉·皮克就会议议程的第二个问题做了报告。威·皮克的报告是从分析西德的局势开始的，这种局势是由于英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德国走卒的分裂活动而形成的。德国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这也恰恰是美帝国主义分子的目的所在。

可是，不管阿登纳傀儡政府^①如何伪装成德国的政府，它终究是美国主子手中的玩偶。因此党的任务就是在德国群众面前揭露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从而使它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舒马赫的党推行反对派的政策，也指望欺骗德国人民，掩盖这个政府的真实性质。西德政府作为美国资本手中的傀儡，不可能维护德意志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揭露这个政府不过是占领国的机构，而我们则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保护德国人民使其免遭帝国

^① 1949年9月20日，西德成立了以阿登纳为总理的第一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该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组成。

主义列强侵犯的全德国的机构。中心设在柏林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① 就是这样的机构。

然后，皮克阐述了建立这样的政府应采取的计划的计划。根据这个计划，10月5日应该举行各民主党派联盟与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会上将与其他党派就政府的组成达成一致。

10月7日，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将通过把人民委员会变成人民议院的决议。人民议院成立以后，将通过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的法令、组建以格罗提渥为首的政府的法令。

10月10日，各个专区将召开地方自治代表会的非常会议，选出参加专区议院的代表。将有7名有发言权的代表作为柏林代表参加专区议院。

10月11日，专区议院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议院主席。同一天，将召开两院联席会议，选举总统。

10月12日，将召开人民议院第二次会议，格罗提渥将在会上通报就建立政府而进行的协商情况。还要宣布政府的施政纲领。政府的组成被批准以后，政府成员将宣誓就职。在这次会上还将选举最高法院院长和共和国检察长。

接着，皮克表示希望苏驻德军政府能积极地对待政府的成立，并且能宣布把全部权力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自己只保留监督的职能。估计不久就会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政府纲领包括对待西部各占领区的措施态度，大赦在押人犯，

^① 1949年10月7日，德国苏占区临时人民议院宣布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当选为总统，格罗提渥出任总理。10月11日苏联政府宣布：“准备将以前属于苏联军政府的行政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同时宣布成立德境管制委员会代替苏联军政府。

把拘留营移交给德国管理机构，规定了前纳粹分子的权利，将要发表声明，要求苏联在 1949 年末以前遣返所有的战俘。……

皮克最后通报中央理事会成员们，苏联给了德国人民广泛的经济援助。应该指出，对待皮克关于苏联经济援助的声明反应冷淡，但是全会听到限制苏驻德军政府职能的通报时却一齐鼓掌。……